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论坛文集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
筹备委员会 编

中国·西安
2012-09-15

目 次

总 论

- 努力提高“两个自觉”·····周远清(1)
- 关于西北联大的几个问题·····张岂之(4)
- 肩负起繁荣西北的历史重任·····蒋庄德,贾剑鸣(7)
- 传承西北联大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服务当代高等教育·····王庚华,田志松(12)
-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方光华(16)
- 寻觅西北联大的生命密码·····储朝晖(19)
- 战时内迁高校与现代大学发展·····张 玮,朱 俊(31)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姚 远(36)
- 论国立西北联大的爱国民主传统·····李永森(52)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赵弘毅(60)
- 西北联大与汉中·····陈海儒,李巧宁(67)
- 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赵万峰(74)
- 抗战时期的西北战略与西北联大·····梁严冰(84)
- 抗战爆发与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陈印政,王大明(89)
-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起讫时间考·····张 强(97)
- 国立西北联大的使命自觉·····曹振明(104)

分 论

- 国立西北工学院丰碑永存·····姜澄宇(115)

抗战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高等工程教育	·王少安,张尚宇,洪振涛	(119)
从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建立看我校对中国农业的贡献	·····赵忠	(126)
西北联大精神与北洋工学院的办学贡献	·····王杰,肖松山	(130)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的西北元素	·····黄书光	(136)
民国时期家政教育考析	·····戴建兵,张志永	(143)
西北联合大学师范教育的精神品质	·····丁虎生	(153)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	·····王淑红,邓明立	(160)
北平大学的西迁之路	·····胡佳,白欣	(167)
徐诵明与医学高等教育	·····杨春德,于炜武	(173)
李蒸民众教育理念及其对西北联大的影响	·····娄岙菲	(178)
黎锦熙在西北联大开创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秦开凤,何炳武	(190)
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	·····崔莉	(196)
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张贻惠	·····白欣	(202)
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曾炯	·····王淑红,姚远	(209)
西北联大对张骞墓的发掘与维护	·····姚远	(218)
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经济与商学系	·····卫玲,柴莉	(224)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历史学系	·····崔幸	(231)
西北联大工业经济管理教育的肇始	·····张建新,燕云捷	(242)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数学教育	·····李晓霞,姚远	(248)
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物理学系概况	·····白秀英,姚远	(255)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地质地理学教育	·····李晓霞,姚远	(263)
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教育体系的演化	·····张建新,李晓霞,姚远	(272)

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 ·····姚聪莉,刘莹(277)

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生活研究 ·····刘俊凤(284)

回忆与口述史研究

回忆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 ·····穆嘉琨(292)

百岁老人 缅怀母校 ·····马瑞玉(301)

回忆西北联合大学 ·····李钟善(304)

西北联大三位名师传略 ·····李钟善,刘新科(306)

校友伉俪叶培大与袁保鑫 ·····陈印政,王大明(313)

西北联大的故事 ·····姚远,宋轶文(318)

总论

努力提高“两个自觉”

周远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如何发挥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高等学校如何践行文化育人?我认为要努力提高“两个自觉”。

一、努力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

大学要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大学要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大学要直接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学的三大职能,即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些观点都被人们所认同、所接受,也是大学一直所践行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所有这些大学职能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大学的重要功能就是传承、实践、创造文化。从这一意义出发,大学就是实践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的场所。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了大学,大学同样承担着实践、传承、创造文化的重任,特别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才的培养来实现她的这种功能。大学正因为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实践、传承、创造文化,满足国家、社会永恒的需要,才得以源远流长。大学教育不仅在于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更在于她具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内在的不可替代的教育力量。而要让这种文化熏陶力量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提高大学文化自觉,建设一种追求真善美、有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的文化精神。

大学的文化自觉,在于大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当代中国的大学应该摆脱纯粹的功利性甚至是工具理性的困扰,在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同时,更应牢记其民族的使命、文化的重任,更应自觉地认识、领悟和把握自身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

大学的文化自觉,也在于自觉地将文化建设融入人才的培养的全过程。大学的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大学的科类单一状况已经明显地改变,很多大学的学科更加综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加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逐渐融合起来。这不仅改善了人才培养的环境,给学生更加广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大学更好地把实践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与培养高素质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从重理轻文、单纯培养“专业”人才、单纯传授专一知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大学的文化自觉,更在于积极推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促进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大学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学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教学科研的改革与发展,都与促进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关。只有把大学

* 周远清,男,湖南桂东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

的具体任务、短期任务和大学的历史使命、长远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实践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的任务自觉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大学才能担当起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同时,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更重要的也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上,要以直接促进全社会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为己任。

二、努力提高学校素质教育的自觉

大学践行文化育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根本路径。今天,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对素质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对素质教育的自觉,提高对素质教育的认识。

1.我国高校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在高校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开始时引起过一些争论和质疑,但时间很短,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原因在于它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与熏陶为内核,引起了学生和教师的极大兴趣。在许多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报告几乎场场爆满,从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索。文化素质教育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轰动,同时又久盛不衰,其关键就在于“文化”二字。

文化素质教育经过十五六年的实践,今天回过头来认识,不仅切中时弊、顺应潮流,而且还应加上四个字:“涉及根本”。涉及根本就是涉及大学的根本目标、根本任务,即如何培养人;涉及大学如何传承文化、实践文化、创造文化。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大学在特定历史阶段,在育人中传承文化、弘扬文化的重要探索与实践。

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素质教育的精髓在“文化”二字,它的魅力也在“文化”二字,特点也在“文化”二字。大学校园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与格调也正是源于文化,源于高雅、厚重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融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于教育之中,是以优秀的文化培育、塑造人才的教育。因而,要重新认识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提高加强素质教育的自觉。

2.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是体现方针性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实施素质教育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这一点为素质教育实施历程所证实,而且已为不少人所认同。

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或者说三要素,即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对“素质”这个概念准确定义不容易,但已被广泛使用,并被老百姓所理解、认同了,约定俗成,而且被看作是比知识和能力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内化为人的内在的稳定性的品格,是涉及人的格调、品位、品格的东西。而这些内在的品质,更多地是文化的积淀、内化和转化的结果。

从素质教育的提出看,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提到:1985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里,明确提出劳动者的素质。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李岚清同志把它称为素质教育最初的思想源头。素质教育在于“提高民族素质,劳动者素质”。2010年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把素质教育提高到了很高的高度,不仅是“战略主题”,而且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李岚清同志认为,实施素质教育是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实践,素质教育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结果。素质教育在今天被人们广泛认可和重视,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这是我国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

3.从“三注”到“战略主题”。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三注”→“三提高”→“三结合”→“战略主题”的发展过程,这显示了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也显示了素质教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形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

199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针对当时时弊,提出“三注”,即“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提出“三注”,主要强调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与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创新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在于高素质的养成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因此不能离开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孤立地讲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注”将素质教育的理念引入高等教育。

1998年以后,随着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的召开,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以后,文化素质教育进入一个推广和提高的阶段。针对这个阶段的形势,提出“三提高”,即:提高学生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素养,特别是文化素养;提高学校品位,特别是文化品位。由此,把提高广大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纳入到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中,进一步拓展、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2005年,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展10周年,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出应着重做到“三结合”,即: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教师文化素养的提高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把素质教育提高到“战略主题”的高度。“战略主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是核心是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二是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牵涉民族素质的提高,实施素质教育对全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提出“三注”,是对原来偏重知识传授的教育思想观念的突破;重视“三提高”,则是素质教育理念的又一次升华和飞跃,也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探索的途径和目标;做到“三结合”,是文化素质教育与其他素质教育结合,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路径;提高到“战略主题”,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附录“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筹备会如期召开,我非常支持这个事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将积极支持这个论坛。今天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对于西北联大,我们教育界是不太清楚的。西北联大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拥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也培养出很多人才,它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很值得我们回顾、整理、发掘,也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我国第一位留苏博士、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院士,就是西北联大分支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1939年自陕北佳县转入)毕业、1941年夏保送入西北工学院电机系、1945年毕业的。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角度审视,西北联大也是很有贡献的。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是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牢固的基础。我主持过“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等研究项目,深感缺少西北联大是一大遗憾,应该把这一块补上。同时,这对于落实和发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的高等教育文化传承创新,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议论坛的主题最好加“发展”二字,改称“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

(以上据作者2012年4月3日在“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筹备会上的发言摘录)

关于西北联大的几个问题

张岂之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的研究, 成果比较少。今天在西北大学召开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十分难得。对于这个主题, 我过去没有研究, 为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 看了一些资料, 读了一些有关文章, 初步有些感想(谈不上是系统的学术见解), 请诸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指正。

一、西北联大及其解体的历史大背景问题

有一种看法, 认为西北联大的组建, “完全出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有意识的战略安排。”这里用“完全”一词可能有点绝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1年), 侵占我东北, 企图灭我中华, 严峻的民族危机, 是当时知识界和教育界都能感受到的。九·一八事变后, 这样的呼声不少: 大西北和大西南是民族的出路, 收复失地、振兴祖国, 应以“两西”(即大西北和大西南)作为大本营, 在这里预作准备, 发展经济和教育。早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两年, 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和大学的缔造者张伯苓先生已在重庆沙坪坝买了地, 盖起教学楼、图书馆、师生宿舍, 准备一旦抗战开始, 就把南开中学迁到这里。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抗日战争后期我曾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过书, 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

至于在大西北门户的陕西办大学, 早在1933年,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有这样的想法, 认为: “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 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 教授百余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①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也筹划将学校内迁至陕西, 他一度“亲自赴陕勘定西京分院院址”。^②邵力子同意该校迁陕, 于1936年1月3日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支持。行政院将申请函转教育部办理。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爆发, 9月10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指令: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长沙, 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西安,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 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南汉中, 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 国民党中央由抗战初期的各党派一致抗日转变为一边抗战, 一边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 甚至采取军事围剿, 与此相应, 对迁至后方的大学则进行严厉的政治和思想监控。特别是在陕西, 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胡宗南部队的司令部就驻扎在西安, 因而对西北联大的监控远胜于对鞭长莫及的西南联大的控制。

从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出发, 才能了解为什么西北联大只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便解体, 而有五校之设。

二、为什么西北联大只有一年多的历史?

关于西北联大, 需要对此前的北平大学作一些分析。新中国建立后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

^①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至教育部笺函》, 载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26页。

^② 李书田: 《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 载杨慧兰: 《世纪记往》,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4-32页。

侯外庐先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北平大学任教授职，他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说：“三十年代初，北平大学法学院汇聚着一批比较知名的进步教授，院长白鹏飞先生肯于容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时该校有名的教授中，有李达、陈启修（豹隐）、陈翰笙、许德珩、章友江、王思华等人。平大法学院的学生也特别活跃，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没有什么活动少得了法学院学生的参加。”^①当北平大学迁至陕西，成为西北联大的一员，北平大学法学院的革命进步传统影响着西北联大的师生员工。北平大学原校长徐诵明先生在西北联大成立后任校常务委员。1939年，国民政府电令西北联大解聘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先生拒绝执行，教育部催办，徐先生与此前北平大学40余名教师愤而辞职。西北联大很难继续办下去，于同年解体。

关于徐诵明先生，请允许我多说几句。新中国建立后，徐先生为建立中国病理学作出很大贡献，曾担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1990年11月22日徐诵明先生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徐老病逝，享年101岁。

西北联大办不下去，主要是政治原因，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例如西北联大在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不仅有人事矛盾，还有经费如何分配使用等问题，解决不了。

当时随西北联大来到陕南的，有众多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他们中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们建议联大解体后，可按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而且考虑到西北联大的学科基础，在陕西分别设立大学，各自独立管理。这些意见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这才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1944年全部迁至甘肃兰州十里店）五校之设，此举措奠定了以后数十年间陕西省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其功不可没。因此谈西北联大不能只限于存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校史，应扩展至五校之设。关于此五校，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办学理念是相同的，这就是爱国精神、扎根西北、开发西北。关于这三个理念如何体现，及其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贡献，有些学者已作深入分析，我也有专文论述，这里从略。

三、关于西北大学的若干问题

西北大学的源头始于1902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设立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辛亥革命后改名为省立西北大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名国立西北大学，后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改名为西安高中。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名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在抗日战争前，陕西省的政治经济和师资条件难以支撑一所大学，应承认这样的事实。不过，由张学良将军负责从沈阳迁来西安的东北大学则是另一回事。西北大学于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其校址就是东北大学的。抗日战争期间，西北联大为在陕西办大学灌注了新活力、新血液。1939年8月，由文、理、法商学院组成国立西北大学，校址在陕南城固。教授们来自五湖四海，不但传承了北平大学法学院的革命传统，而且传承了北平师大的优秀学术传统。这两大传统是西北大学的根基。

今天说西北大学有110年校史，是从“源头”上计算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重建”，这时西北大学学科的综合性质，才开始提高到教育自觉的高度。抗战胜利后，西大重返古都西安市，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中国建立后，西大以其较强的学术综合实力和历史原因，成为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后来，在有关西大归属问题上，陕西省有关方面有所失误，1958年再三向教育部要求将西大下放省管，屡劝不止。西大遂成为省属地方大学，给后来者带来很大困难。今天对此作一些反省是必要的，说明办好一所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有随意性、主观性。今天我们西大的同仁们应多向兄弟院校学习，谦虚谨慎，时刻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4-35页。

四、关于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的相互比较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贡献，“比较”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比较不是说谁高谁低，而是总结经验与教训，供人们、特别是高等教育界的同志们参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之为“以史为鉴”吧！

先说西南联大，其权威性的总结颇不少见，如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可称之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此碑文千余字，抽绎出西南联大的四种精神，即：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的爱国精神；学术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克服危难，恢复故土的民族自信心。

西南联大是我国国内顶尖的三所综合性大学的联合体，长达八年，所谓“综合”，从大学精神的层面看，这主要指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在此影响下，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在本专业范围内可以受到权威学者们指教，课外又可听到人文社会科学大家的讲演；这两者的结合，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肥沃土壤，因而杨振宁教授自豪地说：“西南联大的八年，毕业生 3000 人，今天国际上，非常出色的第一流学者中，有科学的，有工程方面的，有文史方面的。……”^①

我们再来看西北联大。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有公认的、经典性的西北联大碑文，时间短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要从其中抽绎出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可能有些困难。因此，有的论者认为，“西北联大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未真正建立，……”^②我觉得提出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西北联大及其以后的五校，马克思主义是不允许自由讲授的，而某些人文学科的观点也受到限制。在五校中，只有西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则是专门研究教育方面的高等学府，李蒸先生作为西北师院的院长，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维护师范教育，论述中国师范大学的特色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其它三所则属于自然科学大门类的高等学府。因而西北联大要像西南联大那样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融合，体现在学校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上，那是很难的，也不能这样去要求。

如果论断只停留于此是不够的。学术自觉性体现在多方面，不止一点，例如西北联大以后的五校之设，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开发西北需要怎样的专业人才，学科体系如何有效地为建设西北服务。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五校不是口头上，不是短时间内，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在长期过程中为开发西北作出了很大贡献。众所周知，玉门石油矿最初开发时，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来自西北工学院等校的毕业生。西北联大及其后来五校的毕业生几乎全部在我国中西部工作，其中半数扎根于西北五省区（陕、甘、宁、青、新），为战后中国的西北建设，尤其为新中国建立后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储备了人才和知识、技术的资源，体现了对于开发祖国大西北有了相当高的自觉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还想提到，过去西北联大和五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艰苦岁月，更加坚定了当时师生们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我有幸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城固师大附中（当时只有初中，迁到兰州后才有高中）读过书，尝过“艰苦”的滋味，举个例子，每天晚上的自习，如果有了一支蜡烛，我们都要掂量怎样用它，平时用的是自制的小油灯，微弱的光却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明白无误的真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北联大及其五校值得我们研究，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谢谢大家。

^① 张劲夫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81页。

^② 储朝晖：《寻觅西北联大的生命密码》。

肩负起繁荣西北的历史重任

蒋庄德*， 贾剑鸣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49)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两大高等教育联合体之一，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立，1938年前后崛起于汉水之滨、秦巴山地，在艰辛备尝的抗战岁月中风雨兼程，拼搏奋进，为培育民族精神、延续中华文脉和振兴西部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隔70余载，典范犹存，影响深远。从西北联大母体生长出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一批著名高校深深植根于西北大地，作用重大，发展喜人，前程似锦。而与此相辉映，西安交通大学同样奋勇地投身于抗战烽火和民族解放斗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举校移师大西北，一同肩负起繁荣和发展祖国西部的时代重任。西北联大、西安交大，都是以奋发进取的卓越风采，为国家民族写下光辉的一页，彰显其历史功绩，弘扬其高远理想，承续其奋斗精神，对于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和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铭记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振兴祖国文化教育的光辉历史

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是我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觉醒和社会大动员，亿万民众同仇敌忾，以前赴后继的巨大牺牲精神，演奏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最强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令我们格外感到自豪的是，重大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召唤下，中国知识界与广大民众一起，肩负起时代重任，勇敢地站在抵御侵略、捍卫祖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最前列。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已投入奋勇抗争的激流。“七七事变”之前的1936年初，马叙伦等300多位知名人士不顾当局强压和敌伪干扰，毅然发起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发表宣言慷慨陈辞：“中国是民众的中国，土地是民众的土地”，决不允许敌伪染指，也坚决反对任何为虎作伥、压制抗战的言行。他们大声疾呼：“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应该一致起来抗敌救亡，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是下了牺牲的决心，任何压迫，无所畏惧。我们希望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不要偷安退缩准备作亡国奴才。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在这些大无畏的知识界人士中，就有后来担任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的吴祥凤等多位知名教授，他们胸怀大义，正气凛然，不惜为国家民族献身。在抗战烽火中，他们更是以甘冒锋镝奋勇向前、施教育人百折不挠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大学凝聚民族精英和凝结知识精华，大学创造、传播和升华人类文明，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大学在而命脉存，大学强而国运盛，大学的蓬勃林立足以托举起华夏文明的制高点。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轫于1895年，至抗战爆发还只有40余年历史，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向前迈进和向上发展，其中的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师生员工都是弥足珍贵的，绝不能听任强虏肆意摧折。而据史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

*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的，对我国各地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特别是敌机不间断的轰炸扫射常常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作为主要目标，其残忍猖獗令人发指。至 1938 年 8 月，我国 108 所高校中竟有 91 所遭到日寇破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完全损毁，学生流失达 50% 以上，成为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大劫难和文化大浩劫。为了坚决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从文化教育和精神魂魄上彻底摧毁中国的图谋，最大限度地保存、赓续和振兴华夏文明命脉，于是就有了抗战时期艰苦卓绝和气壮山河的中国高校大迁徙，当时因战争影响而被迫西迁、南迁乃至三迁、四迁的高校前后竟达百所之多。如今时过 70 多年，当年那一幕幕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师生员工相互勉励，披星戴月奔赴抗战后方的壮烈情景仍令人荡气回肠，深深感染。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枪响，日寇大举进犯，平津首当其冲。奋起抗战、救亡图存的嘹亮号角之下，分别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等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应运而生，昂然崛起在中华大地上。为了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大家紧紧携起手来，迅速团结起一大批爱国师生，毅然向大西北和向大西南挺进，开启跋山涉水传承薪火的非凡征程。为了更好地肩负起教书育人光荣使命，两所临时大学不久分别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为战时我国高等教育的两面旗帜，宣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振兴文化教育的坚强决心。西北联大校歌所高唱的“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充分展现了广大师生员工勇于为国担当的高远志向和卓越风采。

西北联大 1938 年 4 月在陕西汉中正式宣告成立。她的诞生，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更成为大西北高等教育振兴的重大契机和崭新开端。战时的大迁徙大转移，演变成面向西北未来的科教文化事业的大变革和大发展。西北联大荟萃络绎迁陕的多所高校，按照国民政府“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的决策，启动了文理、法商、农学、工学、医学、师范 6 个学院和 22 个系的建设，其强大的师资阵容和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大西北历史上从未有过。她所呈现出的蓬勃朝气和一派新貌，吸引着全国范围内的有志青年奔涌而至。她集中方方面面所长，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不懈开展教学和研究，将抗战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源源不断送出。

西北联大影响深远。虽然她作为一个高教联合体存续时间并不很长，但由其母体生长出的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植根山岩蓬勃而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储才兴学，开辟新宇，教化一方，造福百姓，先后哺育上万名青年学子，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为支援抗战和振兴西部创造了条件。而在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以上 5 校除少量师生和学科回返京津冀外，几乎是建制制地留在了陕甘两地，为当时内迁大学所仅见，是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

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到冠以西北之名的国立各大学成立，从 1937 年秋师生辗转汇聚西安，到 1938 年春翻越秦岭向汉中转移动，从抗战风云初起到最终取得胜利，那一个个甘苦备尝开拓奋进的艰辛岁月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它们极大地磨砺了师生员工的品格，激发他们勇敢地肩负起使命和责任。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其前身西安临大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就曾写下可歌可泣的壮烈一页。1937 年 11 月医学院师生们从北平刚到西安不久，立即组成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的 30 多人抗日宣传队，顶风冒雪前往宝鸡、凤县、南郑等地，宣讲抗战道理，传授防空知识，开展义诊活动。几个月后西安临大南迁之际，其救护队也是由医学院的高年级同学们组成。在汉中办学期间，医学院曾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教务长杨其昌教授和两名同学不幸牺牲，但师生们不屈不挠，斗志更坚。风雨飘摇极端困顿的 8 年间，其教室、诊所、病房散布于古庙民居，图书资料匮乏，一日三餐无继，做手术要点蜡烛。但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医学院集中了包括内科名宿吴祥凤、我国皮肤性病学科奠基人蹇先器、药理学大师徐佐夏、生理学名家陈作纪、法医学创始人林几、公共卫生学带头人严镜清、儿科后起之秀颜守民，以及后来长期

主持院务的著名医学教育家侯宗濂等在内的优秀师资，开出了战前的几乎所有课程，并著书立说，潜心科研，医术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培养学生数以百计。附属医院克难攻坚进行多种手术，采取各种医疗手段，竭尽全力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疾病痛苦，其口碑流传至今。同样，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在其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坚守秦巴山地团结奋斗，为抗战而献身的艰辛足迹。

70 多年后回望，正是由于贯彻了那样一种为国家民族执着奋斗的精神，从当年西北联大走出的大学群体无不得到健康快速发展，其中涌现出“985”、“211”高校，以及一批在国家建设和区域建设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校和学科，成为科教兴国、文化强国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骨干力量。与西北联大具有明确血缘关系的原直属卫生部西安医科大学、原直属中国人民银行陕西财经学院，均系大西北具有领头作用的优秀学府，2000 年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后作用更加突出，发展更加迅猛，互补更加显著，齐心协力共创未来，为在祖国西部早日建成具有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饮水思源，愈发感到当年西北联大那种崇高信念和坚强决心的可贵，也愈发激励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矢志开发和建设祖国大西北，沿着先贤足迹奋勇前进。

二、弘扬优良传统，扎根大西北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在仰望西北联大历史丰碑之际，我们也油然联想到西安交通大学当年同样奋勇地投身于抗战洪流，并在此后献身于大西北的历史性抉择，从中得到新的教育和启迪。

西安交大作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校之一和工业教育先驱，1896 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1921 年定名交通大学。抗战初期，交通大学先后成立平越分校、重庆分校，并于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将学校本部设在了战时中枢重庆。虽然借用厂房上课，搭起茅屋住宿，面临敌机轰炸等种种危险，条件艰难到极点，但学校不辱使命，始终恪守严谨治学优良传统，锲而不舍地培育专业人才和攀登科学高峰，于百年史册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辛的岁月，而学校已预见到：“一旦战事结束，我国必须进行大规模之工业建设”，“我国欲赶上欧美工业，必先迎头赶上欧美之工业教育”。为此一方面加快引进留美、留欧青年学者，把世界上最新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大力完善学科专业，精心办好电机、机械、土木、航空、造船、运输管理、工业管理、财务管理 9 个系和航海、轮机两科。特别由于航空和航海、造船等系科的开设，在传统土木机电基础上前所未有地拓展了学校事业，成为当时所罕见的理工管兼长和“海陆空”齐备的一所新型工业大学。学校还与众多企业合作成立电信研究所，开展抗战所急需的科技研究，并成规模地培养研究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所授予的工学硕士将近半数出自交大这一时期。正是通过坚持不懈和坚韧不拔的努力，为学校进一步提升水平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师生员工永远引以为自豪的。而同样经过抗战大后方的艰苦磨砺，交大师生对于广袤的祖国西部大地产生了深厚感情，为日后最终扎根大西北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如果说抗战期间的交大重庆兴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那么 1956 年的举校内迁西安，则是从根本上把自己的命运与大西北人民群众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西北、西南地区加紧兴建一批规模巨大的新工业，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大量部署在内地，铁路新线建设的半数任务、工业投资的 1/3 安排在西部地区，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形成高潮，深刻影响国家未来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于 1955 年 4 月作出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以彭康校长为首的交大党组织和全校师生员工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在接到上级指示的当天，迁校工作就已经开始研究和部署，仅仅一个月后，西安新校选址即告完成，随即全面展开施工，一年后就已迎来首批一千多名西迁师生员

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稍后不久，全校 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全部历史档案，都相继运抵西安，全校 70%以上的教师，1954、1955 级 80%以上的学生，1956 年入校的全体学生，都已经生活在西安新校园，而后续师生仍不断迁来。1957 年鉴于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中央提出兼顾大西北和沿海建设，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交通大学调整迁校方案，一校之下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1959 年 7 月，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成为当时全国 16 所重点大学中的两所，原领导交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彭康同志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一株在黄浦江滨生长了整整 60 年的大树，就这样在大西北黄土高原深深地扎下根来，同样参天蔽蔭，更加枝繁叶茂。

建设和开发大西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等，亲自领导了交大内迁西安的工作。周总理的亲切教导：“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交大在西北发展前途大”，师生员工牢牢铭刻在心。交大迁校作为牵动八方、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全局性工作，始终得到高教部、上海市、陕西省的大力支持，充分调动了校内外的积极性，特别是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交大到来，提供了当时最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令师生员工深受教育和鼓舞。当年的老教授们“举家西迁高风尚”（引自江泽民同志 2009 年 7 月写给交大老教授的寄语），甘愿舍弃江南鱼米之乡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不惜低价卖掉上海的住房，义无反顾走在西行最前列。年轻教师和大学生们打起背包就出发，成为迁校建校的中坚骨干力量。老一辈交大人所创造的“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半个多世纪后仍给予我们深刻启迪。

与当年西北联大牢牢植根陕甘，矢志振兴西部教育的伟大理想相辉映，交通大学西迁作为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立足于长远建设和未来发展，也是要干出一番新事业的。从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到黄土弥漫的大西北，她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环境挑战和条件困难，最主要的还在于能不能把学校事业发展得更好，更加出色地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事实表明，西迁成为学校大规模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开端，全面推进科学研究的开端，兴办尖端学科专业的开端，西迁带来了高知群体在西部的聚集，促进了教育科技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明风尚，从而凸显了优秀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导性作用。西迁磨砺了学校品格，全面提升了办学实力，赢得了她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这一切正如教育部原部长周济同志在教育部交通大学迁校 5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进一步向中西部转移，当年这着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充分显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交大西迁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今天历史已翻到了崭新的一页，形势和任务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祖国西部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既是十分光荣的使命，也注定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取决于学校在新型工业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进程中的表现，取决于能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把握先机，也取决于学校的国际化、卓越化程度，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能不能继续起到表率 and 引领作用，坚持不懈地出先进思想、出创新成果、出一流人才。为此，近年来学校切实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一是坚持内涵发展，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实行“2+4+X”培养模式，并通过兴办钱学森实验班、基础拔尖人才实验班、侯宗濂医学实验班和提高少年班水平，开办工程坊，首创书院制，弘扬体育精神等，贯彻钱学森大成智慧学，带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深化；二是推进体制改革，打造适应未来发展的学科格局，并通过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快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学校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三是加强协同创新，以全国、全省范围内政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以大力度积极参与创新型国

家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际行动，赢得学校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竭诚服务社会，为我省“经济强、教育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建设目标做出应有贡献；五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前导地位，坚持文化强校，弘扬大学精神。

以“2011”计划为导向，今年以来，学校与卫星测控中心、航天集团五院西安分院、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合作成立西安太空信息工程协同创新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成立可持续发展学院，与陕西戏曲研究院合作成立戏剧学院等等，丰富了西安交大的发展内涵，标志着学校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迈出新的步伐。

榜样力量无穷，精神丰碑伟岸，70 多年前战火中昂首挺立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代表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促进了大西北高等教育的振兴，带来了高校蓬勃发展的局面，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同样，我们也十分珍惜交通大学的西迁精神，决心沿着西迁师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西安交通大学将以本次《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契机，认真学习实践西北联大所缔造的优良传统和卓越风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各兄弟院校紧紧携手，共同肩负起繁荣和发展大西北的历史重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谱写辉煌篇章。

传承西北联大办学理念和传统文化传统， 服务当代高等教育

王庚华，田志松

(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西北联大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个临时的学校，它的存在时间虽然较短，但却对西部高等教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本文从一个层面对西北联大办学理念和传统文化传统进行简要分析，提出其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并列举东北大学办学实践加以佐证。

关键词：西北联大；理念；传统；高等教育

西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为应对战事而组建的一所临时学校，虽然相比西南联大来说，西北联大存在时间比较短，但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曾撰文指出，西北联大是西北高等教育生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说：“今天在西北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就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西北联大的校训为“公诚勤朴”。根据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由黎锦熙撰成的西北联大校歌词曰：“并序连甍，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三校在平津办校 40 年，在秦陇联合举办文理、政法、师范、农、工、医教育，以“公诚勤朴”为校训，传承民族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标作了高度概括。

西北大学赵弘毅教授在提及西北联大的办学传统和精神对陕西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意义时归纳整理为三点：一是在办学思想上，突显时代特色，主动适应抗战需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二是在教学、人才培养方面，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特色，注重为抗日救国和地方培养适用人才；三是在科学研究方面，突出地域特色，积极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诚然这三点不仅仅对陕西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推广开来，对西部高等教育，以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其历史意义仍然存在，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不遗余力的发扬和传承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传统文化传统，服务当代高等教育，使之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一、传承文化传统，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大力弘扬主旋律，用先进文化鼓舞斗志、凝聚力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学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大学就是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始终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大学就是要切实担负起高等教育强国的责任，积极借鉴国内外一切成功经验，始终保持永远追求卓越的精神状态，坚定不移地着力提升办学水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要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就是要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文化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把握正确的人生航向，立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推进文化育人的根本要求。大学始终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首要职责，引导学生科学发展、成才报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二、传承文化传统，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向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因此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较为系统和牢固的，但是高等教育的创造性不足，这使得我国大学教育与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相比，虽然能够提供比较系统的知识，但是前沿知识还不够丰富。尽管它们所处的层次有所不同，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在承担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却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型人才。

我国现代化建设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高等学校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自主创新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敢为人先、敢于超越、敢于竞争的理念还不深入。文化的传承创新正是要大力提倡这种敢为人先、敢于超越、敢于竞争的理念，不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鼓励学生成为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新型人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打好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认识和掌握真理。

高等教育在培育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加工知识，也就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对知识进行创造、积累和传播。此外，高等教育还可依靠其知识优势和多学科的人才，直接为国家提供教育和培训等服务。因此，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持，通过传承优秀文化和创新先进文化形成新的成长点，保持了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性。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就是一种教育创新，目的是培养出真正能够与时俱进的创新型人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不同层次的创新型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也不能离开各种类型的高校。

面对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脚踏实地，勤于探索。目前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过程中，还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对外技术依存度比较大，许多自主创新技术缺乏政

策环境支持，高层次人才短缺，重引进轻消化现象明显等，这些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如果这些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可能制约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目前，高等学校已经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及文化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大学是否能够有效传承和创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因此，大学不仅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推动先进文化的创新和传播；不仅要研究、回答理论问题，更要研究、回答现实面临的问题，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不断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三、传承文化传统，服务区域和地方经济建设

大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来实现的。忽视了人才培养，就忽视了大学的使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当前，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大学必须承担起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

东北大学是一所有着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学，历史上曾与西北联大有过一段渊源，在近90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坚持传承历史文化，紧扣时代脉搏，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作为部省市共建的国家重点大学，东北大学坚持“立足辽沈、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方针，以服务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基础，理顺科技创新体制，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积极发挥人才、知识、成果的辐射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东北大学的发展定位紧密结合行业、区域和地方经济建设。

从上世纪中后期的“为冶金工业服务”到“既为冶金工业服务，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逐渐明确了建设“国内一流、行业示范、理工为主的多科性社会主义大学”的发展战略，到世纪之交的“立足辽沈、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学方针，东北大学不断强化冶金、信息学科特色和产学研相结合办学特色，将办学目标定位在建设“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是立足实际，着眼未来，经过了慎重思考、广泛论证后做出的，在东北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北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特色，在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支撑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方面具备了一定的人才和科技优势。作为地处沈阳的唯一一所“985工程”建设高校，东北大学要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带来的有利条件，主动参与到区域经济振兴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去，谋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强化特色、发挥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优化学科布局，切实担负起“扎根社会、引领发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责任和使命，在引领和推动辽沈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上有所作为，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引领者和开拓者，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在建校百年之际，将东北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高端创新人才的培育基地，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发和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基地，加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传播先进文化的思想库和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的研究平台，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引领者和开拓者。

东北大学十分重视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学校以“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为契机，对科技体制与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新创业，企业孵化，综合服务”三大平台建设，逐步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充分

发挥大学对社会的科技辐射作用和服务功能。与此同时加强产学研结合，紧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加强产学研合作，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东北大学积极响应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全面服务于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十一五”期间，学校与辽宁省内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 2000 多项。与沈阳机床、沈阳铸造所等单位共同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10 余项，与沈飞、606 所等单位共同承担国防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与北方重工、华晨汽车等企业开展联合科技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为企业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赵弘毅.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25-30.
2. 方光华.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8-10.
3. 顾秉林，胡和平. 大力推进文化创新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J]. 中国高等教育，2012，（3、4）：12-14.
4. 徐显明. 大学理念论纲[J]. 中国社会科学，2010，（6）：36-43.
5. 周绪红. 推进研究性大学建设是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J]. 中国高等教育，2008，（1）：31-35.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

方光华*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同时决策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云南,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十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极为薄弱,其史实很少为世人所知。

事实上,西北联合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联大是西北高等教育生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组成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到来之前,西北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根基相对薄弱。而西北联大的主体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有较强的实力。例如北平大学有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北洋工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有物理、化学、镭学(后改为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迁徙到西北,组成一个高等教育联合体,大大提高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实力。

在西安期间,西安临时大学分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6大学院,24个系,教授计有106名。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太原失守,西安东大门告急。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奉命迁离西安,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依然设有6个学院23个系。

1938年7月,教育部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虽然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但这些学校并没有因为分立而缩小,反而得到扩大和发展。

如西北大学共设文、理、法商3学院12系,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高等文理教育体系。西北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6系,1940年后又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形成了完整的高等农学教育体系。西北医学院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西北师范学院设立有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教育系、体育系、家政系、劳作专修科系。

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

*方光华,男,湖南益阳人,西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外,所有分出院校皆留在西北,为西北地区构建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今天在西北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

二、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光采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不设校长,由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三校校长和教育部特派员共四人组成常委,商决校务。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45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联大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西北联大有黎锦熙撰成的校歌。其词曰:“并序连冀,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三校在平津办校40年,各有鲜明特色,在秦陇联合举办文理、政法、师范、农、工、医教育,以“公诚勤朴”为校训,传承民族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标作了高度概括。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的重大意义。南迁汉中以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苟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根据国民政府建设西北后方的战略,教育部将西北联合大学分设为国立五校。当时就有姜琦教授指出“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目的就是“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

西北联大及其分离出的国立五校逐渐形成了扎根西北、传承文明、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1939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常务委员的报告即说明,“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教育部部长陈立夫1940年6月曾到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1943年11月,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校长赖琏指出:“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也指出:西北大学,为西北最高学府。其宗旨即“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而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也在1940年决定西迁兰州,并于1944年全校迁到兰州办学。西北医学院也在侯宗濂先生的主持下,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做好了西迁兰州办学的准备。

三、西北联大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教育成就

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7名。在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的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谔、沈志远、汪堃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貽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例如黎锦熙开创拼音方案研究,编纂多部陕西地方志,所著《方志今议》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外文系曹靖华一生致力于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第一人。历史系陆懋德研究中国史学方法成就卓著。黄文弼三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大量文物,发现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的位置,填补考古空白。数学系曾炯,以两个“曾定理”和一个“曾层次”闻名,丘

成桐认为他是 20 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齐名的中国数学家。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地质构造五大学派之一。地理系黄国璋是我国传播近现代西方地理科学的先驱,特别对中国古地理学的改造发挥过重要作用。农学院汪厥明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科的创始人。虞宏正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工作。医学院蹇先器是中国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几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严镜清是国内遗体捐献的发起人和践行者。体育系袁敦礼、董守义在 1945 年联名倡议,首次提出我国申办奥运会。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学生中有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赵洪璋、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等杰出人才。例如师昌绪,1945 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2010 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赵洪璋,1940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学系,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接见他,亲切地称他“挽救了新中国”,人们也把他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

四、西北联大体现了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又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其中部分力量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再回迁复校,大部分扎根西北。

整个联大的图书馆,刚开始时只有 2 000 多册图书。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极其艰辛。学生上晚自习用自制油灯照明。但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

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联大还主动适应抗战需要,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1938 年 9 月 8 日,全校组织了 734 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1944 年西北联大有 300 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 43 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可见,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体系系统植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储备了人才,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西北联大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成为 20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我们认为,西北联大的先驱者在民族大义面前,与祖国共命运、与河山同沉浮、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不应被忘记,他们对祖国西北开发使命的崇高自觉不应被忘记,他们期待祖国辽阔西北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的愿望不应被忘记!

寻觅西北联大的生命密码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8)

摘要:西北联大的产生主要是国民政府在抗战背景下实行的后方战略的组成部分,而非学人自主自觉的学术生成。这种组建方式决定着她在此后的曲折变化和最终的落定状态。完全依赖于行政,缺少学人自主自觉的耦合使西北联大的精神文化长期处于无根状态,这样的大学是难以坚守的,这也是西北联大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西北联大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其兴也政府,其衰也政府。西北联大的案例给当下中国大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启示:单靠行政力量建不成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大学,确立学术自主,唤回学人自觉,并加速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加以保障,是在各种条件下提升大学品质的通用密码。

关键词:西北联大; 生命密码; 学术自主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西北联大的历史价值不会有人怀疑,西北联大瞬间即逝令众多人惋惜,在为它修史、保留遗迹的同时,不得不反思:谁给了西北联大的生命?这一生命靠什么来维持?为何这一生命未能久葆青春?如何重新唤醒它的生命?因此,寻觅西北联大的生命密码就不只是具有历史价值,还能对与该校有历史关联的各校形成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解决当下中国大学发展中的难题也有重要启示。

一、播种:非学术自觉的生成

西北联大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战略安排加上抗战机遇,而非学术自觉的结果。这一学校形成的初始原因决定着西北联大此后命运中的每一次曲折变化后的最终落定状态。

1937年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存留住中国教育的精髓,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①。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下发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5月2日,西北联大正式开学;7月,教育部指令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① 蒋昱.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北联合大学[N]. 人民政协报. 2010-08-16, 转载自 http://www.rmzxb.com.cn/jctj/t20061228_112945.htm

西北联大再次改组。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蔡元培、梅贻琦以及国民政府负责人等人的高远见识促成政府做出设立长沙和西安两个临时大学的决策产生，而这一决策本身在当时普通的大学学人内心并未成为自觉自愿的共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动的行动者。

西北联大学生多数为自华北、东北、华中等沦陷区流亡而来，没有衣服被褥，生活无着，主要靠微薄的贷金和公费来维持极低的学习生活。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3年以后。当时，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8年上半年，西北联大千余名学生中，享受公费待遇者仅54人（平大26人，师大17人，北洋工学院11人），约占全校学生比例4%，可见公费比例是极低的，绝大多数学生是靠贷金维持学习生活，艰难完成学业的。不少学生为在战时维持生计，被政府给这些学生每人发给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以及贷金吸引过来。

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大的组建几乎完全是政府行为，在政府发文的时候正是假期，有些学生还不知道消息，当时组建西北联大的几位原任校长在抗战后复校中的态度是西北联大组建为非学术自觉这一论点的重要证明。当时排在首位的常委徐诵明因相对比较包容而被迫离开西北联大的学校群，却担任内迁四川的同济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徐与该校师生的意愿站在同一边，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在蒋介石在巡视宜宾时亲自询问徐诵明：“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依然回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无法从命。”^①

李蒸虽然带领师生员工将西北师院迁到了兰州，但他早在1939年就对学生们说过：盼望抗战早日结束，争取把学校迁回北平；1945年他接受张治中邀请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而离开西北师院；1947年西北师院学生先后掀起“复校”和“复大”运动，李蒸为他们面授机宜道：一是请曾任师大校长的辛亥革命老人李石曾出面呼吁，二是见了欺软怕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理直气壮^②。足以说明他也没有坚持在西北办大学的学术自觉。

李书田对北洋大学有更浓的母校情结，西安临时大学组建时，他虽以北洋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出任常委，心里却只有北洋大学；在1938年教育部指令工学院独立成校，李书田出任筹委会主任，他却不同意将学院称为“西北工学院”，坚持认为校名应是“北洋工学院”，以致在当时三位北洋校友：时任部长的陈立夫以政令相告，孙越崎以学友相劝，时任交通部长曾养甫软磨硬泡的情况下，李书田才勉强答应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1939年3月发生“驱李事件”后，他又率200多名师生南下四川准备恢复北洋，失败后又发誓把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办成北洋大学式的学校；他在两年后任贵州农工学院院长时又一心恢复北洋大学，一年后辞职专心筹办私立北洋工学院，1944年又到西安筹办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直至1946年初王宠惠给教育部电函后，教育部下令在天津恢复北洋大学，李书田又带着35名学生和两名教员回到天津，5月被任命为北洋大学教务总长，虽历经八年波折，总算走完“复校”之路^③。这样一种心态的李书田至少说明他志不在西北发展大学教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尽管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已被注销，依然有人争取像西南联大诸校一样“复校”，这一意愿因与国民政府的战略意图相背而遭到拒绝，甘肃省政

^① 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功德永垂——纪念爱国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先生[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85.

^② 商昭.师范教父——李蒸[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91.

^③ 闻迟.精英主义教育的大师——李书田[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97-98.

甚至动用警力阻止西北师院中的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东返,在这样强的阻止下西北师院的1000多名教职工中仍有300余人返回天津和北平,复校的三所学校事实上是重建^①。

是否在西北联大师生中就完全没有立志西北大学教育的学术自觉的人呢?并非如此,郁士元就是个例证,他不仅从北平来西北后就未随复校回去,还先后办了三所私立文治中学,他看到西北联大设置“地质地理系”不合理,便建议校方向教育部申请将两个专业分别设系,并向他原在北大地质系的老师和同仁,当时已在国民政府或地质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许杰等人反映,实现了地质系单独设立。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有人说是他舍不得在西安办的私立文治中学,更深层原因在于他一生“不执着于外物”的士性人格^②,恰与他的“士元”之名名实相符。

另一个例证就是自称“做梦都是在西大”的张伯声,这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1937年随北洋工学院内迁来到西北。抗战胜利后,很多师生闹着要回天津、北京,但他却选择留守西北大学,之所以如此,是他觉得离不开秦岭和西北,“这是一个对自己学术生命负责任的选择,也是一个有良知的选择……这块土地给了他丰富的研究资源,为他将来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③。这样的例证或许还有杨钟健等人。

在迁校过程中,当时也有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悉后纷纷由各地冒险绕道前来报到求学,在困难条件下学校仍然坚持正常授课;没有图书馆,更没有体育场,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战内容为主的报告,学生与教授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而民族精神和“士气”仍然兴旺,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在“复校”的过程中,西北工学院中原北洋工学院的师生因曾有过李书田四川复校的波折,这次也基本没有返回天津。

但总体上,立志于在西北办大学的人和事都相对较少,或影响力不够大,郁士元也仅代理过地质系主任。简而言之,应当看到当时西北联大建立整体上是执行政府指令的结果,是处于一种战时流亡教育状态,它的悲壮在于战火中的坚守,而非学人的学术自觉。

二、发育:行政安排的按部就班

西北联大从合到分,存在时间很短,几乎它每次发生变化的主动力都是行政的安排。

在形式上,西北联大内部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实质上是行政力量唱主角。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时大学不设校长,王世杰自己却兼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由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等组成校务委员会,加上教育部特派员陈剑脩4人为常委管理学校。而与西南联大相比,这四人常委相对于当时的政府和教育部而言,是一个弱勢的委员会,也是一个与教育部直接连通的常委会,曾因试图委派童冠贤为主任委员而遭到强力反弹。在陈剑脩请辞后,教育部又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并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就是要保证与教育部的连通不断。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西北联大的一切都要依据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的安排按部就班。

1、依据行政指令分分合合

接下来的教育部对西北联大连连发令,西北联大都不折不扣地执行。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1938年,长途跋涉后立足未稳,4月3日教育部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

^① 李寻.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变迁[J].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2辑:20.

^② 李海阳.郁士元传奇[J].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2辑:130、134.

^③ 高远.大地之子——张伯声教授[J].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2辑:114-115.

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根据《方案》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①

不久，国民政府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散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又以部长陈立夫的名义发布训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同时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迁设陕西武功独立设校。同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培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等规定，西北联大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9月8日，全校734名学生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奉令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在行政指令下拆分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

1940年起，西北师范学院又奉令陆续迁往兰州。

1944年9月，西北大学奉命新设边政系。1946年5月，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又奉命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

这组史实表明，西北联大存续的时间不长，“奉令”的频率却很高。与西南联大较为稳定地存在九年相比，西北联大从合到分不到一年时间，这本身也是“奉令”的结果。

2、在政府压力下铲除学人自觉

在西北联大发生的若干事件更能说明她的学术自主性的稀缺。

校训原本是为体现一校特定的办学理念，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45次校常委员会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在宣传校训同时，西北联大不忘将当时政府所定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与校训一并悬挂礼堂，这种做法或出于形式，也多少体现出一种真实的精神。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下令禁止学俄文，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的俄文教授曹联亚（曹靖华）等。国民党为加强对法商学院的控制，改聘张北海为院长，新院长张北海新提名单，另发聘书，曹联亚、章友江、沈志远、黄觉非等13名教师被解聘。曹联亚、彭迪先作为被迫害教授代表曾前往本部抗议。这导致1939年1月12日上午9时，法商院学生列队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住地和平请愿，反对解聘进步教授和取消俄文课程。

由于西北联大的法商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学生人数最多，所学专业与学人自主和法治精神关联度最大。这些学生头脑比较精明，不愿委曲求全，所以该院的食堂伙食最好，既提供米饭，又提供馒头，女生还经常将剩余的米卖掉换菜吃。也正是这一学院的学生最容易唤起自觉和自主性，成为西北大学的学潮发源地。为此，教育部长陈立夫1940年到该学院做演讲进行劝导，国民党元老监察部长于右任也到此演讲。这样的事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几乎不会发生。后来如此强盛的法商学院在五院分立时并未成为一个独立设置的学院也多少说明官方对学人自主的抑制意图。

3、以西北后方战略牵引学人志愿

西北联大对中国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这种作用的理想机制当是学人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

自觉基础上的政府支持，而当时的发生机制是外部牵引，而非西北联大的学人内部自愿。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首先是国民政府而非联大学人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开始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长远考虑。有人推测国民政府早就打定将这批学校留在西北的主意，并从迁往西北的高校体系齐全、管理与决策的绕弯、撤销西北联大的机构和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并收缴校印、建立独立设置的西北师院、陈立夫晚年回忆坦承改变大学地理分布不合理的战略意图，并以 1932 年前后就有将一部分高校内迁的动议来印证^①。

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陈剑脩二常委赴汉口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而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根据国民政府建设西北后方的战略，教育部着手为西北建设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遂有西北联合大学分设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之举。对于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当时就有姜琦教授指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②。

1939 年 5 月 2 日，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常务委员的报告据教育部指令说明：“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③。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中正为西北大学 1940 年毕业同学会题词：“械朴多材”。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1940 年 6 月曾到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④。这些行动都是整体后方战略的组成部分。

无疑，这一决策从多方面评价都有积极意义，却非当时学人的志愿。

同样，1940 年西北师范学院奉命迁往兰州，阻力很大，师生均不同意迁移，教育部长陈立夫对李蒸说：“要借助你们北平师大的力量发展西北教育事业。”李蒸从大局出发向教职工进行耐心说服动员，并采取从 1941 年起分批迁移的策略才完成迁校任务^⑤。

4、学校内部管理党化逐渐增强

1941 年进入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的高启伟回忆“西北联大的新生入学要训练一个月，所谓训练就是校长、秘书长、各个院给新生讲话，介绍各系怎么样。那个时候每一个新生入学都填表参加国民党”^⑥。

早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教育部就想利用搬迁的机会对三校进行改组，派童冠贤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后又任命其为“主任委员”，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常委陈剑脩也提出辞职，迫于压力，童冠贤只好辞职^⑦。这次加强党化行动遇到挫折。

徐诵明被排挤出西北联大是党化强化典型的例证。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前，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已经五年，为人开明正直，推崇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任人唯贤。“一二·九”运动中，他亲自到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1937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求解聘北平大学陈隐豹、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五位疑为“亲共”的教授，徐很清

^① 李寻.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变迁[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18-19.

^②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7.

^③ 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J].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

^④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7.

^⑤ 商昭.师范教父——李蒸[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89.

^⑥ 难忆当年岁月——访西北联大学生、抗战老兵高启伟先生[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139-140.

^⑦ 商昭.师范教父——李蒸[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91.

楚这几位教授的政治立场，却在南京对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和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以致此事不了了之。西北联大组建后，时任常委的徐诵明 1938 年 9 月请辞其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并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引发当局不满，组织三青团围攻许寿裳，并越过校常委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得悉后向徐辞职，徐因此提出抗议并向教育部辞职。教育部长陈立夫以解散西北联大威胁徐诵明，1938 年底教育部训斥了徐，随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徐不予理睬。1939 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曹清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西北联大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大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这成为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和五校分立的直接诱因^①。北平大学也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西北联大农学院由北平大学农学院与原在此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建立，原农专校长辛树帜任院长，北平大学来的教授们因没有行政职务曾闹学潮，赶走了辛树帜，实际上却让后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派来一位他可控制的人掌权。辛树帜虽然是朱家骅委任的，但辛本人是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很敬业、很民主的人，学生非常尊敬他，原本经过考察要他接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却自愿选择到农林专科学校工作，将黄埔军校汇到德国给他的路费退回了。陈立夫派来的校长可能还不如辛树帜，党化更加严重，于是学生不乐意又闹起了学潮^②。

赖琏出任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一干就是六年半，是学校内部管理进一步党化的主要过程。和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不同，赖琏是国民党 CC 系的骨干，他的职业经历是“办党”、“办报”、“办学”，他是 1927 年反共清党的干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将教育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坚定执行者，较好地执行了国民政府的办学意图。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成功和最愉快的回忆，即保证了学校的稳定和正常教学秩序，却难以看到它是建立在强奸学人学术自觉基础之上的。

赖琏来到西北是由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内部纠纷，时任院长李书田向陈立夫请示邀请这位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来调解，并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委派。戏剧性的是，1939 年 3 月，赖琏自重庆至汉中的路上，在广元遇到“驱李事件”发生后李书田率领的 200 余名北洋工学院师生准备到四川恢复北洋工学院，震怒的教育部下令沿途不许提供交通方便，赖琏在答应学生两个条件后，和曾养甫一起成功地说服了这批师生回城固上课，唯有被陈立夫批评为“作风霸道，不善团结”的李书田执意不回。赖琏到校后对罢课近半年的工学院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顿，在短时间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后被教育部任命为院长。由于他对西北工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化解了矛盾，比较受师生拥戴，以致三年后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时，西北工学院师生不愿让他走，教育部让他同时兼任两所大学的校长。

赖琏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同样因为西北大学学潮不断和学校领导间的派系斗争，前两任校长胡庶华和陈石珍因无力应付而黯然离职，于是该校校长职位成为谁也不想接的烫手山芋，国民政府便任命赖琏来整顿秩序。他所采取的手段是安抚与打击两手并用。上任当天，上午在全体学生大会上以“安定第一，纪律至上”为口号，要求大家“树立严格的校风，倡导学术精神，加强读书空气，要使西大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下午以茶话会招待全体教职员，勉励大家在博望侯张骞故里建设新的文化，并强调“我来西大，非教人，乃来领教，非役人，乃役于人”，成功亮相让师生对他充满期望。接着他较好的解决了学校的经费问题。

^① 杨春德、于炜武.爱国重教功德永垂——纪念爱国教育家、病理学家徐诵明先生[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83-84.

^② 造福半个中国的农林科学重镇——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专家杨笃先生[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77-79.

更高的招术在于他利用多年前“清党”的经验对左翼学生“约法三章”，在摸清人数和具体对象后，以写信的方式要求他们不再干涉学校行政，不再举行示威罢课，只要不闹事，就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读书自由。发出这封信当晚就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左翼学生离去，大部分人从此安静下来。对后来还有“不听话”的就采取扣发毕业证、清查进步青年和与军警配合逮捕几名“共党嫌疑”的手法，将“学潮”扼杀于萌芽状态。对于教授们，他则扮演“居委会大妈”的角色，主要采取安抚的方式，但对少数人还是多次发出警告，经济学教授季陶达、文学院教授杨慧修等就先后收到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的警告信。赖琏说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可以，但不允许利用讲台介绍马列主义和宣传共产主义，文学院院长马师儒到延安参观拜访毛泽东被报纸披露后，教育部密令赖琏，赖琏即免去马师儒的文学院院长职务。^①

赖琏式的大学管理是典型的官员办学、党化管理，他的政治立场鲜明，即坚定拥护国民党；他的政治手腕和行政能力出色，能在复杂关系中化解矛盾，维持秩序，稳定局面，贯彻国民政府的西北教育发展国家战略；但他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所做的仅是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是以压制学人自主与自觉为条件的。

正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格式化了自主办学的理念，创造性和包容性都十分有限，抑制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自主生成。赖琏的继任者刘季洪同样沿用了他这种管理模式。在缺少自主性的情况下，学校文化是难以有真正的积累的，这也是导致西北联大很快被湮没的重要原因。

三、湮没：精神文化的无根状态

西北联大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被人们遗忘，这是令人遗憾又不争的事实。

有人在讨论西北联大被历史湮没的时候，提得比较多的是两个原因：一是这所学校存续的时间较短；二是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西部高等教育人才“孔雀东南飞”。这两点都有大量的事实支撑，也或对西北联大的后续影响有关联，也或是西部高校变化的现象；然而，断不能将此当为西北联大湮没以及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拉开距离的主要原因。时间长短确实是影响被遗忘的重要因素，但不要忘记，历史上依然有众多瞬间闪光的存在被长久深刻地刻入人类记忆，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也是短暂的，然而却有广大、久远的影响。作出这种判断的人也忽视了西北联大的规模大于西南联大的事实。

为了清晰的认识这一原因，不妨将当时的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作一深层次比较，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做过两校办学的比较^②，其实，西北联大的精神文化和内部管理制度等内质性因素才应是更为关键的，其中最深层次、影响面最广的就是两方面：

一是大学精神价值层面的差异。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在组建前就比较一致地认同“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兼容并包”作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这一价值在西南联大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大量生动的事例实实在在的体现。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精神得到极至弘扬的典型，“北大的宽容自由、南开的吃苦耐劳、清华的聪明睿智，当时被人比喻为山、海、云的风格。三校结合，使联大既有海似的博大、山样的坚强、云般的飘逸，又集三校之长为一校之长，特色鲜明。”^③从而生成了刚毅坚卓、民主治校、兼容并包、自由与竞争并存、严谨治学、“君子不器”的精神。

西北联大的徐诵明也试图延续此前北平大学的类似理念，却遭遇到当时教育部的直接干预，导致徐诵明等四十余位教授辞职，导致西北联大事实上此后便丢掉了学术自由，仅能维

^① 高远. 世事纷纭说赖琏[J]. 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110-111.

^② 刘明伟.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之办学比较.

<http://wenku.baidu.com/view/a3dbb2d076eeaeaad1f3302c.html>

^③ 刘克选、方明东. 北大与清华(上)[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256.

系日常的教学。

西南联大基本上能够独立发展，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由于地处西安、汉中等地距离延安较近的地方，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暗战使其一再被加强控制，在成立不久又被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

二是保障精神价值得以自主确立的管理制度的差异。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都基本建立起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清华大学尤为成熟。蔡元培在北大采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于政党与宗教之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其中明确提出“教授治校”可以说是蔡元培的首创。梅贻琦在清华学蔡元培实行校务真正公开，一切集思广益，才有了较长时期无人愿“倒梅（霉）”的局面。清华体制对于当时高等院校内一长专制的传统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30年代中期，蒋梦麟从教育部长转任北大校长时，就曾针对清华体制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①，使北大因在制度上落后于清华，而且发展明显缓于清华。而梅贻琦又在西南联大起到事实上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清华体制得到充分有效实施，教授治校、民主决策的制度健全，教授会实际上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不论是学校建设发展方案，还是各项重大决策以及涉及全校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举措，无一不是在广泛听取教职员、特别是广大教师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教授会、校务会议决定。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精神使西南联大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大师。

西南“联大的一些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如联大的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②，西南联大创立不久便建立了教授会和校务会议，“西南联大除常委、校务会议外，还沿袭南开、北大、清华三校传统，设有教授会。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教授会主要审议教学方案的改进，研究学生的管理，学生的毕业成绩与学位的授予，审议常委会或校务会议的事项，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建议。教授会虽属咨议性质，但它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③“常委会开会时，各处处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会议。这样就从制度上保持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④。

西南联大的民主治校还体现在“设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吸收教师参加学校管理工作，协助学校办理有关教学和行政事务，或应急事宜。据统计，联大前后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几十个，如校舍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有长期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各委员会成员，由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聘请教授担任，指定负责召集人。虽属义务工作，没有报酬，但人的价值受到重视，感情受到尊重，因此大多心情舒畅，认真负责地工作。正如有的教授所说，‘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⑤这类委员会据1939年所统计即有17个之多^⑥。

西南联大正因为有常规制度的作用，对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东西，即使来自当局也敢于抵制。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发出加强学校统一管理的“部令”，该“部令”“不利于学校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严重窒息学校学术研究的自由空气，引起联大教授的反感和抵制”，于是“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此令“据理抗驳”，认为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言“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

^① 黄延复.梅贻琦[A].清华人物志·三[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19.

^② 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7.

^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59.

^④ 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41.

^⑤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60.

^⑥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7-79.

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①。

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事例是，1940年教育部先后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和《大学及独立学院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对于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员‘资格’，联大教授会讨论时，曾有许多教授表示反对，‘发言非常激愤’……联大常务委员会执行了‘送审’规定，但基本上是按三校的聘任意见上报的，并没有以此排挤、打击进步教师”，且没有照规程要求核定教师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等级，而是“联大教师级别一直保留‘教员’这个级别。”^②

与西南联大的学者治校不同，西北联大中较有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是北洋工学院，由于李书田的过强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使现代大学制度变形，后来发生的“驱李事件”又使西北联大及其主要的学院彻底告别了现代大学制度，校内派别纷争此起彼伏，沦入党化教育管理模式，还发生多起教授被解聘或愤而离去的事件。例如，许寿裳教授在被徐诵明任命兼任法商学院院长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密令“主法商学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并另定人选。曹靖华教授因被教育部怀疑而解聘也是一个例证。国民政府的这种以党治校的做法深刻影响和制约了西北联大的健康发展。

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始于1896年北洋大学的完全模仿美国大学管理制度。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蔡元培主持起草的《大学令》，明确“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并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教授会，试图通过教授会和评议会使大学学人的权利获得制度保障，在《大学令》之下还制定有公、私立《大学规程》。这些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1917年蔡元培主要把洪堡办柏林大学的大学制度引到中国来办北京大学，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后继承了北大的传统。1937年到1946年的西南联大的制度主体也是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当时其他的私立学校都是采用了现代大学制度，办学成果、成效都是很好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绩效是斐然的，凡当年发展得较好的大学或快速发展的阶段，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现代大学制度。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缺乏这种精神和制度的“大学”很难发展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内部的一切就都要变形。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深层巨大的差距也就在于此。

由于未能有现代大学制度的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学人真正精神文化的自主，由此西北联合大学的精神文化处于无根状态，也就很难有精神文化的传承。对此就西北联大遗踪进行追访的高远先生在见到现今的城固教堂活动后慨叹：“相比于宗教而言，西北联大在这里的影响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几十年前，他们用教堂当学堂，然后他们走了，今天教堂依旧还是教堂。”并总结出：“这中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信念。当年，不管其目的如何，传教会士们至少来这里的行是主动的，而西北联大的师生们来这里却是被迫的，是很不心甘情愿的，只是把这里当作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岁月里的一个临时避难之所，抗日战争一结束，他们很快就走了，没有留下现代文明的体系和传统就匆匆走了”^③。这是对上述判断的一个见证。

方光华先生曾道：“西安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④事实上仅能在大学形体上做如此判断，在大学精神上并非如此，曾经一度乃至现在与西北联大有直接历史联系的一些大学不敢认同或不愿认同自己的西北联大历史渊源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学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基本机理是积淀和认同。西北联大的精神积淀由于上述分析的原因显得稀薄，但还是有所积淀的。1941年西北大学也成立了西北学会，并创办《西北学报》，

^①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60.

^②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70.

^③ 高远. 西北联大遗踪追访记[J]. 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2辑：149.

^④ 方光华.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 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2辑：7.

明确学会以“确立民族自信、加强民族团结”，“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1943年11月，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应负之使命”^①。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也指出：“西北大学，为西北最高学府。……今者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椎轮大路，先轸本刊，借以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之西北数省，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其意义至深且大也。”逐渐明确了西北大学“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这些表述中却不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理念。

西北联大精神在与之相关的各学校也有一定的认同和传承。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为大多数学校所承续，或直接继承（如西北大学），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北工业大学）、“诚朴勇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②，表明分出各院校仍有精神上的联系。

由上可见，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体系系统植入西北，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外，所有分出院校皆留在西北为西北地区构建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但这个基础由于精神积淀相对薄弱，学人自主未能真正确立，现代大学制度不够完善，依然沿用行政管理模式，难以跟上人类现代大学发展的步子，这才是制约西部高校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制约。

四、唤醒：学术自主与制度重建

在西北联大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其兴也政府，其衰也政府。这是现今西部各大学发展中应当深刻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是整个中国大学发展不可多得的启示。

不少人将西部高校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投钱和“给政策”，这种期望是朴素的，也是必要的，却离大学振兴的真谛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大学自身没有建立学人自主的现代学校制度，外部的投入和政策作用收效都会有限；如果大学学人能够自主，又有制度保障，就能吸引全球范围内的优秀生源、资金、师资，也就不必担心不能振兴。

美国也曾有过如何在发展西部大学的问题，与美国顶尖的众多私立大学不同，伯克利是一所美国西部的公立大学，在物理、化学、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方面都做出过领先的成就，其数学系也是全美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校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以多元文化为特色，抓住西部开发机遇，坚持学术本位，充分尊重教授会决定的学术方针。伯克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顶尖学府，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目光远大。在建校之初，校方在伯克利的发展目标上就达成了共识——采取兼收并蓄、自由开放的方针，容天下贤士于一堂，从而把大学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二是重视人才，坚持学术民主，不搞论资排辈，不用名人、权威压人。

现在较多的人已经看到中国西部大学发展的劣势，然而西部大学发展的优势尚未被充分认识，这些优势就是：一是西部比东中部有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二是未被彻底功利化；三是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据此，包括与西北联大相关的西部各高校目前发展的最大机遇就在于抓住国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机遇，建立起真正学人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依据大学的逻辑和规律办好大学，具体实施中尤其要抓住三个要件：

第一是以明晰自主办学理念为第一要务。

^① 赖琏.题词[J].西北学术, 1943(1): 扉页.

^②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休闲读品·天下, 2012年第2辑: 8.

学人自主、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建设优质大学的基础。当一个人没有自主性的时候，就只能工具，只有当大学学人具有了自主性，才可能显现出原本的大学精神。纵观中西大学发展史，学人能自主则大学兴盛。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现代大学的兴起、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宋代的疑古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创造都可为这一方面的例证。

相反，凡不能保证学人自主，不管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哪种原因，大学则必衰无疑。历史上，士人依附于封建君主的权势紧密、科举盛行、功名思想淹没了士人的自觉意识、功利观念占据了学人的心灵空间、政治教条替换了学人脑中的大学理念等，这些都曾经成为大学衰微的动因。与欧洲大学自古即以“自治与学术自由”维系其价值体系不同，中国长期把学与“仕”捆绑在一起，形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从个体角度考察，它成为学人自愿放弃其自主权利与精神追求的诱因；从群体角度考察，它构成中国大学精神难以彰显的心灵陷阱。大学的行政化显然成为限制中国学人自由、自觉、自主的关键性因素。

学人自主的含义是学人可以相对超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来决定大学的价值取向。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民国时期的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告诫学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绳：第一，研求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① 这些都在诠释学人的自主。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挑战，“自由之研究精神”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自由是学术创新、发挥学者创造力的必备条件。作为人类整理探索者和知识创造者，学人不应为组织、党派所累，而要潜心钻研自己所喜爱的学问。

对于具体的学校发展而言，自主和自由又不是抽象的概念：

就个性化而言，学校怎样才能健康发展，并不存在对所有学校普适的统一答案，需要从研究各个学校的历史和现实状态、现有条件出发，找到个性化的答案，以此提升学校教育的品质，找到适合各校的发展道路。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在其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依据学校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内在规律，明晰学校发展理念，在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确定适合该校实际的发展路径，有效提升学校品质。

就一般规律而言，一所学校要永葆其特色鲜明，既要一以贯之，又要与时俱进；既要继承和发扬学校原有的历史文化传统，还必须有新的创造和跨越。众多历史名校兴衰的例证说明，把悠久的办学传统和不断创新相结合是保持学校持续提升的必要条件，即需要不断“返本开新”。

第二是为建立保障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奠定坚实基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方向，并正在积极推进学校章程建设。然而中国大学有行政模式管理的传统，虽几经改革，官本位气象仍然很浓，学者“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还较普遍，大学还有各种行政级别。大学校长由政府指派，并对政府负责；大学教师也受政府人事制度的控制，教师的任用也只是普通的人事安排而缺少专业性，高等院校“官学一体”、“商学一体”的特点明显，管、评、办的职责模糊。

高等院校体制改革就是要逐步增大高等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自治（即使是相对的自治）就很难办出有特色的大学，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提升的基础就不牢固。所以西部各校一定要订好章程，练好内功，保障好学人的权利，确保学人自觉自愿参与到大学发展进程中来。

第三是以组建西北联大大学联盟为助推机制。

为了发挥整体联动效应，建议组建西北联大大学联盟。西北联大的母体北平大学已经断

^① 叶恭绰.在交大第一次开学典礼上致词[J].南洋学报, 1922(4: 2).

线了，但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都有复校的后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此外，她还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等西北高校，与之相关的还有河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再加上汉中地区的陕西理工学院，联合与西北联大有渊源关系的院校成立“西北联大大学联盟”，在致力于抢救、整理西北联大史料的同时，建立多方面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应对人类大学发展的竞争与挑战。

西北联大大学联盟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各校历史。不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促进自身发展，对本校历史茫然无知，依然是当下众多学校的真实状况。很多教师，甚至多数校长对自己学校的历史一无所知，不少学校就成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立存在，没有文化积淀，也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学校的每一任领导都在喊改革创新口号，几十年下来却依然在低层次、低水平上重复打转，难以有延续性的发展，教育品位无法得到提升。

由于中国体制与观念中的封建专制成分没有彻底有效消除，现实中学人精神发挥依然存在困境，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依然有不少体制性障碍，包括沿海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变革依然有较长的路程，西北联大相关的各校如能在这过程中恰当地运用好“快半拍”的改革策略，以人民幸福为学问归止，振兴便指日可待。

战时内迁高校与现代大学发展

——以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为例

张 玮，朱 俊*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抗战军兴，民族危亡，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教育文化机关大肆摧残和破坏。“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延绵民族文化命脉，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将沦陷区或接近战区的学校内迁。战时的高校内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知识精英的战略转移，迁移高校在促进内地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涤荡了内地封建、保守、落后的社会风气，发挥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作用。在此过程产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即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他们也对我们现代大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两所联大概述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两个战时大学联合体同日由令诞生。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长沙危亡，长沙临大决定西迁昆明，并于1938年4月2日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西安告急，西安临大亦决定南迁汉中，并于1938年4月3日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南北呼应，实为教育史上之创举。

两所联大均以常委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在西南联大，常委会下设“两会三处”，即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而在西北联大，常委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三处。

在院系设置方面，西南联大有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专修科、师范专修科），一个晋修班（在职教员晋修班），一个先修班。西北联大有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六大学院、二十四系。二者均为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西南联大的教师常年保持在350人左右，教授和副教授约占一半以上。西南联大的在校学生一般在3000人上下，其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学过的学生达8000人，培养毕业生约4000人（其中研究生74人）。学生中涌现了“两院”院士9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4人；党和国家领导人8人。

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9256名。涌现了师昌绪、赵洪璋、叶培大、王光远等一批杰出人才。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不限于此，两所大学培养的人才，更多的默默无闻奋战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成为新中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顶梁柱和奠基人。

*张玮，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西南联大研究所副所长。

西南联大以合中有分的形式在西南大后方存续 9 年，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返平津，为答谢云南人民的深情厚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建制，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即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将西南联大时期视为其发展历程中光辉灿烂的一页，继承和弘扬其光荣传统。

西北联大奉教育部令于 1939 年 8 月 8 日改称国立西北大学，相继分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以分中有合的形式在西北大后方发展 9 年，为西北地区留下了综合、师范、工、农、医等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今天，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关系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8 所大学，还有东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位于辽宁、北京、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 20 余所大专院校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或间接地源流关系。

二、两所联大的光荣传统

文学家林语堂先生 1943 年访问联大时曾说过，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在物质方面是不得了”，但在“精神方面是了不得。”^①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西北联大。以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不畏艰难险阻，顽强绽放，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了自己的名字。

1、共济时艰的爱国信念

在日寇入侵、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广大内迁高校师生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抒写了知识精英共赴国难的崇高信念。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以培养杰出人才、报效祖国为神圣职责，不畏艰难困苦，锲而不舍。西北联大的校歌唱到：“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中有一句“绝缴移栽桢干质”，校歌唱出了战时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心声，也唱出了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教育家对战时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西安临大南迁汉中，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在播迁途中，两校师生以严格的纪律，吃苦耐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了教育界的转移。

战争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营养不良、物质匮乏、缺医少药……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泡茶馆”、“跑警报”、“八宝饭”……是他们见证苦难的集体记忆。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报国、救国的理想，那就是教育救国、读书救国。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庭先生所言：“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②亦如西北联大常委、原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颂明所言：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他们不仅开展了一系列抗战救亡宣传活动，而且还直接投笔从戎。1944 年西北联大有 300 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 43 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上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西南联大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前后有 1100 名学生从军，约占学生总数的 14%，其中不乏牺牲的烈士。

2、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

在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中，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理念。

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任，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明确了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的意义。西北联大及其分离出来的国立五校逐渐形成了扎根西北、传承文明、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

^①曹思义《黎明前后——联大生活回忆之片段》，《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第 251 页。

^②冯尔康等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年，第 802—803 页。

西南联大也主要形成了四种理念：

第一，兼容并蓄、自由宽容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而成，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有各自的办事机构、研究机构和经费，但“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各种学术流派能平等发展、各种治学路径能同台竞技、各种学术观点能自由对话，呈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景象。

第二，通识为本、全面育人

长期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认为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他认为，对知识的通达，不仅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能将三者会通。由此，西南联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通识教育，形成了以“学分制”为主体，“共同必修课”、“公共选修课”相辅而成的“三位一体”育人思路。

第三，硕学宏儒、名家荟萃

梅贻琦曾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主政西南联大时，非常重视延揽一流学者，由此开创了西南联大名家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1939年西南联大有教授、副教授179人，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称为“囤积教授”，其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西南联大三常委中，梅贻琦和蒋梦麟留美，张伯苓曾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修。五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二十六位系主任，除五位留欧，其余都为留美。西南联大师资力量之雄厚可以想见，荟萃了陈寅恪、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陈省身、吴大猷等大师巨子。

第四，民主管理、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一是发挥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的作用。二是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吸纳教师参与各种校务管理。据统计，联大前后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几十个，如校舍委员会、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等等。这些专门委员会协助常委会分别处理各项行政和教学事务或应急事宜。由于充分发挥了教授的作用，在学校内部彰显了学术自由精神，在对外方面捍卫了学校政治独立地位，教授已然成为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力量。

3、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

为适应战时需要，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师生，义不容辞地与国家、民族共命运。西北联大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发表有关城固新修县志论文近10篇，法商学院尹文敬教授发表的《改良税制与调整地方财政》论文，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关注；许兴凯教授发表了《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及吾人应有的认识》等论文；矿冶系对安康行政区砂金矿和勉县煤矿区的地质勘查，完成了《勘察安康行政区砂金矿简要报告》；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对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完成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在“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①的原则指导下，西北联大兼办社会教育，举办了防空防毒讲习班、科学常识讲习班、地方自治讲习班等。

西南联大工学院施嘉炆教授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两期勘测任务，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开发的初步计划，设计出腾冲、富民水电站等一批水电站，出版了《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为中华民族寻找精神武器。历史系钱穆的《国史大纲》，使普通民众在了解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化学工程系教师针对昆明市场所需，创办了酒精厂、墨水厂、利滇化工厂、自动化工厂……，等等。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师生运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结合迁入地的自然地理、历史传统、

^① 《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引自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风俗民情等地域特点和抗战建国需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建设，支持了中华民族抗战救国大业。

三、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对现代大学发展的启示

时空虽已转移，但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之于今天大学的发展，不是清风拂面，而是丰碑激励。我们在回望、反观它们的同时，尤其要揭示其裨益于当前大学发展的启示，从其光荣传统中探寻可资借鉴之处，推动大学发展。

1、现代大学发展要重视自由精神的培育

社会不断前进，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引擎，不可能固步自封。它必须以新的思想引领社会，以新的人才、新的成果服务社会。自由的氛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思想的自由、学术自由，就没有人的创造力，就谈不上创新。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一方面，大学要囊括与汇通各种学术观点及学科内容。在这里，应有各种学术观点的立身之所，各种学科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大学要倡导各种思想的平等对话与自由切磋，允许各种学术思想共存，平等交流，而不是打压、“相轻”。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或切磋、辩驳，或倡导、批判取得让人信服的理由。

2、现代大学发展要强调包容意识的涵养

对人的包容、对各种思想的蓄收，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基础。大学要包容，强调“和而不同”。在大学校园讲求“和而不同”，就是各种要素的包容和谐。大学的发展，是大学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大学与外部相适的结果。在大学内部，有人与人的“和而不同”、群体的“和而不同”、各项工作的“和而不同”。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和而不同”，换言之，即大学与所在地区、与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的格局”^①。大学内外通过包容，形成和谐，才能发展。

3、现代大学发展要注重个性特色的凝练

一所大学的个性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它的成员。只有那些富有个性、蕴含特色的大学才能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西北联大形成的“公诚勤朴”校训和西南联大形成的“刚毅坚卓”校训都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都是自身办学目标的高度概括，也都是自身个性风格的彰显。因此，大学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使历史与现实相联，继承与创新统一，继续凝练个性，走个性发展之路。

著名高校之所以有名，因其特色鲜明。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来说，更应以特色争得一席之地，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力争有发言权，而这需要深入挖掘本校的资源、内涵，在更新教育思想、确立人才培养目标上下功夫。对于具有特色的高校而言，更要强化自身的特色，使自身的特色更加明显。

结语

西北联大母体及其国立五校立足西北、植根西北、服务西北、建设西北，由此陕甘地区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点”“线”向“面”布局，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发展而来的云南师范大学植根云南，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教师摇篮”。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作为办学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的华丽篇章，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以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内迁高校为抗战建国和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西部地区社会、科技、文化、思想发展。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竞争与

^① 董泽芳著《大学的理念与追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挑战，我国高等教育将如何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宏观地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谋篇布局，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学特色、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勾勒新蓝图，也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目标。我们要通过深刻解读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光荣传统，切实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放在突出位置，牢牢把握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性和规律性，积极探索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新路子，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教文化事业兴旺再创辉煌。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

姚 远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通过新见历史档案、报刊文献,清理和还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子体演化的历史脉络,重新反思和认识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研究表明:1937年9月10日成立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其子体,即国立西北五校——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从1937年临大成立至1946年各自回迁复校,具有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历时九年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形成了人文社科、理工农医完整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拥有505名教授和1489名员工的师资队伍,毕业学生9257人,五校均开始招收研究生,奠定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并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储备了人力资本。

关键词: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战时高等教育史

一、时代背景

“九·一八”与“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国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2/3以上的东北与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遂先有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北的颠沛流离,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9月复并入省立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于是,由此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8日,还有仿效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的大学联合体形式在福建建阳成立的,由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所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合组而成的东南联合大学。1943年7月结束,收容学生400余人,并资助许多其他学校师生投奔各自母校,从筹办至结束存在一年零九个月时间^[2]。

西南联大以合而有分的形式在西南大后方、西北联大以分而有合的形式在西北大后方各自从1937年至1946年发展9年,分别为西南地域文化或西北地域文化,保存国族文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几乎全部在平、津复校,仅为西南地区留下一个昆明师范学院。西北联大,虽在1939年8月8日奉教育部令改为国立西北大学(以下简称西大),相继分出国立西北工学院(以下简称西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国立西北医学院(以下简称西医)、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简称西农),为西北地区留下综合、师范、工、农、医等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后来复归平津,但北平大学建制永远留在西北。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母体诞生的子体——国立西北五校——表现出明显的分而有合。比如:五校在西北联大校训“公诚勤朴”的基础上或直接继承(西大),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工)、“诚朴勇毅”(西农);与工、农、师、医从联大分出独立设置不同,西

北大学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在1945、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除原平津三校学生外的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截止1947年5月1日,已收到教育部验印的毕业证50张,尚有10余名待办中,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的签章、所在院院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3],表明西北联大确有精神上的延续,而且最先分出的西工与西大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师在1939年8月虽然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大隔壁共处、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西医1939年8月分出,1946年8月复与西大合并回迁西安;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北分会等学术社团,以及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争取权益等。

过去对于西南联大研究较多,对西北联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以致形成一些不公正的认识。我们力图理清脉络,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我们的研究上限为1937年9月10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下限为1946年底其子体各校在平、津、冀、镐各地相继复校。并且,始终将西北联大母体与其子体,作为一个分而有合的共同体来看待。

二、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时期(1937-09-10—1939-08-07)

(一)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之构思始于1937年8月教育部的《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初拟在长沙、西安等地至少设三个临时大学。1937年9月10日正式颁布教育部第16696号命令。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发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王世杰兼任主席,聘任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脩、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9人为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4人为常委,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1938年1月10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为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全校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再分为:文理(国文、历史、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系);法商(法律、政治、商学三系);教育(教育、体育、家政三系);农(农学、林学、农业化学三系);工(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六系);医(不分系)六大学院,24个系。学生以文理学院(439人)、工学院(386人)、法商学院(279人)居多。全校三院分布在西安的三个地方: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

其教授计有106名。其中,文理学院有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曾炯、张贻惠、岳劼恒、刘拓、张贻侗、金树章、黄国璋、殷祖英等35名;法商学院有沈志远、寸树声等12名;教育学院有李建勋、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齐壁亭、王非曼等15名;农学院有周建侯、汪厥明、虞宏正等16名;工学院有李书田、周宗莲、李仪祉(兼)、魏寿昆、张伯声、潘承孝等22名;医学院有吴祥凤、严镜清等6名。

历史学家侯外庐、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梁漱溟、水利学家、西安临大兼任教授李仪祉、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女作家丁玲、作曲家贺绿汀、漫画家张汀、杨虎城的夫人、西安中山学院毕业生谢葆真,在此期间到校讲学或演讲。

西战场失利,太原失守后,日寇沿同蒲铁路南下,窜抵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一带,与西安东部135公里处的潼关仅一河之隔,西安东大门告急。为此,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遂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千余师生历时月余,

以沿途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为三大目标,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常委徐诵明为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每个中队500至600人,先乘火车至宝鸡下车,再徒步130余公里,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全校分布在三县六地:大学本部、文理学院设于城固县考院(黄学巷贡院旧址);教育学院全部、工学院一部设于城固县城文庙;法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利用大自然形势和环境,研究地理和实地测量;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便于民众诊病;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凿沟渠,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

(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提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合并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学院向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据此,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陕南城固校本部补行开学典礼,并开始上课。同年,联大第45次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并聘请黎锦熙教授撰成校歌歌词。其词曰“并序连冀,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嵯豸,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平津三校联合、立足秦陇的文化使命,以及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六大学院的办学目标等作了高度概括。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时大学旧制,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1938年7月22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令,撤销原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校务委员会,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均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因陈剑脩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

学校初设6个学院23个系:文理学院有国文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法商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体育系、家政系;农学院有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学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讯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医学院,不分系。1938年7月工学院与农学院分出独立后,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四个学院,除各学院原有系科外,新增医科研究所、师范研究所。各院系教授大致与西安临时大学各院系教授一致。

1938年12月1日,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成立后,李建勋教授任主任,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0至15名,期限两年,开始及格者授予硕士学位。其“以研究高深学术,训练教育学术专才,及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域内教育行政机关研究教育问题,并辅导改进其教育设施为目的”^[4]。

1937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人,仍发给原校证书。其中北平大学251人,北平师范大学307人,北洋工学院39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1人,他校转学借读生57人。

三、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1939-08-08—1945-08-14)

西北联大分两次分立:第一次是工、农两院的分立;第二次是西北大学的“令改”和师范学院、医学院的分立。在此以1939年8月8日最后一次分立为准,并以分出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按照校政演替、院系设置、教师、学生、学术研究、教育贡献,特别是对西北经济、科学、教育和社会发展等贡献,简洁勾勒各校历史脉络,以及各校之间的合作线索。

(一)国立西北工学院

西北工学院是第一个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学院。1938年7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令:“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

为国立西北工学院”^[5]。李书田初任筹备主任,赖琏、潘承孝相继任院长。教育部附发的西工改组办法规定了其经费的三个来源:一是以西北联大原有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实支经费 266 400 元充为其经费;二是以焦作工学院的教育部补助费实支 31 500 元及原有学院经费移充为其设备费及迁移费;三是以中英庚款会补助西北联大工学院设备费原额 89 000 元移充为其设备费。其教职员、学生、院产等均为西北联大工学院等三院校原师生和财产,包括全部学生成绩、设备、文卷等。其地址,教育部初定设于岷县或天水,但实际上一直以在西北联大借用的意大利天主教堂之一部做院址,即汉中城固县东南部的古路坝天主教堂(今城固县城南 12 公里处董家营乡古路坝村)。1938 年 11 月 10 日筹备委员会迁古路坝院址办公。筹备期间约有学生 600 余人。1938 年 12 月 11 日开始上课。初设有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八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1939 年 2 月,教育部撤销筹备委员会,聘秦瑜为院长,未到任,复聘赖琏为院长;3 月 16 日赖琏就职后,增设工科研究所与工程学术推广部;8 月 21 日第一届 144 名学生毕业;民国二十八年(1939)度第二学期毕业 143 人,这两届学生的大部分学业应在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完成。至 1939 年 6 月,有教职员 159 人,学生共计 829 人(含正式生 811 人,研究生 1 人,借读生 10 人,特别生 7 人)。至 1946 年,共毕业学生 233 人,按教育部学位授予法,授予学士学位。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 3 月,西工^①迁至陕西咸阳。

西工在联大时即成立有工科研究所,1939 年又成立矿冶研究所。其中矿冶研究所分设采矿、冶金、应用地质三组,先后招收研究生 46 人,研究期限两年。开设有外国语(德、法、俄)、高等数学、高等金属矿床开掘法、采矿术、物理冶金学、高等冶铁学等 40 余门必修课和选修课程。

西工与西大等西北五校关系极为紧密,一度甚至两校共有一个校长。其中赖琏任西北工学院院长任内,于 1942 年春至 1943 年 12 月,一身两职,同时兼任西北大学校长。直到 1943 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后,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

西北工学院前承北平大学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工程高等教育体系,其工程学术推广部测绘南郑城区,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并调查安康、凤、徽两县矿产等,从而奠定了西北工程高等教育和工程学术的基础。

(二)国立西北农学院

西安临大农学院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农科,1912 年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2 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8 年并为北平大学农学院。在西安时设于西安通济坊,与法商学院、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同在一地。时有农学、林学、农业化学三系。周建侯教授任院长。汪厥明教授任农学系主任,教授有易希陶、夏树人、王益滔、陆建勋、李秉权;贾成章教授任林学系主任,教授有殷良弼、周桢、王正;刘伯文教授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教授有虞宏正、王志鹄、陈朝玉,副教授罗登义等。

西北联大农学院在汉中时,设于沔县(今勉县)武侯祠。三系未变。周建侯教授继续任院长。教授新增姚鏊等。周明群教授因体弱,翻越秦岭抵达汉中即不幸去世。

1938 年 6 月始议,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合组为西北农学院。1938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联大农学院原院长周建侯教授等为委员。1939 年 4 月正式成立。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六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 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1941 年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 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历任院长有辛树帜、周伯敏、章文才、唐得源等。

^① 1957 年以西北工学院为主体,与华东航空学院(中央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设于西安,与西北大学相邻。

其办学“重视结合西北实际,为西北的农、林、园艺等事业服务”以及西北农作物栽培育种、西北家畜品种改良、西北兽医预防、西北造林、护林、森林利用等^[6]。1941年,西农农田水利研究部成立,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年限两年,助教兼研究生者3年。其必修课有高等数学分析、流体力学、土力学、高等水文学、高等水工设计、模型试验、水工流体学、专题讨论等,选修课有水利机械、水质分析、黄河问题研究、田间技术、植物生理及病理、作物遗传、棉作学、食用作物等。在科学研究方面,先后育成棉花、小麦、谷子、大豆、玉米、高粱、马铃薯等各种优良品种22种,并以农业推广处、改良作物品种繁殖场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举行过三次农产品展览会、举办过农民训练班、新旧农事讨论会、农民夜校,辅导扶风、武功两县成立棉麦生产合作社170个和信用合作社265个,为教化民风、开发西北作出重大贡献。

西农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体系。1937年至1947年,全院有教职工265人,其中教师138人,教授52人。先后有247名教授、副教授在西农工作过,92人有留学经历,21人获博士学位。虞宏正、林镛、盛童笙、涂治等10余名教授后来成为院士。王绶、周尧、刘慎锷、李赋都、石生汉、李仪祉等教授曾在此任教。1934年至1949年共毕业学生1657人,其中本科生1396人,专科生261人。

西农在专科学校时即与西安临大有密切联系。其一是西安临大之前,已经与临大四大前身之一——以北平大学研究机构为基础创建的北平研究院发生联系。1936年11月18日,北平研究院与农专合建的西北植物调查所在农专成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所长刘慎锷等30余人出席,之后于1937年春自北平运来书籍和标本100余箱。刘慎锷还主持北平研究院西安办事处,并向西安临大生物系推荐林镛、汪德耀等教授。其二是,与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大也有频繁交流。临大到西安后,除农专校长参与筹备西安临大外,“初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备函探讨拟将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共计八个系设于武功。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于1937年9月17日复函‘极表欢迎’,但指出‘本校前奉教育部筹设西北大学理学院化学馆,并由本校计划建筑附设高级职校,设备不周,仅可容纳现有学生,房屋设备需争取资金’”。1937年11月11日,临大筹委会复函决定“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暂在西安城内及附近已有之校舍设法上课”^[6]。同年,11月27日,临大筹委会致函农专要求支援实习材料及标本等。农专给予“所有之水稻三种、小麦八种、大麦、玉蜀黍、黍、粟、稷、荞麦、大豆各数种、蔬菜种子五十种、昆虫八种”^[6]。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周伯敏于1939年9月至12月代理西农院长。西北联大农学院院长周建侯曾任西农筹备委员会委员。西北联大生物系主任金树章教授后任西农农学系植物病虫害组主任;西北联大林学系主任贾成章后任西农森林学系主任。

西农与西大也有诸多联系。1946年5月20日在南京发生“五·二〇血案”,“国统区”60余所大中城市学生联合举行罢课,西农(武功)、西大(西安)、西工(咸阳)亦联合举行罢课。1949年6月,放弃西安西撤的胡宗南复自陕甘边境东进拟收复西安时,西农于6月11日奉命迁西安,寄居西北大学,7月27日扶眉战役结束后返回武功。西农与西大两校教授亦有密切联系:李仪祉既为西北大学工科的创始人,亦为西农水利专业的创始人;西农教授周尧曾任西北大学生物系主任三年;虞宏正院士曾任西北大学仪器委员会主任,长期在西农、西大两地兼课;李振岐院士与西大教授联姻,长期双聘于两校。另外,先后在两校互相兼课或曾在两校任职的教授还有汪厥明、王志鹤、王恭睦、唐得源、甄瑞林、邢润雨、刘鸿渐、季陶达、李伯洵、毛鸿志、李中宪、李萃麟、巩重起等。

西农形成了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园艺、农田水利、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农产制造、农业经济,以及从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完整农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农学与农业技术的基础。

(三)国立西北大学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分出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按照《国立西北大学组织规程》,学校“以研究高深学术,陶铸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赖琏校长补充提出“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1940年4月,教育部决定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永久校址。

1939至1949年间,胡庶华、陈石珍、赖琏、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劫恒等相继任校长或代理校务。张貽惠、姜琦、杜光墀、杨宙康、杜元载、高明教授相继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相继由刘拓、马师儒、于赓虞、萧一山教授兼任;理学院院长相继由刘拓、赵进义教授兼任;法商学院院长相继由刘鸿渐、卢峻、赖琏、曹国卿教授兼任;医学院院长相继由侯宗濂、汤泽光教授兼任。

西大初设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法商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商学系)三院12个系,另有与西工、西农合办的1个先修班。1944年9月奉教育部令,文学院添设边政学系。1945年奉教育部令增设教育学系。1946年5月奉教育部令,西医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大。8月1日,自联大分出的西医正式并入西大,为医学院,院址设于西安崇礼路西北化学制药厂旧址(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院)。1947年初,报教育部批准,理学院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地理两系。1947年12月报经教育部批准,原隶属文学院之边政系,改属法商学院。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一是创建师范、经济学、西北文物研究所(室),创办《西北学术》《西大学报》《国立西北大学校刊》《西北学报》《西北月刊》《边政学报》《经济新潮》《文史》《城固青年》等多种大型学术期刊,创建中国教育学会西安分会,以及法学、边政学、地理、教育、考古、政治学等学会或研究会,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基础;二是开展西北文学、方言、国语拼音注音符号、民歌、史志、关学、俄文、维汉、蒙汉语言研究,杨兆钧副教授出版《维汉字典》,谢再善教授出版《蒙汉辞典》,张西堂教授出版《春秋六论》《颜习斋学谱》等18部著作,其中《颜习斋学谱》获教育部著作发明二等奖,黎锦熙教授完成陕西8部地方志,所撰《方志今议》提出的几个原则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并于1941年获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三是开展史学研究,陆懋德教授的《中国上古史》与《史学方法大纲》分获民国三十年度(第一届)、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与二等奖(当年一等奖空缺),其中《史学方法大纲》为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奠基之作,还接收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间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搜集的1000余件文物,出版西北文物丛刊,王子云教授出版《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10余部著作,从而首开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四是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对陕西中等学校投考试卷进行分析,研究改进中学国文、英语、数学教材与教法,还开展暑期中等学校教师培训,提高基础教育师资水平,马师儒教授还出版了《教育概论》《现代教育思潮》《教育史》《教育哲学》等著作;五是与陇海铁路局合作组织西北经济考察团,开展西北工业、矿产、水利、畜牧、农业、金融、物价、商业、劳动、边疆经济等广泛调查,编制西北输出入货物指数、物价指数、工人生活指数,出版经济学丛书等,成为民国西北大开发的重要文献;六是组织西北地方政治、西北司法、社会组织、历代地方政府调查,组织边疆考察团,到甘肃、青海、新疆考察实习,考察边疆回、藏、蒙、维、哈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风俗等,拍摄百余幅照片,其中地理系李式金教授在青海玉树等藏区的考察,形成丰富成果,被称为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仅在城固时期,文科教授黎锦熙、刘朴、杨伯森、许兴凯、罗章龙、郝耀东、何士骥、何竹淇、曹鳌、卢宗濂、唐祖培、王锐铭、周国亭、梁念曾、于鸣东、李永增、刘鸿渐、李宜琛、刘毓文、曹国卿、徐褐夫、孙宗钰、贾晰光等23位教师即完成论著101部(篇)^[7]。

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一是创建数学研究所、医科研究所,创办《自然科学》《地理教学》《地质通讯》《西大医刊》等一批自然科学或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建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安分会,以及地理学会、自然科学服务社等学术社团,开展了国际、国内、校际多层面的学术交流;二是组织秦岭、巴山、汉中动植物资源调查,采集标本 1 000 余种,组织对陕西关中、汉中盆地、华山地区、临潼地区的地理、地质考察,形成殷祖英的《西北地理与政治地理》、郁士元的《城固地理》、张伯声的《陕西金沙》《黄河上中游考察报告》等文献,为开发西北提供了生物、地质、地理上的科学依据;三是组织西北区域性疾病调查与病理研究,最早提出癌症防治立法。仅在城固时期,刘拓、张貽惠、余凤早、段子美、郁士元、张世勋等教师即完成论著 33 部(篇)。其中余凤早教授还在比利时陆文大学《细胞学杂志》发表了《南京丰年虫两性之发生》和在《法比荷科学会论文专刊》发表了《农年虫类而器官之研究》等论文。

西大在汉中办学 8 年,在西安办学 3 年,至 1947 年,共有教师 231 人,其中教授 101 人,副教授 43 人,讲师 48 人,助教 39 人。至 1948 年,共毕业 9 届学生 2 411 人(文学院 499 人,理学院 510 人,法商学院 1 153 人,医学院 299 人)。

1939 年 8 月 8 日,西北大学在陕南的成立和在战后迁建西安陕源西大原址办学,标志着京陕两源的合流。它激活了已中断 5 年的陕源西北大学,汇聚京陕两源,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基础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学术的基础。

(四)西北医学院

西北医学院由前身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发展而来,是我国最早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学校。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为西安临大医学院,院址位于西安北大街通济坊,与临大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以及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同在一地。吴祥凤任院长,教授有徐佐夏、严镜清、蹇先器、王晨、林几等,副教授有毛鸿志、王同观等。在西安时,以徐佐夏教授、王同观副教授为正副队长,组成 30 余名师生的赴陕南抗日宣传队,于 1937 年 11 月底自西安出发,经宝鸡、凤县、褒城,到达南郑,宣传抗日,讲解防空知识、为群众诊病,1938 年 2 月返回西安。随即于 1938 年 3 月开始南迁,临大医学院高年级学生组成救护队随行。

1938 年 4 月迁汉中南郑县,改为西北联大医学院,先借南郑联立中学校舍一部分为校址,复租陕西省银行南郑中学巷九号为院址。1939 年 3 月因日机飞南郑频繁轰炸,又迁南郑城东孙家庙、马家庙(二三年级,院本部)、黄家坡、黄家祠(四五年级)、城固校本部(一年级)等处为临时课堂。此间,与南郑县卫生院成立临大医学院附属诊所,又与迁南郑的洛阳军分区医院联系作为实习基地。附属诊所于 1939 年夏迁至南郑东关黄家坡文庙内,改称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颜守民教授任附属医院院长。1939 年蹇先器继吴祥凤任医学院院长,全院有正副教授 8 人,专任讲师和助教 6 人。

1939 年 8 月 8 日自西北联大分出独立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徐佐夏、侯宗濂、刘蔚同、万福恩、李之琳教授等相继任院长或代理院务。此时,新增教授有马中魁、李佩林、汪美先、颜守民、陈天启、杨其昌等。

抗战胜利后,医学院师生要求回迁北平未果。1945 年兰州的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并设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1946 年 8 月 1 日并入西大,并由汉中迁回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①。由此,有了较大发展,联合国总部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医教会拨赠病床设备 110 套、X 光等各种治疗器材多套,药品 60 箱;美国红十字会捐赠药械 3 卡车;教育部增拨医疗器械经费 3 000 美元,使其初具规模。1947 年,始下设医学研究所。1947 年 11 月在西安建成西北大学附设医

^① 1950 年再独立为西北医学院。1956 年 9 月改为西安医学院。1985 年 6 月改为西安医科大学。2000 年改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其校史追溯至北平大学医学院以及并入北平大学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院并开诊,王立础、颜守民、王同观、赵清华、陈阅明、马载坤等教授相继任院长。1949年9月将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大学医学院。迁回西安后,以西安总医院为实习基地,并聘其刚时院长、马志千、孙大光、张时等为西北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或讲师。

其办学宗旨为造就医学人才,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研究医学高深学术,并创办《西大医刊》,发表了防癌立法等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在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时,仅从北平等地聚集师生30余人。在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时期,有教职员工74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1人,学生196人,含有南通医学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等104名借读生。抗战时期日机数次轰炸汉中教学区和居民区,1940年夏,医学院教务长兼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和四年级学生栾汝芹、陈德麻被日寇炸弹夺去生命。迁回西安后,1949年时在校教师44人,学生为280人。

西北医学院保存我国最早的医学高等教育火种,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

(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分出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仍在汉中城固文庙旧县学内,与西北大学为邻。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袁敦礼、黎锦熙相继任教务主任,黄国璋、袁敦礼相继任训导主任。1940年西师拟分年迁移兰州,李蒸赴甘勘定校址,购置土地。1941年在兰州黄河北岸十里店设立西师分院并开学,原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西北联大家政系主任齐璧亭(国梁)教授任主任,同年城固校本部停止招生。1942年本部由城固迁兰州,而城固改为分院。1944年11月西师^①全部迁移兰州。1944年城固分院学生全部毕业,宣布撤销城固分院。1946年7月下旬,教育部电令西师继续独立设置。其相继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八系,及劳作、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5个专修科,以及师范研究所、附中(由西北联大附中改称)、附小、附中师范部、劳作师资班、优良教师训练班和先修班等。是年,全校教职员225人,学生1010人。至抗战胜利,“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甘有九年之久,毕业学生1300余人”^[8]。

城固时期的西师与西大隔壁为邻,可以说完全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其“文、理、教育和各科学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长时期西大、西师相关系科及其课程是合班讲授。一因西师建校之初,并无单独的校舍;二因西大文理科学学生多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其中许多学生原是北平师大的学籍”。“至于教授、讲师,虽各有专任,但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大和西师互相兼课”^[8]。其主要教授,如黎锦熙、罗根泽、杨晦、谭戒甫、刘朴、何士骥、易忠策、许寿裳、陆懋德、黄文弼、李季谷、周传儒、杨人梗、张瞬琴、李建勋、齐国梁、马师儒、程克敬、胡国钰、郝耀东、唐得源、包志立、鲁世英、方永蒸、金澍荣、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王耀东、罗章龙、黄国璋、谌亚达、殷祖英、李镜湖、邹豹君、郁士元、刘拓、张貽惠、张貽侗、蔡钟瀛、岳劼恒、杨立奎、赵学海、赵进义、傅种孙、张德馨、杨永芳、刘亦珩、郭毓彬、刘汝强、雍克昌、汪堃仁、李中宪、吴世昌、王汝弼等,今皆被列入两校学人谱。汪堃仁院士曾回忆指出:“西北大学与西北师院仅一墙之隔,两校都设有生物系,两系教授均不齐全。我带头先为西北大学生物系讲授动物生理学等课程,仪器设备也互通有无,使两系的学生都得到益处,提高了教学质量”^[9]。“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时,原来北平师范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大学”^[8]。实际上这一部分教师远比预计的要多,他们几乎成为西北大学从1939年至20世纪末文理科教师的主干。即便以上所列两校共有的55名教授,已经占到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文理科教授的90%以上。西北大学第一部校史由黎锦熙教授1943年在城固完成,今西北大学校训“公诚勤朴”、西北联大校歌歌词亦由黎锦熙教授担任西北联大

^①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中的北平师范大学师生300余人返回北平复员,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有教职员工72人,学生360余人。1958年改为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改名为西北师范大学。

秘书长时提出。

西北师范学院为陕南地方文化与西北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按照 194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定的全国 7 所师范学院辅导区,豫、陕、甘、宁、青、绥为西师的辅导区。1941 年 1 月 19 日,在城固郊区邯留乡成立“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后改为社会教育实验区),开展社会教育、兵役法宣传、卫生与科技知识宣传等,两年半时间中先后有 300 余位学生参与,结束时当地民众还赠以“善教民爱”。1941 年 8 月,曾在城固召开本区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后,逐年举办暑期体育讲习班、体育师资训练班,又与地方教育当局、西大合办城固、临潼、西安、兰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开展中等学校、小学教材教法研究,并以毕业生充实西北师资,从而奠定了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并大大推进了西北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袁贵仁认为:其历史是“一部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具有特殊地理与文化内涵的大西北,始终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母体,始终是学校历代学人为之奋斗、希冀建设发展的对象”,“早在 40 年代初……在艰苦的条件下,聘请著名教授任教,开办社会教育试验区,研究和保护文物,参与西北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11]。

四、三校一院回迁复校时期(1945-08-15—1946-11-30)

(一)北平师范大学

“1946 年 3 月在北平复校,称北京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时,一部分教师留在了西北大学”。“一些教师在黄河上乘牛皮筏渡到绥远,再乘火车到北平;体育系教师徐英超带各系师生 200 余人,自郑州北上,路过解放区回到北平”^[8]。1946 年 11 月始在北平开课。

(二)北洋工学院

1939 年 3 月,李书田率北洋学生南下,拟在四川恢复北洋,但随去教师学生很少,赖琏院长与教育部派人在四川广元劝回学生,原北洋大部分教师仍留城固任教。李书田随后在西昌创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942 年复至西安。1943 年 4 月 5 日,李书田即在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一封信中提出在西北的兰州、西安、宝鸡、天水、汉中,以及西南的成都等地“号召同学捐款,完成二百万元之捐献”^[12],并在西安之百余亩基地筹办私立北洋高中,以备收容北洋同学。1943 年 3 月下旬,经行政院核准,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于浙江泰顺,以北洋校友捐款补助之,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复归英士大学。1943 年 2 月,李书田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驻西安时期,开始在西安筹设“国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李书田任院长,10 月招收 108 名学生,12 月中旬开始上课。1945 年 6 月 6 日,教育部电令泰顺北洋工学院和北洋西京分院分别并于英士大学和城固古路坝国立西北工学院^[13]。在此期间,还曾有将西京分院改为西京工学院之议,被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陕西已有西北工学院为由否决。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次年 1 月教育部准予复员。1946 年春聘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茅以升等为筹备委员,5 月任命茅以升为北洋大学校长。1946 年 4 月,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 38 名学生,在李书田院长率领下,经韩城、山西临汾断续乘车或步行返回天津,揭开复校序幕。1946 年暑假,刘锡英率师生回到天津,任北洋大学教务长,一度代理校务。1946 年 10 月 20 日国立北洋大学^①开学,11 月 22 日一年级与先修班开始上课。

(三)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其前身为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906-06-13)的北洋女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傅增湘、张伯苓等曾任校长。1929 年始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设有国文、家政两系。抗战前夕新增英文、史地、教育、音乐、体育系,共 7 系。齐璧亭(国梁)任院长。1937 年抗战爆发后的 9 月,齐璧亭“于九月间晋京向钧部(教育部)面呈学校被毁情

^① 1951 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北洋大学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航空系并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矿冶系并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

形,并请示复课办法”^[14]。教育部核准同意女师用中英庚款补助办学,并同意迁西安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除女师附属师范部、中学部和附属小学部退入天津英租界被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收容以外,其余院本部师生在齐壁亭、程孙之淑、王非曼教授的带领下,迁至西安,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女师最有特色的家政学系整建制入临大教育学院,仍为家政系,成为教育学院教育、体育、家政三系之一,齐壁亭教授兼主任,程孙之淑、王非曼为教授。女师其余各系学生分别并入临大各系。1938年4月3日西安临大改为西北联大后,继为其文理学院家政系。1939年8月8日自西北联大分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其家政系。民国二十七年度、民国二十八年度,有11名女师学生毕业,仍颁发给女师毕业证书。1944年底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州前,齐壁亭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校筹备处主任。1946年在天津原址复校,仍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①。曹禺、萧乾曾在校任教。1949年8月改为河北师范学院,男女生兼收。

(四)北平研究院

国立北平研究院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筹组而成,1929年9月9日成立于北平,隶属于教育部,李煜瀛任院长。其研究机构有物理、化学、镭学(后改为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

1933年至1935年因形势所迫,北平研究院开始将镭学、药物学研究所迁上海,稍后地质学研究所迁南京。1933年徐炳昶(旭生)领导之“史学研究所大部亦迁陕”;1936年,刘慎铎(士林)领导之植物研究所之“图书、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此卢沟桥事变以前大概情形也”^[15]。徐炳昶回忆史学研究所“与本地士绅合组陕西考古会,到宝鸡斗鸡台作发掘工作数年,写成《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一书,对于殷盘庚以前古史作一整理”^[16]。其中植物学研究所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在陕西武功合办西北植物调查所。胡宗刚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17],证实1936年至1937年,刘慎铎、徐炳昶在西安成立“北平研究院西安办事处”,推徐炳昶为主任,并与西安临时大学有聘任关系,显示部分研究人员在李书华委员未到西安之前已经开始执行教育部关于并入西安临时大学的命令。其证据:一是1937年10月30日刘慎铎自西安致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经利彬(燧初)函中有“西安临时大学已在西安成立,经费已有办法,生物系主任为金树章兄,惟因此系平大与师大合并,平大教员只有金树章兄一人,孤掌难鸣,前曾屡次函催君范及德耀二兄来此,终无音信,而师大皆招旧人,郭庸早到,刘汝强坚决要来,弟曾示意金兄林^②、汪^③之功课(尤其是君范之功课)坚持保留,任何人不能取代之,金兄亦甚赞成斯意,请兄再促林、汪二人早到。临时大学有通启,声明旧教授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后不能到达者,即以解聘论,此为淘汰之法。然与林、汪二人,弟自当特别设法处理之,请勿念”^[18]。这是迄今所见有关北平研究院研究人员与西安临时大学教授聘任关系的唯一文字。它表明,刘慎铎与北平大学兼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的金树章、刘汝强已经应聘在西安临时大学,并请经利彬催促林镛、汪德耀二人尽快在临大要求的教授到校最后时间(1937年11月15日)之前到临大应聘。另外,“西安临时大学已在西安成立,经费已有办法”表明,由于教育部停拨北平研究院经费造成的刘慎铎的困扰,似已经在西安临时大学解决。其二是北平研究院主事的副院长和部聘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李书华(润章)因身困北平,直到10月始脱险离平,于1937年11月8日抵沪后,收到刘慎铎于11月5日寄自西安的函后,回复刘称“弟为经费事曾与教部王部长去一详函,并说明本院现在工作情形,嗣后复函大意谓:平研究院决定迁西安,并经呈准行

^① 1956年8月大部分迁石家庄,先后称石家庄师范学院、石家庄师范大学。1962年6月改为河北师范大学。1996年6月与他校组建为新的河北师范大学。

^② 林镛(1903—1981),字君范。江苏丹阳人,西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二年级导师。1930年自法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4月随西北联大农学院并入西北农学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③ 汪德耀(1903—2000),江苏灌云人。193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于1932年任北平大学生物系教授,兼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起任西北联合大学生物系教授。后任厦门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汪德昭、汪德熙之弟。

政院,其经费应与平津国立校院一体发给”^[19]。这说明教育部长兼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王世杰已经再次明确北平研究院迁西安与国立三校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且经费已经“与平津国立校院一体发给”。此时距 1937 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令以三校“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命令已是两个多月以后。

之后,李书华复经上海、武汉、长沙,辗转至昆明,遂改教育部初衷于 1938 年 4 月在昆明设立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研究所相继迁昆明。稍后,刘慎铎将西安办事处与教育部往来函件、文档等移交昆明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除药物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结晶学研究室回到上海以外,其余均陆续返平。1945 年 8 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设有物理学、原子学、化学、药理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 8 个研究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接管。

(五)与西北联大母体或子体有源流关系的其他相关院校

除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与西北联大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以外,还有辽宁、北京、陕西、河北、河南的今东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之一西北工学院航空系、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西北工学院矿冶系等 20 余所大专院校与西北联大有直接的源流关联,或者与西北联大母体或子体有间接的源流关系。

实际上,这些子体院校的创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保存、激活或汇聚了更多的地方高等教育的“小江”、“小河”。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教育(1906 年的北洋女子学堂)即经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借西北联大之“壳”得以保存和延续;我国最早的矿冶工程高等教育(焦作路矿学堂)亦借并入西北联大子体西北工学院得以发展。以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而论,原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民元(1912)的省立西北大学、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安中山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陕源,已经在 1931 年改为西安高中而几近断流,而正在国民政府顺从民意拟在西安恢复陕源西北大学之际^[20],适有西北联大避乱入陕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以陕源西北大学西安校址作为永久办学地址,这就激活,或者整合了陕源西北大学,形成号称京陕两源的一个完整、强势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架构。同时,西北大学还先后并入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医学专门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南郑师专分校等院校,或分出师范、医学、外语、政法、财贸、民族等合计 33 所不同类型的院校。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 1947 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最大数,不过 207 所,北方地区的平、津、蒙、冀、晋、鲁、豫、辽、吉、黑、陕、甘、宁、青、新总共不过 53 所高等院校^[21]。这才是一校的汇聚和分流,如将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汇聚或分流的所有院校加以统计,估计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半数以上大专院校均与此或多或少地有源流关系。

在与西北联大有源流关系的院校中,东北大学工学院并入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以及与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大学西安办学地址共处等史实,形成了较多的联系。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于 1936 年 2 月迁设西安(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东半部)。1937 年初,受“西安事变”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东北大学,将其 1931 年 11 月设于北平的校总部移迁开封。1937 年 3 月 3 日,臧启芳自开封赴西安接收西安东北大学工学院。1937 年 5 月 17 日,改为国立东北大学,开封校总部与西安的工学院部分正式合为一处。1937 年 6 月 30 日,西安新校舍竣工。东北大学的文、法两学院(后增理、商学院)于 1938 年 3 月迁四川三台,5 月始复课,而其工学院则于 1938 年 6 月迁陕南,于 7 月 7 日并入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工学院。在此期间,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3 月,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共处一院。此时,临时大学在东北大学大礼堂曾举行过李仪祉、张伯

声、顾校书等主讲的4次大型讲演和报告会。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聘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显然有将东北大学并入西安临时大学之意。迁三台以后,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有“东北大学未奉部令,径行迁移入川,当即仍令该校迁回陕西”的说法^[22]。1946年6月三台东北大学开始迁回沈阳复校,1947年2月召开庆祝迁校胜利大会。抗战时期同处西部的大学,教授互聘或兼职很频繁,表明各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东北大学教授中的萧一山亦曾离东大而受聘为西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而西北大学的蓝文征教授亦曾离西大而任东北大学(三台)教授。另外互相曾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或西北工学院等西北五校教授的还有曹靖华、高亨、蒋天枢、陆懋德、曹国卿、丁山、陈克孚、陆侃如、方永蒸、王耀东、陈述、杨丙炎、刘朴、张杰民、王治焘、刘仙洲、孙宗钰、刚时,以及在东北大学为讲师,到西北后为西北五校教授的章右江、潘承孝、袁敦礼等。学生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中共西安市委的学委委员由东北大学学生孔宪春(孔飞)担任,负责领导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党支部工作。在西安与西安临时大学共处时,中共东大—临大党支部曾拟在东北大学拟迁三台前夕,联合西安临时大学拉出数百名学生赴抗日前线,但被西安市学委劝阻继续留校完成学业^[23]。

五、西北联大的历史意义

(一)西北联大分而有合以及面向陕甘移布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历史性转折

矫正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面向西北均衡展布,服务于西北,建设西北,是国立西北五校最大的共性。国民政府行政院确定“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1938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以后,西北联大徐诵明、陈剑脩二常委赴汉口面谒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部长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他顺便还提到入川大学过多,“并无余地容纳”。徐诵明也总结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22],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所处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不仅让北平大学整建制留在西北,而且还下达了不准北平师范大学迁回北平的命令,只因招致强烈反对未果。

民国著名教育学家姜琦教授就此深刻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演进顺序,是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即今京沪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沈阳而进行的……都是沿着江河流域(但黄河流域位中原之附近未尝为人所注意到),或铁路沿线(但陇海铁路也与黄河流域有同样的情形)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名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样的提倡中国文化之建设,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就西北而论,陕西一省,也在抗战以后,才有所谓‘西安临时大学’之产生。一望便知诸当局最初并未曾想到久居于西北了”,谁“也既不愿意即刻化为西北自身所有的大学——由点线的大学转变为面的大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亦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24]。这是迄今所见民国教育学家对西北联大化为西北自身所有的大学以及矫正抗战以前高等教育畸形点线分布的最为精辟的一段论述,这也是距离西北联大改组和向陕甘移布时间最近的一个论述。它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源和演化的高度,深刻揭示了西北联大展布西北的战略意义,是国立西北五校确定办学宗旨的重要起点。

首先对自己服务西北的办学宗旨作出表述的是国立西北大学。西大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故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25]。殷祖英教授 1943 年参加蒙新考察归来后，即呼吁西北大学：“陕南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我们的眼光要放在大西北”。西大兰州校友分会负责人于书绅指出：“尤其是西北最高学府的学士，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该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应以西北为己任，西北如果没有办好，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就是我们放弃责任与权力。我们要吃西北、喝西北、住西北、行西北、领导西北、保卫西北，撒下西北网，整个掩盖住西北。……到西安、兰州、宝鸡、天水、迪化……西北各地，为国家民族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26]。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亦指出：“西大、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所、西北学术文化重心所寄”^[27]，表明西北各校都对服务西北有明确认识。

地方上对西北联大向陕甘移布亦表现出极大地热忱。在西北联大开学典礼上，国民政府第六区张专员即提及：“我们最后胜利的原动力，均在大学教育，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以前贵校有一队到汉中，对于训练小学教师，尽了无限的力量，事后调查，各小学的教学状况均有进步，由此证明适当人才的重要。今贵校全部到此，地方种种事业，仍要借重，尽量改善”^[28]。

在这种共同办学宗旨和共同历史使命之下，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而有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遂有联合招生与办学、对外共同争取权益等共同举措。民国三十七年度(1938)、民国三十八年度(1939)尚为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在城固时期，西大、西工、西农即开始合办大学先修班。迁至西安后，陕西省教育厅专拨早慈巷官产房舍两院，由三校继续联合办学，分为文法、理工、医农三组，于 1946 年 12 月恢复招生。郝圣符教授任主任。1947 年 11 月，招收录取大学先修班学生 120 名，备取 65 名，连同与西工上次招收的新生，共计 220 余名，分为 4 班^[29]。直至 1948 年秋季，西大才开始单独招生办班，物理系吕秉义副教授为主任。1942 年夏秋之际，汉中、西安物价飞涨，每袋面粉从年初的 145 元，到 8 月下旬涨至 550 元，教授薪金以每月 300 元计，仅合战前 83 元，教职工生活大受威胁。为此，于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0 月、1943 年 3 月，西北五校数次联合电呈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秘书处、检察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解决生活困难，并联合采取措施自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亦联合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同设一个西北大学支部，但大家仍习惯地称“西北联大支部”，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40 年，陕西省委为便于秘密活动，才将原支部划小，分为西大、西工、西师三个支部。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期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与西南联大仅留师范在昆、余则全部北归不同的是，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陕甘办学，在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五校，包括了理工农医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其母体诞生的子体与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院校均有或多或少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几乎与我国北方地区半数以上主要高校相关，表明西北联大史在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西北联大的空前迁徙凝聚了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坚强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空前的大规模内迁与合组西北联大，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从全国各战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再回迁复校，远辞故园，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天空敌机轰袭，地面交通阻滞，可谓极其悲壮惨烈。其中汪堃仁院士偕妻女(6 岁女儿和数月大次女)一家四口，逃出北平，取道海上，经天津、香港、越南、昆明、重庆、成都，两遇敌机轰炸，在重庆又采购仪器，行程万里，最后抵达陕南汉中，没有解剖实验用遗体，就捡取无主尸体代替，在西师和西大开出了他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全

部现代生理学课程,在极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联大一位教授和一位学生在翻越秦岭途中和在抵达汉中当天劳累病逝;西医一位教授和两位学生在汉中南郑遭遇日机轰炸牺牲;徐诵明常委自汉中押车再次西迁时,途中翻车,几遭不幸,司机逃逸,复用牛车转运,始抵兰州。重要的是西北联大将历次迁徙(特别是翻越秦岭)确定为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三大目标,就使其更有意义。迁回复校同样壮怀激烈,西大和西师体育教师徐英超带领 200 余名学生回迁复校,自郑州北上,路过解放区,到达北平,还有一部分教师从陕甘北上,乘牛皮筏子渡过黄河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再乘火车至北平。联大师生“以自身绝大的牺牲和激昂热忱,通过‘内迁’这种独特的形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圣战”;“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高教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它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除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众包括师生员工及教师家属计达 77 万余人”^[30],涉及学校 100 余所,累积迁徙 200 余次。西北联大等高校空前大迁徙的凝聚点,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教育制高峰的争夺,为此高校师生持续九年,东北大学持续 15 年在即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院校尚有数百学生奔赴延安、教授从军和 300 余学生直接从军抗战和远征,从而保存了中华民族最高层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知识资本的保证。

西北联大向陕甘的移布,取得了形成 505 名教授、1 489 名员工的师资队伍、培养 9 257 名学生、开创研究生教育、服务西北、创新西北文化和奠定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大教育成就。这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不致因战争的破坏而中断,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激活、整合和提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实力,向西北偏远地区播撒了新的文明因素,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 21 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亦为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作了富厚的历史积淀,作了人才资本的战略储备,尤其是为进入 21 世纪后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文明的根基。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1937-09-10.
- [2] 李莉.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联合大学[D].广州:暨南大学,2007.
- [3] 编者.西北联大学生毕业证书教部验印发还一部待领[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7(复刊 29):12-13. 1947-05-01.
- [4] 编者.本大学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章程[J].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3): 15-16.
- [5] 教育部长陈立夫.令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主任李书田.1938 年发汉教学 6074 号,1938-07-07.
- [6] 关联芳.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1-57.
- [7] 编者.介绍西北大学教授最近著作[J].西北学报, 1941(1).
- [8]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11 120.
- [9] 汪荃仁.科学需要毕生的奉献[OL/EB].<http://news.bnu.edu.cn>.2012-03-22.
- [10]王镜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城固社会教育实验区两年半工作介绍[N].甘肃民国日报,1943-11-08(3).
- [11]袁贵仁.序(2002-09-01)[M]//《西北师大校史》编写组.西北师大校史(1902—2002).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3.
- [12]李书田.致陈立夫信(1943-04-05)[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

- 社,1991:366-367.
- [13]李书田.北洋大学过去五十三年(截止于1948年)[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03-412.
- [14]彭子光.河北师范学院志[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83.
- [15]北平研究院.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工作报告[R].1939.
- [16]徐炳昶.自传[J].河南文史资料,1985(14).
- [17]胡宗刚.刘慎锷与北平研究院西安临时办事处[EB/OL].<http://blog.sina.com.cn/huzonggang/2012-02-25>.
- [18]刘慎锷.致经利彬函(1937-10-30),见:胡宗刚.刘慎锷与北平研究院西安临时办事处[EB/OL].<http://blog.sina.com.cn/huzonggang/2012-02-25>.
- [19]李书华.致刘慎锷函(1937-11-22自上海).见:胡宗刚.刘慎锷与北平研究院西安临时办事处[EB/OL].<http://blog.sina.com.cn/huzonggang/2012-02-25>.
- [20]崇兰学会等.呈为恳请转咨教育部改设西北大学于兰州一案请查照办理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6-06-06.
- [21]高沂.中国高等学校简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 [22]徐诵明.偕陈委员赴西安转汉口向教部报告校务与请示各点[J].西北联大校刊,1938(1):13-14,1938-08-15.
- [23]王振乾,丘琴,姜克夫.东北大学史稿[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18.
- [24]姜琦.祝贺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1):1-2.
- [25]赖琏.题词(1943年)[J].西北学术,1943(1):扉页.
- [26]于书绅.西大青年快到西北来[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5(复刊14):9-10.
- [27]张兆荣.西北各校院迁移问题[J].国立西北工学院月刊,1948(4):3-4.
- [28]张伯常.在西北联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西北联大校刊,1938(1):8-9,1938-08-15.
- [29]编者.先修班招生揭晓,上月中旬开课[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7(复刊33):12.
- [30]韦卓民.三年来的中国战时教育(英文),现藏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YAO Yuan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historical archive, newly found press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division and unity of Northwest National University as the Alma Mater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founded on Sep. 10, 1937, which also mothered five other universities including Northwest 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Northwest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 Northwest National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National Medical College. As a close knit body, it is rational to take them as a study subject, which spans from 1936 to 1947. In these nine years, the integrated system boasts 505 professors, 1489 employees and cultivates 9,257 graduate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nd medicine and these five universities all have graduate programs. They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accumulated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Northwest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 Northwest National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Medical College

论国立西北联大的爱国民主传统

——兼论西北联大改组的原因

李永森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胡锦涛主席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讲到: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作为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催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抗日救亡成为全校师生的天职,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更是进步师生的一种理想和追求。本文着重论述国立西北联大(含初期西安临大)时期,师生抗日救亡活动和反对解聘进步教授、迫害进步学生的斗争中,全校师生所表现的爱国民主传统及周恩来副主席对西北联大反解聘斗争的指导。兼论西北联大为什么没有和西南联大一样坚持联合大学的独立办学体制,两年后逐渐走向改组和解体的原因。

关键词:国立西安临大、国立西北联大、抗日救亡、民主、解聘、反解聘、反迫害、改组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一步步由东北危及华北,这些地区的高等学校随着军事形势的失利,纷纷开始内迁,东北大学先迁北平,不久该校校长张学良来西安担任军职,他用旧东三省官银号结余款15万元,在西安小南门外的原西北大学农科所在地修筑校舍,先将东北大学工学院迁来西安。在修建大礼堂时,他有感国破校散的处境,写了“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勸尔多士,复我河山”的励志题词,可是祖国锦绣河山随着北平“芦沟桥事变”的爆发,大片大片地丧失,不到一个月京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相继成为日军的兵营和司令部,有的校舍全毁,图书、仪器破坏殆尽,师生颠沛流离……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不当亡国奴或受奴化教育,延续中华民族的文明火炬,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喊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口号,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京津地区高等院校内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初期叫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这对“双生子”就是在国土沦丧高校流亡的背景下同时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这两所超大规模的大学联合体,就是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流亡的产儿。

一、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西安临大既是抗日战争中诞生的,抗日救亡就是全校师生的头等大事。正如临大校刊创刊号全校一号布告宣称:“凡所教学训遵之方,悉宜针对国难时艰,积极设施,以厉行非常时期之救亡教育。”^①

自红军长征到陕北后,陕西就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区,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救亡的声浪震撼了这座沉睡的古城,全国热血青年无不向往,这时平大,师大,北洋等学校内迁西安,大批流亡学生乘机纷纷从沦陷区来陕复学,不少爱国青年也都以考取西安临大为自己的迫切愿望。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平大,师大等校师生的来陕及大批爱国青年的入学,极大地壮大了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古都西安和陕南一时成为西北学生抗日

^① 《西安临大校刊》第一期,3页

救亡运动的中心，广大师生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力主国共合作、动员全民抗战的中坚力量。当时的西安临大和以后的西北联大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在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如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大会，举办抗战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激发爱国热情，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当年凡省、市县举行的抗日群众集会、游行，联大师生无不是主要参加者或组织者。如法商学院的沈志远教授，就曾在西安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激情的抗日演说。当年曾经参加西安抗日集会的老校友，向母校奉献了全校同学执宣传抗战的小旗，参加群众游行的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①，这张照片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年联大师生投身于古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烈场面。一些老校友回忆起抗战初期在西安参加的重大活动，仍非常激动。如1937年入学的经济系学生傅道义回忆说：“当彭德怀将军在西安要作报告的消息传出时，大学闻之雀跃，蜂拥前去。”^②另一经济系毕业的校友、民先队员李可风在自己的回忆中也说：“当时常有八路军政工人员路过西安，临大学生多次邀请他们来校作报告，他们就国内外政治，前线军事形势和敌后群众运动分别论述，理论与实际结合，说服力强，生动感人，激发了学生爱国热忱，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③在临大地下党支部和“民先队”的组织领导下，全校还经常举办各种专题座谈会，邀请进步教授出席指导，并发表对政治形势和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应邀前来作报告或讲演的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女作家丁玲，有历史学家侯外庐，有杨虎城将军驻陕西时的秘书长、陕北抗日大同盟主席杨明轩，还有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梁漱溟等。全校同学到会听讲极为踊跃。

2、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西安临大开学后即宣布“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④全校规定学生每学期必须用二到三周时间，由教师带队到县乡和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于1938年春，先后组织了四个学生宣传队，分别到汉中，褒城，留霸，凤县进行宣传，每队20-30人，成绩作为学业成绩之一部分。救亡宣传活动的形式多样，如组织歌咏队、漫画班、话剧团，通过唱歌，演戏，绘画，写标语，出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当时作曲家贺绿汀，漫画家张汀，陶今也从武汉去延安，在西安停留，学生团体就请他们来校指导，为全校培养了一批抗战宣传人才。当年贺绿汀操着满口湖南腔，教唱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神情，至今在老校友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西安上演过舞台剧《飞将军》和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学校南迁后校话剧团又活跃在陕南城乡，成为抗日宣传一支先锋队，当年任联大剧团团长的李昌伦校友回忆说：“约在1938年元月，联大中共党支部负责人找我谈话，叫我出面组织西北联大剧团，我接受了这一任务，立即着手筹备，我担任团长。剧团还附设有歌咏队，由十余名民先队员组成。当时联大剧团的演员虽然只有几十人，但围绕剧团活动和支援剧团活动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则不下一、二百人。联大剧团曾经在陕南城固、南郑等县的农村和城镇巡回演出街头剧和中小型话剧，歌咏队也经常到群众中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开路先锋》、《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新莲花落》、《黄河谣》等。这些对于唤起民众，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⑤

3、培养抗日干部，组织支前工作。如通过民先队组织抗日军事训练和游击战演习，组织战地服务团慰问抗日伤病员，并发动队员赴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等。抗战初期，民先队

^① 见《西北大学史稿》（上卷）（2002.9版）25页

^② 傅道义《关于西北联大时期校内政治斗争几个问题的片断回忆》载《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P84

^③ 李可风《从抗日救亡蓬勃发展的西安临大到白色恐怖笼罩的西北大学》载《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33页

^④ 《西安临大校刊》第一期

^⑤ 李昌伦《抗战时期西北联大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P119-120

组织在全校有很大发展，全校有民先队员 202 人，^①民先队分队部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满头银发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柏渠常在办事处接待西安临大师生，一些知名教授学者，也常主动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林老请教，如法商学院的章友江教授常是办事处的座上客。193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作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全校民先队负责人，原平大法商学院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郭有义等人曾代表学校民先队出席会议，不久，关中地区民先队在西安召开会议，讨论民先队的工作和联合行动，全校民先队亦派代表参加。随后，校民先队与西安市民先队又经常联合行动，如多次动员群众赴晋豫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和游击战演习等，这些活动为抗战输送了干部，支援了前线，同时也增长了同学们抗战的军事和政治的认识。民先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博得了全校同学的信任，民先队的队伍也在校内日益壮大。此外，为了做好支前工作，1937 年 8、9 月间，学校抗敌后援会（当时相当于学生会的组织，不另成立学生会）决定组织“西安临大战地服务团”到敌战区周围进行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团长薛启犹，副团长申振民（申健），共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其中少数是中共党员，其他多为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这中间，有几位同学还是刚从陕北受训回来的。服务团于 1937 年 11、12 月间去潼关华阴等地工作，到 1938 年春才回到西安，不久，与西南联大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为抗敌做了不少工作。与此同时，1937 年底为支援前线抗战，全校教职工一律以一个月薪金认购救国公债（分五个月扣缴）全校学生响应“一日一分运动”，每人每日从生活费中节省出一分钱，投入钱箱，接济前方需用，人人节衣缩食，尽心尽力从物力上支援前线。

4、组织读书会，团聚发展进步力量。1938 年夏天，正面战场不断传来失利的消息，政府中悲观失望的妥协投降空气有所增长，这时，全校师生已被迫迁往陕南的城固，汉中，勉县等地。陕南交通闭塞，同学们坚持抗战，要求进步的愿望受到地方当局的压制。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为了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在各院，系广泛组织合法的社团活动，各种读书会的组织在联大校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影响较大的社团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学习社，译丛社，自修社，毕业之友社，文艺学习社等。这些读书会组织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进步，主张救亡的。如自励社的组织者，1937 年入学经济系的学生伍诗绥回忆说：“成立读书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学习革命理论，联络思想感情，宣传抗日救亡，要求社会进步四句话”^②各社的成员都是跨班，跨系，跨院的，其中以法商学院的学生最多，人数少则几人、十人，多则几十人，读书会组织学习进步书刊，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出墙报等。书刊都是由大家捐献或集资购买的，有时个人得到一本有价值的新书，也临时交给读书会传看。他们经常举办讨论会或报告会，围绕抗战问题议论国内外形势和时局的变化。讨论的问题有：“现阶段日本政治经济的透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著名教授沈志远、寸树声，章友江，季陶达，许寿裳，曹靖华等经常被学生邀请作报告或参加座谈讨论会，如 1938 年春天，在法商学院召开的《抗战救国纲领》座谈会上，沈志远，章友江教授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发言，激发了每个热血青年的心、“全校前来参加的人非常之多，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在教室的四周点燃一支支土制的蜡烛，师生济济一堂，烛光熠熠发光，真是一派战时的景象。”^③墙报一般是一个月一期，凡遇重大节日，特别是“七七”抗日周年纪念日，必出特刊。至于文章体裁，或论说，或评说，或杂感，或特写，或翻译，或文摘剪报，丰富多彩。全校举办的墙报以《展望》、《自励》、《自学》、《学习》等最有名气，其篇幅大都是每期几万字。内容主要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反对妥协投降。如展望社的壁报每期必对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形势分别作一展望分析，很受同学欢迎，其他如《自励》第五期《学习·革

^① 《西北大学校史稿》207 页

^② 张容林《自励社成立的前前后后》载《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133 页

^③ 引自《西北大学史稿》（上卷）243 页

命·人生观》一文，还有《纪念“九一八”八周年》等文章，都曾在全校引起很大的震动，每逢抗日纪念日，各社壁报一齐刊出，真如同学称道的“琳琅满日报满墙，奇苑争艳吐芬芳”。

二、轰轰烈烈的反解聘，反迫害斗争

抗日战争阶段，政治上，国共两党是处于合作的时期，国民党虽是执政党，而共产党的活动亦应是公开合法的，但由于两党在抗日的主张和路线上的分歧，两党之间有合作也有斗争。虽然中共西北联大党支部在1937年11月就成立了，^①但党的组织实际上只能处于未公开和隐蔽的状态，大多数活动只能通过群众性的社团组织和读书会开展工作。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具有革命传统的西北联大师生的爱国，进步倾向深为不安。1938年底在西北联大的布告栏首先贴出了禁止学生参加民先队任何活动的醒目布告，称“以后本校学生不准参加该队任何活动，如有违背，一经查出，严加处分。”^②与此同时，西北联大民先队员在校名册，离校民先队员名单，指导员，区队长，分队长名单均被政府军政当局掌握。^③教育行政当局对西北联大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严加防范，对进步教授的授课内容及其行动也倍加注意了。

为了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1938年7月，教育部下令改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后增聘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胡并任常务委员，胡到校后，还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一身二任，实际上从此掌握了全校的实权。张北海在任校务委员之前，是以教育部督学名义常驻学校的，他的责任是对学校行政进行监督。他过去曾在国民政府专搞新闻检查，曾任上海影检所所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专员。他的来校，负有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特殊使命，因为他随带一名秘书名义的保镖、精通拳术，一度当过大汉奸褚民谊练拳的助手，张北海身后经常跟着这位带着墨镜，不言笑，仿佛时刻在搜寻争斗目标的“秘书”，大家一眼便可判断，他不是来办学的！张北海来校后，不仅是陈立夫设在联大的坐探，同时他经常匆匆来往于渝陕道上，把他掌握的西北联大的情况上报陈立夫，然后再把陈立夫的指示下达给胡庶华。

1938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校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决定聘请鲁迅先生的好友，德高望重的许寿裳先生任法商学院院长，当教育部得知此事后非常不满，竟违背大学组织法“院长由校长聘任”的规定，由教育部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张北海的上任，引起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大家立即意识到这是企图向进步师生开刀的一个序幕。当时法商学院教授曹联亚，沈志远，章友江，彭迪先，黄觉非，韩幽桐，刘及辰，李绍鹏等10余名教师开会，决定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当院长，并立即发出油印传单“快邮代电”送全国各报社、大专院校和机关团体，公开反对教育部的决定。指责张北海不学无术，品质低劣，不仅不足为人师表，更不配当大学的院长。“快邮代电”发出后，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反应和轰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师生同情支持，学生中立即提出了“反对张北海接任法商学院院长”、“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等口号，在校内掀起了一次学潮。

为了对付进步师生，在张北海的策动下，一方面出动特务学生对为首的进步师生跟踪监视、威胁、刁难，并围攻支持进步教授的学生。另一方面对进步教授有的采取不排课或削减课时，打击排挤；有的则采取公开威胁或破坏课堂秩序等办法进行恫吓。如在彭迪先教授讲课时，竟然有特务学生坐在第一排拿出手枪擦弄，蓄意威胁。至1938年底，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社会科学课程，并认为开设俄文课程，是引进了共产学说。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同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俄文课

^① 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有关人员党籍处理意见的报告》载《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6页

^② 《西北联大校刊》第七期

^③ 见西北联大档案政治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大队第十中队第一区队《西北联大民先队在校名单》

教授曹联亚等 13 人。随后，曹联亚（靖华）、章友江，沈志远，韩幽桐，彭迪先，黄觉非，寸树声，刘及辰，李绍鹏，方铭竹，吴英荃，夏慧文等一批进步教师就先后被一个一个地解聘了。在此同时，教育部还通令全国各院校，凡解聘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予聘任。

当局的倒行逆施，当然地激起了被解聘教师的愤怒。法商学院推举曹联亚，彭迪先二人作为被迫害教授的代表，前往校本部抗议，当面质问主管校务的三青团头目为什么要撤换院长？为什么要解聘进步教授？两位代表拍案怒斥道：“不遵守聘约，不讲信义，不讲民主，迫害教师，就是摧残教育！”彭迪先年方 31 岁，更是怒不可遏，与校常委胡庶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搞得胡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全校进步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后，更是群情激愤。在中央联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向教育部和校方开展了一场请愿斗争。由法商学院勤奋好学，思想敏锐，敢于斗争的学生李昌伦出面组织群众 200 余人签名请愿，由文章写得泼辣漂亮的“桂胖子”（桂奕仙）执笔起草了谴责党团控制学校摧残高等教育，倒行逆施的石印传单。这些传单除公开在全校张贴外，还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大专院校散发请求声援。同时组织请愿小组，提出：（1）反对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2）要求恢复商学系俄文课程。全校进步教师对学生这一正义行动积极支持。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也和学生一道，拍案而起，公开支持学生的斗争。学生请愿代表虽多次向校方请愿、谈判，但校方仍坚持教育部的决定。张北海更是凶相毕露地威胁训斥请愿代表，宣布对李昌伦，王仲雄等代表“记大过”处分一次，以示惩罚。

在被宣布解聘的进步教授中，大部分是全国知名学者，他们对教育部倒行逆施的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章友江教授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斗争的策略一事。章教授曾于 1927 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不久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0 年，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等宗派集团而被迫出党的，就是在苏联工作期间，已和周恩来熟识。1938 年底，在西北联大师生反解聘斗争处于高潮时，他曾专程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将教育部解聘西北联大进步教授及师生反解聘斗争的情况向周恩来副主席作过汇报，当时周恩来同志对西北联大的斗争作了重要的指示。关于这一重要经历，正如章友江教授在 1973 年 7 月给周总理的信中写道：“1938 年我在西北联大任教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抗日反蒋活动，为此被国民党解聘教职，并被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再聘请我任教。在这次斗争中，我曾专程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您请示，您和其他领导同志曾用请客吃饭的掩护方式，给了我很多重要指标。遵照这些指示进行斗争，在学校里保存了一部分左派教授的力量，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①周恩来同志关于斗争策略的重要指示为“反解聘”斗争指明了方向，是对联大师生的极大关怀、章友江教授由重庆返校后，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他特意在城固居住了一段时间，积极地指导进步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反迫害斗争，弄得教育当局理屈辞穷，狼狈不堪。

在校方被闹得黔驴技穷，难于维持的时候，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派学者型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于 1939 年 1 月 9 日来西北联大平息事态，也未成功。^②于是便会同国民党汉中地方当局下定了镇压进步师生的决心。于 1939 年 3 月 5 日（农历元宵节）深夜，几十名便衣特务，将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刘长菘，党员郑登材和李昌伦三人分别逮捕，并于次日晨押解到汉中国民党陕南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肃反组关押审问。于是，这场由“反解聘”进步教授的斗争立即转入了“反迫害”进步学生的阶段。由于支部书记被捕，中共联大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立即改组了支部，由袁敏继刘长菘任书记，并积极领导和组织进步师生探监慰问被捕的学生。同学们给三位战友献诗：“爱国竟何罪？无端系尔身，永怀苏氏节，不愧岳家

^① 傅道义：《抗日战争初期西北联大和校内政治斗争散记》、《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第 107 页

^② 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稿》（上卷）254 页

魂。此地朔风急，北天春意深。勿为多寂寞，四海结同心。”^①彭迪先，章友江，沈志远等教授此时多次奔波于城固、汉中之间，到处呼吁营救，寸树声教授为营救一事从城固赶到汉中找校常委徐诵明商议办法。随后徐老同黄觉非教授同去汉中警备司令部找当政治部主任的家乡林某疏通。在重庆生活书店的邹韬奋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发出呼吁，要求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主持公道，电令陕南当局释放被捕的无辜学生。经过三个月的营救斗争，国民党汉中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之，三位共产党员拒不吐实，大义凛然，当局抓不住把柄，只好被迫将他们释放。“反迫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全校然后笼罩着恐怖的阴云。

1939年夏天，由于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制定，国民党当局到处制造摩擦。在白色恐怖日益临近的形势下，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和联大进步师生，团结一致，按周恩来同志通过章友江教授传达的指示精神，利用敌人派系矛盾保存左派力量，积极组织撤退。1939年暑假前夕，教育部当局解聘的十多位进步教授，分别向学生讲完最后一课后，先后被迫离开西北联大，转战四川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著名翻译家，作家曹联亚教授一到重庆就去看望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周恩来副主席不等曹开口，就说：“你们被解聘了，经过不用多谈，因为你所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所不知道的，我也知道了。你们反得很好！你们反得很对！你们所反对的是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你们反对他，他就解聘你，因为政权在他们手里。”接着又说：“你们被解聘了，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归第三厅郭沫若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老舍实际负责的文艺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都在咱们手里，都直接归党指挥，他们一点反对的余地也没有……现在你到中苏友好协会担任常务理事。你对苏联熟悉、又会俄文，那里工作需要你，你去，这是党的提名，他们不敢不接受，他们不能、也不敢再动你。”^②其他被解聘的进步教授如章友江，沈志远，彭迪先，李绍鹏，刘及辰等都先后在中共和其他进步人士关怀下，分别在重庆、成都文化战线安排了工作。那些从西北联大毕业或呆不下去（被开除、记过）的八七十名进步学生，有的去了陕北和华北敌后，多数通过上述进步教授的社会关系，先后到四川安排和介绍了工作。

由此可见，1938年冬至次年春天。西北联大师生反对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的这场斗争，始终是在西北联大地下党领导下，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的结果虽然反动势力暂时在校内占了上风，联大的一批进步教授和革命青年也暂时撤出了学校，但这不是革命力量的削弱，而是革命力量的转移和交换阵地。在斗争中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保存了一部分进步教授的力量，保存了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培养和锻炼了革命青年，这就在校内保存了抗日进步的革命火种，这火种是会再一次地燃烧起来的！

三、西北联大改组的原因探析

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和轰轰烈烈的反解聘、反迫害斗争和西北联大的改组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同是作为内迁的一对双生子，国立西南联大就能保持独立、在西南的大后方坚持长达八年，而西北联大加上临大阶段也只不过坚持了两年就改组了呢？

1、西北联大改组的“近因”

首先，从西北联大改组的客观地理和历史原因来分析，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平大，北师大，北洋等校同学经历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洗礼，七七事变后由京津地区艰辛流亡到陕西，他们的抗战爱国热情像烽火一样在心中燃烧，西安事变后的革命圣地延安深深地吸引着这些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就是这些年轻人去陕北的介绍所；延安和“抗大”就是这些心向革命的年轻人向往的校园，因此，教育部当局怕这一局面发酵延续、学生“赤化”，怕真的有一天西北联大变成了“第二抗大”，那他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① 据牟敦伟：《西北大学片断回忆》、《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第148页

^② 傅道义：《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政治斗争散记》、《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内部），第104页

因此，国民党教育当局一直在寻找解决上述头痛问题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北联大改组后曾同时担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和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赖连（景瑚），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就有过清楚的叙述。因为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后来又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他的看法不能不反映官方的意图。他曾在1966年4月和1969年8月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两篇回忆文章，他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国的全面抗战便开始。平津各大学就不得不仓卒南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云南的昆明，合组西南联大。平大，师大，北洋等院校在陕西的西安，成立西北联大。两个联大（最初一度称临时大学）虽然都是准备长期抗日而产生的，可是，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后者远不及前者安定。由于北方战局严重和学校内部常发生歧见，西北联大一再迁徙及改组。”“有一次在重庆遇见西南联大的蒋梦麟先生。我们互言两方所遭遇的困难。他说：我们比你们幸运一点，昆明离延安很远。”^①他在这篇回忆录的“经常来自陕北的威胁”一节中，痛切地说：“最可怕的，还是随时来自陕北的威胁！”^②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西北联大之所以“一再迁徙及改组”，是因为“后者远不及前者安定”，“经常来自陕北的威胁”，是为了解决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和“近忧”的问题。因此，1938年3月，西北联大由西安迁到边远的陕南，此时，日寇的飞机虽不如学校在西安时那般频繁地飞临头顶，学生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如在西安城内那样方便，但战局日益深重，抗日前线和延安仍然像一块磁石，时时刻刻牵动着联大师生的心，事实证明，只是简单地将一所大学搬到交通闭塞和偏僻的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统治陕南的鄂陕边区警备司令祝绍周（人称汉中王）等人，神经高度紧张，无时无刻都感觉到西北联大师生革命进步势力的存在。联大民先队和联大剧团仍活跃在陕南城乡，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外围进步社团仍活动频繁，全校各院大小学潮一个接着一个，教育当局除了采取解聘进步教授，逮捕开除进步学生，加强国民党、三青团和建立训导处等三位一体的办法来控制学校外，就是进一步肢解联大，分而治之。于是，国立西北联大便从1938年7月开始，不断改组，首先于七月奉教育部令将农工两学院各与他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及国立西北工学院，并同时将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为稍后独立设置的西北师范学院奠定了基础。

2、西北联大改组的“远因”

西北联大改组除了当时教育当局痛感这所学校的地址离延安太近，学校师生太红，太激进这个“近因”外，从“远因”来看，国民政府也并不是没有对全国高等教育布局及开发大西北等方面做长远考虑，单纯把联大改组归结为防红、防共，把教育事业完全政治化也是不客观的。从历史原因分析，自1931年西北唯一的一所国立西北大学停办以后，西北地区民众和全国有识之士对于国民党当局不重视发展西北高等教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提出了严重的质问。譬如，1932年《新西北》创刊号所载康天国《西北应设立一国立大学》一文就说：“吾人试观江苏一省除八院齐全之中央大学所在外，其上海一地即有国立大学六所，而西北六七省地方除前已所云兰州公立之甘肃大学外，国家并未丝毫顾及西北之教育！此则固西北人之不幸与失望，同时亦国家当局之失职与损失，此则事理昭昭，毋庸多赘。故吾人以为今后我国当局欲谋整个中国文化程度与夫人民知识程度之提高，须由中央经费来创办一法学、理学、教育、文学、工学、农学、医学、体育八学院完备之一国立西北大学于西北不可也。”^③又如1932年1月29日天津《大公报》题为《西北教育》的评论也说：“国家教育经费，动以千百万计，然用于西北者几何？沿江沿海，大学如毛，而从未在西北省区创一规模宏阔之

^① 赖景瑚：《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抗战时期兼长西北两大大学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五期9、14页

^② 赖景瑚：《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抗战时期兼长西北两大大学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五期10页

^③ 《西北大学史稿》（上卷）267页

国立大学，此政府教育行政上之大缺憾也。”^①可是，这些明智而富远见的建议，当时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国民党内关于开发西北的呼声又起。在1935年11月2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杨一峰等32人提案称：“查我国兴学数十年，于国立大学之设置，对地域分布向未重视。…惟西北数省，广袤万里，迄今无一国立大学，以素称文化落后之区域，又无高等学府之设置，衡以教育平等之义，诟得谓平？矧国难以还，开发西北，万不容缓，百废待举，动需专才。”^②接着，1936年8月20日在开发西北协会第三届年会上，又正式通过了由安汉委员提出的《请中央筹设国立西北大学案》。明确要求：“开发西北，应以经济与文化相辅而行，庶免畸形病态不均之现象发生”。

可见，国民政府在“未丝毫顾及西北之教育”对地域分布“畸形病态不均”的批评面前，不得不有所作为。因此，在1938年4月3日行政院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就明确提出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仅是一所临时性的学校，“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这就是后来国立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及工、农、医、师各学院逐渐分流独立设置的原因和依据。正如1941年9月西北大学教授姜琦在《西北学报》创刊号中评论说的：“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很显然，这是国民政府对于以上呼声的积极回应。

总之，西北联大的改组，虽然从政治上看，是为了“防红”、解决西北联大离延安近的问题，但从文化和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来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对开发大西北、建立巩固的抗战大后方，对于长期留下的高等教育分布不均，西北高等教育落后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这不能不是国民政府在解决这个“近忧”问题时，必须从长计议的一种明智的“远虑”。西北联大的改组正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发生的，因此西北联大的改组从客观上说，不但是光绪年间创办的“陕西大学堂”和民国年间两建两停的西北大学重新焕发了生机，接续了生命，让“陕源”和“京源”实现了对接，而且大大促进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西北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再生之源。抗战胜利后，虽然北师大，北洋先后复校，但留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在咸阳的西北工学院，在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在西安的西北医学院等高等院校，成为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农、医、师高等教育的牢固基础。联大的主体文、理、法商三个学院，虽然永远地留在了三秦大地，北平大学的校名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但由这所大学血脉流淌的国立西北大学，却延绵不断地继承着国立西北联大和北平大学的校风、学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新中国建立后，国立西北联大改组留下的丰厚高等教育遗产，像种子一样，洒遍了西北大地，根本改变了抗战前西北高等教育长期空白、落后的状况，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西北联大在历史上凝聚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永远值得西北地区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学子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 1、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辑）1987年8月内部版
- 2、《国立西安临大校刊》（合订本）
- 3、《国立西北联大校刊》（合订本）
- 4、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上卷）修订本，200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 5、赖景瑚：《烟云思往录》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出版社，八卷五期、十五卷六期

^① 《西北大学史稿》（上卷）267页

^② 《西北大学史稿》（上卷）268页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

赵弘毅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陕西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具有两大源头:陕源与京源。在陕源即将断流之际,京源济陕,成为陕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诞生,曾成为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支撑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擎天柱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五校分立,促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其办学传统与精神,对陕西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高等教育; 陕西高教发展

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陕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时期的大学堂。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两大历史源头:陕源与京源。在陕源即将断流之际,京源济陕,成为陕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

所谓陕源,可追溯到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二日,陕西巡抚升允奏请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圣鉴训示”,开办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张凤翔创建的省立西北大学、1923年刘镇华恢复的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的西安中山学院和1928年的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4月,西安中山大学改为陕西高级中学;1932年,原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中国水利之父李仪祉筹建陕西水利专科,附设于该中学;1934年6月,该科并入由于右任先生1932年创办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称水利组。至此,西北大学已两办两停,虽有此工科的再延续,但纵观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此时已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几乎断流。

所谓京源,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京津地区西迁来陕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研究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联合组建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及其它们的前身。

国立北洋工学院的前身是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的天津西学堂,后用过北洋大学堂(1903)、北洋大学校(1912)、国立北洋大学(1914)、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名。1937年西迁来陕。1946年11月部分师生返津恢复国立北洋大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为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37年西迁来陕;1946年抗战胜利后,部分师生返回北平复校,称北平师范学院。

国立北平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的京师大学堂始设的速成科仕学馆和预备政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京津沦陷,上述京津三校与国立北平研究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1906—1937-9),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第17728号训令颁布的《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于同年10月西迁来陕,联合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城固,并于4月3日,按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溯其本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除北大、清华之外,平津国立院校几囊括以尽。因其组成高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学科众多,办学实力强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和民族危难时期,不仅保存和坚持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香火不断,而且曾一度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成为当时著名学府,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支撑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两大擎天柱石。特别是在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几乎断流的情况下,西北联大成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西北联大校常委陈剑脩在联大开学典礼上所讲:“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原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在三十多年前回忆当年情况时亦说:“可见当时西北建校教育政策甚为重要,而对以后西北地区发展更具远大影响。”

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五校分立,成为陕西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之基

国立西北联大存续仅一年零四个月,国民党统治当局出于战略需要,对西北联大实行分设之。1938年7月,国民政府令西北联大,将其中的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独立设置国立西北工学院,院址设城固古路坝;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址设武功杨陵;同时将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1939年8月8日,进一步将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其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出来,分别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迁兰州,医学院仍设南郑。至此,国立西北联大已分设为五校。

国立西北联大的分立,从客观上促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成为陕西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壮大之基础。今日陕西许多著名高等学府都与国立西北联大及其主要承袭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不少高校始建时期的主要领导、骨干教师、学科专业设置基础,都来自国立西北联大。以下仅从学科专业设置角度,探讨这种渊源关系的演变。

再生于抗战救国大时代的国立西北大学,主要承袭了西北联大中原国立北平大学文理(由平大女子文理学院和师大的文学院与理学院组成)、法商(即原平大的法商学院)两学院。按大学旧制,凡成大学者必拥有3个以上学院之规定,遂将文理学院分劈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和法商学院共设3院12系,暂留城固,永久校址指定为西安。原西北联大校常委胡庶华任首任校长,一大批联大著名教授长期留校任教。1939年12月29日,学校制定了《国立西北大学组织大纲》,基本承袭平大之旧,自平大、师大而临大而联大而西大,办学体制大体无更张。1944年9月,国立西大奉命新设边政系,归属文学院,1947年改属法商学院;1946年5月5日,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又奉命并入国立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同迁西安办学。1949年,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1941-9—1949)、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38-4—1949-5)、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4-7—1949-5)等并入国立西北大学,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国立西大已拥有文、理、法、商、医4大学院15系。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大获得新生。1950年2月,南郑师大分校(1946春—1950-2)并入国立西大;1952年9月,兰州大学和西北师院的英语系并入西北大学;1972年3月,又将陕西工业大学化工系并入。新中国成立初的西北大学是部属全国14所综合大学之一,曾一度名列前茅。然而,西大同西北联大一样,又为西北高等教育无私奉献:1950年5月,西大医学院分立为西安医学院;1952年9月,西大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兰州大学;西大的边政系(建国后改为民族系)并入西藏公学(即后来的西藏民族学院);西大俄文组与俄文专修科并入西北俄文专科学校;1953年9月,西大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调入西北俄专,师院数学系、中文系、史地系四年级并入西北师范学院;1954年6月,西大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1958年9月,西大法律系并入西北政法学院;1960年5月,西大经济系分立为西北财经学院(即后来的陕西财经学院)。西北大学在为陕西乃至西北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贡献的同时,自身却元气大伤。其中,特别是1958年8月下放陕西省主管,使西北大学的发展惨遭严重限制,“文革”时期,又遭受破坏。到1966年,西北大学仅剩文、理两大基础学科,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8系9个专业。改革

开放后,西大人发扬顽强拼搏精神,奋力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胆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广泛开展联合办学,重振西大雄风。1978年,学校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1996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9年,成为国家省部共建高校和国家西部地区“一省一校”计划重点建设院校。现已发展成为学科齐全,特色鲜明,拥有21个学院(系)、71个本科专业,19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办学格局,并朝着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宏伟目标迈进。

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联大中的工学院(由原国立北洋工学院与原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组成),1938年7月22日,奉命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和原已迁往甘肃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校常委李书田、赖琏等先后任院长。1946年,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城固迁咸阳,1950年改称西北工学院;1957年10月,与西安航空学院(其前身为1952年由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即原中央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合并而成的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8月,由南京迁西安)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60年10月,成为全国重点大学;1970年,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并入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现已发展成为今日国内唯一具有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特色的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国立西北联大中的农学院(由原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农学、林学、农业化学3系组成)。1938年7月22日,奉命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成国立西北农学院;1950年改称西北农学院;1979年列入全国重点大学;1985年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9月,奉国务院之命,与原从西农分离出来的西北林学院及其中科院设在杨陵的水利所、水保所、西北水利所、陕西农科院、林科院、西北植物所等合并,组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使之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联大中的师范学院(其最早前身是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1938年7月改称师范学院)。1939年8月8日,联大师范学院奉命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迁兰州今址设分院;1944年,全部迁兰州。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西北联大校常委李蒸和著名教授黎锦熙等先后任西北师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北师院部分师生返回北平,恢复北平师大,多数师生仍留兰州继续办学;1954年,西北师院的体育系与西北体育干部培训班合并,成立西安体育学院;1958年,西北师院由部属下放甘肃省管,并改称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又恢复原名;1988年5月,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5年由教育部特令增设的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教育学系。1949年5月,该系与由省府委托西北大学教授郝耀东1944年主持创办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1952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从西北大学分迁至长安南路新址,1954年6月正式批准独立建制,定名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初,西安师范学院与始建于1956年的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1978年列为部属,现为部属“211工程”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联大中原北洋大学的工学院,后为西北工学院。1956年,西北工学院、东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土木、建筑、市政等类系科合并,成立西安建筑工程学院;1959年易名西安冶金学院;1963年改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1994年3月8日更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其前身为1949年5月1日建立的北京机械学院和陕西工业大学于1972年联合组成的陕西机械学院;1994年1月改为现名)中的水利系,源自国立西北联大的工学院;1938—1956年,成为西北工学院的水利系;1957—1960年,成为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1960—1972年,成为陕西工业大学水利系;1972—1994年,成为陕西机械学院水利系;1994年至今,成为西安理工大学水利系。

西安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的采矿系冶金科,后成为国立西北联大工学院的矿冶工程系;1938年7月,并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7年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矿冶系;1958年9月15日,以西安交大采矿系、地质系(由采矿系地质教研组与西安动力学院及西

北农学院水利系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合并组成)和部分基础课师资为基础,成立西安矿业学院;1999年6月,改称西安科技学院;2003年4月,更名为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的前身为创建于1912年的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其后历经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国立西北联大纺织系,西北工学院纺织系;1978年成立西北纺织工程学院;2006年更名为西安工程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之一是1958年9月从西北大学分离出来的法律系(最早可追溯到国立北平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法律系,后为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另一前身是1937年创办的延安公学,1941年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9年迁西安办学。1958年,西大法律系与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合并,组成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改称西北政法学院;“文革”时期停办,1978年复校;2006年11月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西北大学的俄文组、俄文专修科(最早可追溯到城固时期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俄文组)与兰州大学俄文系、中共西北局党校俄文班联合而建的西北俄文专科学校。1958年西北俄专改称西安外国语学院;1995年与陕西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沿用原名;2006年2月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

原西安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联大医学院(最早可追溯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医学实业馆,次年改为医学馆,1912年改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称国立北京医科大学,1928年并为国立北平大学之医学院)。1938年8月8日,医学院从西北联大分出,独立设置国立西北医学院,原西北联大著名教授吴祥凤、蹇先器、徐佐夏、侯宗濂等先后任院长。1939年8月,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后,医学院又归并国立西北大学;1950年5月,医学院从西北大学分离,成立西北医学院,后改称西安医学院;1985年,西安医学院更名为西安医科大学。1946年8月,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并入国立甘肃学院,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成为兰大医院,1954年,兰大医学院奉命独立建院。

原陕西财经学院的前身是国立西北联大的法商学院(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仕学馆,后几经易名,成为国立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城固时期成为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中的经济系与商学系)。1960年5月,经济系从西北大学分出,成立陕西财经学院;1962年与西北政法学院合并,成立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财经独立,改称西北财经学院;“文革”时期停办,1978年复校,更名为陕西财经学院。

原西安医科大学与原陕西财经学院,是两所历史悠久、富有鲜明特色的著名学府,于2004年并入西安交大,现为该校的二级学院。

从以上所记大略,非但可以清晰地看出陕西乃至西北一些高校发展之导源,特别显示出陕西绝大多数历史较久的高校,其发展之基础,都与国立西北联大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其中不少高校还属同根同源;亦可清晰地显示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艰难曲折发展之概观。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前身与承袭者,百余年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经数代学人艰苦卓绝地拼搏与惨淡经营,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终于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发展壮大起来。陕西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西北联大功不可没。

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办学传统与精神对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由京津四校一院组成的国立西安临大、国立西北联大师生,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岁月,颠沛流离,内迁来陕,立足西安不久,又被迫南迁城固,其艰难困苦之状,是今人难以想像的,特别是南迁之初,师生徒步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颠沛跋涉千余里,历时月余,才达目的地。正如《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碑文所载:“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匪类为伍;或驱车险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餐风露宿,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初来乍到,没有校舍,全校6院24系散居于城固、勉县、南郑3县6处数十公里的农舍、祠堂、庙宇、教堂。从校长到教师,皆租民房而居;学生没有宿舍,就在教

室席地而眠;伙食为水煮白菜还无盐;上课没有课本靠笔记;为防日寇轰炸,还往往不得不躲到野外树林上课。在物价飞涨,生活困迫的境况下,教职工薪俸还一律七折。全校师生不得不节衣缩食,共度时艰。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西北联大师生仍然师敬业,生勤奋,朝夕弦歌,呈现出一片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正如时任校常委胡庶华 1939 年 3 月 27 日在全校纪念周大会讲话所说:“物质方面我们诚然不如敌人的地方,我们却应把我们的精神发扬起来”,“我们西北联大,处在城固这个偏僻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都享受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这种精神不但鼓舞着西北联大师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坚持比较正常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为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华文明火炬绵延不断,贡献力量,而且还因时因地制宜,作出了显著业绩,所创造的办学经验与精神,对后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在办学思想上,突显时代特色,主动适应抗战需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抗战救国已成为当时国人的头等大事,也是西北联大师生的第一要务。联大在教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入学选系、上课考试等方面,不可能有大的创新,基本沿袭了战前三校的归制。但在办学思想与实践,却主动适应抗战需要,突显时代特色,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8 年 5 月 2 日,联大校常委、原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在联大开学典礼上就明确指出,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学校当局不但将抗战救国思想融入教学、科研各项活动之中,而且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比如,1938 年 9 月 8 日,全校组织了 734 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10 月,全校开展了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背心活动;1939 年 1 月,学校成立了“国立西北联大抗敌后援会”,该会在全校广泛开展了各种献金、捐款、节约、捐助前方将士寒衣,慰劳前方将士家属,认购救国国债,扩大兵役宣传,协助地方训练壮丁等活动;同时开展了防空防毒讲习和向陕南民众普及防空防毒知识;4 月 6 日,全校 1 400 余名师生,为纪念“民族扫墓节”,集体徒步汉中博望侯张骞墓,进行祭扫活动。由校方组织的这些临战军训、支前活动,对振兴联大师生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共西北联大地下党领导与支持下,学校还先后建立了一批诸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文艺学习社等进步社会团体,特别是民先队。他们组织会员研修《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等马、列、毛著作;开展文艺演出,办壁报、高唱《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流行歌曲,宣传抗战理论,动员广大民众;举办“抗战建国”纪念会、座谈会,动员组织民众参与抗日救国活动;通过游行集会,反对国民党当局解聘进步教授,营救被捕进步学生;通过大型签名活动,通电全国,声讨大汉奸汪精卫。民先队还组织部分骨干力量分赴山西、河南前线参加战地工作;选拔部分队员背负行装,北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推动青年学生革命运动发展。

(二)在教学、人才培养方面,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特色,注重为抗日救国和地方培养适用人才

西北联大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众多学科专业,在办学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大多数教师都守职尽责,克服困难,认真备课,精心讲授。不少教师每晚在豆油灯下工作至深夜。在教学实践中,尽力根据陕南地区条件,科学安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工科采矿系结合教学,对安康行政区砂金矿与勉县煤矿进行了考察;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对城固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历史学会对勉县的历史、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等进行了考察。特别是法商学院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进步教授,在授课中主动调整教学内容,联系社会现实,引导学生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人才。著名史学家许寿裳教授,上课多讲授他的师友章太炎、鲁迅等著作,大胆揭露国家腐败、社会黑暗问题,在军

训中,他还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爱国情怀;章友江教授的《比较宪法》课,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实现民主以及民族团结诸问题,指导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全面抗战的必要性、重要性;沈志远教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课,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为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武器,分析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述抗日救国是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彭迪先教授的《经济学史》与《世界经济史》,刘及辰教授的《唯物辩证法》,季陶达教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曹靖华教授的《进步文艺理论》,韩幽桐先生的《国际法》《苏联政治》等课程,都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针对现实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妥协投降等重大现实问题,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启迪和教育学生,走追求科学真理的革命道路。

西北联大还坚持了“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的原则,举办了一系列社会教育与服务活动,比如,文理学院主办了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防空防毒讲习班、科学常识讲习班;法商学院举办了法律常识讲习班、地方自治讲习班、商业知识讲习班;师范学院举办了小学教师讲习会、民众学校、体育训练班等。

西北联大这种结合实际开展教学,启迪学生联系社会实际独立思考,并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增强社会服务意识,提升社会实践能力,而且为地方和民族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材。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 70 多年前,西北联大能有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教授,不畏强权,不怕被捕迫害,坚持向学生传授科学信仰与理想。

(三)在科学研究方面,突出地域特色,积极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在战火纷飞的严酷条件下,要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是难以实现的。然而,西北联大教师仍然坚持因时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科研活动。他们在坚持编写教材,满足教学需要的同时,还潜心研究,并取得了一批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文系黎锦熙教授开展地方志研究,特别是在城固新修县志方面,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法商学院尹文敬教授发表的《改良税制与调整地方财政》论文,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关注;历史系陆懋德教授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许兴凯教授发表了《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和《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及吾人应有之认识》,著有《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谢似颜教授发表了《民族主义与道德》;黄文弼教授发表了《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周国亭教授发表了《勉县考古纪实》;地质系完成了《勘察安康行政区砂金矿简要报告》;历史系完成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地理系复刊了《地理教学》杂志,刊发了黄国璋、湛亚达等教授教学研究与学术论文十余篇。西北联大教师在短暂时限内,能完成这么多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大学以研究学术,追求真理为天职的精神。

总之,根植于京津膏壤,源自京津三校一院的国立西北联大,发扬和传承了平津高校爱国荣校、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为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生与发展,贡献出了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和众多的学科、专业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昔日的西北联大,就没有今天陕西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西北联大及其前身的办学经验、传统与精神,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西北联大与陕西乃至西北一些高等院校这种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早已在相关高校史册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今日西北大学沿用联大校训“公诚勤朴”,西北工大与西北农林科大分别以“公诚勇毅”与“诚朴勇毅”为校训,亦绝非偶然。

参考文献:

- [1] 赵弘毅,程玲华.西北大学大事记(1901—2002)(修订版)[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2] 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上卷·修订本)[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3] 陈汤臣, 王忠民, 王栓才.中国大学校长名典: 上、中、下卷[M].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
- [4] 赵弘毅.试论西北大学办学传统与精神[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6(1).
- [5] 黄展鹏.中国著名大学概览[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 [6] 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M]//西北大学旅台校友会.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1969.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Shaanxi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ZHAO Hongyi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odern Shaanxi has two sources, Shaanxi and Beijing. When the source of Shaanxi were about to stop, the Beijing source started and became the rebirth of the Shaanxi higher education.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marks the pillar ston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founding of the five campuses help to keep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Shaanxi and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Key words:Northwest National University; northwest higher education; Shaanxi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西北联大与汉中

陈海儒，李巧宁

(陕西理工学院 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1938-1946年，西北联大在汉中九年，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改变汉中的闭塞与落后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其间既有对汉中地方文化的整理，对矿产、地质及水利资源的调查，又有对风俗的化育、对民众的教育、对文体活动的普及，以及对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对实用工艺与技术的改进。这些工作，无论是长远的规划，还是具体的操作，都对汉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西北联大 汉中 风俗 社会教育 地方文化 文体卫生 经济规划

1938年4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在陕南汉中成立；时隔不久，西北联大分立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除了国立西北农学院迅速搬离汉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到1944年全迁兰州外，其余三校均一直在汉中办学，直到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夏天迁离。人们习惯上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从中分立出来后依然在汉中办学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统称为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在汉中办学达九年之久，巍巍秦巴、依依汉水滋养了西北联大，西北联大也以它的“勤朴公诚”给汉中增添了发展的活力。本文拟以档案、西北联大校刊、相关人士的回忆与访谈等为基础，梳理西北联大对汉中的影响，展现内迁高校对迁入地文化悄无声息的改造。

一、化育风俗

汉中盆地位于秦岭、巴山之间，交通闭塞，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汉中人的平静、温和、安于现状、乐天知命的性格。抗战初期，西北联大的到来，渐渐打破了汉中千百年不变的宁静。它带来了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学子，带来了一批批满肚子学问的“先生”，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汉中的风俗，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正如1941年的一份报告所称：“街市自抗战后亦日渐繁华，交通亦发展……其社会情形亦日有变更”^①。

这种“变更”，和西北联大师生有意识的努力是有关系的。西北联大来汉中之初，校方就提醒师生：在言行方面一定要做民众的表率。比如，在1938年的一次纪念周大会上，西北联大校常委李蒸就讲：“本校同学皆为大学学生，对于一切言语行动，自当堪为一般人表率。日前本地士绅及县政府宴请本校教授，曾希望本校领导地方提高文化，吾人尤宜特加注意。例如购置各项用品，言语务须和蔼，如商人故意高抬物价，尽可报告县政府，加以制裁，不可直接办理，致起冲突。又如在汉江游泳，务宜穿着游泳衣服，藉重观瞻。总之一切举动，均宜自行检点，以期为民众之表率”^②。

在校方的督率与严格要求之下，联大师生以现代文明慢慢化育汉中古老的风俗与观念。

对汉中风气最直接的影响是着装。汉中本地的群众多穿土布衣裤，自织、自染、自己缝

^① 编者.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年8月24日)[R].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41年至1942年),西安出版社长安印刷厂,1993:70.

^② 李蒸.李蒸在西北联大1938年5月23日纪念周上的讲话[J].西北联大校刊,1938(1):11-12.

制，几乎不使用化妆品。随着西北联大的迁入，城固县城开始涌起一股大都市风情：平津人士所开的化妆品店、照相馆、成衣店铺日益增多，许多本地人不曾见过的商品渐渐摆上了铺面，人们的着装、语言、举止大有海纳百川的千姿百态，城固一时有“小北京”^①之称。尤其是夏季，西北联大女生的短裤装成了街上一道亮眼的风光：它既衬出了年轻人简洁明快的青春活力，又凉快、清爽。一年四季穿长裤的当地女子引以为新奇，大胆一点的开始模仿。尽管家长们百般反对，但女性爱美的天性总是打压不住的，家长们渐渐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短裤也就在当地女子中流行开了。^②

最让汉中人大开眼界的，是女生穿着“暴露的”泳衣在汉江游泳。汉江是西北联大师生一年四季的好去处：沿着河岸散步、聊天，坐在江边看景、读书……静谧、辽阔、乐趣无穷。尤其到了夏天的午后，汉江成了师生们的天然游泳池：“男男女女，整天生活在水里，从崖上望下去，男女们红白相间，黑头不时钻出，嘻笑喧哗，红的像荷花，白的像肥鱼，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和力的感觉。”^③不过这只是联大人的自我感觉。在当地人眼里，女生如此暴露地跳进汉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深恐这会冒犯“汉水明王”。可是，学生们哪里管得了当地人心里的这一点“小疙瘩”，她们照游不误，嬉水、乘凉，直到当地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西北联大师生们的汉江之泳，还让当地百姓感受了勤洗澡的妙处。西北联大师生们带给汉中人的一个最普遍的习惯是勤洗澡。千百年来，汉中百姓为疥疮所扰：它虽死不了人，但在当地流传很广，不易医治，患者身体奇痒难忍，百姓有“神仙难倒汉中疥”的俗话。西北联大师生在汉中，靠着勤洗澡、勤换衣，很快就征服了汉中疥。这让当地百姓大开眼界：难倒神仙的皮肤病竟然难不倒联大的师生！于是，百姓们“也洗澡了，过了一两年汉中疥也就没有了”^④。

二、社会教育

西北联大把提高学校周围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大力推行社会教育。

1938年，西北联大第33次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由李蒸及各学院院长、秘书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为委员，李蒸为召集人。1938年9月15日，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对各个学院具体应承担的社会教育项目做了规定（见下表）。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 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⑤

学 院	内 容	备 注
文理学院	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防空防毒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月
	科学常识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调查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	会商两县县政府计划进行
法商学院	法律常识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地方自治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① 陈海儒，李巧宁.在城固县采访知情人陈孟林的采访记录[Z].2010-10-01.

^② 陈海儒，李巧宁.在城固县采访西北大学法商学院 1943 级学生李继宗的采访记录[Z].2011-01-19.

^③ 卢苇.自城固迁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N].青年日报，1946-07-04.

^④ 鲁颖.在西安采访鲁世忠的采访记录[Z].2002-07-31.

^⑤ 编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J].西北联大校刊，1938（2）：14.

	商业补习班	期限三个月
师范学院	小学教员讲习会	暑期举办, 期限一个月
	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	
	民众学校	指导学生办理
	体育训练班	期限三个月
	民众业余运动会	春季举办一次
	家事讲习班	期限三个月
医学院	救护训练班	期限一个月

随后,各个学院根据自己的计划陆续展开社会教育工作。如,文理学院的防空防毒讲习班 1939 年 2 月开课,招收学生 60 余名(其中 40 余名为城固县政府选送的保甲长、保安队及警察,余下的 20 余名为直接报名参加者),使社会人士初步掌握了防空防毒的基础知识,对于民众救护很有好处。^①师范学院的家事讲习班于 1939 年 4 月 17 日开课,由家政系学生讲授,设有衣服学、食物学、育儿法、家庭布置及管理、家庭卫生及看护、手工等相关内容,每日下午四至六时上课,第一期报名听讲者共六十余人。^②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在城固、洋县、西乡、南郑、褒城、勉县等六县分办,对于增进小学教师教学知识、技能、组织及训练民众的能力、抗战意识等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③。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于 1939 年 2 月 6 日在文理学院第十三教室开课,先对 26 名参与讲习班的员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作为对民众进行训练的师资。^④

此外,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还设立了自然科学讲习班,由文理学院物理、化学、生物三系高年级学生在系主任的共同负责下办理,共招收学员 80 余名(其中有女生 26 名),于 1939 年 2 月 6 日在文理学院开课,主要为民众普及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⑤

1941 年 9 月 21 日(农历八月初一)发生日蚀,据城固县志记载,“全日蚀,午刻晦,明星丽天,飞鸟栖树”。群众对于这样奇特的天相不知所以,西北联大师生一边给民众讲解有关日蚀的知识,一面指导有条件的当地人用烟将玻璃熏黑后去观察。当地农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发生日蚀的那一天,西北工学院的师生们在各个山头观察的情形。^⑥

在以开设讲习班的方式集中进行社会教育的同时,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还开设了“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制订了《本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办事细则》^⑦,用通讯的方法指导现任小学教员的进修工作。

西北联大的社会教育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北师范学院 1941 年 1 月 19 日在城固近郊的郃留乡成立了社会教育实验区,时称“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当时,西北师范学院组织了 80 多个学生进入郃留乡,集中开展了为期四周的社会教育,主要内容有宣传兵役法、帮助农民丰收、讲授卫生常识及进行其它各种社会服务等。这次活动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广泛认同。比如,一位老农说:“(李蒸)院长说的是北京话,清楚得很,他说,以后三郎庙有大学的人来往,告诉我们种田的方法,谷子可以多收,好比我们收一石,用他们的方法可以收两石。”当地百姓还给西北师范学院送来“社教民爱”的锦旗,以示感谢。^⑧

^① 编者.本校社教推委会成立防空防毒讲习班概况[J].西北联大校刊,1939(11):15-16.

^② 编者.家事讲习班开课[J].西北联大校刊,1939(15):15.

^③ 编者.陕南六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简章[J].西北联大校刊,1938(2):14-15.

^④ 编者.本大学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国语注音符号讲习班概况[J].西北联大校刊,1939(11):12-15.

^⑤ 编者.本校社教推委会成立自然科学讲习班概况[J].西北联大校刊,1939(11):17.

^⑥ 陈海儒,李巧宁.在城固县古路坝采访当地居民夏金仲的采访记录[Z].2010-07-21.

^⑦ 编者.本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办事细则[J].西北联大校刊,1939(13):16-17.

^⑧ 李溪桥.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逝世 20 周年[A].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1-32.

西北联大的社会教育之所以搞得如火如荼，一是校方非常重视，有专门的推进机构，二是在教师的带动与指导下，许多学生尤其是教育专业的学生对当地民情做了大量扎实的调查和了解，为社会教育扎根民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西北师范学院学生高振业（毕业后即留校工作）的《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①一文，张述祖的《汉南民众日常思想之分析》，经昌荣、张万璞的《城固儿童之情绪研究》，张翠珍的《抗战期中南郑中等学校之训育》，邓运甫的《抗战时期南郑之中等教育》，晏显世的《抗战期间城固之强迫教育》等。^②

三、整理地方文化

西北联大建立于全民抗战这一大背景下，它把挖掘汉中地方文化、编纂抗战史料、续修方志作为自己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

刘季洪任校长之后，特别注意加强西北联大对地方文化的建设。他“常与各院系研商，除特别加强课业讲授及考核外，并在可能范围内，因地制宜，注意西北地区各种资料进行研究工作”，“如中文系研究西北各地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收集西北地区各省史料及古物，教育系则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入学考卷加以分析，作为改进国、英、算三科教材教法的改进。又生物系作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作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作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③西北联大为地方文化建设所做的种种工作，使她赢得了汉中“文化保姆”的美誉，西北联大学院集中的城固县也被称为“西北的文化城”^④、“西北文化的摇篮”^⑤。

汉中有许多重要的两汉三国时期的遗迹，但有关这些遗迹的记载大多比较粗略，详细内容多不清楚。西北联大师生以廓清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面目为己任。西北联大在汉中成立不久，历史系即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制订了《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目的是“表彰民族英雄张骞墓间古物，并为历史学系学生实地考古”，初步计划为清理张骞墓前两个石兽并制作石座安放原处^⑥。经过考察，考古委员会于1938年7月12日认定：“石刻全部，虽尚未见，但由己见部分之作风观之，似为汉物无疑。”^⑦

联大教授黄文弼还根据史书记载，写出了《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⑧，将张骞通西域的路线详细地进行了考证，为后世认识张骞、研究张骞提供了直观的材料。

此外，西北联大还多次组织师生对三国遗址做了考察。如，1939年3月19日至21日，西北联大历史学会组织师生赴勉县、褒河一带考察了武侯祠、武侯墓、读书台、阳平关、马超墓、定军山、褒城石门等地，通过对相关文物的分析，考证清楚武侯祠、武侯墓确为汉代建筑遗址。^⑨历史系陆懋德教授还对汉中境内各县的诸葛亮遗迹加以考证，并作了文字梳理，以利师生前往瞻仰^⑩。

西北联大也将编修地方志作为服务地方的重要途径。联大教授黎锦熙认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通过修县志，“则一县之耆宿，四乡之秀民，在任之职官，各界之领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帜既树，县誉攸关，组织易精，牵涉至广，然后调查无碍，宣传可资”¹¹。于是，西北联大迁城固不久，黎锦熙

^①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J].西北联大校刊, 1939(11): 29-39, 1939(13): 42-50.

^② 编者.教育系二十六年度论文研究概况[J].西北联大校刊, 1939(8): 41.

^③ 刘季洪.教育生涯漫谈[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69.

^④ 仰山.国立西北大学[J].陇铎月刊, 1940(10).

^⑤ 卢苇.自城固迁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N].青年日报, 1946-06-30.

^⑥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委员会.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J].西北联大校刊, 1938(1): 32.

^⑦ 何士骥, 周国亭.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J].西北联大校刊, 1938(1): 32-37.

^⑧ 黄文弼.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J].西北联大校刊, 1939(14): 15-16.

^⑨ 杨其超.本大学历史学会沔县考察记[J].西北联大校刊, 1939(18): 33-35.

^⑩ 陆懋德.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J].西北联大校刊, 1938(6): 1-6, 1938(7): 2-6.

¹¹ 黎锦熙.方志今议序[A].黎锦熙, 甘鹏云.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 1984: 13-18.

就积极联系城固地方人士，商讨续修地方志。在西北联大校方和城固县长余正东的支持下，“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迅速成立，“续修工作方案”也得以起草，且罗致了黄国璋、何士骥、殷祖英、张通骏、刘慎谔、胡庶华、谌亚达等联大知名学者参与其中，在对城固民风民情、物产资源等进行广泛调查、访问地方耆宿的基础上，着手方志续修工作，且以所了解的内容作为向群众进行乡土教育的重要素材。

西北联大还响应政府号召，开展了“抗战史料纂集”工作，成立了以李季谷、许寿裳、陆懋德、许重远、谢兆熊、胡鸣盛、何士骥、吴世昌、唐祖培、周国亭、何竹淇等先生组成的纂集指导委员，制订了《抗战史料纂集大纲》^①，拟“对于敌人在我国摧毁文化、屠杀民众的、奸淫妇女的实况，以及不顾正义违犯国际公法引起国际反对之情形，全部加以搜集，使国人认识真相，巩固民族之自信力量”。

四、普及文体卫生

西北联大的到来，给汉中这座古老的山城带来了体育锻炼的风尚，无论是偏远的古路坝、汉江畔的城固县城，还是汉中郊区的黄家坡，大大小小的平地上总是闪动着参加运动的身影。运动场地有限、运动器材简陋，这些都难不倒西北联大的师生。1938年度第一学期西北联大还组织了校内各学院、各学系组队参加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组织了小足球赛、竞走比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群体性比赛，将体育运动的理念带到了汉中。^②

垒球运动就是此时传入汉中的。西北联大来汉中之初，联大教师董守义拿着垒球样品找到当地的鞋匠张文林，请他缝制了一批垒球；师生们再自己动手，用当地的青冈木削制成垒球棒，用玉米秆编制成垒垫；没有手套，就赤手空拳进行传接球训练。在西北联大的操场上，垒球渐渐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场垒球比赛宛如当地的一大盛事，附近的百姓会成群结队来观战、助兴。

在西北联大师生的带动下，联大校区附近的中学、小学渐渐地开设了垒球课，垒球运动在师生中迅速普及起来。城固县城附近的文治、博望等中学和小学，竟把垒球列为“必修课”。

西北联大在汉中普及垒球运动，对提高汉中的垒球水平大有裨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汉中的垒球运动水平一直居于西北地区前列，在多次比赛中获得很好的成绩。

西北联大学生的演剧社团，不仅是学生们切磋演剧技艺的组织，丰富了学子们的生活，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学生剧团经常在校园附近的村庄巡回演出秦腔、京剧，吸引老百姓前来观看，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百姓的文化生活。更何况，学生剧团在演出前后，会给百姓们讲一点通俗的戏剧知识，帮助百姓提高演剧欣赏水平。

久而久之，百姓们也能唱几句曲、哼几段词，讲一讲剧情，聊一聊演员们的小花絮，茶余饭后的生活多了谈资，添了趣味。正如有人所说：经过多年的熏陶，“抗战八年中，城固的人们，戏剧水准提高了，随便一个老头，一个孩子，都具备一些为普通人所不及的戏剧常识。”^③

此外，西北联大还为改善地方环境与公共卫生做出了一些努力。

随着内迁高校在汉中生根发芽，学校周围迅速兴起一些集市。尤其是在山高路远的古路坝和向无集市的七星寺，师生的到来刺激当地的物资交流，兴起了买卖兴隆的“百日集市”^④。这些集市既是师生们购物的场所，又是他们与外界沟通、交流之地。但是，各个商户各自为政，毫无规划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搭起帐篷和房子，垃圾私堆乱放，无人管理，整个商业区域，成为污秽之地、混乱之所，不仅影响西北联大的环境，也影响当地的交通。地方人士为之着

^① 编者.抗战史料纂集大纲[J].西北联大校刊,1938(1):37-40.

^② 编者.二十七年度第一学期校内各项竞赛结果[J].西北联大校刊,1939(14):8-11.

^③ 卢苇.自城固迁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N].青年日报,1946-07-04.

^④ 城固县政府公函政字第3号[Z].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工学院档案,案卷号:61-1-276.

急、慨叹，却少有解决之良方。为此，西北工学院首先与它所在的古路坝地方政府协商，成立了“古路坝市政管理委员会”，监督、指导商户统一规划建筑，打扫卫生，规范经营，不仅整顿了校园周边的环境，而且为地方的市场管理提供了一种典范。^①其他校区也纷纷模仿，优化了校园周围的市场环境。

在改善汉中公共卫生方面，西北医学院凭借自己的专业优势开展了相应的活动。西北医学院成立之后，除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开展多种有效的方法给当地民众普及医疗和卫生知识，比如“办理妇婴卫生讲习所”，“并于春假期间将学生编为数队在今汉中市新民、灵泉二乡作卫生宣传，施种牛痘，并作死亡出生调查统计及陕南地方病调查，以为改良地方卫生之准备”^②。

五、推进地方经济

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西北工学院于1938年9月成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学术推广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程学术推广部的宗旨有七：第一，办理各种技术训练班；第二，倡导协助各种有关经济建设事宜；第三，协助各机关办理地方建设事宜；第四，协助西北各地改进原有手工业；第五，承办公私机关团体工业咨询及受人委托计划实施或经营事宜；第六，办理技术人才职业介绍事宜；第七，其他有关工业之实地调查统计事宜^③。工程学术推广部主任为李书田。按照具体职能，推广部下设六个部：推进西北区工业职业教育部、土木水利及军事工程部、地质矿冶部、机械工程部、化学工程部、纺织工业部。

推进西北区工业职业教育部旨在协助陕甘宁青四省推进工业职业教育的实施。

土木水利及军事工程部的工作主要包括：水利及军事工程教授周宗莲主持的西京飞机场扩充计划及施工、陕西省咸榆公路之监修、陕西省汉白公路图案之整理；水利工程教授刘德润主持的陕西省商洛公路之踏勘及初步计划、陕西省渭水河灌溉区测量及扩充改进计划；测量学教授赵玉振主持的陕西省南郑市区测量及市政工程计划等。

地质矿冶部主持的工作主要有：冶金工程教授魏寿崐、地质学教授张通骏（即张伯声）、采矿工程教授雷祚雯主持的陕西省安康行政区砂金矿之调查及试探；雷祚雯主持的陕西省石泉县长岭岗砂金矿探采计划、川陕黎坪垦区矿产调查；魏寿崐、张通骏主持的陕西省凤县黄牛铺铁矿及甘肃省两当县亮池寺煤矿调查。

机械工程部承担的工作是由设计及热力工程教授李西山主持陕西省城固县军运手推车改良计划。

化学工程部具体工作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制革及油脂工业教授李仙舟主持的陕西省城固县平民工厂蜡烛改良办法，其二是化学工程系主任萧连波主持的陕西省城固县油脂工业合作社设厂计划及营业状况。

纺织工业部负责的项目为：纺织工程教授崔玉田主持的改进西北土产纺织品意见书、设置陕南模范土布工厂计划、改良毛巾织机设计。^④

“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学术推广部”的各项工作展开后，一方面推进了地方地质、矿产、水利等资源的调查，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一方面对香皂、肥皂、蜡烛、制糖工艺、油印腊纸等制造工艺的改进和对手推车、传统淘金工具等的改良，为汉中经济技术的改进和物资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 通知开古路坝市政管理委员会筹备会议希届时出席由（1939年9月7日）[Z].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工学院档案，案卷号：61-2-96.1.

^② 编者.国立西北医学院工作近况[J].图书季刊，1940（2）：266.

^③ 西北工学院关于呈报工程学术推广部规程请备案由（1938年9月7日）[Z].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工学院档案，案卷号：61-2-29.1.

^④ 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学术推广部工作汇报（民国二十七年份）[Z].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工学院档案，案卷号：61-2-29.1.

六、结语

西北联大为汉中基础教育所做的贡献也值得一提。一方面，九年中，西北联大学生在汉中各地广泛兼课，充实了地方师资；另一方面，西北联大校方或师生个人在汉中举办中学、小学，如西北联大附中、西北师大附中、私立城固博望中学、北平私立五三中学、私立北平文治中学等，直接为提高当地的基础教育添砖加瓦。

总而言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学校在汉中期间，发挥科研优势，在改良汉中风俗、开展社会教育、整理地方文化、普及文体活动、推动地方经济方面既做了长远的规划与调查，又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中作为传统山城的封闭面貌，也为中国抗战积蓄了力量，利国利民。正如1946年西北大学从城固复员北归西安，临行前中国文学系主任高明教授代表西北大学撰写的《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碑文所称：“搜奇考古，则西北文物灿然备陈；格物致知，则陕南花木纷焉入览。于是村童野叟，扩其见闻，田夫蚕妇，益中神智。蚩蚩群氓，乃睹冠冕之盛，济济多士，益见宫墙之美。”^①西北联大的师生们深刻地践行了校常委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的理论^②，圆满地完成了城固县政府“希望贵校同人将教育竭力灌输，提高一般民众的教育程度”的嘱托。^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北联大在汉中仅有九年时间，囿于物质条件的简陋还有许多服务于地方的项目尚未深入开展，或虽展开却没有完成，就因学校迁离汉中而中止，对汉中的积极影响因而受到抑制。

^① 高明.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A].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366.

^② 编者.胡庶华在西北联大城固本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西北联大校刊,1938(1):10.

^③ 编者.张党务督导员在西北联大城固本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J].西北联大校刊,1938(1):9.

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

赵万峰*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西北联大是抗战时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两朵奇葩之一,它应全民抗战的现实需要,积极踊跃的宣扬抗战爱国思想,积极灌输师生以军事思想,积极培养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并组织师生积极投身于支持抗战的宣传、发动民众、军事技能培养、战时资源准备、精神鼓动等方面实际行动中去。同时,它在师生的学术研究与学养提高的领域迸发出了比以往更大的热情,作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它所体现出的完整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是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典型代表。

关键词:西北联大 战时教育思想 实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历过一段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为配合军事战线的斗争,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在高等教育的本来职能之外,爱国教育、军事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等内容与实践也成为了当时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这些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可以称之为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两朵奇葩之一的西北联大^①,辗转流徙于西安、陕南及西北地区,在极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保存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撒布西北高等教育火种的重任,她在另一条战线上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其穷心穷力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谨严于科研教学,愈挫愈奋、奋发自强的精神尤其值得表彰。在抗战时坚持兴办的《西安临时大学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等文献集中记录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西北联大的抗战爱国教育思想及实践

爱国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抗战以来,民族爱国主义宣传及实践活动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西北联大的抗战爱国教育思想及实践也属于其中的组成部分。但它带有普通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学校直接组织抗战爱国思想的传达与宣传;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教师们对学生进行抗战爱国演讲与教育;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以抗战爱国为主题的活动。

学校直接组织抗战爱国思想的传达与宣传。《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是学校进行抗战爱国思想宣传的主要载体,校刊上的宣传主要有这么几类:一是及时发布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训令、制度、要求等。《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共出30期,每期上面(《军训专号》除外)头版及靠前均是发布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训令、制度等的位置,规定了有关对全体国民、高校师生抗战爱国的具体要求等。《西北联大校刊》第十期“特载”了蒋介石“严斥近卫声明”的文章,对日本所宣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东亚新秩

*作者简介:赵万峰(1970—),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及高等教育思想。

^①西北联大组建于1937年9月,始称西安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后迁至陕南汉中一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发展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等五所子体高校,西北联大子体各校延续了西北联大的战时大学联合管理体制和办学精神,至1946年底西北联大部分子体高校“复原”平津冀。本文所谓的西北联大,即指从1937年9月至1946年底的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分中有合的办学时期。

序”“东亚协同体”等进行了揭露驳斥，指出日本侵华的真正目的“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绝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意在使师生明了时局、统一认识，鼓舞士气、团结一心，继续抗战救国^①。《西安临大校刊》在《发刊词》中这样描述中华民族所处之环境及民族抗敌之决心：“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今日吾国抗日战争不竟至此，大多数同事同学之故乡父老，已被芟夷戕刈一空，试问此时此日，成何现象？岂非吾辈最高学府中人所当泣血椎心，锻炼磨厉，以与暴敌相周旋者耶？”^②这正是当时每位西北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二是学校邀请军政长官，或者学校领导等对师生进行抗战爱国的教育演讲宣传。从《西北联大校刊》第六期以后可以看到，学校每周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讲演是核心内容。而对于演讲内容，学校有明确要求：“学术讲演在此非常时期，其讲演内容应注重：（1）国防科学、文学艺术，（2）战事有关之国际问题，（3）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形，（4）非常时期教育，（5）西洋文化及历史、地理、资源各问题，（6）青年学生之修养问题。其他与抗战有关之重要问题亦可随时加入”^③，即演讲内容应该契合抗战时期之社会现实与民众需要。利用演讲、报告等形式，学校请了许多军政人士或者学校领导对师生宣讲抗战爱国的思想。常委胡庶华是第一次总理纪念周演讲的嘉宾，他讲了抗战的国内国际形势，希望师生“彻底实施军事管理，养成守纪律耐劳苦的抗战生活，不要错过读书机会”；教务主任张貽惠在演讲中提到了学生如何参加抗战工作的问题，他认为战时教育还是应该将有关抗战教育内容提到整个教育的首要位置，他说：“在抗战中，一切思想行动，均应以抗战为目标；应如何树立全民抗战的必胜信念，使前方士气旺盛，都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当然，他所说的以抗战为目标也并不就是要师生们全部直接上前线，而是要发挥高校辅助抗战的功能，“树立全民抗战的必胜信念”，并“使前方士气旺盛”。类似的观点许兴凯先生在第六次总理纪念周演讲中也提到了，他希望全校师生能意识到我们民族的优点与缺点，从自己做起，发扬优点，改正和补足缺憾。他说：“武器改良，是研究科学同学的职责”，“至于训练民众，改良过去民众教育的错误，更是我们大学生的专责”^④。学校还请了当时城固县长鞠海峰为师生就陕南的情况进行了通报，重点讲了县域在国家抗战大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主题，为师生了解地方政治，抗战思路等有了清晰的认识^⑤。

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教师们对学生进行抗战爱国演讲与教育。导师会杨立奎教授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第十次纪念周”演讲活动中，要求全体师生都要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参与抗敌后援工作，他对全体师生提出了四点希望：“希望全体教职员和同事贡献意见”；“希望全体同学，协同努力去作（做），不要只靠支会职员”；“藉抗敌后援的工作，联络同学的感情，巩固校内的团结”；“藉后援工作，提高当地文化水平”^⑥。在 1938 年学校举行的军事集训活动中，教授李季谷、许寿裳等通过在军训过程中给师生们讲历史故事所作的演讲，在西北联大抗战爱国宣传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李季谷演讲的题目叫《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其中讲了四个历史故事。他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为复国大业忍辱负重，精心计划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他知其此去必不得返而义无反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祖逖枕戈待旦、击楫中流，以光复中原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死如归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些精神都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他以此勉励全体师主要学习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爱国奉献，恪尽职守，时刻准备报效国家^⑦。许寿裳在《勾践的精神》的演讲中说，“越

^① 《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西北联大校刊》第十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② 《发刊词》，《西安临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③ 《本校学术讲演办法》，《西安临大校刊》第三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三日出版。

^④ 《西北联大校刊》第九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⑤ 见《西北联大校刊》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

^⑥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⑦ 《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二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王勾践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报仇雪耻的好英雄，也是一位抗战建国的好模范。”学习勾践，就要学习他四个方面的优点：“第一，有信心”；“第二，有整个的计划”；“第三，苦硬干”，“第四，能持久战”。他还将勾践的精神直接引导目前的抗战现实中来，说：“勾践故事，报仇雪耻，复兴国家，终于成功，宛然是我们这次抵抗暴日的神圣战争的豫（预）兆……只要我们能学着勾践的精神有自信，有计划，刻苦耐劳，长期抗战，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①。历史系教师在抗战正式开始后不久的1938年8月，出于“使国人认识真相，巩固民众之自信力量”的目的，着手组织编写“抗战史料”^②。教师的宣传不仅仅停留在演讲中，实际上许多内容已经被悄悄渗透进学生的学业教育之中。教育系民国廿六年度的学生论文登载在《西北联大校刊》第八期上的目录有15篇，15篇中共有7篇显示直接与抗战相关，这种现象在西北联大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很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北联大因时施教的教育理念，同时也体现了西北联大师生对于抗战爱国的迫切心情，也充分说明忧国忧民、关心国难的教育理念在西北联大时期已经深入人心。

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以抗战爱国为主题的活动也是很好的宣传形式。在全校上下热烈的抗敌爱国氛围之中，师生们也自发组织了很多的抗敌爱国的机构与活动。师生们在学习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情况下，积极声援前方抗战一线，他们经常举行捐献现金、衣被等活动，在校刊每一期上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简讯、新闻等，甚至为了调动师生捐献的热情，在《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五期上出现了这样一则简讯——“本校同学节约献金竞赛”——学生们采用竞赛的方式进行募捐活动，活动还得到了积极响应，“诸同学莫不慷慨解囊。其献金总数，约在千元以上。”^③抗敌后援会是师生们于1939年1月份自发成立的一个组织，其拟定的工作内容包括：“（1）参加民众训练，（2）慰劳出征军人的家属，（3）扩大兵役宣传，（4）募集鞋袜运动，（5）义卖献金等。”^④随后，该会多次修订了《简章》，调整充实了机构，在领导校内师生参与抗敌爱国活动、对外进行相关宣传和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⑤。家政系“师生鉴于我前方抗战将士需鞋袜，特将平日烹饪，缝纫实习成绩全部献出义卖，而以所得卖价制备鞋袜，捐赠前方将士，冀补抗战力量于万一”^⑥。作为高校支援抗战的一个选择，节约资源是师生们能够立竿见影做到的行为。学校制订了《节约办法》，其中要求师生“停止宴请”，“新制衣必须用国货材料”，“积极提倡储金”，“纸张均用国产，学校内部通知均用便条”等^⑦。

二、西北联大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

开设军事课程，加大军体教育分量。围绕抗战救国需要而开设相关课程，这是当时西北联大师生普遍认同的一种意见。陆泳宽先生虽然对通过大学教育来直接救国不抱很大希望，但是对于在高校开设一些有助于救国的课程并不反对，他说：“国难时期之大学，除基本课程外，自应注重实用，而任何课程皆须集中思想于救国的研究。如能以各大学为中心，而放映此种活动于所在区域之各地，则吾国有救矣”^⑧。战时军事知识与技能训练也成为西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学校制定有详细的课程实施方案，并一直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修订过的《本校特殊训练技术训练队修订课程实施方案》显示，特殊训练技术主要分为五种科目：（1）军事测绘；（2）军事工程；（3）军事机械；（4）军事电讯；（5）军事化学^⑨。每

^① 《勾践的精神》，《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二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② 《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③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④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⑤ 参见《西北联大校刊》第十期、第十一期等相关报道。

^⑥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⑦ 《西北联大校刊》第二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⑧ 陆泳宽：《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西安临大校刊》第八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出版。

^⑨ 《西安临大校刊》第五期第5页，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种训练技能都有设定的具体课时、教学目的、具体负责教员、报习学生类别及人数等，这说明当时西北联大的战时军事知识与技能教育工作已经做得非常扎实、非常深入细致。西安临时大学从西安迁徙陕南的活动，被学校看成了一次绝佳的军事行军训练。学校制定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成立了专门的行军领导组织机构负责本次行军军训工作。军训已经成为学生日常的必修课程，学校师生对于军训工作相当重视，训练成效不佳，学生竟然联名提出申请，学校批准延长军训，学校甚至还将军训当做假期作业布置给学生去完成，这样的认真严谨，令人佩服。“惟该队学生，学然后知不足，颇感二月来所得军事学识与术科训练尚差，倘令充任军队中下级干部，深虑不胜。特由全体队员联名请求学校当局延长训练期满，改良实施办法”^①。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军事技能，“矫正过去文人的孱弱积习”，“培植抵抗侵略的能力”，学校于1938年的暑假举行了全校性的军事集训，从学刊第十二期《集训专号》的内容来看，集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②。

军事兴趣小组活动活跃，学习战争技能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根据师生需要，以高年级学生为主，成立了“自然科学讲习班”，主要讲述一些战争常识，如“飞机之原理及简单构造”、“枪炮概述”、“罗盘针，及北斗星之观察”、“食物保存法”、“水之清洁及消毒法”、“健康与疾病”、“传染病之预防”等等，内容非常庞杂丰富。农业化学系同学组织战时食品问题研究会。其他相关的军事兴趣小组也积极开展活动，这都进一步激发了师生学习军事知识技能的兴趣与热情。

军事教育增加了师生抗战的信心与热情，一批师生直接走上了抗战的最前线。常委李蒸在1939年5月29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演讲中，鼓励学生们，尤其是毕业生响应国家抗战动员的号召，到抗战前线去工作，积极报名参加“短期军政人员训练”，然后“到各部队去服务”^③。最为传奇的是西北联大地质系郁士元教授投笔从戎的故事。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43岁的郁士元申请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与重视，蒋介石亲自接见并特授予其少将军衔，《大公报》这样宣传他：“自知识分子从军运动成为风尚后，大学教授之申请入伍者，此为第一人。”“郁士元的参军入伍行动，的确鼓动了当时的知识界、教育界的参军抗战热情，其他高校也有三四位以他为榜样参军的教授，同时，也带动了更多的爱国学生参加抗日青年军，西北联大就有约300名学生参军^④。西北联大学生参军的热情的确非常高，《西北联大校刊》第三期、第四期登载的《本校二十六年度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可以印证这一点，在这两期调查表中，共有70名毕业就业学生，涉及系别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数学系、教育系、国文系、生物系、地理系等，其中有28名学生直接参军投身抗战第一线，占到总数的40%，还有几位学生从事民众组训等相关服务战线，学生的抗战热情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出来^⑤。

三、西北联大的社会责任教育思想及实践

重视社会教育的功用，积极发动民众。西安临时大学甫经组建，即积极投身于发动民众抗日的大潮中，“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动员全国军民，最重要之工作。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爰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负之责任”^⑥。教育学院李蒸院长在城固大礼堂对师生所做的《在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的报告中，认为社会教育是目前“国家应现代化”“国家将进入宪政时期”“抗战胜利必属于我”的必要前提，其重

^① 《特殊军训准延长一月》，《西安临大校刊》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②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二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③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八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④ 《郁士元传奇》，《天下》第二辑，陕西休闲读物杂志社，2012年，第123-136页。

^⑤ 《本校二十六年度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见《西北联大校刊》第三期、第四期。

^⑥ 《组织宣传队分赴陕境各县宣传》，《西安临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要性不言而喻^①。学校积极响应教育部的训令，很快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在 1939 年 1 月 22 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演讲中，常委李蒸将此事作为学校一件大事预先向师生进行了通报。很快，该会就举行了以“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知识”为宗旨的防毒讲习班活动。学刊还专门转载了《简单防毒概设》^②。在教育民众方面，西北联大还做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工作，学校组织了校内教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了阵容庞大的培训团队，对陕南六县小学教师进行暑期讲习培训^③。组织了各种针对校内外积极分子参加的培训班等，如家事讲习班，就可以招收“曾经读书识字能做简单笔记的妇女”^④；学校女生参加看护训练^⑤；学校组织下乡宣传队，宣传的主要内容有：（1）壮丁训练，（2）社训军体育指导，（3）保安队军体育训练等^⑥。高振业教授将在陕南进行民众教育的实践活动经过总结提炼，撰写了很有分量的《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一书，对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所采用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学理归纳与提升，这对国内开展此类工作的高校和社会团体有很好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开展民众教育的意义何在？王镜铭教授说得很明白：“所谓动员民众的最高目标，是使民众成为直接的与间接的，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战斗员，在物质资源方面，应设法使食料及军用原料生产增加，在国民消费上，应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尽量节约，如此方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供给；在战斗力量方面，应设法加强民众组织，提高民众的战斗情绪，有‘前赴后继’的兵员……^⑦”

抗战紧缺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地质系师生与陕西省建设厅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厅长雷实华作为地质系的嘉宾多次出席地质系师生大会，并向师生们做关于资源开发，尤其是战争资源开发重要性、需求等方面的报告，地质系师生受托在陕南安康、南郑等地进行过许多次实地勘察，写出了一批勘察报告。魏寿崑等人经过详细勘察，于 1938 年 8 月提交了《勘察安康行政区砂金矿简要报告》，其中认为“安康区沙金区域虽广，但含金量太低”；“石泉近富矿带，似应作一详密之勘探”；陕南汉中盆地一带“苟能作有系统之勘察，不难有发现富矿之希望”。结论认为：“陕南沙金，以国民生计论，以科学上之价值论，均有详密研究之必要”^⑧。今天陕南金矿开采的成绩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审慎而严谨的。同样的目的，在陕西省建设厅的引导下，地质系的师生们还对陕北的石油资源进行过初步研究勘探，并写出了初步调研报告，只是由于随后迁校至陕南，交通经费战事等客观原因限制了师生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⑨。

在学生中积极推行实业教育内容。工学院李书田院长在《适应抗战期间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著作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实业报国思想。他认为：（1）在大后方迅速建立战时及生活急需之生产工厂，恢复生产，以应时需。（2）对于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要重军事技术学习，相对放松“八股工程”教育。他说：“全国各大学工学院之专门教授，责任綦重，应如何以最经济之时间，与极贫乏之设备，为最有效之训练，是乃工程教育家最值得筹思而力行者。……至于工程教育本身，虽凡所研习，均直接间接与抗战力量有关，然太平时代之八股工程教育，究应加以适合时需之变化，在本大学工学院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六系之课程，已作施行特殊训练之厘定，保留原订课表最切要课程之十五学分，而另任学生选习技术训练四组课程之一组，即一军事工程组，二，军事机械组，三，军事电讯组，四，军事化学组”。（3）在教学科研实践过程中要重点进行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教育。（4）对于工

^① 《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② 《西北联大校刊》第七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③ 《西北联大校刊》第二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④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⑤ 《西安临大校刊》第五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⑥ 《西安临大校刊》第六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⑦ 《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⑧ 《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⑨ 参阅《西安临大校刊》第三、四期等。

程教育应更加重视——不仅指战时，和平建设时期更需要工程教育提供发展动力^①。

进行深入的社会实践，“研究实用问题”。对此问题，贾成章教授认为：“对日抗战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是全民族的责任，不是一部分或某一阶级的责任，前方战士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奋勇杀敌，其责任固然很重大，但是后方支持抗战力量，所负的责任尤为重大，所以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我们国民应尽的责任。不是一时的责任，而是达到我们民族复兴后以前的永久责任”^②。师生们积极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帮助所在地进行历史文化整理、教育能力培训、社会问题调研、实用技能的开发等。工学院教授利用专业知识技能“纷纷顾问”，“资源开发，汽车养护技术，均关重要……，教授先后到陕，各方遂纷纷顾问，应接不暇”；“土木工程学系主任周宗连博士既尽力于邻近飞行港之扩充”；“土木系教授刘德润博士复曾勘估商洛公路”；“矿冶工程学系……因陕西省建设厅之邀请前往调查探淘安康区砂金矿”；“机械工程学系教授研究改善可以就地铸造之汽车零件”^③。历史学系考古委员会充分利用身边历史文物资源对师生和抗战进行宣传资料的挖掘整理。他们“为表彰民族英雄张骞墓间古物”，对城固县境内的张骞墓进行了发掘，并有过程报道，考古完成后学校又将此地作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墓前召开“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活动。教师继续深挖此素材，撰写了《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等著作，大力宣扬张骞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多年困居边地却不忘报效国家的精神，使身处相似境遇的师生感同身受，教益良多。化学系“鉴于汉中一带，无造胰工厂，并无造胰之基本原料（牛油），而胰子又为日常生活必需用品之一，故拟利用此间土产之白油制胰，以资补救”^④。学校还将“试验”作为学生取得学业教育必须的内容之一，并制定相应办法。办法第一条说：“本大学学生所习各课目，皆需举行试验，以凭考核学业”^⑤。说明西北联大时期非常重视学生学习的实效性，这应该也是构成西北联大战时教育理念的一部分。

撒布西北高等教育火种。在西北联大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开始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长远考虑。1938年4月，教育部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西北联合大学。”^⑥“移布”是迁移进行布局，布全国高等教育之大格局之意，说明从这个时候起，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让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的计划了。南迁汉中后，徐诵明、陈剑脩二常委赴汉口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本有继续西迁四川之意，陈立夫指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这个指示更加明确，让西北联大作为全国高等教育大布局中充实西北、撒布高教火种的计划已经确定无疑。从平津繁华之地迁移来的西北联大的师生虽然从感情上不愿意，但从理智上，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安排，并且乐意做“文化开秦陇^⑦”的先驱。1939年5月，在西北联大城固校区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常委报告中即说明了改名西北联大的意义即在于“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⑧。抗战后期直至结束，西北联大各学院虽有部分“复原”，但是相当一部分还是留在了西北：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在1940年即决定西

^① 李书田：《适应抗战期间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西安临大校刊》第二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② 贾成章：《如何支持长久的抗战》，《西安临大校刊》第九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出版。

^③ 《西安临大校刊》第六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④ 《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⑤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五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⑥ 《国民革命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

^⑦ 西北联大黎锦熙先生所撰写的校歌：“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⑧ 《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迁兰州，并在抗战胜利前夕的 1944 年举校迁往兰州；北平农学院部分师生留在了陕西武功；而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均留在了西安，应该说，当时大家对自己的使命还是清楚的，而且基本也都实现了国民政府的初衷^①，西北高等教育的大格局就此形成。

西北联大留给西北的不仅仅是高起点、高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它也留给西部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西北联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抗战后期出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蒸曾指出：“不重视精神与方法，则所谓迎头赶上者，恐成徒托空言矣。^②”在西安临时大学组建不久，学校发了一则布告：“本大学受命于危难之际，由平津三校院移陕联合成立，幸未受时局若何重大影响，仍能照常上课，顺利布施虽设备上极感简陋，环境亦远不如往昔宁静，究能保存若干学术研究精神，弦歌未断，饔食宛然，特殊训练之外，不忘正常教学，埋头苦干，冀成学风，此未始非我一群学人领导知识青年共体国家维持战时教育之至意所致，然亦其力求精诚战胜危机之一种心理建设也。^③”其中保存学术精神，弦歌未断；特殊训练，不忘正常教学；埋头苦干，冀成学风的呼吁，正是西北联大战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常委李蒸在 1939 年第五次总理纪念周演讲中说：“这次本人到四川，见到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南开学校等，他们的物质设备，都比我们完备，可是精神方面，我们并不比他们落后”^④。学校志存高远，并未因偏安西北而降低对自己的责任要求，《西安临大校刊》第十一期一则新闻中说道：“本大学应树立文化上之权威，使西北一切新学术新思想胥以本大学为中心，庶乎有济于国家之生存独立”^⑤。实际上，学校已然将自己看做振兴西北、扶助国家复兴的重要力量。西北联大自己所拥有的优秀精神文化传统也留存并激励着西北文化教育事业，其中很多精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

四、西北联大“为未来储才”的专业教育思想及实践

在西北联大异常艰苦的时代，师生们缺吃少穿，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匹夫不忘忧国，积极为抗战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贡献，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家的抗战大业。除此之外，师生们并未放松对专业知识的求索，为抗战充实高层专业技术人才，为战后重建储才的思想与实践也为师生们经常所宣扬与接受，他们将教师的学养钻研，学生的专业学习及个人修养放在了与抗战及对社会的贡献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地位。

师生们将科学研究看成了抗战爱国的一部分，他们认同“为未来储才”的思想。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在 1938 年 5 月 2 日学校南迁城固的开学典礼上说，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在注重抗战宣传的同时，西北联大的师生们没有忘记他们本来的社会角色，他们也在时时提醒要加强个人修养，加强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的钻研与学习。1939 年 2 月，黎劭西（锦熙）先生在学校学期第十次纪念周所做《青年学生学养与服务两个重要的条件》的演讲中说道“青年学生，关于学养与服务，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关于学养与修养的；第二个条件是关系在□时期的服务的。^⑥”1941 年，西北学会成立大会在国立西北大学举行，其创办的《西北学报》宗旨之一即为“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学生们对于作为大学的首要功能也有清醒的认识，即使是在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军事训练感想文章中，学生们也能清醒地认识到“大学教育军事化”只是战时增加给普通大学的一个职责。学生赵兰亭在军训感言中写到：“我所谓军事化，并不是

^① 《西北能办出一流的大学吗？——访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天下》第二辑，陕西休闲读物杂志社，2012 年，第 43 页。

^②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68 页。

^③ 《本校布告》，《西安临大校刊》第五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④ 《西北联大校刊》第八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⑤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⑥ 《青年学生学养与服务两个重要的条件》，《西北联大校刊》第十三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把一个普通大学，改为军事学校，而是摄取军事的精神，把军事当做研究各项学科的出发点，来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①”

教师克服困难、因地制宜，体现出了良好的钻研精神，获得了不俗的创新成果。在正确认识作为高等教育首先应做好学术研究与学生培养任务的背景下，西北联大的教师们没有因为国难当头、设备奇缺、研究环境恶劣而放松对自己专业研究的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奉献，做出了一批令人惊叹的成绩。国文系的黎锦熙教授适应战时汉字普及的需要，开创了汉字拼音方案，并很快在国内进行了普及。他同时牵头编撰地方志，组织文科理科背景的教师，就近取材，首先从陕南开始，编写了一批陕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矿产等专门方志，其对方志编写的设想开阔宏大，在此基础上编写的《方志今议》更被学界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西北联大在考古领域的贡献也在现代考古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师生就近对城固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整理不遑多论；王子云首开先河，进行艺术考古，搜集了 1000 余件文物，出版了《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等 10 余部著作；黄文弼三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大量文物，发现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位置，填补了多项考古空白。数学系的曾炯，以两个“曾定理”和一个“曾层次”闻名，当代数学家丘成桐认为他是 20 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齐名的中国数学家。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理论被公认为至今为止世界地质构造的五大学派之一。其他外语的曹靖华、历史的陆懋德、教育学的李建勋、地理系的黄国璋、农学的汪厥明、医学的蹇先器、体育的袁敦礼等均在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做了令我们今人也惊叹不已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成就^②。

对学生的修养及学术要求标准不降低，鼓励学生参与科研与创业。西北联大是一个由不同学术背景、层次的多个高校组建的联合体，组建前各个学科的基础与成才要求多少会有差异，但在西北联大组建以后，学校对于学生的要求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对学生的要求几乎全部向最高标准看齐。以西北联大工学院为例，其前身北洋工学院是当时国内最好的高校，教育理念很先进：“一个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同步的理念；一个是追求一流的精英教育理念”，工学院重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将此作为了立院之本。在组建的过程中，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及一些零散的师生也加入西北联大工学院之中，师生的层次和领域就有了差别。时任院长李书田却不管这些，他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不论出身，甚至不问政治，坚持施行自己认准的精英教育理念。为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在教育观实践中主要把好了三个关口：一是把好宁缺毋滥的招生关。“北洋招生有一年全国报考 1000 多人，最后只招了一个，宁缺毋滥，绝对的精英式教育。它到了西北，报考 1000 多人它才招了 100，还坚持这样。”二是把好教师质量关。为了保证工学院的教师质量，李书田想到了一个教授考试的点子：要求凡在工学院任教的教师均必须经过统一考试，按照真才实学重新划级。这个措施在实施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很大的抵触，甚至引起了西北联大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师生内讦事件，但这件事本身反映出工学院实事求是和高标准严要求的学风。第三是严把学生教育质量关。为督促学生刻苦学习，工学院推出了非常严苛的“末位淘汰制”：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工学院的高标准严要求也被学生所接受和认可，学生们昼夜苦读，学风极佳，出现了名噪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段“七星灯火”的佳话^③。

积极严格推行教育部提倡的导师制，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徒式”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传统教育组织形式多样，但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关系犹如传统手工作坊中的“师徒式”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对于学生的教育不仅仅

^① 《从集训生活说到大学教育军事化》，《西北联大校刊·集训专号》第十二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②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天下》第二辑，陕西休闲读物杂志社，2012 年，第 8-9 页。

^③ 本部分参看《北洋大学的贡献》和《精英主义教育的大师——李书田》，《天下》第二辑，陕西休闲读物杂志社，2012 年，第 32 页，第 95-99 页。其中，“七星灯火”即说“当时的教室七星寺烛光摇曳，教师与宿舍的山道上火把游动，被人称为‘七星灯火’”，言当时学生学习精神足，学习刻苦努力。

通过“言传”的形式进行学识教育，还有更多则是依靠“身教”，即手把手、面对面，多接触、多一起做事，进行潜移默化的熏染。孔子的“师徒式”教育理念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虽有其狭隘的一面，但是也自有其独到的优势——那就是对教育资源，即教师潜力的尽可能开发与利用^①。近现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习现代日本、德国、美国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模式，发展迅猛，成效显著，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东施效颦、一味照搬，出现了许多问题。随着抗战的深入，一些教育问题越发明显严重，教育部“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渐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特参照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导师制，令中等以上学校遵行。^②”西北联大是一个深具传统熏染的综合性大学，对于教育部推行导师制的要求完全拥护，很快便落实实施，并且直至西北联大的子体各校，这个制度一直在延续执行。教育系对于实行导师制反应很积极，很快就制定了《教育系导师制实施办法》，这个办法也成为以后其他各个院系学习效仿的范本^③。学校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导师会组织章程》，

五、小结

战时教育思想的内涵有三点：一是其教育体系中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教育思想及体现；二是其教育体系中有专门针对战争的思想教育及具体实践。三是决不忽视教育本身所应具有的职责。“战时”只是一个特定的内涵，而这个内涵只是应时之需添加在“教育”这个基础概念之上的内容，第一、第二内涵就是“战时”加给“教育”的特定内涵。以第三内涵为基础，包含有第一、第二内涵的教育思想才可以称为完整的战时教育思想。西北联大应全民抗战的现实需要，积极踊跃的宣扬抗战爱国思想，积极灌输师生以军事思想，积极培养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并支持师生积极投身于支持抗战的宣传、发动民众、军事技能培养、战时资源准备、精神鼓动等方面的实际行动中去。同时，它没有因噎废食，更没有本末倒置，在艰难的环境中，深明大义，响应国民政府的要求，“战时应做平时看”，在师生的学术研究与学养提高的领域迸发出了比以往更大的热情，作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西北联大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物质环境下，从不言弃，甚至连大学教育的标准也不愿意降低，他们吸取中华民族每遇逆境而愈奋的优良传统，靠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践行“公诚勤朴”的校训，走出了一条踏实而光彩的道路。她所体现出的完整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是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典型代表。以西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加深和丰富了

中国抗战战线的深度和广度，也为抗战及战后建国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西北联大的战时教育思想及实践也为西北联大赢得了其他时境所无法比拟的精神与社会影响：西北联大落户西北之前，西北就没有一所像样的高校，但是西北联大的到来，使西北地区拥有了一所当时国内层次最高的高等教育学府。更为重要的是，这所学校从华北繁华之地辗转几千里，落户当时西北边陲西安，又徒步跋山涉水栖身于人迹罕至、文化荒漠之秦巴山区与汉水之滨，一路走来，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之种子便播撒在身后，在她走后又给西北留下了已然枝叶繁茂的高等教育体系，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目前西北高等教育并不弱于中东部高等教育的格局，正是得益于当时西北联大打下的基础，留下的根脉。贡献与回报是对等的，正如韦卓民所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内地并不是一种灾难。他们是迁移到了文化落后的地区。知识和技术意念的普及帮助了内地的迅速现代化。由于这些外地高等学府的迁入，促使落后地区的学校在教学水准上和效率上都获得改进。大专院校的师生大都是在沿海大城市中长大的，有机会和本国落后地区的生活接触，使他们能于亲身体会的经验中学习重视祖国所面临的问题。许多教授由于环境所迫，要去应付新的问题，而这些答案绝非仅为

^① 参看赵万峰.《论孔孟式儒家教育到书院教育的三个转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1)，第142-143页。

^② 《教育部训令》，《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③ 《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西洋人使用的课本中所能觅得，更非彼等携归的欧美各大学课堂中所讲所做的笔记。简单而欠精确的设备也非全然无益，基于此理，教学也许更有兴趣而且更有实效。^①”

^① 韦卓民：《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见台湾《湖北文献》第54期。

抗战时期的西北战略与西北联大

梁严冰

(1.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2.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对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组建后,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国立五院校,且独立设置,在当时及现在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与认识。本文认为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分置国立五校是国民政府改善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战略;西北联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对西北后方建设战略进行了筹划与实施。期间,国民政府对西北后方教育战略予以高度重视。西北联大的组建及分置国立五校,是国民政府改善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举措。

但是,对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组建后,从母体中分离并独立设置国立五院校,当时及现在人们的看法与认识是不同的。比如,《西北师大校史》在其中谈到西安临大南迁时讲:“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的三校师生来自北平,大都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延安对西安的影响也与日俱增,部分学生为了抗战投奔延安。因此,1938年3月,国民党利用‘潼关吃紧’、‘西安告急’的气氛,强令学校再次迁往陕南汉中一带。”^{[1]p38—39}《西北大学校史稿》中讲:“抗日前线和延安时时刻刻像块磁石,牵动着爱国学生的心。国民党害怕这个局面延续下去,使大批临大学生‘赤化’。”因此,“把这所他们称为‘陕北公学第二’的西安临时大学搬迁到汉中。”^{[2]p212}在谈到西北联大时说,三院校“矛盾重重”,“各院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之事。”而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一心致力于恢复北洋大学……分离之心早已有之”。^{[2]p219}《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在谈到临大南迁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讲:“一些学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往延安。”^{[3]p238}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数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能够维持9年之久。”^{[4]p18}其“大多数”及“不欢而散”虽然没有明讲,但显然暗含有西北联大。另外,美国学者易社强也认为:“作为一所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与战时由华北另几所高校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不幸的是,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5]p100}以上诸种说法虽重点不一,但大致上均认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组建后不久即分置五院校,是“防共”需要和内部纷争不团结导致的结果。

以上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与关键所在。其实,临大南迁是大战略下形势所然,而西北联大分置五校为则属国民政府有意而为的战略举措,是基于对西北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布局及发展前景的考量。

首先,看西安临大南迁。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后,1938年2月上旬,日寇沿同蒲路南下,28日,日军占领临汾,兵临山陕交界的风陵渡一带,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并且日军经常隔着黄河向河南岸炮轰,与此同时,敌机从1937年11月之后,不断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据统计,仅1938年3月11日,日机即出动30架4次分袭西安,^{[6]p226}这是1937年11月以来空袭最为严重的一次。不仅如此,日军对西安的轰炸强度不断加强,据陕西省政府1943年统计:自1937年11月日机首次轰炸西安至1942年12月,陕西共遭受日机空

袭 1413 次，死亡 3300 人，受伤 3467 人，房屋被毁 24208 万间。^{[6]p227}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法进行正常教学、科研的情况下，蒋鼎文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临大师生于是在 3 月 11 日大轰炸 5 天后，即 3 月 16 日离开西安，南迁较为安全的汉中。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按照历史事实及逻辑推理，假如临大师生不离开西安，继续留下来，面对敌机的轰炸，生命安全如何保障？怎样进行教学、科研？又怎么能保证弦歌不辍呢？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西安临大南迁并非孤立事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令“将长沙临时大学移设昆明”，^{[7]p11}且长沙临大师生早于西安临大 20 天即 2 月 20 日，从长沙出发“随着一排排木船顺着湘江向北漂去”，^{[5]p29}到常德后改为步行。这次跋涉“并不像某些保守人士所指责的那样，是为了逃避左派的搅扰”，^{[5]p28}而是国民政府的战略筹划，与西安临大南迁一样；再者，如果简单考虑空间上的距离，害怕与担心学生在西安被“赤化”并“投奔延安”，就迁移一所大学，那么迁到陕南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汉中就不会牵动爱国学生的心吗？抑或陕南无法抵达陕北吗？这显然令人难以信服。所以，西安临大南迁汉中是国民政府决定“提高边省文化”并“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之一步。

其次，因为“私人纠葛”或“派系之争”就“肢解”一所煞费苦心组建的联合大学，而很快独立设置国立五院校，恐怕既不合常理也不是一个政府迅速决定执行的。学者们现在一般把西南联大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来探讨，其实，西南联大组建之初，矛盾同样很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之事不是没有，3 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4]p152-153}政府为什么没有考虑独立设置呢？也许有人认为西南联大有宽容精神，即便是这样，那么，西北联大在独立设置院校时，为什么是五所，而不是三所呢？按理说是为了解决矛盾的话，将原先的三院校分别设置更合适。抗战胜利后，又为什么将西北联大主体及其从母体中分离出来的院校永留西北呢？这一切答案，还得从国民政府的全国教育政策及西北后方建设战略谈起。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及整个中国东部的沦陷，西北的后方战略地位逐渐凸显与提升。早在 1930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专门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4 年 5 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视察陕、甘、宁、青四省，指出：“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8]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西北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国民政府试图以“西北为建国的根据地”，通过加强对西北的政治军事领导和军事战略部署，发展西北农业经济，促进与军事关系最为密切的工矿业建设，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推动西北后方建设。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9]p556}1942 年，蒋介石亲赴西北各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返回重庆后，于 9 月 22 日就西北建设问题发表了讲话，视西北各省为将来建国最重要的基础。随后，在 1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文化教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命脉延续与发展之关键所在，故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及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设是当时西北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国民政府进一步明晰与加快了借平津院校内迁之机，构建和布局西北高等教育的战略设想。正因为如此，南迁汉中以后，时任西北联大常委的徐诵明、陈剑脩赴汉口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打算，而陈立夫却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实为“钧”，指蒋介石）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0]因此，将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院校按照学科门类重新调整，统一贯之以“国立西北”之名，实际上就决心将它们永久留在西北。民国著名教育学家姜琦教授就此曾深刻指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亦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

高等教育机关”。^[11]

从国民政府的全国教育政策来看,国立五校的分置及改善与加强西北高等教育也是势所必然。抗战爆发后,虽然处在战时,但国民政府一再强调教育要按照“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办理,换言之:“战时教育的方针,仍是一贯正常的教育方针,仅仅是更明显,更切实些,决不是病急乱投医的医药杂技,而是针对着教育上已经暴露与必要暴露的缺点,加以根本的治疗,调整病态的环境,确定治疗的处方,以求疾病之挽救。”^{[12]p3}什么是教育上的缺点?又如何“治疗”呢?国民政府认为应该加强理工科的教育,即大力发展理、医、农、工及各种技术专业学校。因为,按照一般的比例,理工人才与文法人才所需为 1:4,也就是说有 1 个技术人才,应该有 4 个文法管理人才,而当时文法科占十之八九。于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在教育方针上必须使理工科学生多起来,这样国家工业化才能强盛起来,到时文法科学生才始有出路。^{[13]p295-296}对此,从 1930 年代初开始,教育部就予以高度重视,陈立夫的前任、1933 年接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讲,自己到部后以三事自勉:“(一)促进职业教育之发展;(二)谋中央及地方教育经费之独立;(三)促进公务员考试制度之普及,为青年求正当之出路。”^{[14]p1}按照其促进职业教育的思路,必须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他在 1933 年 5 月 24 日的日记中又讲:“到部后调阅二十年度大学统计,全国文科(文、法、商、教育等科)大学生数额,占大学总额的万分之七千,约 32000 人;实科(理、农、医、工)生仅占百分之三十,约 9000 余人。因于 5 月 20 日详定限制全国各大学(包含独立学院)招生办法,务使各校自本年度起招收文科新生严守一定之限制;其不遵守此项限制者,教部即不审定其新生之学籍。”^{[14]p1-2}由此可知,从 1930 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即大力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着力发展理、工、农、医等学科教育,以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

在此背景下,前面已经提及抗战以来随着沦陷区域的不断扩大,西北的后方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与凸显,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而要担当“建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在当时却十分薄弱与落后。据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 108 所,^{[15]p1400}主要集中于京、津、沪等东南沿海地区,广袤的西北地区只有 2 所专科以上学校,^{[16]p294}仅为总数的 1.85%,由此可知其薄弱程度。西北教育的这样一种状况,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极不相匹配的。故而改善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已成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对此朝野人士普遍关注,一些人士疾呼:“在工业化西北经济建设中,必需大量专门技术人才,始克济事,……是则只有多方号召与积极培育,以资应用。”^{[17]p10}故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善与加强,而改善与加强首先还是强调理工科教育,同时兼顾师范性与综合性,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事实上,早在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即有将平、津大学西迁的意图。1936 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即提议将北平四所大学之一所迁移进陕,并希望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他认为:“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省,人口总数 2000 万以上,乃竟无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而“查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实嫌供过于求”,因此“似可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18]p26-27}并希望国立北洋工学院也“移于西安,以为西北大学之基本”。^{[19]p27}由上可知,平津院校之迁移西北,政府早有动议。抗战爆发后,由于形势所迫,客观上进一步加快了国民政府大学西迁战略的进程。对于平、津大学的具体迁移状况,几乎与 8 年抗战相始终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有较详细的回忆,其在回忆录中专设“专科以上学校的西迁与增设”一节,讲述大学西迁及增设新校之政府战略。1940 年 6 月,为了进一步督查与落实西北联大的分置情况,陈立夫曾亲临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经营西北,固我边疆”明确表达了国民政府早有的西北战略意图及其重视程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也曾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通盘计划“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尤其是考虑到“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

当时并拟有各地分设综合大学和各专门学院的蓝图。》^{[13]p251} 由西北联大分置五校的情况来看，即完全是遵照以上之“蓝图”执行的。而对于这些新学校的设置经过，他饱含深情地说：“其工作之艰巨，事后追忆，实非笔墨所可形容。”^{[13]p248} 另外，不管是工学院、师范学院还是西北大学独立设置时，国民政府均将原“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的“校长免职”，“校印缴部”，此举意味着终止了原“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与原“北平大学”的校名。

至此，时隔 70 多年，我们清晰地看到当年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在西安建立一所临时大学，又要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并且作为综合大学的国立西北大学，最初也完全按照国民政府“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的原则组建。进而也可以看出把当时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最强的工科大学、规模最为庞大的综合大学迁移西北，显然是国民政府从战略高度筹划的结果。

结 语

总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及分置国立五校，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西北后方建设战略的重大举措。相较而言，同样内迁的西南联大更多表现出战时“临时性”举措的特征，组成西南联大各高校在抗战胜利后的回迁是谁都没有疑义的；而西北联大的组建则更多体现出战时“过渡性”的特征，因为经营西北、提升西北高等教育水平、优化高等院校的分布状况早已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之一，抗战的危急形势以及高校内迁只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契机，而借平津等地原有高校之实力和影响，助力西北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才是国民政府的核心意图。明了于此，才能理解西北联大分置五校并非一己私利或个人恩怨的结果。毋庸讳言，从人文荟萃、物质充裕的平津等地迁移尚显蒙昧、贫穷荒寒的西北，且要永留此地，对于数百名教授而言不可能不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和震动，而短时间内完成的院校分置重组，也不可能不引发各方面的意见之争和利害冲突。即便如此，西北联大的师生们仍然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为重，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所有的分置和重组，最终实现了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使联大主体及其分置院校大部分得以在战后永留西北，西北联大的精神得以薪火相传，成为西北高等教育的坚实基础。抚今追昔，西北联大师生们的奉献与牺牲，更值得我们景仰。

参考文献：

- [1]西北师大校史编写组.西北师大校史（1902—2002）[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2]西北大学校史委员会，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M].上卷，修订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3]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写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895.10—1949.1）[M].第1卷，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
- [4]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 [5]（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6]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民国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7]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A].（193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C].第5辑第2编《教育》（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8]宋子文在兰州畅论西北建设,申报[J].1934.5.9.
- [9]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Z].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 [10]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西北联大校刊[J].第1期，1938.8.15.
- [11]姜琦.西北大学是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西北学报[J].1941:(1).
- [12]陈立夫.抗战时期之教育[A].杜元载.革命文献[C].第5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
- [13]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M].台北：正中书局，1994.

- [14]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M].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1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第1编,综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16]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第5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 [17]胡纯如.西北经济建设之根本问题[A].秦孝仪.中华民国史料丛编——西北问题论丛[C].第2、3辑合订本,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
- [18]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A].(193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19]行政院关于邵力子提议将国立北洋工学院西移致教育部笺函[A].(1936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The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Northwest Strateg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Liang Yanbing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2.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After Anti-Japanese War breaking ou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northwest-building strategies, among which was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s measure of higher education. Both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the other five National University which ensued were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moves for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northwest areas and even on the whole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orthwest Strategy; the National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抗战爆发与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

陈印政，王大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曾一度提出“开发西部”计划，均未实施，原因之一是由于陕西没有一所大学，缺乏建设人才。1935年中日签订《何梅协定》，华北局势更为紧张，开发西部的计划也变得紧迫。邵力子苦于陕西高等教育基础薄弱，先将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办学，又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西迁，后因西安事变而中断。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沦陷，教育部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以继续办学。北平研究院之史学研究所考古组、植物学研究所已分别于1934、1936年迁至陕西，后因北平研究院大部分迁至昆明而缺席。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5日正式上课。

关键词：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何梅协定》；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一起西迁陕西，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并坚持继续办学。长期以来存在误解认为，这是抗战爆发之后解决办学困难的临时措施。经整理史料发现，由于国民政府“开发西部”计划对人才的需要，以及《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的紧张局势，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就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筹划，将学校西迁陕西，后因西安事变而中断，直到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仓促西迁。本文试就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简要回顾。

一、抗战之前的陕西高等教育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历史上曾数次成为中国教育的中心。“周之辟雍、汉之太学、唐之国子监，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①后来由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的改变，又由于地处内地和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再加上缺乏合格的师资，以及学生基础较差等原因，到了近代全国大兴新式教育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虽经数次创建，却又数次停办。至1931年1月，陕西省政府将中山学院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省内已没有一所大学。

由于没有大学，进而导致人才缺乏，陕西的建设受到很大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所计划的西部开发计划也因为缺乏人才而徘徊不前。原来，南京国民政府自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西北的开发与建设上来，并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之后又曾先后派遣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学术考查团、西北实业考查团等前往实地考察，以便做好开发西北之前的准备工作。“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落入日军之手。一时间，社会各界呼吁开发西北，“为抗战救国，要尽快建立稳固的战略大后方的呼声，通过书信、报告，雪片般飞到南京国民政府。”^②

1933年5月5日，奉国民政府命令，邵力子开始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主政陕西期间，立志开发西北和陕西，“修公路、通河渠、办水利、劝农桑，励工商”^③，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以利百姓休养生息。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邵力子对教育建设的重视。他不但提议给在

^① 严琳、王继武、易同民. 近代陕西高等教育的兴起及高校校报的发端[J]. 今传媒, 2011(7): 121~122.

^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编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12.

^③ 王自成, 刘玉桂, 周仓银. 邵力子在陕西史料略述[J]. 民国档案, 1985(2): 128~132.

陵大学和留日的陕西学生发放奖励金，协助建立“中国文化学会陕西分会”，受聘为“中华国学社”董事等，还支持其夫人傅学文创办西京助产学校和西安培华女子职业学校。

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由时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要求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之后，日本侵略者又幕后导演“华北五省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深感国内外事态的紧张，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开发和建设西北上来，并提出“现今国事日非，环境愈劣，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生产上欲救亡图存，则开发西北实刻不容缓。”^①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开发西北的现实困难，并提出“然开发西北之要素有四：曰劳力，曰资本，曰人才，曰市场。劳力与市场在我国固不成问题，所缺乏者惟资本与人才耳。但使政府高瞻远瞩，树立国家根本大计，认定开发西北为一切救亡运动之前提，排除万难，期底于成，则集中全国财力人力共同遄赴，事实上固似难而实易也。”^②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开发西北计划，所需要的经费开支也是一笔巨款。在政府的预算当中，包括调查费、采冶矿产费、建筑铁路费、修筑公路费、整理水利费、改良农林及畜牧费、移民费、拓殖银行费等共计需要8亿余元。但在预算当中，并不包括开办高等学校和培养人才的经费。

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也深感开发和建设西北面临的人才奇缺，并提出创办大学的设想。其实，早在1935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联合西北各省政府要联名提议建立西北大学。对于新建西北大学所要面临的困难，邵力子也有充分的估计，“须有充分之设备，复须有相当之教才。衡以中央财政现况，恐难点正多”^③。面对现实中的困难，邵力子萌生了从内地迁一所大学到西安办学的想法，“以旧有图书、仪器、教材作新校基础，中央但筹购地暨建筑校舍之费”^④，这样就省去了西北另起炉灶所要面临的种种困难。

二、战前之前的高校西迁

《何梅协定》签订后不久，面对日军连续不断对中国主权提出的挑衅，国内众多高校师生纷纷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指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并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时，很多有远见的大学校长纷纷考虑将学校迁往内地办学，以应对随时变化的紧张局势。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不但亲自到重庆、成都等地选取办学校址，而且让“学校总务处提前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⑤清华大学则在长沙征地建立分校，并提前将部分重要的仪器和设备运走。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也都在计划着西迁。

（一）东北大学西迁陕西

面对“一二·九”运动之后危在旦夕的华北局面，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率先准备迁往内地继续办学。“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城含光门外选定原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东大新校舍。2月24日，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随后，迁往河南开封的东大师生也迁到西安校舍（现西北大学北校区）。”^⑥

^① 行政院关于王超凡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致财政部令[A]. 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0.

^② 行政院关于王超凡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致财政部令[A]. 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1.

^③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A]. 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6.

^④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A]. 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6.

^⑤ 王德滋.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93.

^⑥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37.

在修建大礼堂的时候，张学良有感于国破校散、颠沛流离的处境，毅然在礼堂基石上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勛尔多士，复我河山！”

（二）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的西迁计划

邵力子经过仔细调研提出，仅北平一地就有四所国立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另外还有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数所私立大学，有些供过于求。所以邵力子就提出将在北平办学的国立大学西迁一所入陕，并易名为西北大学。经更仔细的考查，他认为“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机器、仪器、标本、书籍等约值三百万元，规模素称完备，以该校环境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①1935年12月28日，邵力子正式向行政院发函，申请将北平大学迁移至陕西办学。

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也深感国内外局势复杂，天津恐难为长久办学之地。如果学校继续留在天津办学，一旦日军发动军事行动，北洋恐遭不测，于是他也开始筹备将学校迁往内地。对于新校所址，他首先想到的便是自己的老朋友邵力子，并“亲自赴陕勘定西京分院院址”^②。邵力子不但同意该校迁陕办学，而且于1936年1月3日致电行政院请示。行政院在收到邵力子的提议之后，当日就将该事交教育部统筹办理。之后，邵力子又为北洋工学院办理了拨地130亩作为校址的手续。

李书田（1900—1988），字耕砚，河北昌黎人，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然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专业，于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1932年始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经李书田争取，中国第一水工实验所就建在北洋工学院。

李书田选择到陕西办学，是因为他与邵力子具有非常密切的交往。邵力子主政陕西之后，花大力气加强当地的水利建设，并亲自担任陕西省水利委员会主任。精通水利的李书田也经常到陕西协助工作。后来，邵力子还“送李书田之弟赴英国学习水利”^③，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再加上邵力子历来支持兴办教育，李书田选择西迁学校到陕西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西迁计划因西安事变而中断

1936年12月9日，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西安的东北大学师生与当地青年学生一万余人，联合举行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口号的请愿游行。“他们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表现出‘为实现救国主张，置生死于度外’的抗日决心。”^④游行队伍先是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然后又冲破戒备森严的军警的阻拦，向当时正在临潼的蒋介石请愿。

当听到游行队伍的请愿声，生性多疑的蒋介石起初认为完全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甚为惊讶，便质问邵力子：“西安是军事重地，为什么会发生高举此类标语游行？”^⑤邵力子回应到：“沈阳‘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同胞倍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苦，有志青年被逼得走投无路，离乡背井，参军随来西北。东北官兵的遭遇很快得到西安各界的同情，其中尤以青年学生爱国情切，又容易冲动，发行游行请愿是颇自然的。”^⑥

在学生的爱国请愿面前，顽固的蒋介石不但拒绝接见请愿学生，而且还命令军警准备好刀枪，震慑学生以免发生过激行为。面对蒋介石的这一可耻行径，已向蒋介石哭谏数次的张

^① 行政院关于邵力子请将北平四所大学迁移一所进陕致教育部笺函[A]. 马振犊. 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6.

^② 李书田. 北平大学之过去五十三[A]杨慧兰. 世纪记往[C].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 4-32.

^③ 王自成, 刘玉桂, 周仓银. 邵力子在陕西史料略述[J]. 民国档案, 1985(2): 128~132.

^④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M].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37.

^⑤ 张立星. 邵力子在陕西两事[J]. 民国档案, 1986(2): 102~103.

^⑥ 张立星. 邵力子在陕西两事[J]. 民国档案, 1986(2): 102~103.

学良也彻底寒了心，不得已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联合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邵力子也奉蒋介石之命，到溪口与张学良共住雪窦寺，共学古文，开导张学良“读书明理”。1936年12月21日，邵力子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高校西迁陕西办学一事也随之中断。虽然后来李书田曾到教育部请示学校西迁一事，“嗣曾请款略建西京分院校舍，未邀部允。二十六年二月，奉教育部长面嘱，平津各校院勿迁移设备^[1]”。这里面的原因，很可能与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大学学生游行，教育部害怕将学校西迁之后，学生联合起来再起事端有关。而事实上，“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的学生确实与东北大学联合起来，举行了示威游行。

三、北平研究院西迁陕西

北平研究院与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并立的两所国立科学研究机构，两所研究院共同为民国时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平研究院最早正式筹建于1927年4月17日，李石曾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并决议请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起草组织法^[2]。1928年8月，北平大学成立，附设研究院称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与北平大学一同筹备。1929年8月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改为国立北平研究院，聘李煜瀛（石曾）先生任本院院长，负综理全院之责。十八年十一月由院长聘李书华先生为副院长，襄理院务，并报教育部备案。”^[3]之后，北平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机构陆续筹备成立。

北平研究院隶属于教育部，筹备时计划下设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理化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四个研究所，生物部设生理、动物、植物三个研究所，人地部设地质、历史两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除药物、镭学两研究所设于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设在北平。其中，植物学研究所筹备于1929年9月，聘刘慎谔博士为主任；“史学研究所成立于1929年11月，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后设两组，一为调查编纂组，由李书华暂代主任，一组为考古组，由徐炳昶任主任。”^[4]

北平研究院成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研究经费紧张。李石曾在制定北平研究院筹备方案时，初步预算每月经费为5万元，但国民政府最后只批准每月拨付3万元。所欠缺的研究经费就要由北平研究院自行筹措。而李石曾筹款的办法，一方面是从庚子赔款中获得补助，另一方面则是寻求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与植物学研究所先后与陕西的机构合作。

（一）史学研究所考古组

1933年冬，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由考古组担任指导及研究工作。陕西是考古工作的重点省份，自1930年至1932年，北平研究院曾与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过几次合作，如北平研究院函索西安碑林全套拓帖，陕西省政府即立刻组织人员拓印寄出。在几次接触的基础上，北平研究院一度设想在陕西成立分院，于1933年派遣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等赴陕筹设北平研究院驻陕分院。但由于陕西士绅普遍反对由北平研究院独自在陕设分院，乃改提议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经双方反复协商，陕西考古会于1934年1月1日在西安省府大楼内成立，推举张扶万为考古会会长，徐炳昶为

^[1] 李书田. 北平大学之过去五十三[A]杨慧兰. 世纪记往[C].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 4-32.

^[2]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记录[A]. 国民党党委员会编. 李石曾文集(上)[C]. 台北: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80: 250.

^[3]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J]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 第一卷第一期.

^[4] 刘晓. 李石曾与北平研究院[D].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7: 78.

发掘主任。^①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曾留学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北平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48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译著有《欧洲哲学史》。

陕西考古会在陕期间的工作，一是陕西省民政厅前院发掘，这里原为唐代中书省旧地，自1934年2月21日至3月19日，获得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二是对宝鸡斗鸡台进行发掘，这里原是秦民族的发祥地。为研究周民族与秦民族的初期文化，陕西省考古会曾三次对其进行发掘工作，“第一、二两次自民国二十三年春起，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初止，为第一段落；第三次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上半年，为一段落”^②。第三次发掘原计划一年多完成，以期寻找真正新石器时代清晰轮廓，不料发掘工作仅进行一半，就爆发“七七事变”。事变之前发掘出的文物，大多运抵北平但未来得及整理；而对于剩下的一半工作，则因为事变后研究经费不能及时拨付，则被迫中断。徐炳昶也曾一度到家乡河南唐河组织抗日活动。

（二）植物学研究所

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之后，辛树帜出任校长，他认为“发展西北农林事业，须由调查研究西北植物着手，于是与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副院长李书华商议，请植物学研究所刘慎谔前来主持。植物学所虽从事纯粹研究，但亦倡导科学之应用，故不谋而合，甚得刘慎谔赞同，遂达成合作创办西北农林植物调查所的协议”^③。1936年9月，植物学研究所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刘慎谔兼任所长，地址设在陕西武功张家岗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内。当年冬季，因北平岌岌可危，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主要标本、资料和设备等便迁往该所，大部分人员也随同前往。植物学研究所与西北植物调查所实际合二为一。

刘慎谔（1897—1975），字士林，山东牟平人，1920年经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刘慎谔回国，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1936年植物学研究所与国立西北农学院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年底刘慎谔把植物学研究所迁到武功。1941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1950年秋，刘慎谔到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

四、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

（一）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努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军向驻扎在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时让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华北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这时，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华北各界，对于将来的华北局势，均存在两种相互分歧的意见：一方认为卢沟桥事件是日军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事件，中日双方将爆发全面战争；另一方则认为事件仅仅是地方军队之战的摩擦事件，不久就可以和平解决。

这时的蒋介石也在时刻关心着华北局势和中国将来的命运。危机时刻，他自7月9日起分别分批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国民党军政要员于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

身在北平的各界人士，更是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担心。7月15日，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在庐山的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

^① 罗宏才. 民国时期陕西考古会成立之缘起与大致经过[J]. 考古与文物, 1998(3): 94~96.

^② 苏秉琦.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M]. 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1937: 自序1.

^③ 胡宗刚.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65.

虑。”^①

7月16日，李书华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各校负责人：“芦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不胜祷切。”^②

于此同时，7月16日、17日，在庐山召集全国知名人士158人举行谈话，1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谈话会。19日，蒋介石宣称：“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须与敌抗战到底。”^③随后，蒋介石又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④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虽然表达了与敌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他还是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来解决当前紧张的局面。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与会者在会议结束总结发言时也表示“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⑤，言外之意则认为此事将以中国方面一贯的做法——妥协而暂告无事。身在北平的师生并没有将学校迁出办学的念头，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和军队，师生们甚至表达了“守土抗战之决心”。

（二）平津沦陷

但事情远没有中国方面预料的那样简单，日军不但没有与中国和谈的诚意，而且不断向平津方面增兵，并于7月20日下午突然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到25日，麇集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⑥7月26日，日军向位于京津之间的廊坊发起攻击，廊坊当天中午即失守，当天日军还向北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平附近的全部中国军队必须在28日以前全部撤走，否则，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下午，中日军队在广安门发生交火。

7月28日，中日双方在南苑发起激战，开战不久中国军队的通信系统就被打烂，部队伤亡惨重，防御已近崩溃，担任战斗指挥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和副军长兼学兵团团长佟麟阁，先后以身殉国。面对大军压境，以及日军不断发动的挑衅，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在“没有必要的作战计划，兵力没有集中部署到位，工事没有构筑”的情形下，对谋求和谈已不报有任何幻想。7月29日夜，宋哲元率北平守军撤出北平城，北平失陷。

同一天，日军还向天津发动猛烈的轰炸，打击的重点目标一是河北省政府，二是南开大学，轰炸之后日军又派兵放火烧了南开大学，将之化为灰烬。7月30日，天津失陷，身在庐山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听说学校被毁的惨状后，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⑦

面临国难当头，学校破碎，师生离散之惨状。对于平津的师生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到何处去，所以广大“爱国学者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口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采

^① 北平各大学负责人密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A].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C].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

^② 李书华等21教授密电庐山谈话会[A].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C].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

^③ 蒋介石. 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A]. 武月星，杨若荷.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1937—1945）（上册）[C].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8.

^④ 蒋介石. 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A]. 武月星，杨若荷.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1937—1945）（上册）[C].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6.

^⑤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序1.

^⑥ 戴峰. “七七事变”始末[J]. 军营文化天地，2007（7）：8~11.

^⑦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5.

取果断措施拯救高等教育。各校纷纷提出内迁的要求。”^①

（三）筹建西安临时大学

而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众多大学校长们，会后并没有立刻返回学校，而是去了南京教育部，商讨将来如何办学的事宜。平津沦陷后，教育部被迫于8月19日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华北高校内迁事宜。由于战前清华大学已经在长沙动工建立分校，初步计划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又由于战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已经与陕西省政府共同做好迁陕准备，而且北平研究院部分机构已经迁到陕西，所以计划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但由于北平师范大学当局则要“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自愿分到西安一组^②。

9月2日，教育部长王世杰签发高壹7字第16390号令，聘请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安东北大学校长）、辛树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陈剑脩（教育部特派员）、周佰敏（陕西省教育厅长）、童冠贤（秘书）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之后，西安临时大学进入筹备阶段。

9月10日，教育部发出16696号令，正式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③李书田“率少数教职员，潜赴青岛转西京，与师大、平大合组西安临时大学。”^④另外两校师生也大多先经天津，坐船然后绕道陇海铁路到达西安。

10月11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又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一、校址之勘定；二、经费之支配；三、院系之设置；四、师资之遴聘；五、学生之收纳；六、建筑设备之筹置；七、其他应行筹备事项。”^⑤同时规定临大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本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指定常务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议”，“随后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脩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下设秘书、教务、总务三处，全校设立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大学院，共二十四系。”^⑥

由于教育部决定筹备西安临时大学已是9月，再加上西安既有的办学条件有限，经多方努力，才分别将学校暂时安排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小南门外东北大学和北大街通济坊三个地方，能过两个月多月的筹备，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11月15日正式上课。

（四）北平研究院西安临时办事处的筹建

在西安临时大学组成单位里面，包括北平研究院，而且筹备委员会当中也包括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但是李书华并没有到任，北平研究院最后也没有加入西安临时大学。这其中的原因如下：

七七事变时，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正在欧洲考察，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院内事务。院内实际负责人是副院长李书华。李书华是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的哥哥，早年留学法国图卢兹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北平大学代校长、南京

^①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M]. 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234.

^② 陈明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M]. 南京出版社，1981：10.

^③ 教育部训令[A].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350.

^④ 李书田. 抗战前期与胜利后之北洋[A]杨慧兰. 世纪记忆[C].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4—24.

^⑤ 教育部训令[J]. 西北临大校刊，1937（1）.

^⑥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 西北大学校史稿[M].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26.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1929年参与创建北平研究院，并任副院长。

但是由于李书华素来主张抗日，并表示：“日本军阀侵略无止境，欲吞并我全国，非全国起而反抗，别无他法。”^①日本占领北平之后，极为搜寻他的行踪，并曾指令伪警察到位于八面槽椿树胡同二十三号的家中盘查，但由于李书华早已到达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暂住，因此幸免于难，但也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暂避医院。

抗战刚刚开始时，已经迁到西安的植物学研究所和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但由于李书华被困北平，其余各所也没有人统一组织迁移。因此两个机构也面临经费停拨的危险。为了让全院能有一个组织核心，出于万不得已，于是刘慎谔与徐炳昶一起“策划成立了北平研究院临时办事处，推徐炳昶为主任”^②并假借李书华的名义，托人在南京与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接洽，称有五个研究所早已迁出北平并在外工作，物理所岳颀恒先生已经到达陕西，另外还有三个研究所在来陕西的途中。希望研究院事业得到延续，并且由徐炳昶通过教育部领出了北平研究院七月份的研究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筹备西安临时大学时，也将北平研究院列为组成单位。

但是，北平研究院迁出各所并没有去陕西，李书华直到11月8日才到达上海，与迁出各所取得联系。李书华对刘慎谔等假借自己名义成立西安临时办事处一事颇有微词，因此并没有去西安。“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北平研究院设昆明办事处于昆明黄公街十号。该处房屋系由富滇新银行缪云台行长帮忙向该行租用者。总办事处及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史学各研究所陆续迁滇。一部分图书仪器，均先后抢运至滇应用。其抗战前由北平迁出其他各部分，仍各照旧工作。”^③

西安临时大学的创建，使得因抗日战争爆发而遭受重创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为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的逃难师生提供了读书的环境，为数次中断的陕西高等教育提供了再生之源。更为重要的是，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公诚勤朴”之精神影响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其培养的人才为西北和全国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李书华. 李书华自述[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21.

^② 胡宗刚.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1929—1949)[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74.

^③ 李书华. 李书华自述[M].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23.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起讫时间考

张 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西迁重组的高等院校之一。由于存在时间短暂, 鲜为人知, 其起讫时间在不同的叙述中异见纷呈。通过比较不同的叙述文本, 参照历史文献资料, 本文力图呈现国立西北联大的发展脉络, 厘定国立西北联大的起讫时间, 以资参考。

关键词: 国立西北联大; 起讫; 考证

抗战军兴, 为传承文化火种, 保存教育事业, 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 面对日军的大规模入侵, 采取“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开展了大规模的高等院校西迁行动, 其中尤其以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并含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涉及面较广、联合规模较大, 在民国高等教育西迁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战争年代的薪火相传, 呈现了文化和教育的时代坚守, 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西部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两校分别汇集了中国高等教育界最优秀的师资和学生, 从炮火战乱间迁离, 分集西南的昆明和西北的西安。它们立足相似的背景, 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 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在这方面, 联大与战时由华北另几所高校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不幸的是, 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 西南联大却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八年之久”。^①持存与即散之间, 国立西南联大弦歌不断, 薪火相传, 培养出了杨振宁等享誉世界的优秀人才,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 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 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 缔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相比之下, 国立西北联大则是初合即散, 虽各校于陕西南郑、城固等地有教师勉力而教, 有学生刻苦勤学, 终究未能取得如西南联大般的成就, 湮没于历史而鲜为人知, 甚至学校起讫时间也存在分歧。本文的立意初衷, 始于各方表述之异见, 从多方文献资料入手, 考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起讫时间, 希冀获致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

一、分歧之诸端

作为一所短暂存在的改组高校, 国立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北平研究院之一部分组成, 先后分拆扩展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安医科大学(后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国立西北联大作为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无论时间节点, 还是影响作用, 在各校的校史书写中呈现表述不一、意见各出的现状。此外, 专门的西北联大研究者通过发掘整理历史文献, 还原出西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真实面貌, 产生了正本清源的积极作用。但是,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章的考察可以发现, 关于联大的起讫时间尚存在诸多争议, 有待厘清统一。

^① 易社强著, 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年3月: 123

（一）1937年9月——1938年7月之说

中国著名高校丛书之《天津大学》在校史沿革一节中指出，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①又《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关于北洋大学在抗战中的境遇时提及，面对1937年日军入侵后的紧张形势，“北洋工学院和平津其他院校的爱国学者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口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拯救高等教育。各校纷纷提出内迁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教育当局才匆忙商议华北高校内迁事宜，准备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随后于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同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又以第17728号训令颁布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1938年4月3日，学校师生南迁后，教育部下发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从此，工学院独立设校。^②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一书在“大学内迁”之抗战时期迁往西部各省的大学中，指出“北平大学、北师大与北洋工学院三校，首迁西安，1937年8月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二迁陕西汉中，三迁陕西南郑，1938年4月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决定将该校各学院分别独立为学院，组建新校”。^③

（二）1937年9月——1939年8月之说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中提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师大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在陕西西安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它的行政体制为委员制。合组后各校仍保持各自的特点，师大学生亦保留师大学籍。一九三八年春，日寇飞机频频轰炸汉中，临时大学难以在西安奠基持久。三月，全体师生组织起来，越秦岭，出褒谷，步行数百里，到达汉中。四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工学院分出独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仍设于古路坝。农学院亦分出独立，称国立西北农学院，设于武功。七月，根据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给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等规定，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一九三九年八月，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三学院。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城固。”^④

《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一文指出，“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合并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校设6学院23系；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校陕南城固县，4月奉教育部令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年7月，又奉教育部令，将联大的工学院和农学院与他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联大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⑤

^① 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天津大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4:8—9.

^②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234—240.

^③ 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551.

^④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111-112.

^⑤ 姚远等.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30卷,第3期.

李永森,姚远主编的《西北大学史稿 上卷(1902-1949)》一书指出,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为顺应抗战初期的这种形势,便决定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两个临时大学,命令于当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不久,两大学相继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而西北联大在建校一年多以后,即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工、农、医、师等学院相继独立设校,余文、理、法商三院成为西北大学的主体。”^①至于西北联大的结束时间,则以1939年8月国立西北大学的建立和师范学院、医学院的分离为时间节点。

谷雪艳在《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一文中,以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作为西北联合大学设立的起点。并指出“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农学院则被强迁往陕西武功,与当地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随之,西北联合大学改成国立西北大学,……不久,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独立,称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②作为西北联合大学解散的标志。

(三) 1938年3月——1939年8月之说

余子侠在《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系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先于1938年3月在西安合组西安临时大学,4月迁陕西南郑后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停办后,大部师生亦并入西北联大”。^③此段叙述侧重于构成其基件的各院校。在起讫时间上,与其他表述都有节点上之差异。

赵弘毅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中指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续仅一年零四个月,国民党统治当局出于战略需要,对西北联大实行分设之。”另有“1939年8月8日,进一步将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其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出来,分别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迁兰州,医学院仍设南郑。至此,国立西北联大已分设为五校”。^④据此,其对于西北联大的划分时段为1938年4月至1939年8月,将西安临时大学时期未予考虑。

(四) 1937年9月——1946年之说

王淑红等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的表述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37年9月,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在西安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9年9月,西北联合大学进行了再次分流与重组,其中包含女师主体的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此后人们依旧习惯上把从中分离出来的仍在城固办学的各校统称为西北联大”。^⑤

姚远进而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中指出,1937年9月10日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其子体,即国立西北五校——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从1937年临大

^① 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 上卷(1902-1949)[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09:4.

^② 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3:62—64.

^③ 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J].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176.又见余子侠.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00.

^④ 赵弘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3期.

^⑤ 王淑红,邓明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成立至 1946 年各自回迁复校，具有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①

方光华在《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一文中，亦将 1937—1946 年间的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作为整体看待。^②

（五）1938年4月——1946年之说

李巧宁、陈海儒在《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一文中提及：西南联合大学（下文简称“西南联大”）从 1938 年 4 月到 1946 年在云南办学 8 年。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于 1938 年 4 月在陕南汉中组建，1939 年 8 月开始陆续分立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等几个独立院校。除西北师范学院 1944 年全迁甘肃之外，其他几个院校都是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迁出陕南的。^③该文将西北联大的前身即西安临时大学时间亦未加考虑，同时在西北联大的结束时间上，根据习惯将其延伸至 1946 年。

二、线索之梳理

立足不同出发点的考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起讫时间即明且晦，难下定论，其中有史实上的失察，亦有观点上的歧异。有鉴于此，按照时间顺序对其进行一番梳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战时肇划至战后回迁的过程中，先后经历如下：

1937 年 8 月《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出台，规定“一、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二、此项临时大学暂先设置下列一所至三所：（1）临时大学第一区—设在长沙；（2）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3）临时大学第三区—地址在选择中”。^④

1937 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⑤。

1937 年 10 月 11 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又以第 17728 号训令颁布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⑥。

1938 年 3 月，西安临时大学迁校陕南城固县。^⑦

1938 年 4 月 3 日，师生南迁后，教育部下发《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称“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期间，拟令该校各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步，并改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依旧”。^⑧

1938 年 7 月，根据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给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等规定，^⑨西

^①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②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③ 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202.

^④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⑤ 转引自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234.

^⑥ 同上.

^⑦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五编:602.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教育(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1.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教育(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7.

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同时教育部指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农学院则被强迁往陕西武功，与当地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①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三学院。同时，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城固。

1940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至1944年迁移完成。

1946年，3月民国教育部令设立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仍独立设置兰州；国立西北大学在5月迁设西安，并于8月合并了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于6月奉令复员于陕西咸阳；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天津复校，师范班与初中班于9月11日开学；北洋工学院筹备在天津复校，于11月正式上课。^②

三、起讫时间之勘定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合分，历经坎坷波折，它在起讫时间方面的争议，当根据联大在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组织机构的统一性予以考量澄清。以上各家观点之罗列与历史线索的梳理，呈现了当前研究的概貌，也为本文的考证提供了研究的余地。

（一）起点之确认

概而言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创建时间，分别有1937年8月、1937年9月、1938年3月、1938年4月的说法。查其以据，“1937年8月说”源于《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的出台；“1937年9月”的依据是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而迟至“1938年3月”或“1938年4月”的观点，则以1938年4月教育部下发《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为来源。

通过比较分析，“1937年8月说”失之过早。虽然《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规定“临时大学第二区—设在西安”，但在具体举措上尚未形成明确的计划，而仅为一种构想，不应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设立的起点。至于“1938年4月说”，虽然在《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中正式出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用以取代“西安临时大学”之旧称。但是从组织机构的自身延续性而言，这种割裂是不恰当的选择。因此，按照教育部“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规定，将1937年9月10日作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起始时间，既有了组织机构的支撑，也保持了西北联大的历史连续性。

（二）终点之分析

国立西北联大的终止时间，分别有1938年7月、1939年8月、1946年三种观点。“1938年7月说”见于中国著名高校丛书之《天津大学》和《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此处将1938年7月《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农学院单独设置，与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命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相混淆，是为知识性的错误，应加以更正。

更具代表性的观点是“1939年8月”与“1946年”两个时间点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三学院。同时，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城固。这就从机构名称和设置上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五编：698-699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五编

结束了西北联合大学的实体存在，也完成了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使命。但是“1946年说”依据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其子体，即国立西北五校从1937年临大成立至1946年各自回迁复校，具有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依照习惯，从西北联大分离出来仍在城国办学的各校仍然统称为西北联大，延至1946年是为西北联合大学之终点。

在此，关于西北联大终止时间的争议，涉及到实际的历史存在与完整的研究客体之间的区别。前者出自事实的认证，后者注重精神之延续，都有各自的立论依据。笔者立意于实存对象之考察，自是侧重于事实的认证。因此在西北联大的终止时间上，当以机构名称、组织构成的存废作为立论的重点。通过以上分析，西北联合大学的终止时间，应该在1939年8月8日为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国立西北联大起讫争议之焦点，集中于起点之界定与终点之明确。从立校意旨的初定，到具体组成院校的规划，进而由临时大学改为联合大学，中间分离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最后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又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最终完成了从整合到分拆的过程，国立西北联大也由此完成了其特殊时代的特殊使命。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分析，关于国立西北联大的起讫时间，即可以1937年9月教育部“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规定作为该校的起始时间，而将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三学院。同时将联大原有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作为国立西北联大的终止时间。

一所饱经磨难的高等学府，理应有其生发寂没的生命周期，虽存世不久，亦当铭记。透过历史的长河厘清其发展道路上的波折，足以识见国立西北联大在历史大动荡中的短暂历程和艰苦卓绝，以为后世追忆反思的基石。

参考文献:

期刊文章

- [1]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 [2]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
- [3]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 [4]王淑红,邓明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 [5]姚远等.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30卷,第3期
- [6]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 [7]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J].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
- [8]赵弘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第42卷第3期

著作

- [1]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
- [2]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 [3]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 上卷(1902-1949)[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09
- [4]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天津大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5]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6]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

[7]余子侠.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档案汇编

[1]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Z].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2]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5[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

国立西北联大的使命自觉

——兼谈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

曹振明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西北联大淬炼出“公诚勤朴”校训, 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精神和文化传统。她不畏千里险阻, 在西北组成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坚强堡垒, 广泛开展抗战救国活动, 与国人共御外侮, 肩负西北开发之重任, 为战时西北开发和战后建设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树立了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 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宏远追求。

关键词: 西北联大 公诚勤朴 使命自觉

“七七”事变后,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中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空前灾难。1937年9月10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 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 西安临大受命南迁汉中。

1938年4月3日, 教育部命令已迁至汉中的西安临大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 西北联大之“工、农两学院, 奉部令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别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¹。1939年8月, 教育部命令改西北联大为国立西北大学, 同时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分别独立设置, 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至此, 西北联大发展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西北联大子体各校延续了西北联大战时大学联合管理体制和办学精神。²至1946年底, 西北联大子体部分院校在平津复校。

1938年10月, 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通过决议: 以“公诚勤朴”为本校校训。³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对校训曾作出精辟阐发。⁴“公诚勤朴”是西北联大在艰苦办学中淬炼出的大学精神, 蕴含了西北联大的崇高使命自觉, 对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作了高度概括, 集中体现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 它所包涵的精神理念深深地融入了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的言行之中。

一、“公”即天下为公。《礼记》提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即是大同社会的最高标准。近代以来, “天下为公”则是孙中山先生终生所倡导的精神。黎锦熙以“公以去私, 用绝党争”⁵释之。它表达了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以国家

¹ 《工农两学院分别合并独立》, 《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 1938年10月1日。

² 方光华: 《为什么纪念西北联大》,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姚远: 《国立西北联大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³ 《国训校训同悬礼堂 校歌歌词催请黎锦熙、许寿裳赶制中》, 《西北联大校刊》第4期, 1938年11月1日。

⁴ 黎锦熙: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 伊雪曼编: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年, 第9页; 方光华: 《为什么纪念西北联大》,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⁵ 黎锦熙: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 伊雪曼编: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台)国立西北大

建设与民族事业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

二、“诚”即不诚无物。“诚”乃天之道。《礼记注疏》曰：“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无诚，则事不成。”⁶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⁷即：只有至诚之心、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有所成就——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他人、成就事业。黎锦熙同样认为“诚”可以“实”去“弱”去“虚”。⁸它蕴含了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以诚待人，以诚做事，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三、“勤”即勤奋敬业。《尚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诗经》曰：“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唐代韩愈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⁹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勤以开源”；“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也”。¹⁰它是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忠于职守、奋发有为的表征。

四、“朴”即质朴务实。儒家认为质朴与文饰相对。道家主张“朴”即朴素、本真。黎锦熙说：“朴以节流。然朴之义又不止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¹¹把“朴”解释为节俭节流，不事雕琢，与世无争，埋头苦干。它是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艰苦朴素、质朴务实的真实写照。

一、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坚强堡垒

1.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不畏艰险，千里大迁徙

同西方文明首先主要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传播一样，中国现代大学也首先聚集于我国东部省份。其中作为晚清王朝和北洋政府京畿之地的平津地区，首先诞生了一批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聚集地。“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平津相继失陷，日寇“有意识地对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¹²，平津高等教育遭到空前浩劫，诸多院校被日军毁坏或占领，大量师生流离失所。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平津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高等院校分别内迁长沙和西安组成临时大学。

按照教育部命令，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院校师生不畏千里之遥，经历无数跋涉与险阻，从平津内迁来陕，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高等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千里大迁徙。如北平师范大学的汪堃仁携带妻子和两个幼女，从北平取道海上，经香港、越南，再经云、贵、川，沿途两遇飞机轰炸，前后历时4个多月，行程万里，最终到达陕西。¹³常委陈剑脩在《西安临大校刊·发刊词》中说：“临大合乎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校院，经过不少曲折历程，始在此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一创举。”¹⁴此种壮举表现出我国高校师生不畏艰险、誓与中国高等教育共存亡的顽强精神，是西北联大师生忠诚于中华民族的体现。

在西安不到一年，西安临大被迫再度南迁。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兵临风陵渡，直逼潼关，西安告急。为西安临大师生安全起见，1938年3月，西

学校友会，1969年，第9页。

⁶（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33页。

⁷（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⁸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9页。

⁹屈守元、常思春校注：《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08页。

¹⁰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9页。

¹¹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9页。

¹² [日]石岛纪之著，郑玉纯译：《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¹³ 姚远：《国立西北联大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¹⁴ 陈剑脩：《发刊词》，《西安临大校刊》第1期，1937年12月20日。

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命西安临大再迁陕南汉中。临大师生由西安坐火车至宝鸡，然后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西汉公路，涉渭河、过散关、越秦岭，经黄牛埔、油房沟、凤县（双石铺）、南星、留坝、马道、褒城等，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近千里的艰难跋涉之后，最终抵达汉中。沿途峭壁陡立，地势险恶，人烟稀少，行军十分苦难。一位教授和一位学生因长途跋涉的劳累而病逝。因此，在抵达汉中时常委李书田感叹道：此次大迁徙实乃教育史上“破天荒的大举动”¹⁵。

2.组成大学联合体，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办学，成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坚强堡垒

由天津著名院校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我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根基作出了重要贡献。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院校本来就有很强的实力。国立北平大学是由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而成，包括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也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当时全国最强的工科大学之一。1938年9月，由这些诸多著名学府组建的西安临大共分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6大学院24个系；教授计有100余名；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为1470余人（含借读生150余人）。西北联大则直接由西安临大改名而来，继承了临大规模，设有6个学院23个系，与西南联大一起，成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时期我国高等院校师生的向往之地¹⁶和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坚强堡垒。

然而，西北联大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平津沦陷后，诸多院校原有的仪器设备、药品与标本、图书资料等教学设施损失惨重。“学校西迁以来，图书、仪器损失殆尽”¹⁷，教学、实验、实习等严重缺乏教科书、参考书、仪器设备等。因前线抗战，后方的物资紧缺，即使是办公和教学所用的纸张也很难购买。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加上抗战、通货膨胀的影响，教师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学生大多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贷金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迁至城固后，办学条件更为艰苦。校舍不敷使用，且分散各处，教职员工不得不租住简陋的农舍房，由旧房改造的学生宿舍“一遇阴雨，必有数处漏雨”¹⁸，师生上课往返各地也殊费时间，学生学习无教室，吃饭无餐厅，晚间自习只能用自制的油灯或土蜡照明。因处“偏僻”的陕南汉中，西北联大“请教授，购图书仪器，因为交通的关系，比其他大学格外困难”。¹⁹1938年5月，西北联大常委陈剑脩说：教育部给本校的经费“实发三成五，后增改为四成。本校迁至城固后，一切仪器设备丝毫未有，尤以此处未有电灯，油烛消耗甚大，故请求予以增加，教部对此深为谅解，允予竭力设法，但未有具体结果。”²⁰

尽管如此，西北联大毅然在当时尚很偏僻的西北坚持办学。这是西北联大之“勤”与“朴”的孕育土壤和真实写照。1937年11月西安临大向教育部提交的关于两月来筹备情形的函文称：“本校僻处西安，一切物质建设均赖自力创造……较长沙临时大学之能借用圣经学校房屋与事半功倍不啻有天壤之别。”²¹因联大初创，一切校务亟待筹建，联大多方勘定并筹借校舍，先后制定诸多规章制度，成立导师会、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建筑设备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警卫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等，使一所由仓促内迁的诸多院校组建成的联合大学迅速进入正常的办学轨道。在有限的条件下，联大师生不求享受，安分守己，因地制宜，紧锣密鼓地展开各种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少教师在豆油灯下工作至深夜。

¹⁵ 李书华：《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7年12月20日。

¹⁶ 譬如，因报考学生过多，西安临大不得不违背教育部关于高校新生录取有名额限制的规定，自行超额招收试读生，事后再呈请教育部批准。《西安临大校刊》第6期，1938年1月24日。

¹⁷ 《教育系自本校迁移以来所经办之重要事项》，《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¹⁸ 《学生宿舍修建情形》，《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¹⁹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期第五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1939年1月1日。

²⁰ 《历届纪念周讲演纲要》，《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²¹ 《呈为陈述两月来筹备经过各情形恳请鉴核由》，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292.1。

因开学较晚，临大还特别规定第一学期“延至二十七年（1938）二月底”，“除二十七年（1938）元旦停课一日外，所有年假寒假，均不放假”²²。即使是在日军逼近潼关、临大准备南迁之前，学校“依然坚持着镇定的态度，完成上学期的学业”²³。迁至汉中后，尽管办学条件更加艰苦，甚至常遭敌机轰炸，但是西北联大师生并未气馁。1939年1月，西北联大常委李蒸从重庆回到汉中的西北联大时对师生感叹道：“这次本人到四川，见到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南开学校等，他们的物质设备，都比我们完备，可是精神方面，我们并不比他们落后，这一点个人引为欣慰”²⁴。1939年5月，常委胡庶也鼓励联大师生：“抗战中的我国大学，虽物质被敌人毁坏，但是我们的精神却不能让敌人破坏。”²⁵其实，早在西安临大成立之初，西安临大全体教职员就曾向全国同胞联合发表声明：决心与前线将士一道，“率千百青年学子”筑成救亡图存之坚强教育“堡垒”²⁶。

因为条件艰苦，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坦诚相待，互相信任，患难与共，共同进步，充分体现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之间的“诚”。在向汉中的迁徙中，行军干粮的购集困难、运输笨重，“为学生减轻负担着想”，学校取消由“学生购置总运”和由“学生分带”的办法，决定“由学校总办”。²⁷因处抗战时期，物资缺乏，又因处于交通不便的陕南，师生的办公与生活用品购买不易，学校遂接管了原由学生创办但经营困难的消费合作社，增加学校和教职员出资参股，以增强消费合作社的效益，活跃物资流通，为师生的教学、生活提供便利。鉴于来自战区的学生缺乏经济来源，衣食无着，西北联大积极为他们创造缓解经济困难的条件，如向教育部申请更多的贷金、设立服务队、请学生缮写讲义等，使来自战区的学生可获得学习和生活补助。学生因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被捕后，诸多教授常常不顾个人安危而予以挽救。联大农学院全体学生还曾联名呈请教育部，维护西北联大的组织完整，反对农、工两院的改组分立。²⁸在城固办学时期，因校舍不敷使用，众多教职员租不到房子，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遂将自己的租用房“分为同事四人居住，本人全家住一间，且仅有一面有窗”。²⁹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的学生则彼此“踏着不分你我的情谊生存并生活”。³⁰

二、抗战救国的精神力量

1. 在全民抗战洪流中，誓与国人同仇敌忾

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是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忠诚于中华民族和践行“公”之精神的生动体现。“七七”事变之后，抗战救国已成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西安临大成立伊始，就确定了教学的指导思想：“凡所教学训遵之方，悉宜针对国难时艰，积极设施，以厉行非常时期之救亡教育。”³¹并向全国发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教职员“拥护贯彻抗敌大计”》的通电，声称：“自信我黄帝裔胄决不就此沉沦，但须坚苦创造；我广大民族，亦决不就此瓦解，但须精诚团结。总之，今日之权势属于人，将来之胜利属于我，民族解放，以至达到

²² 《学期延长》，《西安临大校刊》第2期，1937年12月27日。

²³ 《本校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²⁴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期第五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1939年1月1日。

²⁵ 胡庶华：《精神的改造》，《西北联大校刊》第16期，1939年5月15日。

²⁶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教职员“拥护贯彻抗敌大计”的电报》，《西安临大校刊》第3期，1938年1月3日。

²⁷ 佟学海：《膳食委员会报告》，《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²⁸ 《呈请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恳请诸公同心协力据理力争》，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306-2。

²⁹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11页。

³⁰ 程敬扶：《我们来检“梦”》，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58页。

³¹ 《本校布告》，《西安临大校刊》第1期，1937年12月20日。

现代化国家之枢机……同人等深知救亡图存，高于一切。”³²家政系教授、主任，原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璧亭于1937年10月在南京中央电台发表的广播讲演中说：“敌人所毁坏者，中国之物质。中国人之精神，将因此而愈加奋励，益行团结。今后将以全民族之力量，抵抗顽敌，期获最后胜利。未来之所得，必远胜于以往之所失。”³³

1938年初，西安临大迁至汉中改称西北联大时，全国抗战形势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西北联大认为：“在战抗期中，一切思想行动，均应以抗战为目标；应如何树立全民抗战必胜信念，使前方士气旺盛，都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大学生须做民众的模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须注意，尤其于每天早晚应加以反省个人终日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有否与抗战工作有关系，必须如此，才不愧为大学生。”³⁴常委李蒸甚至指出：“有些人希望和平，这层根本谈不到，试问敌人能否将占去的土地，完全交还我们？如不交还，怎能谈和呢？谈和不就是投降吗？政府的国策，是抗战到底，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奋斗，不必乐观，也不要悲观。”³⁵“博望侯（张骞）在匈奴十余年，不与敌人妥协，此种精忠报国之精神，堪为吾人所效法”³⁶，1939年4月6日“民族扫墓节”，西北联大组织全校1400余名师生，集体徒步至汉中祭扫博望侯张骞墓，并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誓与民族共存亡。

2. 广泛开展抗战救国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抗战

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积极举办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讲演会或报告会，甚至将教学内容也向服务抗战倾斜。西安临大除正常上课外，每周均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至大礼堂（即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大礼堂），从开学到当年年底，仅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共组织四次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大型讲演或报告会：第一次由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讲演，题目是《不得了，不得了》；第二次由陕西省水利局局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讲演，题目是《抗战力量》，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队长徐宝溥也做了《在北战场办理军事工程之经过》的报告；第三次由航空委员会第十三科科长顾校书讲演，题目是《防空工程》；第四次由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雷宝华讲演，题目是《求学态度与抗战时期应有之修养和准备》。³⁷

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00余名学生参加的为期两个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为配合1938年9月的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徐寿裳教授作《勾践的精神》讲演，李季谷教授作《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讲演，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每周还举行由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由校常委、校长、各处室主要负责人或著名教授主持并参加，分析并报告全国抗战最新形势，振奋师生团结抗战的斗志。学生也组织抗战救国方面的座谈会或纪念会。1938年夏，以“《抗战建国》座谈会”为主题，学生召集全校性的大型座谈会，会议由法商学院学生主持，邀请了许多著名教授参加，在点燃土制蜡烛的大教室中，师生济济一堂，对民族抗战和复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当时，抗战救国已成为各院系教授授课的重要内容。1938年1月，工学院举行第二次院务会议，决定自下学期开始，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心将转为与国防建设、国防工业及自卫教育等有关的工程科学。

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还走出校园广泛开展抗战救国活动。1937年12月，临大发布公告曰：“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组织宣传队利用星期、假期下乡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尽之责任”。³⁸1938年1月成立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临大学生

³²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教职员“拥护贯彻抗敌大计”的电报》，《西安临大校刊》第3期，1938年1月3日。

³³ 齐璧亭：《天津失陷之经过及现在之状况》，《西安临大校刊》第2期，1937年12月27日。

³⁴ 《本校校本部本学期第二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7期，1938年12月15日。

³⁵ 《本校校本部本学期第五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1939年1月1日。

³⁶ 《本校全体师生祭扫博望侯墓并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1939年4月15日。

³⁷ 西北大学小时编纂委员会编：《西北大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³⁸ 陈剑脩：《发刊词》，《西安临大校刊》第1期，1937年12月20日。

支会，“发挥大学生之救国效能，增加抗战力量³⁹，1939年1月改组为由联大师生共同参加的“西北联大抗敌后援支会”，成立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交通队、募捐队、防空队、妇女看护队、抗战剧团、农村工作团、汉奸侦察团、防毒研究会、民众宣传及组织研究会、游击战术训练班等机构，广泛展开义卖献金、慰劳前方将士家属、为前方将士征集鞋袜、扩大兵役宣传、开展防空防毒讲习和协助地方训练壮丁等大量工作。1939年1月，全校师生开展拥护抗战签名活动，并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在艰苦的办学和生活条件下，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还积极为前线将士捐薪、捐物、义卖、义演；认购国债、慰劳伤兵、救济难民；成立大团结社，创办《大团结》，增强抗战舆论；为声援全国抗战，全体教授还加入航空建设协会；在中共西北联大地下党领导与支持下，先后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文艺学习社以及民先队等学生团体，研习马列思想，宣传抗战理论，动员广大民众等。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还弃笔从戎，从军抗战的学生达300余名；其中，地质地理系郁士元教授，主动要求奔赴抗日前线，被誉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三、西北开发的使命先驱

1. 被时代和国家赋予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基础的重任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开发西北”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选择。1934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考察西北时就指出：“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之生命线”。⁴⁰然而，此种战略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东强西弱”的畸形布局很不相符，引起了国人越来越多的注意和批评。1935年11月，杨一峰等32人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出的议案称：“开发西北之呼声高唱入云，而实际工作仍未曾着手。溯其往事，深用慨叹，故宜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不仅使全国高等教育获平均发展已也。”⁴¹“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东部国土的大部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凸显。1942年，蒋介石考察西北时指出：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1935）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⁴²不难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不仅愈来愈高，而且把开发西北与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借平津高校内迁之机，将社会舆论变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奠定开发西北基础的实际战略。在西安临大内迁来陕之初，教育部就认识到平津院校的内迁对于“收容北方学生，并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基础”⁴³有重要意义。1938年4月教育部规定西北联大的重要任务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⁴⁴1938年5月，在西北联大开学典礼上张党务督导员也向联大师生提出：“希望诸位负起抗战胜利及复兴民族的责任。”⁴⁵1938年夏，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实为“钧”，指蒋介石）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⁴⁶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所发的汉教第5942号训令中指出：过去“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遍合理，又未尽适合需要。自抗战军兴，各校多迁移后方……实有积极改进之必

³⁹ 《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生支会工作计划》，《西安临大校刊》第9期，1938年2月7日。

⁴⁰ 《宋子文在兰州畅谈西北建设》，《申报》1934年5月9日第5版。

⁴¹ 西北大学小时编纂委员会编：《西北大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⁴²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开幕训词》，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29页。

⁴³ 《西北大学大事记》编委会编，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⁴⁴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⁴⁵ 《本校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⁴⁶ 《本校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要”⁴⁷，于是将组成西北联大的平津院校按照学科门类重新调整，统一贯之以“国立西北”之名，以将它们永久的留在西北。1940年6月，教育部长陈立夫视察西北大学时为第四届同学会题词曰：“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向国立西北大学提出“开发西北奠复兴基，学成致用报国及时”的殷切希望。可见，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得以在西北设立，不仅仅是因为平津高校失所，同时也被时代和国家赋予了明确的战略定位：引领西北文化教育，培养硕学宏才，开发辽阔西北，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2. 自觉践行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基础的使命

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对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基础的使命有着充分的自觉。这是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精神的集中体现。西安临大已经自觉地认识到，本校担负着“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庶乎有济于国家之生存独立”；“深冀其（本校师生）努力成就，为国效用”。⁴⁸常委陈剑脩对师生说：“本校自平津三校院迁陕成立，目的在保持原有学校基础，发展西北学术文化，萑籝褴褛不惜迂回曲折以靳达到”，“应培植青年，埋头苦干，储为国家建设之用”。⁴⁹常委李书田则对师生讲：“吾人更应远瞩高瞻战后之复兴与建设”，负起“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复兴建设”的重大使命。⁵⁰常委陈剑脩在1938年西北联大的首次开学典礼中同样讲到：“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⁵¹西北联大的子体各校即国立西北五校也自觉地认识到，西北地区“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因而致力于“汇集专家意见以全力促进西北建设；凡关于农牧之改良，林矿之开发，荒地之垦殖，交通之发展，乃至工业水利之振兴，贸易及合作事业之推广，皆为研究探讨之范围。尤注意于社会动态之调查统计，并提供具体改革建设方案，以为政府及社会人士参考资料”。⁵²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也指出：要“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⁵³。

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确实承担了“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⁵⁴，从知识、思想、文化上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西北联大先后承担了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含陕、甘、宁、青和新等，甚至包括河南和内蒙）职业学校的辅导，中等学校、小学教师各科教员的培训，以及研究并推行师范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选拔毕业生充实边省学校教员，联合招生、联合考试、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学术社团的主持和实施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重责。此外，联大还组织考察团赴甘青两省考察地理、资源、人事等，“以为计划发展本大学及西北教育之根据”⁵⁵；并以西北联大的名义，向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交议案，建议由教育部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切实调查西北各省需要，设计西北教育发展的改进方案，以期改变西北教育的落后状况，推进“建设西北”的“既定国策”。⁵⁶西北联大俨然已成抗战时期西北文化教育的重要主导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北联大基本实现了国民政府发展西北高等教育的战略设想，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及战后西北开发的文化基础。与西南联大的几乎全部北归（仅在西南留下昆明师范学院）不同，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部分师生回迁复校外，西北联大在大西北

⁴⁷ 《教育部有关院系调整方案及工学院农学院合并改组事宜、设立师范学校等通知训令函件》（一），陕西省档案馆藏：国立西北大学档案，全宗号：67，目录号：5，案卷号：306-1。

⁴⁸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

⁴⁹ 《常委对假期军训生训话》，《西安临大校刊》第12期，1938年3月7日。

⁵⁰ 李书田：《适应抗战时期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西安临大校刊》第25期，1937年12月27日；《本大学工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记录》，《西安临大校刊》第5期，1938年1月17日。

⁵¹ 陈剑脩：《迁移经过与校名更名的意义》，《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⁵² 《西北学报·发刊词》，《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西北大学学报史料汇编》，2008年，第23页。

⁵³ 赖琏：《题词》，《西北学术》，1943年第1期。

⁵⁴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

⁵⁵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

⁵⁶ 《中国教育学会西北分会向全国教育会议提案之一部》，《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1939年4月15日。

留下了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等5所院校，使西北地区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西北地区从此一改高等教育严重落后的现状而拥有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西北联大不仅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应有使命，同时也基本实现了国民政府改变当时高等教育“东弱西强”畸形布局的战略设想。

为“不负本校在西北设立之旨”⁵⁷，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还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开发西北作了大量基础工作，以应战时西北开发及战后复兴建设之需。如应陕西建设厅之请，赴陕南调查金矿，“并代为计划开采事宜”；航空委员会邀请“设计监修”西安机场，“刻全部工程”；陕甘公路管理局敦请“为彼研究、改善可以就地铸造之汽车零件”；行政院主办之工业合作社及沔县政府邀请代为调查“沔县煤矿区之地质”，以期开发；还代为勘察商洛的山区公路，以期建设等。⁵⁸国立西北大学还联合国立西北工学院建立西北科学研究室，“藉以约集专家，从事于西北建设问题之研究”，以“赞助政府早日完成建设西北大计”；又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商妥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甘、宁、青、新、蒙各省实地考察”。⁵⁹此外，西北联大师生也多以西北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物产资源、社会经济等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为西北的开发建设献言献策。正如常委李书田所指出的：我们内迁来陕，“更宜熟察地方情形，准备协助地方政府，开发资源，兴建西北”。⁶⁰西北联大与子体各校还努力培养服务于中西部的建设人才。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子体各校培养了9000余名学生。据《西北联大校刊》第3—7期“本校26（1937）年度毕业同学就业调查表”统计，西北联大的毕业生大都扎根中西部省份，其中奔赴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者高达一半。

西北联大常委胡庶华曾明白地指出：“我们西北联大，设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京津各校内迁组成联合大学“对于内地及边疆文化影响极大，不仅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大有进步，即卫生方面亦多发展，同时知识分子以及优秀青年，在平时万想不到在边远之区，服务或求学。竟能经长途之跋涉，受生活之辛苦，这是锻炼身体和修养人格的极好机会，这是自卫战赐给我们的最大收获。”⁶¹此种情势孕育了西北联大的“朴”“勤”精神，集中反映了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和对“公”之精神的实际践行。

四、文化传承创新的宏远追求

1. 自觉树立文化传承创新的宏远追求

民族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虽处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但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非常关注已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自觉地树立了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宏远追求，反映了他们质朴务实、勤奋敬业的精神，是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师生忠诚于中华民族和践行“公”之精神的重要体现。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周秦汉唐文明构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骨架。平津院校内迁来陕首先组建的西安临大，就立足西北文化故地，“以复兴西北古代文化自任”，认为“本

⁵⁷ 《甘宁青暑期考察团筹备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17期，1939年6月1日。

⁵⁸ 《矿冶系将往安康调查砂金宣传救亡》，《西安临大校刊》第3期，1938年1月3日；《工学院教授各方纷纷顾问》，《西安临大校刊》第6期，1938年1月24日；郁士元：《沔（勉）县煤矿区之地质》，《西北联大校刊》第9期，1939年1月15日等。

⁵⁹ 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7页。

⁶⁰ 《李书田院长在工学院矿冶工程学会迎新大会上的讲演》，《西安临大校刊》第4期，1938年1月10日。

⁶¹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1938年4月15日；胡庶华：《战争与文化》，《西北联大校刊》第16期，1939年5月15日。

大学应树立文化上之权威，使西北一切新学术、新思想胥以本大学为中心”。⁶²黎锦熙、许寿裳为西北联大撰写的校歌则说：“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对西北联大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作了高度概括。黎锦熙、黄国璋教授在《答复教育部征询各种教育问题之意见》中，针对中国文化“应如何研究整理及发扬光大”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应注重科学的方法及时代的认识，方能发扬光大。”⁶³

西北联大子体各校即国立西北五校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⁶⁴1942年5月赖琏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他在师生大会的致辞中说：“我们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人人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⁶⁵西北大学1943年创办《西北学术》，其《发刊词》曰：“今者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椎轮大路，先轸本刊，借以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自西北数省，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暂益，其意义至深且大也。”⁶⁶

2.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其一，融会现代西方理论与学术方法，在发掘和研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丰硕成果。1919年新文化运动引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文化之争，动摇了长期以来的“中体西用”的主流思想。面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中国学界产生了西方化、东方化和中西调和之论。经过长期的文化论争，不管是主张“中国本位”者、“全盘西化”者，抑或是调和论者，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需要整理和发扬，同时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文化之外。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聚集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人文学者，他们融会现代西方理论与学术方法，在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发掘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和重新研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探索征途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开创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是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人、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之一，所著《方志今议》形成一套完整体系，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开创了民国时期新型方志的先声；许寿裳讲授章太炎、鲁迅等著述，对20世纪初的新旧文学论战多有探讨和反思；张纯一对中国先秦哲学、中国佛教和景教以及西方的基督教都有研究，在中西不同文化的融会会通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曹靖华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第一人；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等的罗根泽，是以现代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尤以诸子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为长，曾受顾颉刚之邀主编《古史辨》第四、六册，对先秦学术的现代性探讨作出重要贡献；高亨对中国先秦诸子思想，特别是《诗经》《楚辞》《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周易》《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作了重新整理，是中国近现代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历史系教授陆懋德对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考古学等颇有研究，其著作《中国上古史》1941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届社会科学类著作发明三等奖（无一等奖，仅1项二等奖和1项三等奖），《史学方法大纲》于1942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届社会科学类二等奖（无一等奖），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学的开创者之一；黄文弼前后3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吸收西方考古学理论，依据所得大量文物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高昌等古国和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与变迁，填补了考古学空白，对西北文化地理和中亚文明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子云带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搜集的1000余件文物，并作出科学研究，开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后来国立西北大学

⁶²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

⁶³ 黎锦熙、黄国璋：《答复教育部征询各种教育问题之意见》，《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

⁶⁴ 《西北学报·发刊词》，《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西北大学学报史料汇编》，2008年，第23页。

⁶⁵ 赖琏：《安定第一，纪律至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第1期，1940年7月1日。

⁶⁶ 《西北学术·发刊词》，《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西北大学学报史料汇编》，2008年，第28页。

还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以科学方法发掘和发扬中华文化；许兴凯从事日本历史研究，被称为“日本通”；陶元珍的明史研究与西南联大的吴晗齐名；历史系师生还对汉代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提出了保护方案，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文化遗迹和民族文化调查，发表大量考察报告。哲学系汪奠基教授是著名逻辑学家，所著《中国逻辑思想史》为第一部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通史；刘及辰著有《近代资本主义思潮批判》《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西周对近代日本哲学的贡献及其实证主义的立场》《近代日本哲学对我国的影响及其研究的意义》等。政经系教授沈志远是中国早期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者，著有《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研究〈资本论〉入门》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罗仲言所著的《中国国民经济史》被列入《大学丛书》，对史前时期到明清两代的中国经济、财政的历史特点，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现代阐述；李宜琛对中外法律以及当时中国的现行法律深有研究；章友江开设《比较宪法》课程，力求以唯物主义论述全国总动员，倡导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及民族团结等问题。教育系教授李建勋领导的教育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国钰还作《荀子心理学观点》，用现代教育学理论发掘荀子的教育思想。家政系教授齐国梁、王非曼与程孙之淑同为第一代留学欧美的家政学专门人才，是创设中国大学家政学系的重要先驱。

其二，放眼世界科学问题，在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大量的理论与应用成果。中国古代文化虽有对于自然世界的思索，但整体来说，中国古人研究自然世界，并没有走上科学分析之路。他们是因为出于对人事的关怀，而去探求自然世界，着重点是为人类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立法。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概念经历了十分痛苦和漫长的过程。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是战时科技学者的荟萃之地，聚集于此的大批科技学者放眼世界科学问题，在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与应用成果，为中国的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学系教授曾炯，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抽象代数的人，被认为是 20 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媲美的中国数学家；傅种孙是我国率先介绍几何基础理论的数学家，其成果被西方数学界认为到达了世界的一流水平；刘亦珩领导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中学数学改革运动。物理学系教授岳劫恒是把旋光学方法应用于金属络合物研究的重要创始人，其研究成果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络合物分子结构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张贻惠首先在国内高校开设原子构造课程。化学系教授虞宏正所开创的“土壤热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创造新型细菌肥料、微生物固氮、同位素农业、地方病与生化微量元素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之霖研制成旧照相底片翻新法，并获得专利；刘拓利用城固的土特产资源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研制蜡烛、烤胶和造纸等，缓解了战时我国物资缺乏的困难。生物系教授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胞质基本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地质地理学教授张伯声创立了“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黄国璋是我国传播现代西方地理科学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工程技术学教授李仪祉是将现代水利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重要先驱；萧连波是我国造纸工业界著名的专家。农学系教授汪厥明是中国生物统计学的创始人；贾成章长期从事光与林木生长关系之研究，是中国林木耐阴性研究的开拓者；殷良弼是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李秉权毕生致力于畜牧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医学系教授蹇先器是中国西医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徐佐夏是中国药理学较早研究者和开拓者；林几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严镜清是国内遗体捐献项目的重要发起人。

综上所述，尽管处在当时尚很偏僻落后的西北，且始终面临着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但西北联大并未临难而退，恰恰相反，她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毅然矢志不渝地坚

守着崇尚高远的精神追求，践履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崇高使命，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不致因抗战而中断，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西北开发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孕育并谱写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于国难中不屈不挠、践行“公诚勤朴”的生动诗篇。如今，75年已经过去，但西北联大的崇高使命自觉并未被遗忘，“公诚勤朴”仍然被西北大学奉为校训，西北工业大学则以“公诚勇毅”为校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则以“诚朴勇毅”为校训。我们相信，西北联大所淬炼出的大学精神，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珍贵遗产和永久财富。

分 论

国立西北工学院丰碑永存

姜澄宇*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2)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周远清会长, 各位领导、专家、同志们: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经过几个月的筹备, 今天在美丽的西安古城隆重开幕了。西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在特殊时期所孕育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 对后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走向和布局, 以及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辉煌业绩, 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作为西北联大和西北工学院直接源流的西北工业大学, 对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 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作主题发言:

一、西北联大的历史功绩应深加挖掘并发扬光大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 是在抗日战争初期, 在祖国的南北两地同时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当时, 两大共同体都分别集中了中国北方大学的精华, 荟萃了中国大学的精英, 一南一北, 比肩齐名。然而, 历史的车轮滚过了 75 年, 西南联大声誉日隆, 西北联大却“养在深闺人未识”, 一如大西北的博大与厚重一样, 不肆张扬, 默默无闻, 以致于几近淡出人们的视野。

其实, 对于西北联大的纪念和宣传, 相关高校长期以来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比如西北大学、天津大学等校学者, 一直关注西北联大, 从事资料收集和研究。西北工业大学近几年来也做了不少工作, 如在旧址汉中古路坝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立碑, 出资几十万元给古路坝村修路并共建新农村等, 但这些都是个别学校的行为, 对西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重要性的共识和相关研究, 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政府部门层面, 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今天举办的发展论坛, 应该视为还西北联大应有历史地位的良好开端。

西北联大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科大学(北洋工学院)、第一流的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规模最为庞大的综合大学(北平大学), 以及颇具特色的专业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 构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整体植入广袤的西北大地,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落后的面貌, 为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不仅如此, 西北联大在特殊环境里所形成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 至今还深刻影响着很多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办学方略。应该说, 西北联大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功不可没, 现在是到了对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进行深入挖掘并发扬光大的时候了。

二、国立西北工学院奠定了中国西北工科高等教育的基础

西北工学院是 1938 年 7 月第一个从西北联大划分出来并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

*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

工学院合并成立的独立工科学院。

1. 抗战时期中国第一流的工科院校。1938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国家最需要的是工程科技人才。当时国民政府把位于北平、天津、东北等地的优秀工科院校内迁至西北，一是想保护好这批学校，让他们以人才和科技支持抗战的胜利；二是希望他们能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枝繁叶茂”。

北洋大学是1895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学校之一。那时出国留学生超过50%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其教育学术水平得到国际认证，她派出去的学生到了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大学，是可以免试读研究生的。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北洋工学院的工科是最强势的学科，以它为基础组成的西北工学院在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工科院校之一。北平大学工学院创建于1903年，原名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东北工学院是1923年创办的东北大学的一部分，该大学规章制度完备，设备条件优良。焦作工学院是英商福公司1909年3月创办的焦作路矿学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也是现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这四所工科高校办学水平在当时都是国内第一流的。

2. 改变了西北工科高校落后面貌。西北联大组建之前，西北地区几乎没有工科高等教育。为矫正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国民政府行政院确定“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紧接着，又将国立西北联大改组，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等五所国立大学。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大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这与西南联大诸校临时迁移有明显的不同。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至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拥有了学科较为齐全、水平很高的高等教育体系。

3. 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奠定了高起点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从1947年到1957年十年时间，西北工学院部分院校复原，回到了天津、北京、沈阳，但组建时的四大工学院，都有一批优秀教师留了下来，因此，西北工学院的实力并没有明显减弱。解放后到1951年国家院系调整前，西北工学院仍有土木、矿冶、机械、机电、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九个系，是国内系科最全的工学院之一。

五十年代初国家对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西北工学院多数系科被调离，支持国内兄弟高校。首先把航空系合并到清华，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专业并到北京石油学院，矿冶系分并到北京矿业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土木系并到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纺织系分立为西安纺织学院。1955年国家又决定把西工办成国防工业特色院校，这样民用工业系科全部分出去了，到1956年5月，改建后的西北工学院只设第一至第四机械系和12个专业，其中大部分专业与国防军工有关。

西北工学院从1938年建立到1957年合并总共存在了19年时间，它诞生在西北的陕南山沟，成长在古都咸阳，最后在西安与西安航空学院（原华东航空学院）合并，深深扎根在大西北的沃土。今天，除北京的四所高校有西北工学院分出的专业外，西安有六所高校都与西北工学院专业密切相关。可以说，西北工学院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奠定了高起点的基础，起到了播洒种子和母鸡下蛋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国立西北工学院对中国工科高等教育影响巨深

西北工学院作为当时工科专业最为齐全、办学水平最高的知名高校之一，其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对后来我国工科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先进独到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西北工学院前身的四所高校，均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办的极负盛名的一流工科大学，合并之前都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和文化理念。如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之时，就以“西学体用”办学模式定位，采取的是一步到位的先进办学理念。西北工学院在国破校散、颠沛流离的艰难时期，汇聚四校精英，坚持了四校先进的

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确立了“精英教育”的办学思想。著名水利和土木工程专家李书田先生在主持筹建西北工学院期间，坚持“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宁缺毋滥”的办学原则；先后长期担任西北工学院教务长和院长职务的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潘承孝先生，以严格治学、严格管理为国内同行所瞩目。

1939年西北工学院确立了“公诚勇毅”院训，开学典礼时潘承孝教务长专门进行了讲解，要求师生“献身工程界，克服当前之千万困难，为母校争光”。这一时期还制作了院旗，谱写了院歌。这些院训院歌，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作为西北工业大学的校训校歌，一直沿用至今。

2. 注重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潘承孝先生主政期间，十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强调要打好扎实的基础。他提出：一要有好的校风，二要重视抓基础，三要加强实验教学。他自己身先士卒，对教学精益求精，讲课之好，受到每一个学生的欢迎。学生大多数课程由教授承担，学院成立之初，教授占教师队伍的73%，其中很多是留美英归国的知名教授。西工教学除注重基础和实验课程外，还具有专业课广而多以及重视人文科学的特点。教育管理严格，新生入学考试，低于规定分数线者，一律不予录取。对学生缺课、旷课超过授课课时数一定比例后，都有重修、休学乃至令其退学的规定。这种“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是今天工科高校仍在坚持的办学方向。

3. 刻苦努力的学习风气。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西北工学院学生怀着“科教救国”，共纾国难的抱负，学习十分努力和刻苦。这里我愿意用当时流传的“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佳话来说明。所谓“坝”即古路坝，西工所在地，1940年10月起，由于学生人数增多，就在离古路坝不远的“七星寺”设立了一年级分院。著名材料学家师昌绪院士是1941年入校的西工学生，据他回忆：当时他与八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院士同住一间宿舍，竟然几个星期不见一面，原因是师昌绪每天吃了晚饭就去教室看书学习，一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回宿舍；回宿舍时，高景德又出去学习了。那时学生分两批，一批学到半夜两三点钟，另一批是从两三点钟学到凌晨。山区没有电灯，都是蜡烛和煤油灯，由于“开夜车”的学生都衔接起来了，教室灯光彻夜通明，夜里从远处看，点点灯光错落有致，所以有此独特景观。师昌绪先生讲，那时的学生有着一股近似于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用功劲头。抗战时期，教育部每年都要组织全国性的高校四年级学生专业考试，每个专业全国只取一名。1945年，西工一下摘取了数项桂冠，轰动了西北各校，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西工学生连续几年考取公费留学生人数也是全国各高校中最多的。

4. 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以及随后分立出来的五所大学，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培养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和国防建设的杰出人才，犹如朗朗星空，璀璨夺目，其中又以西北工学院毕业的杰出校友格外耀眼。抗战8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近两千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分布到了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让我们记住为共和国建设居功至伟的专家名字：师昌绪、高景德、吴自良、史绍熙、李恒德、叶培大、张沛霖、雷廷权……据不完全统计，西北工学院19年里的教师和学生，后被评为两院院士的有13人；副部级以上干部11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等；在高等院校担任正副校长以及在科学院系统研究所担任正副所长的有50余人。

5. 科教救国、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抗战国难当头，许多有志青年毅然走上了科教救国的道路。四校一院从平、津、冀沦陷区迁到西安，远辞故园，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天上敌机轰袭，地面交通阻滞，其状极为感人。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师生千余人，长途跋涉，徒步250公里，过渭河、越秦岭，尝尽艰辛，历时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汉中。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非常艰苦，西工教室是泥房，晚自习没有电，学生用自制油灯照明，教师上课经常没有粉笔，更谈不上实验设备和条件了。面对抗战期间

飞涨的物价，教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是这样，广大师生仍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严谨治学，刻苦学习。师生们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据统计有130多名学生直接奔赴前线，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四、国立西北工学院等名校铸就了西工大今日之辉煌

为适应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西北工学院先后与西安航空学院、军事名校“哈军工”麾下的空军工程系合并，三脉汇聚，强强融合，群英荟萃，大师云集，共同成就了西北工业大学今天的辉煌。

1. 西北工学院奠定了西工大学科基础。西北工学院孕育了顶尖毕业生和优秀的教授群体，一大批著名教授留校长期任教。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方针、教学制度等方面西工大也多有继承。如西北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是现在西工大材料学院、机电学院的肇始；1956年西工大设立的水雷和鱼雷专业为今天西工大航海学院奠定了学科基础，成为西工大航空、航天、航海三大特色的重要一翼。

2. 西工大继承和发扬了西北工学院的精神文化。科教救国，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在战乱频仍的岁月，西工人秉持“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直面艰难困厄，将学院的命运与祖国休戚相关。今日，西工大师生发愤图强，心系国防，将祖国的西部作为砥石砺金的沃壤。从西北工学院“公诚勇毅”院训到西工大“三实一新”校风，老西工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和延伸。

3. 西工大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工大已为国防科技工业和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15万多名科技人才，培养了我国6个学科的第一位博士；校友中已拥有30多位两院院士、30多位将军；一大批校友成为国防科研、党政机关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和栋梁人才。中航工业集团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在集团下属三大主机所（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三大主机厂（西飞、成飞、沈飞）担任总师（副总师）、重大型号总师（副总师）、特级专家、党政领导及国家三大奖获得者中，西工大校友占60%以上；2011年，中航工业隆重表彰了航空工业60年10位航空报国金奖获得者，西工大校友占了6位。在中国航天领域，从早年的“航天三少帅”（西工大有两位，张庆伟和雷凡培），到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再到“中国航天液体动力掌门人”谭永华、“中国航天固体动力掌门人田维平”都出自西工大；在中国船舶和水中兵器领域的领军人物队列中，同样活跃着一大批西工大精英。6位校友分别当选历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英才辈出，不胜枚举。这一系列的人才培养成就，形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独有的“西工大现象”。在科研方面，西工大发挥集成创新优势，以承担和完成国防重大工程和型号项目见长。在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重大专项中都有不俗的建树。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大工程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重大贡献奖，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国庆60周年大阅兵无人机方队所展示的全部三个型号均由西工大研制。

西工大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发轫于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西工大师生执著地守护、秉持、弘扬西工精神，不移于艰难，不困于险阻，艰苦创业，自强不息，遂使真知薪火相传，桃李繁茂相继，使西工扬英名于战时，著妙誉于当代。

谢谢大家！

抗战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高等工程教育

王少安， 张尚宇， 洪振涛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焦作 454000)

抗日战争时期，始建于1909年、地处中原的我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私立焦作工学院（今河南理工大学）奉命西迁，与当时的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开启西北工程高等教育之先河，在陕南古路坝度过了八年峥嵘岁月，巩固和发展了后方工程教育，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灿烂篇章。

一、勇挑国难：私立焦作工学院西迁办学的始末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焦作工学院西迁办学，是中国抗战期间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和勇挑国难、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高等教育根基的图谋，开启了我国战时高等教育迁移内地、保存实力、服务西部、抗日救国的壮丽实践。

1. 西迁办学：救亡图存的非凡壮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汉铁路继续向南进犯，迅速把战火燃烧到豫北，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为了不使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沦入敌手，院长张清涟迅即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慨前车之可鉴，允宜未雨而绸缪，拟在紧急时期，择定安全区域，预将图书、仪器、机械、文卷、表册等件之一部或大部，迁移保存，以备将来之用。”在征得同意后，中福公司总经理、常务校董孙越崎权衡迁校地址之利弊，命令学校“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实习工厂的机床等教学用具，连同教职员和学生一并迁往西安。”^①10月20日，院长张清涟率师生将160吨仪器设备和图书全部搬上由孙越崎亲自安排的铁路车皮，假道郑州，举校西迁，于24日抵达西安。因学校与先前已迁建西安的西安临时大学和东北大学商谈合作事宜未果，为不使教务停顿，遂单独觅定校址，租借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部分教室及西京机械修造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西北高等教育由此新增一支重要力量。次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军铁蹄攻占风陵渡，开始派军机侵扰轰炸西安。为给学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学校决定再迁甘肃天水。由于当时陇海铁路刚通至宝鸡，且公路运输力量极其薄弱，全校师生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长途跋涉500余里，“峡谷寒风，陇州暮雨；关山晓月，驿路晨霜；山泉冷饮，冰河盥漱，行歌道山，谈笑峰巅”，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完成迁校任务，成为天水最早的高等学校。不久，学校以天水南郊水月寺为临时校舍开始上课，并在水天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祭出了“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设，当前责任不让人”的楹联，演出了抗日救亡话剧。是年暑假，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在天水毕业。

焦作工学院的西迁办学，不仅为战时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而且在西部地区播撒了科学文化的种子，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敌后的深入开展。尤为重要的是，焦作工学院并没有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和省内各学校一起迁往豫西南，而是撤迁中国大西北，从而减少了战火袭扰，免受当时如河南大学“谭头血案”之劫，保全了中国第一所矿业大学的文

^① 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

脉，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奠基留存了实力。

2. 合并改组：抗战救国的教育实践

在焦作工学院西迁天水之际，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的西安临时大学，也奉命迁往陕西城固，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独立建院。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集中师资和设备，巩固发展后方工程教育，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①，并附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对筹委会的组成、经费支配、院系编制、教职员、学生、校址、校产等事宜作了原则规定。8月10日，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任筹委会主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文华和教育部代表张北海等为筹备委员。13日，通过筹委会《组织大纲（草案）》。18日，确定校址暂设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设置教务处、总务处、训育处等管理机构，以及矿冶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工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水利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系和工科研究所、学术推广部、矿冶研究部等教学科研机构。9月6日，通过学校组织规程和计划大纲。10月，招收首批学生，11月，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院长张清涟率领下，从甘肃天水乘汽车整建制迁入国立西北工学院，图书、仪器及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分别从西安、宝鸡、凤翔、天水运往城固古路坝。11月12日，西北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西北工程高等教育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实现了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四所名校的强强联合，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大学。如《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院史概略》所载：“四校在战前，办理完善，声誉素著，本院集四大工程学府之精萃而成立，虽经乱离，而教授人选，图书仪器，亦复蔚为大观。”^②焦作工学院也由此开始了八年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

3. 洛阳复校：情系桑梓的薪火传承

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焦作工学院随校西迁的师生主要分布于矿冶工程学系和土木工程学系。他们在古路坝潜心执教、发奋学习的同时，仍情系桑梓、心怀故土，时时怀念在焦作工学院的美好时光。特别是共同奋斗经历所熔铸的焦工精神，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把焦作工学院的师生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但与此同时，“过去之历史，日久不彰，未来之重任，事浮莫属”^③的担忧也时常在原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的心头萦绕。为“联络情感、砥砺学行，辅助母校发展”^④，负起继往开来之使命，在张清涟倡导下，1939年6月12日，原焦作工学院师生在陕西城固五圣山成立校友会，通过《焦作工院校友会总会简章》，推举张清涟为校友总会会长。校友会最初下辖西康、甘青、西安、城固、重庆5个分会，并设计制作了校友徽章。1942年10月，编印《焦作工院校友录》，张清涟在序言中勉励校友：“如何发扬旧精神，如何树立新生命，皆为本会之职责。愿与诸校友共同策励之！”^⑤这些举措，对于加强校友联络、凝聚焦工师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后来焦工复校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西北工学院内载歌载舞、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复校大计也开始在焦工师生心中酝酿。8月31日，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在陪都重庆成立，孙越崎等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尽快复校并由张清涟参加全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6074号训令，1938年7月27日。

② 《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院史概略》，1948年6月。

③ 张清涟：《焦作工院校友录·序》，1942年10月10日。

④ 《焦作工院校友会总会简章》，原载《焦作工院校友录》，1942年10月出版。

⑤ 张清涟：《焦作工院校友录·序》，1942年10月10日。

国教育复员会议。信中指出：“焦作虽属小镇，地处晋冀豫三省工矿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本院设置于此，允称最为适宜。”^①10月15日，教育部批令国立西北工学院将原属焦工的图书仪器设备归还，以利焦作工学院在原址复校。但受时局影响，焦作工学院先是落脚开封，与国立河南大学互助合作，继续筹备复校大计；后最终于1946年在洛阳关林复校，当年招录新生232名，11月15日正式上课。至此，辗转飘零九年之久的焦作工学院得以浴火重生。

焦作工学院的成功复校，既是战后教育复员的大局使然，更是焦工精神凝聚、焦工校友极力斡旋争取的结果。它不仅使得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文脉延传，“其灵光巍然，弦歌未尝一日辍”，更激励着广大师生和校友“提起精神，创造青出于蓝的新牌子，建设新焦工”^②，并在后来孕育出河南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矿业高等学府，成为我国矿业高等教育的发源与中坚。

二、矢志不渝：鼎力支撑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发展

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年代，焦作工学院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雄厚的师资设备、丰富的办学经验、优良的办学传统，鼎力支撑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办学，为巩固和发展抗战后方的高等工程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

1. 同舟共济：开启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先河

早在焦作工学院筹备西迁之时，常务校董孙越崎即明令学校：“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③西北工学院筹建时，西北联大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经多次迁徙，图书、仪器、设备几乎损失殆尽。而焦作工学院至1935年物理、化学、地质、采矿、冶金、试金、测量、材料、水力等仪器设备、矿物标本、土木模型总值已达125479元，^④西迁办学时，除个别特大型设备外，其图书、仪器、设备及实习工厂机器几乎是完整西迁。运抵古路坝时，雇佣汽车约87辆次。^⑤1938级校友师昌绪在回忆西北工学院时说：“那时我报考矿冶系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那时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开矿炼钢当属首位；二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福中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到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报考了矿冶系。”^⑥此外，西工的图书馆藏书也主要来自焦工，1940年馆藏的15257册图书中，来自焦工的图书就达13101册。以至西工筹建时，他校师生但凡见到焦工师生，言必问“焦工图书来了没有？”^⑦正如孙越崎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⑧

事实上，焦作工学院对西北工学院的贡献，远非仅限于仪器、图书等硬件条件的支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校已汇聚了一大批“留学欧美，在彼邦有工程经验，在海内有教书成绩”的师资队伍，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⑨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西工筹建时焦工教授不下15人（四校共有教授62人）；在三组共5人的接收委员会中，焦工就

① 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为呈请准予复校并令本院院长张清涟参加全国复原会议由》，1935年8月31日。

② 张清涟：《在复校第一次纪念周上的报告词》，1946年11月18日。原载《焦作工学院院刊》创刊号，1947年5月16日。

③ 《焦作工学院学生会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呈文》，1937年10月23日。

④ 《私立焦作工学院一览》，1936年5月。

⑤ 《焦作工学院迁移费预算表》，1938年。

⑥ 师昌绪：《回忆在西北工学院时的几件事》，1981年1月。

⑦ 陶秉礼：《西北工业大学校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1页。

⑧ 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

⑨ 《私立焦作工学院一览》，1936年5月。

占了3人。特别是后来担任西北工学院事务主任、训导长等职的张清涟院长，为我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冶金学家，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毕业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其“学识优良，经验丰富”，“颇能兢兢业业，锐意精进，处理校务，亦擘划有方。”^①他们将焦工的丰富办学经验和优良办学传统带到西工，与其他三所高校风雨同舟、戮力同心，终于使得西北惟一工程高等学府放射出灼灼其华的耀眼光芒。

2. 作育栋梁：打造高等工程技术人才基地

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后，焦作工学院的教职员大多留任于各学系、研究所（部）及管理部门。张清涟、胡季纯先后任事务（总务）主任；任殿元、马载之、李余庆、石心圃、朱端、张卯均等任教于矿冶工程学系，任殿元教授为该学系主任；谢光华、徐百川、胡季纯、许继曾、沈季良、杨大金等任教于土木工程学系；彭荣阁、余立基等任教于水利工程学系；张景淮等任教于航空工程学系；马书润、唐绍宗等任教于化工工程学系；杜春山等任教于机械工程学系；王允升为公共学科体育副教授。王洪涛、王魁元、李振亚、曾冀泉、王喜麟、李树栋、胡昌来、樊宝莲等任职于各事务部门。^②由于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他们只有租住在天主教堂附近当地人喂牲口或堆放杂物的房子，白天忙于授课，夜晚则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教授月薪500元左右，1942年8月，每袋面粉也涨至500元左右，其窘况不言而喻。”^③但他们依然刻苦钻研，严谨执教，颇受学生敬仰。如马载之教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讲课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启发有术，是著名的授课名师。西工合组时，他校师生凡见焦工师生，必询问“马载之教授来了没有”^④。李余庆教授“嘉惠后学之精神，极堪敬仰”^⑤。青年讲师袁耀庭学业基础深厚，教学内容娴熟，分析问题透彻，思路敏捷，讲授得法，效果出众，深受学生推崇，被誉为当时西工的“四大金刚”之一。^⑥由此可见焦工教员在当时的影响。如张清涟所言：“自是本院教务暂告停顿，前途发展，不无影响；然本集中力量之原则，以辅助战时教育计划之实施，其作育人之精神，初无二致。”^⑦

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初期共有8个学系，其中矿冶工程学系为焦工采矿系和北洋矿冶系合组而成；土木工程学系为焦工路工桥梁系与东工、北洋土木系合组而成。当时，学生虽只能挤住在教堂的桶仓式房子里，依靠政府发给的菲薄“贷金”维持学业，但他们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在艰苦的环境中练就了坚毅品格，以至于古路坝和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处处闪烁，“古路灯火”遂成战时高校一大奇观。这一时期，西北工学院先后招收学生2330人，原焦作工学院八个班的学生共97人分别于1939年至1942年毕业。^⑧孙越崎曾深情地回忆说：“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抗战后方新兴的工矿企业和交通发展提供技术力量。很多毕业生被聘到甘肃玉门油矿和四川天府、嘉阳及威远等煤矿工作，其中不少人至今尚在国家重要企业中负责煤矿技术工作。”^⑨

3. 考工致用：探求抗战建国之需工程学术

焦作工学院以“教育英才，备物质建设之先锋；从事研究，求吾国学术之独立”^⑩为使命，向来重视学术研究。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学校因应抗战救国和西北地区生产事业的现实需要，成立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和工程技术推广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工

① 戴夏：《河南省私立焦作工学院视察报告》。原载《视察河南省教育报告》，1933年10月。

② 《河南理工大学史》，中华书局2009年9月版，第16页。

③ 《西北工业大学发展概要（1938~2002）》，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④ 陶秉礼：《西北工业大学校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1页。

⑤ 《西工友声·人物动向》，1943年第4期。

⑥ 陶秉礼：《西北工业大学校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1页。

⑦ 张清涟：《焦作工学院校友录·序》，1942年10月10日。

⑧ 《河南理工大学历史文化概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页。

⑨ 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

⑩ 张清涟：《私立焦作工学院二十周年纪念会报告词》，1935年6月1日。焦作工学生，1935，2（1—2）：5—6。

矿技术改良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任殿元主持矿冶研究部工作期间，积极推动调查研究工作。1939年，工程学术推广部附设的化工实验工厂研制成功肥皂、蜡烛。1942年，矿冶研究部的石心圃教授经过调查研究，撰写出《关于调查沔县、略阳一带煤铁等矿并采集矿物及岩石标本的报告》，指出：“沔县民生公司所产之煤，经试验所炼之焦（炭），为全省之冠，沔县窑沟及略阳一带铁矿质量均佳。”同年，教育部拨款15000元，指令矿冶研究部调查西北矿产，研究部指派石心圃、马载之教授为该课题的实际承担人。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半年，撰写了《佛坪县铁矿调查报告》，认为佛坪铁矿“矿质纯洁，硫磷极低，为炼钢之上品”。1943年，任殿元、石心圃教授到汉中调研略阳一带之土法炼铁之改良问题，并草拟了《改良土法炼铁之说明及试验计划》。此外，1941年，矿冶系李余庆教授被聘为青海西宁西北区采矿处总工程师，技术服务近一年，1943年，他与图书馆王洪涛主任在陇南主持金矿开采。这些科学研究实践，为扩大抗战时期战略物资的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奠定了西北工程学术的基础。但由于受研究经费、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所开展的研究大多面向生产现场，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高层次基础理论研究不多。

与此同时，学校于1939年6月成立了编译委员会。鉴于焦工创办学术期刊的经验，编译委员会三级领导全由焦工教职员出任：张清涟任主席，杨大金任专门委员，李振亚任出版组组长。张清涟主持通过了《编译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委员会以“编译书报，发扬工程学术及有关自然科学”为宗旨。9月，编辑出版《国立西北工学院季刊》，栏目分论著、计划、调查、设计、特载、杂俎等，刊发“富研究性之工程论著，或调查及与抗战建国有关之具体建设计划”。院长赖琰在《发刊词》中指出：“吾国工程刊物，无论数量与质量，均难与欧美各国相比衡。在此抗战建国之大时代中……工业人才已感供不应求，工程刊物尤有尽量扩展之需要。”“今更编纂定期季刊，发表本院师生研究考察之所得”，旨在“增进全国技术人员研讨工程学术之兴趣”，为西北开发“树之风声”。学校编译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国立西北工学院丛书》、《国立西北工学院通俗工程丛书》。1940年，学校创办期刊《西工友声》，刊登“服务社会之经验，研究学术之心得，以及改革事业之建议”等方面的论文。这些刊物的创办，对于提高学校的学术知名度及追求学术研究之独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文化长征：高扬在西北高等教育的焦工精神

焦作工学院西迁之前，已有近30年的办学历史，在“实业报国”思想的激励下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品质，熔铸形成了焦工精神。西迁办学不仅是一次人员和物资的迁徙，更是一次文化的长征，焦工精神对于西北工学院的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矿魂斯扬：办学宗旨之坚守

焦作工学院的前身焦作路矿学堂，最早是在“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下，为“培养路矿专门人才”而创立的。及至后来“养成采矿冶金专门人才”、“教授工程学术，养成建设人才，以应社会之需”，再到“研究高深学术、培植专门人才”，无不体现了学校服务工矿的办学宗旨与方向，彰显了“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的办学目的与价值。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使得焦工的矿冶高等教育非但没有中止，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据1948年6月《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记载，从1939年至1946年，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学生394人；矿冶工程系毕业学生165人，其中采矿组107人，冶金组58人，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沛霖、李恒德、师昌绪、刘广志、傅恒志等是这一时期矿冶系杰出校友。矿冶研究部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石油地质组，这也是焦工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践。1939年张清涟在《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诗中写到：“邇来古路坝，弦歌满山丘……煤田问疾苦，生产羨美欧”^①，显示了学校培养矿冶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已延续至西工。这一时期，西北工学院确立了“以

^① 张清涟：《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1939年7月1日。原载《梅荫集》，1994年铅印本。

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及发展西北地区工业”的宗旨，这于焦工之办学宗旨，既有传承，亦有创新。学校在西北地区开展的陕南煤矿勘测、广元和昭化等地金矿调查、两当山磺矿设计等一系列科考与研究活动，也充分彰显了服务于国家工矿业发展的崇高追求。

2. 通专并重：教育思想之传承

在西迁之前的近30年办学历程中，焦作工学院形成了“学富”和“学贵专精”、“学重专门”相结合即通专并重的教育教学思想。张清涟主校时，曾针对课程设置提到：设置国文、经济等普通课程，是要“培养工程师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并授以发表意见之技术与实际工作之境地，范围广博，用意精微”；设置算理化图等基本课程，“所以起工程学术之宏规，验学生个性之适宜与否，乃解决择业问题之最后阶段也”；设置土木、机电等辅助课程，“所以辅助采矿冶金各项工程使有实现之可能也”。^①西迁办学时期，“通专并重”的教育教学思想得到传承与发展。全校九个学系一年级公共课程和基础课设置完全相同，学生不分系科混合编班，二年级各系课程完全相同，三、四年级分专业精心进行课程设置，这与1930年代焦作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如出一辙。1940年，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在对第二届毕业生的训词中指出：“工程人员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更应有充分的普通知识；否则，一旦观感幼稚，判断谬误，小之被人讥为坐井观天，大之就可影响毕生的事业……纵有专门技能，也难成为健全的工程人员。所以，你们对一门自应精通一切，对其他部门，也应略知梗概。”^②这一教育教学思想，对于西北工学院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影响，也是这一时期毕业生中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荟萃，名家、大家迭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 学用结合，教学理念之发展

作为一所培养工矿人才的大学，焦作工学院坚持学用结合、尤重达用的教学思想，把学生实验和实习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务校董李文浩认为：“研究科学，专从书本上用工夫，犹如闭门造车，难以合辙，隔靴搔痒，不得要处，结果不能成功，必须要于研究科学的时候，同时对于自然界的有机体无机体，作实际的考察，俾理解其现象与原理，则科学的知识才能充分。”^③在焦作办学时，学校充分利用与中福公司矿厂关系密切之便利，组织学生深入矿厂实习，使讲授和实习之比相差无几，着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便学生“朝夕渐摩、易有心得”，“学理与应用互相证明”。合组西工后，这一教学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学校把实习和实验视作“创作和发明的祖先，有了它，才能造出宇宙间的奇迹来”^④。因此尽管抗战时期经费紧张，学校还是尽力补助路费，鼓励学生利用暑期到工厂实习，以使“学生在校时，一面课以书本，阐明理论；一面授以实际工作，供其揣摩，二者互相引证，事半功倍，俾将来服务社会时，一切问题，均能得心应手，而无格格不入之苦。”^⑤学校依此原则鼓励学生深入生产一线，以工程技术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验证所学知识。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专业基础知识扎实，而且实践动手能力强，科研探索意识浓，毕业后能很快胜任工作，以致毕业生不敷分配，广受社会欢迎。

4. 人格涵育：公诚勇毅之源头

焦作工学院历来十分重视学生的人格修养教育，提出了具体的修养标准，如“抱定力、爱名誉、服勤劳”^⑥，“力戒懦弱苟安，养成勇敢奋发之精神”；“力戒依懒敷衍，养成自立负责之能力”；“力戒轻躁盲进，养成审慎周密之思考”；“力戒浪漫奢靡，养成刻苦勤朴之习惯”；“力戒虚伪涣散，养成精神团结之意志”；“力戒自私自利，养成爱国爱群之观念”。^⑦特别是

① 《国内四校采矿冶金学系现行课程标准之检讨》，矿冶，1936，8（29—30）：5—14。

② 赖琏：《敬告本院第一届毕业同学书》，西北工学院季刊，1939（1）：2—4。

③ 李文浩：《李监督在工学院开学讲演辞》，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2出版。

④ 《西工友声·母校矿冶陈列室概况》，1941年3-4期合刊。

⑤ 赖琏：《西北工学院季刊·敬告本院第一届毕业同学书》，1939年7月31日。

⑥ 《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演说辞》，1915年6月1日。

⑦ 《焦作工学院周刊》，1932，（26）：6。

常务校董李文浩关于“我的观念”训育思想，认为要“在切身处所尽力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维护元气，为国家制造实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努力用功”^①，对于焦工师生的人格涵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些精神的感召下，焦工师生积极参与或领导了反帝保矿运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南下请愿抗日救亡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在风雨洗礼中铸就了独特的精神品质：“本院同人，素具同舟共济之精神；本院同学，向有朴实耐劳之习惯。”^②“本院学风醇朴，来学者多刻苦求学之士，课余之暇，率多游览矿厂，参观工程设备，绝少浪漫奢靡之风。”^③“为国家争人格，为母校增光荣”^④早已融入焦工师生的精神血脉。合组西北工学院之后，焦工的文化精神与西北联合大学“公诚勤朴”校训相结合，逐步发展成“公为天下、报效祖国，诚实守信、襟怀坦荡，勇猛精进、敢为人先，毅然果决、坚忍不拔”等精神特质，形成“公诚勇毅”的校训，不仅成为西工师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精神支柱，更激励着历届学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它不仅保全了焦作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四大国内高等工程学府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而且推动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战时亟需人才，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西北工学院留下的丰富教育思想和优良学术传统，仍值得我们在新时期继续传承与发扬。

① 李文浩：《李董事长在工学院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演说》，1932年5月29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6期。北平：北平震东印书馆，1932。

② 《焦作工学院之展望》。原载《焦作工学生》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33年9月出版，第5—6页。

③ 《焦作工学院周刊》第四卷第5、6期合刊，1935年10月7日出版，第5页。

④ 张清涟：《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1934年10月。原载《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1935年出版。

从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建立看我校 对中国农业的贡献

赵 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1934年建立的西北高等专科农林学校经过近80年的发展,成为今天全国“211”和“985”建设序列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校自建立以来,始终发挥农、林、水学科优势突出的特点,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道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坚持“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信念,坚持为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特别是1999年合并组建后,积极探索“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有利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在学校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推动模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高等学校;科教体制改革;农业科技推广

《高等教育专题规划》指出:“高等教育是国力强大、民族昌盛、社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文化的重要任务。”我校作为高等农林院校,从1934年的西北高等农林专科学校,发展到今天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发挥我校农、林、水学科优势突出的特点,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特色办学之路,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把学校建成卓越农林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农业高新技术的重要创新基地、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重要推广示范基地,为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战略性贡献。

一、以“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为信念,

坚持为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服务

四千年前,神农后稷在杨陵“教民稼穡,树艺五谷”,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八十年前,于右任先生、杨虎城将军等有识之士在后稷故里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奠定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第一块基石。学校创建伊始,归并了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和陕西省水利专科班,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和河南大学畜牧系并入;1950年兰州大学水利系并入。

早在1934年建校之初,学校就高度重视教学、科研与农业生产实践有效结合,确定了“未建系组,先办场站,未开课程,先抓科研”的办学思想,以复兴中华农业为己任,形成了“切实从事于农场、林场实际工作”、“与农民生活密切联系”等人才培养理念,“要造就高级农业指导人才”,“以期担负发展西北经济事业之重大任务”,学校在组织机械中设置了农业推广处,统盘筹划和推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并在周边农村建立了若干试验场站,作为教学、科研和推广的有机结合体,师生在此进行实习、试验,开展研究和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工作。

*赵忠(1958—),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北农学院的成长和杨凌十大科教单位的衍生，杨凌成为中国著名的“农科城”，教育单位和科研机械之间以农水相关领域研究为共同基础，互促互动，相得益彰，共同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由于我校长期远离城市、植根农村，客观上实现了师生与“三农”的零距离，积淀出亲近农业、亲近农村、亲近农民的优良传统。上世纪50年代，“小麦癌症”——条锈病的变异和蔓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小麦生产。为解决几亿人的生存吃饭问题，赵洪璋院士集中瞄准条锈病的攻克，开展小麦新品种选育，并成功培育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抗病小麦新品种——碧蚂一号，让中国小麦的亩产量从100多斤增加到400多斤。赵先生被毛主席赞誉为“你的碧蚂一号挽救了一个新中国”。朱显谟院士，针对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流进河床，形成“地上天河”，中下游连年泛滥成灾问题。朱先生长期从事水土保持研究，在对黄土高原形成原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源；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抓）”，为生态建设和黄河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黄土高原穿上了崭新的绿装，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从16亿吨减少到2.6亿吨，极大地造福了我们整个国家。

二、探索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迫在眉睫

我国现行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其思维方式、运行机制是按计划经济的要求设计和运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科研、推广、生产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分户生产、分散经营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原来建立的科技面向农村社、队的集体组织，转变为科技面对分散的、组织化程度较差的一家一户的广大农民。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30%—40%，成果转化普及率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如何建立一种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促进农业科技入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快速发展，科技成为农民增收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发展产业对科技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农民渴望致富对科技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并且由过去的以粮食生产和种植业为主的季节性需求转变为常年的经常性需求，由单一性需求转变为多样性需求。结合农民经常性、多样性需求，尊重农民的愿望，建立一种大学农业科技成果与农民的紧密联系和有效对接机制，使农民尽快了解、学习、选择和应用农业科技知识，建立大学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便捷通道，发挥大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就是探索和形成一种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实现科技与农村、专家与农民、技术与生产的有效对接。

（二）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1999年，地处杨凌的两所农林高校和五所科研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被国家赋予了探索、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历史使命，按照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思路，积极推进科教体制改革，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炼建校以来科技推广工作经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提出“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并积极实施。探索实践“大学+试验示范站（基地）+科技示范户+农民”的推广通道，初步形成了以农业试验示范站（基地）为载体，以试验示范、科技培训、信息服务为支撑的科技推广模式雏形，初步总结了大学与地方政府、基层农技部门、涉农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示范户、农民有机结合的模式与机制，为新形势下我国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 在国家粮食主产区构建示范推广基地

学校位于关中平原，与东部的黄淮和江淮平原的国家粮食主产区纬度相当，生态环境相近，农作制度相通，小麦、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品种通用性强。这是 20 世纪后半叶起始于杨凌的著名小麦良种“碧蚂一号”、“小偃六号”等得以迅速覆盖中原大地的重要因素。两个品种在黄淮麦区种植面积逾 2000 万公顷，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几年，学校借助于推广模式的构建，进一步和苏、鲁、皖、豫的地方政府、农技部门和种子企业紧密合作，联手建立了 20 个小麦新品种展示园；在皖、苏、鄂建立了 10 个油菜新品种展示园。2010 年学校在各省的新品种覆盖面积逾千万亩，在河南的种植面积就达 600 万亩，成为该省小麦品种四强之一。

在产区建立品种示范园，使前期的品种选育放在生产区，通过实践发现不足，及时调整，同时也可逐步形成适宜产区的配套栽培技术，使良种与良法紧密结合，农民容易掌握。

2. 在优势产业中心建立试验示范站

“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是我国农民的特点。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是展示科技成果的重要窗口，是农民看得见、摸得着、跟着学的典型样板。近年来，根据推广模式探索的总体思路与目标，依托学科优势，结合区域农业主导产业发展需要，我校先后在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地依照不同类型产地。覆盖了林、果、茶、桑、瓜、菜、杂粮、水产等数十个方面，其分布为陕北的红枣试验站，小杂粮示范园，绒山羊示范基地；渭北高原的白水苹果试验示范站；关中的蔬菜、甜瓜、猕猴桃试验示范站；陕南的安康水产、石泉蚕桑、西乡茶叶、山阳核桃试验站；青海乐都的设施示范园；甘肃泾川的设施蔬菜基地；宁夏固原的小杂粮示范基地等。此外，学校还与陕西宝鸡等政府合作建立了 32 个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实施了陕西省“生态校园创新工程”，建立了 8 所农村生态校园示范学校，有效地拓宽了学校科技成果的推广辐射范围。

3. 在国家级贫困区构建科技扶贫试验示范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了响应国家科技扶贫攻坚的工作号召，学校受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委托，在生态脆弱的宁南山区西海固设置了半干旱的固原陶庄旱作实验示范区和半干旱偏旱的海原旱农试验示范区，依托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任务实施科技扶贫。通过调查和研究，在已有的水分生产力研究基础上，围绕构建有利于农牧综合降水利用效益提高的种植结构核心，从探究宁南粮食作物降水生产潜力入手，提示障碍因素，成功地组建了以紫花苜蓿种植面积为突破口，有助于强化农牧结合的“草—畜—肥—粮”节水型农牧生产结构，称之为“陶庄模式”。并以此扩大延伸，在半干旱偏旱地区的海原县二道沟基点，实施以“压夏扩秋”为主题的种植结构优化，构建成有利于降水效率得以整体提升的海原模式。经受了几个周期的干旱、丰水、贫水年型气候考验，已为宁南旱区农民广为接受，并成为今日宁南种植模式主体。固原市的粮食产量 30 年间大致以 10 万吨的增量，连续跃升 4 个台阶。人均占有粮食突破 400 千克，奠定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基础。

三、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一）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是深化科教体制改革，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教育和科技的支撑。农业高校不仅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也应该是服务现代农业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特别是农业高校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有其他高校不可比拟的优势。建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构建聚集大学社会服务力量的大平台和网络体系，有利于发挥大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综合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组建，是世纪之交我国科教体制统筹改革的重大试验，学校合并组建以来，通过科教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体制框架，同时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模式上进行了重要实

践。组建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既是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客观产物，又是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新体制的战略举措。我校提出的“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为我国农业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子，被赞誉为高校服务“三农”的一面旗帜。建设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是对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探索的拓展和提升，必将有效克服长期形成的科研主体与推广主体“两张皮”的问题。有效解决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为我国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二）建设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1. 深化学校科教体制改革，增强社会服务功能

学校将以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办学新体制”为契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整合学校科教资源，将建立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作为学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大平台。通过组织管理，人事制度、激励机制、考评体系等改革，调动广大科教人员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2.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由陕西省政府、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依托我校建设，并积极吸纳相关地方政府、农业科教单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建设，形成以政府为主、多元化的投资建设机制。研究院由社会参与管理，实行理事会制度。

3. 拓展“政府推动下的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

通过在杨凌示范区建立农业高新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平台，在区域主导产业中心地带建立试验示范站，在产业不同生态区建立示范基地、专家大院、服务站和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构建大学与地方政府、基层科技力量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形成高新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快捷通道，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

4. 构建面向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培训体系

在新农村研究院设置新农村建设培训学院和推广学院，充分利用我校的各类教育资源，培养造就掌握现代农业知识、德才兼备的基层农业干部，高素质的农民企业家、善经营、会管理、懂技术的农村经济发展带头人，能起示范和技术指导作用的农民技术骨干，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5. 建立面向北方旱区服务的科技协调联运机制

依托“十省（区）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创业行动联盟”、“高校农业科技与教育网络联盟”、和我校发起成立的“西北五省区农业科技联盟”，探索建立不同区域高校和科技单位之间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和推广的协调联动机制，逐步形成以杨凌示范区为中心，面向北方旱区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技术推广体系、科技培训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

西北联大精神与北洋工学院的办学贡献

王 杰， 肖松山

(天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天津 300072)

西北联大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办学联合体，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的年代，树立起艰苦卓绝、玉汝于成的丰碑，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崇高地位和历史贡献。西北联大的精神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是中国走向强盛的精神基石。

一、西北联大与北洋工学院的办学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京、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三校西迁陕西西安，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此可见，北洋工学院是组成西北联大的主体院校之一。

北洋工学院初创时名为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清光绪皇帝御批，由清政府官办的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是当时教育部所属的三所大学之一。其后，民国教育部实行大学区制，将北洋大学的法科调给北京大学，改为单办工科，1928年改名为北洋工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北洋工学院西迁，胜利后返津，复校国立北洋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后定名为天津大学。

北洋工学院在西北时期的办学贡献有待进一步总结，就目前了解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组建了西北联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于艰难困苦中坚持办学，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与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地处京津要冲的北洋工学院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校舍被日军占为兵营，图书仪器遭焚毁、抢夺。因时值暑期，多数师生放假在家，人身免遭伤亡。但是，有校不能回，有课不能上，师生焦虑万分。早在战争爆发前，北洋工学院就提出西迁计划，但是迟迟未得到教育部的答复。1937年9月10日，民国教育部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北洋工学院随即迁址西安。

1938年3月学校又由西安迁往汉中，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是年7月27日，再奉教育部6074号训令，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古路坝。

古路坝距离县城几十里，条件十分艰苦。院址是一天主教堂，教室是泥房子，门窗年久失修，夏天下雨教室里就成了烂泥潭，冬天冻得手上都长冻疮。分院七星寺条件更差。没有电，点的是蜡烛和小煤油灯。饿肚子是经常的事。还要时常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师严谨治学，学生发奋苦读。成为一所飞机炸不倒、艰苦难不倒的抗战大学。

西北工学院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拼搏，弦歌不断，承担起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重任，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国家的负责，对民族长远未来的负责。

第二，北洋工学院的加入，提升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

北洋大学是以美国大学模式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学，建校之初设有法科、机械、冶金、采矿、建筑等学科，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本科毕业生、第一批大学出

国留学生、第一批研究生，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单办工科后，北洋工学院在我国率先引进德国大学模式，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出版学术专著，开办工程研究所，培养工科研究生，成为一所与世界先进高等教育同步发展的现代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一所具有 40 多年办学历史，体制完备、卓有成就的大学。

北洋工学院参加合组的西北工学院，在西北各校中是实力最强的。据资料记载：工学院教授 22 人，讲师、助教 22 人，学生 440 人，约占联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下设 6 个系，2 个组，6 系为土木工程学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工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授中不乏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如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教授，留学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学系；造纸专家萧连波教授，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造纸专业；土木工程专家周宗莲教授，留学英国孟都斯特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采矿冶金专家魏寿崑，留学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材料工艺科学系化学专业；机械工程专家潘承孝教授，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系。工学院的 22 名教授中没有留学经历的不过一、二人。

工学院正是凭借雄厚的办学实力，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保持了较高的办学质量，不仅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而且保障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个奇迹。

第三，以西北工学院为骨干，广布教育资源，为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任西北联大常委兼西北工学院院长(时无校长，只设常委 4 人，分别为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李书田不仅坚持西北工学院按照北洋的办学标准培养学生，而且努力在战时做恢复北洋大学的工作。他认为，北洋大学历史悠久，办学水平世界认可，这样的大学应该恢复。在他与众多北洋校友的努力下，1942 年 12 月，民国行政院第 606 次会议决定，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校址由英士大学所在的泰顺县司前镇迁至百丈口镇。1944 年春，教育部又拨款建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12 月开学。校址在西安梁府街，随后迁至崇廉路。

1939 年 1 月西康建省，李书田奉命随莫德惠、黄炎培赴川、康、滇考察文化建设。在考察中，他认为西昌地处安宁河谷平原，自古为西南重镇，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矿产丰富，而人才匮乏是经济落后的根源。为开发边疆、积蓄抗日资源，他呈请教育部在此设点办学。是年 9 月 13 日，国民政府核准创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即聘李书田为筹备主任，嗣复聘为校长。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作为综合性多学科的高等专科学校，在我国尚属首创。因教师大部来自北洋，多为誉满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如魏寿崑、周宗莲、曾炯之等。这点诚如《康导月刊》中的《抗战中的西康技专》所言：“西康技专具有一个普通农工学院所不能具备的许多优良师资”，其师资力量之雄厚，当时实为国内普通高校所罕见。同时，因该校在治校方针上，继承了北洋“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从严务实”的办学精神，故在社会上享有“小北洋”之称谓。

抗日战争时期“北洋工学院”不仅是组成西北联合大学的主体院校，更重要的是为西北地区乃至西南地区植下了工程教育之根，为其后西北、西南工程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 年西北工学院筹备迁址西安，“茅以升正式任命为北洋大学校长，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北洋大学，部分师生仍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后来的西北工业大学就包含有西北工学院的大部分院系，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第四，坚持严谨治学，严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关，为国家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储备。

据史料记载，1939 年 5 月，工学院举行了迁徙到西北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为战时的国家输送人才。其后，“自 1938 年至本年（1946 年）共招收学生 2330 人，自 1939 年至本年（1946 年）共毕业学生 1457 人。”

它不仅是坚持办学，而且规模不断扩大。1942年工学院增设工业管理学系，并招大学先修班两班。学生规模激增，城固校址不够用，在郊外增设七星寺分院，“古路坝本院可容学生八百人，七星寺分院可容学生六百人。”

西北工学院提出“公诚勇毅”的校训，教育学生以工业抗战救国。李树田院长更是严谨治学，不但严格要求学生，也同样严格要求教师，确保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教学质量不减。不仅培养了一千多名国家急需的科技人才，而且许多人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领军人物，如著名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师昌绪；电子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的开拓者之一叶培大；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国家内燃机燃烧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史绍熙；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清华大学校长、教授高景德；物理冶金学家、我国核燃料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科院院士、核工业部核燃料局总工程师张沛霖；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及工程科学部主任，清华大学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恒德；农业工程学家、拖拉机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秉聪等等。

第五，北洋的爱国精神在西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汇合成了西北联大精神。

二、艰苦卓绝中锤炼的西北联大精神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具有爱国传统的，在西北经过艰苦卓绝的锤炼得到发扬光大。

1、中国大学的优秀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讲到中国大学的优秀精神，首先是“兴学强国”的精神。

中国的大学诞生于民族危难的年代，在1946年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受着战火的洗礼。

1894年甲午之战的失败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清光绪皇帝发出《强国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图自强而弭隐患”，广征强国之策。国人兴学强国的诉求空前强烈。1895年盛宣怀明确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繁长较短，断乎不能”，可见“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1895年10月，盛宣怀谋划的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北洋大学堂，经光绪帝批准在天津建立。北洋大学堂建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兴学强国”。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提议建立“京师大学堂”。其后，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筹拟学堂章程折》中明确提出了建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和根本：“臣谨按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百[千]余年旧制，亦时势使然。”张百熙上奏后，孙家鼐、姚文栋、熊亦奇、李盛铎等均就设立京师大学堂问题提出了建议，都表示出“兴学强国”的强烈诉求。1898年经光绪帝批准，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建立。

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他们的诞生是民族觉醒的产物，又是民族觉醒的标志。储朝晖在《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中指出：“大学是整个社会人文世界的一个特殊领地，大学精神在本质上反映了整个社会人文精神”。《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民族复兴成为中国近代史

开篇的主题。”“兴学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强烈诉求，亦是中国大学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兴学强国”到了“兴学救国”的严峻时刻。北洋工学院带着这样的精神传统来到西北，这一精神也成为西北联大的精神。傅恒志院士在谈到西工大优良传统时讲到：“那时在西安的街上总能碰到一些衣衫褴褛，头发很长，夹着几本书，但是你看他目光炯炯的年轻人”，“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和随着学校西迁的师生，在西安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西安一下子变了样，街上到处是演讲、活报剧、墙报、标语、募捐……”，“无穷的爱国心、无穷的救亡图存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就是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抗战八年西北办学的动力。

其次是“严谨治学”的精神。北洋工学院有着严谨治学的传统。李书田在《国立北洋工学院季刊发刊词》中说：“惟因北洋师生之‘实事求是’也，教师讲授实验之点，恒多于他校，学生上课自习之时数，亦超越乎寻常。教者学者，惟日孜孜。”著名冶金学家魏寿崑说，北洋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是因为该校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教学体系，充实完备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著名机械专家潘承孝说：“教师督促严、考试严、升留级严、学生也以做一个北洋大学学生而自豪。”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正因为严格，基本学科的基础才打得比较牢固。”北洋大学教授曹诚克在《国内矿冶工程教育现状下几个问题》中，列举了北洋大学与其他工科院校所开课程、学时的数据，比较后说“北洋功课之重，考试之严，青年求学者之视北洋为畏途，不自今日始，而于今为烈。……人家俱称北洋学生为牛，言其终日受鞭策，只知工作，全无休息之谓。”据史料记载：“北洋学生勤奋好学，刻苦读书。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时在课堂，晚间三小时自修。因为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在读书。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入市游逛者几无所闻。”“教学严格，使学生都能自觉自重，研读精勤，一经入校就用功，不能有任何松懈，这种孜孜好学，逐步形成北洋特有的风气。”北洋的“严”还充分体现其“淘汰制”上，据1923年毕业的陈立夫回忆：“我们那一届班次，原本有四十五名新生，到毕业时只剩下土木十六人，矿冶十五人，一共三十一人，中途不是因病辍学，就是成绩不够标准而退学，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人不终学。”这种严格的精英教育确保了学校的教育质量。

北洋加入西北联大也带来了严谨治学的校风，李书田作为西工大的工学院院长坚持这一办学原则。原西工大出版社社长张光慎谈到：“西北工学院的教学生非常严格，学生淘汰率达15%或以上”，“学校实行的是严进、严管、严出政策”，“学生一旦两门主科不及格，便留级或退学，无一例外。”西工的学生苦读之风盛行，据师昌绪回忆，由于教室少，学生分为两批读书，一批是吃了晚饭去教室读书到半夜两三点，另一批是两三点学到早上。他与高景德住上下铺，他是吃了晚饭去教室读书的，高是半夜读书的，两个人几个星期都见不上面。

古路坝容纳不了整个西工的学生，将一年级安排在七星寺，“一年级的同学把七星寺叫鬼门关，学校要求非常严格。每年都有1/2的学生留级或补考，同学们学习非常用功刻苦。”师昌绪回忆说学生学习“近似于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用功的劲头。”

2、西北联大精神是特殊的时代精神，宝贵的历史财富

西北办学锻炼了“艰苦卓绝、艰难奋斗”的精神。北洋大学、北平大学等校迁入陕西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汉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李书田在西北联大开学典礼上回忆了由西安迁往汉中的过程：“回忆这次迁徙，所费达一月有余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县，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老校友曾回忆道：“西北工学院除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校址外，还在不远处的七星寺设立了分院。同学们怀着救亡抗日的心情学习，卧薪尝胆、分秒必争，苦读之风盛

行。古路坝距城固四十里,距汉中七十里,地旷人稀。西北工学院的建立,给这宁静的土地带来了盎然的生机。学生们专心苦读,图书阅览室由于地方狭小,从早到晚都有人满之患。晚间自习时一个大教室,顶多两盏汽灯,晚饭后就有同学抢先进入教室,占灯下座位,晚来的同学只能依次后坐,有些则自己举着蜡烛以补光线之不足。每晚自习都是在煤气灯将要熄灭时,同学们还迟迟不肯离去。黎明,即有同学散布于山坡或树林中开始晨读”,“七星寺的同学也是人人自奋,潜心苦读,开夜车成风。每个教室,有开晚车者,有开早车者,你去我来,经年如此,百数只蜡烛,光焰闪耀彻夜不熄,被誉为‘七星灯火’”。

汉中迁徙、七星灯火,抗战八年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闪跃着西北办学的“艰苦卓绝、艰难奋斗”的精神之光。

“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精神是西北办学的进步精神。西北联大有流亡西北的东北大学工学院,有离乡背井的京津院校,这些学校的师生对日同仇敌忾,抗日情绪激昂。联大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交通队、募捐队、防空队、抗战剧团、汉奸侦查队等等,宣传抗日,支持抗战,“将西安闹翻了天”。教师则在教学中开设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编写进步教材和刊物,启迪和教育了当时一大批青年认识现实,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西北联大地下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进步运动,组织了进步团体“民先队”,队员有120多人,通过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使联大成为了抗日救亡的堡垒。

由于联大地处陕西西安,距离延安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向往光明、投奔革命,许多青年学生或主动、或有组织的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队伍。组成西北联大的院校都有此时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先烈,他们是民族之魂,是学校的骄傲。

西北联大精神是在民族危难,艰难困苦中磨练、养成的,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的,他是全体参加西北联大大学校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弘扬西北联大精神,做出新时代的贡献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我们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这就强调了“兴学强国”仍然是中国的大学在新时代的使命,只是它具有新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西北联大以“兴学强国”为核心的精神,无疑是今天高等教育传承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一,将以“兴学强国”为核心的西北联大精神,作为文化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学教育根本在于坚持育人为本,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无疑,“兴学强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他是在民族不屈不挠、玉汝于成的过程中锻造出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大学百年奋发的精神动力。中国的大学始终以“兴学强国”为己任,多少代人为此追求、奋斗,他是中国高校学人的共同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由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的今天,理应发扬光大,继续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使他们知道昨天、珍惜今天,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

第二,将以“兴学强国”为核心的西北联大精神,变为今天大学传承创新的文化自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在会上严肃指出:“‘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的作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什么是先进文化?胡锦涛指出:要“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兴学强国”根源于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化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大学捍卫真理、坚守正义的基本理念。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将“兴学强国”作为大学的文化自觉，作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精神动力。

第三，将以“兴学强国”为核心的西北联大精神，作为大学改革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基石。王冀生在《大学之道》中提出：“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问题，既是大学理念的实践基础，也是人们认识大学的根本立足点。全面、深刻地认识现代大学在人类社会中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既是当前大学理念创新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正确把握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新形势下全面开创大学新局面的重要基础。”西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是一面“兴学强国”的旗帜，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树立了历史丰碑，他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基石。今天我们弘扬光大这一精神，正是为了努力全面开创大学改革创新的新局面。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的西北元素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曲折发展, 特别是抗战爆发后的大学西迁, 引发了学者对师范教育价值的深度思考, 北平师范大学融入西北联大以及其后独立设置的西北师范学院之际遇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生命史上的一次不平凡经历, 它让国人领悟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的西北元素: 直面现实, 扎根本土, 励精图治; 凝聚人才, 以教育专业精神引领大西北开发。

关键词: 高等师范教育 动变 西北联大 西北元素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源自 1902 年“壬寅学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其后演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 年 7 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1931 年 2 月成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 北平师范大学奉命西迁, 与同时西迁的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 组建西安临时大学(1937 年 9 月), 次年 4 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 8 月, 成立独立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这频繁的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 师范教育的存在价值不断遭到质疑, 特别是抗战爆发后的大学西迁, 引发了学者对师范教育价值的深度思考; 北平师大融入西北联大以及其后独立设置的西北师范学院之际遇是中国师范教育生命史上的一次不平凡经历, 它让国人领悟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动变中的西北元素, 这就是: 直面现实, 扎根本土, 励精图治; 凝聚人才, 以教育专业精神引领大西北开发。

一、北平高等师范大学西迁的复杂心态与师范教育价值的深度思考

作为中国高等师范大学的一面旗帜, 北京高师和北京女高师在 20 世纪 20 年代“高师改大”运动中双双升格为师范大学, 并于 1931 年合并为全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然而, 这一“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却时常遭到政府当局的挤压, 或限其改革整顿, 或令其停止招生, 或扬言取消师大, 其生死存亡危在旦夕。虽然经过李蒸校长及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并未通过“取消师范大学”的提案, 但事隔不久的 1933 年 2 月 18 日, 北平的《世界日报》又传出“师大迁校西安”的消息。

虽然这只是误传, 但也反映了当时教育部“朱家骅的心理确有过此打算”¹。面对可能的西迁, 李蒸坦诚地指出: “师范大学一校迁移, 想无此理, 事实上有种种困难: (一) 迁移费用过钜, 中央财政困难, 决无钜款拨冲师大迁移费。(二) 教授发生问题, 各教授虽系专任, 但均不愿至西北任课, 因西北教育不易发展也。(三) 学生亦有问题, 西安交通不便, 南北学生前往入学, 川资颇钜, 且西北中小学极少, 敝校学生不易参观实习。(四) 理学院仪器甚多, 迁移之时, 难免有损失之虑。(五) 文学院图书甚多, 不易运输。(六) 教育学院贵在参观实习, 西北各校不及华北, 似与敝校学生参观实习不便。(七) 西北无大片房屋, 不能容纳师大千余师生。(八) 附属中小学不能迁移, 如欲迁移, 学生不能迁往……”² 李蒸此

*黄书光(1962—), 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变革中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反思”(11JJD880011)的研究成果之一。

时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更多的是站在师大自身的生存立场进行辩护。然而，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北京沦陷，抗战爆发，北师大遂获命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一起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8日正式上课。不久，由于晋南战急，临时大学又迁往汉中、城固一带。1938年4月，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西北联大又被教育部强行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次年4月，教育部以“兰州高等学校太少”为理由，要求西北师范学院再次迁往2000余里外的甘肃兰州，面对这一“自私的报复打算”，“西北师院在政治上没有力量，无法抗令”。³不难看出，北平高等师范大学服从了战时大学内迁的国家决策；但教育部借西迁之机，将“师范大学”降格为“师范学院”，并夹杂着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某些偏见和积怨，则是让师大学人难以释怀的。

事实上，由于亲眼目睹了西北大地的艰苦生存条件和全面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以李蒸、李建勋为代表的一批师大学人已逐渐从被迫西迁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开始主动寻找新形势下学校发展之生机。因此，当教育部要求稍事安宁的西北师范学院再次迁往遥远的甘肃兰州时，李蒸等学院领导颇能淡然处之：“为谋学校的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⁴为此，李校长自告奋勇，事先去兰州两次，仔细考察和勘定校址，并依据极其有限的办学经费制定了“分年迁校计划”；这样虽然给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但经过师生四年的持续努力，最终完成了艰难的历史性迁移。然而，与实际的办学困难相比，李蒸、李建勋等一代教育家思考更多的则是如何倡扬教育的救国价值，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在抗战建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中的重要价值？如何消除某些教育部官员对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固有偏见？

早在1932年，李蒸就指出：“教育为人类文化承先启后之一种事业，以教育为职业者，只以自了生活为满足者异，须以社会及民族为立场，而不以个人为立场，着眼于千百世之后，而不以目前利害萦诸胸怀。”⁵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李校长对师大师生“不避艰险、不畏强暴”的求学热情至为赞赏，他说：“本校教职员学生，不避艰险、不畏强暴间关绕道，跋涉数千里，迢赴西京，参加奉令合组之国立临时大学，百凡草创，弦歌重兴。……此种勤劳之精神，殊足为诸君他日求学任事之助，望珍重爱惜，发扬而光大之，必有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⁶他殷切地期望全体教师务必以“抗战建国”为重，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指出：“现阶段的教育，以抗战建国为中心，国家民族之危难日亟，各级教师之责任愈重，教学成功，训育尽责，不过责任之一部分，欲完成救亡复兴之大业，必须训练全国民众，团结而组织之。如何灌输民众常识，指导民众训练，使全国同胞激发国家民族之意识，充实抗敌御侮之能力，皆各级教师义不容辞分所当为之事。古人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教育救国，良师救国，皆赖此弘毅之精神，以达到任重道远之目的，诸君宜服膺先哲名言，身体而力行之。”⁷李蒸还勉励学生在暑假期间也要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战救国活动，将个人求学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暑假到了，西北西南的同学们，可以回家按照学校订定办法，在本乡本土进行抗战工作。战区留校的同学，教育部希望能做些社会教育工作，抗敌支会也正在筹划发起，同学们可以再宣传、慰劳、调查、组训四组工作中选择一种或两种。现在后方民众还有很多对抗战情形尚不明了，服兵役的人还不十分踊跃，这一切都需要去宣传，去开导他们。”⁸

与李蒸长期共事的另一位师大学人李建勋，他对教育、师范教育乃至高等师范教育的价值也有过很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他说：“教育为国家之命脉，教师为教育之源泉，欲建其国者，必先建其教，欲建其教者，必先建其师，此各国所以重视师范教育之原有也。中等学校所教育之学生，悉为生气勃勃之青年，此班青年，将来皆为改造社会之中坚分子，其所受教育之良否，对于国家尤有重大之影响，然负教导之责者，即为中等学校之教师，此又各国所以重高等师范教育之原由也。故吾人不欲建国与改造中等教育则已，否则即应顺应世界潮流，

注重师资训练,改进高等教育。日月逝也矣,岁不我与,急起直追,此其时矣。”⁹然而,与大力推进高等师范教育以为强国之基的世界潮流逆反,国中蔑视师范教育者从未销声匿迹,甚至在国难期间依然我行我素。李建勋指出:“溯自民国27年创立师范学院以来,逐年增设,时谋改善,无论就量上和质上言,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孰意高级师范教育多难,恒遭恶运,迩来又有人予以猛烈之抨击,十余年前之陈调,不幸又重见于今日,此等人士,或由于不谙高级师范教育之发展趋势,或由于不明高级师范教育之功能,或由于偏颇固执之成见,鄙弃之不遗余力,摧残之惟恐不逮,一若高级师资训练机关取消,则万事大吉者,此诚令人大惑不解也。”¹⁰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教育决策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之长久未来,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说:“夫教育为国家之百年大计,倘所取之途径错误,不仅为害于一时,且将种祸于百年,而于高级师范教育之决策尤然。”¹¹

二、出入“西北联大”:直面现实,扎根本土,励精图治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北平高等师范大学在西迁过程中先是被合组为西北临大(1937年9月),继而正式更名为西北联大(1938年4月);但仅过一年零四个月,就被降格为“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院”与“师大”在学人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师院之目的较单纯,专为训练中等学校健全师资而设。师大之目的,除训练中等学校师资为主要目的外,并负责培养(1)教育行政人员。(2)教育学术专家及(3)研究适用于教育之专门人才等三种责任。师大在专业训练方面其对象已较师院为广,实际已包括教育职业所需人才之全部,且于专业训练之外,培养一部分研究其他有关教育之专门学术人才,所谓师大负有专业训练与研究高深学术之双重使命。”¹²很显然,师大的培养目标更为广泛,李蒸对教育部当局的制度变更仍有不满情绪,他说:“站在教育学术立场及为提高中等学校师资训练在高等教育阶段之地位计,师院以改称师大为宜。”¹³但在全民抗战的特殊环境,且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李蒸作为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亦很快调整心态,直面现实境遇,做出了赓续师大传统、扎根西北本土、聚焦师资培训、兼顾社会教育的战略决策,其励精图治之信念与情怀备受后人赞誉。

对于师大的已有成绩和优良传统,李蒸如数家珍。他说:“师大自成立以来,30余年间,培养毕业生5000余人,其中80%以上均服务于教育界,且‘能以教育为终生事业,卓然有所建树,久已誉满士林’。师大已为国家培养数千青年导师,组成国家的教育干部,筑成踏实的社会基础。”¹⁴特别是师大业已形成的优良校风——“刻苦耐劳”、“诚朴笃实”、“埋头苦干”,和宝贵学风——“努力课业,有好学的精神;吃苦耐劳,有实干苦干的精神;参加课外活动,有服务社会的精神;爱好运动竞赛,有注重体育的精神”,¹⁵与后来西北联大“勤朴公诚”的校训是一脉相承的。李蒸深为推崇,并对师院学生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本院现有之生活环境与教学设备均不足以言高深学术之研究,但在精神训练方面,正可利用抗战大时代,努力教育家人格之陶冶,同时对于建国大业有切实之贡献,深愿本院同学均能以此自勉。”¹⁶

既然培养“健全师资”为师院的核心任务,那么如何扎根西北本土、聚焦师资培训,无疑关系到新落成的西北师院之存在价值与声誉。李蒸强调,西北师院一定要以“师大”为榜样,指出:“本院继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负起西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于不坠。”¹⁷然而,要真正负起西北这一艰巨的师资培训任务,一定要有扎根西北之情怀,走进民众心里,去真心实意地了解民性乡情,方能真正了解西北社会与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有效的师资培训。如:1938年12月26日,西北联大社会教育委员会就曾决议由西迁过来的北平师范大学(后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继续办理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该研究处的研究人员通过广泛调查,筛选出100个小学教育实际问题进行较深入地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西北小学教育的某些本土问题及其症结。为此,李建勋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

说：“就问题之数目论，仅有百个，与实际问题之范围较，诚觉微乎其微。就研究之性质论，既非根据实验，比较其结果；又非调查各方，取得之集中趋势；与深刻之研究较，亦觉弗及。但问题虽少，实为小学常感到之困难；研究虽浅，均系参照学理与经验而成。倘从事于小学教育者，各能人手一册，则不仅于其个人之进修有所助益，而小学教育，亦可藉以获得相当之进步也。”¹⁸ 由于该小学教育通信研究处能够切实地解决当时小学教育的实际问题，有效地促进了战时小学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特别嘉奖令，称：“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勘嘉许。”¹⁹ 当然，师资培训优良与否，更重要的是要审察师院的实际工作成效。1940年2月9日，李蒸指出：“师院注重专业训练，在课程方面所设教育科目分量甚多，尤其对于实习之规定特别认真，如附属中小学有相当之规模，及与各公私立学校有相当之联络时，实习能认真实施，则未来之中等学校师资，当能更近于专业化之境地。”²⁰ 当时西北师院附中的办学成绩也倍受赞誉，李建勋写道：“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系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所主办，该校之毕业生，在历届大学招生中之成绩，恒为全国之冠，因而获得教育部‘启迪有方’之匾额，倘非该校教师教学成绩优良，曷克臻此。”²¹ 此外，西北师范学院还十分重视举办暑期训练班，并与地方教育当局合办暑期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以不断提升本土中小学的师资水平。

事实上，一所大学不只是一个区域的学校教育中心，更是其文化乃至社会教化之重心。这一点，李蒸院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导责任。本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科室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植，必须治力于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换言之，本院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设工作之任务。……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该文化建设应从西北做起，盖因其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础，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奋复兴。西北人民至今保有中国古风，所谓礼义廉耻之民族道德，可以随处有所表现，兼以人民之诚笃勤劳，体格健壮，如施以适当之领导，必能勇往迈进。本院所负使命甚大，虽深感能力绵薄，但以职责所在，亦必竭力而为之，惟愿各界人士协力进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²² 在李蒸看来，狭义的师资培植固然重要，而广义的社会教化——“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乃至抗战救国之宣传，同样也是师范学院的神圣职责之一。为此，他相继在城固、兰州成立了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国民教育实验区、家庭教育实验区，力图消除学校与社会生活的隔阂，与民众打成一片，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还获得民众赠送的“善教民爱”之锦旗。当年学生邵致新后来深情地回忆说：“1944年迁校兰州后，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特别是李院长，院务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亲自组织部分师生兼办社教：以本院附近两所小学为基点，开办群众夜校，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参加社教的同志编印抗日小报张贴街头，组织宣传队，深入厂矿农村，通过讲演、演话剧、筹办抗日图片展等多种形式，激励士气。每次纪念周和区乡镇月会时，李院长都亲自做报告，以有力论据和胜利消息，阐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从而坚定了师生和群众抗日的决心和信心。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还直接参了军，奔赴抗日前线。总之，西北师院在李院长领导下，为培养人才和动员群众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²³

三、以教育专业精神引领大西北开发

西北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诚如“西北联大校歌”中所言：“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但由于种种原因，华夏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致使其“教育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来，而本地人才亦多外流，同时政府亦因利趁便发展东南及沿江沿海一带，所以西北不幸而落后，西北各省曾不断遭受天灾人祸，致使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无人从事天然富源的开发，所以形成一种偏枯的现象。”²⁴ 抗战以来，大学西迁，人才回流，

这就为建设和开发西北提供了绝好的机遇。李蒸深知“由教育建设途径以培养人才自为根本之图，但短时期内难有大量的成就”，他期望西北各省当局及地方上有识之士当及早“招致人才来西北工作，不但应优厚其待遇，且应布置适当生活环境，使来西北者留住西北，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均能安心工作，满意生活。”²⁵他还从道义上奉劝师院毕业生“毕业之后，当以西北为服务领域，下定决心，争先恐后，同在西北工作，以符政府分区设立师范学院之本意，一以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²⁶当然，李蒸更希望国家能切实提高师范教育地位及师资的生活待遇，以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他说：“国家重视师范教育，必须以全力办理最优良的师范学院与师范学校，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准备从事教育事业。……师范大学及师范学院之师资即所谓‘师资的师资’，必须为国内外之专家学者。尤须集合教育学界的权威学者，优厚其待遇，保障其生活，崇高其地位，使能安心于教育事业，为国家民族树立千年万世之基。师范学校师资，亦须选拔曾受专业训练之优秀人才，使其献身教育，不肯见异思迁”²⁷。

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固然重要，但开发大西北的长久之计还是要靠自己培养各种各样的建设人才。李蒸指出：“西北地区当然需要经济建设，增加生产，开发富源，救济旱荒，而修筑铁路至兰州以通新疆，以沟通欧亚两州，尤为建设之首要”；但是如果仅偏重经济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就如同“建筑高楼大厦而忽略基石之坚固者，其结果为表面的繁荣，而有随时倾覆之虞”；至于忽视教育投资，“社会风气闭塞，教育水准低落，一切建设均不能顺利进行。”²⁸就教育而言，李蒸认为，西北各省失学民众过大，亟待加速增设学校数量，且须“大量办理民众学校及社会教育方式，以求成人教育之补习”²⁹；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师资训练，强调“中小学师资的专业训练，应为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而中等学校师资培养，即“由教育部设立之西北师范学院负责办理”。³⁰因此，如何以教育专业精神引领大西北开发，无疑是西迁而来的师范教育改革家们反复思考和探究的重要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师范教育实践和研究工作，李蒸对“教育专业化”、“教育专业精神”有很深的理解和体悟。他说：“教育之需要专家，正如工业之需用工程师，医药事业之需用医药师一样。过去的错误在于任何人皆能高谈教育，以为教育是一种常识而非专门学问，此为不科学之头脑，无怪举之不能进步。教育这一门学问虽尚不能如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之严格客观，但其中有许多部门已达到科学化之境地。……所谓教育专业化，除关于知识技能方面须经过严格训练外，尚有专业精神之培养。教育事业是精神事业，从事教育事业者须先养成专业精神，然后方能安心服务，不至见异思迁。从事教育工作之代价亦属于精神方面为多。教育的对象为活泼的儿童与天真的青年，富有浓厚的情感，教育者必须能发挥爱的精神，以培育而滋长之；此种教育专业精神必须在生活环境中自然养成。”³¹极言之，这种专业精神也就是以教育事业为重的奉献精神，“即古人所谓安贫乐道的精神，……此种教育专业精神，必须在师范学校之特殊环境与校风中养成之。”³²

李建勋也敏锐指出：“教育事业已随社会之进步而日趋复杂，教育学术已因专家之研究而趋于专精，换言之，即教育已经专业化，非受特殊训练者弗克胜任其职，故从教育专业本身言，亦不能不予以训练。”³³在他看来，“对于中等学校教师之训练，应特重专业的态度与理想之培植，务必使其具备敬业、勤业、乐业之精神，合乎教师服务道德标准之行为，以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正确人生观。”³⁴但遗憾的是，当时全国师范学院仅设立七处，且建设参差不齐，远远不能满足中等学校师资专业训练的实际需求。

为了更好地体现教育专业精神，李蒸十分重视师范学院的师资专业训练。他说：“我们负责训练中等教育的师资，确信社会上无论那项事业，都需要专业训练的人才，几年来我们竭力呼吁，谋师范教育的发扬光大。”³⁵在他看来，师资专业训练应该包括普通及专门学科、专业学科、教学实习和生活训练四个方面。他说：“凡能胜任之教师，必须有丰富的常识，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生哲学及体育、艺术等均有基础学习。其在中等学校任教者，更须修习一种专门学术，如现时师院之分系研究，但以中学课程所需要者为主体。关于专业

学科,大半为教育一类课程,如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学法、教育史、教育统计等,凡为教师者必须有深刻之了解,然后方能在专业精神与技术方面有所成就。教学实习在附属中小学之参观、见习与试教,此为预备教师之应有的训练,其用意与习医者之在医院,习工者之在工厂相同。至于师范生之生活训练,亦应与普通科学学生有所不同,须有严格管理,养成守纪律、重秩序之习惯,及奉公守法之精神。”³⁶ 李蒸严肃指出,师资专业训练事关重大,全国各师资训练机构务必高度重视,严加检讨,切实改进;同时,他也深切期望西北师院要与地方行政机关密切配合,以推动地方教育的不断改进与发展。他说:“全国中等教育之能否改进,与师院之使命能否完成,有赖于师院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切实合作之处甚大,愿师院与地方教育当局共同努力。”³⁷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命运十分坎坷,抗战爆发后的北平师范大学的八年西迁际遇,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生命史上的一次浴火重生。它引发了学者对师范教育价值的深度思考、对高等师范教育本土化推进的实践体验,以及如何以教育专业精神安身立命,进而引领大西北开发乃至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革,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源于西北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散发出浓浓的西北泥土芳香,值得我们在当代高师教育改革中去反复品味。

参考文献:

- 1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6.
- 2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5—76.
- 3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0.
- 4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0.
- 5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3.
- 6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1—152.
- 7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2.
- 8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十次纪念周记录(N).西北联大校刊(18),1939.
- 9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6.
- 10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8—329.
- 11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9—330.
- 12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2.
- 13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4.
- 14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5.
- 15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9.
- 16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0.
- 17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5.
- 18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57.
- 19 王明汉等.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39—1989)[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18.
- 20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3.
- 21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52.
- 22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6.
- 23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50—351.
- 24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4.
- 25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7.
- 26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3.
- 27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18—219.

- 28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7.
29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5.
30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5.
31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13.
32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15.
33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89.
34 许椿生等.李建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42.
35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期第五次纪念周记录[N].西北联大校刊(8),1939.
36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5.
37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3.

The Northwest Elements During the Unrest and Change of China's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Huang Shuguang

(Institute of School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CNU,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circuit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attracted some education scholars' depth thinking of the value of the normal education in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in the time when Universities were moved westwar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opportunity that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integrating into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building of Northwest Normal College independently had was an uncommon experience in the life history of China's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which made the Chinese realize the northwest elements during the unrest and change of China's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face to face with reality; take roots in the local; makes determined efforts to make our country prosperous; conglomerate talents together;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China with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the unrest and change,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the northwest elements

民国时期家政教育考析

——以齐璧亭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为个案

戴建兵， 张志永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齐璧亭是我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女子师范教育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立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冀以改善家庭来推进整个社会革新。抗战前在中国高校中率先创办家政系；抗战期间率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西迁办学，并在大后方积极推广家事教育；抗战胜利后，他殚心竭虑恢复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凡致力于教育事业达30多年，为中国女子家政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时期 家政教育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齐国梁

提起“家政”一词，当代人熟悉的是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等纯粹事务性工作。其实，民国时期的家政教育与现在人们的想象有着很大的区别，家政学兼有文、理、艺三科性质，是一种新兴的家事教育事业，更带有强烈的教育救国的色彩。遗憾的是迄今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不仅难以窥豹一斑，而且错讹极多，以致遮蔽了事实真相。本文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为个案，综合运用原始档案、报刊等文献，探究民国时期家政教育的发展概况，期以抛砖引玉。

一

齐国梁（1883—1968），字璧亭，直隶宁津县人（今属山东省）。他是我国近代知名教育家、女子师范教育奠基人之一。自1916年担任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起，至1949年8月卸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致力于女子师范教育达34年之久，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时人赞其“学识渊博，经验宏富，为人仪态整肃、和蔼可亲，处事脚踏实地、认真负责，不务虚名不期近功，其所以能受学生的爱戴，为社会人士所敬重绝非偶然”。^①1949年8月，齐璧亭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1956至196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齐璧亭出生在宁津县城内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天资颖慧，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之勤奋好学，少年时期便考中秀才，名闻乡里。及长，赴省会保定师范学堂就读，开始了终生从事师范教育的职业生涯。1907年齐璧亭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旋入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师范科学习，1908年北洋大学堂选派齐璧亭等人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1年冬齐璧亭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满清倾覆，中华民国建立，国内局势趋于安定，翌年，齐璧亭再赴日本继续完成学业，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科深造，1915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齐璧亭两度留学日本，不仅学识上大有收获，还对日本女子教育印象甚深，这奠定了他毕生献身女子师范教育的思想基础。

1916年1月10日，经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兼代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先

^① 马志超：《介绍河北女子师范教育家齐璧亭先生》，载《河北教育》（第七届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特刊）第五、六期合刊，河北省政府教育厅编辑，1948年5月1日。

生推荐，直隶省教育厅批准，“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毕业生齐国樑，现经电调回国，昨奉巡按使朱经帅委派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齐君昨已谢委莅该校，与代理校长张伯苓君接交办理。”^①当时，他是我国中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唯一具有国外学历和学衔的校长，不仅具有先进的教育知识和技能，还能够把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和管理经验运用到学校中去，尤其重视女子教育。“鉴于日本女校普通注重家事教育，因之日本女子在家庭中担任重要任务，所有家庭中清洁、整理、缝衣、饮食以及教养子女、照顾成人，无不圆满作到，以是家庭健全，社会、国家深受其益，……所以回国后，极力提倡女子实用教育！家事教育——除对省立女师课程着重实用外，并于民国七年，设立家事专修科，以培养中等女校师资”。^②起初，学校教员缺乏，他就聘用日人，自任翻译，以教授之。“惨淡经营，成绩斐然，凡赴该校参观者，莫弗称之”。^③

齐国樑所办的学校继承了此校前身北洋女师范的传统，北洋女师范的总教习，中国著名的女词人吕碧城在办学时认为女子实践即在家庭，而女子教育家家政是不可缺少的。她说：“道德者能在实行而不徒取其理论也，夫行之维艰。古有明训：任教育者，苟不着意于实践，终难收其效果。吾女子素无与外事，则以对待家族为道德实践之始，如孝父母和昆弟、养舅姑、助良、人御、婢仆、睦乡，当皆尽其情理，守其秩序，俾家族之间日益昌盛，此女子之专职也。然而女学不兴，则乏家庭之教育，养于深闺，习于骄惰，詈鸡骂犬谗帚闯墙，戚友以细故而生隙。骨肉因谗构而乖离。颓风恶俗流毒于社会者匪浅，此家政学所宜急讲也；”^④故而其主持的北洋女师范均设有家政课。^⑤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家政为必修课。^⑥

齐璧亭在从事女子教育数年间，痛感中国教育弊端丛生，其要者是“我国办教育者，其学识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以致教育不能进步”，因而他在“办公之暇仍潜心学问，并于民国十一二年间赴美国留学，专攻教育，尤注意于女子教育”。他先在斯坦福大学获取了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研究教育两年。同时，他还注意观察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家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庭比较的好，女子在外面的时候，实在很阔绰，一回到家中，一切操作如洒扫烹饪，保育儿童等，不特不避免而且乐于习作，同时又对外交际，一切都好像比男子的能力强得多，这样进步，完全由于家事教育实施的效果”。^⑦进一步认为“彼邦各级学校对家事教育较日本尤为重视，尤为进步，彼邦女子在家庭及社会贡献更大，因之国家建设及兴盛更受其益。”^⑧相比而言，我国家事教育很不发达，要想矫正过去和革新社会，必须提倡家事教育。家政学的重要性在当时社会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文盲众多的晚清民国社会而言，女子是其主体，而即使是追求女性解放的识文女子，看到下面的文字也能让人们感受到民国家庭建设的重要。二十年代女子剪发运动中，一位女子写道：“我们女士剪发就是抵制男子们的剪辮。从前男子没有剪辮的时候，假使家庭中起了风波夫妻相打起来，男的一把拉住女的发髻，女的一把拉住男的辮子，彼此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现在男子们已没有辮子而女子们还挽着发髻，相打起来女子已拉不到男子的什么，而男子却依旧可以拉着女子的发髻。女子的髻一被人捉住，就有天大本领也施展不出来，变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要把五千烦恼丝付之一剪咧。”^⑨

^① 《益世报》1916年1月10日。

^② 《省立女师学院院长齐国樑报告》，河北省教育会议发言（1948年6月）

^③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国樑来院讲演》，《交大唐院周刊》1930年10月20日

^④ “兴女学议——碧城，《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21日。

^⑤ 北洋女子师范招考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4月18号；北洋女子公学招考，《大公报》（天津版），1911年3月7号。

^⑥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大公报》（天津版），1906年7月16号。

^⑦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第二次应约出席纪念周讲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22期。

^⑧ 《省立女师学院院长齐国樑报告》，河北省教育会议发言（1948年6月）

^⑨ 徐国桢：《剪发与剪辮》，《红玫瑰》，1926年第2卷第27期，第102页。

1926年8月，齐璧亭学成归国，仍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着力把女子教育推向深入，“因鉴于彼邦妇女，做事能力之强，及所负家庭责任之重，皆由于曾受家事教育，智能充实之故。乃思吾国欲图女子教育之发展，及家庭之改进，非设立家事科学院，加以研究提倡不为功，”屡屡呈请“增设女子家政艺术学院，研究家事科学及与家事有关之艺术，以图女子教育之改进”。然而，由于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北方政局动荡不定，故他的提议长期未被重视。1929年4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成功后，新成立的河北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为学院之一系……并增设他系，以广储女子教育人材。是年五月，由北平大学区教育行行政院，聘请齐校长，为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备员，令于省立一女师校内，积极筹备进行。……旋由教育行行政院，聘请齐校长，为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①

齐璧亭遵令就任筹备员后，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内，划出校舍一部，作为学院之用；并规划初次先招国文、家政两学系班次；编制经临各费预算；聘请教授、讲师；拟定课程大纲及招生简章等。6月29日，齐璧亭正式出任女师校长。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初建，百废待兴，此时，距离本年9月开学，已不足3个月，招收新生就成为最迫切的事情。齐璧亭克服时间短、人手少等困难，在暑假期间，分别于天津、北平两地招收新生。9月10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正式开学，最初开办国文、家政两系。1930年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与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合并，至此，女师学院基本格局底定，共分学院本部及师范、中学、小学、幼稚园各部，成为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

女师成立后，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家政专修科升格为家政系，齐璧亭兼任系主任。家政系“以造就女子师范及中学校家政教师，并以改善我国家庭生活为主旨。”其培养目标为：“a. 指导学生认识家庭为社会发展之基础。b. 授以家政学识技能，俾能充任家庭指导师之职任，并采择众中外新旧家庭之优点，诱导社会，改良家庭生活。c. 养成师范及中学校家庭学科之教师。”当时，全国高校中仅燕京大学在1922年设有家政系，“经过逐年演变和调整，课程设置乃集中在营养学和儿童发展学两专业上”，^②但其与女师家政系宗旨迥异，故女师开办家政系缺乏现成的规范和经验，许多工作只能在探索、试验中推进。如以该系开设课程为例，自1929年以来，除了公共必修课外，其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屡有兴替，至1934年才基本确定下来。具体规定为：本系必修课目，第一学年，高等化学有机化学，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织品与衣服，家政学概要；第二学年，生物学，生理学，经济学，簿记学，衣服洗染及调色，实用服式设计，食物选择及调制；第三学年，营养学，家庭卫生及看护，儿童保育，园艺；第四学年，食物选择及食物经济，家庭布置及管理，家政学教学研究，论文，家事实习，教育实习。副系必修课目：图画副系、音乐副系。另外，本系还开设选修科目，诸如高等缝纫及纫工、制帽学、食物微菌学、食物贮藏、疾病膳食、婴儿及儿童之营养、家庭问题讨论等。^③

女师家政系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了多个试验室等实习设施。如化学试验室、食物学试验室、生物学试验室、营养学试验室、微菌学试验室、染织试验室；模范家庭医院，器皿、颜色标本；以及实习工厂等。凡有关于家政之研究进行者，无所不备，时为全国之冠。

同时，齐璧亭积极把家事教育推向社会。1936年春女师在天津“设立妇女民众学校，先谋妇女之解放而造就全民教育之先声”，以4个月为一期，采取研讨式教学，向缺乏文化的劳动妇女普及家事知识。如关于民众能力方面：“（a）培养爱国思想认识国际情形，（b）养

^①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编，1934年4月。

^②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③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览》，第125-129、136-137页。

成保持个人家庭及公共场所整洁之习惯，(c)有简单日用之计算及记账之能力，(d)改善家庭生活及有儿童教育之常识，(e)有解读浅近文字及应用浅显文字发表意见之能力。”第一个学月组织学生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黑暗的家庭，一个是新生活运动，在第一个问题说明家庭和平的重要，中国家庭腐败的原因，给与学生一种改善家庭的观念，第二个问题，说明新生活运动的要义‘礼义廉耻’，并陈述新生活的重要及其优点，劝导学生切实实行。”通过讨论和教授，使民众了解人生的意义，体验人生的真趣，养成改进日常生活及改进社会思想之能力，并灌输民族的意义及公民的高尚道德。妇女民众学校开办很成功，“获得民众的敬仰”，许多妇女说“这个妇女民众学校，真是我们妇女的造化”，希望“多办一二所民众学校，那么无论男女‘可以读书识字了’。”^①另外，女师把妇女家事教育推向农村，“在杨村与河北省立民教馆合作设立妇女班，推行乡村家事教育。并与各省市中等女子学校联系，介绍家事教育师资和材料。”^②

女师建立后，虽然华北数经战乱，省款支绌，教费欠发，未能按照呈准计划，继续发展，但是在齐璧亭苦心经营下，多方网罗人才，增添设备，使校舍修建的富丽堂皇，设备极为充实完善。“各系教师都是由新型的、有学术造诣的青年教师作主力，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泰斗。如文学界的冯沅君、英文界的李霁野、钢琴界的丁善德、提琴界的张洪岛，以及刚从美国归来专门学习家政学的孙家玉等。……它那宏伟的主楼建筑，一流的体育馆、图书馆，先进设备的理化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具有国际水平的家政实习室，以及大片的教室群等与师范部、中学部相连”。^③来院参观者，络绎不绝，声誉大著，至1934年女师“已有国文、英文、史地、教育、家政、音乐、体育七系二十三班，合计师范部十三班，中学部六班，小学部十一班，幼稚园部三组：都为五十六班，学生一千七百七十九人，教职员一百二十八人。基础确立，规模粗具，俨然为华北女子教育之中心矣。……数年以来，本院刊物之发表，仅作文艺学术上之研究，甚少行政上之叙述。”^④

女师不仅是全国惟一的一所女子教育的完善学府，还在短短数年内跻身于全国家政教育之领导地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社会上“不但轻视家政学的趋势改变，并且家政学人才亦有供不应求之势。”1934年“春季家政系毕业同学8人，竟有十余处争相延聘，由此可见得家政学在我国已有蒸蒸日上之势。”^⑤另据1937年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学生调查，家政系共查询到3人，其中，崔毓秀任“本校家政系助教”，王献平任“宁夏女子中学校长”，郝培如任“本校师范学院附中教员”。^⑥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齐璧亭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在天津沦陷前夕，齐璧亭“以中英庚款之补助请准教部”，带领女师部分教师和学生辗转内迁，在此期间，女师家政系先后与多个院校合校，但是，齐璧亭始终担任家政系主任，讲授《家政学概论》、《家事经济学》等课程，苦心经营家政系。1943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褒奖齐璧亭，“抗战后以来，随校迁徙，艰苦备尝，潜心研究，似此终日执教，老而弥笃，良足矜式。”^⑦

1937年秋，女师先迁到陕西省西安市，与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等联合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2月10日，西安临大学生人数统计，全校共计学生1472人，在其下设

^① 李月婵：《设立妇女民众学校过程之实验》《期刊》第4卷第1、2期合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出版课（无日期，疑为1936年）。

^② 《教育家齐璧亭先生》，《宁津文史资料》（第10辑），第58页。

^③ 齐文颖：《忆我的祖父——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人及院长齐璧亭先生》。

^④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览》，1934年4月。

^⑤ 程孙之述：《我们为何要研究家政学》，《期刊》第三卷第1期，1935年1月20日。

^⑥ 《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1938年12月1日，第23页。

^⑦ 《关于奖励教授李建勋、齐国梁二人事宜给教育部呈文》（1943年2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135-0002。

的教育学院 149 人中，家政系有 40 人。^①

1938 年 3 月 16 日，西安临时大学南迁陕西南部城固，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当时，火车只能通到宝鸡，自宝鸡至城固尚有 250 多公里路程不通火车，南迁学生只得步行，故沿途食宿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齐国梁担负着膳食委员会主席重任，“议定购办米粮、炊具、咸菜等办法，规定行军时早晨食粥，中午打尖食自带之锅饼咸菜，晚间食干饭汤菜，并分配前站人员”，“齐主任最初主持颇为尽力”，后又与他人“共同办理米粮北运接济队员食用事项。”^②保证了学生顺利抵达目的地。1938 年 5 月，西北联大在城固举行开学典礼，据 1938 年上学期统计，家政系：“一年级正生 9 人，借读 1 人，旁听 6 人；二年级正生 4 人；三年级正生 4 人，四年级正生 4 人；合计正生 30 人。”^③

1939 年，西北联大又分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随之分出。当时，由于西北地区文化落后等原因，家政系招生困难，1940 年甚至出现无人报名的现象。齐璧亭分析了人们“不甚重视”家事学科的原因，一为“本系教授设备都说不上，成绩不甚好，故不入此系”；二为误以为“不学家政一样可以过活，何况家事是日常生活的事，实在值得专门去学。”积极呼吁应重视家政教育，指出，“现在一般的家庭是否幸福，是否合于理想可说相差太远，我们不要以为做良妻贤母是开倒车，孰知母不良妻不贤，却为大家所不愿的，……应该替国家社会着想，一致起来提倡，共同资助，切不可儿戏视之。”^④经过多方努力，家政系招生情况明显好转，据 1940 年度第一学期统计，在西北师范学院 13 系 521 人，家政系“总计 44 人，一年级 15 人，二年级 9 人，三年级 7 人，四年级 13 人”；居教育系 51 人、史地系 66 人、体育系 59 人之后，成为第四大系。^⑤1941 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建立后，为解决家政系生源不足的窘境，西北师范学院决定补招家政系新生，10 月 16 日，经过考试，共计录取家政系一年级新生 9 名，直接到兰州分院报到上学，“每生由本院津贴旅费 201 元 8 角，在兰州分院发给”。^⑥

当然，大西北本不发达，而战时教育更为艰难，迟至 1944 年，西北师范学院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一名学生在写道，“我们爬山越岭，来北国兰州十里店，即将进入西北师范学院，一片沙原，背山面水，沙原上的几座房屋，正是我们的教室、宿舍”。^⑦从中也可见家政系教学条件之艰苦。齐璧亭努力克服物质条件不足等困难，注重家政系正规化建设。1938 年 10 月，他再次领导制定了家政系课程标准。“以专业训练为主要任务”，教学目的：“一、造就中等学校家事教育师资；二、养成家庭善良主妇及贤慈母性；三、训练家政学术专门人才（期对家政学之学理及技术能为适合国情之研究及创造，对于本国家事上各种问题，能为独立之研究及解决）；四、培养家庭改进之倡导者（期以社教方式改进一般家庭）；”训练方针：“一、涵养服务社会、家庭及教养子女之健全人格；二、锻炼胜于职务之坚强体魄；三、养成服膺家事教育之专业信念；四、陶冶勤于操作之劳动习惯；五、培植适于任务之知识技能；六、陶铸寻求真理之科学头脑；七、培养改进家庭之领导精神”。^⑧

因此，家政系开设课目虽多与其他大学之家政科系课目相同，但教学及训练之旨趣则实相异。如必修课目中，除了修养课目、基本课目大致相同外，专业课目分为：“一、教育的（教法的或形式的）专业课目：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普通教学法、家事教学法、家事教学实习、家事教学及设备参观；二、家政的（教材的或实质的）专业课目：a.关于家事一般

^① 《西安临大校刊》第 2 期，1937 年 12 月 27 日，第 10 页。

^② 佟学海：《膳食委员会报告》，《西北联大校刊》第 1 期，1938 年 8 月 15 日。

^③ 《西北联大校刊》（第 9 期），1939 年 1 月 15 日，第 16 页。

^④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第二次应约出席纪念周讲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 22 期。

^⑤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务概况》，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33-001-0593-0001。

^⑥ 《为续招家政系一年级新生姓名的布告》1941 年 10 月 16 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 33-001-0456-0025。

^⑦ 《自传——家政系一年级周雅南》，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33-001-0539-0001。

^⑧ 《课程标准》，《西安联大校刊》第 2 期，1938 年 10 月 1 日，第 12 页。

的：家政学概论；b.关于衣的：织品与衣服、实用服装学、衣服洗染及调色；c.关于食的：食物选择及调色、食物分析、生理化学、食物经济、食物细菌学、营养学；d.关于住的：家庭布置、园艺学及庭院布置、家畜饲养；e.关于医生的：疾病大意及医药常识、家庭卫生看护、儿童保育；f.关于管理的：家庭管理、家庭管理实习及家庭参观；g.关于教育的：健康教育、儿童心理及儿童教育；h.毕业论文编制”。并且还开设了许多选修课目，包括“图画（自然画、图案画）、刺绣及编织、音乐唱歌乐理弹琴、高级服装学、高级烹饪学、家庭工业化学、家庭机械学、护病学、统计学及家庭调查、民众教育、工艺。”^①从中可见课目种类甚多，凡衣、食、住、卫生、管理、教育等课目几乎都涵括在内，以致于三四年级每学期必修课目之学分数超过部定标准一二学分，选修课目，尚未在内。另外，家政系还开办儿童保育实验室，“招收满二岁以上未满四岁之儿童。”其宗旨“补助家庭教育之不足，增加母亲工作之效率。注重实验，藉供做行。……本室对于儿童注重科学的养护，活泼之指导，环境力求生动，设备力求适宜。”^②

并且，齐璧亭在退居后方期间，继续把家事教育普及到民众去。“他一面在城固和兰州举办家事教育实验区，一面捐出个人的薪资，作为中等学校家事科设备费，以提倡陕、甘、川等省女校家事教学，借以推进后方各省的家事教育”。^③如1939年4月，齐璧亭在城固开办家事讲习班，讲授“‘衣服学’、‘食物学’、‘育儿法’、‘家庭布置及管理’、‘家庭卫士及看护’、‘手工’等六科，由家政系三四年级同学分别担任讲授‘衣服学’及‘手工’二科，讲授与实习同时进行。‘食物学’因人数众多，分为三组，每组隔周实习一次。‘育儿法’‘家庭布置及管理’‘家庭卫士及看护’因学校无此设备，则轮流参观学生家庭，藉以实习之……诸任教同学颇为热心，所教授教材均应学生实际之需要，故尚能引起学生之兴趣，是以上课情形甚佳。”^④

另外，齐璧亭还积极要求加强家政教育的基础工作，在大后方推行女子教育。1938年，齐璧亭呼吁，“家庭改善为社会进步之基础，家事教育为普通女子教育之中心。此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诚以家庭良好，可促进个人身心之发展，以增加建国卫国之力量；而女子天性宜于家事，应切实予以特殊训练，俾能发挥家庭之效能也”。提出七条建议，主要包括：“请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对于家事教学，应聘请合格之师资，购置合于标准之设备”；“各省教育厅……选择设备完全，成绩优良之女子师范一二校，令仿照体育及劳作师范科制度，添设家事师范科，以造就完全小学之合格家事（劳作）师资；”“全国师范学院，皆设置家政系，以广储中等学校合格师资；”“请教育部颁布各级学校家事设备标准”等。^⑤

齐璧亭的呼吁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回应，1940年2月，教育部委托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拟编高、初级家事、缝纫、刺绣、烹饪各科职业学校课程及设备标准，务于本年三月底以前呈送到部。”^⑥家政系接到训令后，迅速组织师资力量，编制了《高级普通家事专科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和《初级普通家事专科职业学校课程标准》，把培养目标定为性能和人材两个方面，如《高级普通家事专科职业学校课程标准》主要包括“训练处理家事及督导工作之能力”、“涵养对于家事之研究兴趣及改进志愿”、“陶冶主妇应有之健全道德”以及“养成社教机关之家事教育部主任、中心小学劳作教员、幼稚园保师及儿童保育院主任或保师。”^⑦《初级普通家事专科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大致类似，只是标准有所降低而已。这两份课程标准上报后，教育部比较满意，批复“大致尚可”，并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⑧

^①《课程标准》（续），《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1938年10月15日。

^②《本校家政系儿童保育实验室简章》，《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939年6月15日。

^③《教育家齐璧亭先生》，《宁津文史资料》（第10辑），第61页。

^④《为报本校二十七年度社教工作报告的呈》，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078-0006。

^⑤齐国梁：《实施家事教育与培养家事师资》，《教育通讯周刊》1938年第40期。

^⑥《教育部训令》高字5418号，中华民国二十九年2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33-001-0089-0008。

^⑦《高级普通家事专科职业学校课程标准》，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209-0002。

^⑧《教育部训令》中字第45866号，1941年11月2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108-0001。

在此期间，齐璧亭痛感“后方中等学校无论国立、省立（或市县立）对于家事教育异常漠视，……其购置有家事科设备，聘请专门教师、遵照部颁课程标准，认真教学者直如凤毛麟角，似此情形，非但蔑视女子特殊教育，抹杀女子天性特长，俾家庭经济、卫生、教育等事无由改善，而对于社会进步，国家建设亦有莫大阻碍”，故向教育部拟请1941年休假一年，“分赴陕、甘、宁、川、黔、滇各省考察中等女校（及男女合校之女生班）对于家事教育之设施及其不发达之原因，顺便考察各省社会情形及家庭生活状况，以便草拟促进家事教育计划，建议教育部采择施行，在考察期间并拟对于各省教育当局及各校院生说明家事教育之重要及推进方法，以为将来促进之地步。”^①教育部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不久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齐璧亭兼代兰州分院主任一职，故休假进修计划只能延至1942年。

1941年，齐璧亭再次致函教育部，指出，“家事教育为改进社会、建设国家之基础，家事教育不发达，不能谋个人身独立健全发展，不能培育健全之个人，对于社会改进、国家建设，俱有莫大之障碍”。批评大后方家事教育种种弊端，“环观后方各省学校，小学无论矣，中学及师范对于家事学科之设施，十之九亦付缺如”；社教机关“推行此项教育者，亦少。间或行之，亦不过形式上之宣传，而无实际上之督导及训练，致收效极少。”提出全盘救正及推行的四条办法，包括“请令各省选送学生投考，为各省中等学校广储家事师资”；“请令各省选送受训学员，迅速推行各省家事教育”；以及“请令各省宽筹家事设备费”、“培植各学院家事教员”。^②

总之，抗战时期齐璧亭竭力坚持家政教育，家政系“师生得以赴陕甘两地继续教学，藉留我院之一线生机，乘机推进后方家事教育。”^③如1944年秋，甘肃省教育厅下令各女子师范学校加授家事学科，为此，平凉女子师范学院致函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希在家政系毕业学员中代本校预约专任家事科教员一人”。^④学院遂转“城固齐璧亭先生，甘平凉女师聘家事教员一人，……请代聘迳复”。^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返省复校，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依然保存下来，其系主任就是原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教授王非曼女士。

三

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10月，河北省政府还治，着手战后复员工作；其中，教育复员计划规定，“使本省教育迅速恢复战前规模，并使切合国家教育方针及本省实际需要，奠定教育建设之基础”。^⑥河北省教育厅也决定，“改进高等教育，恢复原有院校，充实设备，以培养建省人才。”^⑦

齐璧亭很快从兰州辗转回到天津，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信心，不辞劳苦地奔波陕、渝等地，积极筹备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复校工作。然而，早在抗战爆发初期，天津“学校中破坏最甚者，为南开大学、女中及小学……其次为省立女师学院，于轰炸之后，又驱使乱民入内行抢，所有残余书物，均被洗劫一空。”^⑧抗战期间，“河北沦陷后，各院校先后停办，各项设

^①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遴荐三十一年度休假进修教授候选人及考察计划》（1940年），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376-0010。

^② 《关于上报家事教育全盘纠正及推行办法给教育部的呈文》（1941年6月2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209-0001。

^③ 《女师学院周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十二周年校庆特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特刊委员会，1948年4月22日，第7页。

^④ 《甘肃省立平凉女子师范学校公函》（1944年6月16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566-0014。

^⑤ 《便函》（1944年6月29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案卷号33-001-0209-0003。

^⑥ 《河北省教育复员计划纲要》（1946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7-1-27。

^⑦ 《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工作报告》（1947年10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7-1-38。

^⑧ 《天津失陷之经过及现在之状况》，《西安临大校刊》第二期1937年12月27日。

备被敌人破坏或移去，损失极为重大。”^①天津收复后，原校址又被国民党军队暂住，虽然多方呼吁，收回了校园，“但摆在他面前的是断瓦颓垣，废墟荒草，徒空四壁的几座急待修葺的楼房”，^②复校可谓困难重重。

在齐璧亭多方奔波和呼吁下，1946年5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正式复校，为了弥补校舍不足，“天津市政府将省府后花园一部，拨借该院作为体育场。”^③8月，女师先就呈部核准之各科系，分别填招新生；9月，女师正式开学。至1947年6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基本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设置教育、国文、体育、家政、音乐等五系，学生127人，已渐入正规”。^④“惟家政系课程大部须以实验或实习佐证理论，而事变前之设备，又毁于战火，荡然无存，经多方年来之努力，已将科学馆（家政系各科所占用）设备逐渐充实，计有化学实验室，生物生理实验室，服装、织品与食物实习室等，各实验实习室之设备，已粗具规模，预计不久之将来可恢复战前原状也。”^⑤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河北教育事业，1948年6月，齐璧亭提议，“请省政府分别呈咨行政院及教育部，对于本省各学院，比照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特拨建设费，俾得修整房舍充实设备，以谋恢复而利进行案。理由：（一）本省当华北首要之区，高等教育，向称发达，各学院皆有相当历史及成绩，胜利后，以本省经费拮据，未能顺利进行，中央亟宜加以扶持，俾得恢复旧观，为国育才。（二）本省各学院虽系省立，与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同负为国育才之责，以经费数目太少，对于聘请教授及充实设备上均感困难，中央宜不分国立省立，一视同仁，就其所处特殊环境及其责任，俾得充分发展，完成其任务。（三）中央对于本省各学院已有补助，惟数目太少，值兹物价动荡剧烈之际，对于实际应用，相差甚巨。（四）各省高等教育机关，多由合成省立大学而改为国立大学，享受中央待遇，本省各学院，虽各自独立，中央亦不宜令其向隅，而背各省教育平衡发展之旨。”^⑥

同时，齐璧亭大力呼吁实行教育双轨制，重视家政教育。首先，他指出女子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固为建国最重要之一环；而师范教育又为此重要一环之根本。”其中，女子师范教育在建国的过程上，在社会的改造上，在未来民族生命的延续发展上非常具有重要性。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尤为落后。这不仅是教育上的大不幸，而实是国家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其次，批驳所谓“人的教育”的观点，要求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他指出，“所谓只有‘人的教育’，而没有‘男子’或‘女子’的教育，表面看来，似属平等，然就实际情形而言，却全然相反”。其原因在于，一则“女子教育远较男子教育为落后。如果男女合校，女子升学，需与男子竞争，机会自然较少，若女校分设，女子升学为女子与男子竞争，机会当然增多”，二则“所谓‘人的教育’的诸般措施，无论教学设备、体育设备、训导方法、课外活动等，均以男子为中心，对于女子鲜有顾及，这样将使女子的天性特长，无发挥之机会，而不能与男子获得平等之发展，所谓不分性别的单轨制，所谓‘人的教育’，不过是披着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漂亮的外衣，事实上女子教育作了男子教育的附庸，形成不折不扣的男子中心教育。”另外，“社会上，一般家长们仍然保存着旧礼教的观念，对于男女合校仍表怀疑，如果普遍的男女合校，又必然的减少了女子求学的机会。”要求针对男女天性特长，实行因材施教，认为男女平等“系指男女的人格而言，并不是说，男子与女子什么都需要一样啊！所以我们

^① 《教育通讯》（复刊第二卷第3期）1946年5月1日。

^② 《教育家齐璧亭先生》，《宁津文史资料》（第10辑），第61页。

^③ 《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工作报告》（1947年10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7-1-38。

^④ 《复员一年来的河北教育》，《河北教育》（创刊号），1947年6月1日。

^⑤ 《女师学院周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十二周年校庆特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特刊委员会，1948年4月22日，第7页。

^⑥ 《请省政府分别呈咨行政院及教育部，对于本省各学院，比照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特拨建设费，俾得修整房舍充实设备，以谋恢复而利进行案》（高提字第3号）（1948年6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617-2-289。

应该承认她们和她们所具有的天赋上的差异，……让他们和她们各自顺着自然赋予的途径，自由发展，将来担负自己所宜于担负的责任，这样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

最后，齐璧亭提出建立女子教育双轨制，“一方面她们仅可与男子同受教育，一方面她们有自己的教育系统。但是在这种理想的双轨制未成事实之前，唯一的接近的有效方法，就是女子学校的单独设立。”其中，在女师课程方面，他特别强调，“除却应与男子共同修习的科目外，尚应为了她们天赋的特长，为了适合她们未来任务，特别增设家事课程。”并强调，“中国社会的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国家的构成，也以家庭为基石，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就难望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所以家庭改进，在当前的中国，实具极端的重要性。家政教育就是改善家庭的教育，推而广之，由家而国以至整个社会的革新，都是家政教育的目的。”他还具体提出开设课目，“诸如家庭布置、家庭管理、家庭看护卫生、儿童保育、幼稚教育、食物选择调制、食物保藏、营养学、织品与衣服、服装学以及烹饪、裁缝、保育的实习等，举凡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常识、家事操作的训练、婴儿教养的知识、家庭副业的技能等，均应斟酌各级需要，尽量添设，并充实所需要之设备，以期达成建设良好家庭的目的。”^①

顺便说一下，齐璧亭还多次要求河北省教育厅、教育部解决 1937 年度毕业学生没有发给毕业证书的问题。“查本院每届毕业学生均系遵章举行毕业考试，成绩及格后，除发给临时毕业证明书，并由本院缮具正式毕业证书，呈请钧部验印发还，再行分别转给……。至二十六年暑假毕业生，本院亦依照成例，缮具正式毕业证书，呈送钧部验发；旋以抗战事起，是项毕业证书迄未验印发还”。后来，女师辗转迁徙到大西北，该届正式毕业证书更难部颁，故为补救起见，“拟遵照钧部颁发之修正学校毕业证书发给办法第七条之规定，按照毕业证书遗失办法，转请钧部核发毕业证书遗失证明书，以资证明。”^②

四

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家庭教育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影响极大，东方和西方国家都有家庭教育的理论和观点。就中国而言，关于家庭教育的传统观点有二种，一是就女子而言，培养“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二是就男子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西方而言，自 19 世纪晚期出现了近代家政学，以便提高女子自身修养。前者对于静止的传统宗法社会而言可谓极为适用，后者则适应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后生活的变革。

然而，齐璧亭的家政教育思想却与上述有所不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在中国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女子教育势必不能不与国家存亡兴衰联系起来，故不仅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方式明显落伍了，而且西方近代家政学也不能照抄照搬。齐璧亭认为中国社会病态的症结在于家庭不健全，欲改造多年积弱不堪的中国社会，建设富强的国家，应该从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改革做起，故其主张家政教育不仅强调女德、知识、家庭技能等培训，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家庭妇女，更是为改良社会，挽回民族命运。甚至在 1948 年他仍然坚持认为，“看完日本女子教育，回来设立家事专修课；看完美国女子教育，回来开办家政系。家事重于一切，一切基于家事。”^③这反映了他一生试图通过改造家庭进而改造社会的理念。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虽然与五四时期造就新青年和少年中国说等教育救国论异途同归，但是其把救国的关键放在改造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家庭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新的家政教育体系，培养家政师资，普及家政教育，在传播现代家事知识的同时，以深刻改变国民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为民族复兴培植根基。

总之，齐璧亭从事教育事业长达 30 余年，力主创办家政学科，为改革中国之家庭、树

^① 齐国梁：《目前女子师范教育应有之改进》，原载《河北教育》（第七届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特刊）第五、六期合刊，河北省政府教育厅编辑，1948 年 5 月 1 日。

^② 《呈教育部函》（院字第 372 号，1947 年 10 月 13 日发）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617-2-406。

^③ 《衷心的倾吐——会员报告选粹》，载河北省教育会议宣传组编印《会讯》第 3 号，1948 年 6 月 10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617-2-289。

立社会健全之基础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也推动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变化。1948年，女师举办42周年校庆时，特意指出，“家政系创设于民国十八年，为本院成立时与国文系首先设置的两系之一，毕业生服务各地，成绩斐然。”^①他关于女子家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今天仍然引发人们的学术思考和实践冲动。

^① 《女师学院周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十二周年校庆特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特刊委员会，1948年4月22日，第7页。

西北联合大学师范教育的精神品质

丁虎生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9月1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①。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三校师生历经艰辛,撤离平津。在西安与同时前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焦作工学院等院校合组“西安临时大学”,次年又徒步翻越秦岭,在汉中城固一带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开始了西北办学的艰苦历程。西北联合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他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不可低估。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和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文化精神。西北联合大学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域,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积淀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从西北联合大学独立设置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相当一段时间都自认为是“西北联合大学”的一份子,仍然继承和弘扬着这些优秀的传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文化品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一、尊严师道、奠基社会的教育理想

尊严师道首先表现在追求高深教育学术研究和维护教师培养的专业体系上。梁启超说:“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②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了高等师范教育存废之争和北平师大师生及校友为此开展的“护校运动”之后,大家认为,“师大者,乃聚精会神,目无旁瞬,以施此(教育)专业训练之地也。”故“师大之教学,在养成熟练教人技术,及确立对于教育上之主张与信仰”。^③就如老校长范源濂所说:师范大学“学生之德操也,研究之精神也,学校之行政也,教职员之品位也,苟有一未足为全国法者,斯未可谓之大。盖循师范大学之名而核其实,则不徒大其规模,丰其设备,多其部门,必也其声大而宏,其化大而远”^④。李蒸曾这样表达师范大学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师大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平庸的,而不是烜赫的。师大尚未能为国家培养出开疆拓土的领袖人物,尚未能为国家培养出有创造发明的学术专家,但师大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个青年导师,组成了国家的教育干部,这种力量是潜伏的,永久的,并且是踏实的社会基层。师大毕业同学担任国家教育的下层工作,为国家树人大计培植下优良种子。”^⑤培养大批“青年导师”,以教育奠定踏实的社会基层,就是我们的先师坚定不移的教育信念与理想,这也是我们的先师坚定不移地维护师范教育、倡导尊严师道的精神源泉。

西迁后,原北平师范大学各系主要组建在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育学院和文理学院。1938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刚刚徙

^① 《教育部第17728号训令》,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②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0页。

^③ 《本校教授为师范大学具有特殊别任务呈呈教育部长文》,《北平师大校务汇报》第24期,1932年11月12日。

^④ 林砺儒:《祝师范大学》,《北京师大周刊》第203期,1923年9月28日。

^⑤ 李蒸:《我校对于国家之贡献——37周年纪念讲话》,《师大37周年纪念增刊》,1939年12月17日。

步翻越秦岭迁到汉中的师生，接到了教育部根据《方案》发出的训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①从此，被组建在西北联合大学的各所院校，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的历史责任。

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急谋实施。……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需要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制而急谋设置。”教育部根据这一纲要，颁布《师范学院规程》，作为实施高等师范教育的准则，规定“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培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1938年夏，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八个系及劳作专修科，同时，筹设师范研究所。1939年2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西北联大李蒸、徐诵明、胡庶华三位常委参加会议，以西北联合大学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中国教育学会西北分会向大会提交了“师范学院应一律单独设立案”^②，获得通过。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40年2月28日，教育部长陈立夫致函李蒸表示：“西北师范学院实为师大之支衍，昔日师大之精神，将因此而永远扩展于西北，在师大同仁必有吾道西行之感”，西北师范学院将“永留西北”，“共图师范教育使命之完成，为民族复兴奠立精神之基础”。^③李蒸表示，“我校此后之使命将益形重大，不但要继续发扬师大精神，并且要奠定西北高级师范教育基础，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学校迁到兰州后，李蒸院长指出：“虽说受时代的影响，物质设备感觉不够，但是，本校所负担之使命，在校内为训练未来中等学校精神健全师资与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在校外为协助西北各省教育当局发扬西北文化及西北教育，这是政府规定本校应有的责任，本校为西北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对于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均应参加，总括言之，本校应积极致力于（1）恢复民族固有道德；（2）提高原有文化水准；（3）推进西北公共教育；（4）供给人们精神食粮。”^④西北人民对这些学校寄予厚望。当时西北的媒体评论西北地区的师范教育时说：“在今日西北区域教育而言，则凡负责造就师资的机关，谅必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事施教、因时施教、因材施教，以此种活的教育方法，培养适应西北环境之师资，然后始能培养建设西北之真才，而完成开发西北之目的”。“目前西北方面之高级师范教育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负其专责，抗战以还，该院本昔年北平师范大学乐育英才、研究学术之精神，教师均具信心，为教育而作师，得英才以自乐，以故人才辈出，出任西北各校教师，逐步解决中等学校师荒问题，良以该院为西北精神、国防及复兴民族文化负有重大使命，故不能不作更进一步之努力，以为开发新西北多做建树也。”^⑤自组建西北联合大学以及各学院分设为“西北”打头的六所大学，这些学校都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结合起来，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

二、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价值追求

1947年，曾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为《毕业同学录》题词：“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并以他别具一格的国音字母书之。题词中“知术欲圆、行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

^② 《中国教育学会西北分会向全国教育会议提案之一部》，《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1939年4月。

^③ 陈立夫致李蒸的信，见王嘉毅等编《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02-2012）》，第9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④ 李蒸《国立西北师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感言》，载《西北日报》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⑤ 西北日报社论《师范教育在西北》，见《西北日报》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旨须直”句，深刻地揭示了知、术、行、旨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取历史上形象反映西北地区自然风貌与人文特征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圆”和“直”两个意象，巧妙地表达了对学问和人品两方面的崇高追求，即老子所谓“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渊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①题词意韵深邃，儒雅考究，对仗工稳，特色鲜明。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备受师生的推崇与喜爱。黎锦熙先生的题词，并非突发奇想的应时之作，而是长期践行和思考的结果。黎锦熙先生在西北联大及西北师院的讲话中，多次阐述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宗旨、知识与生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归纳起来，实际上都是“知”“术”与“行”“旨”的问题。因此，“知术欲圆，行旨须直”，是黎锦熙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的学术实践与教育理想的高度概括，是对学校厚重的文化沉淀的精彩提炼，也是对学校学风教风和师生精神状态的美好期望，彰显了学校精神文化的特质，表现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教育理念，被西北师范大学作为校训。

李蒸认为，大学有三个要素：第一，有一个学者的集团，此项学者的集团必须有授予他人以学位，及学术上荣誉之权威；第二，进大学的学生必已受过充分的普通文学和科学的训练，有被指引研讨特殊的专门学术的能力；第三，应用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及出版物等得以保存知识、发展知识及散布知识。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这三种要素，否则不配称为大学。大学的功用不只是研究学术，尚须同时顾及社会服务，正真的大学生必须一面研究学术，一面服务社会，研究学术的学生，不但应有研究能力，还应有服务的经验。研究所的任务，一方面研究教育学术，一方面造就教育专门人才，所以研究所才是真正的大学，研究生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师大之所以必须设立研究所，原因即在于此。^②

黎锦熙先生认为，“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只有在广博的常识基础上，个人的专业技能才能够得到好的发展，才能够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学术。他曾在1940年对西北师院新生说：“无论求学和做人，都要以广博的常识为基础。例如没有广博的常识，尽管专精一门，成了一个专门学者，也是没有出息的。……这种专家出来办事，除开他所专精的一个小范围以外，一切都不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应用他所专精的学理，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因此更加重视将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他认为，所有理性的生活都是学习，因为它包括经验的解释和改造。因此，教育必须像文明生活一样，是一组可以共享的经验。为了获得经验，解释和改造经验，每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都应当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完满、完善与永恒的社会价值，并“专精”于这样的宗旨，以达致“动必有功，处必能久，遭遇任何艰难阻碍，信仰不变，努力不止，以抵于成功”的效果。^③

西北联大的学者们面临着艰辛的生活，缺少研究设备和参考资料，他们却始终注视着自己的脚下，注视着自己所处的区域里需要研究的问题。孔宪武先生曾经受聘河北大学教授，但在教学中感受到了在中国植物学方面的不足，于是放弃140元月薪的教授职位，应聘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当一名月薪30元的练习员，从头做起，研究中国自己的植物学，最终成为植物学大家。何士骥先生从发掘城固张骞墓到考证兰州西北师院校园的明代烽燧；黎锦熙先生从撰写《方志今议》到完成陕西数地《方言谣谚志》等等，这些学者从不好高骛远，他们脚踏实地，就地取材，取得了立意高远的优秀学术成果。辛勤耕耘在这里的先师们，蜗居在兰州十里店的小屋内，土墙纸窗，一张书桌，一盏煤油灯，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坚守着教育的精神与品德，李嘉言先生1944年元旦贴在住所门上的一副对联可作为这种精神品

^① 王利器注《文子疏义》卷七《微名篇》，中华书局2000年9月版。

^② 李蒸：《在北平师大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讲演》，《师大月刊》第8期，1933年9月28日。

^③ 黎锦熙：《四十年来来的国语运动——“提高”与“普及”相反相成，是师范学院最重大之使命》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出版。

德的写照：“门前拓展无穷路，面北欢迎有德人”。

西北联大许多教授都表现出了刚直不阿、素白不污的精神气度。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西北联大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大会，举行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西北联大常委胡庶华曾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的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许寿裳先生在受到监视和排挤中仍坚持宣传鲁迅的思想；黎锦熙先生公开支持学生反对解聘进步教授的斗争以及为避免“身兼数役”影响工作而辞去院长职务；李建勋先生直言：特务分子“恶毒卑劣的手段只能禁锢人身，决不能禁锢人的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将来是非自有分晓”；李蒸院长为聘请了一位不称职的教授而向学生公开道歉等事例，不胜枚举。

三、公诚勤朴、爱生崇教的管理取向

“公诚勤朴”是西北联合大学的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公以去私；“诚”是不诚无物，诚以去弱；“勤”是勤奋敬业，勤以开源；“朴”即质朴务实，朴以节流。表达了西北联大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期，团结合作，研究科学，培育人才，以教育学术的力量，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

李蒸强调“学校当局之立身行事尤为重要，校务处理必须能以‘公诚’二字出之，视学生如子弟，遇有过失，必须负责纠正，不可放任纵容，本爱护之热情，立严师之教范，果能如是，则校风自然培植起来”。“学校教职员必须能负责领导学生，举凡思想方面、课业方面、生活方面、精神方面，均能以身作则，以教育家态度教导学生，以最大热忱为学校服务，则学生未有不敦品厉行、服膺教诲者”。^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高校极力推行训导制，加强对学生的控制。但西北联大及西北师院的训导工作却超越了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学校管理处倡导“公诚”二字，“训导的态度，不但对学生相见以诚毫无任何虚伪，并且处处出之于恳切与同情，以成全爱护为主，既不借题发挥，亦不感情用事。但是学校的规章必须遵守不渝，毫不通融，否则不独是学生的错误，而且是执行规章的教员的错误。惟其如此，方能从贯彻学校规章而提倡学生自动的能力，尊重共同制定的规约”。二是讲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凡是一种训导措施，都力求其学术的根基，随时以研究的结果来改进”。^②

因为西北师院早就有开展“训育制”的优良传统，因此绝大多数教师从学术上、生活上严格要求学生，但不控制他们的政治思想，相反，还有很多教授主动救助被国民党军警等机关逮捕的进步学生。因为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包括后来分离的各学院，在西安、汉中一带办学，离延安很近，学校内部也有地下党和进步学生组织活动，因为这些原因常有学生被抓捕和关押。王凤岗、袁敦礼等先生都曾数次出面担保和营救被捕学生，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照顾是毫不惜力，并且是细致入微的，想方设法不让学生再被关押起来，也反映了当时亲密的师生关系。

兰州建校之初，师生生活十分艰苦。但师生精诚团结，“以有余之精神补物质之不足”，不仅建起了初具规模的高等学府，还继承和发扬了西北联大的优良校风，工作有条不紊，面貌日新月异。当时教务处的康绍言老师管理着学生注册及考勤工作，由于他能很快认识每一个学生，上课时到每所教室的窗口看一眼，便知道谁没来听讲，因此学生赠送雅号为“照相机”。学校没有电灯，晚上开会或有大的活动用汽灯照明，学生平时上晚自习，每人每周发给两到三支土蜡烛，学生大都不够用，因此，老师们总是教育学生要“日出而作”，充分利用好白昼。学校没有浴室，流行“干浴”，早晚用干毛巾搓擦身体，简便健身。学生都是互相理

^① 李蒸《西北师院的使命与校风》，载《北平师大、西北师院三十八周年纪念专刊》1940年12月。

^② 《训导概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务概况》1941年6月。

发，自己拆洗缝制被褥，自己装订笔记本，自买颜料冲制墨水，校园生活如此艰苦，节俭成风，虽苦尤乐。

四、雅化风俗、变换气质的人格陶养

北京高师时期，陈宝泉主张对学生均“以成己成物为励学及服务之方针”。“关于精神之修养，则有德育演说、名人讲演、自治谈话、静坐法、雅乐组等以陶铸之，使学生动静交养，既变化其气质，复陶冶其性情，总期身心调和，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形成了“沉毅朴实、不骛声华”的独特校风。1940年，李建勋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对学生管训工作的看法：一、他认为导师制是在大学可行的学生管训方式，但应当严格遴选导师，“理想之导师，除专门学识外，应具有健全人格、职业道德、专业精神、科学头脑及领导能力”。二、“环境可以影响人生，教育在乎控制环境；所谓设备者，乃在布置适当之环境，使生活于其间者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教育目的”。他建议学校安排专门的师生谈话室，支持师生交流的各种文化活动，增加学生与导师见面交流的机会。

在城固办学期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对学生的管理和训导工作，立足于培养有健全人格的教育家，为青年树立楷模，为国家扶植正气。以培养具有崇高气节和良好生活习惯，对人类万物富有同情博爱精神，对职务具有责任心与义务心，对国家社会富有创造勇气与建设技能，对事具有明是非辨真伪的能力的教育工作者为目标。坚持如下方针：“养成专一坚定之信仰与忠党爱国之精神，养成服务精神，养成合作精神，锻炼坚强体魄，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养成欣赏艺术之兴趣与高尚娱乐之习惯，养成教学不倦之精神与教育救国之信念，养成崇尚气节之精神，养成寻求真理之态度。”十分重视“陶冶人格”之“特殊环境”的营造，一是在学生的“社会生活”方面，注重情感与意志的陶养；二是校园氛围方面，注重营造有利于训练师资、陶冶人格的特殊教育环境。

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以来，学校就特别重视校风建设，特别是迁兰州建设新的校址，而且学生也是在兰州从一年级招起，逐步过渡到各年级齐全，实际上容易造成校园文化特别是学生文化的断裂，因此，学校十分重视精神文化的继承和优良校风的传承。大学生活需要导师善为督导，但更需要学生本身具有自愿、自动、自觉、自律的精神、习惯和倾向。为养成上述各项德性，就必须在课外开展各种活动，需要开展这些活动的学生组织。当时院长李蒸和训导主任袁敦礼对课外活动组织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放手信任、鼓励推动、专业指导、解决困难”，校内课外活动组织层出不穷。学生班代表会在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办理有关发扬全院精神及改进团体生活的各项事宜，具体包括迎新活动、本院成立周年纪念游艺会、欢送毕业同学会、新年同乐会、远足旅行等。另外还有各种社团组织，如三民主义研究会、国剧社、话剧社、国乐团、诗社、文会、歌咏队、书画研究会、棋社等。各系还有同乡会、同学会以及壁报社、读书会、演讲会、体育比赛会等社团。这些社团都聘请教师指导，曹配言、唐得元、陈澄然、庄肃襟、殷祖英、陆懋德、张德馨、朱春芳、李嘉言、叶鼎彝、焦菊隐、吴樾荫、沈伯平、舒明斋、李德慈、袁敦礼、易价、黎锦熙、王璈、谭戒甫、王如弼、张永宣、龙文、蔡锺瀛、孙一青、张万里、李世权等先生，都是学生社团的积极指导者。学校每遇周末或节庆日，院内体育活动、文艺竞赛、音乐晚会、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书画展览、墙报宣传等活动丰富多彩，各种演出异常活跃。话剧团、合唱团、国乐团、国剧团、秦腔剧团的演出极具专业水平，曾多次在兰州市内售票演出，很受欢迎。售票收入不仅为校内流亡学生提供了救济，还为演出团置办了布景片、道具等。

体育活动也成为“全院有蓬勃振奋精神之一大原因”。无论学校领导，还是一般教员，都很重视体育对学生的作用，不仅强调体育对个体人生的重要意义，更加强调体育对社会风尚的重要意义，在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的同时，激发作为师范生学习掌握体育运动技能的热情和对推广体育运动的责任。在袁敦礼、董守义、王耀东、徐英超等先生的指导下，学校

每季度都有球类比赛计划，各系科间的篮球、排球、足球、垒球比赛几乎天天都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的春季田径运动会更是学校的盛会，事前均由体育系同学筹备，仿照奥林匹克大会的形态，参与者除各系科的正式选手外，还有五光十色的啦啦队、助威团，真正达到了全校动员，“无人无事，无事无人”。平时还经常举行体育表演会、体育同乐日、越野赛跑、远足旅行等活动。各类课外体育活动，不仅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至大至刚、不厌不倦的弘毅精神

1938年6月，李蒸在为当年的《毕业同学录》所作的序中说：在全校师生徒步迁徙的过程中，大家“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精神奋发，秩序井然。比及月余，簧舍重整，教学载废，含辛茹苦，甘之如饴。此种勤劳耐苦之精神，殊足为诸君他日求学任事之助，望珍重爱惜，发扬而光大之，必有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古人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教育救国，良师兴国，皆赖此弘毅之精神，以达到任重道远之目的，诸君宜服膺先哲名言，身体力行之。”“寇深矣！时急矣！诸君毕业后个人对社会国家民族之责任，日益艰巨，宜如何激励奋发，以负荷此艰巨之责任，完成此救国兴国之伟业，愿诸君力行何如耳！庄周有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国难时期之教师，尤须有此艰苦卓绝之操守。”^①对于学校来说，这次艰苦卓绝的大迁徙所凝练出的精神财富，不仅留在了当时参与其中的师生心中，也是师大精神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在西北这样的特殊地域发扬广大的典范，值得后学永远记取和学习。

西北联合大学的办学及师生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当时，学生在旧庙宇、教堂和祠堂改建的教室里上课，没有床，就睡地铺。学生上晚自习用油灯或土蜡烛照明。在西北联大，内迁高校学生着装的朴素程度竟成为当地人判断学生年级的标准：“因为衣服愈破，就表示他年级愈高，……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朝气，看见他们的破破烂烂，而又蓬蓬勃勃的气象，便会感觉到，这是真正代表中国民族的年轻一代”。^②教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教育部规定教师的工资按“抗战期间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但很多教授表现出了不畏艰苦，不计报酬的爱国主义精神，仍坚持与学校在一起，尽心尽力搞好教学。为了充实学习研究和生活的内容，师生成立了各种戏剧组织，自发自创自演，话剧团、京剧团、秦腔剧团都有，人才济济，水平不低，经常排练演出，1938年西北联大青年大学生联合中学爱好话剧的学生，组织“陕南学生剧团”，排演了《这不过是春天》、《春风秋雨》、《古城的怒吼》等爱国话剧，为抗战动员和战时环境下活跃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在复校运动中，校友倡议“吾校师生秉至大至刚之正气，振不厌不倦之精神，流离播迁，艰辛备尝，钻研攻错，晋修罔替，……希全体校友加强联络，互利互助，以教育精神改良政治，以政治力量发展教育”。^③1945年12月17日，易价先生提出：“我们复校工作根据‘原名称、原地址、原任校长复职及本院师生全体返平’三原则进行，不达目的，决不终止。为发展西北教育起见，我们一面进行复校工作，同时应当协助建设西北师范学院，二者并行不悖，使师大还于旧都，发扬光大，在兰州成立永久的西北师范学院，共存共荣。奠定高级师范教育制度，促进国家文化建设。”齐国梁先生在代表教职员强调：“抗战胜利，各校复员，我师大理当还于旧都，但吾人对于高级师范教育，宜双方尽力，西北师范学院现已有相当规模，为了继续发展西北教育，故不能弃西北师院而不顾也。”^④表现了崇尚教育、热爱事业的大局

^① 李溪桥主编《李蒸纪念文集》第151-1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 刘利民：《走出一片蓝蓝的天——西北联合大学记忆》，百度文库教育专区之“高等教育”。
<http://wenku.baidu.com/view/4f0ac6d226fff705cc170a2e.html>

^③ 《师大及本院成立四十一周年纪念专号·校友总会第四届年会及理监事会议报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61期，1943年12月17日。

^④ 《校闻·复校运动之一段》，《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81期，1945年12月31日出版。

观念。

六、文化绿化、树人树木的环境美学

在校址频迁的过程中，动员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建校劳动成为学校的传统。在陕西城固办学期间，虽然大部分校舍是租用的临时场所，但师生对环境的美化从没有懈怠。学校经常组织师生修筑道路、布置校景、清洁卫生等美化校园环境的劳动。当时学校一部分在城固县文庙，学校图书馆为文庙尊经阁，馆长何日章先生撰文赞美其“高阁凭城，榆柳四合，碧影满窗，市声不闻；阁上游廊环绕，可眺汉江，颇似故都北海公园览翠轩。读倦凭栏，令人意远，诚学子潜修地也”。^①

在兰州选择校址时，李蒸提出三条原则：第一，学校不能设在城内，而应选择距离城区10—15里的地方，一则可防日军空袭，二则可避免城市商业气氛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第二，要交通方便，最低限度要能通汽车和人力车；第三，必须见到黄河，一是数千人生活必须保证不发生水荒，二是风景问题，大学校园须有优雅环境，必须保障绿化美化校园的灌溉水源。并确定建设校舍的原则是：规模须朴实远大，材料须就地取材，设备须新颖充实，作用须费小效宏，房屋位置须联络与疏散兼筹并顾，以防意外。直到今天，西北师范大学校园建筑的布局结构，都深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呈现出“朴实远大、疏密兼顾”的特点。

迁兰后的西北师院院址，是久荒的沙石土壤，干旱强碱。李蒸院长在勘定兰州十里店校址时，曾独自坐在黄河北岸，憧憬未来，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将要兴建起一座高等学府，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他也曾畅想，将在这里崛起的高等学府，绿树成荫，花木满园，师生学习生活的环境优美。但面对现实，他也曾感慨：“我们的校景，实在是不大美观”。因此，学校经常动员师生参加平整校园、修筑道路和植树绿化等校园建设的劳动。1943年秋天，西北师范学院以“树人树木贵在同时，文化绿化乃能并进”为主旨，大举植树，绿化美化校园。今天校园里仍有许多当时栽种的树木。

为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尽其所能改善实验条件，学校建起了史地绘图室，购置了测量、绘图的仪器设备；建起了理化实验室，有化学、物理实验仪器设备百余种，多属自制；建起了博物实验室，有生理解剖等设备及1600种标本和模型切片；建立了烹调进餐、裁缝、技艺、洗染、家庭卫生及看护、家庭园艺及家畜饲养等6个家政实验室；建立了木工、锻工、翻砂、案工、土产工艺、家事化学工艺、农产制造、畜牧农业园艺等8个劳作实习室。学校附设的附中、小学、幼儿园、生产农场，都是学生实习的场所，所有学生在学习期间都得作一段时间的课堂教学和辅导，学习教育行政课的同学还要实习教育工作。同时，学生还要利用假期进行社会教育实践，要求学生到农村办学校，组织动员农民上学，为农民编写教材，并和农民一起活动。

^① 何日章：《谈谈本院图书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45、46、47期，1942年8-10月。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

王淑红, 邓明立

(河北师范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对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在抗日战争时期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成为其四校一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作首次考证分析,并试图理清其西迁办学经过、专业系科设置、主要教师与其学术活动等历史事实。研究表明,在齐璧亭(1883—1968)、王非曼(1897—1977)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秉承兴学救国、保存文化火种的理念,将富有特色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从而注入西北高等教育新的教育元素,同时也保存了中国女子师范教育的根脉,成为战时高等教育的重要篇章之一。

关键词: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家政学系;齐璧亭(1883—1968);王非曼(1897—1977)

1937年,迫于时局的紧迫,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和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两个重要的大学联合体应运而生。1946年西迁办学的各地院校大多回迁原址复校。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即为此联合体的成员之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建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为今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在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历程中,独享创校时间最早、独立设置最连贯、办学体系最完整的殊荣。1937年9月,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在西安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至陕南城固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称中华民国十大著名学府,全国排名国立大学第三位,仅次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9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流重组,其中包含女师主体的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此后人们依旧习惯上把从中分离出来的仍在城固办学的各校统称为西北联大。女师在西北这片广袤而富有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扎根,多年呕心沥血经营的血脉在动荡的时局中得以存续,对抗战胜利后的顺利复校功不可没,同时也在西北远播先进文化。目前,关于女师西迁办学的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不但鲜有专门的论述问世,甚至在为数不多的记述西安临大构成的文字段落中对女师也是闭口不提,经常被省略在“等”的行列^[1-4]。这显然和女师独特的历史地位不相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关西安临大的研究相对较少,与其相关的女师自然也很少被挖掘;二是资料匮乏,尤其是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烧毁或散失;三是女师在天津复校后不久又分流天津美院,而且把校址从天津迁到石家庄,迁移过程中有些历史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

我们通过搜集和整理女师自办刊物以及散落在校史著作和相关文献中的历史素材,客观公正地对女师西迁办学的历史进行较全面系统的复原,试图对女师西迁办学给出合乎事实的评价。

一、大致经过

女师是河北省在1929年为培养中学师资批准成立的。按照国内大学追溯到学堂的惯例,女师要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6月在天津建立的北洋女师范学堂谈起。创办人为袁世凯委派的天津女学事务总理傅增湘。光绪三十二年(1906)6月1日,北洋女师范学堂举办招生考试,

首批招生 46 人,6 月 13 日正式入学。《大公报》刊发新闻说:“从兹女学校发达当以此为基础”。

《教育大辞典》说:“北洋女师范学堂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创建初期,规模很小,属中师性质。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校名几经更迭。1912 年春,改称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3 年 5 月,改称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6 年 1 月,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8 年 9 月,改称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9 年 6 月,为培养中学师资,经河北省政府决定,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内增设女师学院,由著名教育家齐壁亭任院长。院训是:崇实、明理、守法、合作。暑假内在天津、北京两处招收国文、家政新生两班,9 月 10 日开学。1930 年 9 月,院校合并,以学院为总校名,分设学院、师范、中学、小学、幼稚园 5 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中国当代许多名家,如:曹禺、萧乾、冯沅军、李何林、丁善德、陈铎、张洪岛、张汇兰等,都曾在女师任教,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士,为国家教育输送了许多栋梁之才。截止抗战前夕,历经 8 年的发展,女师已经初具规模,发展态势良好。可惜,一场史无前例的侵略战争使得女师多年经营的心血几乎荡然无存^[2]。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7 月 30 日,日军对天津狂轰滥炸,女师院舍毁于日军炮火。学校器物被掠,损失中外图书 57 000 余册、中文期刊 210 种,院务陷于停顿。

在时局严峻时刻,院长齐壁亭率学生退入天津英租界,经商洽,由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将女师附属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分别收容。附属小学部学生在志达小学继续上课,只有学院本部学生在租界各私立高校没有相应系科,无法安置。

齐壁亭提出申请,即“当于九月间晋京向钧部面陈学院被毁情形,并请示复课办法。”经教育部核准,同意女师用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并迁西安办学。在齐壁亭的带领下,部分师生辗转西北,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等校合并,在 1937 年 9 月 10 日正式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 年 9 月 18 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西安 17 日专电:“西安临时大学,设备方面,尚需教部接洽,开学约在九月半左右。”西安临时大学设有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等 6 个学院。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和女师的家政学系组成,共设 10 个系。女师学院最具特色的家政学系建制迁入,维持独立建系,其他各系学生分别转入西安临时大学各系^[5]。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教育重组,实现了多院校融合,也使得后来的西北高校有了更为稳固的根基^[6]。齐壁亭任家政学系主任,教师主要有女师的程孙之淑教授、王非曼教授等。女师自此开始了长达 9 年战时颠沛流离办学的艰难苦旅。

1938 年春,由于敌机不断轰炸西安,使得师生不能安心上课。1938 年 3 月 16 日,西安临大南迁。师生们怀着共赴国难的悲壮和教育救国的信念,经历艰难跋涉,历时月余,4 月顺利到达陕西汉中,以城固县为中心驻地继续办学。复奉命改西安临大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 9 月,西北联合大学进行再次分流和重组,以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为基础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医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女师融入其中,从此开始了国立西北五校分而有合的新的新的发展时期。

1940 年 4 月,国民政府鉴于城固县地处偏僻,高校较多,下令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至甘肃兰州,在兰州十里店选址建校,采取兰州招收一届新生,城固毕业一届老生的办法,逐步将学校迁至兰州。1941 年 4 月成立 29 人组成的兰州分校建筑筹备委员会,齐壁亭任兰州分院主任。兰州第一届新生招收 200 余人。1941 年 12 月 3 日,举行开学典礼^[7]。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女师相继从上述学校析出回迁原址复校。11 月,河北省教育厅派女师原庶务主任李荫珂为接收员,接收女师校产。1946 年 1 月,河北省教育厅任命李荫珂为女师复员筹备主任,负责复校事宜,同时函请齐壁亭由兰州返回天津主持院务。齐壁亭历经 9 年的热盼,终于带领师生回到他苦心经营了几十个春秋的校园。面对残垣断壁,女师的师生振作精神,以最快的速度粗整校舍,于当年 9、10 月,附属中学、幼儿园、小学和学院本部先后正常开学。又经一年的修缮,校园焕然一新。复校后的女师设有教育、家政、国文、体育、音乐等 5 个学系。在齐壁亭等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

女师在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中薪火相传。

二、专业系科

女师迁至西北后,部分师生并入西安临时大学教育学院的相应科系,与各校师生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但也未尽失自身的发展特色,即便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也保有久负盛誉和富有特色的家政学系,而且对全国的家政教育都具有深远影响。

1929年女师初建时,设国文和家政两个系,各招生1个班。国文系主任为郑因伯,家政学系主任为单贵我。至1937年7月,女师已发展到拥有国文、家政、英文、史地、教育、音乐、体育等7系28班,师范部12班,中学部6班,小学部12班,幼稚园部3组,学生总数达2000余人。毕业服务于社会者遍及各省。学校声名远播,是当时全国唯一实施完整女子教育的著名学府^[7]。

女师家政学系学自美国。齐壁亭留美归来,曾数次向省教育当局建议,增设女子家政艺术学院。后经省政府会议决定,将该议案改为增设女师学院,为了保有原意,以家政作为学院的1个系。同时增设其他的系,广储女子教育的人才。女师家政学系建立之时,全国只有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等少数几所院校有家政系。女师家政学系声名远播,国内各方都来函询问家事性质、办理方法及应设科目,并索阅刊物,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8]。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期间,女师师生分别并入西安临时大学教育学院的相关科系,唯家政学系保持独立。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决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设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8个系及劳作专修科,齐壁亭仍任家政系主任,还建立了师范研究所,所长为李建勋,研究人员有韩温冬、许椿生等。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在城固,院长仍为李蒸。师范学院与西北大学隔壁相处,教授互聘,学生亦合班上课。同年,师范学院增设了公民训育系和博物系。至此,师范学院共有10系1科^[2]。1942年西北师范学院本部由城固迁至兰州十里店,城固部分改为分院。1944年11月在兰州时全院除原有的10系1科外,又增设了国文、史地、理化、外语、体育5个专修科。共有教员159人,职员66人,在校学生多达1011人。

1946年暑假后,女师在天津河北区天纬路原址正式复校。校名仍称女师。院长仍为齐壁亭。10月28日,女师开学。院本部共设有教育、家政、国文、体育、音乐5个系,每系各招生1个班,共招新生109名;附属师范招生两个班,计学生80名。附属中学初中招生两个班,计学生100名。幼稚园两组,招生60名。附属小学刚接收过来,所有学生编为8个班,计600余名。女师本部连同附属单位,共计有学生940余名。此后几年,学生又陆续有所增加,截止1948年底,学院部有学生300余名,连同附属单位,共有学生1500余名^[7]。1949年前所办各系中,家政学系最为出色。在全国知名的营养学家当中,就有女师的毕业生。1949年暑假之后,学院根据需要,取消了家政学系,并将其中部分业务并入教育系,在系内设立了幼儿教育专业。

三、主要教师

(一)齐壁亭

齐壁亭(1883—1968),名国梁,河北宁津县宁津镇五胡同人,是著名师范教育家。光绪三十二年(1907)进入北洋大学堂师范班。宣统元年(1909)毕业后在日本广岛师范学校肄业。宣统三年(1911)冬毅然回国投身辛亥革命。在河北宁津、广千、保定任教。1913年重赴日本完成学业,1915年入研究科深造。1916年回国,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1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接着进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两年。1925年回国,复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任女师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教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复任女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副主席。

1937年,他任职的女师共有学生2000余名,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女子教育的完善学府。“七·七”事变后,他率女师并入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及西北师范学院后,一直任家政学系主任。在西北任教的八年中,他一方面在城固和兰州举办家事教育实验区,另一方面捐出个人的薪资,作为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女校家事教育的设备费。1938年,齐璧亭被选为国大代表。同年由西北师范学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会后加入国民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函请回津,为复校不辞劳苦,奔波陕渝各地。当时的女师满目狼藉,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信心,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使女师焕然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工作,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参议,第一、二、三届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8年11月29日,因遭迫害,病逝于天津。1980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对其一生的功绩予以肯定和褒扬。他学洋不崇洋,富有民族气节。他既是“教育救国论”者,又是“教育强国论”的实践家。从民国初年起,把毕生精力用在了女子教育事业上,使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为各方面的建设人才^[2]。(二)王非曼

王非曼(1897—1977),幼名王淑静。山东省济南市齐河县人,是山东著名教育家王祝晨的长女。先后就读于美国3所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家政学硕士学位。从幼年就开始对学习具有浓厚兴趣,并得到父母全力支持。对于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个时代,王淑静犹如一个异类被全村人侧目称为王家又出了个半疯子。

1918年,王非曼从父亲来信中获悉山东省公派官费赴海外留学增加女留学生名额的议案在省议会获得通过,产生去省城读书、到国外求学的强烈想法。于是,毅然到济南,先是在南关广智院街家里自修,1919年暑假过后,去济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上了六年级。1920年暑假后又以同等学力考入济南女中三年级,但因与班上同学年龄相差悬殊,读了1年后,就在家自修课程。当时中学还是4年学制,但她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初小到高中的学业。寒假期间,幼年曾裹脚的她大胆地走进齐鲁医院外科,忍痛做了双脚放开矫正手术。1923年以全优成绩被录取为山东全公费赴美留学生,是当年仅录的两名女生之一,且成绩第一。出国前,将女性化浓郁的名字王淑静改为王非曼。

1923年8月,王非曼漂洋过海赴美留学。9月初,进入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化学系学习。1925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遂又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她喜爱的家政学。3年后,成为家政学理学士,但仍不满意,又报考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家政学系,1931年获得该学院的家政学硕士学位。

1931年春,王非曼留美8年后,满怀一腔报国赤诚回到国内,应聘到女师家政学系做教授。女师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开设家政学系最早者之一,王非曼则是开风气之先的最早女教授之一。当年女师家政系的专任教授中,齐璧亭、孙家莹、陈慧苏、孙金胜、黄玉莲、程孙之淑、王非曼等人,均为第一代留学欧美的家政学、教育学专门人才。几位女教授中以王非曼留学海归最早。

王非曼倾心在女师教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师范及中学家政学科教师,也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在开启女性智慧,提高女性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非曼随校西迁内地坚持战时办学,经历了8年多颠沛流离的文化苦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执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师范学院。

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学校成为动乱区,被战争弄得混乱不堪不能上课,教师学生相继离去。王非曼先是回到济南,不久即赴美与丈夫团聚,在美国定居,曾几次想回国任教,都因故而未能成行。晚年王非曼非常想念祖国,但不幸于1977年12月病逝异国他乡,享年80岁。

四、主要活动

女师的师生在西北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边坚持兴学救国的方针,继续对知识的传授和渴

求,另一方面也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情操,积极投身革命、保家卫国,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着宝贵的青春和年华。

(一)迎难而上,全力兴学

女师师生在战事不断、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激流勇进、排除万难,跋涉到西北,中间又经多次迁移和变更,唯有靠心中不灭的传道和求知的信念支撑。因为学校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所以每次迁移都是徒步穿越。从西安到宝鸡,从宝鸡又到城固,有时连续跋涉十几天,辛劳困苦不能好好休息。乍到城固时,居住的地方有限,全体新生只好合住在一个原来作为风雨操场的大草棚里。教师们大多居住在城内,天天起早贪黑徒步到城外学校上课,至少要走三四里土路。有的老教师则要一边手提皮包,一边强拄拐杖,一路连嘘带喘赶到课堂上课。当时社会黑暗,官员们贪污腐化,通货膨胀物价天天飞涨。学生们每月只有8元钱的饭费,根本吃不饱,能够承受住所有的辛苦都是因为把学校经营下去求知若渴的坚定信念。

(二)热血丹心,保家卫国

女师的师生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在祖国危难之时,并不是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毅然加入保家卫国的队伍。

因为城固驻有兵工厂,所以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扫射,环境很不安宁。每次轰炸,都需躲避一两天,不能正常上课。有时敌机来轰炸,地面有汉奸和特务给敌机打信号弹,当地人民和学生就紧密组织在一起抓特务。

抗日战争期间,因为西北是红色基地,所以国民党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十分严酷,教职员和学生不带证章和符号者,随时予以逮捕。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和兰州时,就曾发生过学生被捕事件。广大师生向往进步,积极从事各种进步活动,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出版进步的油印刊物,拒绝反动游行。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就曾在国文系的同学中秘密传阅过。另外,还出版进步的壁报和油印刊物。抗战胜利后,兰州发生反苏游行,学校停伙,强迫学生参加,进步的同学团结一心,宁肯不吃饭,也坚决不参加。闻一多、李公朴不幸被害的消息传至兰州后,学生们曾开过一些小型座谈会,出了壁报,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哀思,以及对反动派的无比激愤和憎恨^[9-10]。

五、历史意义

女师从1929年正式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齐壁亭长达九年殚心竭虑的经营下,逐步发展到有完整建制、声名显赫的女子高等学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种良性发展戛然而止,校舍被焚,图书被烧,学校面临灭顶之灾。幸而在齐壁亭的极力主张下,女师被国民政府批准西迁到陕西继续办学。女师的师生秉承兴学救国、保存文化火种的理念,历尽艰辛辗转到达陕西,并入西安临大,从而保存了女师的文化根脉。在西北历经九年坚韧不屈的奋斗,实现了连续办学的历史。辽阔的西北大地为女师储备了文化思想和优秀人才。抗日战争后,女师于1946年顺利在天津复校。从此,女师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教育、科技等战线培养了众多卓越人士。

抗日战争爆发前,女师地处对外港口城市天津,借鉴西方文化引进先进的家政学科,建立起完善的家政学系。在具有家政学系的学校中,女师的家政学系创建时间最早、独立设置最连贯、办学体系最完整。女师的师资力量雄厚,院长齐壁亭和女教授王非曼等人都是留学归来的专门的家政学人才。他们随女师西迁后,在西部地区身体力行继续推进女子师范教育,为西部地区注入了新的教育元素。齐壁亭一方面在城固和兰州举办家事教育实验区,另一方面捐出个人的薪资,作为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女校家事教育的设备费,同时走访这些地方的女校,助其筹建起家政学科,进而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家事教育。王非曼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女教授,则是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来开启女性智慧,提高女性社会能力和社会地位。抗日战争的8年,女师不但在西北招生并培育了一大批师范及中学家政学科教师,而且使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走

向社会,成为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是中国近代女子师范教育历史上辉煌壮丽的一笔。

西北地区如人才和思想的储藏库,平津高校如先进文化的营养源,通过各校师生的共通互融使得各个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生存和发展,成为战时教育的重要篇章。一方面,女师等平津院校的西迁,是抗战时期西北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为广袤的西北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实现了地处大后方的西北各校和西迁至此的平津院校的多元融合。如果没有这些学校的西迁,时断时续的西北各校就难以再生于抗战之中,也难于在短期内集合起强大的师资阵容和大学联合体。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西北作为依托,女师等京津学校就有可能在战争中消亡,无法保存其文化根脉,也无法储备和培养专门的人才,从而严重阻碍抗战胜利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女师西迁与各院校在战争中团结协作、相融共生,不但对女师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西部的教育和社会发展贡献了一己之力,使得河北师范大学增添了浓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情怀。在日益注重文化传承、文化创新的今天,女师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精髓和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必将是河北师范大学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之浴血奉献的前辈们也必将会永远载誉史册。

参考文献:

- [1] 姚远.西北大学的源流与承袭[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7(3):81-86.
- [2] 曹桂芳,张玉钟.河北师范大学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1-11.
- [3] 姚远.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0(3):127-131.
- [4] 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校史稿[M].修订本.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5] 彭子光.河北师范学院志[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83.
- [6] 余子侠,冉春.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71.
- [7] 王金生.百年树人——河北师范大学简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26-236.
- [8] 齐壁亭.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学系一览[M].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37:6.
- [9]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11-120.
- [10] 校史编委会办公室.河北师范大学简史(1906—1986)(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M].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校史编委会办公室,1986:15-18.

致谢:谨衷心感谢姚远教授提供的女师家政系原始文献、研究提纲和思路。

The History of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s

Moving West to Merge into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WANG Shu hong, DENG Ming li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nzhuang,
052204, China)

Abstract:As a member of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s four universities and one college,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 is one of the predecessors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t moved west to merge into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After the research of the experience, programs, teacher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of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 by analyz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his paper has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ith the idea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flam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Qi Biting(1883—1968) Wang Feiman(1897—1977) and others, it re-organised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College into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to inject new elements of education into the northwest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cious roots of Chinese women's normal education was preserved and it becam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chapt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artime.

Key words: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 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ome Economics; Qi Biting; Wang Feinan

北平大学的西迁之路

胡 佳, 白 欣

(首都师范大学 物理系, 北京 100048)

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考证法, 旨在理清西北联合大学成立的背景、始末, 为中国战时高等教育史研究做补充。本文系统梳理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西迁到西安, 合组西安临时大学, 又迁到汉中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结论: 西北联合大学在战火中成立与发展, 为保存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的成立是一次学术文化意义上的西部大开发。

关键词: 北平大学; 西迁; 西北联合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 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 众多高校纷纷内迁。其中,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西迁到西安, 合组西安临时大学, 后因潼关告急, 西安临时大学迁到汉中, 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后分离成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五校, 除西北师范学院外, 皆为陕西众高校的前身。尽管西北联大为保留中国教育火种、奠定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是学界对西北联合大学的研究较少,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80—2012的资源中, 按篇名搜索“西北联合大学”有16条记录, 搜索“西北联大”有4条。其中, 姚远^[1]教授的文章阐述了西北大学的京源和陕源源头。谷雪艳^[2]和苑旭森^[3]的文章概述了西北联合大学的整体情况, 但不够详尽。李巧宁^[4]则展示了学界对西北联大研究薄弱的现状及原因。而输入“西南联合大学”记录有69条, 输入“西南联大”有521条。由此可以看出, 学界对两所联合大学关注度的差别之大。所幸的是, 2012年恰逢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75周年,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大型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于2012年9月10日在古城西安西北大学举行, 此举定会掀起学界对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热潮, 为恢复西北联大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贡献。

一、迁徙前的北平大学

“四一二”事变后,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 推行“一党专政”。1927年6月, 国民政府组织大学院, 代替原来的教育部, 任命蔡元培为院长。1928年7月31日, 南京国民政府仿效法国正式公布推行大学区制, 全国分北平、江苏、浙江、广州四个大学区。同年9月, 国民政府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 以北平政治分会所管辖的北平、天津、河北、热河为大学区。把原有的9所国立高校合并为北平大学, 李煜瀛^①为校长。^[5]北平大学包含有女子文理、法、师范、农、工、商、医、艺八个学院。1929年7月5日, 国民政府命北平、浙江两大学区于暑假内停止。大学区撤销后, 有学院陆续宣布独立。到1935年8月, 北平大学为五院建制: 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夕, 北平大学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 教学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① 李煜瀛(1881~1973), 字石曾, 晚年自号扩武, 河北高阳人。中国教育家, 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任北平大学校长。

二、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据统计，我国的108所高校，17所由于战争破坏无法办学，14所勉强维持在战区，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火炬延续不断，剩余的院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学府大长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6]随后，除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外，平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3所国立高等院校，奉命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其目的是“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7]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①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本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之。”^[6]并规定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聘任李书华^②、徐诵明^③、李蒸^④、李书田^⑤、陈剑脩^⑥、周伯敏^⑦、减启芳^⑧、辛树帜^⑨等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脩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校务主持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全校设立文理、商法、教育、工、农、医六大学院，共二十四个系。^[8]第一院包含国文、外语、历史、家政四系，第二院包含工学院各系及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四系，第三院包括法、商、农、医各学院及教育、地理、生物三系。

三校师生赴西安报到困难重重，虽然临大规定各院开学日期为1937年11月1日，但“本大学本学期筹备伊始，所有教职员学生，前后到校，参差不齐。关于原三校院学则规定：“学生缺课逾三分之一者令其休学”一节，应即从宽规定。兹定于二十七年一月十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逾期令其休学。”^[9]又由于学生赴陕颇费周折，开学较迟，不得不延长学期，“延至二十七年二月底，为本学期终了时期。除二十七年元旦停课一日外，所有年假寒假，均不放假云。”^[10]

西安临时大学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立的，虽然学校条件极其艰苦，但全校上下同舟共济，仍坚持正常上课，教学中除课堂学习外，还有军事训练看护训练等。学校还派教师带领学生下乡宣传，并协助地方进行壮丁训练，以备战时特殊需要。

^①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法学家，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历任民国教育、宣传、外交部长。时任教育部部长。

^②李书华：（1889~1979），字润章，河北省昌黎人，物理学家，教育家。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

^③徐诵明：（1890~1991），字轼游，别号清来，浙江新昌县人，医学教育家和病理学家。时任北平大学校长。

^④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王攀庄人，教育家。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⑤李书田：（1900~1988），字耕砚，河北省昌黎人，高等教育专家。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

^⑥陈剑脩：（1897~1953），江西遂川人。历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院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委员、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高等教育司、蒙藏教育司代司长，江西、湖北教育厅厅长。时任教育部特派员

^⑦周伯敏：（1893~1965），陕西泾阳人，书法家、教育家。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

^⑧减启芳：（1894~1961），字哲先，又字哲轩，号蛰轩，辽宁盖平人。时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

^⑨辛树帜：（1894~1977），字先济，湖南省临澧人，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时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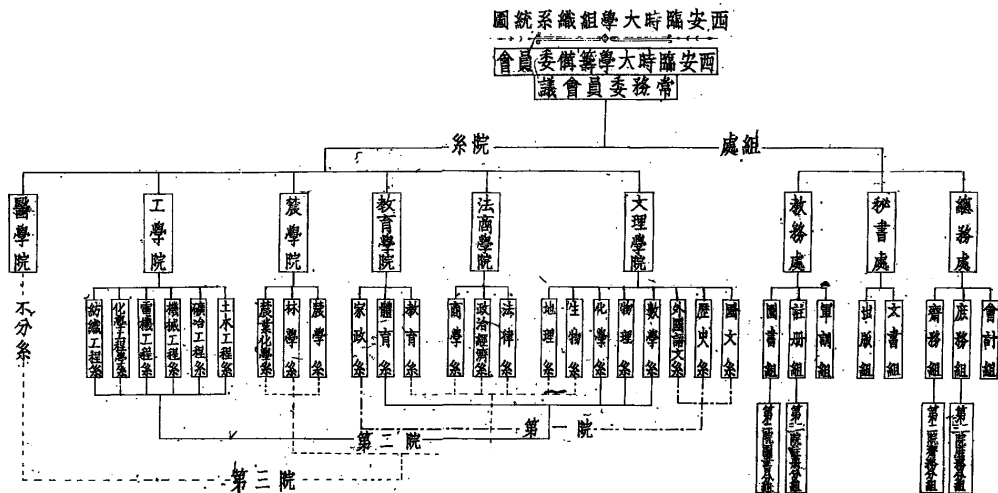


图1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组织系统图

引自西安临大校刊第二期

三、迁往汉中

随着战事深入，教育部派人考察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的地理环境及人事情况，为临时大学寻觅永久办学之地，要求此地在战时平时皆可保全，以期能稳定发展西北教育。如《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 李耕砚，袁志仁，张汉文三先生同行》一文提到“教育部有意指定新、青、甘、宁、陕等省为本大学活动之区，即托付本大学以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但西安已届前方不远，而军事瞬间万变，又为确切不移之性质，万一略有疏虞，不免进退失据，此亦不可不预防。因此决议派李委员耕砚，袁主任志仁暨纺织系张教授汉文同赴天水，兰州，西宁等处考察，相度地宜，衡量人事，并探察天然资源，以为计划发展本大学及西北教育之根源。”^[11]

汉中为考察的地点之一。1938年1月，受陕西省建设厅邀请，学校曾派人赴汉中等地进行地质勘探，对环境地貌较为熟悉，考察了从宝鸡到汉中乘汽车所需时间以及路况。如果乘汽车从宝鸡县出发，当天宿双石铺，第二天下午可抵达汉中，计算汽车行程共需十二三小时，如果小车快行，一日可达，只是赴秦岭凤岭及紫关岭山路崎岖，驾驶车夫若无经验，非常危险。^[12]又考察到因时局关系，各方人士多走集南乡，汉中更呈热闹繁荣之象，确实是避难偏安办学的圣地。而学校在安康进行地质勘探时恰好发现汉中城外二十余里有适合办学校的寺庙。《本大学安康采矿队报告 总领队魏寿崑等报告》曾提到“全体学生由教授率领远足赴圣水寺（汉中城外二十余里），该寺建筑颇佳，且地址适宜，可供设立学校之用。”^[13]

1938年3月，在西安临大上课没几个月后，西安战场失利，太原失守，敌人沿同蒲南下，窜抵风陵渡一带，潼关告急，于是西安临大迁往汉中。潼关告急固然是迁徙的主要原因，然而西安临大师生空前高涨的抗日爱国情绪亦使国民政府当局感到危机重重，由于临大大多数师生经受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加上从各地赴陕旅途的百转千回、颠沛流离都使得他们心中播种了爱国抗日的火种，而延安就像火石，国民党害怕愈来愈多的师生奔赴延安，造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遂决定临大向南迁往汉中，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综合以上信息，1938年3月9日，西安临大常务委员决定成立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布置、运输及膳食3个委员会，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

在西安至汉中行军途中，大学教职员编成独立区队，由常务委员率领。而全体学生依照大学军训组织编为一大队、三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约五百

人至六百人。大队设大队部，大队长由军训队长兼任，军训主任教官为副大队长。中队设中队长一人。区队分队各设队长一人，由中队部提请大队部指定学生担任之。并设立运输组、设营组、纠察组、交通组、医务组、警卫组。出发时按照军训之中队次序，逐日连续出发一中队。每中队行进行列按照设营组、侦察班、中队全队、医务组、运输组、收容班顺序前行。每中队配备胶皮大车 15 辆，以装载粮食及随身行李之用，由运输组监督管理。整个行程由宝鸡至汉中分 10 站，给养由膳食委员会在各站布置，每中队携带两天的给养，由运输组给养班负责保管押运分配。由分队长于早餐后为出发前向驻在地办理伙食人员领取该分队全部给养，转给同学，自行携带，早餐为稀米及馍，晚膳多为干饭及汤菜，均由舍营地办理伙食人员负责整理。如遇路程距离较远中途煮水由饮食班办理。全校大队、中队、区队、分队均需各制白布角旗一面，各组制白布角旗多面，写明番号。学校西迁教职员及学生出发到达办法规定：原则上教师、职员须随全大队出发，如若因患病体弱或者愿意自愿前往，需在 3 月 21 日前到达汉中。在注册时声明愿随大队同行的学生，应按照编队出发。学生需置备旅行需要之零星物品的，学校借给每人五元，将来定期偿还。在注册时声明不随大队同往，或由医生检查证明确实患病不适宜同行的学生，应于大校报到，逾期报到者，一律令其休学。

1938 年 3 月 16 日，西安临大师生正式从西安迁往汉中，全校师生由西安坐火车至宝鸡，下车后按上述行军计划徒步前往汉中，师生们翻越高耸入云的秦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一切运输工具：大车，汽车，皮轮大车，驴马，乃至滑杆等，均行利用，但以登山越岭，困难颇多”^[14]，又有“教授周明羣先生因身体素弱不胜长途之苦至汉中病逝，又有同学一人在中途病故皆为此次迁移中不幸”^[14]。总之，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经过半月左右时间，抵达汉中。师生报道者多于 1200 人，于 4 月 18 日上课。^[15]

汉中校址选定方面，在汉中找房设校很困难，多费周折，最后徐诵明与陕西省官员商量长期借用军校校址。由于汉中无集中的可供办学的地址，所以将全校分置在城固县、南郑县、勉县三县：其中，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距城固县城南 30 公里的古路坝，医学院设在南郑县，农学院设在勉县。这样分散办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可集中各院的优势为当地服务，“本校大学本部文理教育工学院设于城固，医学院设于南郑，因该地居民较多，可便利民众的诊病，法商学院设于本城西关外，农学院设于沔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掘沟渠从事灌溉，利用大自然的形势和环境，研究地理，实地测量及锻炼身体，这是分配校址的大概情况。”^[14]

四、更名为西北联大

1938 年 4 月 3 日，学校师生南迁后刚刚安顿下来，教育部即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 350 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16]5 月 2 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当日的开学典礼上，陈剑脩常务委员讲话说明更改校名的意义：“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14]西北联大行政机构设置仍基本沿袭旧制，仍不设校长，学校重大事务由校务委员会决议，该委员会是由筹备委员会撤销改组而成的，筹备委员改任为校务委员，“原有的筹备委员为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陈剑修、李蒸、徐诵明、李书田等。”^[17]西北联大课程仍沿袭西安临时大学建制的六院二十四系。（注：医学院不分系。）行政部分分为秘书、教务、总务三处。秘书处分为文书，出版两组；教务

处分为注册，图书、军训三组，总务分为会计、庶务、斋务三组。大学在南郑设办事处，在西安设留守处，都是临时行政机构。

在西北联大迁到汉中中学校事务步入正轨后，教育部下令裁撤了总务处和西安留守处。教育部电令如下：

本校总务处，原辖会计，庶务，斋务三组。本年度因会计独立，将会计组改为会计室，受常务委员之指导；除师范学院照部章组设事务处外；文理、法商、医三学院之事务室亦已分别成立；谨余业务一组，与训导处有密切关系，已改隶训导处；经第四十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总务处著即裁撤。^[18]

本校奉命西迁，所移西安之校产与应结束及接洽事项甚多，特设立西安留守处董其事。现在各项应办事件，业已完结，仅剩余校具一部分，自无设立留守处之必要，经第四十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西安留守处著即裁撤。^[18]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西北联大师生们在后方努力维持着正常的教学活动。

五、西北联大解体

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相持阶段后，西北联大师生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潮运动，他们参加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民主活动，如联大地下党支部领导成立的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文艺学习社等，还举办“抗战救国”方面的座谈会和纪念会，排演爱国话剧在群众中宣传爱国思想和全民抗战的重要性。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12月汪精卫投降日本，这一卖国求荣事件引起全民公愤，在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全校发起广泛的签名运动，向全国通电讨伐汉奸，引发了新的抗日爱国热潮。为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国民党教育部就派张北海在校秘密从事解聘进步教授和迫害进步学生的活动，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面对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声，国民党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散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工农学院分别合并独立。“本校工农两学院奉部令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本别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18]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训令其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准筹设师范科及医科研究所。”^[18]此时，西北联大共有4个院：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命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相继独立称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19]至此，原西北联大6院24系局面被打破，只剩文理、法商两学院，又根据3个以上学院方可组成大学的规定，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拆分为文、理两学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12系。至此，西北联合大学完全撤销，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五校分立。西北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现位于杨凌，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40—1944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往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抗战后，西北工学院迁至咸阳，现位于西安，为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迁回西安。

西北联大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9年8月撤销，存在的时间仅1年零4个月，其存在虽然短暂，但是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现今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极大地发展了西北地区的教育水平。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南北遥相呼应，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两翼，在抗日烽火中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举步维艰的新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珍贵的火种，也为如今开发大西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战后，西北大学沿袭了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正值西北联合大学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更应该与西北大学共同回顾这所老校曾经走过的艰苦岁月和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创造的辉煌业绩，传承其在艰苦卓绝环境下的拼搏奋斗精神。

参考文献:

- [1]姚远,刘舜康,赵弘毅等.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2000(8):127-131.
- [2]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3):62-64.
- [3]苑旭森.浅谈西北联合大学[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1(7):253-254.
- [4]李巧宁.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1-94.
- [5]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138.
- [6]西安临时大学出版组编.西安临大校刊[M].西安:1937(1):2.
- [7]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3):62.
- [8]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199-200.
- [9]西安临时大学出版组编.西安临大校刊[M].西安:1937(2):3.
- [10]同[9]:6.
- [11]西安临时大学出版组编.西安临大校刊[M].西安:1938(11):6.
- [12]西安临时大学出版组编.西安临大校刊[M].西安:1938(7):3-4.
- [13]西安临时大学出版组编.西安临大校刊[M].西安:1938(12):10.
- [14]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编.西北联大校刊[M].西安:1938(1):7.
- [15]佚名.西安临时大学迁往南郑上课[J].教育通讯:1938(4):6.
- [16]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216-217.
- [17]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编.西北联大校刊[M].西安:1938(2):7.
- [18]西北联合大学出版组编.西北联大校刊[M].西安:1938(2):9.
- [19]佚名.西北联合大学改西北大学[J].教育通讯:1939(32):3.

徐诵明与医学高等教育*

杨春德，于炜武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正直爱国 艰难求学

徐诵明先生 (1890-1991) 是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中国病理学奠基人、多所大学的老校长。在他走过的人生征程中，正直爱国、严谨治学、知人善任，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高尚的品格深受人们的崇敬和爱戴。

徐老是一位爱国者，对国家的热爱和报效，贯穿了老先生的百年人生，也贯穿了中国从沉痾昏睡中站起来，迈开巨人的脚步的过程；而纪念徐老最好的方式，则是把他的报国精神和治学态度发扬光大。老校长徐诵明生于 1890 年，自小受到塾师家庭环境影响，13 岁即考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大前身）预科，1907 年，旧中国正被清政府带向灭亡的边缘，不断加大的科技与经济差距，被列强不断践踏与侮辱的现实，使得大批爱国志士涌现出来，也在年轻的徐诵明心里播下了报国救民的种子。浙江省掀起的反英护路风潮，让徐诵明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决心，依靠同学的资助瞒着家人远赴日本留学。作为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缺乏交通工具，徐诵明便乘坐风险极大的小火轮开始了远渡重洋的求学之旅。

当时的日本不能平等对待中国人，尤其是在日本求学的中国学子，很难在正式的大学接受教育和毕业。但徐诵明刻苦学习，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1910 年预科毕业后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并结识了当时的三年级学生吴玉章，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徐诵明还与郭沫若等人一起组织“夏社”声援国内革命活动；同时，因为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徐诵明结识了章太炎先生，并由其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 年 10 月，国内爆发武昌起义，徐诵明即刻弃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沪参加了徐锡麟之弟徐锡翼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后因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等政局变化因素，他于 1912 年重返日本学习。自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因成绩优异，1916 年即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前身）聘任。由于想深入钻研医学，1918 年徐诵明毕业后仍留九州帝国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1919 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 1928 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由国人自己主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他还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著作上、下册译成中文。1920 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奠定了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基础。他为引进病理学理论、创建中国病理学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立志报国 投身教育 支持进步 任人唯贤

1928 年 5 月，徐诵明回到北京任教于京师大学校医科，8 月，他带领北京医科大学进入国立北平大学，并和河北大学医科组成北平大学医学院，徐诵明任院长。从此，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进入了国立大学的序列。1929 年，徐诵明院长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1932 年，徐诵明教授出任北平大学校长至 1937

* 西北大学副校长杨春德、档案馆馆长于炜武根据其他研究材料整理编写

年。徐诵明校长开明爱国，为人正直，他推崇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重视人才，任人唯贤，提携后进。1934年，他聘请范文澜、许寿裳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1935年，日伪炮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校长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威胁，但遭到了徐诵明校长的严厉拒绝，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的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委员会中除去。他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此时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的师生上街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的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徐诵明校长闻讯后，立即到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1937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校长徐诵明，提出要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教授，他们是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认为他们是倾共分子，关于这几位教授的政治立场，作为校长的徐诵明是清楚的，随后，他去南京找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于教育部，教授的聘请和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为此事，国民党教育部对徐诵明先生甚为不满。此事一直拖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才不了了之。

主政西北联大 发展西部教育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逼北平。国难当头，为保存教育国本，保护师生和教育资源以延续国家高等教育，国内70多所大学依国民政府指令纷纷内迁。其中最重要者是由京津地区六所大学三三合并而产生的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而西北联合大学的成立过程则极为复杂曲折。

1937年1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校长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常务轮流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在此期间，徐诵明校长还兼任该校的法商学院院长。1937年底，由于正面战场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1938年，日寇蹿抵风陵渡，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汉中，这些饱经艰辛的流亡学子们不愿迁校抗战爱国的激情日益高涨，时刻准备奔赴战场。作为校长的徐诵明深深的理解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怀，但他更懂得作为校长保护好国立大学的师生们的生命、设施、图书、资料等资源，对于中华民族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和其他常委们，一起和师生们讲明道理，团结一致，认识到保护好国立大学让他正常运行也是抗战的重要任务。由于汉中离西安很远，人员很多，为此学校成立了以徐诵明校长为首的17人迁移委员会。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迁离西安，全校以军队编制组成，在校常委徐诵明先生任大队长的带领下，由西安出发，先乘火车至宝鸡，再从宝鸡到陕南汉中。当时，去汉中盆地唯一的道路，就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路经双石铺等地，路途十分惊险，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情发生，但是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职员工不顾艰辛带领学生，他们以前线战士爱国精神鼓励自己，行军500多里，过渭河，越秦岭。吃不上饭，累了就睡在路边，过着流亡的生活，但是大家互相帮助克服困难，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1938年5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校常委徐诵明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西北联大的师生的爱国进步的倾向，早已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加强了对进步教授的控制，增派了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1938年9月，校常委徐诵明先生请辞其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并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国民党教育当局认为徐诵明任院长时，实行了许多开明的政策，

已经走得很远了，怎么能看到许寿裳这样的人来当这个院长。他们组织了三青团围攻许寿裳，并越过校常委，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先生得到此消息后，立即向校长徐诵明辞职，徐诵明校长表示同情并抗议，立即批准许的请辞，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因为此事，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徐诵明校长非常不满意，以解散西北联合大学威胁徐诵明。193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训斥徐诵明校长，指责西北联大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做法，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社会科学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共产主义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校长不予理睬。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校长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10余位进步教授，徐诵明校长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同年，将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从此，北平大学在国民党教育当局设局迫害下，从历史上消失了。自此徐诵明永久地离开了由他接掌的北平大学及其后承——西北联大，也将“北平大学断于吾手”的遗憾留在了心间。他被迫辞职，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学校。之后北平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风格被西北大学传承下来，这为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徐校长的爱国的热情、刚正不阿的品德，深深留在广大师生的记忆中。

临危受命 出掌同济大学

翻开如今的同济大学校史，在历届校长当中，赫然印有徐诵明的头像。虽然北平大学其名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不复存在。但历史似乎注定要将同济大学一段重要的命运交在徐老手中。其实同济大学最初便起源于德国人在上海开设的诊所，后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虽然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同济大学的时候，她已是一所集合了工、医、文理科的综合大学，但追根溯源，同济大学医学之根脉正好与徐老的职业生涯相吻合。

早在徐诵明被迫辞去西北联大职务来到同济大学前，同济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已经迁往四川。那是在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应长江古镇李庄进步士绅们“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报相邀，已迁至昆明、正面临敌机轰炸的同济大学再迁至李庄坚持办学。然而虽避开战火之虞，但李庄当时条件却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这一时期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济大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徐诵明校长坚持勤俭办学，努力克服困难，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度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在这一时期，就在“九宫十八庙”，遍布祠堂寺院的古镇李庄，由徐诵明兼任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此后同济大学医学院一直在国内独树一帜，存有老校长徐诵明先生一份功劳。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1945年，学校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2系。1945年夏，学校向教育部申请10万元经费，在宜宾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时任校长的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校长，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校长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随后徐诵明带领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迁回上海继续办学。徐老在写给上海教育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潜心医学教育 无怨贡献社会

1946年6月25日，徐诵明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而在同年初，徐老曾经执教的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校，至此，北洋大学复建。解放后更名为天津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学校师生也陆续迁回北平复校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解放后正式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经历了几十年光阴，跨越硝烟战火，和平年代。世事变迁如萍聚云散，曾云集了京师九所大学的北平大学算是尘埃落定。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西安，这一群高校终得以流传，至今向莘莘学子提供优秀的高等教育机会，这对于徐老来说，应该亦是“幸甚至矣”。

徐诵明曾经做过好几个大学的校长，如同救火队员一般，基本是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而他却拒绝了成为台湾大学校长的机会，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而他已经看出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准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8月9日，徐诵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兼卫生部教材审编委员会委员，并任北京医学院病理学一级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总结了解放区的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1年，徐诵明加入九三学社。1953年出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他被错划成为右派，撤职降薪。在其间二十年，在徐老的事业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这二十多年徐老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作为多所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他的晚年清贫令人扼腕。而一代教育家，所受的遭遇，值得发人深思。

一生爱国 功德永垂

1978年徐诵明得到彻底平反，同年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89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隆重为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人，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中国病理学奠基人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庆祝大会上，代表卫生部党组致词，赞扬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在医学教育上，徐老可谓是用中文讲授西学的先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胡厥文，赞扬徐老并挥毫题词为“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在百岁寿辰前夕，这位饱经时代风云的医学教育家，经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的介绍，以百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可谓是历史的奇迹。

当他老人家晚年时，有人问他：您是最早引进病理学的人，也是第一个成立病理学研究室，审定病理学中文名词的奠基者，使中国病理学在中国西医学中享有了独特的地位，如果您不做大学校长，只作病理研究，也许在病理学上会有更大的成就。徐老笑笑说：他年轻时

东渡日本就本着医学救国的精神，想使旧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他回国后，看到国家一盘散沙，他坚定了想摆脱这顶让人看不起的帽子，并不是哪个人能做到的，一个人也许在某个领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只有办教育，教育出更多的有用之人，使国民明白教育是改变国家之本，教育才能使这个国家真正的富强。

徐诵明先生在整整一个世纪当中，走过了历史的波澜壮阔，也经过了凄风苦雨，正是他豁达的心胸，坦荡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作风，使这变幻的百年风云最终沉淀为先贤传喻后世的遗产。1991年8月26日上午10点55分，徐诵明教授因肺部感染、循环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徐诵明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医学家，一位教育家，一位祖国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的人，一位具有不凡人格魅力的人。人们一定会永远铭记他、怀念他。



10月14日，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徐诵明铜像前举行。徐诵明的家属、朋友代表与医学部师生共同回忆徐诵明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不断探索、奉献的一生。图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在徐诵明铜像前献花。本报记者 陈曦 摄

李蒸民众教育理念及其对西北联大的影响

娄岿菲*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李蒸是民国时代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期最长的校长(院长)。本文将李蒸办学实践重新放置到个人学术发展与人生际遇互动的背景下去理解,他早年对民众教育及乡村教育的研究,是其掌校前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深刻地影响了其担任校长(院长)之后的办学实践。在他的积极奔走之下,北师大及西迁后的西北师院皆利用师范学校的优势,创建多个乡村教育施教区,并能够根据各地实际条件灵活办学,不仅使师大(师院)学生得到接触教育实践的机会,也对当地社会文化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李蒸; 北平师范大学;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西北联大; 民众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中国开始推行新式教育以来,能否培养优秀的师资一直都是关乎教育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对其办学历史的重新梳理以及与学校发展相关联的重要学人思想理念的概括总结,是观察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百余年历程的重要视角和主题。在北师大百余年办学历史上,1949年之后以陈垣任期最长(1952.10—1971.6),1949年之前任期最长则首推李蒸(1930.2—1930.12, 1932.7—1937.9, 1937.10—1945.8)。陈垣作为重要史学家、知名教育家,早已广为人知。相比之下,另一位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李蒸校长却鲜为人知,称得上是“教育史上的失踪者”。

李蒸(1895—1975),字云亭,河北滦县人(现唐山市)。1910年中学毕业后,最初升入天津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后因无力供给学费,辍学入觉民小学教书。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自此便与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蒸担任北师大校长的十余年,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动荡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师大先是作为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西迁继续办学。1939年8月,又根据教育部“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的规定,改称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师院众多师生的眼中,“北平师大是西北师院的‘前身’,西北师院是北平师大的‘继续’”。^[1]作为高等师范教育在西北地区的延续,正是因为有李蒸多方奔走,积极筹划,才使得师大精神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之下得以延续和发扬。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民国教育人物,长久以来却被学界所忽视。迄今为止,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于1996年出版了《李蒸纪念文集》之外,对李蒸的生平与其教育理念和实践尚缺乏系统和深入地梳理,仍有大量文章散落在杂志报刊上(详见附录)。可以说,对李蒸论著的收集整理以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都与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重新梳理西北联大(西北师院)的办学经验,不仅需要理清学校变迁的历史脉络,也需要重视对相关教育家理念及实践的整理。李蒸教育理念是与其学术兴趣、早年研究经历以及实际办学经验密切相关的。他早年对民众教育及乡村教育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其担任校长(院长)之后的办学实践。历史地评价近代大学发展的地位,不能仅仅依据于辨析那些

*娄岿菲(1980—),女,北京人,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讲师,教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大学历史与文化。

高瞻远瞩的教育理念,更需要的是要看这些理念在现实运行中的状态,解释造成大学发展的实际与理念之间差距的原因。因此,本文将李蒸办学实践重新放置到个人学术发展与人生际遇互动的背景下去理解,通过考察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民众教育对他的治校理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希望能够藉此提供一个更加丰满的教育家李蒸的新形象。

二、作为思想资源的民众教育

活跃于民国教育界的学人,有不少都是身兼数职,游走于学界与政界之间。他们身上还留有传统读书人的印记,以读书问学作为人生的起点和基础,因此,对民国学人的分析就需要特别关注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渊源,并以此为基础才能为更好地理解他们思想观念的内在逻辑提供帮助。

李蒸正式就任师大校长之前的经历,可以堪称是一份立足学术界的完美履历。自北京高师英语部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同时兼任体育科美国教师的翻译,以及校长办公室英文文稿工作。1923年考取河北省官费,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主修乡村教育,1927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分别在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起担任南京大学区民众教育院主任,后又应聘到江苏无锡民众教育院(后与劳农学院合并,改称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授暨实验部主任。^[2]后曾于1930年2月至12月代理师大校长。1931年初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因师大校长问题迟迟未决,多次陷入危机,教育部于1932年6月底正式任命李蒸为师大校长。

从学人的专业成长轨迹来分析,李蒸学术起步于乡村教育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以《美国单师制学校组织之研究》为题,关注中美乡村教育的差异,留学期间他探访美国中南部11个州的乡村学校,获得了大量“第一手之察访”的实际经验,并由此开始思考中国农村改革的实现之路。他回国之后得以进入多所大学任教,并进一步将研究主题扩展至民众教育方向,曾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发表于《教育与民众》、《民众教育月刊》、《师大教育月刊》等杂志,后又将部分论文集集成《民众教育讲演辑要》一册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31年出版。1931年,李蒸又与俞庆棠(时任第四中山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高阳(时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舒新城(时任上海中华书局总编辑)、孟宪承(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等人发起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并当选为理事。可以说,学院式研究生活的滋养,再加上李蒸还曾有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经验,使得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和判断,既有国际视野的理论性分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乡村民众教育的深入研究,正是李蒸出掌北师大时思想资源的起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冠以“乡村教育”、“社会教育”等各种名目的教育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民众教育的提法发轫于1927年北伐胜利前后,基本目标是要培养全国民众成为健全公民的教育,对象偏重于失学之青年与成人,从理念上略等于“平民教育”,在具体实施方面又与“乡村教育”较为贴近。^[1]李蒸曾明确表示过,虽然他受命主持北师大,但“兴味仍在于民众教育”。^[3]他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主要的研究精力与兴趣都集中于民众教育。他将民众教育放置在极为重要的地位,认为“中国的前途如何进展,要看民众教育推行的程度如何以为定夺”。所以,他根据“教育整个的人”与“教育是继续不断的程序”的理论,提出促进民众教育发展的途径就是要使民众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一定要互相为用”。^[4]他把民众教育的内容定为三部分,一是基本知识技能训练,如语言、文字、算术、常识;二是职业的训练,如运用科学方法实现增加生产;三是成为国家公民的训练。^[5]从形式上分,民众教育有“学校式”和“非学校式”两类,操作中具体运用哪种方法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是应该“抱一种

^① 民众教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到1930年代中后期,社会教育逐渐取代了民众教育,成为针对非学校教育的普及教育的统称。在李蒸的论述中,民众教育基本等同于社会教育。所以,本文在论述中不再做细致区分。具体行文中使用的概念则以李蒸的论述为标准。

实验的态度”，根据各地情形和实际需要以及具体实验结果来决定。^[6] 李蒸更倾向于将民众教育馆看作实施的中心。他在设计河北省民众教育实施组织计划时即是用此方法，将全省划分为若干民众教育区，每区内设立一处县立民众教育馆作为该区中心，负责实施指导。^[7] 他强调要把社会教育当作一种“积极的，活动的”事业去努力。^[8] 能够办理社会教育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传教的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所谓“传教的精神”，是指要抱有宗教式的“牺牲的精神”，“本着坚定的信仰，任劳任怨勇往直前”；“接近民众的态度”则是指对待一般民众要诚恳谦恭，以平等地位相待，注意人格的感化和以身作则。^[9]

与近代其他教育改革运动相似，民众教育倡导者也是见仁见智。教育学家姜琦曾根据“理论的中心”和“理论的论据”将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划分为“十一派”。从具体观念来看，李蒸对民众教育的看法更接近于高阳（践四）所属的无锡教育学院一派。高阳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多年，与李蒸共事多年，交往密切，观点相近。这一派主张“用教育力量推进乡村，组织民众，为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建设”，“以具有充分教育意义的机关，为实施中心机关，并主张政教合一”。也就是说，他们更注重的是如何以各式学校为中心实施民众教育。^① 选择教育作为切入点寻找救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不少学人的共同选择。对他们来说，现实的教育问题及其应对方法，并不是书本上条分缕析式的现成答案，而更多是他们基于自己已有的学识、立场、经验，对方向和策略做出的判断。李蒸在就任师大校长之前，虽然以民众教育的研究为主，其中所涉及到的师资培养部分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1924年尚在留学的李蒸曾给《北京师大周刊》撰写稿件，讨论乡村教育的实施问题。他通过考察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对比乡村与城市教育的区别，进而讨论了实施乡村教育的方法。除了呼吁要大力推行强迫义务教育以及进一步开展调查农村生活状况之外，还特别提出各级师范学校和初级农业学校应该“即时成立乡村教育班，专造就乡村教员”。^[10] 在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授课期间，李蒸为江苏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的实验部制订了三年计划大纲草案，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能够深入观察实际教育问题，验证书本里实施民众教育的各种方法。^[11] 李蒸总结了当时阶段实施民众教育的诸多困难，除了经费无着，办理欠缺实际操作经验之外，民众教育人才的缺乏问题也是造成办理方法“多不尽妥善”的原因，所以急需推广民众教育师资的训练机关。^[12] 他曾呼吁中央及各省市都“必须训练社会教育专门人才”。无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或设立独立学校或是利用现有的师范学校，其总体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有眼光，有兴趣，有能力，有道德的社会教育专家”，然后才会使社会教育可以收到实效，有长足进步。^[13]

此外，1930年前后李蒸还利用各种机会参与社会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他在出掌北平大学区扩充教育处时，曾创建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承担培养民众教育工作人员的任务。^[14] 此外，他还曾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职务，虽然任期只是一年有余，但在此期间他曾到河北、山东两省视察社会教育状况，并向教育部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② 他亲自前往各省、市、县立社会教育机关视察，同时也向社会教育主管人员谈话各项事实，讨论可能范围内改进的办法。他曾多次强调民众教育应该满足不同条件的各地民众的实际需求，创造出适宜的方法，认为社会教育原则上的错误就是在于“静止在某一阶段消极的保持着一些开创的成果”，却“不能以积极的态度而运动”。^[15] 这些一手调查使得李蒸对社会教育的实施状况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和经验。可以说，正是李蒸早年间对民众教育问题的关注，使得

^① “十一派”分别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孙中山、沈玄庐）、村治派（梁漱溟）、晓庄派（赵叔愚、陶行知）、平民教育会派（晏阳初）、农村复兴委员会（汪兆铭）、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江问渔）、无锡教育学院（高阳）、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冯和法等）、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者（雷沛鸿）、普通大学教授（庄崔古、子钵、千家驹、杨开道等）、念二社派（邵爽秋），参见姜琦：《乡村教育的动向》，《教育杂志》，第25卷第11号，1935年11月。

^② 详细报告可参看李蒸：《视察河北山东两省社会教育实施状况报告书》，《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李蒸：《视察山东省社会教育的感想》，《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6期，1932年。

他始终能够立足于北师大（也包括西北联大及西北师院）抗战前后的社会条件，把握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也由此赋予其师范教育理念独特的内涵。

三、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创建

1932年7月，李蒸正式接任校长之时，北师大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临危受命，不久便带领学校逐步走上正轨。他担任校长的十余年，经历了抗战时西迁、改组的考验，是师大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16]在此期间，办学环境几经变化，李蒸则一直担任校长（院长），师大的治校政策也由此得以保持了延续。他立足于师范大学的特点，通过办理乡村教育实验区，将民众教育和师范教育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发挥师范大学的办学优势，也反映了其对于教育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刻性与具体办学实际问题的灵活性。

李蒸到校不久，师大即陷入到是否停办的争议之中。^①师大师生全力反抗，他亲赴南京教育部奔走接洽。^②最终教育部迫于压力宣布改制之议系误传，并准许师大可继续招生。此次风潮才得以终止。^③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自1920年高师改大运动以来，各地高师纷纷改组为大学，在课程、教材逐渐趋同的条件下，师范大学与普通大学相比在培养师资方面优势何在？对此李建勋、常道直等师大教授多从师范的独特性上立论，特别强调只有师范大学的学术氛围才能够提供专业的师资训练。^④作为师大校长的李蒸，则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一文中站在师大整体发展的角度做出回应，观点更具可操作性，也是理解抗战前后其治校理念的关键。“如何能使师大保持其固有之精神，如何能使师大发挥其独具之特性”，是李蒸治校的核心问题。此文中，李蒸承认在“专业训练之成分日减，学术研究之成分日增”的情况下，师范大学与普通大学相比，虽然教材选择略有差别，而课程组织几乎“无甚出入”。他认为，师范大学特性在于“师范”与“大学”两字，“应兼筹并顾，不使割裂”。所以，师大整理的基本方针是要从组织、课程、教法、训育等方面入手，才能培养出中学良好师资以及造就教育行政人才和教育学术专家。其中，组织、课程、教法主要与教学关系密切，是整顿的重中之重。除了明确要求重订各系课程标准之外，李蒸对师大学生参与教育实践也有详细地规定。具体来说，要求各系学生均须在附属中小学作系统的长期参观、见习和实习，延长实习时间，并组织专门的参观实习指导委员会予以指导。此外，李蒸还特别提出要在北平附近添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及成人教育均整合在此实验区中，“用教育方法以达到乡村建设之目的”。^[17]此部分设想与李蒸早年为江苏民众教育院所订的三年计划大纲相比，又向前推进一步，即实验区的设计不仅要提供给学生实习的机会，同时也要借助师范大学特有的优势能够使实验区当地的民众生活得到改善。李蒸希望找到的是将民众教育与师范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1933年9月，北师大校务会议通过《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计划大纲》，确定了实验主旨、实施目标、施教区域及范围等项，并决定先行设立乡村师范班，招收农人子女，训练实际从事乡村儿童与成人教育事业之人员。其设立主旨与李蒸设计如出一辙，主要包含三点：一，在民族濒于危亡的局势之下，研究如何改进乡村教育之道，以复兴乡村社会；二，使研究乡村教育者，实行深入乡村，以求彻底明了乡村社会问题之因果与农人生活习惯之实况；三，供给师大学生研究及实习乡村教育之机会。^[18]计划大纲随即呈请教育部审核，

^① 参见《行政院决议案》，《申报》，1932年7月23日，第8版；《院部严令整顿教育》，《申报》，1932年7月23日，第11版；《教部变更北师大组织》，《申报》，1932年11月5日，第12版；《三中全会中央组委提改革高等教育案内容》，《申报》，1932年12月17日，第15版。

^② 参见《本校教授为停止招生事致教育部快邮代电》，《师大教育丛刊》，第2卷第3期，1932年11月；《师大师生罢课》，《申报》，1932年11月12日，第10版。

^③ 《师大制不变更》，《申报》，1932年11月20日，第12版。更详细的记录可以参看李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的存废之事》，《李蒸纪念文集》，第60-75页。

^④ 相关集中讨论可以参见常道直、天健、李建勋等人在《师大月刊》创刊号上的文章。

获准通过后，筹备工作正式开始。李蒸对实验区的工作进展始终抱有极大热情。他曾亲赴京郊温泉附近勘察，并最终勘定北平市及其近郊的宛平、昌平两县的十七个村庄作为实验区。翌年还亲自兼任实验区主任，为节省经费起见，不再另支薪水。^[19] 实验区开办之后，仅一年时间便已有四个附属小学，在成人教育方面也已在辛庄设立男女民众班各一班，教学由师范班学生担任。^[20] 师大学生到实验区参观实习后，也在观念上有所转变。从前师大的毕业生“大都好往大城市作(做)事”，现在已不再把到乡村去工作视为畏途。^[21] 作为当时唯一的师范大学，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所谓“师大之特性”，也是李蒸出任校长之后，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他十分看重对师范大学诚笃朴实学风的倡导，曾多次表示过，“大学的功用不只是研究学术，尚须同时顾到社会服务，真正的大学必须一面研究学术，一面服务社会”。^[22] 他对师大的期望，是“于学术上不在石破天惊之发明，不在凿空探险之奇迹，而在平实正确，求一人人共由之路，以奠全国中等教育之基”。^[23] “不厌”、“不倦”、“毋躁”、“毋惊”，是他希望师大学生能够牢记的，也是李蒸身体力行的准则，同时也是战争年代北师大得以一直保持师大精神的关键。

抗战开始之后，北师大被迫西迁，数易校名。1939年8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校址设于城固，院长仍为李蒸。教育部发布的整理方案称，北师大等校西迁有“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的考虑，意在借此重新调整教育结构布局，提升西部文化教育水平。^[24] 1938年5月，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各级学校依托自己的专长，提供切合社会需要的教育。^[25] 翌年又相继出台了多项工作标准及实施办法，明确要求就各院校附近划定相当区域，办理社会教育施教区。^①西北联大（西北师院）遵照教育部训令，立即开始着手组织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并先后提交西北联大及改组后的西北师院校务会议讨论，但因经费困难等问题一直搁置难行。^②直至1940年底，西北师院办学情况好转后，经校社教推行委员会讨论并通过施教区经费预算及组织纲要，施教区才真正得以施行。^[26] 1941年1月19日，陕西城固邠留乡施教区举行开幕典礼。

李蒸对邠留乡施教区的工作异常热心。他曾多次亲率众人勘察，最终选定翟家寺南三郎庙为办事处，并于办事处内附设乡村民众教育馆一所作为施教中心。他还多次追加经费予以支持，并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师范院校兼办社会教育的意义，不时亲赴施教区考察，耐心指导学生实践。^③他在开幕典礼上再次强调了施教区对于师范学校的意义，认为师范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可以“使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师院学生也可以藉此获得实际教育的经验，进而改进推行社教的方法，增进其服务能力。^④自西北师院独立之后，如何能使师资训练与抗战救国以及建设西北地区文化的主题相结合，是李蒸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问题。他十分赞成教育部推行的划分区域设立师范学院的政策，提出高级师范事业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所以，师范教育“必由国家统制其设施，督促其进展”，才能培养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之专才”；同时也只有师资训练和任用的正常推行，民族精神才能得以发挥，复兴民族的事业才能够实现。高级师资训练的目的“不但要培养健全师资，并且要培养教育家”，要充分认识到师范教育所肩负的责任。^[27]

^① 《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暂行工作标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师范学校及民众教育馆辅导中等以下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37页。

^② 《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5期，1940年1月16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筹设经过报告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20期，1941年2月15日。

^③ 《本院社会教育施教区近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33期，1941年10月30日；《本院施教区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及寒假乡村服务大会记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39期，1942年2月28日。

^④ 参见《本院乡村社教施教区开幕典礼志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19期，1941年1月31日；《乡村社会施教区开幕典礼纪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23期，1941年3月31日。

在李蒸的影响下，师大学生也对乡村民众教育工作表示出极大热情，纷纷选择施教区进行暑期乡村社会服务，以社会调查、青年补习教育为中心。晚间举行的月下座谈会，参加民众尤为踊跃，深得当地民众喜爱。^①因西北师院在邯留施教区的突出表现，教育部还特别予以嘉奖。^[28]西北师院迁往兰州后，又择定徐家湾至安宁堡间为实验区域，并在孔家崖中心学校设办事处。以十里店为中心，从事城镇社教实验；以孔家崖为中心，从事乡村社教实验。此外，1943年11月，西北师院又与兰州市政府合办国民教育实验区。^[29]该实验区举办的社会教育形式活泼，包括办理补习教育、成立抗日宣传队、举办流动图书馆、暑期服务队等，被赞誉为“西北教育的拓荒者，普及文化的传播人”。^[30]1945年夏，李蒸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出于能够有助于师大复校的考虑，同意调任重庆工作，不再担任西北师院院长。但他的民众乡村教育实验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师大迁回北平之后，在京郊冉村续办社教实验区，虽因经费困难等问题，开办规模不大，但在扫盲教育及医疗救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1]

四、结论

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变迁是与一代又一代教育学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李蒸是一位集理论素养与办事能力于一身的实干型教育家。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战时条件下在西北的办学，更是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将国家民族的复兴及对西北地区文化的建设都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表示西北师院作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师资培训”，更是要“致力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树立”。^[32]民众教育是他教育学术研究的起点，师范教育则是他掌校十余年时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结合，是解读李蒸教育理念的关键。在他的设想中，借助师大已有的师范优势，将师资训练融入到乡村民众教育的推广之中，同时分别以培养师资解决学校教育问题，以建设教育实验区以解决非学校式的社会教育问题，由此便可逐一应对中国教育在城市与乡村，学校与社会等各层面的症结。从北师大抗战前后十余年的历程来看，李蒸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时至今日仍给人以启迪，也是理解艰苦条件下延续师大精神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 [1] 李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的存废之事[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79.
- [2] 李溪桥.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逝世20周年[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1-17.
- [3] 李蒸. 民众教育的认识[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18.
- [4] 李蒸. 民众教育辑要[M]. 北平: 文化学社, 1931: 2.
- [5] 李蒸. 积极的社会教育[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20.
- [6] 李蒸. 民众教育的途程[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02.
- [7] 李蒸. 民众教育的途径[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01.
- [8] 李蒸. 最近一年之社会教育[J]. 时事年刊, 1930(1): 556.
- [9] 李蒸. 积极的社会教育[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24.
- [10] 李蒸. 实施我国乡村教育的管见[J]. 北京师大周刊, 1924-10-26.
- [11] 李蒸. 江苏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实验部三年计划大纲草案[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04.
- [12] 李蒸. 民众教育的认识[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17.
- [13] 李蒸. 社会教育改造之途径[J]. 中华教育界, 1934, 21(7): 77.

^① 《本校学生暑期乡村社会服务经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46期，1942年9月30日；李溪桥：《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李蒸纪念文集》，第32页。

- [14] 王镜铭. 乡村小学兼办社会教育的实验[J]. 教育通讯周刊, 1939, 2 (31): 14.
- [15] 李云亭先生视察本馆纪实[J]. 北平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 1932 (创刊号).
- [16] 李蒸.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的存废之事[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60.
- [17] 李蒸.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33-137.
- [18]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计划大纲[J]. 师大月刊, 1933 (8): 131.
- [19] 文模. 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报告[M]//乡村工作讨论会. 乡村建设实验 (第二集), 上海: 中华书局, 1935: 142-143.
- [20] 徐旭. 平郊的四个乡村教育实验区[J]. 中华教育界, 1935, 23 (6): 33-34.
- [21] 二十四年度本校乡村教育实验区概况[M].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近况, 出版地不详, 1936: 114.
- [22] 李蒸. 在北平师大研究所开学典礼上的讲演[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63.
- [23] 李蒸. 发刊词[J]. 师大月刊, 1932 (创刊号): 1.
- [24] 教育部拟定之平津沪战区专科学校整理方案法[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一).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11.
- [25] 教育部订定之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第五辑第二编教育 (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31-33.
- [26] 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 1941 (18): 6.
- [27] 李蒸. 高级师范教育与青年训练[J]. 教育通讯周刊, 1939, 2 (48): 3.
- [28] 教育部对本院兼办社会教育嘉奖指令二件[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 1941 (23): 3.
- [29] 本院社会教育实验区及与市政府合办国民教育实验区举行成立典礼盛志[J].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 1943 (60): 5-6.
- [30] 李荫田. 忆西北师院, 景仰云亭院长[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396-397.
- [31] 汪彦山. 在“冉村社教实验区”服务的观感[J]. 中华教育界, 1947, 复刊第1卷 (12): 58-59.
- [32] 李蒸. 本院的使命与校风[M]//李溪桥. 李蒸纪念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90.

Li Zheng's Mas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n

PNU/NNNU

Lou Aofe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Li Zheng was the most famous president of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 Northwes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before 1949. His research experience was the foundation of hi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had influenced on his career. Li Zheng created experiment areas in Peking, Chenggu and Lanzhou. The students of PNU/NNNU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ies to know the country's really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 areas were successful i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local people.

Key Words: Li Zheng;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Mass education

附录：李蒸论著补遗

1921年

1. 《美国之男女合校》，（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一九二一年六月号），《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第47期
2. 《关于儿童身体生长方面作教员所应当知道的事项》，《平民教育》，1921年第34期

1922年

1. 《就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卫生特别班纪略》，《北京高师周刊》，1922年第170期

1924年

1. 《留美杂感》，《学术与教育杂志》，1924年，第1卷第2期
2. 《实施我国乡村教育的管见》，《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10月26日，第六版

1929年

1. 《训政时期民众教育的实际问题》，《民众教育》，1929年，第2卷第1期
2. 《吾国乡村教育问题》，《教育汇刊》，1929年第1期
3. 《民众教育的途程》，《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3期
4. 《河北省十八年度新增社会教育事业计划及其预算》（附表），《教育与民众》，1929年第1卷第5期
5. 《对于研究及促进吾国乡村教育的建议》，《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1929

1930年

1. 《民众教育问题》，《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7期
2. 《主张“成年补习教育”名称为民众教育之理由》，《河南教育》，1930年第2卷第19-20期
3. 《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师大教育丛刊》，1930年第2期
4. 《河北省教育概况》，《河南教育》，1930年第2卷第21期
5. 《最近一年之社会教育》，《时事年刊》，1930年第1期

1931年

1. 《中国之农村社会与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3期
2. 《识字运动之意义与价值》，《三民半月刊》，1931年第6卷第4期
3. 《社会教育困难问题》，《民众教育通讯》，1931年第1卷第6期
4. 《最近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民众教育》，1931年第3卷第6期
5. 《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2卷第28期
6. 《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续），《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2卷第29期
7. 《民众教育与教育》，《民众教育》，1931年第3卷第6期
8. 《半年来全国社会教育之实施状况》，《民众教育》，1931年第3卷第8期
9. 《民众教育馆问卷》（附表），《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8期
10. 《一年来之全国社会教育》，《民众教育》，1931年第3卷第11/12期
11. 《适应吾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民众教育》，1931年第3卷第11/12期
12. 《识字运动为什么重要？》，《民众周报》，1931年第172期
13. 《识字运动的重要性》，《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1931年第2卷第27期

1932年

1. 《民众教育的理想与事实》，《民众教育季刊》，1932年第2卷第4期
2. 《视察河北山东两省社会教育实施状况报告书》，《民众教育季刊》，1932年第1卷第1期
3. 《中国的社会教育》，《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3卷第5期
4. 《计划与报告：最近一年之社会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5期
5. 《李云亭先生视察本馆纪实》，《北平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2年8月1日
6. 《视察山东省社会教育的感想》，《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3卷第6期
7. 《批评与主张：适应吾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社会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6期
8. 《李邦权著民国二十年之民众教育序》，《民众教育通讯》，1932年第2卷第7期

1933年

1. 《征询各方对于民众教育意见说明书》，《文化与教育》，1933年第2期
2. 《以乡村小学为乡村建设之中心：师大乡村教育实验区之目标》，《文化与教育》，1933年第3期
3. 《教育问题：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大教育学会讲演》，《文化与教育》，1933年第4期
4. 《师大研究所开学典礼讲演》，《师大月刊》，第8期，1933年12月30日，教育学院专号

1934年

1. 《民众教育意义及办法之初步研究》，《师大月刊》，1934年第16期
2. 《教育改革问题》，《众志月刊》，1934年第1卷第5期
3. 《社会教育改造之途径》，《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1卷第7期
4. 《国联教育考查团报告书中之小学教育》，《时代教育》，1934年第2卷第8/9期
5. 《民众教育应转变方向么》，《教育与民众》，1934年第5卷第10期
6. 《卷头语》，《师大月刊》，1934年三十二周年纪念专号
7. 《中国教育改革问题：在文化协会学术讲习会讲演》，《文化与教育》，1934年第27期
8. 《拟议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要点》，《文化与教育》，1934年第31期
9. 《社会教育的进展》，《社友通讯》，1934年第3卷第2期

1935年

1. 《改造中的乡村教育目标》，《民间》，1935年第2卷第1期
2.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7期
3. 《中学教育与乡村建设》，《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49期

1936年

1. 《说实话难》，《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2年第1期
2. 《关于非常时期教育之意见及方案：非常时期教育的意义及其对象》（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纪念周演词），《江苏教育》，1936年第5卷第1/2期
3. 《〈欧洲民众教育概观〉序》，《社友通讯》，1936年，第4卷第10/11期
4. 《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文化与教育》，1936年第108/109期，又载《社友通讯》，1936年第5卷第6期
5. 《师范大学新生谈话会演词》，《文化与教育》，1936年第103期

6. 《今年的国庆与今后的教育》，《文化与教育》，1936年第104期

1937年

1. 《大学生训练问题》，《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1期
2. 《发刊词》，《地理教学》，1937年第1卷第1期
3. 《今后师资训练之方向》，《教育改造》，1937年第1卷第5-6期
4. 《中学生之升学与就业问题》，《教与学》，1937年第2卷第11期

1938年

1. 《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方法》，《教育通讯周刊》，1938年第23期
2. 《抗战期间大学教育之方式》，《教育杂志》，1938年第28卷第9期
3. 《敌人摧残后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通讯》，1938年第11期；又见《教育杂志》28卷，第8号
4. 《高级师范教育前途之展望》，《教育通讯周刊》，1938年第34期
5. 《教育与训练》，《教育通讯周刊》，1938年第36期

1939年

1. 《学制问题》，《教育通讯周刊》，1939年第2卷第9期
2. 《高级师范教育与青年训练》，《教育通讯周刊》，1939年第2卷第48期
3. 《成功的教师》，《教育通讯周刊》，1939年第2卷第33期
4. 《师范学院问题》，《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4期
5. 《报告出席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经过》，《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1939年5月1日
6. 《本大学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十次纪念周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939年6月15日
7.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发刊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1期，1939年12月11日

1940年

1.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第五次纪念周记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3期，1940年1月1日
2. 《李院长在新生训练开学典礼训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16期，1940年12月15日
3. 《北平师大及本院三十八周年纪念会李院长报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17期，1940年12月31日
4. 《师范教育与师资训练》，《训练月刊》，1940年第1卷第5期

1941年

1. 《教育建设与教育问题》，《安徽政治》，1941年第4卷第4期
2. 《青年的需要及其教育》，《教育通讯周刊》，1941年第4卷第17期
3. 《师范教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教与学》，1941年第6卷第5-6期
4. 《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幕典礼演说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23期，1941年3月31日

1942年

1. 《时代精神与教育政策》，《甘肃教育》，1942年第4卷第24期
2. 《青年应有高尚的理想》，《读书通讯》，1942年第34期
3. 《纪念周讲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39期，1942年2月28日

1943年

1. 《李院长报告及训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50期，1943年1月31日
2. 《李院长训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56期，1943年7月31日
3. 《青年应有的修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80期，1943年11月30日

1944年

1. 《院长赴渝返校训话记录》，《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68,69,70合刊，1944年6月30日
2. 《本院第三节毕业实习生毕业典礼院长训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71期，1944年11月30日
3. 《教育家的修养》，《新西北》，1944年第7卷第7-8期

1945年

1. 《时代精神与社会》，《甘肃教育》，1945年第7卷第3-4期
2. 《促进儿童健康工作之时代使命》，《女青年》，1945年第2卷第5期
3. 《论今后青年训练问题》，《中国青年》，1945年第13卷第5期
4. 《促进儿童健康工作之时代使命》，《女青年》，1945年第2卷第5期
5. 《李院长讲演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76,77合刊，1945年5月31日

1946年

1. 《论学术人才之养成》，《正气杂志》，1946年第1期
2. 《社会教育与民主政治》，《教育与民众》，1946年第11卷第3-4期
3. 《中国青年的新使命》，《中国青年》，1946年第15卷第3期
4. 《要为青年解决问题》，《中国青年》，1946年第14卷第3期
5. 《教育的力量及其使命》，《三民主义半月刊》，1946年第8卷第4期
6. 《战时教育与平等教育》，《三民主义半月刊》，1946年第9卷第9期
7. 《论学术人才之养成》，《正气杂志》，1946年创刊号
8. 《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与民众》，1946年第11卷第9-10期

1947年

1. 《认识时代保卫国家》，《曙光》，1947年第1卷第5期
2. 《社会教育与民主政治》，《教育与民众》，1947年第11卷第3/4期
3. 《行宪后的教育》 李蒸 中华教育界 1947年第1卷第12期复刊

1948年

1. 《我的办学经验》，《教育通讯月刊》，1948年第5卷第3期
2. 《自立更生之道》，《广播周报》，第268期（复刊第72期），1948年2月1日

1949年之后

1.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
2. 《执行教育方针学校面貌改观》，《人民日报》，1959年5月8日

译文

1. 《游戏之价值》，《北京市高师教育丛刊》，1919年第1期
2. 《美国中学校之体育》，《北京市高师教育丛刊》，1920年第3期
3. 《美国专门学校中女子之体育》，《北京市高师教育丛刊》，1920年第3期
4. 《体育与其他学科》，《北京市高师教育丛刊》，1920年第2期

专著

《民众教育辑要》，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黎锦熙在西北联大开创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秦开凤¹，何炳武^{2*}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人文杂志社，陕西 西安 710065

2.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古籍与历史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他方志理论的代表作。他参与修志主要于抗战期间，编纂方志并不是他的本业，但基于爱国热忱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机缘与兴趣等诸多原因促使他走上修志之路。《方志今议》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从方志的体例、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在后来修纂县志时他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黎锦熙；《方志今议》；实践

黎锦熙(1889—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一生主要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但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他方志理论的代表作，另编修过《洛川县志》、《同官县志》、《黄陵县志》、《宜川县志》等地方县志。从黎锦熙一生来看，他研究方志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也即在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总体时间并不长，但却为这一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前人对黎锦熙的研究多关注于他在语言学上的成就，而方志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将对他与方志结缘始末和在方志理论上的独创以及如何将之践行作简单探讨。

一、黎锦熙修志缘起与过程

黎锦熙参与修志始于1938年，该年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至城固，受县长余正东之邀，黎锦熙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来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黎锦熙在后来的《洛川县志》序中曾专门提及：“溯自民国廿七年之春，予自西安随联合大学迁陕西之城固，始识余君，时余君长斯邑也，偶谈及地方志，便组设城固县志委员会，推予草定方案，遂撰《方志今议》一书，予本不务此，所谓因缘和合而成者也”。^[1]

黎锦熙与方志结缘看似偶然，实则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从小就对此有兴趣密不可分。“未冠时，习史地，研究章实斋氏之书”，尤喜读《文史通义·外篇》，“及读至《外篇》创论方志之学，又读其《校讎通义》阐明目录之要，而所主修之方志，其‘艺文’一篇又便能打通而实践其‘校讎’之旨，则‘闻其风而大悦之’。自是好览方志。”^[1]后来，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志书，但对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满意：“全国各省道府厅州县新旧方志殆无不备，一一览之，其修于章氏前者，真多不成东西，无怪章氏之奋起而改革也，修于章氏后者，又绝少能实行章氏之计划。近年为《中国大辞典》遍抄各方志中所志之方言，亦复绝少，有之亦仅资点缀耳。此调不弹，为时已久，迄于今兹，因缘凑合，竟尔秉笔，写成此书。”^[1]

机缘与兴趣固然重要，促使黎锦熙修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责任

*秦开凤(1979—)，女，山西长治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和中国传统文化。

何炳武(1956—)，男，陕西黄陵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与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

感。他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为抗日救国之“第一步工作”。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主张学习要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以应社会国家之需要”,从而达到“学用相合,教学均增兴趣,而国家社会亦得实受其益”的效果。^[1]修志就是一种很好的教学相长、学以致用方法。

黎锦熙从参与《方志今议》修纂之始到他在陕西期间修成的最后一部县志——《宜川县志》,短短几年,成果丰硕,由他主纂除《方志今议》外,主要有《洛川县志》、《同官县志》、《黄陵县志》和《宜川县志》四部,另单行出版《洛川方言谣谚志》、《同官方言谣谚志》、《黄陵志》。在这一过程中,他亲历亲为,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在修纂《洛川县志》时,他与吴致勋共居一借来的小房间,“昕夕从事,未尝须臾离此斗室……居之半年,严冬炽炭室中,时烹羊羔,泡馍为餐,焚膏校字至夜分”。^[1]修纂《同官县志》时,为了赶进度,不管条件的艰苦,就直接住在印刷厂中,“昼夜督印”。^[1]修纂《黄陵县志》时,战事正紧,日军逼近潼关,政府下令疏散,正在印刷的县志不得不停下来,“拆装机件,一日而毕”,正准备撤退时,又传来“前线胜利消息,厂定次日仍开工,遂不复行。”^[1]一面遭受战争的威胁,一面生活又十分艰苦,与黎锦熙一起工作的吴致勋在他写的序里描述了当时的艰苦环境,那时,他与黎住在西安南郊新中国印书馆印刷厂,“厂址为南郊一古老高氏荜舍,四周无一树以调节阳光,整日曝晒,室内温度常达一百二十度(按:华氏),入夜亦不能就寝。且多蝎,予曾被啮伤颈,负痛数日始愈;劬西师以其闻窸窣声,即持皮履,隔糊墙纸压毙之,谓不令突出内围。”^[2]其中透出的不畏困苦、乐观积极的态度让人叹服。

洛同黄宜四县县志,黎锦熙作为总纂,仔细修订考核,克服各种困难,历时一年,顺利完成。用他的话总结说:“予事方志,但缘‘方言’;从而游击‘史地’,已踰周年;三区四志,以余君之志定意坚,力能克难,固已贯彻乎‘三联’;予其返回岗位,以免旁鹜无成之愆乎?”^[1]

二、黎锦熙的方志理论概说

黎锦熙的方志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方志今议》一书中,该书是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成的。主要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从方志的体例、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

(一) 确立修志四原则——“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

“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是黎锦熙提出的修志四原则,这是在章学诚方志思想上的继承创新,他认为:“章氏谓修志者,无论何人何志,均须知: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今者时势不同,学术大进,其说虽可节取,宜先知所兴革,故敢增拟四端,树为原则:‘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本此原则,再为拟目。”^{[1] (P28)}

明三术。即修志应先了解“续、补、创”三种方法。“续”指前志已经记述过而今又发展的内容;“补”指“凡兹订改补充,统谓之补”;“创”指“事类新增者”。三者是续修新编志书必须采用的基本方法,缺一不可。

立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针对很多人所认为的方志为史的观念,黎锦熙认为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著述,“方志固为‘方域之地志’,然须将境内事物物,穷原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因。……方志固为‘地方之历史’,然全国民族之荣瘁隆污,史家笼统抽象之谈,须待此而证实,而灼知;本乎史而定施政设教之方针,亦待此而后能备纤悉周到之方案,而后能谋部分具体之实践。”^{[1] (P21-22)}方志兼具史地两性的理论观点受到业内肯定,方志学家朱士嘉这样评价,较之章氏胶执方志为史之说,比章学诚前进了一大步。^{[1] (P2)}

广四用。即方志可作“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南”之功用,以符合时代需要。此说打破了旧学只重方志具有政治功用的偏见,有助于发挥方志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

破四障。指志书编纂要“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类不关文”是针对章学诚提出的“志”应分记、谱、考、传四体而发，认为此说有种种不便。主张“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类者事类；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1] (P24)}“文不拘体”是指各类文体，既随事之宜，图、表、谱、考皆可，即便在一类之中，亦可兼备各体。“叙事不立断限”是指方志非断代史，不必整齐时间界限。“出版不必全书”即分纂各志各类，一俟定稿，即可单独印行，不列卷次，所出之书，名以专志。这样做有五个好处：可商榷订正；可征阙补遗；可贡献于各学科之需；可用新创门类影响全国，树之风声；可为全书之成功先彰成绩，赢得声誉。破四障从现实出发，对旧志重体例形式、轻视内容实质进行了革新。

（二）创设《县志拟目》

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创设了城固“县志拟目”，分五门三十篇，附录二种。具体志目为：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地形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卫生志、党务志、司法志、教育志、古迹古物志、宗教祠祀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后附本县文征、本县丛录。“县志拟目”以大量的篇幅逐一介绍各专志特点、内容、采辑资料、编写方法及注意事项等。

民国时期，修志盛行，但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有些志书沿袭旧体，没有改观；有些志书新旧杂揉，体例混乱。在此背景下，黎锦熙吸取精华、抛弃糟粕，从现实需要和社会形势出发，在他的方志兼具“史地两性”和多种功能的思想指导下，所设“县志拟目”，已经开始摆脱旧志的束缚，基本抛弃了旧式体例，而接近于当代方志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反映了时代新内容，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如气候志、地形志、水文志、土壤志等都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新类目，对以后的方志设目有很好的启示。

（三）材料来源——实地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

收集材料，是修志的基本和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没有材料，体例设想再好，都无法执行下去，尤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梁启超对此曾强调说：“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冥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3] (P375)}黎锦熙也意识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专门另辟一节谈论“材料来源”，认为“修志首务；在使材料充实”，而材料来源则不外三种：“一曰实际调查，二曰档案整理，三曰群书采录。”^{[1] (P130)}最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不可能由单个的人来完成，而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正如梁启超所说：“斯固非一手一足之力，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3] (P375)}对此，黎锦熙提出“三者各须一二人负责，负责人犹司令也，遣将调兵，多寡不同，视所需要。惟专科调查及整理统计工作，需用科学技术人员较多（多属自然与经济两部门者），余则皆可通力合作”。^{[1] (P130)}黎锦熙对合作者也做出要求，“须其人对于方志旨例，心知其意，而所学有相当根柢，对于前列各篇目之内容例证，举一而能隅反者，便可加入为合作之一员。如调查一地，阅览一书，某事足供某类材料，触目了知，随手登记，统筹兼顾，分项点交，是为合作。”^{[1] (P130)}这样对梁启超所说的合作容易出现“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3] (P375)}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三、黎锦熙的方志理论实践

黎锦熙仅花了一月的时间就写成了《方志今议》，“我这‘方案’费了一月之力草成付印”，^{[1] (P13)}这是他在方志学上多年兴趣和积累的结果。而这也为他在日后的方志学研究道路上开了一个好头，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将他的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亲自总核订陕西四县志，使之成为民国名志代表

《洛川县志》、《同官县志》、《黄陵县志》和《宜川县志》，黎锦熙均担任总纂和校订工作。志书本身包罗万象，头绪纷繁，作好此项工作一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黎锦熙和他的同仁们为这四本志书中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前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述。在他们的努力下，洛同黄宜四县志成为民国名志，其中黎锦熙功不可没。这一点已被时人所认可，参与同官县志工作的姬命新曾这样评价说：“又敦聘湘潭黎教授锦熙整理润色。不惟可与关中四大名志并传，且得三十二年陕西全省文物展览会‘取材新颖，内容充实’等优评。……但邑志以黎公传，‘同官’二字且以志而著。”^{[4] (P536)} 每修一志，黎锦熙都与合作者商讨并进行认真核订，而核订工作并不轻松，正如他所说：“所谓核订工作，其繁重者皆在此，此其责不尽在原执笔者，盖资料与人力不相应也。至若整齐体例，通贯脉络，润饰文辞，标点章句，则为之实皆易易，无足道者。”^{[1] (P138)} 一般情况下，初稿往往并不尽人意，需做大量的校订工作。“盖印校工作之繁重，尤过于编核也。”^{[1] (P138)} “或病简省，乃为补苴；或有讹脱，乃为检校。”^{[1] (P138)} 他在《宜川县志》序中提到了他的具体核订过程：“或为双行小注，或为低格附件，而约其要领、举其宏纲于正文，有时增成章节，别为标题。凡诸芜颣空疏，尽量删汰。斯史家所谓‘文省事增’者矣。凡此皆斯志资料方面之补充、部勒、润色也。”^{[1] (P152)} 他的合作者之一和文瑄在他写的《同官县志》序中也曾描述过黎锦熙的工作情况：“复由余专员聘湘潭黎君劭西（锦熙）司总纂，其间阙者补之，论者正之，精心考斟，总归至当。而于方言谣谚中之‘声母’及‘同音字谱’独具心得，不厌求详。不佞与李君复从事校役，与黎君相处者三阅月，朝夕谈论，开益良多。”^{[4] (P13)} 黎锦熙的敬业严谨由此也可可见一斑。

（二）将《方志今议》的理论践行在县志的修纂过程中

黎锦熙当初在百忙之中，之所以答应参加四县志的工作，除了余正东专员^①的力邀外，最主要的原因当是将他的方志理论付诸实践并进行验证，对此，他在所主纂的县志中曾多次提及：“予参斯役，忝领编校，意固在践宿诺，抑亦因所草方志今议，仅‘设计’，未‘执行’，非实修数志，具体表证，即无从‘考核’其当否也。（如章实斋氏曾自撰永清、和州、亳州诸志，以实证其所创义例。）”^{[1] (P139)} “夫邑志纂修，方隅之业，学者隘之，然无方隅则不成全域，所学不验诸方隅亦终不能深切著明也。斯志之成，固余君‘为政在人’之绩，吴史诸君，始终贯彻，于予之方志今议，亦由实践而具有心得，而予则籍是而立‘求可求成’之方。”^{[1] (P146)} “所草方志今议但‘设计’，而余君毅然为之‘执行’，倘仅核稿入帙，而不督印出版，则其绩不得表证于社会，又何从‘考核’其当否乎？”^{[1] (P151)} 事实上，他主纂的陕西四县志均在《方志今议》的理论指导下修纂的。四县志的凡例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如《洛川县志》凡例中写道：“二、本志内容，略采‘方志今议’之两标、（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三术、（续、补、创。）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之旨，以为纂修之准的。三、本志篇目，亦略依‘方志今议’之拟目。”^{[5] (P29)} 《同官县志》凡例中写道：“一、本志依‘方志今议’之拟目……三、文不拘体：全篇有为图者，（卷一之疆域总图。）有为表者，（卷三之大事年表，卷二十五之氏族表。）有为文录者。（卷三十之丛录，但辑旧志序体。）各篇中亦随宜附入图、表、谱、或专件。”^{[4] (P17)} 参与县志工作的吴致勋也曾提及：“详搜约取，善善从长，‘补’所未备，‘续’所未入，依时代之演进，而‘创’所未有，以为编修之旨。”^{[5] (P19-20)} 总之，陕西四县志的主撰者到一般的参与者都在《方志今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修纂工作，四县志内容虽庞杂，但体例统一，条理清晰，这也为黎锦熙的最后统稿核订工作带来了便捷：“三区专署所颁类目，悉采余所草之‘方志今议’，原稿条分件系，巨细不违，余核订时，转多省变，盖视其材料之翔实与否，不容为体例所拘牵也。”^{[1] (P147)}

黎锦熙指导的陕西四县志修纂过程中，虽以《方志今议》为纲，但并不完全拘泥于此，会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以各县志拟目为例，都是结合本县实际，对原有拟目进行一定的调整。

^① 黎锦熙在写《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即《方志今议》时，余正东时任城固县长，过了两年，即1940年，他升任为陕西省第三区专员，文中提到的陕西四志均在他执政时完成，为督修地方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洛川县志》凡例中写道：“三、本志篇目，亦略依‘方志今议’之拟目，并参酌地方情形、材料多寡……四、各篇结体行文，概视内容为准；制谱列表，均随事类之宜。”^{[5] (P29)}“原拟目之农矿志，分为农业与矿业二篇，以本邑矿业发达也。”^{[4] (P17)}这一点，黎锦熙在《方志今议》的“总结全文”中专门提及：“今者全国一千九百余县，山川风土，文物经济，譬诸人面，各有特征，正宜量体裁衣，岂容削足适履？故预拟篇目，皆属假定，纂著之际，删并增析，一随当地材料多寡轻重之宜。”^{[1] (P131)}

（三）在实践中对《方志今议》的理论进行补充完善并将之应用到县志修纂

通过亲身参与修纂县志，黎锦熙将他的方志理论付诸实践并进行了验证，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对之进行了补充完善。最为突出的是，根据现实情况，对材料来源原来的三种方式——实际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分别调整为方桌访问、报告抄送、旧志剪贴。

黎锦熙在修纂洛川县志时，发现最后的成稿并不令人满意，认为“以理想之现代地方志为鹄，则斯志相去殆万里，即以方志今议之设计绳之，相去亦千里也。”^{[1] (P139)}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料来源问题，如实际调查中因人员素质和政府协作问题不能真正付诸实施，“今洛川县志虽云采照方志今议，而所拟二十余种普通调查表格，未见一纸之填报，询其故，则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故曰相去千里也。至各类专门调查，更非力所能举。准诸理想之现代地方志，非相去万里乎？”^{[1] (P141)}档案整理因战乱不断，保存凌乱，且分类并不统一，致使很难应用，“今洛川县志虽偶采县卷，然固未能如方志今议所云，彻底整理档案，故曰相去千里也。（洛川旧档，大部于二十八年被敌机炸毁，故可据者无多，旧事多由访问故老而得）。”^{[1] (P143)}群书采录因史籍茫茫，有限的人力采一邑之资料并不现实，“今洛川县志，除前志所引者外，殆未采录一书，如方志今议所陈‘阅览一书，某事足供某类材料，触目了知，随手登记，统筹兼顾，分项点交’者，未之能行也，故曰相去千里也；（即如文艺，历代涉及洛川之时，前志仅得唐诗一首，宋诗一首，杜工部三川观水涨诗，则富县、中部皆可用；假若广搜集部，可采录者宁止此乎？）至欲尽四部群籍凡涉洛川区域者悉囊括之，则更谈何容易？其相去万里矣！”^{[1] (P144)}

针对以上问题，黎锦熙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分别以方桌访问、报告抄送、旧志剪贴代替实际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这样做使资料收集这项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强，更符合现实情况。所谓方桌访问，即“须征约耆氓，东西南北，四乡各一，方桌围坐，按籍逐事，询记其现况及近年经过，不一周而毕矣。”^{[1] (P144)}报告抄送指“一邑之各机关团体以及各级学校，岁有考成，例具报告，自著其绩，亦备概况，虽或官样文章，未尽翔实，然舍此亦难获他据；但须县府行文，克期抄送，其机关直属国省者，呈转飭办。历年报告，应有尽抄”。^{[1] (P145)}旧志剪贴指要对旧志“彻底改组，有同掷碎，悉照新立志目，一一拾取，分纳诸门；别类宜精，废材勿弃；且不宜别纸抄录，只就原书剪裁，分隶新类，类复分目，片纸只字，并皆粘贴。（旧志尚宜用原刊本，凡近年排版重印本皆校对不精，讹脱贻误；原刊本即版本名贵，但有两份，便须以一份剪贴，勿吝也。）叠修之志，但次时代，蝉联而下，勿嫌重复。据此再检群书，拾补缺遗，纠绳舛误，固为至佳，即今无暇以为，属稿时注明出处，偶遇传讹，勉能卸责。”^{[1] (P145)}

《洛川县志》是黎锦熙担任总纂的第一部县志，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了修正与调整，并将新方法应用到后几本县志的修纂中。如在核定同官县志时，他就采用了方桌访问，经常会访问和他一起工作的另两位主要修纂者李榻山、和文瑄，“和李二君，深悉邑故，相处一室，时经三月，一有疑问，随举随答；且李君于二十四年续编时，跋涉山川，采查登录，法即未备，功已可钦。”^{[1] (P147)}在核定宜川县志时，也使用了方桌访问，先后采访了好几个人，就“方言一志，应主城郊，乃临时邀城居之李君文灿来发音”。^{[1] (P151)}再如旧志剪贴尽管因时间仓促，也尽力实施，如他曾评价宜川县志修纂时认为旧志剪贴“则斯志之优于洛、同、

黄三志者在是”。^{[1] (P152)}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黎锦熙在陕西期间教学工作之余参与修志，他从实践出发，结合现实，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方志编纂方法，并通过实践检验对之进行修正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并由此奠定他著名方志学家的地位，他的方志理论不仅在当时是进步的，而且至今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著名的方志学家朱士嘉认为《方志今议》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是那么精湛；又有说服力，所以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1] (P3)}

参考文献：

- [1]黎锦熙，甘鹏云.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4.
- [2]何炳武，陈一梅等.黄陵县志校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4]余正东修，黎锦熙纂. 民国同官县志[M] .铅印本影印，1944.
- [5]余正东修，黎锦熙、吴致勋纂. 民国洛川县志[M] .铅印本影印，1944.

Li Jinxi's Chor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

Qin Kaifeng, He Bingwu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Li Jinxi is famous scholar on chorography. Fangzhi Jinyi is his chorography representative works. He start compiling chorography during the Anti-war. The reason is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est. Fangzhi Jinyi discusses the nature, function, principle, style of the compiling chorography. It has many innovations in the Style\form and content. In the later, he will theory in implementing practice and continue to supplement and perfect.

Keyword: Li Jinxi; Fangzhi Jinyi; Practice

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

崔 莉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家面临危亡之时, 许兴凯潜心于日本史的研究, 目的在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侵略罪行, 以挫伤其民族自信, 使“国人认识真相”, 增强国人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本文将从日本法西斯、日本资本主义、日本殖民教育三个方面对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进行论述, 试析抗战时期, 许兴凯及其日本史研究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许兴凯; 日本法西斯; 日本资本主义; 日本殖民教育

许兴凯, 别名志平, 北京人, 生于 1898 年, 是建国前在日本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一位学者。192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吸引, 经李大钊介绍参与过《新青年》杂志的具体工作, 做过北京《晨报》的记者, 后又来到东北, 担任张学良创办的《新民晚报》的主笔, 以“老太婆”、“大小孩”、“老摩登”等为笔名写过许多文章, 全国青年对于他的文章, 莫不以先睹为快。许兴凯从事过新闻事业, 但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讲台上度过的。他 29 岁时就被北平大学聘为教授, 主讲日本史等课程。为了对日本作更深刻的认识, 1934 年, 许兴凯离国东渡, 在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研究所学习。回国后经历了短期从政, 便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许兴凯曾在北平多所大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 他来到西北联合大学, 作为文理与法商两学院的合聘教授, 讲授日本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1]。在西北联大担任教授期间, 他跟随学校从西安搬到城固, 又从城固迁回西安, 学校改名后又任西北大学教授, 直到 1953 年病故^[2]。

许兴凯在日本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发表过多篇文章, 并撰写了《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日本政治经济研究》、《日本学术界及学术机关》等著作, 是日本人所公认的日本通。其中, 《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一书还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这本书详述了日本在满蒙的殖民政策、司法、行政、驻军、警察、邮电, 以及教育经营; 中日俄三国铁路历史、现况、关系、价值, 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影响; 日本在满蒙的工商业投资, 对满蒙的原料夺取, 以及将来中国抵制的方法和出路等等。帝国主义与满蒙的主要问题基本被涵括在内。关于这本书的编辑, 许兴凯花费了一年半的功夫。1928 年 9 月, 他开始到沈阳搜集、整理材料, 参阅中日英文报纸、杂志、书籍, 抄画统计表, 直到 1930 年 3 月方才完稿, 是许兴凯在东北地区综合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 250 余幅统计表是从 500 幅统计表中精选出来的, 都是中日英文各报纸、杂志、书籍中发表的材料^[3]。从某种意义上说, 许兴凯有关日本史研究的著作既是对日本国情的详细分析, 又是向日本提出的抗议书。

一、许兴凯的日本史研究

19 世纪末,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进行了自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伴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 日本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而其侵略的首要对象便是中国。作为同样遭受过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在中国造成绵延不绝的内乱和革命, 而在日本却促其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是为何? 对此疑问的探索迫使许兴凯等学者开始下大气力去认识和研究日本, 而当时正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民族危难日亟, 为激励国人抗战, 抵御外敌侵略, 许兴凯通过调查研究推出了《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日

本政治经济研究》、《日本学术界及学术机关》等著作。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还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到庐山讲演。后来东渡日本，进行更加深入的考查。以下即结合许兴凯有关日本史的研究成果，从日本资本主义、日本法西斯、日本殖民教育三个方面对其研究进行论述。

（一）日本资本主义研究

1、“日本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发生，并行发展”。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崩溃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同时崩溃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但日本却比中国走快一步，粉碎了封建制度而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许兴凯认为这是因为日本“较弱”、“较小”、“较穷”、“较早”、“较急”的缘故，使得日本发生资本主义的一切障碍被扫除。“较弱”，是指日本国内的封建势力不像中国的封建势力历史长久、根基稳固，藩伐与幕府间的争斗反而促成了日本国家的统一；“较小”，是指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内战更易促其国家统一，所以“勤王倒幕”后不久，日本国内便已安定；“较穷”，是指日本国内贫乏，可使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垂涎的野心也较小，所以帝国主义束缚并扰乱日本的努力也较少，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完成；“较早”，是指日本的维新运动较早，明治立宪远在中国戊戌政变前十四年之久，那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到达东方的力量尚不太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也不太高，所以日本容易兼程追及；“较急”，是指日本偏小贫乏，实际生活的逼迫和需要使得人人皆有危亡之惧，尤其是维新以后的武士等，为促进物质的发展，积极开拓资本主义的大道。由于日本没有固有的文明，很容易吸收、学习，并采用西方科学与工业技术，不像中国已有文化深厚，不易完全抛弃，去学他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政权由幕府还给天皇，天皇同时宣布立宪召集国会，封建制度终止，资本主义遂开始迈进。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且从最初的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转变成为他国的侵略者。许兴凯认为这是日本资本主义自开始便立足于中国牺牲之上的结果。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巨额赔款作为资本，同时因为国际地位提高，又从欧美各国借得资本，开始使用机器，开设工场，完成了产业革命。从明治二十七年到明治四十五年，也就是中日和日俄两大战争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无论在任何方面都有了迅猛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也随之完成。

然而日本很快便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为生产过剩，不能不设法谋取商品或资本的输输出。而输出者又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这便导致了各输出国之间的摩擦冲突，于是发生了所谓的市场开拓与市场竞争。而市场开拓与市场竞争需要政治的、武力的援助，于是帝国主义便发生了。

许兴凯认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与英国等其他先进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发生最落后，技术远不及人，国土面积狭小贫瘠，资本原料严重匮乏，且国内人民贫穷，缺乏购买能力。而国外即中国这块市场，英德等国家早就打好了贸易基础，日本为谋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得不早早的利用政治，利用武力，在国内使用工资低廉的劳动者，在国外掠夺原料、资本和市场。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自明治维新、产业革命开始，在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便带有帝国主义的意味。经过中日和日俄两次大战之后，方才确立了日本资本主义，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生而具有政治性和好战性”^[4]。“这政治和好战两种性质恐怕是要与日本的资本和帝国主义相始终。日本的帝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发生，且并行发展的”^[4]。这是许兴凯认为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2、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温室的资本主义”。

根据日本国情，其资本主义是不应当发达的，然而事实上，日本资本主义却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兴凯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工的力量”，认为这“人工的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向外的掠夺、拓殖、武力等政策，便成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种是对内的保护、奖励、扶助等政策，便成为所谓的“温室资本主义”。

许兴凯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一方面得力于天时地利，即在日本实行产业革命以前，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日本可以很容易的吸收运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国内低廉的劳动力。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使日本资本主义发达，最为重要的还有“人工的力量”。“人工之最大者是日本政府的‘官营保护政策’”^[5]。

因为日本的产业革命不像英美各国是生产力发达的自然结果，而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利用人工赶超而成，其中多少带有强制性。这是因为日本国内的资本和原料异常贫乏，不能不求之于国外，而国外市场和原料又早为各西方经济先进国家所占领，日本要为自己的新经济找基础，也就不可避免对外一战。同时，“日本是个经济后进国，技术方面当然是不如各经济先进国，如若在市场上和人家自由竞争起来，恐怕是十九要失败，所以由战争之后获得了市场和原料场，仍不能不用政治的力量来看守”。许兴凯将日本的这种通过政治力量保护起来的资本主义称为“温室资本主义”，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就譬如冬天的花木，得天独弱，受不了风霜，又没有老松老柏耐寒冷的本领，所以必须放在温室里，加以人力的保护，用人工供给日光热力，方才可以发展”，而“这温室里的热力是由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来，并且需要政治上的坚壁，以保障这热力的不致外散”^[5]。

（二）日本法西斯研究

1、“日本资本主义先天浓重的封建性导致日本法西斯的产生”。

对于日本法西斯的产生，许兴凯从明治维新说起，分析了明治维新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差异，认为明治维新仅仅是“封建的政变”。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不同，西方国家是因为工商业发达，先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势力，资产阶级用其势力，向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要求，通过流血或不流血的方式，限制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固有的统治权，而使自己本身参与政治。明治维新则不然。许兴凯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政变，这政变是封建统治者（天皇、将军、诸侯和武士）本身间的一种政变，……是诸强藩和幕府间的冲突，以武士为主力，而以天皇为招牌”^[6]。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虽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地下埋根”，在明治维新中，比较进步的一方面虽然也得到商人若干财政上的援助，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胎儿”的商人及高利贷者的势力过于微弱，根本无法实现资产阶级革命。

明治维新中，被打倒的将军是封建势力，打倒将军的武士和诸强藩也是封建势力。不过在此次“政变”之后，日本封建政治崩溃，日本资本主义随之萌芽，而导致萌芽的力量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封建残余的武士。之后的日本资产阶级也是一部分由封建时代将军和诸侯的御用商人膨胀而成，一部分由武士改业转变而成。由此可见，日本资本主义是立足于半封建支柱之上的，具有先天浓重的封建性，这种情形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由下而上自然成长，西方资产阶级粉碎了封建势力，自己蜕化而出是完全不一样的。许兴凯称日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先天封建性为“胎病”，认为“这胎病乘着日本资本主义本身虚弱的时候而发展起来，便是日本法西斯。日本资本主义是先天病态的，成长于病态之中，最终不能不断送在这病里”^[6]。

2、“法西斯思想潜在于资本主义胎中，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特点。”

许兴凯从文化的角度探析了日本法西斯思想产生的原因，认为日本法西斯思想是儒学、史学、兰学相互作用的结果。

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三百年间，中国儒学支配着日本思想界。儒学家们主张孔子的“尊王攘夷”，以尊王反对将军代天王而执政，以攘夷反对幕府的对外妥协和开国通商。许兴凯认为中国的尊王攘夷思想成为后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精神推动力，一方面帮助日本完成维新大业，另一方面也种下了日本军人的唯我独尊、排斥欧美文明的东方法西斯思想。

导致日本产生法西斯思想除了儒学以外，还有史学。日本史学家提倡神道，用神道阐明国体的本质，疾呼：“神国日本”，“天皇是神”。许兴凯认为这种神道思想一方面固然肯定了

将军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种下日本的天皇神圣、日本神圣、日本民族优越一切的东方法西斯思想。

在维新前夜，和儒学、史学相对的还有“兰学”。“兰学”是西方学术，因为最初和日本往来的西方人是荷兰人，所以日本对西方新学称为“兰学”。兰学主张开国，和外国通商往来，学习欧美学术技能。它在早期虽然不如儒学、史学势力强大，但也有自己的地位。明治维新即是以这两种矛盾思想为推动力的一种运动，因此明治维新又称为“王政复古”。“王政复古”“不但是一个不彻底的革新运动，而且是内部矛盾的革新运动。日本法西斯便由此产生”^[6]。

明治维新时期，儒学、史学和兰学的两大对立思想是联合的。等到幕府倒了以后，两者再次敌对起来。兰学代儒学、史学而居领导地位，成为日本思想的主流。这也顺应了当时世界发展的趋势。世界的大潮带着日本，使日本不能不向资本主义途径上走，因而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支配了日本的思想界。

维新以后，随着欧美学术的输入，日本国内开始提倡学习西洋文明，日本资本主义及立宪政治随之产生。可是在另一方面，儒学、史学的反动思想也并没有消灭。非但没有消灭，并且仍然成为一方营阵而对立的存在着。他们反对欧化主义，反对采用西洋文明及制度，力倡“保存日本古来的民族性格”。日本维新前后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是由于日本资产阶级的弱势而成的。因为在维新前后，日本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并不太大，因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封建的土地领主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日本资产阶级前身的商人、商利贷者仅占援助地位，最多也只能说日本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妥协而使明治维新得以成功。这便是日本法西斯思想潜在于日本资本主义胎中的原因。许兴凯认为，法西斯思想潜在于资本主义胎中，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特点。

3、“日本法西斯的目的在于维持日本病入垂危的资本主义”。

因为二十世纪初期经济恐慌深刻化的缘故，动摇了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政治。资本主义为维持其命运开始做最后的挣扎，走上了冒险的途径——法西斯主义。许兴凯认为“法西斯是资产阶级公开的专政形式，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吗啡针。”“西方如此，日本也是如此”^[7]。随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没落，同时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所谓的“立宪政治”）也没落了。于是日本的政党出现分裂，一部分遂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有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就是军阀。日本军阀在历史上同盟会中的各政党冲突，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军费支出过大，财阀多不肯出钱，因而主张温和，和军阀遂成为正面冲突。这冲突的结果演变成军阀和财阀的劫夺政权战，军阀便开始从事政治运动，法西斯政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日本被军阀与财阀支配，而军阀与财阀又不能同时被一个人直接掌控。所以日本的法西斯虽然表面上反对资本主义，其实是反财阀，反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资本家。在日本国内，军人与财阀虽有矛盾，但是财阀又寄望于军人，企图通过制造军火敛财，并用枪炮的威胁得到中国这块市场；而军人得到财阀的钱以后也不再喊打倒财阀，打倒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法西斯的目的在于维持资本主义，维持病入垂危的资本主义”，许兴凯认为“法西斯的狂暴，法西斯的恐怖，可以表现出来资本主义临死的最后挣扎，最后愤怒，最后搏斗”^[7]。

（三）日本殖民教育研究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殖民教育，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而采取的侵略措施。其实质是从思想上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甘心做日本的奴仆和工具，实现日本“长治久安”的侵略目标。

对于日本在东北地区实行奴化教育，许兴凯认为，“一个民族的特点，就在他自有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一个民族所借以维系而不为其他民族所同化以至于灭亡的，也在于这自有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一个人所以能自己觉得他是某一个民族的，也在于这自有的语言、文

字和风俗。凡欲吞并或消灭某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普法战后，德国对于亚尔萨斯及罗伦便是如此，现在日本对于东三省也是如此。”“日本政府在东三省——关东州和南满铁路沿线——所办的学校，收容中日两国学生，目的完全在于中国人的日本化”，也就是“使中国人失掉他们的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而永久作日本资产阶级的奴隶”^[8]。

殖民教育是帝国主义国家为掠夺原料及独占市场的重要手段。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人民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膏血日渐枯竭，自发产生了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许兴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时候，为维持其继续掠夺和独占，仅仅依靠自身优越的经济势力是不够的，于是帝国主义的两只铁腕——一个是使人望而生畏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武化铁腕’，一个是似乎温柔可爱的宗教和教育的‘文化铁腕’——便开始发挥作用了。”许兴凯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铁腕”时写道，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缔结不平等条约，占据水陆要津，军舰巡弋，枪炮示威，迫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俯首帖耳、受尽掠夺，但是日积月累，酝酿已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终会随之爆发。“帝国主义者为了消患于无形计，不能不使作苦工而日就贫穷化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人民的怨气放散在牧师们的‘阿门’声中，而引他们的希望于死后的天国。”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设立学校，“这种自幼栽培的家奴，不只是没有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而且可以为虎作伥，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本地的人民，于是便产生亲此或亲彼的卖国贼”^[8]。

许兴凯痛斥日本的殖民教育，称其结果将是若干年后，东三省日本势力范围内不复有中国人，直指日本亡种教育的可怕，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险恶用心。同时，许兴凯也指出“中国民众十九目不识丁，过去的宣传教育总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但并没有把爱国家、爱民族意识灌输给他们，结果中国民众不懂什么叫帝国主义，而对于国家民族根本没有印象，更不知为何物。”许兴凯呼吁“训练民众、改良过去民众教育的错误”，并提出这是当下知识青年的专责^[9]。

二、许兴凯日本史研究的时代意义

许兴凯有关日本史的研究，以及著作的写成和出版，都正值中日两国处于不断升级的战争时期。在民族遭受侵略、危急存亡之时，许兴凯深入到已沦为殖民地的东北地区，甚至东渡日本，调查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在他有关研究日本史的著作中，内容兼包有理论、历史和统计，且在每一个问题之始必分析其原因，同时叙述历史的发展、经过，并陈列数字，清楚展现最新情况，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了解日本的重要参考资料。许兴凯在研究中对日本帝国主义追根溯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侵略罪行，目的是为挫伤其民族自信，使“国人认识真相”^[10]，坚定国人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许兴凯还将其日本史研究的成果用于教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等地相继陷落，许兴凯随北平大学等华北地区的3所国立高等院校一同迁往西安，在新组建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3月，日军进逼潼关威胁西安，学校随之南迁。为适应抗战需要，许兴凯等学者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不畏艰辛，一路曲折辗转来到后方，在艰苦的条件下施教育人，这正如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所说：“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11]。许兴凯等学者正是以知识为武器，为抗战救国提供了知识和人才的保证，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西北联合大学是在日本侵华的枪炮声中诞生的，因此认识日本无疑对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许兴凯在西北联大通过讲授日本史，将其所学及研究成果教与学生，对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姚远. 西北大学学人谱[M].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195
- [2] 紫藤园夜话千里青随笔集[M].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15-18
- [3] 许兴凯. 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M]. 上海昆仑书店, 1929: 3
- [4] 许兴凯. 日本法西斯发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元祖[J]. 东方杂志, 1938,35 (20): 19-26
- [5] 许兴凯. 日本政治经济研究[M]. 天津百城书店, 1931: 405
- [6] 许兴凯. 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M]. 上海昆仑书店, 1929: 395
- [7] 许兴凯. 日本政治经济研究[M]. 天津百城书店, 1931: 341
- [8] 许兴凯. 日帝国主义与东三省[M]. 上海昆仑书店, 1929: 63
- [9] 许兴凯. 抗战的经验与教训[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9): 17-19
- [10]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10-16
- [11] 本校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7-10

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张贻惠

白 欣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048)

摘要: 张贻惠是中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对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及北平大学工学院以及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他还为统一度量衡工作做出积极的努力,同时他也积极的投身科学普及工作,翻译并出版科普书籍。张贻惠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学界对张贻惠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本文对张贻惠的生平简历、科学成就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研究以及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张贻惠; 教育思想; 物理学

引 言

明末清初,物理学开始传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物理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繁荣,这与许多物理学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张贻惠。张贻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在我国近代物理学界和教育界有较高的声望,从目前的国内文献来看主要有陈毓芳的“物理学家张贻惠”^[1]和“张贻惠——率先在国内高等院校开设原子物理学”^[2]较全面的介绍了张贻惠的生平、科学成就及其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作者还着重描写了张贻惠对北京师范大学的贡献,但在张贻惠的思想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物理学会的贡献等方面还有些不足。此外,王士平主编的《中国物理学会史》^[3]中简单的介绍了张贻惠的生平及其在创立和筹办中国物理学会中的贡献;还有一些书提及到张贻惠的某一方面的贡献,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校史》^[4]和《西北大学校史稿》(解放前部分)^[5]就涉及到张贻惠对北京师范大学和解放前一段时间内的西北大学的贡献;另外还有,闻黎明的“1921 年清华学生“同情罢考”事件”^[6]中,提到了张贻惠曾经在请愿中受伤;戴念祖的“我国第一个物理学博士李复几”^[7]和美国学者马祖圣著的《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都记述了张贻惠是我国较早出国学习的科技人员之一。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史界对于张贻惠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张贻惠生平及主要工作进行了深入梳理,以往学界对张贻惠的具体逝世日期并不明确,本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确定了张贻惠的逝世具体日期;在张贻惠的科学成就方面,着重强调了张贻惠对物理学会的贡献。

一、生平述略

张贻惠(1886.?—1946.7.12),字绍涵,1886 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他的父亲是进士,当过内阁中书,因此张贻惠可以说是生在书香门第,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少年的张贻惠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再加上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因此 1898 年,在他 13 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巧的是这年正好在中国的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加上之前的洋务运动的影响,导致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张贻惠日后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及他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2 年,张贻惠 16 岁那年去南京参加乡试,恰巧赶上江南高等学堂招生,这所学校正是为预备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前期学校,于是他便通过考试进入了该校学习,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由于学习



成绩优秀，1904年，他获得了一次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这是由一些由南京政界人士募集经费，专门选拔优秀的安徽籍学生赴日深造，这也是安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获得此次机会的一共只有十个人，张贻惠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这一契机，张贻惠成为近代中国较早出国学习物理的人，在20世纪的一个十年里，出国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只有张贻惠、何育杰、夏元璠、李耀邦、胡刚复等少数人。^[8]到了日本后，张贻惠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日语，之后便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数学和物理，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获理学士学位。后于1914年回国，并于1915年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讲授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课程。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校教授。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23年曾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考察教育，1924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于1925年10月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27年6月，张作霖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从北沟治顺成王府设立大元帅府，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就职，他先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称为“大元帅”。请刘哲出任了当时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同时张作霖下了一条特殊命令，让刘哲执行，就是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以刘哲兼任校长，以胡仁源、张贻惠、毛邦伟、孙柳溪、林修竹等为各院院长。由此，1927年8月，奉系军阀政府将北京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改称为京师大学师范部，张贻惠任师范部学长；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后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官僚贪污，致使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丝毫没有保证。随着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奉系军阀撤出关外，南京派阎锡山军队接管京、津，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国民党势力到达京津一带，国民党政府把教育上的大学区制推行到北方，将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原北京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院，原北京师范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张贻惠任第一师范学院院长。

1928年，张贻惠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的邀请，就任中央大学教育政治院高等教育处长和物理系主任、副教授。但几个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他又重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任院长。张贻惠与原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一起要求学校独立，1929年，北平大学改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独立，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张贻惠于1929年8月—1930年2月担任该校校长。1930年—1933年期间，他同时在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1933年，张贻惠被当时政府的教育部任命为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和工学院院长，他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校务管理，辞去了其他社会兼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天津相继沦丧，北平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的和平环境供广大师生学习，为了保存和坚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致受日本人管制、不成亡国奴学校、不受奴化教育，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当时张贻惠积极的带领着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广大师生西迁，同时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也纷纷迁往陕西，这几所高校在陕西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又于1938年4月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张贻惠出任西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主任。“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原有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9]，于是原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校址设于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张贻惠出任教务长，并讲授数学、物理等科目。城固县地处偏僻、物资缺乏，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民族危机和国民政府的腐败，造成教师的薪金较低，生活条件较为恶劣，但张贻惠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向广大的学生传授科学知识，陪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广大师生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虽然条件艰苦，张贻惠也一直坚持，直到1940年，他奉命调到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就任技正一职，“次年调任参事，对后方建设多有建议”。1946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当局准备接收北方个省，于是便委派张贻惠“视察冀、热、察、绥及东北各省工业状况”，可不幸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于7月12日在济南坠毁，张贻惠以身殉职，为此，西北大学的师生们在城固校址万般伤痛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其弟

张贻侗^①悲痛的讲张贻惠“毕生治学，半生讲学，桃李遍寰区，此日同悲耆旧谢；爱弟则友，海弟则师，仪型思往昔，人间赖有父兄贤”^[10]。

二、投身科学

张贻惠在力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他较早的在中国高等院校开设原子物理学，向热爱科学的学生们传授原子物理学，而且，他还积极的参与筹办中国物理学会。张贻惠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界一位有影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对中国近现代物理教育的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筹办中国物理学会、统一度量衡、投身中国科学普及工作等。

1 积极参与筹办中国物理学会

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物理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且于 1918 年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物理系，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特殊环境所致，全国没有一个正式的物理学学术交流组织。在这一背景下，应全国的物理学同仁一致要求下，中国物理学会创立起来，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为全国物理学界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物理学进展的学术平台，对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1 年，设在瑞士的国际联盟派遣了一个由 4 人组成的国际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现状，在这 4 人中有一位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名叫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他在考察中国的教育的同时，也很关注中国物理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在北平的物理学者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建议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们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组织——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方便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们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交流物理学研究与教学经验，最终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在保罗·朗之万的建议下，中国的物理学者们便开始积极的筹办起物理学会来。1931 年 11 月 1 日，北平物理学界众多学者们开始倡导创办中国物理学会，他们分别是：张贻惠、夏元璠、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文元模、谢玉铭、丁绪宝等人，他们发函给国内的物理学界的同仁，并要求他们作为发起者。^[11]

1932 年 8 月 23 日，代表们在北平清华大学科学馆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之后召开了年会，在这次年会上，张贻惠成为 9 名评议员当中的一员，其他人还有李书华、叶企孙、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和王守竞。当时中国物理学会还成立了理事会下辖的 3 个委员会，分别是：物理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学教学委员会，张贻惠在物理学报委员会和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都担任职务。1932 年，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初，为了方便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创办了《中国物理学报》，并设立了《中国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张贻惠与张绍忠、周培源、胡刚复、严济慈、丁燮林、王守竞、吴有训、饶毓泰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张贻惠同时还与萨本栋等人一起担任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

2 对统一度量衡工作做出努力

张贻惠还为近代中国度量衡的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1913 年，中国农商部颁布《度量衡法》，逐步取消营造尺库平制^②，开始采用米突制^③，米突制的使用在中国科学界已不成问题，但在翻译名称上，由于我国文字的关系，难于统一，推行上有很大困难，这部《度量衡法》便最终成为一纸空文。1928 年 7 月 18 日，国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草案》，内容共两项，计六条。1929 年 2 月 16 日公布《度量衡》二十一条。1931 年 12 月 5 日实业部公布《修正度量衡法施行细则》五十四条，这使得新制渐渐的全中国推广起来，当时统一度量衡成为当务之急，但度量衡名称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变得明显起来，全国各阶层人

^① 张贻侗(1890—1950)字小涵。安徽全椒人。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

^② 营造尺库平制是在吸收各朝代度量衡制度的基础上，于清朝康熙时期完善形成的。即以 100 粒黍子纵向排列的长度定为营造尺，为度的标准；又以一定的尺寸定容量，制成漕斛(清时容量单位，民国时取消)，为量的标准；再用 1 立方寸金属的重量为权衡的标准，称为库平。由营造尺、漕斛、库平组成的度量衡制，简称“营造尺库平制”。

^③ 以米为长度主单位的国际计量制度。“米突”为法语“mètre”的中文音译，意为“公尺”。现已称“米”，而不再用“米突”这个旧称。

士开始热衷于对度量衡名称的讨论，并纷纷将自己的意见刊登在各种刊物上，中国物理学会为此事也上书当时行政院及教育部，陈述命名及定义的关系，从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大争论。张贻惠也积极的参与到这场争论中，他经过系统地、仔细地研究度量衡的产生及其发展历史后，认真的分析了我国对米突制的几种翻译，他认为：“关于我国过去翻译的米突制的名称，约分三种，（一）音译法、（二）造字法，（三）农商部法仍沿用我国尺寸斤两的旧名称，在上面加‘公’字区别”，这三种翻译法在张贻惠看来各有利弊，他认为统一度量衡的意义重大：“订一较完全之系统，则于实用上，科学研究上将更见整齐划一，无扞格不通之弊矣。”^[12]并且，他还根据国家推行统一度量衡所遇到的困难，提出应该在推行市制上做出努力，最终他还对标准度量衡的命名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见解和建议对当时度量衡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统一有关名词的工作有积极的意义，获得工程技术界和物理学界的支持与赞同。

3 积极投身科学普及工作

张贻惠不仅拥有深厚的物理功底，他认识到科学普及对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他投入到物理及各门学科的文化普及与传播工作中去。张贻惠于1914年回国，当时他还很年轻，有很大的抱负，他很想科学研究上作出一番成就，可当时中国局势混乱，各高校设备欠缺，因此他便不得已将精力都放在教育上。当他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后的科学技术知识时，他便决定投身于科学普及工作。1932年，国内政治局势较稳定，学术界也渐渐活跃起来，因此他便想翻译或编著几种浅显易懂的科学理论书籍，让更多的国人认识科学、了解科学，他并不是像很多科学家一样埋头工作于自己的实验室，而是在搞研究的同时还注重科学文化传播，就像在他所翻译的英国科学家靳斯^①的《宇宙及其进化》的编纂缘起中写的“一个科学家主要的工作，自然是在实验室里，或者工作室里，仔仔细细的，作那实验或理论的研究。但在科学落后的国家，像我们中国，把科学思想普及到社会，似乎也是很要紧的一种工作”。因此，为了宣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他在国内较早地做起了翻译科学丛书的工作。张贻惠在《宇宙及其进化》的序中写道：“天文学是发现最早的一个科学”，因此他认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住的宇宙，有深切的兴趣，并且有许多现象，举首即见，很容易实地考察”，所以他首先选择了由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靳斯所著的科学通俗著作《宇宙及其进化》作为他翻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这本英文原著刚出版时很受欧洲人的欢迎，仅仅发行一年，便卖出了七万五千余部，张贻惠翻译的这本著作于1933年由北平震亚书局出版发行。张贻惠在书的序中指出：“他在译文时注意达意，而不去斤斤作句句字字的对照。为了使意思更圆满，译文更通达，在有些地方作了些变动”^[13]。书后还有译者自加的增录三条：一、太阳距离的测法；二、天文用干涉表；三、希腊字母和罗马字母，作为补充。此书由于原作者高深的学术水平和娴熟的文笔，加上译者的补充和润色，用极平凡的名词，富有趣味的文句，叙述深奥的科学原理，使读者不倦，此书的出版受到广大天文爱好者的欢迎。

三、个人思想

近代中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强大的西方列强。因此，在上个世纪初，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物理学都是一门十分陌生的学科，中国没有专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没有完备的物理实验室，没有一个能够容纳广大科学家专心搞科研的和平环境，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物理学的陌生直接导致政府与社会对于物理学研究工作的不支持。因此，在物质与精神支持的双重缺乏下，中国早期的物理学家们大都还担当着教育者的责任。

1 倾心教育

张贻惠在回国后，发觉中国非常落后，没有良好的实验室、完备的图书馆，缺少能够让他专心搞研究的物质基础，但他没有像许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一样离中国而去，而是选择献身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张贻惠归国后，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教育上，很少去搞研究，因此很多人更愿意称他为教育家。

上世纪20年代，北京的一切几乎都在军阀的控制之下。由于当时的国内军阀混战，因此政府的支出大量都用在军费的开支上，军费开支不够时便挪用教育开支，这使得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廉因学校经费积欠困难，

^① 靳斯：英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无法开展正常校务工作，突然辞职离校。1925年，张贻惠接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务，此时北京师范大学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为坚持办学，他开始积极的筹措资金，首先，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求助，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赠与科学教席4座，每座附设备费2000元，并补助附属中学1400元，附属小学600元；其次，为了赚取维持学校的费用，他决定由北京师范大学为广西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省政府拨给补助费。正是由于张贻惠的四处奔波与努力，学校才得以维持，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北京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

1933年到1937年间，张贻惠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工学院的工作上，他说：“工学院往往被外界人士误会为老朽落后的工业学校，固然工学院的房子、一部分的机器、仪器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够的上说是老的了，但是在课程同研究上并不觉得比一般学校老朽，所有的教授同学生都是非常的努力”^[12]，他在担任院长期间，努力的节省日常经费开支，用于扩充工学院的机器设备，使工学院的教学与实验、实习活动逐渐走向正常化。1934年实行限制教授兼课时，本应当提高教授的工资待遇，但他在同各教授磋商之后，还是按以往开支，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来购买仪器设备，体现了他对教育的投入与专注。

张贻惠很注重教学工作，他总是很积极认真的备课，他的课堂总是很活跃，生动且认真，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课，“据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赵慈庚回忆，张贻惠在讲授普通物理学中，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很吸引人，学生们都很愿意听。”^[2]他很注重课堂质量和教学方法，陈毓芳在她的文章里就夸赞张贻惠说“张贻惠的课堪称北平各高校物理学教学中高水平、高质量的课。”^[11]为了更好的传授同学们科学知识，满足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望，他还开设了原子物理学课程，将其毕生所学尽可能的传授给学生们，且为那些热爱原子物理学的同学们提供充分学习的机会。

张贻惠还十分重视学校的学风建设，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期间“提倡学术风气作育优秀师资为职志，启迪后进，不遗余力”。1933年他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在“训练专门技术之外，尤重学生人格道德之培养，于是校风卓然”^[14]。张贻惠在努力教学，重视校风建设的同时，也很积极的为学校、学生提供帮助，例如关注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关心学生、爱惜人才等等。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他也非常关心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当时国内科技图书缺乏，校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也很少，为使广大师生能阅读到更多的图书，他及家人将自藏的一批科技图书无偿献给学校。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依然还能看到一些盖有张贻惠印章、并写有“赠”字样的图书，这就是他当年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付出心血的证明，现在这些书已成为该校图书馆的珍藏。

张贻惠十分关心学生，注重对同学们的考察。“1939年5月10日，西北大学第72次常委会通过了《本校学生操行成绩考察办法》，规定：‘切实考查其平日进修情形，阅读书报、言论、写作、礼节、仪容、内务及团体活动等项为评定分数之根据’”^[15]，并推举张贻惠教授等人为筹备委员，利用暑假期间组织教授到甘肃、青海、宁夏考查。

张贻惠也很爱惜人才，在他任校长期间，他总是尽力为北京师范大学挽留人才，后来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汪德昭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汪德昭毕业，张贻惠发现了这个人才，并且为了留住这个优秀的人才，将其破格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助教，后来汪德昭的发展及其成就证明了张贻惠择人的眼光是很独到、正确的。汪德昭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他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水声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水声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贻惠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和该校物理系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的广大师生对他仍铭记在心，1948年在校长袁敦礼的主持下，将原物理楼命名为“贻惠楼”，并写成匾额，悬挂在楼内大厅中央，以表示永久的纪念，可惜时至今日，由于历史原因，那块匾额已经不知去向，但今天，当我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楼时，我们仍然会看到他和其他老前辈的照片一起被挂在物理楼大厅里，照片下面还有他的简介，以方便广大师生了解他。

2 真情为国

在张贻惠留学日本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还身为学生的张贻惠，义不容辞的请假回国参加了革命，他身在国外，心却不曾离开过祖国，他和当时的所有爱国的民主战士一样，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1914年，他回到祖国后看到祖国的落后，

便下定决心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意识到祖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落后,大多数群众仍然很愚昧,生活在封建迷信之中,因此他便决定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张贻惠尽最大的能力教授与传播科学,正如他在《宇宙及其进化》的编纂缘起中写道的:“近来国难临头,上自党国要人,下至服吏走卒,莫不认为中国的不振,是因为物质不如人。”因此他也认为:“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提倡物质科学的一途了。”^[13]而他本人又是个从事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学者,因此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921年6月3日,北京的教育界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即“六三惨案”。1920年7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第一次直皖战争,由于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以致教育经费被大量挪用,公立院校经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为此,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于1921年3月14日宣布停止职务,4月8日又举行同盟罢课。后来,其他学校教职员也纷纷加此行列,6月2日上午,北京29校学生代表赴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国务院请愿,可时任内阁总理的靳云鹏却拒绝接见,第二天早晨,坚守在国务院前的学生代表经四次交涉方得入内,却遭到一连卫兵荷枪实弹的看守,“消息传出后,各校紧急协商,决定举行大规模请愿。上午10时,北京中小学以上男女22校学生600余人,手执“教育破产”、“请政府履行国务会议议决三条”等标语,齐集新华门东门外,要求总理接见。”^[6]众人当时冒雨坚持二个多小时,直至下午,二十二所公立学校的校长,与八校教职员代表(张贻惠是其中之一),以及学生共千余人,再至新华门请愿。时任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邻翼出面,对代表要见靳云鹏的要求,只同意代为转达,不能对事件负责。代表们被马邻翼的应付态度激怒了,遂欲拥入。这时,早有准备的军警们,荷枪实弹,见人就打,在这场正常的请愿活动中,教职工代表们却遭到不正常的毒打,导致张贻惠与其他代表二十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声援老师们的索薪斗争,继续宣布罢课抗议。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当时国内学生运动的开展。1927年4月6日,在张贻惠还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之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李大钊教授被捕,张贻惠便很快主持召开校务讨论会,商讨营救李大钊的办法,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注册部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的余文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张学良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16]。从这些事件中看出,张贻惠心系祖国,当国家处水深火热中时,作为科学家的他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国民教育中,为教师、学生的利益倾尽全力。

四、结语

正如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所说“由于庚款留学的关系,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以留美居多。而留学日本的吴南薰、张贻惠、周昌寿、文元模等,均未获得博士学位,也没有重要的物理论文发表。”^[17]这使我们过多地关注了留学欧美的物理学家,而张贻惠这位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中国近现代物理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创建或发展了几所大学物理系、对中国物理学人材的培养、积极开设物理学课程、将物理学知识向社会的普及、积极创办中国物理学会、统一中国度量衡等方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本人却未能在物理学研究上取得突出的成果,使我们常常忽视了他对中国物理学的贡献。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得大多数物理学家难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研究,但没有取得突出的物理学成就,依然成为当时留学日本的物理学家们的共性。

通过张贻惠对中国物理学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看出,物理学从来到中国到生根、生长,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在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的中国物理学的今天,已然有了繁荣的景象,在即将迎来201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80周年之际,当我们重新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依然不能忘记这些为中国物理学事业前仆后继的物理学者。

参考文献:

- [1] 陈毓芳.物理学家张贻惠[A].王淑芳、邵红英.师范之光[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8—92.
- [2] 陈毓芳:“张贻惠”.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专略[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3-29

- [3] 王士平主编、刘树勇、白欣、李艳平、王洪鹏副主编, 中国物理学会史[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4]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 [5] 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史稿(上卷, 1902-1949) [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 [6] 闻黎明.1921年清华学生“同情罢考”事件[J].百年潮.2003(4)
- [7] 戴念祖. 我国第一个物理学博士李复几[J].中国科技史料.1990(4): 32-36
- [8] [美]马祖圣.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1840-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7.
- [9] 赵弘毅,程玲华.西北大学大事记(修订本)1901—2002[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174—177.
- [10] 本校前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张绍涵先生追悼会在本校举行[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6, 23:14—15.
- [11] 李艳平、王贞.朗之万在中国[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3): 72-78
- [12] 茜蘋.学人访问记[N].世界日报,1935-2-20(7).
- [13] 靳斯.宇宙及其进化[M].张贻惠.北平震亚书局出版,1933:3-6.
- [14] 本校前教务长兼物理系主任张绍涵先生追悼会假本校举行[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6, 23:14—15..
- [15] 赵弘毅,程玲华.西北大学大事记(修订本)1901—2002[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176—177.
- [16] 晨报[N].1927-4-11
- [17] 吴大猷.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J].燕京学报.第10期: 55

Zhangyihui, The physicist's Life, Achievement, Thought

Bai Xin Zhai Lipe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ysics,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 Zhang yihui is a famous physicist and educato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e mak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also makes efforts to unify weights and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he joins the wor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ranslates and publishes the work “The Universe and Its Evolution”. Zhang yihui i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but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few people to research him and their works are not deep enough. This paper pays much importance on Zhang yihui's experiences,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Zhang yihui will have a special significa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hysics and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Key words: Zhang yihui, Education of Thought, Physics

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曾炯

王淑红^{1,2}, 姚远¹

(1.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127;

2.河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通过考察相关历史资料, 对著名数学家曾炯(1897—1940)的生平、成就和影响进行较系统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表明, 曾炯通过自身努力留学海外, 得到哥廷根大学代数学学派的灵魂人物 E.诺特(E.Noether,1882—1935)和汉堡大学代数学学家 E.阿廷(E.Artin, 1898—1962)的真传, 学习并掌握了当时先进的抽象代数学, 先后发表三篇重量级论文, 引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曾定理和曾层次。回国后, 先后在浙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任教。他不但对抽象代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中国研究抽象代数学的鼻祖, 而且为近代西方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的科学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曾炯(1897—1940); 曾定理; 曾层次; 哥廷根; 抽象代数学

曾炯是抽象代数学之母 E.诺特和 E.阿廷的嫡传弟子, 是中国第一个抽象代数学家。因英年早逝, 仅留世三篇德语论文, 但就是这三篇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坛的重要地位, 使他获得中国抽象代数学鼻祖的美名。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和克拉福德奖三大奖励荣得者丘成桐(1949-)认为他是 20 世纪唯一可以与日本数学家相媲美的中国数学家^[1]。1976 年, 来华访学的美国数学代表团的著名代数学学家麦克莱恩(S.MacLane, 1909-2005)在其学术报告“代数的过去和将来”中, 列出了 11 位世界著名代数学学家, 曾炯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学者。西方文献中把他的名字载入 E. 诺特的重要学生之列。数学界公认他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赴哥廷根学习数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地位最突出的一个。

抽象代数学又称近世代数学, 产生于 19 世纪, 从法国天才数学家伽罗瓦(E.Galois,1811—1832)在 1832 年成功运用群的思想彻底解决了用根式求解代数方程的可能性问题开始, 经过很多数学家的努力, 特别是 E.诺特和 E.阿廷等人的发展,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成为独立的学科, 全面开启了代数结构研究的新局面。哥廷根大学和汉堡大学是当时世界抽象代数学研究的两个重要中心, E.诺特和 E.阿廷分别是这两个中心的代表人物。其中哥廷根大学创建于 1734 年, 培养和聚集了众多杰出人士。抒情诗人海涅(H.Heine, 1797—1856)、科学家洪堡(A.Humboldt,1769—1859)曾在该校学习, 数学王子高斯(C.F.Gauss, 1777—1855)、全才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1862—1943)等曾在该校执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 世界数学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 到哥廷根去求学是很多人的梦想。中国经过 19 世纪末以后一段时期的向西方学习, 特别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后, 开始大量向美欧日等国派遣留学生, 鼓励学成回国兴办教育, 发展学术, 追赶国际科学和教育前沿^[2]。

曾炯就是在这种科学教育背景下, 通过自身努力抓住机会到哥廷根和汉堡这两个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留学深造的。在良好的科研氛围中, 经过顶尖数学家的悉心指引和自身的不懈探索, 在抽象代数学领域获得重要成果, 显示了非凡的创造力, 一跃成为在国际上早期进入抽象代数领域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日本《岩波数学辞典》把他得到的一些结果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曾定理和曾层次^[3]。

曾炯学业完成后，放弃哥廷根的热情挽留，满怀壮志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以及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教。由于条件艰苦，常年奔波，不幸英年早逝，留给我们无尽的遗憾，正如沃尔夫柴荣获得者陈省身（1911—2004）在回忆中指出的那样：“他回国后没有充分发展他的才能，是国家的损失！”

遗憾地是，相对于同时代其他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数学家而言，关于曾炯的历史研究相对少得多，这与曾炯的数学成就及其世界数学史中的突出地位不相符合，有鉴于此，我们在整理和分析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试图较系统地整理和分析曾炯的生平、成就以及科学教育影响，以期对更好地了解近代西方代数学的传入和发展有所裨益。

一、一生求索，英年早逝

曾炯，字炯之，谱名祥江。依家谱记载，曾炯 1897 年 4 月 2 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赣江西岸生米乡斗门村。父亲曾繁文，又名曾祖文，生有二子，曾炯居长。

全家仅靠父亲打鱼为生，生活很贫困，因此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时读时辍。幸运的是，作为晚晴进士且任过翰林的堂姑父雷恒慧眼识英才，发现小曾炯非常聪明勤奋，就竭力主张克服家庭经济困难送他去读书。于是，在众亲友的关怀和帮助下，曾炯先是在家乡读短期私塾，后来又回到南昌市高桥小学就读。但两年后，还是因生活窘迫辍学返家，先随父捕鱼，后经人介绍到江西省丰城煤矿打工。在此期间，他坚持在工余时间勤学苦读，也常常利用极好的珠算功底，帮助矿工们记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7年，曾炯以同等学历考取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好在该校免费供应膳食，另外得到在日本公费留学的表兄雷宣节约生活费给予资助，他自己还自食其力，通过写文章、帮助学校图书馆整理书籍等获得一些薪酬，满足生活的不足。家境虽然贫苦，却乐于助人，孝敬长辈，曾在一次讲演比赛中获奖金银币10元，全部交给母亲，并嘱咐母亲给邻居孤老大妈4元。

曾炯依旧学习刻苦。别的同学在课外去饭馆或看戏，他却找安静处读书。晚上自修室熄灯后，他悄悄打拳锻炼身体，在路灯下或厕所里看书至深夜。假期回家，即便因家里房子倒塌住在曾氏祠堂的小屋期间也坚持自学。常常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演算题目，甚至察觉不到别人从身边走过。他成绩优异，文理兼通，还有一手好书法。曾炯还参加学生的爱国行动，上街演说，反对军阀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二十一条”，身穿的粗布大褂被反动势力撕成碎片也毫不畏惧。

1920年，曾炯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顺利毕业，遵照规定，在南昌、新建等地任小学教师两年。当小学教师两年期满后，1922年进入今武汉大学前身，即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著名数学家陈建功（1893—1971）的得意弟子。在陈建功的鼓励和引导下，他萌发了出国留学的愿望。因当时的中等师范学校未设外语课，数理化的开课水平不及普通中学，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及英文等科目的要求亦不如其他国立大学，所以他遵循陈建功的教导，除加倍努力学好规定课程外，还学习德语，准备出国所需的条件。1926年，经过四年苦读顺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此期间，生活上得到雷恒之子雷子布的热心资助。

大学毕业后，曾炯到江西西北部山区武宁县省立第六师范任教半年多，随后又在江西省立第六中学教过半年多的书，并继续坚持自学。他锐意进取、坚持理想，考取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按规定，必须在中等学校执教两年才可出国学习，所以他继续在中学教书。他房间的桌上地上经常落满纸张碎片和铅笔断头，日子虽清苦，但心情十分舒畅。其间，曾炯和一些爱国师生，走上街头，要求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他在街头大声讲演，市民们边听边鼓掌。不料被突然窜出的不明身份之人围殴致头破血流，被师生们抬到医院急救。时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1892—1978）听说被毒打的人中有一个考取公费留学

的年轻人，还专程到医院探望。1928年上半年，曾炯在南昌的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且担任高中部主任。

1928年秋，曾炯在中学执教两年期满，遂办理出国手续，本应去美国的他提出改去德国的愿望。他之所以想去德国，是因为陈建功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我本人是个日本博士，但德国数学博士最难得！德国哥廷根大学是世界数学的中心！”顺利得到批准后，曾炯在1928年当即启程赴与哥廷根同样声名显赫的德国柏林大学数学系学习。

1929年春天，转入他梦寐以求的当时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犹太女数学家E.诺特，主攻在20世纪数学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并且方兴未艾的抽象代数学。当时的哥廷根大学代数学派代表了代数学的前沿，聚集了以E.诺特为首的众多杰出代数学家。曾炯抓住时机力争上游，依旧保持他一贯的勤奋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据记载，在E.诺特和曾炯师生初次见面时，E.诺特问：“你是不是很像日本人呢？”曾炯答：“不，先生，我是中国人！”“呵，对不起！大家都说日本留学生最用功，学得最好！”“先生，是的，学习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愿跟世界各国的同学们比一比！”“好！祝福你！”“谢谢先生！”曾炯就在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指引下，在哥廷根大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攻读五年。

期间，1932年9月12日，第9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瑞士苏黎士召开。因当时中国数学会还未成立，因此报名参会的中国数学家仅4人，即熊庆来（1893—1969）、许国保、李达（1890—1966）和曾炯，但曾炯因迟到未获正式参会资格。

曾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还有一段插曲。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排挤犹太人波及到哥廷根很多犹太数学家和科学家，E.诺特也在此列。1933年4月E.诺特被解职，10月被迫离开挚爱的哥廷根背井离乡远赴美国，临行前一再叮嘱曾炯一定要完成学业。

曾炯在1933年发表其第一篇重要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 (*Divisionen algebren Über Funktionenkörpern*)”的时候，在题注中写道：“谨向导师E.诺特致以诚挚谢意！本文作者是在她的鼓励之下开始从事此项研究的。在文章撰写过程中，因她孜孜不倦地教诲和帮助，使得作者最终顺利完成研究工作。”由此也可见E.诺特对曾炯的深刻影响。

1934年，曾炯不负老师期望，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终以“代数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 Über Funktionenkörpern*)”为题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哲学博士（即热爱知识的人、知识造诣高的人）学位。当时的哥廷根大学未设独立的数学系，数学是作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的哲学院的一部分。学位也只设哲学博士。博士论文的答辩由各部分教授一起主持。

曾炯在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同时也是中国数学人勇攀数学高峰的五年。曾炯的论文成果引起了世界数学家的高度重视。欧洲跨国性科学基金组织，亦称万国科学基金会，为表彰曾炯对世界数学的贡献，当时发给他奖金1万6千英镑。据说，曾炯在大会上，头戴博士帽，身穿博士服。导师E.诺特坐在台上，掌声四起。诺特讲话时十分欣慰地说：“我要对心爱的学生曾炯改正一个说法，中国的留学生最用功，学得最好！”曾炯诚恳地致谢：“非常感谢如慈母般敬爱的老师E.诺特先生，您是最好的老师！我将永远是您的学生！”

1934年8月，曾炯得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研究资助，到当时另一个抽象代数学研究中心德国汉堡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一年，著名数学家E.阿廷是他的合作导师。据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学算四十年》中记载，1934年的德国汉堡是中国数学人的圣地，除了曾炯，姜立夫（1890—1978）、程毓淮（1910—1995）、周炜良（1911—1995）等都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还说到曾炯为人直爽诚恳，每个人都喜欢他^[4]。

1935年4月，作为哥廷根的真传弟子，曾炯得悉E.诺特不幸蒙难病故他乡的消息后，失声痛哭，仰望天空，伤心自语：“恶人当道，好人遭难，呜呼哀哉！诺特千古。”借以表达对老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曾炯在汉堡完成学业后，由于所作出的杰出成就和刻苦勤勉的态度，哥廷根大学重金挽

留他留在哥廷根工作，但心怀祖国的他还是放弃了优越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在 1935 年 7 月回国，并用万国科学基金会的奖金购买了大量数学书籍带回国内，抗日战争期间将书籍转移到家乡的亲戚家中，但很可惜的是，日军入侵江西时，他的数学书籍和文稿全部被烧毁。

1935 年 8 月，回国后的曾炯经大学时代的老师陈建功推荐，被浙江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讲授抽象代数等代数课程。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和数学系主任苏步青（1902-2003）对他都很器重。1936 年，他用德文在《中国数学会学报》首卷发表在汉堡大学期间完成的论文“关于拟代数封闭域层次论（*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 abgeschlossenen Kommutativer Körper*）”。

曾炯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留德教师颇多的天津北洋大学多次派唐岐欧先生南下杭州，邀请曾炯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37 年暑假后，曾炯接受天津北洋大学的聘约，任教授。曾炯在中学教书时曾因追求科学探索而拒绝当地县长因其才貌欲招其为贤婿的美意，并为此离家逃婚。1937 年，曾炯还完成人生一件大事。他受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启示，终于开始向往婚姻，与南昌一位化学教师秦禾穗结为伉俪。

因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西迁至西安，联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日寇进攻潼关，西安危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又迁至汉中，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因多种因素，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各校分离，但仍在西北办学并依旧习惯上被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天津北洋大学部分迁至陕南城固龙头镇，改名国立西北工学院。从 1937 年 10 月底开始，曾炯携同妻子随校辗转各地，艰苦办学。

1939 年，受原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书田（1900—1988）的邀请，加入由一批沦陷区学者新创立的国立西康（旧省名，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技艺专科学校。该校以西昌郊区泸山一带绵延十余里的寺庙为校舍，在艰苦的环境下办学。曾炯作为首席著名教授讲授高等数学。该校于 1952 年院系调整时撤销。由于长年的奔波与医疗条件的恶劣，曾炯胃疾加重，1940 年 11 月因胃穿孔在西昌逝世，享年 43 岁，令人惋惜^[5]。

二、成果卓著，享誉世界

曾炯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现代数学开拓的时期，加入出国留学的热潮，投身世界代数学的研究中心哥廷根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顶尖数学家 E.诺特、E.阿廷等人，加上自己的天资过人和勤奋刻苦，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优秀成果，跻身世界著名数学家之列，被麦克莱恩列为对抽象代数学做出杰出成就的世界 11 位代数学家之一。

曾炯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要以数学为基础，为阶梯，为先导。”他先后用德文撰写发表三篇震惊世界数坛的著名论文，奠定了他在数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篇是 1933 年在《哥廷根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第二篇是 1934 年在《哥廷根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博士论文“代数函数域上的代数”；第三篇是 1936 年在《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一卷上发表的“关于拟代数封闭域层次论”。他在这三篇论文中创建了五个定理和一个层次，因成果的重要性和创新性被命名为曾定理、曾层次，是函数域上的代数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关于超越扩张的布饶尔群的主要研究基础，对 E.阿廷—施赖埃尔形式实域上的二次型理论有重要应用。既具有数学前沿的高层次性，又具有数学中的基本性，对数学运算提供了与之适合的定义和公理，是数学上高层次的理论和应用。下面我们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三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

1933 年，曾炯完成人生中第一篇重量级学术论文“论函数域上可除代数”，并于当年在《哥廷根大学学报》第一期的 335-339 页发表。这篇论文创造性地证明和提出了前代和当代数学界尚未发现的两大定理：

定理 1: “设 Ω 为代数封闭域, 则 $\Omega(x)$ 上所有的以 $\Omega(x)$ 为中心的可除代数只有 $\Omega(x)$ 自己”。

日本《岩波数学辞典》把这个定理称之为曾(炯之)定理。

曾炯还明确给出了关于拟代数封闭域的定理。这个概念是 E.阿廷最先引进并给出定义: 如系数在 K^n 中的任一 n 元 m 次齐次多项式 $f(x_1, x_2, x_n)$, 若 $1 \leq m < n$, 则必在 F^n 中有非全零解。E.阿廷首先注意到, 代数的理论可看成域中丢番图方程的解的理论, 即看到了在域 K 上可除代数的不存在性与一类方程具有 K 中多个未定元时的可解性之间的重要关系。曾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下面的重要定理:

定理 2: “设 F 为代数封闭域, K 为 $F(x)$ 的一个代数扩张, 则 K 为拟代数封闭域^[6]。”

1982 年, 皮尔斯 (R.S.Peirce) 在《结合代数》(Associative Algebras) 中的第 19 章“超越域上的可除代数”的第 4 节中把定理 2 作为重要结果进行了证明^[7]。这个定理是关于超越扩张的布饶尔群的主要研究基础, 对数学领域和科学技术作出主要贡献。

1933 年, 曾炯刚一完成第二篇创新性论文“代数函数域上的代数”, 《哥廷根 1933 科学通讯》就立即向世界预告了他的重要结果。这篇备受瞩目的论文发表于 1934 年《哥廷根大学学报》198 号的 1-19 页。文章中又证明了两大重要定理:

定理 3: 对于以有限域为系数域的单变量代数函数域上的正规单代数, 存在和海塞-布饶尔-诺特定理、海塞定理相当的定理成立。而且, 以代数闭域为系数域的单变量函数域 K 上的正规代数, 总是 K 上的全阵代数。

定理 4: “假如 Ω 为实封闭的域, 那么 $\Omega(x)$ 上所有的以 $\Omega(x)$ 为中心的可除代数除去 $\Omega(x)$ 自身外, 至多还有一个, 且其指数必为 2^[8]。”

由于曾炯对世界数学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哥廷根大学隆重授予曾炯博士学位, 并奖励他一万多英镑。

1936 年, 不顾哥廷根大学的重金挽留, 曾炯满怀报国的壮志回到国内任教。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 在上海《中国数学会学报》的 1936 年第一卷第 81-92 页, 发表了他在汉堡期间的成果“关于拟代数封闭域层次论”。他在这篇论文中,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定理, 并推广了拟代数封闭域 (即 C_1 域) 的概念, 引进 C_i 域的概念, 进而创建了层次论。

曾层次: 域 F 称为 C_i 域, 若对任意正整数 d 及任一系数在 F 中的 n 元 d 次的齐次多项式 $f(x_1, x_2, x_n)$, 当 $n > d^i (i \geq 0)$, 则 $f(x_1, x_2, x_n) = 0$ 必在 F^{d^i} 中有一个非全零解。

定理 5: 若 Ω 为代数封闭域, 则 $\Omega(x_1, x_2, x_n)$ 为一 C_i 域^[9]。

日本《岩波数学辞典》称定理 5 为又一个曾(炯之)定理。定理 5 同样是大多数关于超越扩张的布饶尔群的基础, 且对阿廷-施赖埃形式实域上的二次型理论有重要应用。

由于此文发表在国内, 又因当时国内外战争的原因, 所以除阿伯特 (A.A.Albert) 和雅格布森 (N.Jacobson) 等少数学者外, 长期不为国外同行所知, 埋没 16 年之久, 直到 1952 年, 兰 (S.Lang) 重新独立发现这个定理^[10], 并经其导师 E.阿廷的指导进行改进, 才在学术上广为应用, 在国际上大为传扬。于是世界数学界误认为这是兰定理。迟至 1972 年, 世界数学会才把该定理更名为曾-兰定理, 以正视听, 并把曾炯的层次论命名为曾层次。

上述曾定理对希尔伯特第 17 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1927 年, E.阿廷只是解决了希尔伯特第 17 问题的定性问题, 也就是说 E.阿廷的解答是一个存在性证明, 而希尔伯特第 17 问题本质是一个定量的问题。经过数学家们近四十年的探索, 才取得定量研究方面的突破, 其中最关键的部分用到了曾定理。德国数学家费斯特 (Pfister) 在一篇介绍希尔伯特第 17 问题的文章中, 对于问题的定量部分给出权威且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 E.阿廷之后, 曾炯 1936 年的工作是一步, 也许他本人也没有预见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曾炯的这些工作由于其基础性, 已被写入相关的教科书。杜林 (M.Deuring) 在其 1935 年出版的《代数学》的最后一节“函数域上的代数”中首次提到曾炯的工作^[11]。后来很多教科

书都提到这些工作,比如,塞尔(J.P.Serre,1926-)1964年出版的《伽罗瓦上同调群》,M.J.格林伯格1969年出版的《多变量型讲义》,雅格布森1980年出版的《基础代数》的第11章“形式实域”中多次提及曾一兰定理^[12],皮尔斯在1982年出版的《结合代数》中都有论述。洛伦茨(F.Lorenz)在其1990年出版的《代数学引论》中,列出“关于域上曾层次”的专章,不惜花费23页篇幅阐述曾炯的工作。

由此可见,曾炯的数学创造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张奠宙(1933-)在他1986年发表的论文“二十世纪的中国数学与世界数学的主流”中指出:“环顾中国三十年代的数学界,尽管成绩很大,但能进入代数、拓扑、泛涵分析三项主流的人很少。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曾炯。他的好几项工作被人称为曾定理,列入世界许多抽象代数教科书中。”《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的“代数学”条目结尾部分也集中介绍了他的工作及其意义^[13]。

虽然曾炯因英年早逝,报效国家的壮志未能全面施展,但是以上三篇论文足以奠定他中国抽象代数学鼻祖的地位。黄建华把这三篇用德文撰写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收进1993年出版的《著名数学家曾炯博士纪念文集》中。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著名数学家曾炯博士纪念文集》题词:“创新海外,为国争光。曾氏定理,举世流芳^[14]。”

三、甘于奉献,教书育人

曾炯不但在抽象代数学领域造诣颇深,而且具有高洁的思想品格,放弃哥廷根大学的热情挽留毅然回国,为了祖国科研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辞辛劳。虽然仅仅在回国任教短暂几年之后便英年早逝,但是他的足迹遍布东西南北,共有三期工作,先后分别在浙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任教,在十分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为学生传授新知,同时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尽情挥洒一腔赤子情怀。正如曾炯留学归来对别人所说的那样:“人生在世,对国家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我就是为了尽忠尽孝才回国的!”他行事低调,不张扬不铺张,谢绝家乡父老为他学成归来准备的轿和马,坚持步行回家探望亲人。

1. 浙江大学时期

1935年7月,曾炯怀有满腔赤诚学成回国,经大学时代的老师陈建功推荐,8月,被浙江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分析有陈建功,几何有苏步青,现代数学的三大分支代数、几何、分析中唯独缺乏代数的英才,于是曾炯的到来无疑补足了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不足。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和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对他都很器重。他主讲抽象代数和群论等代数课程,尽心尽力传授新知,培养出一些出色的学生。

他负责教授抽象代数和群论两门课,以哥廷根代数学派的传人,亦是E.诺特的学生,范德瓦尔登(B.L.Vanderwaerden,1903—1996)的《近世代数学》以及另一位代数学家A.Speiser的德文教科书作为讲义。曾炯为人豁达诚恳,教学严谨,思维敏捷,授课思路清晰,讲课生动有趣,为吸引学生,常将字母写得很大。他严格要求学生,讲解学术前沿,只有高材生才比较容易接受,普通学生则需要课外辅导才能明白。因讲课带有较重的乡音,而学生又不习惯看德文课本,他就将学生中能听懂德语的同乡熊全治的课堂笔记加以修改和补充,编成讲义,印发给全体学生。在这种严格治学的大师引导下,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比如当初编讲义而现任美国理海大学数学教授熊全治(1916-)就是其中一位。熊全治教授于1991年4月在美国伯利恒追念曾炯老师,写了一首七绝:

雪舫生米同一县,师徒结缘在杭州。
五旬年后犹追念,曾氏定理永不衰^[14]。

因曾炯晚婚未育,过继了一个堂侄做儿子。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堂侄就随他一起生活。他先是安排堂侄在印刷厂当两年徒工,然后才送他进师范读书。他认为做徒工比做学生艰苦,读师范比读普通中学艰苦,艰苦生活更能开启智慧,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他还认为“良相必起

于州郡,猛将必出于卒伍”,因此青少年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当母亲和弟弟来浙江大学看望他的时候。打鱼为生的弟弟认为没有像哥哥一样当教授是命里注定的。曾炯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为人好与坏、善与恶,都与命运无关,除受到相应客观条件限制外,还是主要靠自身的努力。”

2. 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

曾炯回国后的第二期工作是在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相较于第一期和第三期工作,这一期工作颇具周折,亲历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迁徙和发展,在民族安危时刻依旧克己奉公、传知授道。

他还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留德教师颇多的天津北洋大学就多次派唐岐欧南下杭州,邀请曾炯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37年暑假后,曾炯接受天津北洋大学的聘约,任教授。

因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很多高校被轰炸无法继续办学,因此天津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西迁至西安,联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10月底,曾炯也随着一起历经跋涉辗转到达西北。

在战争条件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遇到极大的困难,校舍和必要的教学设备难以解决。经多方努力,才暂时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全校分别安置在城隍庙后街四号,小南门外东北大学(即今西北大学校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个地方。历经两个多月的筹备,1937年11月1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开学,15日正式上课。11月6日,建校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部长王世杰(1891—1981)呈文: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应保持一成不变之经费,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为战时教育所寄,尤宜有创办建校之基金。为学校之永久计划,提出拟在城外杜公祠或未央宫附近建设新校舍。但由于战局危急,这项要求和计划成为空谈。教师需要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教师暂时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和北京饭店。因此,不少教师上课得步行一二十里路。学校校舍分散,狭小,教学设备和经费尤其困难,没有图书馆和体育场,完全处于战时流亡的教育状态。其中文理学院为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学院,院长由刘拓兼任。文理学院中的数学系主任由赵进义(1902—1972)兼任,曾炯和杨永芳(1908—1963)、刘亦珩(1904—1967)、傅种孙(1898—1962)、张德馨(1905—1992)等人担任教授。

日寇进攻潼关,西安危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又迁至汉中,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因多种因素,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各校分离,但仍在西北办学并依旧习惯上被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西北联大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亦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之一,迁至陕南城固龙头镇,改名国立西北工学院。曾炯随校迁移到国立西北工学院执教,为西北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时期

1939年春天,教育部部长陈立夫(1898—2001)提请行政院于1939年8月1日批准,在宁属中心西昌创办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简称康专),确定校址在西昌城东南15里的泸山东麓的光福寺、文武宫等七座古庙宇。1939年,原北洋校长、西工筹委会主任李书田奉命赴西昌主办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曾炯随往。曾炯携同其夫人同其他部分职工一起,立即从成都向西昌进发。那时成西无公路,他们征服海拔三四千公尺的大小凉山,穿行崎岖山路步行千多里,历经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到达汉族和彝族共居的当时还很荒凉的西昌。

时值抗日战争,康专的条件非常差,物价飞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校方还规定:“因公务进城,由学校开支乘轿费,其他诸如伙食等不得报销。每月供应教职人员信笺信封五套,火柴四小盒,个人如不敷使用,一律自理。”

曾炯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教书育人、同时也关心爱国运动和民族安危。他和在图书馆当馆员的夫人一起借居在泸山刘宝国生祠寺庙,点油灯废寝忘食认真写讲义,装订成册后发给学生,严谨教学。他用英文、德文教学,发给学生的是中文讲义。其间,曾炯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义愤,不顾个人安危,反对当局开除爱国学生,表现出非凡的爱国气概。

令人遗憾的是,连年的奔波劳苦,终于使他积劳成疾病倒。同事想把他送到卫生部西康区卫生院(俗称西昌城九皇宫医院)住院。但他拒绝住院,说:“前方在打仗,我不住院,我要上课!”经过协商与校方达成协议,一边住院,一边上课,有课时回校上课,上完课再返回医院。校长李书田(1900—1988)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不准他走路回校,专门批复了车马费。就这样,曾炯在住院期间仍坚持上课七个多月,直至逝世。真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殚心竭虑,死而后已。全校师生十分沉痛,李书田更显悲伤,亲自为他写悼词,周宗莲博士为他写事略,并报请教育部。行政院令:“下半旗”,“曾炯之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保存,以示来兹。”康专的文献中也这样记载:“著名数学家曾炯之因劳致疾而病逝于学校,埋骨于沪山。”“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从康专校友录上看,曾炯教授教过的学生中有46位是教授、研究员和高工^[15]。

江西人民为纪念他,决定将他年少时就读过的私塾,命名为“曾炯学校”。1993年,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专门为他在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纪念册《著名数学家曾炯博士纪念文集》,以弘扬他的精神,激励后学。

综上所述,曾炯虽然出身贫寒,却心怀远大的抱负,对于科学探索表现出大无畏的攀登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自强不息,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到世界数学研究中心哥廷根大学和汉堡大学跟随杰出代数学大师学习,并做出非凡成绩,曾定理、曾层次奠定了他在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爱国爱家,乐于奉献,不为国外优厚的条件所动,在国内时局动荡、环境非常恶劣的时候毅然回国,奔波劳苦都毫无怨言。先后在浙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康技术专科学校等校传授他的所学所知,终因劳累过度,再加上医疗条件的限制,憾然离世。我们在追忆和缅怀他的时候,充满惋惜又心存敬仰。

如果当初没有执意回国,留在数学家的摇篮哥廷根大学,他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种图景?如果国内能够给予这位天才数学家优越的科研教学环境,他又会做出什么惊世的成就?如果生命没有过早凋零,又会为国家多培育出多少栋梁之才?中国和世界抽象代数学的又会沿着怎样的轨迹运行?可是,再多的如果也仅仅是假设和推测。这样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心系国家和民族,学有所成、贡献卓著的伟大数学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施展自己的远大理想就猝然离去,无疑对中国和世界数学界都是极大的损失。

参考文献

- [1]姚远主编.西北联大史料与研究文献[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171.
- [2]邓明立,王淑红.格廷根代数学派的传人—范德瓦尔登[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7(4).
- [3]日本数学会编.岩波数学辞典[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 [4]陈省身.学算四十年.见:张洪光编.陈省身文选[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6-36.
- [5]吴文俊主编.世界著名数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1534-1537.
- [6]Ch.Tsen.Divisions algebrén Über Funktionenkörpern[J].Nachr.Ges.Wiss.Göttingen,1933:335-339.
- [7]R.S.Peirce.Associative Algebras[M].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2.
- [8]Ch.Tsen.Algebrén Über Funktionenkörpern[J].Diss.Göttingen,1934.
- [9]Ch.Tsen.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 abgeschlossenen Kommutativer Körper[J].Jour.Chinese Math.Soc..1936(1):81-92.
- [10]S.Lang.On Quasialgebra Closure[J].Ann. Math.,1952(55):373-390.
- [11]M.Deuring.Algebrén,Erg.der Math[M].Band4,New York:Springer-Verlag,1935.
- [12]N.Jacobson.Basic algebra,II,2nd ed[M].W.H.Freeman,1989.
- [13]段学复.《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代数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111-116.
- [14]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著名数学家曾炯博士纪念文集[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15]胡清林.震动世界数坛的曾炯博士[J].中国科技史料,1997,18(4):37 — 40.

The Chinese Successor of Göttingen Algebra School

——Zeng Jiong

WANG Shu-hong^{1,2}, YAO Yuan¹

(1.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The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 this paper tried to arrange and analysis the life, achievements and effects of Zeng Jiong (1897-1940). The results show: following E.Noether (1882-1935) in Göttingen and E.Artin (1898-1962) in Hamburg, Zeng Jiong mastered the advanced abstract algebra, and published three important papers including Zeng theorems and Zeng level. After coming back to China, he worked firstly in Zhejiang University, then in Tianjin Northern University-Xi'an National Temporary University-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Northwest National Engineering College, and lastly in Xikang National technical school. As the Chinese successor of Göttingen algebra school,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western algebra in China science education.

Key words: Zeng Jiong (1897-1940), Zeng theorems, Zeng level, Göttingen, abstract algebra

西北联大对张骞墓的发掘与维护

姚 远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通过文献调查与实地踏访, 对 1938 年国立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缘由、发掘过程、主要参与者、出土文物、增修项目以及对当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研究。结论认为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 确认了墓主身份, 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联大在汉中 8 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张骞; 汉博望侯张骞墓; 考古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 汉中城固; 国立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学术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仅在抗日战争期间, “学校对于教学研究尽力策划鼓励, 以谋学术空气之保持。当时……因地制宜, 注重西北地区资料, 进行研究工作”。“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疆等省史料, 成立考古室。三十四年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 拨归本校, 遂将原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1]。在汉中时期, 西北联大历史学会先后进行了勉县历史考察和考古调查、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察等。

1938 年 7 月 3 日至 9 月 2 日, 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由西安迁汉中城固不到半年(1938 年 3 月 16 日正式迁离西安)的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主持对汉博望侯张骞墓实施了发掘和增修。

2006 年 10 月 14 日, 西北大学姚远一行再次拜谒张骞墓, 并访寻国立西北联大在城固、勉县、南郑、留坝、洋县等地遗迹, 形成此文。

一、历史背景与发掘缘由

张骞(?—前 114)为今陕西城固人, 约生于汉文帝时期, 历任郎、大行, 受封为博望侯, 死后归葬故里(今城固县博望乡饶家营村)。他是中外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两次奉命出使西域, 联络了当时西域 53 国, 加强了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打通了横跨中亚、西亚的陆路交通, 成为古代历史上历程最长的国际性贸易通道。他先后 20 余年, 不远万里, 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养蚕、缫丝、冶铁、瓷器、造纸、农业技术传播到西域各国, 又将良马、骆驼及乐器、魔术乃至佛教文化带回中原, 对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做出前无古人的贡献, 故成为丝绸之路的凿空者, 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1938 年 5 月, 国立西北联大校常委许诵明、李蒸及许寿裳、黎锦熙等教授调查汉中著名古迹以后, 提出研究张骞、萧何、樊哙、李固墓, 以及勉县诸葛亮墓的民间刻石、褒城石门和汉中其他古代文化遗迹的计划书^[2]。

其中为“表彰我历史上之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骞起见”^[3], 对张骞墓的发掘和增修, 是为最重要的计划之一。吴世昌指出: “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近在咫尺, 足式仰止, 而东侧土层扰动, 墓道凌乱, 陵前石兽, 长埋榛莽。若不加以修理, 妥为保护, 行见先贤名迹, 日就陵夷”^[4]。为此, 商准各级政府, 会同张骞后裔, 开始发掘和增修工程。

鸠工后, 陈士骥, 周国亭发表发掘报告。次年由西北联大在墓前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

公墓碑记”。1939年4月6日，西北联大全校师生员工1400余人，为纪念“民族扫墓节”，提倡民族精神，整队赴汉博望侯张骞墓，举行祭扫活动。

1939年8月13日至14日，学校考古室举办了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先后有时在学校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教授、学校常委李蒸、徐诵明、胡庶华教授、学校秘书主任黎锦熙教授，以及师生数百人参观。

1942年，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国立西北大学视察并作《标准草书》的学术报告后，也到张骞墓考察。

二、参与发掘和研究者

主持此次发掘的为西北联大历史系两位教师，以及张循祖、杨貽等20余位学生。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黄文弼等历史系教授亦为主要参与者和研究者。县政府保安队陈思礼、联保主任朱秀峰（代表严维馨）、保长饶胜五、甲长饶文明等13名人工协助。

墓道文物出土后，李季谷、何乐夫、周节常、刘廷芳等先生及学生阎应清等分类编号和展出。

其主要参与者（可考者）学术背景^[5,6]如下：

何士骥，字乐天，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他毕生从事历史教学与考古，曾任甘肃兰州玉泉山博物馆馆长。与西北大学考古学系刘士莪教授多有往来。晚年退休后住汉中邮电局其女儿处。1985年夏在汉中逝世。

周国亭，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和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约在1947年离开学校。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1927年至1932年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和上海博物馆特约研究员。1937年至1939年，先后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讲师。1939年后离校，相继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62年自牛津、剑桥回国后，相继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著有《诗经语词研究》、《红楼梦探源》等多部。他撰写《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生前藏有碑记原文手稿，将之精裱成卷轴，曾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曹述敬先生展示，并不胜怀念地指出某处为许寿裳先生修改，某处为黎锦熙先生修改^[7]。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浙江绍兴人。1902年赴日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与鲁迅合办《新生》杂志，主编《浙江潮》。1909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长、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授、国立西北联大史学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等。1940年离陕入滇，相继任中山大学教授、华西大学讲座教授。1946年后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等。1948年2月18日在台湾寓所被杀害。著有《章炳麟传》《鲁迅年谱》等。他为鲁迅密友。发掘张骞墓时为历史系主任，主要讲授文学等课程。

陆懋德（1885—？）别号泳沂，山东历城人。曾留学美国，并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与俄亥俄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37年起，历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他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考古学、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在汉中时期，所著《中国上古史》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所著《史学方法大纲》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二等奖。

许重远（1896—？），河北饶阳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英美留学历史学等，回国后历任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1937年起，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授、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教授、国立西北大学教务主任、历史系教授、

系主任等。他主要讲授西洋近古史、西洋近世史等课程。著有《世界近百年史》等。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湖北汉川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员、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驻西安碑林委员、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1937年10月至1947年先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边政学系教授、主任等。1949年后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西北大学期间，受命数次考察西北文物，行程38000公里，有很多重要发现，号称西北考古第一人。著有《高昌集》等多种。

三、墓冢发掘与增修

（一）墓冢基本情况

张骞墓位于城固县城西北约3公里的博望镇饶家营村。《史记·卫青列传》载“将军张骞，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张骞……墓在城固县西二十三里，有碑，文字磨灭，不可辨”；《南史·齐宗室传》载“梁州（今汉中）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明嘉靖《城固县志·地理志》载“石虎，西八里，地有二石，形如卧虎，列于张骞墓前”。西北大学台湾校友史志超回忆：“张骞墓在（汉中）城东数十里城固境内，土丘旁矮房两间，门外挂大鞋一双，长二尺余，不言可知，博望侯足大健行，能走万里通西域也”^[8]。

今张骞墓占地面积1.05亩（约70m²），坐北朝南，为一覆斗形土冢，南北长35.6m，东西宽20m，高5m。墓前有3通石碑，正中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汉博望侯张公骞墓”，右侧为题刻“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左侧为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纪事碑。在墓前南之左右两侧建翹亭安置西北联大清理出的两尊汉雕石虎。

在西北联大发掘之前，张骞墓至少有两次被掘。《南史·齐宗室传》有：“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推。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清袁枚《子不语》有：“盗入张骞墓，见残漆棺”。

（二）西北联大的发掘与增修

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的发掘分为两次：第一次，1938年7月3日（冯岁平校友将8月24日至9月2日的墓道增修误为开工日）^[9]，开始发掘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石刻；第二次，1938年8月24日至9月2日，发掘张骞墓冢，已发掘到墓冢东侧墓道东耳室，但尚未进入墓室，由于此举激怒张氏后裔，致聚千人寻衅，遂中止发掘，改为墓道增修。

这次发掘清理出的文物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墓前石刻；第二部分是墓道。

第一部分对深陷水田下的东、西相对两石虎作了挖掘清理，仅用一日即完工，破除了过去所称该石虎“愈掘则入地愈深”、“水涨石高，永远能保持其露而数寸之状态”的神化说法。石虎“蹲伏在地，头毁，足残，尾缺。表面多剥蚀，未见花纹与刻字。两兽腹下亦加详查，东面者曾经翻动，西面者未动，惟每兽肋骨左右各七，隐然可见。颜色青黑，制作古朴，状极生动，于考古学上、艺术上，确为极有价值之作品”^[10]。东、西两发掘坑的地层“大致相同，各可分为地面土（或名耕种土，最上层）、青灰色土（次层）、褐色土（微黄，最下层）”，“因久经水湿及扰动之故，层次虽有，似非原有状态”^[10]。东坑出土有：碎砖14块，内仅1块隐约有绳纹；瓦片10片，均无纹；陶片仅1片，灰色无纹；另有瓷片、新缸瓷片等。“所出砖瓦、陶片，十之七八，均为磨光而无锋棱，为上下翻动过多之证，决非器物埋藏地下所有之原状也”^[10]。西坑出土有：碎砖15块，仅1块为绳纹；碎瓦24片，除略见工作纹外，均素无纹；陶片素而红色者2小片，素而灰色者2小片。

第二部分对墓道的发掘，出土有：破残马骨、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有两耳）、砖（墓门及全部墓道之建筑，均系汉砖）、瓦片及五铢钱，由此足证为西汉墓；最重要的有似印泥者一方（亦似封泥），篆书“博望口（或造）铭”四字，“当可为此墓系博望侯墓之一证，且与《史》、《汉》所载张骞故里亦合”^[3]。吴世昌亦认为：“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

汉钱之属，既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4]。

此后，“遂为鸠工培土，重加封植”^[4]。

据汉中博物馆馆长冯岁平校友以后见到的文物手抄目录有 14 页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士莪教授在西北大学文物陈列室（现称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见到汉砖、封泥等 3 件张骞墓文物，后被征调到北京参展未归还，西北大学现仅留复制件。2012 年，城固张骞博物馆证实原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三）增修碑记与文献

西北大学留下许多有关张骞墓的文献^[11,12]，主要有：何士骥，周国亭的《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西北联大历史系的《博望侯墓道古物校内展览记》；王汝弼教授的《谒博望侯墓放歌》（长篇古诗稿，发表在《说文月刊》第四卷）；黄文弼教授发表有《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吴世昌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现立于张骞墓左侧，已用玻璃罩之，有数处字迹磨灭，已难辨认，故特附记于此。其碑阴刻有许寿裳教授篆意楷书，黎锦熙教授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所撰的《汉书·张骞传》。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吴世昌谨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书丹

旷观我国史乘所记，以一介行人，而能跋涉万里，扬威域外，重致九译，荒服蛮夷者，得二人焉，曰博望张侯、定远班侯。然班氏藉汉明之余萌，乘西域之黑弱，运以权谲，事乃克己。未若博望，犯方张之虏焰，假危道以远袭，凿空之功，震烁古今。尝试次其勋绩，约有数端：匈奴肆虐，远稽姬、秦，山戎、狻猊，并其异称。豷父之走岐下，幽王之死骊山，惩前毖后，创痛巨深。是以诗经口歌，戎狄是膺。季子获丑，虢盘焉铭。爰及末叶，凶焰益煽。史称冠带七国，边胡者三，于是赵王高阙为塞，秦、燕限以长城。洎乎楚汉之际，中原鼎沸，塞外群胡，益增猖披。以高帝之雄略，犹不获逞志于冒顿，致有平城之厄、白登之围。下逮吕后、文、景，侵扰犹繁，驯至遣书漫骂，杀戮疆吏，匈奴之加我黄帝子孙以巨耻大辱者，久且烈矣。孝武痛祖宗之积耻，愤华胄之见凌，于是倡议灭胡，发使西征。侯持汉节，跼蹐于风沙冰雪之乡，委顿于腥膻膻毳之群，再使西域，数困虏廷。廿载去国，万里经行。偕往百士，归仅而人。卒使威德遍于四海，赋贡致乎汉廷，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也。侯既遍朔漠，识其地理水草，卫青击胡，资为向导，用能建不世之奇功，恐列祖之皇造，汉业既隆，边患斯少。尔后贰师之破大宛，定远之服鄯善，莫不躐其芳躅，迹其故道。凡所躬历，当今甘肃新疆、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之地。副使间出，历国十余，跨世界之屋梁，通中西之文化，探黄河之真源，来异物于西亚。役属妫水之邦，创通西南诸夷，即今邛属黔滇诸地；苗蛮归化，蚕丛毕启，揆厥元功，亦莫非侯所创议，后之人君，遂得拓疆数万方里，奠我中华数千年来之伟大国基，我今日之能御侮图强，货殖恣所取给者，胥有赖焉，而乡曲鄙儒，溺于清静无为之说，安于疲软苟且之习，乃以汉武之庸武于戎工，引为后人主之大戒，何其陋也！昔杨子云：论前朝之事，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啄，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为不悔也，借如武帝狃于故习，博望阻于（蹶）步，则吾汉族之凌夷，宁待石勒、刘豫、契丹、女真乎？比年倭寇河朔，流毒海陬，国黉播迁，西暨汉中。南郑屏山襟川，炎汉以兴，灵秀所钟，实生人杰，博望之故里、陵墓，胥在城固。廿七年春，吾校历史系同人以侯墓近在咫尺，足式仰止，而东侧土层扰动，墓道凌乱，陵前石兽，长埋榛莽。若不加以修理，妥为保护，行见先贤名迹，日就陵夷。因即商准各级政府，会同张公后裔，将墓侧原有缺口，稍加清除。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既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以为张公原墓无疑。遂为鸠工培土，重加封植。蒸、诵明、庶华等，念斯文之在兹，惧典型之或失，用敢撮述其事，口口（原字模糊无法辨认）先哲，予以赞翼教化，昭明口德，策励来兹，永垂不

朽。庶几口往来，韶华夏之洪泽；立懦振颓，完复兴之大业也。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李蒸、徐诵明、胡庶华谨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吉日，田鸿玉刻石立

四、发掘意义与结论

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联大及其后继学校在汉中 8 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这次发掘：一是出土了汉砖、汉五铢钱、“博望”封泥等文物，确证为西汉张骞原墓，为研究我国第一个外交家、探险家和忠于汉民族、勇敢实践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伟大历史人物张骞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提起当地政府、张骞后裔对丝路凿空者张骞的注意，提高了文物保护意识，成为 1956 年将其列为陕西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今天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基础；三是通过调查、发掘、增修、展览、参观、研究、祭扫等活动，进行了生动的抗战教育，激发了师生和民众的爱国抗日热情，也成为后世振兴民族精神、进行对外开放教育的基地。

陈东原教授强调教育价值与历史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今天走到城固西郊拜谒汉博望侯张骞墓那里几片残砖、一座孤坟，在普通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价值，有历史观念的人，便可以想到 2000 年前的这位大外交家，躯体虽残而精神犹存。若再想到他如果活到今天岂不是又为国事奔走吗？”“总之，我们不仅要寻求知识和训练智慧，并且对于目前的事物要有历史眼光的观察，如此可珍重现在，努力将来，切切实实地努力我们的事业，所以不论学什么学科的人都应知道教育的价值和历史的修养”^[13]。

赖琏校长更将张骞作为战时西北大学所处地域文化的代表，并主张将发扬光大历史文化和创建新文化作为西北大学的办学宗旨之一。他指出：“西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复为博望侯张骞的故里。此时此地，我们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人人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14]。”

西大师生在对汉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的确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孙宝琛学长认为：“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学子们在播迁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地理环境和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攀登秦岭，不畏跋涉之苦。在城固初期教授及学生的生活是何等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而且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15]。

参考文献：

- [1]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 30 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10-12.
- [2]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委员会.张骞墓古物探寻计划书[J].西北联大校刊，1938，（1）：32.
- [3]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博望侯墓道古物校内展览记[J].西北联大校刊，1939，（18）
- [4] 吴世昌.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城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05
- [5] 姚远.西北大学学人谱[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146-149
- [6] 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60-63.
- [7] 曹述敬.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师生对张骞墓的发掘[M]//杨长明编.张骞学术研讨论文集.城固：陕西省城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第 04021 号），1988-9-10).
- [8] 史志超.医学院琐忆[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 30 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21-23.
- [9] 冯岁平.汉中小江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10] 何士骥, 周国亭. 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32-37.
- [11] 姚远, 柏一林, 徐怀东.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
- [12] 姚远. 《西北大学学报》的赓续和演变[J].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3 (6)
- [13] 陈东原. 教育价值与历史修养[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7-02-01)
- [14] 赖琏. 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M]//杨德生, 崔智林, 姚远. 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44-45.
- [15] 孙宝琛. 西北与中华文化[M]//尹雪曼.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 30 周年纪念刊. 台北: 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27-28.)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6 (1): 10-14, 收入本文集时有修订)

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经济与商学系

卫 玲, 柴 莉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运用文献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 对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及学生组成、图书资源以及学术研究活动进行梳理, 对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做一个整体的概貌总结, 以期增加关于西北联大的文献研究史料, 认为西北联大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教学研究立足于西北地区, 并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 对于当时战后我国经济重建和西北地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北联大; 经济学系; 商学系; 西北地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华北地区相继失陷, 这些地区的高校纷纷内迁以此来继续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同年9月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为了躲避战乱, 西安临时大学于1938年3月迁往陕南汉中, 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其农学院、工学院于同年8月份相继独立, 与其它学院分别合并组成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 1939年8月,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它院系陆续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44年,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甘肃兰州, 其余两所院校都是在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 1946年11月份, 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迁回平津校区, 而北平大学不复存在, 原西北联合大学时期的大部分骨干教师都继续留在西北地区从事高等教育事业,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服务于西部地区各行各业的人才。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 该院设在城固县城小西关外, 距离学校本部较远, 故设有各处组室分办公处, 采取联合办公的方式^[1]。西安临大时期的法商学院包括三个系: 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和商学系。1939年9月迁移到城固之后的西北联大将政经系分为两个独立的系: 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 此时的法商学院由四个系组成。

一、西北联大经济系和商学系的课程设置

1. 城固时期的经济系课程设置 (1938-05—1946-11)

在课程设置方面, 根据1944年9月修正的《西北大学学则》规定: “全校课程分当然必修科、公共必修科、分系必修科及分系选修科4种。当然必修科包括: 党义、体育和军训, 不计入学分。在公共必修科方面, 文学院、法商学院计52—56学分; 理学院计46—54学分; 商学系计48—56学分。分系必修课及选修课的学分数都是依据课程标准的規定来具体操作^[2]”。

除商学系没有共同标准外, 法律、政治、经济各学系共同必修科目包括: 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后两门课任选一门), 共34-36学分; 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法概要, 在这四门任选两门课, 共12分;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六门课任选一门, 6-8学分。

经济学系设置的必修和选修专业课包括: 会计学、货币银行学、战时财政、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思想史、银行会计、高级会计学、地方财政、官厅会计及审计、银行学、经济政策、财政法规及毕业论文等。

2.城固时期的商学系课程设置（1938-05——1946-11）

商学系专业课设置包括有：统计学、成本会计、市场学、会计学、商业史、统计实习、俄文会话、俄文讲读、俄文作业、俄文翻译、俄文语法、俄文报章选读及毕业论文等。与经济学系等其他专业所修的共同必修科目相较而言，商学系的共同必修课增加了商业史、财政学、会计学、经济地理等课程，除去了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等。

从当时的课程设置方面来看，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课程安排不仅重视专业基础学科的训练，而且也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保证专业基本理论的扎实掌握的同时，更加注重理论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时西北联合大学每个院系都将毕业论文列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必修课，主要针对四年级学生，围绕课程内容结合指导老师的研究方向，学生选出合适的论文选题，这点对于当今毕业生的论文写作都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而当时的商学系以俄文为主要课程，继承的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原因是北平大学商学系是由前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后改为商学院）发展而来的，名为商学系，实则可以称为俄文系，而后 1940 年教育当局令商学系取消俄文课程，以英文为第一外语，从此时开始成为了真正的商学系。

二、经济系与商学系师资及学生组成

1.师资组成概况

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教师大多来自北平大学，他们都是随着学校迁徙到西安临大执教，其时西安临大聚集了大批著名的学者，如侯外庐、李达、沈志远、章友江等担任教授一职或经常来校讲学，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更为老师之间相互交流学术创造了便利条件，进一步增强了教学效果。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多年来为经济人才严重匮乏的西北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专门经济型人才。

西安临大时期，联大常务委员会徐诵明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政经系由尹文敬担任教授兼任，教授包括章友江、吴正华、李绍鹏（兼）、沈志远、副教授季陶达等人，商学系主任由寸树声教授担任，教授有李绍鹏等人^[3]；城固时期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的教授数量有所增加，全院教师人数一般有 35 人左右，经济学系先后由尹文敬、曹国卿担任系主任并兼任教授，担任过教授的先后包括：季陶达、罗仲言（章龙）、孙茂柏、林穆光、张延凤、孙珍田、张师亮、叶瑛桐、王文光、武梦佐、许炳汉、刘君煌等。全系教授大约为 7—8 人（见表-1）；同时期商学系主任则先后由沈筱宋（代理）、李安、孙宗钰教授兼任，而商学系教授（含副教授）包括：赵树勋、徐褐夫、刘溥仁、林穆光、胡道远、于鸣冬、杨宗培、郭文鹤、刘君煌、盛礼约、安藩之、邵尚文和刑宗江等人，全系教师约 7-9 人^[4]。

在课程讲授方面，有些教授革新了课程内容，将自己讲授的内容与抗日救国相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开展抗战救亡运动。比如沈志远教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门课，在讲到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时，他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而提出抗日救国是全体人民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还有彭迪先教授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季陶达教授讲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等课程，都不是照本宣读式的授课方式，而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相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些课程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当年一大批学生认清了社会现实，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表 1 西北联大时期经济商学系教师名录

教授姓名	出生年份	籍贯	在校时间	毕业学校	讲授课程	论著
沈志远	1902	浙江 萧山	1937-1939	莫斯科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经济学大纲》、《社会发展史的一些问题》（与侯外庐合著）等

马凌甫	1886	陕西 合阳	1944-1945	日本明治大学	经济学、宪法 等	《国民经济学原理》、 《工业政策》
罗仲言	1896	湖南 浏阳	1938-1947	北京大学、赴德 国柏林大学从事 研究	中国经济史	《中国国民经济史》、 《中国职工运动状况》 等
孙宗钰	1896	山东 济南	1937-1948	美国芝加哥大学 商学院	统计学	《统计学》
尹文敬	1902	四川 乐山	1938-1946	北平大学、法国 巴黎大学	财政学、财政 法规	《中国财政制度》、《财 政学》等
曹国卿	1902	辽宁 铁岭	1937-1946	北京大学、德国 莱比锡大学	财政学、财政 法规	《中国财政问题与立 法》、《财政与信用》等
季陶达	1904	浙江 义乌	1937-1946	苏联东方大学、 中山大学	货币银行、经 济思想史、经 济学说史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经济思想史》(译 著)等
彭迪先	1908	四川 眉山	1939-1940	日本庆应大学、 九州帝国大学	经济政策、 经济思想史	《战时的日本经济》、 《世界经济史纲》、《现 代经济学论》(译著) 等
刘君煌	1911	湖南 辰溪	1945-1946	武汉大学、南开 大学	农业经济	《西辅大队的经济发 展》
徐褙夫	1903	江西 修水	1938-1951	莫斯科东方大学	俄文会话、俄 文讲读、俄文 作业、俄文翻 译、俄文文法 等	《日德意集团》、 《苏联哲学》等

2. 学生概况

西安临大时期，学校曾两次面向社会招考新生入学，录取人数合计为 310 名，其时还未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系正式录取 24 名学生，备取 5 名学生；商学系共录取 2 名学生，商学系先修班（即后面提及的商业补习班）共录取学生 15 名^[5]。从 1937 年 12 月 27 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刊登的“本校学生人数统计”来看，政经系和商学系（不包括商学系先修班）总共有 177 名学生，占法商学院总人数的 63%，其中政经系有 147 人：一年级学生 57 人（不含借读生），二年级学生 33 人（内含借读生 10 人），三年级学生 36 人（内含借读生 4 人），四年级 21 人（内含借读生 1 人）；商学系的学生有 30 人：一年级学生 12 人，二年级学生 5 人，三年级 11 人，四年级学生 2 人^[6]。

相较而言，最初迁移到城固时期的西北联大在校学生类别更为复杂，不仅包括正式录取的学生，还有转试生、旁听生和借读生。根据 1938 年 1 月 15 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登载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上半学期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7]”来看，政经系和商学系的学生共计 231 人，从学生类别来看，其中政经系具体人数：一年级学生 50 人（正式生 30 人，转试生 1 人，借读生 1 人，旁听生 18 人），二年级学生 52 人（正式生 38 人，转试生 7 人，借读生 7 人），三年级学生 44 人（正式生 15 人，转试生 18 人，借读生 11 人），四年级学生 38 人（正式生 31 人，借读生 7 人）；商学系具体人数：一年级学生 33 人（正式生 25 人，旁听生 8 人），二年级学生 8 人（正式生 7 人，旁听生 1 人），三年级学生 5 人（正式生 3 人，旁听生 2 人），四年级学生共 7 人。从学生年龄方面来看，在校学生年龄主要以 22 岁

~26岁为主，两个系人数总和达到170人，占学生总数约74%。而学生年龄相差最大为11岁，最小年龄为19岁，最大年龄为31岁。

当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国民政府需要雇佣一批经济业务人员，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学生相对容易就业，因此城固时期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学生人数（见表-2）居全校三学院的首位，约占全校一半以上。法商学院学生总共有500至600人左右，1944年为577人，1945年为561人。经济学系学生人数为200左右，（1944年为208人，1945年为188人）居法商学院学生人数的首位；商学系学生有110人左右。

表2 国立西北大学时期法商学院历届毕业生人数统计表（1938-1946）

系别 毕业时间	经济学系	商学系	法律学系	政治学系	总计
1938					37
1939					39
1940	18	5	25	20	68
1941	33	9	32	12	86
1942	39	33	15	30	117
1943	66	36	11	30	143
1944	81	40	36	29	186
1945	54	15	23	27	119
1946	57	46	39	30	172
合计	348	184	181	178	891

备注: 1938、1939年各系具体毕业人数不甚清楚。

三、图书资源

西安临大虽然仅存在不到半年时间，但是在图书资源方面的供应相对充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战时教师和学生的教学需求和阅读需求。法商学院大部分教师为了配合战时教育的需要，设法寻找和参考各种前沿教材书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这点从当时图书馆所购买的书籍则可以窥见一斑。据笔者对《西安临大校刊》每期最后所附的“本校图书馆新购中文图书”（见表-3）进行了统计，当时经济商务类中文书籍达292本书，总藏中文图书为960本书，占到30.4%的比例，足以见得当时学校对经济商业专业的重视程度。

在城固时期的法商学院距离学校本部远，自身设有图书馆及阅览室，有中文图书二千六百四十六（2646）册，西文图书二百六十七（267）册，报纸7种，杂志近40种。

表3 1937-1938年西安临大图书馆馆藏经济商务类书籍不完全统计表

作者姓名	书名	册数
陈其鹿	高商银行学	1
张先德	银行信用论	1
马寅初	中华银行论	1
顾准	银行会计教科书	1
王效文	高商货币论	1
蔡受百	中国货币论	1

周仰汶	国内汇兑及押汇业务	1
沈家楨	银行簿记实践	2
实业部	中国银价物价问题	1
陈石孚	经济史观	1
郑斌	世界各国新经济政策	1
许炳汉	财政学新论	1
贾士毅	民国财政史	7
傅子东	近代资本主义进化论	1
陶孟和 汤象龙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
朱谦之	历史学派经济学	1
何士芳	英汉经济辞典	1
实业部	中国经济年鉴	3
徐文波	世界经济发展史	1
王世颖	农村经济及合作	1
王承志	中国金融资本论	1
章植	土地经济学	1
杨华日	苏联经济论	1
王正旺	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	1
李剑农	政治学概论	1
陈善林	统计制学	1
王仲武	统计学原理及应用	1
潘序伦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	1

四、 学术研究活动

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来看,因为这一特殊时期受战时影响,总体来说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相较而言,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成果较为丰硕。当时的教师除了编写相关课程的教材书之外,同时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业科学论文。比如经济学系尹文敬教授在1939年3月的《时事新报》发表的《改良制与调整地方财政》,还有曹国卿教授在西北联大创办于1943年的学术期刊《西北学术》第2期发表《评我国现行所得税制》等论文都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除了发表过一些有分量的论文之外,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教授与其他系科同时也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论著。这主要包括:已著有《物权法论》(1933年出版)的刘鸿渐又新著《中华民国物权法论》(20万字)、《中华民国债法总论》(30万字),《中华民国债法各论》;商学系主任孙宗钰的《统计学》(80万字),还在报章杂志发表了百万言的文章;许兴凯的《日本政治经济之研究》(10余万字);已著有《国际贸易理论之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北平佩文斋出版)、《现代经济思潮》(东北经济研究社出版),《德国经济概况》(东方公论社出版)的经济系主任曹国卿又新著《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10余万字);尹文敬教授著有《中国财政制度》、《国家财政学》;于鸣东新译著有河白嗣郎原著的《农业经济学》;曹国卿教授著有《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财政学》等著作,而《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一书则是他在西北联大任职之时撰写出版的;王锐铭的《华北农村问题实际考察》、《四存农村建设实验区工作介绍》;经济学系教授罗章龙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经济史学原理》、《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原理》、《国民经济政策》、《劳动经济》、《中国经济年表》、《战争经济》、《经济原理讲义》等著作。其中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一书则被当时教

育部列为大学丛书，曾获得教育部举办的第五届（三十四年度）学术审议会三等奖，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出版发行，总共分为上、下两册。这本著作中自序部分阐述了罗章龙写本书的动因：“吾人当前之经济制度，盖由于过去累代经济制度有秩序的演化而成，故论究民族经济盛衰与国运隆替者必于国民经济史观之”。（《中国国民经济史》一书从年份来讲，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至明清时代，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变动做了全景式的概述；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农业、冶金业、交通、商业、渔业、工艺业、人口赋税等部门经济，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史。该著作得到了当时出版界及经济学、史学方面专家的高度评价，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主办之图书季刊介绍本书时，评为：“全书评叙条理明畅，要言不繁，取材亦赡富，允为近年出版中国经济史中之佳构”；华西大学秦佩珩教授这样评价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本书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体系，尤其是说明中西经济史发展的关系，这层关系是一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所忽略的^[8]”。

除了经济学系和商学系教授的学术研究之外，各个系均有系会组织机构，学生经常在老师的指导下作学术专题研究，并且按期出壁报，而学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则大多体现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并且与教授们所研究的领域和方向大体相一致，从1945年的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学生毕业论文题目来看（见表4），大部分学生选取的研究问题紧紧围绕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来逐步展开，比如：《币值之跌落及其对策》、《西北经济建设初步商榷》、《现行所得税改进论》、《我国战后工业建设论》等论题都是对当时我国经济各方面的现状做出自己的思考并提出对策。除此之外，西北联大的经济学系与商学系的部分师生与陇海铁路局合作组织西北经济考察团，对西北工业、矿产、水利、畜牧、农业、金融、物价、商业、劳动、边疆经济等进行广泛调查，并编制了西北输出货物指数、物价指数、工人生活指数，出版经济学丛书等，成为民国西北大开发的重要文献^[9]。

表4 第七届学生毕业论文题目（1945年）^[10]
经济系毕业论文题目

1、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之划分	2、战费论
3、工业建设与土地问题	4、王安石经济政策之研究
5、战线工业建设之区位问题	6、西北经济建设
7、战后中国经济建设	8、币值之跌落及其对策
9、我国的营业税	10、我国战时物价问题之研究
11、我国土地税之研究	12、我国之土地问题
13、秦汉经济史	14、桑弘羊王安石对汉宋历代经济影响
15、货币机能与物价	16、战后我国土地税复员研究
17、民族资本与工业建设	18、战线中国工业建设之面面观
19、战后复员与经济建设	20、财务行政论
21、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论	22、遗产税论
23、抗战以来甘肃省的经济状况	24、成本与物价
25、战后我国经济建设	26、西北经济建设初步商榷
27、民生主义租税政策	28、管子的经济思想
29、战后物价统制研究	30、现行所得税改进论
31、货币（论）	32、中国经济建设之途径
33、我国农业金融之研究	34、日本国民经济
35、论我国工业建设利用外资政策	

商学系毕业论文题目

- | | |
|------------------|--------------------|
| 1、企业组织的设计 | 2、论陕西省各银行之组织及其特殊服务 |
| 3、企业经营论 | 4、我国工业建设论 |
| 5、我国专门学业不应取消 | 6、近代企业中的人事管理 |
| 7、我国战后工业建设论 | 8、我国超然主计制度的研究 |
| 9、陕西工业建设之研讨 | 10、各银行之设立 |
| 11、论国际货币会 | 12、甘肃外销商品 |
| 13、夏威夷群岛之中国为夫（译） | |

五、结论

抗战时期，在西北联大经济学系和商学系的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两个系构建了当时西北地区较为完整的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西北联大在数年的创办时间里，经济学和商学课程体系逐渐开始完善，形成了会计学、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国经济史、统计学、市场学、俄文翻译、俄文文法多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学科；西北联大经济学系和商学系师资力量很雄厚，大多都有留学经历，经过专门的经济商学学科学习和研究，教授包括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章龙，去前苏联留学的沈志远、季陶达、徐褐夫等，去日本留学的马凌甫、彭迪先等，也包括去欧洲、美国留学的孙宗钰、曹国卿、尹文敬等人，他们在西北联大期间钻研科研和严谨治学，关心学科专业建设和图书资源的购置，培养了一大批的经济型人才，为西北地区经济商学系的发展以及构建相对完整的经济学和商学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北联大经济学系和商学系教授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史和宏观经济研究，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大多是围绕战时及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包括工业建设，土地问题、财税，以及西北诸省的工业建设、金融、对外贸易等经济建设问题，这与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现实是紧密契合的。这充分体现了西北联大扎根西北，教学研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宗旨，这对于战时经济理论研究的延续与发展、战后我国经济重建和西北地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各学院之现在与将来》[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年11月12日，第17期，第7页.
- [2]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35页.
- [3]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31页.
- [4]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37页.
- [5] 编者.本校录取新生名单[J].《西安临大校刊》.1937年3月，第8页.
- [6] 编者.本校录取新生名单[J].《西安临大校刊》.1937年2月，第9页.
- [7] 编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上半学期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学生年龄统计表[J].《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9月，第17-19页.
- [8] 校闻.《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J]，第26期，第7-8页.
- [9]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子体分合的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42(3)，第5期.第11-24页.
- [10] 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215页.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历史学系

崔 幸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本文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变迁、教师、教学、学生、学术活动, 认为历史学系作为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抗战教育、人才培养、边疆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西北联大 历史学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对华侵略进一步扩大, 平津相继沦陷。在此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 为延续中国高等教育, 传承民族文化, 挽救民族危机, 平津诸多高校内迁成立临时大学。其中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迁往西安, 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 日军炮火逼近黄河风陵渡, 在此紧急危难背景下, 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 后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与西南联合大学遥相呼应, 为抗战时期我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1939年8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改校名为国立西北大学。1940年, 教育部明令西安为西北大学永久校址。至抗战胜利后, 学校于1946年迁回西安。

一、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变迁

西安临时大学历史学系, 隶属于文理学院。西安临时大学之基于由平津极有历史的三院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北平大学迁陕后, 其女子文理学院改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文理学院, 而历史学系由原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之文史系而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由1925年解散之女子师大改设的国立女子大学发展而来^[1]。

1938年, 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 根据《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院系仍旧^{[2]P216}。1939年8月8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其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 原文理学院一分为二为文、理两学院, 历史学系属文学院, 并无较大变动。因此,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有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之历史学系一脉相传的历史。

二、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学人群体

随着北京高校内迁, 历史学系云集了众多著名学者, 形成了强大的师资阵容。这一时期历史学系的学人有: 许寿裳、李季谷、许重远、陆懋德、黄文弼、萧一山、许兴凯、何士骥、周国亭、谢兆熊、王子云、周传儒、蓝文征、杨向奎、杨兆钧、丁山、杨人梗、杜光坝、陈恭禄、辜勉、易忠策、杨宙康、陶元珍、张云波、涂序瑄、林冠一、冉昭德等。他们中多数人有着深厚的留学背景、师从当时国内外著名教授学者、对中西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独到切身的体验、对我国现实政治充满忧患意识及对民族独立、学术救国热切期盼。在抗战期间, 他们从事教学、科研、考古、社会教育等多种活动, 并在所从事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学系主要学人表

姓名	年龄段	留学背景	讲授课程/擅长领域	主要论著
许寿裳（字季葑，号上遂）	1883—1948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文学课程	《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章炳麟传》《俞樾传》《中国文字学》《传记研究》《怎样学习国语与国文》等
李季谷（原名宗武）	1895—1968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布列斯多大学；剑桥大学研究院	西洋近世史、日本史	《西洋近世史》《西洋史纲》《日本通史》《高中外国史》等
许重远	1896—?	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西洋近世史	《国际近势》《近代民族主义之发展及吾人应有之认识》等
陆懋德（号泳沂，字用仪）	1885—1960年代	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大学	史学方法、考古学、上古史、史前史、中国史学史	《周秦哲学史》《史学方法大纲》《中国史学史》《中国上古史》《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瑚琏考》《美法民政之比较》等。译有《战后教育论》
黄文弼（字仲良，号耀堂）	1893—1966		考古学、西北边疆史	《二程子哲学方法论》《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后两部由其子整理）等
许兴凯（别号志平，笔名老太婆）	1898—1953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日本史、新闻学、中国地方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日本政治经济研究》《抗战演义》《柏女士讲演讨论集》等
王子云	1897—1990	法国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法国高级装饰艺术学校	中国美术史	《汉唐陵墓艺术》《中国历代装饰艺术》《唐代雕塑选集》《中国美术简史》《中国古代雕塑百图》《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中外历史装饰艺术图录》《中国雕塑艺术史》等
杨向奎（字拱辰）	1911—2000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	《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绎史斋学术文集》《中国古代史论》《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繙经室学术文集》等
周传儒（号书舫）	1900—1988	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中国上古史、西洋近世史、中国通史、中西外交史等	《中国古代史》《书院制度考》《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现代意大利史》《西北利亚开发史》《新撰世界史》《论梁启超与王国维》《兰亭序的真实性与中国书法发展方向问题》等
蓝文征（字孟博）	1901—1976	日本早稻田大学	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	《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等。

萧一山（原名桂森，号非宇，字一山）	1902—1978	英国剑桥大学	中国近代史、清史	《清史大纲》《清史通史》《中国近代史概要》《太平天国书翰》《太平天国诏谕》《清代学者著述考》《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曾国藩传》《民族文化概论》《非宇馆文存》等
杨兆钧（字涤新）	1909—2003	土耳其安卡拉大学	西北边疆史	译著《克拉维约东使记》《土耳其共和国》编有《维汉字典》《云南回族史》《土耳其现代史》等
杨人榷（字飞迅、洛曼等，笔名骆迈）	1903—1973	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	西洋现代史、西洋近世史、史学名著	著有《圣鞠斯特》《非洲通史简编》等。译有《世界文化史要略》《法国革命史》《法国大革命史》《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等
杜光坝（字毅伯）	1901-1975	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各国政府、中国宪法、国际政治等	译有《宪政制度之新问题》《欧洲二次大战的前夕》著有《现代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现代宪法问题》《现代国家之对外关系》等
涂序瑄	1900—1970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英国剑桥大学	西洋现代史、西洋近世史	《英国文学史》《英国宪政史》《权力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纪略》《西洋上古史》等

三、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学情况

（一）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

历史学系所开设公共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依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所颁布的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历史学系所属文学院必修共同科目有：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注重文化之发展）、西洋通史（注重文化之发展）、论理学；其中，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各 6 学分，外国文 6—8 学分，论理学 4 学分。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任选一种）6 个学分；数学及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任选一种）6—8 学分；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任选两种）12 学分。总计 52—56 学分。此外，党义、体育及军训为当然必修科目，不计学分^[3]。之后，学校又“添设乐歌为一年级必修课，二、三、四年级为选修课，并聘定马振鸾先生为歌咏指导员”^[4]。1941 年，又将“三民主义”列入大学共同必修科目中。1944 年 9 月学校修正《本大学学则》：“本校课程分当然必修课、公共必修课、分系必修课及分系选修课四种；当然必修课为体育军训不计学分；公共必修课，文学院及法商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三系计 52 至 56 学分；分系必修课，其学分数依课程标准；分系选修课，其学分数依课程标准之规定”^[5]。

历史学系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史前史、商周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世史、史学方法、史学通论、考古学、中国史学史、西洋近世史、西洋现代史、西洋史学史、中国美术史、西北边疆史、史籍名著、中国史部目录学、日本史、中国通史、亚洲诸国史、西洋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地理总论、中国沿革地理、世界地理等。

（二）历史学系所用教材和参考书

由于抗战时期书籍资源缺乏，所有课程多使用讲义或笔记。学校因此通过了《请各系规定必须印发讲义数目以便复印案》决议：历史系印发讲义 150 页^[6]。具体课程、课本、参考书见表格^[7]（依据国立西北大学三十年度各院系所用课本）：

科目	课本	参考书
史前史	口讲笔记	<i>Renard, Life and Work of prehistoric times. De Morgam, pre-history. Lowic, primitive Society.</i> 等
商周史	自编讲义	《尚书》，《诗经》，甲骨文，钟鼎文，《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发掘周口店报告》，《发掘仰韶报告》，《发掘安阳报告》等。
史学方法	口讲笔记	刘知几《史通》，崔述《考信录》， <i>Bernheim, Lehrbuch des Historisch en Methode.</i> <i>Langlois, study of history. Fling, Writing of history.</i> 等
西洋现代史	笔记	<i>Fyfe, Modern Europe. Grant & Tenperary, Europe in the 19th & 20th centuries. Fag, Origin of the World War. Schapiro, Modern &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i>
西洋近世史	口讲笔记	<i>Mazar, Europe Since 1815. Gooch,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Temperley, History of Europe in 19th & 20th centuries. Rose,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nations. Hay, A Political &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Fay, The origin of the war. Schmit, The Coming of the War.</i>
考古学	讲义	中华远古之文化；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奉天锦西县砂锅屯洞穴层；周口店之骨化石积；中国猿人化石之发现；周口店、猿人化石层中之石器发见；甘肃考古记；西阴村史前之遗存；诚子崖；安阳发掘报告；燕下都发掘报告；记新发见之石器时代之文化；长征记；考古学集志创刊号；田野考古报告；日本考古学；考古学研究法（日人）；乐浪（日人）；牧羊城（日人）；貔子窝；古蒙古长城地带（日人）
隋唐五代史	编印讲义	“南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新五代史》；《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全唐文》；《全唐诗》；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钱俨《吴越备史》；梁建柁《南洋书》；徐宝善《五代新乐府》；饶知元《十国杂事诗》
中国美术史	笔记	《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佩文斋书画谱》；《中国美术史》
西北边疆史	编印讲义	丁谦《地理丛书》；《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西北史地之研究；中西交通史等。
史籍名著	编印讲义	汉四史选文；《文史通义》；《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等。
中国史部目录学	讲义	《尚书》；《春秋》三传；《战国策》；廿五史；历代艺文志、经籍志；九通；通鉴；各耘记事本末；各种会要、各耘会典；《四库提要》；四库未收书目；《书目答问》；《崇文总目》；各耘目录书类（参考书甚多，不可胜数）
日本史	讲义	太田史《日本史讲义》；荻野田之《日本史讲话》；牧健二《日本法制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福田德三《日本经济史论》；西村真次《日本文化史》；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太汤社《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木宫泰彦《日本交通史》； <i>Gomen, An Outline History of Japan.</i> （以上为现代状况下能得到之书籍）
中国通史（文理两院各系一年级）	编印讲义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日人著《世界史大系》；廿五史及补编；各耘记事本末；稻叶君山《清朝全史》；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赵翼《廿二史劄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三）任课规定

学校将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讲师五种，并分别规定了任课时数。根据学校第四十次委员会决议通过的《处主任院长系主任任课规定》：教授兼系主任者，任课八至九小时。教授兼院长或秘书，教务、训导各处主任或研究所主任者，任课六至七小时。教授兼系主任再兼院长或处主任者，任课五至六小时。教授兼性质相同之两系主任者，任课七至八小时，再兼院长或处所主任者，任课四至五小时。院长或系主任由常务委员自兼者，得不任课^[8]。后经过第四十三次常务委员会议规定讲师授课时数为：专任讲师每周授课时数定为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专任讲师兼任校内其他职务者，其授课时数得酌减之^[9]。1939年底，学校又制定《西北大学教员服务暂行规程》规定：“教授、副教授，每周任课十小时至十二小时，不足十小时，在七小时以上者，按照讲师扣薪”^[10]。

（四）教学实践

在专业教学上，历史学系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如1938年2月18日，由陆懋德教授带领本系考古学班及他班同学赴陕西考古学会参观所藏古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秦汉砖瓦石刻、货币及六朝隋唐之石刻等，不可胜举。其中以于右任先生所寄存的汉石经、具有西方艺术特征的白石观音像、刻有比例尺的唐兴庆宫图以及周末战车照片（图样及照片宝物）最为宝贵，使学生们流连忘返。又如，1938年8月对城固张骞墓前石刻的发掘、已毁坏墓道的清理工作及所得古物的分类编号亦有历史系学生参加。此外，1939年寒假的勉县考古活动、1942年7月青海循化县撒拉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的考察活动以及1943年春假陆懋德教授对南郑小南海、梁山地区进行史前文化及地质结构考察活动都与学生一同前往。其中，杨其超同学作《本大学历史学会勉县考察记》一文，记录了勉县考古活动的缘起、组织、地点、目的、经过及结论，发表于西北联大校刊上。

四、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情况

1937年至1939年，历史系两届毕业生人数约为32人。1939至1946年间，历史系共七届毕业生总计135人，其中女生33人，男生102人。学校制定《本校导师制施行细则》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以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训导内容包括思想性行、学业、体格三方面。“本大学学生，按照系别年级分组，每年级按照学生人数多寡，酌分为一组或二三组。每组设导师1人，由学校聘请教授担任，每学院设主任导师1人，由学校聘请，院长或系主任担任，分别负各院各组学生训导之责。各组导师对于本组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及身体状况分别考察，随时记载报告数训导处，并于每学期终出具总报告1次。各组导师除随时接见本组学生施以个别训导外，每月并得召集本组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会或远足会作团体生活之训导，将各项团体活动，翔实记录，于学期终了时，报告各该院主任导师备查。各系在可能范围内，每年举行学生家庭状况调查1次。注册组于每学期考试成绩评定后，将学生所有各科之分数，送交有关各导师”^[11]。同时学校制定《学生奖惩规则》《本大学学生操行成绩考查办法》等具体章则对学生学业、品德诸多方面进行管理。

在课外活动方面，历史学系学生组织、参加了丰富的社团活动，并创办刊物。如1939年春所创办的自励社，大力开展读书活动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在读书和讨论的间歇中，历史系女社员陆玉菊总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这个机会教大家唱抗日流行歌曲，如《红樱桃》《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12]P239}。随着学生团体增多，学校制定《指导学生团体组织办法》《审查学生团体壁报刊物办法》对学生组织、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历史系创办“历史学会”，学生白尚秦曾担任负责人，并刊行《春秋》壁报^[13]。1945年元旦，各学会出版新年纪念特刊，以阐扬最高学府之学术研究及倡导战后文化建设。历史系学生孙锡本于历史学报上发表论文《王安石理财失败之分析》，被认为“卓有见地，堪称精粹”^[14]。

五、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科研学术活动

（一）学术讲演

西安临大时期，学校便制定《本校学术讲演办法》，以增进学生学术、道德上的修养。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讲演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国防科学、文学与艺术（2）战事有关之国际问题（3）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形（4）非常时期教育（5）西洋文化及历史、地理、资源各问题（6）青年学生之修养问题。其他与抗战有关之重要问题可随时加入”^[15]。并将讲演内容载于校刊之上。从《西安临大校刊》到《西北联大校刊》再到《国立西北大学校刊》，虽经学校南迁、校名更易，然而学校之学术讲演从未间断。而历史学系学人所作各种讲演，依旧能从校刊中找到大量踪迹。

在对于青年学生知识素养的培养上，有李季谷《中国青年应有之反省》、陆懋德《青年节之意义》、杨宙康《人才教育的基础》、萧一山《大学需养成学术研究风气》、周传儒《英国之大学教育》等。在激发民族情感，激励学生担当起富强国家的重任，了解历史与时局政治方面，有许兴凯《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蔡松坡与民初政治》、李季谷《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陆懋德《中国革命之经过》、许寿裳《勾践的精神》、杨人榘《就六三纪念论鸦片战争及禁政》、蓝文征《中日历代战史》、黄文弼《成吉思汗之战略及战术》、萧一山《近代战史》、陶元珍《中国历史上之分裂与外患》、周传儒《最近中苏关系之检讨》等。在学术研究、社会历史考察方面，有杨兆钧《青海撒拉族之生活与语言》、黄文弼《边疆十四民族》周传儒《梁任公先生之学术思想》等。

（二）学术论文

在抗战时期，历史系学人进行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于《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西北学术》《城固青年》等刊物上。如陆懋德《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汉中区的史前文化》《观古杂咏》《汉中古迹杂咏》，黄文弼《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许兴凯《兴中会同盟会时代及国父中山先生早期的地方自治思想——中山先生地方自治理论研究之一》，何士骥《莽镜考》，杨兆钧《萨拉人语文习俗之调查》《萨拉之习俗》，易忠策《八代诗选述旨》《唐诗选述旨》，林冠一《诸葛亮躬耕陇亩辨》，冉昭德《补陈书艺文志序》等。值得注意的是文学院黎锦熙教授对于现代方志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编纂了多部陕西地方志，并在方志理论上，发表了《现代方志之“三术”与“两标”》《方志广“四用”破“四障”议》《方志农村调查法》以及《方志拟目》（包括总纲之部、自然之部、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等多篇论文。

（三）学术专著、译著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学人的学术专著、译著有：黄文弼《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许兴凯《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陆懋德《中国上古史》《瑚琏考》，萧一山《清史大纲》《清代学者著述表》《清代史》，杨向奎《中国古代之种姓》《北魏均田考》《论官利九品》《论谱牒与刑》，杨兆钧《新中国之进步（土文）》《撒马尔罕游记中译》《维汉字典》，丁山《吴国考》《新殷本纪》《说文阙义笺》《先秦史记》《先秦民族与神话》《先秦艺文略》，杜光埏译著《宪政制度之新问题》《（欧洲）世界二次大战的前夕》《现代宪法问题》《日本政治动力论》《法国劳动运动史》，易忠策《李兆海书碑年略》一卷，《静偶轩说泉》两卷，《耜园文存》四卷，《静偶轩题跋》四卷；冉昭德《汉西京宫殿图考》两卷，《晋书劄记》两卷，《陈书艺文志》四卷以及黎锦熙《方志今译》等^[16]。

（四）社会历史考察及历史古物参观、展览活动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师生进行了多次考古、考察以及对历史古物的参观、展览活动。1938年2月18日下午，由陆懋德等教授率领本系考古学班及他班同学共三十余人赴考古学会参观所藏古物。周国亭作《陕西考古学会参观记》记录了参观的经过。

1938年5月，历史学系成立实地考古指导委员会，以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为委员，并临时请有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旭生先生为指导，为表彰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骞，并为历史学系学生实地练习考古起见，制定了《张骞墓门古物探寻计划书》和《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于8月24日至9月2日对张骞墓进行了发掘整理。何士骥、周国亭共同撰写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将清理墓前已露面之两石刻的调查、发掘情形进行了工作总结，并提出了保护维修方案。吴世昌撰稿、黎锦熙书丹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载。

1939年2月13、14两日下午，历史系师生对博望侯墓道古物进行分类编号并加以说明，在本系考古室陈列展览。陈列品类有印范、五铢钱、汉砖、带耳破陶罐、铁钉、细铜丝、碎铜片、陶器片、瓷片瓦片、砖块、漆皮带土、朱红带土、人工石、天然石、牙、骨、螺壳等。到会参观者有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本校常务委员李蒸、徐诵明、胡庶华，秘书主任黎锦熙教授及同学等数百人。1939年4月6日，为弘扬民族精神，西北联大全校师生1400余人在“民族扫墓节”整队赴汉博望侯张骞墓举行祭扫活动。

1939年3月19日至22日期间，由历史学会负责筹划，历史学系教授李季谷、陆懋德等带领历史系师生在经费有限、时间促迫、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对勉县诸葛武侯墓、武侯祠、读书台、阳关、马超墓、定军山及褒城石门等地遗迹进行了考察活动。并根据对各古迹及地理形势的研究，以明了历史事实，发现学术上的价值及贡献。考察结束后，周国亭作《勉县考古纪实》，杨其超同学作《本大学历史学会勉县考察记》对这次考察活动作以总结。

1942年夏，历史学系副教授杨兆钧先生与学生罗郁前往青海省循化县，对撒拉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等进行考察。计于七月廿一日出发，至九月廿八日返校止，费时共七十天。其路线经过天水、兰州，至西宁，然后折南至循化，调查后经抵兰州，依原路线返校，往返路程约四千余里。杨兆钧返校后作了题为《青海撒拉族之生活与语言》的讲演，对其历史、种族来源、宗教信仰、人种特征、房屋建筑、陈设、饮食、通婚、娱乐、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族史、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详实的介绍。

1943年，黄文弼教授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1944年返校。与前两次路线不同，此次沿河西走廊西行，调查了敦煌莫高窟，后对北疆和南疆（偏重北疆）作了一些调查，除考古方面，对教育文化、民族风俗情况亦充分重视。先后撰写发表了《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罗布卓尔考古记》等论文和专著，填补了西北边疆考古的空白。

1943年春假，陆懋德教授偕同学旅行，沿途对南郑小南海、梁山地区进行了史前文化及地质结构的考察。推测小南海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可能。同时，在梁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有石刀、石斧及蚌蛤壳等当时人类食余所弃之物，从而证明汉中区文化之古远。陆懋德教授作《汉中区的史前文化》一文，以备学术界继续探讨研究。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于1940年。从1940年至1944年间，考察团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主要考察了陕西关中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青海塔尔寺、敦煌莫高窟、拉卜楞寺、河西走廊石窟群以及西安、兰州等地，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1944年12月，本校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准予艺术文物考察团迁来城固与文学院合作研究。团长王子云来城固考察了汉代史迹，并在本校礼堂开展览古迹照片。该团考察所得成绩有拓片、照片、图画、模型等四十余箱。

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百余种，计2千余件全部拨归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学系考古室合并，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其主要目的在发扬西北固有文化，收集文物资料，从事整理。王子云先生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开辟了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

1945年11月，西北文物研究室为纪念校庆，在图书馆旧址举行金石拓片展览。出品区

域为陕、豫、甘、青、新等地。分为文字方面与图画方面。关于文字者，以汉唐两代为多，而其区域以西北为限。此次金石拓片展览主要在于介绍我国文字书体之演进及一部分特殊文献与图画其碑石拓片。

1946年元旦，西北文物研究室举行西北风物图画展览。所展为教部前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北各省绘画及摄影之一部分，其种类包括西北名胜、西北民俗、塞外风光、长安景色等均系该团绘画人员随地就所见风景人物加以速写，应用写生方式作忠实的介绍。民俗方面，亦系就考察行程所至，从事速写。此次专题展览出品之类别分绘画和摄影两部分。绘画部分包括西北名胜、西北民俗、塞外风光、赛马运动、塔尔寺十八景、长安十八景。摄影部分包括西北名胜、西北民俗、陕南史迹、北平故都。元月三、四两日，西北文物研究室假期刊阅览室举行汉唐陵墓雕刻拓片展览。陈列拓片多种，均极精美珍贵，深具艺术价值。观众络绎不绝，在欣赏古代文物之余，莫不萌发扬民族精神的思想。

（五）搜集编撰抗战史料、撰写校歌

1938年8月，历史学系便开始着手编撰抗战史料。组织抗战史料纂集指导委员会，推定李季谷，许寿裳，陆懋德，许重远，谢兆熊，胡鸣盛，何士骥，吴世昌，唐祖培，周国亭，何竹淇为纂集指导委员，广为搜集抗战史料。一方面为“提倡民族复兴之助”，一方面使“珍贵之史料有系统之保存”，从而“信今而传后”^[17]。《抗战史料纂集大纲》包括中国部分、国际部分、日本部分。中国部分包括军事、政治、党务、经济、外交、社会、抗战损失、叛逆活动、倭寇兽行九方面。国际部分包括英、俄、美、法、德、意、波两国之公然袒日抑华，世界舆论及多数国家对华抗战之同情与援助，九国公约会议，欧洲各重要问题及其新形势，各国扩军问题，国联问题，各国对于中国抗战之重要言论十二方面。日本部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社会五方面。从而对于敌人在我国摧毁文化、屠杀民众、奸淫妇女的实况，以及不顾正义违犯国际公法引起国际反对的情形等全部加以搜集，使国人认识真相，巩固国民的自信力量。

与此同时，黎锦熙、许寿裳两先生作《本校校歌》，即西北联大校歌，歌词为：“并序连簧，卅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贤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并且“校歌歌谱已请许寿裳、齐璧亭两先生介绍专家从事编制中”^[18]。

（六）社会教育活动

1938年9月，学校奉教育部令，以注重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并行，以先知觉后知、推广学术至于社会，兼办社会教育事业。西北联合大学以李蒸教授及各学院院长、秘书主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为委员，制定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1938）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历史系参加了文学院调查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等活动。同时，历史系许重远教授在陕南六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上作了题为《国际近势》的学术讲演。1944年11月，国立西北大学成立本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刘季洪为主席，历史系教授蓝文征为副主席，萧一山为委员，筹备社会教育活动。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兼办社会教育的努力从未停止，历史学系教授在组织参与这项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贡献

（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开创了以后西北大学历史学系的特色优势。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学人为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如今所见在校刊以及当时的学术刊物上有学术讲演、学术论文及相关文章五十余篇，专著、译著三十多部。在具体领域研究中，陆懋德教授中国史学方法研究成就卓著，其《中国上古史》与《史学方法大纲》分获1941年（第一届）、1942年（第二届）教育部学术奖励社会科学类三等奖和

二等奖。陆懋德教授树立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史观，注重历史的解释方法与致用的学术目的，在中西比较的研究视野下，吸收借鉴考古研究成果，其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文弼教授西北边疆考察研究，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他的西北边疆考察，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为基础，积极研究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验证了史籍记载，并为补正史籍之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萧一山《清史大纲》以“民族革命史观”从宏观上构建了近代史研究模式，以明清之际作为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并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及事件给予精当的评价，试图探索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丁山教授在古文字考释及古史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王子云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物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地贡献，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陶元珍的明史研究与西南联大吴晗齐名。黎锦熙《方志今议》在民国方志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继承和发展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上，开创性地提出方志性质为史地两性，突破传统的观点，并在现代学术视野下提出了“三术”的方志编纂方法。

这些学术贡献，无不体现这些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修养及对国家摆脱战争、振奋民族精神、独立富强出谋划策的爱国情怀。同时也为日后西北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学科特色、人才培养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形成较深厚积累的学科方向，如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世界史、西北边疆史、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中国美术史等，开创了以后西北大学历史学系的特色优势。

（二）为民族独立和祖国建设培育了众多人才

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学人在抗战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注重青年学生知识素养的培养、民族情感爱国情怀的激发，从而激励学生担当起富强国家的重任、了解历史事实与时局政治、从事学术研究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实践考察。这样的培养方式，对历史学系学生乃至全校学生教育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为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历史学科培养了大量人才。

历史学系的众多教授，以他们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求真求实的治学风范、独立不阿的人生品格、敢于担当的使命感、孜孜不倦的诲人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亲身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发扬西北精神，并热心于社会教育及地方教育，致力于唤醒民众思想意识，提高其知识素养，提升地区教育水平和质量。历史学系教授陆懋德、许兴凯因连续任教满十五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二等服务奖。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历史学系共培养学生 160 余人毕业，他们奔赴全国各地，更多的是扎根西北，成为西北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为祖国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

（三）对西北历史文化研究与边疆建设做出了贡献

“初议迁，所向不能决。有朋聚谈，余谓若具远略，宜指西北，度陇屯甘凉，趋新疆，是为左宗棠路线。若避入蜀，是为唐明皇路线。迁陕南，是为唐德宗路线。仅少西移，则为杨贵妃路线矣。然此时新疆道阻且长，故不能往；惟校名西北，终不可忘情于天山也，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当脚踏实地以图之；故曰‘天山万仞自卑隆’也”^[19]。黎锦熙在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中，就已经指出北京高校西迁至西北，应立足实地，脚踏实地发扬西北文化，弘扬国族公诚勤朴的优良民风。历史学系学人秉承这一精神，在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成果卓著，并将这种精神文化广泛传播于学生及社会。

在课程设置方面，“本校于边疆建设科目，原开有各种课程，以供学生选修。复订有西北边疆考察之计划，以作专门研究西北边疆之用。依据该项计划，系将西北边疆民族分为两组：以宁夏定远为研究蒙古语言及文化之中心；以甘肃夏河之拉布楞为研究藏语及佛教文化之中心地，而以青海循化县为研究撒拉族语言及回教文化之中心地”^[20]。因此，1942 年杨兆钧与学生罗郁踏上青海之行，而蒙古语言及文化的研究在计划之中却因故未能成行。1943 年黄文弼教授在前两次的新疆考查基础上第三次考察新疆，他对西北历史、文物研究的成果

填补了考古空缺。王子云带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以及之后成立的西北文物研究室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在学校多次展出，深受学校师生欢迎。研究、发扬西北文化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学人从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他们对于西北历史文化、边疆遗迹考察乃至自然环境、边防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姚远, 刘舜康, 赵弘毅, 王周坤.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 [2]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 1938年4月3日.转引自李永森, 姚远编.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3]编者.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J].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 1938.8.25.
- [4]编者.乐歌为一年级必修课程[J].西北联大校刊第10期, 1939.2.1.
- [5]编者.本大学学则[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副刊第1期, 1944.10.1.
- [6]编者.第十三次会议记录[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第6期, 1943.2.1.
- [7]国立西北大学三十年度各院系所用课本 全宗号五 卷宗号 13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 2008.2.17.
- [8]编者.处主任院长系主任任规定[J].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 1938.10.1.
- [9] 编者.规定讲师授课时数及待遇办法[J].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 1938.8.25.
- [10] [12]李永森, 姚远.西北大学校史稿[M].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11]编者.本校导师制施行细则[J].西北联大校刊第8期, 1939.1.1.
- [13]编者.学生团体活动情形剪影[J].副刊第7期, 1945.1.1.
- [14]编者.本校各同学竞出新年特刊[J].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副刊第20期, 1946.2.1.
- [15]编者.本校学术讲演办法[J].西安临大校刊第3期,1938.1.3.
- [16]国立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医学院教员著作调查表 全宗号五 卷宗号 13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南京 2008.2.17.
- [17]编者.历史系征求抗战史料[J].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 1938.12.1.
- [18]编者.本校校歌[J].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 1938.12.1.
- [19]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A].伊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C].台北: 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 [20]杨涤新.萨拉人语文习俗之调查[J].西北学术第2期,1943.12.15.

History Department of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UI X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Having researched the changes, faculties, education, student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istory department,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fields of Academic research,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talents cultivating as well as frontier researche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西北联大工业经济管理教育的肇始

张建新，燕云捷

(西北工业大学 明德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4)

摘要:通过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其子体学校或相关学校工业经济管理教育的萌芽和生长的历史考察,勾勒出其基本历史脉络。研究认为西北联大工业经济管理学科适应抗战时期内迁工业的发展,萌芽于西北联大时期,成长于西北联大子体学校西北工学院时期,并形成从师资、学生、教材教法,到课程建设的一整套成熟经验,从而填补了中国北方地区高等教育的空白。

关键词: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管理学;工业经济管理教育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有之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3年,在原有土木工程、矿业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八系的基础上,增设工业经济管理系,是我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地区工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开端。这与之前1928年至1936年间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及其交通管理、实业管理、公务管理、财务管理四科的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南一北我国最早的两大工业经管理学科教育基地。

对此问题的研究很薄弱,仅见有极少论著涉及^[1-4]。

一、西北联大前期工业经济管理教育的萌发

工业经济管理是对工业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和监督的一种职能,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萌发于以蒸汽机和纺织工业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20世纪初期逐渐进入欧美高等工程教育领域。1928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管理学院,但最初仅侧重于交通运输管理,1931年始设铁道管理、实业管理、公务管理、财务管理四科。

早在1936年,还在西北联大前身之一北洋大学时期,周宗莲即开始介绍英国工业经济管理的课程和考试内容,指出:“英国的工程教育是由学校、厂家与学会三方面负责,而受教育期间,是三年书本,二年学徒,而在资格上须有学会之某种考试为之证明”;此种考试“命题内容,全是实地经验的材料,如估计材料数量、价值、草拟工程合同或说明书等”^[5]。

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相关的北平大学工学院设有机械、电机、纺织、应用化学四系,未设工业经济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仅在法商学院设有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工学院仅有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等六系,有一些课程涉及到工业经济管理。

东北大学工学院在1932年接收的东北交通大学学生中有铁路管理科(分运输、商业两门)的学生。自1923年至1938年并入西北工学院之前,并无工业经济管理专业。

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前仅有采矿冶金和土木工程两科,后改为采矿系、冶金系、路工系和水利系4系,没有工业经济管理系科。

国立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1938年7月合组而成,故同属西北联大子体学校。该校专设有农业经济系和附设农业经济专修科,适应西北建设需要,培植乡村建设及各种农业经济人才。其所开课程有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学、农村经济学、经济史、西洋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农村合作、农业推广、农业仓库、农场管理、农业经营

等等课程。虽然部门不同，但是原理有相通之处，因此它也是西北联大工业经济管理学科生成的基础之一。

国立西北大学之法商学为其骨干学科，开设有系统的经济学、管理学课程，如所开设的经济学、会计学、成本会计、统计学、会计报告分析、经济数学、运输学、市场学、经济政策、公司理财、战时经济、中国经济史、西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条约论、现代经济学说、工商组织与管理、工商政策、实业计划研究、合作经济。经济学系罗仲言（章龙）所著的《中国国民经济史》^[6]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工业经济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其第十章矿冶、十一章工业中有：“所谓新式工业乃指运用工厂组织合理经营设备、机械、动力，其分工较细，纪律严明，故在生产力较手工作坊特高”。该著将工业经济按部门划分为：一是矿冶，包括金与银、铜与铁、铅锌铋汞、煤与石油、石膏矿等；二是服物业，包括丝织、棉纺织、毛纺织、染炼、刺绣；三是造船；四是火器（铸炮）；五是瓷器；六是纸笔墨砚与印刷；七是铜玉石竹雕漆。他还对自古以来的工艺著作中的工业经济作了研究，包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王微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但是，这些内容大多局限于工业经济的范围，还谈不上“工业经济管理”。但是，它是西北工业经济管理学科萌芽和成长的重要土壤。

未设工业经济管理系之前，西北工学院其他系科已经开始学习相应课程。比如：土木工程学系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开设有经济学必修课，第四学年开设有钢桥计划、钢筋混凝土计划、铁道计划、契约及规范、房屋建筑计划、高等结构计划、都市计划等管理课程；矿业工程学系采矿组第四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学期连续开设有经济地质、矿场会计与管理，第二学期开设有矿业法规必修课和矿业经济任选课；矿业工程学系采矿组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有炼厂会计及管理必修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水利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有经济学必修课，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有工业管理必修课；化学工程学系第四学年第一、二学期开设有簿记及工业会计必选课；纺织工程学系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设有工厂管理必修课、工厂会计必选课，以及工厂卫生、工商法规等任选课；水利工程学系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开设有水工结构计划、灌溉工程计划等选修课和契约与规范必修课和水电工程计划、卫生工程计划、工程估价等选修课。从其工业经济课程多设于高年级来看，其显然是作为工程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的高层知识来设置的。这些课程的开设，为工业经济学管理学科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二、西北联大子体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系教师与学生

（一）系科肇始与师资

1943年，在西北工学院自西北联大分出独立设置5年以后，增设工业管理系。成立之初，教授仅叶守济一人，副教授仅蓝贞亮一人。

抗战胜利后，迁校西安、咸阳时期，工业管理系教授有苏在山、龚止敬（教统计学）、叶守济、蓝贞亮等4人。当时，工业管理学系教师变动不大，仅增聘龚止敬先生教统计。系主任彭荣阁先生事务较忙，无暇兼顾。改聘新回国的苏在山博士为教授兼系主任，各门课业，照常进行。其主要教授生平事迹如下：

叶守济，安徽长丰人，生于1904年。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从1940年起，历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①。他先后讲授过经济史、农业经济、土地问题、农业仓库、农业金融、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工业进化史等课程。

彭荣阁，似毕业于北洋大学。教授水利课程，曾任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后任四川大学工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① 1954年调入西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1976年退休。

蓝贞亮，浙江松阳人，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1934年毕业于暨南大学铁道管理系、1949年至1954年历任西北工学院工业管理系副教授、主任、教授。^①他主要讲授会计原理、工业会计、成本会计等课程。主编有《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等。

苏在山，西北工学院工业管理系主任，东北人，留美博士。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成功大学商学院院长。著译有：《科学管理原理》（苏在山译，台北：“交通部”交通研究所，1969）；《市场学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69）；《工业管理学》（台北：三民书局，1956）。

刘纪之，经济学教授，河北河间人，生于1895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硕士学位，曾在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吉林大学、河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教授、河北大学教授、系主任。1937年1月起，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系、西北大学商学系教授。在西北工学院时期，教授经济学与工业管理课程。教授会代表之一。曾代理院务。

这些教授半数以上都曾分别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间互相兼职，或频繁流动，尤其是与西北大学经济学教育互动更为频繁，早期所知的5位系主任或教授竟有3位与西北大学互聘。这表明西北联大子体学校在分离后仍有紧密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表现在高级工程人才学科结构、知识结构的更深层次。

（二）学生概况

1941年工业经济系首届招生2名；1942年招生6名；1943年招生6名；1944年招生15名；1945年招生2名；1946年招生15名；1947年招生7名；1948年招生3名。1941年至1948年总共招生56名。

抗战时期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来自战区的学生大多失去经济来源，书籍甚缺，文具用品一减再减，上课抄笔记和平时练习大多使用铅笔和陕南土制草纸。学生缺少鞋袜，平时走路、爬山、早起跑步，普遍是赤脚穿草鞋。一些学生冬季无棉衣，而是穿着一层套一层的旧单衣御寒。然而，即使在此艰苦条件下，学生们仍然刻苦读书，常常学习到深夜，有“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佳话^[7]。

1946年，工业经济系开始有6名毕业生；1947年毕业5名；1948年毕业11名；1949年毕业13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总共毕业36人。

毕业生大多分配至铁路沿线工厂、铁路局，以及油矿、煤矿、水利、航空等部门服务。由于西工从严治学，故毕业生在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以及铁道、公路运输等部门一向为直接预约毕业生前去服务，尤其是矿冶、纺织两系的学生，往往不敷分配，供不应求。这些学生虽然仅有30余位，但他们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修养，既懂工程技术，又懂工业经济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正是战后经济恢复和重整民族工业所亟需的。

三、工业经济管理学系课程设置

西北联大子体西北工学院工业经济管理学系的课程设置，包括40余门课程（见表1,表2,表3），两大方面：一是基础性工程技术教育，如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热工学、电工学、结构学、运输学、工程图画、机械设计原理等；二是工业管理学专业课程，如经济学、财政学、机构计划、工业管理、制造管理、施工规范、工商法规、会计学、统计学等。像热工学、电工学等课程连续开设两学年以上。

^① 1954年任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1960年随系转入陕西财贸学院（1978年改为陕西财经学院）。1969年逝世。

表 1 工业管理学系课程

学 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讲授	实习				讲授	实习		
第 二 学 年	应用力学	5		4	必修	材料力学	5		4	必修
	平面测量	2	3	3	必修	水力学	3		3	必修
	经济学	3		2	必修	经济学	3		2	必修
	机动学	3		3	必修	工商法规	2		2	必修
	工程图画		3	1	必修	工程图画		3	1	必修
	应用文	3		3	必修	工程材料	2		2	必修
	工业管理	3		3	必修	运输学	3		3	必修
合 计			19		合 计			17		

表 2 工业管理学系工业管理组课程

学 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讲授	实习				讲授	实习		
第 三 学 年	热工学	3		3	必修	热工学	2	3	3	必修
	电工学	3		3	必修	电工学	2	3	3	必修
	机械设计原理	3		2	必修	机械设计原理	3		2	必修
	机械设计制图		3	1	必修	机械设计制图		3	1	必修
	会计学	3		3	必修	会计学	3		3	必修
	统计学	3		2	必修	统计学	3		2	必修
	人事学	3		3	必修	制造管理	3		3	必修
		3				工业史	2		2	必修
合 计			17		合 计			19		
第 四 学 年	国际贸易	2		2	必修	成本会计	3		3	必修
	货币银行	2		2	必修	工业运输	3		3	必修
	厂屋建筑	3		3	必修	施工规范	2		2	必修
						论 文			2	必修
	合 计			7		合 计			10	
<p>选修以下各类课程，每类选一门或两门，共选三门或五门，每门三学分</p> <p>一、审计会计制度，公司理财。</p> <p>二、高等统计，财务报告分析，应用数学。</p> <p>三、地质学，工业化学，水文学，化工原理。</p> <p>四、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市场学，政治学。</p> <p>五、纺织概要，采矿概要，道路工程，机车，内燃机，市政工程。</p>										

表 3 工业管理学系工程管理组课程

学 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科 目	每周时数		学分	必修 或选 修
		讲授	实习				讲授	实习		
第 三 学 年	热工学	3		3	必修	热工学	2	3	3	必修
	电工学	3		3	必修	电工学	2	3	3	必修
	结构学	4		4	必修	机构计划		6	2	必修
	会计学	3		3	必修	会计学	3		3	必修
	统计学	3		2	必修	统计学	3		2	必修
	劳工问题	3		3	必修	铁道管理	3		3	必修
						工业史	2		2	必修
	合 计			18		合 计			18	
第 四 学 年	经济政策	2		2	必修	铁路会计	3		3	必修
	财政学	2		2	必修		3		3	必修
	铁道工程	3		3	必修		2		2	必修
						论 文			2	必修
	合 计			7		合 计			10	
	选修以下各类课程，每类选一门或两门，共选三门或五门，每门三学分。 一、审计会计制度，公司理财。 二、高级统计，财务报告分析，应用数学。 三、地质学，工业化学，水文学，化工原理。 四、心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市场学，政治学。 五、纺织概要，采矿概要，道路工程，机车，内燃机，市政工程。									

这些课程设置体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思想：一是尽量夯实工程技术教育基础，使学习者懂得工程技术学科最基本的知识，贯通相邻学科知识，建立宽泛而有用的基础知识体系；二是在二、三学年建立基本的工程技术基础知识以后，在第四学年进入由博返约的、以工业经济管理为主的专业知识层次构筑阶段；三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学年升级，课程亦体现由易到难，由基础到专业或从宽泛到专一的过程，另外也通过必修、必选、任选以及学分高低体现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特别引导有工业管理天分的学生能够接触到本学科最顶尖、最前沿的知识。这体现了西北联大工业经济管理教育的先进理念。

四、结 语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工厂内迁，西北地区亦兴起工业合作运动，从而使偏僻的战略大后方西北陡然形成了一些工业部门，而最缺乏的就是工业管理人才。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学校顺应时势，由个别教师的个别课程、个别研究，由个别学校在其他系科的借壳繁衍壮大，到逐渐整合发展为一个“工业管理学系”。这在整个我国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高等教育史上，都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然而，这一切如果没有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搭建这个历史平台，提供这个历史机缘，这个新的历史事物是不会出现的。

在工业经济管理教育这个视角，西北联大母体的孕育，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各子体间的分而有合和互补短长，表现了并非仅仅是基于地缘的一种联合，而是逐渐成为必然的、自然的一种分工与合作。其骨干教师如张伯声、李仪祉、李仙舟、叶守济、刘纪之、蓝贞亮在西工与西大间的流动，或者其他教师在国立西北五校间的流动也成为一种必然和有序的互动，从而互补了各自的短长，也进一步强化了各自优势教育的特色。这在培养文理融通、理工融通、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融通式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陶秉礼.西北工业大学校史[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
- [2]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 [3]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24
- [4]张建新,李晓霞,姚远.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演化[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2(4):684-687
- [5]周宗莲.英国之土木工程[J].北洋理工季刊,1936,4(3):12-19
- [6]罗仲言.大学丛书·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 [7]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M].城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0(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The commencement of Northwestern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economical management education

ZHANG Jian-xin, YAN Yun-jie

(Mingde College,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4, China)

Abstract: Try to outline the bas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economical management education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its budding and growth in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its Progeny universities or relevant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show: Northwest Polytechnical economical subject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land indus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germinated from the period of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grew up in the period of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which was one of the subsidiary bodies of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Finally, it formed a complete set of mature experience from the teachers, studen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us filled the blank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industrial economy management; industrial economy management education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数学教育

李晓霞, 姚 远

(1.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咸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全面整理与审视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数学教育,为西北地区及中国高等数学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线索。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西北联大的数学教育逐渐形成了高等代数、高等分析、高等几何以及微分几何、算学统计等多学科体系与应用交叉学科;师资大多留学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以曾炯、傅种孙、赵进义、杨永芳、刘亦珩、张德馨等教授为代表,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开展科学研究,为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数学与数学教育人才。西北联大不仅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数学科学教育体系,而且借助留学欧美为主的师资队伍,引进和发展西方数学教育及数学学术研究,从而成就了西北地区数学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 西北联大;科学教育;数学教育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三十五年(1946年)合而有分、分而有合,历经西安临时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临大”)、西北联合大学以及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三个时期,在西北地区生存发展9年之久。西安临大数学系是由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三所院校理学院数学系组成。西北联大时期,数学系沿袭西安临大旧制,并在师范学院增设了数学系,因此这一时期的数学教育是在理学院与师范学院两院并行发展。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由于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的独立,此时期数学教育只有在理学院数学系开展。但是,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却甚少,仅有极少数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1-4]。因此,本文运用原始期刊文献分析与考证法,以西北联大的数学教育发展作为研究视点,探讨西北联大数学教育对西北科学教育体系建构的历史贡献。

1 数学系的课程设置

1.1 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

西北联大二十八年度(1939)算学系的课程(如表1)分为共同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由表1可见,师范学院算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一年级课程主要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同必修科目;二年级课程则在第一学年的基础上开始接触专业一般科目,如微分方程与高等代数;三四年级全面展开专业科目的学习,进行深入的专门数学学习,如高等分析、数论、复变数函数等;五年级课程除理论力学外,重点为论文讨论与专业教学实践。其数学必修科目设置的特点是以“高等代数、高等几何、高等分析”为中心,围绕代数、分析、几何三大分支展开深入的数学基础课程以及高深数学课程学习。同时,必修课程的设置还非常重视数学教育实践以及学生科学论文的研究与讨论。更具有特色的是西北联大算学系开设了形式几何、实变数函数、代数数论、天文等门类广泛、专业性极强的选修科目供学生选习。这些选修课程主要是由教师据其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来开课,其教材多是教师自编讲义,甚至是众多教师数年来刻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课程内容皆是当时数学各分支前沿性的内容。国立西北工学院各学系一年级也开设了数学基础课程,有微积分、投影几何、立体解析几何等,航空工程学系二年级还开设了每周4学时、3学分的高等微积分,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二年级开设了每周3学时、3学分的微分方程。

表 1 1939 年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算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

必修课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党义	哲学概论	普通教学法	数论	理论力学
国文	社会科学	高等几何	向量分析	论文讨论
外国文	西洋文化史	高等分析	复变数函数	教学实习
社会科学	教育心理	近世代数	微分几何	
自然科学 (算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人类学任选)	中等教育	综合射影几何	算学史	
本国文化史	微分方程	解析射影几何	分析教材 教法研究	
教育概论	高等代数			
注: 第一学年之自然科学, 以选习算学为原则, 注重学生做题。内容包括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及微积分。				
选修课				
数论	向量分析	实变数函数	椭圆函数	代数函数
微分方程论	积分方程论	群论	不变量数	代数数论
图书馆学	形势几何	黎曼几何	最小二乘法	多元几何
代数曲线与曲面	几率	算学统计	天文	天体力学
弹道学	注: 选修科目, 不定学分年级, 俾各校有伸缩余地。			

1.2 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

这一时期, 数学系课程分为当然必修科(体育、军训, 不计学分)、公共必修科(46~54 学分)、专业必修及选修科(其学分依课程标准之规定)4 种。此时期数学系开设的课程中专业必修科目有: 微分方程、方程式论、高等分析或高等微积分学、高等解析几何学、射影几何学、近世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几何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理论力学、第二外国文、毕业论文学。选修科目有: 函数各论、级数论、数论、群论、初级数学研究、概算、数理统计等课程^[6]。显然, 此时期国立西北大学独立, 数学学科也单独成系, 数学课程设置与前一时期师范学院算学系课程注重广博之理念不同, 学生专修数学基础课程更加全面与完善, 并且更加注重数学精深的发展, 其教育目标也从以培养数学教师为主转向培养数学专家。各门科目使用的教材主要是教授自编讲义或英文原著, 参考书几乎均为国际数学大师的英文原著, 这些英文原著不仅将西方高深前沿的数学知识传入我国西北地区, 使学生们得到更为精确与深入的专业知识训练, 更是开阔了他们的科学视野。

表 2 西北联大数学教授

教授姓名	出生年月	留学经历	研究专长	所任课程
曾炯	1894.4	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	抽象代数	高等数学、代数,包括抽象代数在内等
傅种孙	1898.2	赴英国考察	几何基础、代数学	高等代数、近世代数、数论、群论、高等几何、非欧几何、实变函数论等
赵进义	1902.10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或数学博士学位和理学博士学位	代数体函数、分析力学、天体力学	物质构造等
杨永芳	1908.6	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仙台东北帝国大学,获学士学位	实变函数论、集合论、拓扑学、广义函数论	实变函数、高等微积分、集合论等
刘亦珩	1904.11	留学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获学士学位	几何学	微分几何、近世几何等
张德馨	1905.3	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	基础数学	高等数学、数理方程等
段子美	1898.3	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高等数学、概率论、微积分	高等数学、微分积分学、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刘书琴	1909.2	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数学分析、单叶函数	数学分析、复变函数论、复变函数几何理论、几何函数论、单叶函数等
魏庚人	1901.3		中学数学教育研究	数学分析、数学教学法、微分方程、初等数学等

2 教师资源与教学

西北联大时期,由于三校合一,当时云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仅文理学院数学系就有 6 名教授,即曾炯、傅种孙、赵进义、杨永芳、刘亦珩、张德馨等(如表 2),助教 1 人。国立西北五校独立合作时期,国立西北大学数学系除以上教授外,还有段子美、刘书琴、魏庚人、赵祯等教授。这些教授不仅是国内知名学府毕业,并且均在国外一流大学留学或有国外科学考察的经历。由表 2 可见,留学英国 1 人,德国 2 人,法国 2 人,日本 3 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 3 人,而且他们在数学各个分支领域里均有所成就。其中,曾炯教授,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数学系,后又入哥廷根大学哲学院数学系,师从著名的抽象代数奠基人、女数学家诺特,攻读抽象代数,1934 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研究抽象代数的第一个学者,也是国际上最早进入抽象代数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并被丘成桐认为是 20 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相媲美的中国数学家。他在 30 年代就已发表被后来誉为“曾定理”、“曾层次”的研究结果,成为“大多数关于超越扩张的布劳尔群研究的基础,而且对阿廷-施赖埃尔形式实域上二次型理论有重要的应用”^[7],并且世界各国许多抽象代数教科书都将他的“曾定理”、“曾层次”列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抽象代数、李群论与泛函分析、拓扑学成为 20 世纪纯粹数学的三大支柱和国际数学发展的主流。

数学系傅种孙教授,原为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37 年随校西迁至西安,历任西安临

大、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1945—1947年赴英国考察。在数学研究方面,他曾在《武汉大学季刊》、《数理杂志》、牛津大学 *The Quartey Journal of Mathematics* 等期刊发表《几何学之基础》、《大衍求一术》等数学论文。他的《几何学之基础》,详细介绍了 O.Veblen 几何公理,这是我国首次关于几何基础理论报道,他则是将西方数学基础研究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的《大衍求一术》是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中国古算的创举。他还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逻辑之前,就撰写了论文《算理哲学入门》,后又与他人合作翻译罗素的全书《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可见他在引进西方数理逻辑也曾做出重要贡献。西北联大时期,傅种孙完成了两篇论文,一是完全解决了组合理论中有关无向循环排列的问题,并于1942年将其以英文发表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二是讨论了“阶为 ab 的有限群 G 中,方程 $xb=E$ (E 为单位元)的解数 Nb ”。傅种孙不仅推广了著名数学家 F.G. 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的结果,而且还证明了定理:设群 G 的阶为 ab ,如 b 与 $a\phi(a)$ 互素($\phi(a)$ 为欧拉(Euler)函数),并 G 的任何两个不同而共轭的循环子群,都不包含在同一个阶能整除 a 的叙洛夫(Sylov)子群中,则 $Nb=b$ 。^[7]1945年,傅种孙的科学研究被英国数学界专家认为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在数学教育方面,他率先采用近代观点讲授高等代数、近世代数、数论、群论、高等几何、非欧几何、实变函数论等多种课程^[8]。傅种孙教授大为重视数学文献建设,1937年他自北平南下西迁时就背负数百册数学书籍。1945年至1947年赴英考察期间,他还为国立西北大学数学系代购数百册数学书籍。

3 学生培养与管理

西北联大在抗战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据西安临时大学二十六年(1937)度统计,在校学生人数(包括借读生)中仅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与农学、工程学以及医学的学生就有812人。其中数学系学生包括2名借读生(王傅林、段毓秀)^[9]在内,一年级9人,二年级8人,三年级6人,四年级11人,全系共计34人^[10]。1937年数学系毕业学生7人,分别在河南洛阳中学、四川碧山职业中学、西安临大文理学院数学系、河南邓县县立中学等单位就职。1938年初数学系又录取5名新生,即梁慧中、任井明、常友章、米钦堂、梁文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后,1938年度各院系录取新生414人,其中文理学院数学系10人,师范学院数学系22人,共计招生数学学生32人。据西北联大在校学生人数统计,本年全校包括正式、转试、借读、旁听学生在内,在校学生1114人,而习自然科学学生有370人(不包括农学、工学),其中文理学院数学系36人,师范学院数学系11人,共计47人。从数学系培养的毕业生来看,从1940年至1946年,历届毕业生人数为:1940年10人,1941年11人,1942年7人,1943年8人,1944年5人,1945年5人,1946年8人,7年时间毕业学生总计54人,加之1937—1939年期间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培养的毕业生,足有100多人。他们大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四川等地就职,为我国的数学发展与各地数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生管理方面,西北联大在全国大学中首创建立训导制度。1938年9月,西北联大“为积极训导学生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摄卫起见”^[11],组织训导处。为此,西北联大数学系亦严格施行导师制,在学校成立不久就为各年级学生聘任了导师,四年级导师杨永芳先生,三年级导师傅种孙先生,二年级导师张德馨、刘亦珩两先生,一年级导师赵进义先生^[12]。导师以个别谈话、个性考查、团体训导等多种方式指导学生,在思想方面养成研究之信仰、合作改进之精神,培养学生服务之观念;在治学方面,督导学生养成切实、虚心、创造之精神,培养学生寻求及探讨问题之兴趣与习惯,训导方式多种多样,成绩评价不拘一格。为了给予学生个性化的督导,导师们事先去明瞭学生之性格、思想、行为及学业,以对学生选系、选组、选课、改课及学业进修等事宜作周密一贯之计划,并尽可能事先预定谈话讨论或研究题目,督导学生举办各种谈话会、学术讨论会、读书会、研究会、服务团或远足会,逐渐使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科学修养,成为国家有用人才。

4 科学研究与学术演讲

西北联大在数学教育中不仅注重专业训练,而且注重师生学术方面之研究。教授们在勤于教学的同时,刻苦钻研,积极开展数学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发表出版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论文或著作。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国立西北大学的学术性刊物《西北学术》,创刊于1943年11月12日,“专以研讨学术,融合东西文化,扬民族精神”^[13]为主旨,至1944年2月因经费紧张仅出版了4期,但共载论文数41篇之多。其中每期都有数学系教授的科学研究成果,即杨永芳教授在第1期发表的《近代若干种点集之发现》,该篇论文对近代两种数学流派进行介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所产生的若干种点集,特别是直线上之点集合进行论证分析,这是集合论和拓扑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对于其集合论和拓扑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4]。在《西北学术》第2期有刘亦珩教授的《几个定理的新证明》,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微分几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西北学术》第3期、第4期还载有赵进义教授的《非完整质点系与阿伯尔氏方程式》以及傅种孙教授的《释数学》,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西北地区甚至全国极具代表性,反映了西北地区数学研究的主流方向,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科学的发展与传播。1944年10月,在国立西北大学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12届年会上,不仅宣读了物理系教授的8篇研究论文,还宣读了数学系教授的3篇,即赵进义的《太阳黑点》、《宇宙射线》,杨永芳的《抽象空间》等研究成果^[15]。数学系科学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些理论科学研究方面的论著,这些成果不依赖实验或较少受仪器设备限制,如傅种孙教授的《初等数学研究》、《罗素算理哲学》、《黑柏提几何原理》,刘亦珩教授的《微分几何学》,赵进义教授的《复变数函数论》、《椭圆函数数论》等^[6]。学校也特别注重学生的学术研究,如1945年数学系学生所作的“代数基本定理集解”、“Srrange氏方程式及其应用”等毕业论文,主要以数学教授们的研究方向以及在国内开创的研究领域为研究方向,紧紧围绕当时国际国内数学发展前沿问题展开学术研究。

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学术演讲大多围绕国防科学、文学与艺术以及西洋文化及历史、地理、资源等内容,特别注重西方文化科学的传播。西北联大曾两次邀请时在陇海铁路局工作的中算史家李乐知(李俨)先生作讲演。第一次是1937年12月29日在西安临时大学礼堂(今西北大学礼堂,作了题为《隧道工程》的演讲。第二次是1938年6月27日在城固西北联大大礼堂为全校学生讲演《中算的故事》^[16],使学生了解到中国古时算学之发达。推测在此间李俨被聘为国立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今可见到他于1950年11月在《中国科学》第一卷2-4期《中算家之平方零约术》一文的署名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大学数学系”^[17]。1938年暑期,西北联大对陕南六县举办小学教师讲习会,其中数学系主任赵进义作《科学价值》的讲演,讲师蔡英藩、王毓彪分别作《算术教材及教法》的讲授,以积极推行社会教育与地方中小学师资的培训。1942年12月25日是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日,国立西北大学数学学会与物理学会为了纪念伟大科学家牛顿,联合举办了专题演讲会,其中数学系主任赵进义作《由伽利略到牛顿》的演讲,论及牛顿在数学与物理学方面的科学贡献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1945年9月18日,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史专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来国立西北大学访问,并于18日在校本部大礼堂作《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论及科学与民主之关系,科学研究应具有之精神,还特别指出中国科学不发达之原因等科学问题,会后与教授座谈交流学术问题^[17]。数学系还开展数学社会教育,培训中学数学师资,每年暑假举行“西安暑期讲演会。傅钟孙教授发表在《西北学术》1944年第四期的《释数学》一文,就是他在三十二年度(1943年)西安暑期讲演会上的第一讲。该文论及“数学乃类名”、“数学无人神之见”、“数学中之名实论据”等何为数学、数学的本质等重要数理逻辑、数理哲学等内容,是他继所著《罗素算理哲学》之后的重要研究进展。

5 结论

西北联大数学教育尽管处在国困民敝时期,但是数学系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前进、自强不息,构建了西北地区比较完整的学科与课程体系。与1902—1911年西北大学之陕源陕西大学堂相比之下,此时期虽开设了算学课程,但课程设置单一,每周仅开设3学时的算学课程,还没有形成专门的数学系科,其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天文相关的算学,如测候、推步、元化、积微;师资主要来源省内选拔、外省聘用以及选聘日籍教习或留日学生,如当时本省的廪生王如波,山西省的癸卯科进士狄楼海,日籍教习足立喜六等人担任算学教学;其教学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特别强调精通儒学,其培养目标仅为陕西地方培养人才;学生来源主要是陕西中学堂的学生,培养的学生人数也极少。可以说,此时期的数学教育不是严格意义的高等教育。与1912—1937年陕源国立西北大学的数学教育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已存在数学高等教育,设置了专门的数学科,由熊庆来等教师担任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但其数学教育规模很小,学科、课题体系很不完善。西北联大在9年期间,数学课程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了代数、分析、几何等多学科领域与应用交叉学科;师资力量非常雄厚,研究领域广泛,大多是欧美留学经过专门的数学学习、训练与研究,他们在西北联大期间辛勤耕耘、严谨治学,传播数学知识,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的数学人才,服务西北,为西北地区数学发展以及完整的数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立五校时期各个学校的数学教育,均是由西北联大延伸而来,其师资常常是相互共用,如国立西北工学院所有工程学系开设的数学课程均是西北联大数学系教师担任,国立西北师院与国立西北大学从西北联大分出后,一直合班上课,教授互聘。如赵进义、傅种孙、杨新芳、张德馨、刘亦珩等教授在两校数学系互相兼课。由此可见,西北联大的数学教育奠定了整个西北地区数学教育的基础格局,使西北科学教育更加体系化、制度化。

感谢同门张必胜同学提供了李俨在西北大学兼职的原始文献线索。

参考文献:

- [1]李巧宁,陈海儒.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2):91-94.
- [2]苑旭森.浅谈西北联合大学[J].科教导刊,2011,7(中):253-254.
- [3]姚远.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增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6(6):6-10.
- [4]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24.
- [5]师范学院算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J].西北联大校刊,1939(8):23-24.
- [6]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299,300.
- [7]姚远.西北大学学人谱[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181-182.
- [8]王世强.数学基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纪念傅种孙先生百年诞辰[J].数学通报,1998(1):2-4.
- [9]编者.本校录取借读生名单[J].西安临大校刊,1937(3):9.
- [10]编者.本校学生人数统计[J].西安临大校刊,1937(2):9.
- [11]编者.训导处章程[J].西北联大校刊,1938(3):13-14.
- [12]编者.聘定文理师范两院系各年级导师[J].西北联大校刊,1938(7):24-25.
- [13]赖琰.题词[J].西北学术,1943(1).
- [14]亢小玉,姚远.《西北学术》与现代数学在西北的传播[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1(2):369-371.
- [15]校闻.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区分会胜利召开[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3):7.
- [16]编者.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中算的故事[J].西北联大校刊,1938(1):15.
- [17]李俨.中算家之平方零约术[J].中国科学,1950,1(2-4):295-323.
- [18]编者.美国李约瑟博士来校访问[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5):7.

Mathematics education of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LI Xiao-xia^{1,2}, YAO Yuan¹

(1.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mathematics education of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ly during Anti Japanese War, to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higher mathematics education of the Northwest area and China. The original journ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gradually formed multidisciplinary system and appl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for example higher algebra, higher analysis, higher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geometry, math statistics and so on; most teachers have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such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professors such as Zeng Jiong, Fu Zhongsun, Zhao Jinyi, Yang Yongfang, Liu Yiheng, Zhang Dexin were hardworking and conducted science research. They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mathematician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talents for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China.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not only constructed the comparatively perfect mathematical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introduced and developed wester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teachers of studying abroad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reby formed the basic pattern of higher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area.

Key words: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Science educati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物理学系概况

白秀英, 姚 远

(1.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渭南师范学院 物理学系,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 研究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物理系,为科学教育史研究提供线索和历史佐证。文献考证研究法。抗战时期的西安临大物理系,南迁汉中后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物理系,9位教授10多名教师先后开设了30多门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以及近世(代)物理、地球物理、物性学、量子力学等物理学前沿课程,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学、光学、物性学等10多种讲义,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十二届年会西北区分会,开展了原子弹之探讨、纪念伟大科学家牛顿等多个科学专题报告会,9年共培养85名毕业生的教学成就。国立西北联大物理系形成了初等、预科、本科的物理学教育体系,也形成了师资队伍、专业系科、物理学会及社团等制度化建设,其将欧美前沿物理学引入西北,为战后西北地区高等和初等物理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

1937年9月,由原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在西安组成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集四校一院的师资和办学经验,收容流离失所的战时沦陷区学生完成学业,后迫于战事复南迁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在西北坚持9年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与学界对西南联大研究的多部专著及多篇论文形成鲜明对比,西北联大的研究仅有姚远、谷雪艳和李巧宁等数篇论文而已^[1-3]。本文基于文献考证,对西北联大物理学系课程设置、师生组成和学术活动等进行梳理,以期勾勒其发展脉络。

1 西北联大物理学系的课程设置

1.1 西安时期物理学系课程设置(1937-09—1938-04)

西安临大是战时从平津沦陷区撤出临时筹建的,当时学校整个教学工作和教学指导思想,正如校方宣称的,凡所教学训遵之方,悉宜针对“国难时艰”,以厉行“非常时期之救亡教育”,各学程教材除普遍设置专业课程外,还特别设置以抗日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科目,以适应战时的特殊需要^[4]。物理系是在原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基础上成立的,校址在西安小南门外东北大学(今西北大学)借用部分新建校舍。开设专业课程主要有: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实验、力学、电磁学、电磁学实验、热学、光学、光学实验、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实验^[5]。由于受战乱、教学条件和师资影响,部分理论和实验课程有所删减。如删去了理论力学、物质动力论、电振学、近代物理导引等理论课程。但是,由于全国正处于全民抗战,学校却根据战时实际需要相应地增设了一些实用性课程,例如增加了无线电学原理、电工原理等选修课程,以加强学生对于专业研究的兴趣和应用能力的提高。

1.2 城固时期物理学系课程设置(1938-05—1946-11)

193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课程会议,于当月正式公布共同必修科目表,规定各校自1938学年度一年级新生起开始施行。物理学系根据共同必修科目表修改西安临大课程,城固时期的课程设置如下^[5]。

公共必修课程:党义、国文、外国文、本国文化史、算学、微积分、普通物理(附实验)、

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任选一门,化学、生物学、人类学任选两门,另有教育概论,哲学概论,西洋文化史,教育心理学等。

专业必修课程:普通物理学、电磁学、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无线电学原理、电工原理、物理教学法、无线电实验、近世物理、理论物理、物性及声学、电磁学实验、物理实验、光学实验及毕业论文、教学实习等。

专业选修课程:近世物理、电子论、量子论、物理学史、近代物理实验、实验技术、地球物理、天文学、天体力学、向量分析、复变数函数论、近世代数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外国文、机械画、金工、机工原理、电工原理。

由当时课程设置看,课程注重基础专业学科的训练,注重应用课程与物理学前沿知识的教学。选修课程门类较多,使学生容易获得较完善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早出人才或继续深造。从课程安排看,必修和选修课各占 1/2,其中专业理论、实验课程约占 65%,语言文字课程约占 35%。一、二年级主要是基础理论课,三年级时分组学习专业课,并确定主攻方向深入某一领域去钻研,四年级选定指导教师与论文题目,围绕论文写作,选修相关课程。从 1945 年物理系毕业学生论文选题看(表 1),学生选择的研究课题紧紧围绕当时的物理学前沿问题展开,与教授们在国外的研究领域或在国内开创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

表 1 西北联大物理学系 1945 届学生论文题目^[6]

序号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研究方向
1	定向广播	吕秉义	无线电
2	热电子放射原理之研究	岳劼恒	原子物理
3	波力学中物质波之讨论	谭文炳	量子理论
4	等斜度与等厚度干涉之比较	杨立奎	光学
5	原子构造概述	岳劼恒	原子物理
6	广义的 Newton 第二定律	吴 锐	力学
7	电子 e/m 比值之测定	龙际云	电磁理论
8	狭义相对原理在近世物理中之应用	张贻惠	相对论
9	Bohr 原子构造学说	蔡钟瀛	原子物理
10	狭义相对论原理之概念	张贻惠	相对论
11	原子构造与光谱	岳劼恒	原子物理
12	振荡与检波	吕秉义	无线电

2 物理学系师资及学生组成

2.1 学生概况

西安临大筹备伊始,教育部规定原 3 校学生自愿前往报到。这 3 所院校原注册好几千学生,来西安临大报名的只有部分学生。临大曾两次招考新生,总计录取新生 310 人,其中物理学系正式录取学生 7 名^[7]。据 1937 年 12 月学生人数统计看,物理系在校学生共 55 人^[8],其中一年级学生 7 人(借读生 3 人),二年级学生 12 人(借读生 4 人),三年级学生 12 人(借读生 4 人),四年级 24 人(借读生 1 人)。城固时期的西北联大物理系的本科生中包括学校正式录取和在读的正式生外,还有大量转试生、借读生和旁听生。据 1938 年上学期在校学生数统计,物理学系学生共计 48 人,其中一年级学生 13 人(旁听生 5 人),二年级 19 人(正式生 11 人,转试生 4 人,借读生 3 人,旁听生 1 人),三年级 11 人(正式生 10 人,借读生 1 人),四年级 5 人。学生分别来自全国 15 个省(山西 10 人,河北 9 人,河南 6 人,辽宁 5 人,陕西 3 人,江苏、四川、湖北、山东、黑龙江各 2 人,浙江、江西、甘肃、吉林和绥远各 1 人),在校年龄相差 10 岁,最小为 19 岁,

最大为 29 岁,25 岁学生数为最多,达到 13 人^[9],占学生总数的 28%。可见,抗战时期在校学生的平均年龄在 25 岁左右,学生流动较平时大,特别是毕业班人数,1937 年年底四年级学生数为 24 人,至 1938 年上半年学生人数仅为 5 人。

自 1938 至 1946 年,西北联大共毕业 9 届毕业生,物理系共毕业 85 人,其中原北平大学学生 14 人,原北平师大学生 15 人。有少数原三校学生于抗战时期在他校借读,完成学业后,根据规定发给原校毕业证书,上面的统计数字包括他们在内。与同时期西南联大(包括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物理学系培养 130 名毕业生相比(其中具有清华大学学籍的 36 人,具有北京大学学籍的 24 人,具有南开大学学籍的 2 人,具有西南联大学籍的 68 人^[10]),其本科毕业生人数和西南联大基本相当(西南联大有研究生)。根据 27 名有据可查的毕业生从事工作的统计,有 8 人在国内外高等学校物理学系任教;8 人在中国科学院和工业部门研究所任研究员;7 人献身于中学物理教育;3 人在工业和贸易部门担任负责工作;2 人担任出版社的领导职务^[11]。

2.2 师资组成

物理学系的教师大多来自原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和北洋工学院,他们追随学校迁徙临大任教,由于 3 校教授云集,将各大学有限的人力集中起来,为教授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增强了教学效果。临大时期,物理系教授有张贻惠、杨立奎、林晓、岳劫恒,讲师谭文炳。城固时期,由于西北联大文理学院物理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的分开,教授有所增加,吴锐、蔡钟瀛、张佩瑚、龙际云、张贻侗、谭文炳、王普、张宗鑫等,讲师吕秉义,助教 3~4 人,全系教师 10 人^[12](见表 2),主任先后由张贻惠、岳劫恒兼任。

表 2 西北联大物理系教师名录^[13-14]

教授	出生年	在校时间	原校	毕业学校、学位	讲授课程	备注
张贻惠	1886	1937—1940	北平大学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帝国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英国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力学、几何光学、相对论	1937—1941 年,兼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
蔡钟瀛	1887	1937—1946	北平师范大学	东京帝国大学	理论力学	
杨立奎	1888	1937—1946	北平师范大学	东京高等师范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	光学	
岳劫恒	1902	1937—1946	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	北京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光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原子物理、量子力学、晶体光学	1941—1946 年,兼任物理系主任
龙际云	1893	1944—1946	北京大学、北平中法大学、鲁苏皖豫边区学院	北京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与研究	
谭文炳	1904	1937—1946	北平师范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	物性学、近代物理实验	
林晓	1894	1937—1941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	大学物理	
吴锐	?	1938—1946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近代物理、光学	

张佩瑚	1896	1944—1946	北京大学、北平大学、鲁苏皖豫边区学院	北京大学物理系	力学、电磁学	
吕秉义	1913	1939—1946	北平师范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齐鲁大学	实用无线电学	
王普	1902	1940—1946	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研究院	燕京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德国威廉皇家研究院研究生, 科学博士学位	原子物理、核物理	
张宗蠡	1915	1942—1943	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统计物理、量子场论	实为外聘教授, 并未曾授课

西北联大留学欧洲的博士、教授3人(岳劭恒、王普、张宗蠡),余均为留学日本或毕业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先后在西北联大物理学系任助教、讲师、教授等。他们常在临街陋巷里精心备课,在油灯或土产蜡烛的微弱灯光下看书或批改作业,勤于教学、严格要求学生,学校的学习风气日渐浓厚。学生们课前争座位,课后对笔记,图书馆座位常抢不到手,茶馆就成为学生讨论问题和学习的场所。正是在有渊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和学为人师,行为人范的老师熏陶和感染下,培养出学生们扎实的专业知识,使西北联大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中仍能保持高质量的教学,为战后西北物理学科的发展快速跟上较发达地区、物理学师资队伍及物理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实验设备及图书资源

3.1 实验仪器

西安临大时期,由于3校原大量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来不及搬运,运出的仪器也多半破损等,实验器材缺乏。但是,物理学系秉承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的宗旨,在仪器缺乏、实验课程难以开出时,借用东北大学电机实验室以及物理实验室,重视实验课程的教学。城固时期,学校成立仪器委员会,聘请刘拓、蹇先器、张貽惠、杨立奎、郭毓彬、程克敬等9位教授为委员,负责全校实验设备的购买并带领学生自制教学仪器^[15]。1942年底,委员会由成都购回理化仪器4箱,以后逐年陆续购置少量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仪器设备。物理系还指定专人在香港订购了图书仪器,但是,由于经费和旅途遥远,仪器设备添置不多,虽然有部分自制的仪器,实验条件仍然相当简陋。实验教学由于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不少基本实验项目不能进行,个别实验课程仅有一两台仪器,学生只好轮流操作或观看。

城固时期物理系实验室分普通物理、电磁学、无线电、光学四部分,仪器390种。其中力学类有各种天秤、滑车组、螺旋测微器等64种;水力学类有比量瓶、固体比重浮称等4种;热学类有蒸汽箱、金属线膨胀测定器及温度计等38种;音学类有棒振器、音叉等29种;光学类有放大镜、望远镜、折光仪及偏光仪等44种,磁学类有无极磁表、磁针倾表及磁力针等16种;电学类有电流表、高压蓄电器等106种;无线电类有各种振荡器、收音机、语言扩大器等62种。此外,尚有工具27种,药品58种,借用仪器计大型电机变压器、电机开动器、电流转换器等20种。除天秤等100余种为购置者外,余均系自制^[16]。对比1945年全校其他系实验仪器的统计,化学系当时有实验室2个,药品400余种,分析天秤等仪器178种;生物学系实验室2个,显微镜、解剖镜等普通仪器36种,普通用具34种,挂图切片骨骼等28种,生理仪器54种。比较可知,战时物理学系仪器设备虽然简陋,但较学校其他理学院系可谓较好,这也反映当时物理学系注重学生实验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

3.2 图书资料

抗战前,大学教学多数都没有教材,主要靠教员口授,或直接选用国外原版教材,甚至用以说明原理的例证以及教师指导学生研究的题目,大都采自国外。西北联大成立时,学校即成立了图书委员会,拟定了图书杂志购置费以及图书阅览规定。但是,图书馆馆藏图书远满足不了教师和学生的借阅需求。由当时图书馆馆藏书目可知,物理类相关中外文图书数目仅有 50 多本,按当时的教师和学生总数平均,几乎达不到人均 1 本。从馆藏版本看,外文版本占总量的 75%,当时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中文版数量为 9 册,馆藏书目数量最多,为当时学生的物理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由于学校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和对外交流极为不畅。在缺少现成教材和图书资料的艰苦情况下,物理学系主任岳劼恒利用自己擅长英语、法语的特点,参阅外文教科书,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等 10 多种讲义,解决师生在教和学方面缺少教材的困难。谭文炳教授在讲授《光学》时,学生提出听了课就记不了笔记,希望打印教材。他接受学生建议编写教材,每日 3 000 字,并亲自负责校对蜡纸,直到 30 万字的教材写成为止。他一生编写过《声学》《光学》《物性学》《理论力学》等逾百万字的讲义,其中以《理论力学》讲义最为完善,在全国高校广为交流,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安排出版,但要求他编写配套的习题。由于工作忙一拖再拖,出书的事遂搁浅。事后有人问他是不是后悔时,他却说:“五千弟子就是我最好的一本书。”

4 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

西北联大物理系教学与研究是分不开的。城固时期全校性的学术刊物有《西北学术》,创刊于 1943 年 11 月,正如发刊词中言:“西北大学为西北最高学府,过去数年对于学术颇少贡献”,今者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先办本刊。”由于该刊专以“研究学术”,又融合“东西方文化”而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故取名西北学术。此月刊虽发行 4 期,但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发表论文达 41 篇。其中罗仲言(1896—1995)的《磁针与火药考》,张贻侗的《偶极矩与分子构造》,岳劼恒的《酒石酸甲酯之旋光研究》,虞宏正的《不溶性气态表面膜压力之热力学的推论》等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系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17]。同时,为大力提倡学术研究的风气,《西大校刊》上也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如岳劼恒的《原子能及其应用》等文章。学校还号召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要求师生间应彼此以学术为目的,多作学术讲演式的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全校性的学术讲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围绕抗日民族战争的战局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进行的“时事讲演会”,如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战局和日美战争诸问题,抗战胜利后有关国内和平、民主问题等。二是围绕学术问题进行的各种专题科学报告会,如“日蚀”观测问题、太阳“黑子”问题、原子弹之探讨问题等。1942 年 12 月 25 日,牛顿诞辰 300 周年的纪念日,数学学会和物理学会联合主办“纪念伟大科学家牛顿”的专题报告会,赵进义教授作“由伽利略到牛顿”,岳劼恒作“近代物理学中之不连续概念”,谭文炳作“牛顿生活”等演讲,物理学会出刊《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壁报》^[18],岳劼恒撰文“纪念牛顿诞生三百周年”。1945 年 9 月,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央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访问西北联大,并于 18 日在大礼堂作“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会,概述了科学与民主之关系;科学研究应具有之精神;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及今后世界之展望等,内容简介透彻,立论平允,并向学校图书馆赠送英文书刊数百册^[19],增加了全校西文图书的比重。因交通不便,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抗战期间分区举行,西北区第十一、十二届年会均在城固西北大学物理学系举行^[20],年会由物理学系教授岳劼恒负责召集,吴锐、张贻侗、蔡钟瀛等筹备,敦请龙际云、张佩瑚、谭文炳、吕秉义、赵恒元、光开敏、潘湘等协同办理,参会会员 19 人(包括西北联大物理教员及附近各中学物理教员),宣读论文 8 篇,有力地促进了西北物理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会议

依物理学会西川分会之例,成立了西北区物理分会,并推举张佩瑚为文书,龙际云为会计等,辅助西北各省区物理学教育工作^[23],为西北地区物理学会的成立和物理学科的发展、学术交流和科学考察奠定了坚实基础。

表3 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十二届年会西北区分会一览表

年会界次	开会日期	到会人数	论文数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年会主席
第十一届	1943年9月26—27日	19	14	虞宏正	不溶性气态表面膜压力之热力学的推论	岳劼恒
				岳劼恒	融化的 $\text{Na}_2\text{SO}_4 \cdot 10\text{H}_2\text{O}$ 及 $\text{CaCl}_2 \cdot 6\text{H}_2\text{O}$ 中之冰点分子量测定法	
				岳劼恒	酒石酸甲酯之旋光研究	
				岳劼恒	Biot—germoz 型复杂化合物之旋光的研究	
第十二届	1944年10月8日	18	4	龙际云	电解质溶解析光指数与浓度之关系	岳劼恒
				吕秉义	电话传送导线之放射场	
				岳劼恒	有旋光性正负游子旋光性之研究	
				祈开智	粘滞流体之动力	

5 西北联大物理学系对西北高等教育物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意义

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速成师范馆数学物理部招生,是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的开端,但当时挂名在理科之下,没有独立设置物理学系。1918年,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成立并招收了中国最早的物理学本科生,标志着中国物理学本科教育的发端。抗战前,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20余所高校设置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但是,这些独立设置物理学系的高校集中在东部及沿海地区,西北5省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设有物理学系(当时西北仅有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大学一所高校,设有文史、法律、教育3系,学生180余名,直至1946年8月,才设有物理系科)。因此,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物理学系的招生和教学,开创了西北地区物理学科体系和物理学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标志着物理学科教育及学科建制在西北地区的生根发芽。西北联大物理学系9年的办学经历和经验,将先进的物理学知识及课程、实验教学和图书资料、师资队伍、物理学分会及科学报告活动等引入西北地区,成为西北5省物理学系科设置、体系建制领域的拓荒者,对西北地区高等物理教育具有重要的发轫作用。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物理系及物理学会是抗战时期国内南北最大的两个物理教学和研究中心,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们坚持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延续了近代中国物理学教育的火种,为战后中国培养出众多的科学人才和物理学专业人才。由于当时的大学物理教育仍处于发展过程中,西北联大在追随国外大学物理教学的同时,注重基础学科教学与实验课程的开设,重视实验室、教材和图书资料建设。物理系教授中有对我国物理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元老张贻惠,抗战前后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入美国大学的杨立奎、蔡钟瀛等,也有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的岳劼恒、吴锐等,他们学贯中西,研有专长,专心教学和青年教师的培养,关心学校教材建设和实验仪器的购置与制作,所开设的课程大都具有很强的

启发性。指导学生的论文领域既有他们在国外所做领域的延续,也有在国内开辟的新领域。与西南联大相比较,西北联大教师多为留学法国、日本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精心备课、勤于教学,培养的85名优秀毕业生,大多数毕业生终生扎根在西部坚持物理教育,充实了西部物理教育和物理师资队伍,参与创建了多个西部高等院校物理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所的创设。尽管战时与外界的交流不尽畅通,但由于物理、数学教授云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十二届年会西北区分会的召开等,促进了西北区物理分会的成立和西北各省区物理学师资队伍的交流,为西北地区高等物理教育和初等物理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战后西北物理学发展和教育快速跟上较发达地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 [1]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24.
- [2]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3):62-64.
- [3]李巧宁,陈海儒.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2):91-94.
- [4]编者.本校布告[J].西安临大校刊,1937(1):3.
- [5]编者.师范学院理化系必修选修科目表草案[J].西北联大校刊,1938(8):25.
- [6]编者.毕业论文题目[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4):5.
- [7]编者.本校录取新生名单[J].西安临大校刊,1937(3):7.
- [8]编者.本校学生人数统计[J].西安临大校刊,1937(2):9.
- [9]编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上学期在校学生人数、籍贯、年龄统计表[J].西北联大校刊,1939(9):17-19.
- [10]陈家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人才培养及研究工作[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4.
- [11]编者.三十三年度毕业生就业调查[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6):7-8.
- [12]编者.本校教职员录[J].西安临大校刊,1938,4:10.
- [13]编者.本校新聘教职员工[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2(2):3.
- [14]编者.教职员统计[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5):3.
- [15]编者.本大学仪器委员会成立[J].西北联大校刊,1939(11):4.
- [16]编者.学校各院概况[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4):4.
- [17]姚远,徐象平.《西北学术》的科技内容及其主旨[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3(4):493-495.
- [18]岳劫恒.纪念牛顿诞生三百周年[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3(5):4-5.
- [19]编者.美国李约瑟博士来校访问[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5):7.
- [20]编者.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年会在本校举行[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2):8-10.
- [21]编者.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区分会胜利召开[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3):7.
- [22]虞宏正,岳劫恒.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西北区分会论文概要[J].西北学术,1943(2):52-56.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of National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BAI Xiuying^{1,2}, YAO Yuan¹

(1.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 Weinan 714000,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of National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in order to provides clu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of Chinese wartime Science and history of education.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Results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ational Xi'an Temporary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Physics was renamed as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after moving to Hanzhong, nine professors and 10 teachers opened more than 30 specialized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courses as well as cutting edge physics courses such as Modern (generation) physics, Geophysics, Atomic physics, Quantum mechanics. Professors wrote more than 10 kinds of handouts such as Theoretical mechanics, Thermal, Optical, Atomic physics, held two the Eleventh and the Twelfth, held the study of the atomic bomb, commemorated the great scientists Newton and other scientific presentations, trained 85 graduates of physics in nine years.The primary, preparatory, undergraduate physics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set up in Department of Physics,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which has also forme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faculties of Physics, Associations,etc. Cutting edge phys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as introduced in Northwest of China,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ost war higher and elementary physics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Xi'an temporary University;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ysics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地质地理学教育

李晓霞^{1,2}，姚远^{1*}

(1. 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2.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 整理研究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教育,为西北地区及中国科学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线索。**方法** 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结果** 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教育逐渐形成了地形学、气象学、经济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体系。其教学师资均是留学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国的地质地理学专门人才,以黄国璋、郁士元、殷祖英、张伯声等教授为代表,他们将西方先进的地质地理科学引入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开展科学研究,为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专门人才。**结论** 西北联大不仅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地质地理学教育的基本格局,迅速提升其整体高等地质地理教育水平,而且为西北地区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与完善的高等科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 西北联大; 地质地理教育; 科学教育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从1937年至1946年在西北地区生存发展9年之久,历经西安临时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临大”)、西北联大以及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三个时期。在此期间,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学教育不仅支持和延续了我国的高等地质地理学教育,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地质地理科学教育的发展。但是,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却很少,仅有极少数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1-5]。本文基于原始文献分析与考证,以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学教育作为研究视角,对其课程设置、师资组建、学生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等进行梳理,以探讨西北联大地质地理教育对西北科学教育体系建构的历史贡献。

1 地质地理系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设备

1.1 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

西安临大时期地理系是基于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地理系组建而成的,只设有专科。地理系成立之初开设的课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为他系以本系作副系之同学设立必修课程数种,即地理学原理及外国地理两科目;二是为本系专科学生设置的专业课程,一年级设有自然地理、自然地质、气象学等科目,二年级设有经济地理学、亚洲地志、欧洲地志、中国地理总论、地理测绘、地图绘读等科目,三年级设有北美地志、中国区域地理等科,四年级设有地理研究法、地理教学法,政治地理等科目^[6]。至西北联大时期,即1938年时,地理系的专业课程设置有所变动,一年级增设人生地理,每周学时6小时,由时任主任黄海平讲授,并将普通地质学原为每周学时4小时改为2小时,由学校原第二院授课移至第三院上课,课程教学由郁士元教授担任;二年级的经济地理由英庚款第一届地理门考取之留英归国教授袁寿椿先生担任;三年级增开拉丁美洲科目,每周学时3小时,由时任主任黄海平教授讲授;四年级增加地理教育实习及实习讨论,每周8小时,由黄海平、王钧衡及王化三先生担任。并增开非澳两极,每周3小时,由原为东北大学教授郑励俭先生担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XXW004);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计划(11JK0324)

作者简介: 李晓霞,女,甘肃白银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史研究。

通讯作者: 姚远,男,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史与科学教育史研究。

任^[7]。由地理系的课程设置来看，(1) 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虽没有地质系，但已设有地质学的课程，如自然地质、普通地质学，其他一些课程与地质学亦紧密相关，为之后地质学科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 课程所研究的地域范围非常广，不仅详细教授中国区域地理学，而且还对亚洲、欧洲、非澳两极的地理情形及地志进行讲授，极大地扩展了课程研究的领域，也开阔了学生的学科视野，也由此可见，此时期区域地理学发展鼎盛，为区域研究服务，是地理系的主要专业课程，这与当时中国区域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是分不开的；(3) 开设的课程不仅注重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还特别注重地理学教育人才的培养，如地理教学法、地理研究法课程的开设以及教育实习的增加。

1.2 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

国立西北五校时期，地理系改称地质地理系，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必修与专业选修，专业必修课设有：地理学、地理通论、地质学实习、矿物学、测量学、测量实习、地形学、气象学、北美地理、非澳地志、中国区域地理、澳州地理、政治地理学原理、地理教授法与教材研究、毕业论文等；专业选修课有西北地理等。^[8]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课程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地质学与地理学分组开课，地质学的课程明显增多，逐渐形成地质学课程体系的建制化；其二，区域地理学专业与选修课程均有增加，如澳洲地理以及专门为西北地理研究服务的西北地理选修课程的开设。20 世纪 20-40 年代正是区域地理学在中国地理学中占据核心位置、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而西北联大紧跟而上，特别发展西北区域地理学。由以上地质地理学系的课程设置可见，从专业来看，已形成了地质、地理两门专业学科；为之后地理学的分支领域，如地形学、气象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分化、独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前，全国仅有地质学系 7 个，而抗战期间增加了 3 个，西北联大地质学就是其中之一。表 1 是 1940 年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科目及教材表，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地质地理课程的教材非常缺乏，师生所用课本依然以教授编印的讲义、大纲以及学生笔记为主，所使用的教学参考书主要是国外英文原著或日本著作。

表 1 1940 年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科目及教材表

科目	课本	参考书
中国区域地理	笔记	Little, A: The Far East. Buxton: China. G.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Richard: Comprehensive of Chense Empire.
地形学	笔记	De Martomme: A shorter physical Geography. W.M.Davis: Elementary physical Geography. Pirsson & Schuchert: Text-book of Geology, Part II. Mauil: Geomorphologre.
政治地理	编印讲义	苏馨氏著：政治地理学纲要 饭本信之：政治地理学
气象学	编印讲义	Geddes: Meteorolosy. Kendrew: Clinmate.
西北地理	编印讲义	多方面的搜集
地质学	编印讲义	Text-book of geology-A.W.Grabau. Text-book of geology-Pirssonand Schuchert. Text-book of geology-Longwell. Plane surveying-Tracy. Surveying-Breed & Hosmer.

		Surveying-Davis Foote & Ruynner. Mineralogy-Lana. Study of Minerals & rochs-Rogers.
北美地志	编印讲义大纲	U.Rodwell Jones and P.W.Bryard North America.
专题研究	笔记	

地理系成立之初教学设备非常缺乏,通过学校购置仪器设备逐渐扩充、实验环境日渐完善。至 1945 年统计,地质地理系已建成绘图室、地质实验室等,测绘仪器有倾斜仪、照准仪器共 17 种,各地图标本共 5 集,地质实验室有矿物标本 60 余种,另外建成的绘图室专以备绘制图表,地质地理系还存有轴图 150 余种,均系本系师生自制。^[9]本系也常因为缺乏图表加之购买不易,因此还专门招考绘图员,自行绘制图表、世界气候区域以及世界土壤分布等挂图,以资应用。本系还购买了大量地方志书,堪作历史、地理、地质研究者之参考。

2 教师资源与教学

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的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荟萃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扎根西北地区,传播地理地质科学,促进了战时西北区域地理地质科学研究的发展。西安临大时期教授有黄国璋、谌亚达、殷祖英、王钟麒等 4 人,副教授郁士元 1 人,助教姜玉鼎、王心正 2 人。^[10]西北联大在城固时期,地质地理系主任先后由黄国璋、殷祖英教授兼任。谌亚达、杨曾威、郁士元、董绍良、王华隆、张伯声、李善棠、何作霖、王庆昌、李式金、王均衡等先后任教授、副教授。全系教师一般有 11—14 人。^[8]这些教授均毕业于中国知名学府,大都留学于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国著名学府专攻地理学、地质学,在地形学、经济地理学、世界地理、中国区域地理以及地理、地质学领域很有研究。如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教授在地理学许多领域颇有建树,是中国现代地理科学的先驱,是最早将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理论传入中国、引导地理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学者之一。1926 年赴美留学,先后入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学专攻地理学,师从著名经济地理学家 E.Huntington。在此期间他研究了大量欧美近代地理科学书籍资料,实地野外考察美国的港口、草原以及大峡谷等,习得先进的野外考察研究方法 with 绘图技术,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8 年归国之后,相继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西安临时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和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系主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主任。1940 年起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11]他注重于实地考察和社会考察,这对中国古代记述性地志学的改造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代表性著作有《社会的地理基础》《我国国防地理》《中国地形区域》《爪哇低纬农业的研究》等。在《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会刊》等刊发表有《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上海港地理位置的择因因素》等论文。^[11]他还非常重视地理学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地理科学普及,力主创立地理丛刊委员会、中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与课外读物编纂委员会,出版了《河北地形图》、《亚洲地形图》和其他教学用图。由北平师范大学 1937 年 1 月创刊的双月刊《地理教学》,在因“七七事变”仅出版 4 期后而停刊,在城固时期由黄国璋教授主持复刊,该刊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学类刊物,对抗战时期的地理学教育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地理学的研究。在西北联大任教期间,为西北地区地理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比如地理系郁士元教授,生于 1900 年,字维民,江苏盐城人。1923 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师从地质大家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翁文灏、格路高(德国人)等,历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兼任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曾公派赴日本考察学习。1937 年抗战爆发,郁士元先生来到陕西,先后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大学教授。西安临大成立初期,还没有地质学,到陕南城固时,西北联大增

设地质学，设有地质地理系。在此期间，郁士元教授认为将地理学与地质学合在一起不利于两个专业的发展，遂建议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将其分别设系，他还向原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老师和同仁、时任国民政府高官和国家地质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许杰等反映情况和进行呼吁，^[12]不久地质学专业分化独立成系，郁士元兼任代理主任。抗战期间，国立西北大学地质系曾几度濒临停办，郁士元先生积极奔走呼吁，才使其得以生存。由于战乱，当时地质系很难招到学生，每年录取新生不过 10 人，少时仅有 3 人，但他坚信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建设必定需要地质人才，因此他坚持教学。可以说，国立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创建与其之后的发展，与他的开创奠基之功、坚持不懈的教学是分不开的。国立西北五校时期，他任西北大学教授、代理系主任时，还兼职任教于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在教学中，他先后主讲过中国地质与有用矿产、普通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质测绘学、工程地质学等多门课程，^[12]他还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实践，常去陕南秦岭、汉中梁山、关中骊山等地进行实地勘测考察、深入研究，发表了学术成果《西安附近的地质简述》、《汉中梁山地质》、《城固地形图》、《勉县煤矿区之地质》等多篇论文，为西北地区地质学科的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理学教授殷祖英，生于 1895 年，号伯西，河北房山人。曾入天津第一师范、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学习。1921 年起，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助教、北京及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讲师、河北省教育厅秘书科长。1934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研地理学。^[11]期间曾考察欧美亚非 20 余国。抗战爆发，随校迁陕，先后历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在西北大学担任地质地理系主任为时最久。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他在西北大学期间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甘、宁、青、新，进行实地考察，测绘地图。返校后作数次学术讲演，详细介绍两疆物产、油矿资源及其民族特性等，并呼吁同学远征天山，建设西北。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中学教科书著有《世界地理》、《欧洲地理》、《初级中学教本世界史》、《世界历史》等。地理学著作有《新疆及额济纳地理考察报告》、《台湾的自然条件与资源》、《我国的资源地理》等。学术论文有发表在《西北学报》、《科学大众》等刊的《战后国都》、《西北学会成立的意义》、《回疆典型之吐鲁番盆地》以及《我国自然条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等研究成果。

再比如地质学教授张伯声，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家。1926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专攻化学，获硕士学位。1928 年考入芝加哥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师从岩石学家约翰逊教授、构造地质学家坎伯仑教授攻读地质学，后又转入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深受地质学家维里斯、布莱克卫尔德教授的教诲。1930 年回国后，先后任焦作工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河南大学、北洋工学院教授。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内迁西安，历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教授，1939 年任国立西北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岩矿教研室主任。在西北联大执教期间，他不仅为西北为国家培育大批的地质英才，而且专心于地质科学与实践研究，重新厘定了“汉南花岗岩”年代为前震旦纪，为“汉南地块”概念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解放后在豫西地质矿产考察时，发现了平顶山煤矿和巩县铝矿，发现“嵩阳运动”界面以及之后发现的“黄土线”，使其重建黄河河道发育史。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创建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为我家地质学理论、矿产及工程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地质论评》等刊发表有《陕西汉中区之前震旦纪地质》《中条山的前寒武系及其大地构造发展》《从镶嵌构造观点说明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特征》等 90 余篇论文。著有《中国地壳的波浪运动说》《地壳波浪与镶嵌构造研究》《张伯声地质文集》《地壳波浪与镶嵌构造研究》第 2 集等专著^[11]。

3 学生培养与管理

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地质学、地理学人才。西安临大成立之初，学校还没有地质学，仅有设在文理学院的地理学系。西安临大曾两次招考新生录取 311 人，其中地理学系正式录取新生 12 名，即韩芳、赵凤藻、陈元德、王建华、史立常、王秉成、李存禄、白健、李永声、唐思锐、苗树屏、庞不统，备取新生 1 名方澄敏。^[13]截至 1937 年 11 月 25 日，当时地理系各班均已超过 5 人，共到学生 30 名，计一年级 8 人，二年级 6 人，三年级 6 人，四年级 10 人，其中男生 27 人，女生 3 人。^[6]据西安临大二十六年度（1937）在校学生人数统计，地理系已有学生（包括借读生 1 人）41 人，其中一年级 16 人；二年级 6 人；三年级 8 人；四年级 11 人。本年度毕业的地理学学生有牛傅钦、郑象铕、赵廷鑑、荣若绅、黄绍鸣、梁广模、韩宪纲、王毓梅、梁祥厚、卢惠如等 10 人，分别赴陕西延安、陕南城固、广西、湖南、贵州等省就职。地理系 1938 年 1 月统计本系学生籍贯分布情况，全系 43 名学生分别来自全国 15 个省，即河南、山东、江苏各 6 人，河北、山西各 4 人，安徽 3 人，陕西、湖北、湖南、广西、辽宁各 2 人，福建、绥远、吉林、黑龙江各 1 人。^[14]据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1938）上学期在校学生人数统计，地理系一年级录取的正式学生 4 人（男生），旁听生 1 人；二年级正式学生 9 人（男生 6 人，女生 3 人），转试生 1 人；三年级正式学生 8 人（男生 6 人，女生 2 人）；四年级正式学生 6 人（男生 5 人，女生 1 人），借读生 1 人。总计正式学生 27 人（男生 21 人，女生 6 人），转试 1 人，借读 1 人，旁听 1 人，全系共计学生 30 人。并为各年级皆聘任了导师，四年级与三年级导师谌亚达，二年级导师殷祖英先生，一年级导师黄国璋先生。^[15]至 1939 年 1 月，据西北联大统计，地理系学生籍贯主要分布在 13 个省，即江苏 5 人，陕西、河北各 4 人，河南 3 人，安徽、湖北、山东、辽宁、绥远各 2 人，山西、福建、广西、黑龙江各 1 人。^[16]由两次学生籍贯统计来看，当时招生范围较广，基本面向全国各省市，地理系生源河南、江苏居于首位，在城固时期及后期陕西本省学生比例上升，生源比例变化较大，学生流动性强，此无疑受到战争的影响。

城固时期，西北联大增设地质学，与地理学归为地质地理系，属理学院。学生一般有 60-70 人，在专业设置上分为地质和地理两组，学生人数基本各占半数，地理组学生相对地质组稍少。由于学生对于学习地质的兴趣很高，所以地质地理系一成立，便有从原地理系以及焦作工学院中的一年级同学转入，因此地质组当年便有二年级学生。^[17]1944 年地质地理系地质组学生 35 人，地理组 33 人。1945 年地质组学生 34 人，地理组 24 人。国立西北五校独立合作时期，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培养的历届毕业生人数如表 2，由此可见，从 1940 年至 1946 年国立西北大学培养地理学毕业生 45 人，而地质学仅从 1943 年有毕业生，至 1946 年已培养毕业生 35 人，在 7 年之间，地质地理学系已培养毕业生 80 人，加之 1937-1939 年毕业的地理学毕业生 40 多人，西北联大在 9 年期间共培养地理、地质学毕业生 120 多人。1937-1945 年的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相比，虽招生人数有 615 人，但毕业人数仅 160 人^[18]，与其相比，西北联大在抗战最艰难时期能培养如此一大批地质地理学人才，实属不易。

表 2 1940-1946 年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历届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毕业年份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总计
地理组（系）	8	11	9	4	5	4	4	45
地质组（系）				9	10	14	2	35

4 科学研究与演讲

在科学研究方面，地质地理系因地制宜，注重实地考察、设立专题讨论，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北联大南靠秦岭，北依黄土高原，对于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看说是难得的天然实验场所。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时期，地理系非常注重野外实践，师生常前往陕南、关中地区开展调查研究，以训练学生实地调查技能及明了当地农村地理详情，1938年7月地理系郁士元教授率领一年级普通地质班学生对定军山、高家泉一带进行地质考察，鉴别地层，采集岩石标本作以研究。国立五校独立合作时期，1944年地质组师生利用汉中盆地对其作自然地质情况调查，调查范围自盆地东口黄金峡至西缘定军山，再由秦岭南麓至巴山北坡一带，考察亦称精详，收获盛丰，著成《汉中盆地地质》论文，内容充实，对地质学界贡献亦多，不失为研究盆地地质之珍贵资料。^[19]地理组教师为启发学生研究学术兴趣起见，特别设立专题研究班，每两周举行1次，每次2小时，教师先作学术讲演1小时，后师生共同讨论1小时，除一年级学生之外，其余师生全部参加。所讲主题为：新疆人文地理的分析、国防经济地理与地理经济学、东北边疆问题、金沙江河流争夺问题、生物地理在自然地理中之地位问题、中国雨量之研究、气候分类问题、影响大气变化之因素问题。^[19]而此种讨论研究方法，在当时全国各大学的地质地理系中尚属首创。也因此地质地理系的学术气氛日渐浓厚。在《西北联大校刊》第9期上发表的地质学科学论文有郁士元教授的《勉县煤矿区之地质》。郁士元教授率领师生对汉水之南（巴山山脉）及汉水之北（秦岭山脉）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作以学术之探讨。《勉县煤矿区之地质》正是对勉县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该文首先对勉县煤矿区域所在进行了分析与确定，进而对煤矿区之地质进行了论证分析，指出该区地层除煤外，大部分为砾层、砂层及少许之页层，产侏罗纪化石，其生成时代当为中生代之侏罗纪地壳运动之影响，且有剧烈之变质，多成绿色片岩及石英片岩等变质岩，煤矿区内之水成岩，（即砾岩砂岩页岩等）受其影响，地层扭曲最烈，成斜度甚大致向斜层及背斜层，故煤层亦随之而倾斜，^[20]该区之地质构造如剖面图1所示。并对煤质煤量进行了考量分析，确定煤质尚好，色黑有光，矿量尚不算少，煤有数层，厚度不一，可为工艺及燃料之用。这一煤矿地质的深入分析不仅对煤矿实施开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地质构造对煤矿产生之影响以及山带地质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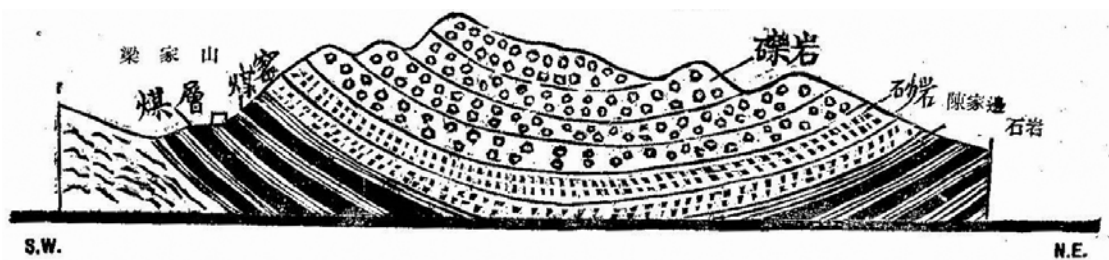


图1 勉县地质构造剖面图

1939年7月，创刊于1937年1月的《地理教学》在城固复刊，由西北联大地理系编辑出版，主任黄国璋教授主持并撰写复刊词，期次接续原刊，序为第1卷5、6期合刊，复刊号刊载了地理系教授的10篇学术论文^[21]，即黄国璋教授的《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地中海问题之地理背景》，谌亚达的《对日抗战与中国地理》，殷祖英教授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郁士元教授的《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卢惠如、黄绍鸣《南郑商业地理》、姜玉鼎《地理教学经验谈》，郑象铤《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刘慎鄂、薛貽源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等文。1941年9月21日，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师生在城固汉江滨观测

研究千载难逢的日蚀，其观测研究内容主要有：日食时气温变化、日食时光度变化（天空亮度测定）、日食时摄影、日食时天电干扰以及日食过程各项时间测定等，师生们并将其观测结果作以分析撰写成研究报告，在《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第1期上发表。在创刊于1941年5月的《西北学报》第1期上发表有殷祖英教授的《由地理上认识西北》，在1943年《西北学术》复刊上发表有殷祖英《论战后国都问题》、《回疆典型之吐鲁番盆地》，王钧衡《甘肃境内黄河航运的地理根据》，李式金译《中亚草原沙漠》（G.B.Cressey 著），张伯声教授的《陕南砂金》。除此之外，还有殷祖英教授的《西北地理及政治地理》，郁士元教授的《城固地形图》，张伯声教授的《陕西城固地质略志》、《陕西城固古路坝之砂砾层》等其他科学研究成果。地质地理系也非常注重学生学术研究的养成，常开展专题探讨，学生毕业选题主要围绕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当时野外调查结果，如1944年地质地理系学生所作毕业论文有^[22]：宝石的研究、中国震旦纪地层的分析、中国之钨矿、青藏矿之研究、中国石油地质、棉花地理的研究、锑、中国煤矿的分析、陕西渭惠渠沿渠地质、陕西经济地理等论文。

地质地理系为弥补教学之不足及增进本系学生西北知识起见，常举行公开学术演讲。从西安临大成立至1938年3月，已举行七次公开演讲（如表3），黄国璋主任敦请中央农矿部地质调查所专门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的孙健初先生、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队长史悠明、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李仪祉与刘钟瑞工程师等专家作了西北地区地理、地质、水利等演讲，并以各种图表照片详为说明。1938年暑期，在陕南六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上黄国璋主任、殷祖英教授作了地理学、史地教育与战争等方面的演讲。1939年1月西北联大导师会在文理学院举行国语演说竞赛会^[23]，讲演成绩经评定优胜者有4人，其中有地理系三年级学生薛贻源。1945年5月，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殷祖英教授在本校国父纪念周大会上作题为《从地理上解除日本之武装》的讲演。地质地理系学生对于时事研究亦甚为浓厚，于1943年12月请系主任殷祖英及其他教授出席举行时事讲演会，作以“关于太平洋战局之地理背景问题”的讲演。^[24]这些演讲不仅开阔了地理系学生的视野，增进了对西北科学知识的了解，而且大大地补救了抗战时期在教学上的诸多不足。

表3 西安临大地理系公开演讲^[7]

次数	时间	演讲者	题目	地点
第一次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仪祉、刘钟瑞先生	泾惠渠之水利问题	第三院
第二次	一月十一日	刘慎镠先生	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	第三院
第三次	一月二十一日	(Dr.Richardson) 理查逊博士	甘肃之地理与农业	第三院
第四次	一月二十九日	刘钟瑞先生	渭惠渠工程概况	第三院
第五次	二月九日	史悠明先生	甘肃青海两省之见闻	第三院
第六次	二月十一日	孙健初先生	甘肃青海两省之地质	第三院
第七次	二月十五日	(Dr.Willer) 卫楼博士	中国西北部之地形	第三院

5 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困民敝，西北联大的地质地理教育却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诞生与发展，不仅成就了西北地区高等地质地理学科的开端，而且为西北地区地质地理教育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与1902-1911年的西北大学之陕源陕西大学堂相比较，这一时期的陕西大学堂在科目和课程设置中多以中学为体、伦理为先，次及经猷材艺。在陕西大学堂总教习屠仁守拟定的课目中，将中学科目分为4门16目，西学科目分为4门，其中开设的质测科

属地质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在陕西高等学堂的课程表中每周共有 36 节课，其中地理课程占 2 节，分为省地理、地图。开办期间，考送学生多不合格，主要为陕西中学堂学生，学制也无明确规定，培养目的也仅为陕西地方培养人才。专门从事地理教学的师资仅有张子安 1 名教习，日籍教习足立喜六专才于数理，但对历史地理亦多有研究。可见，这一时期根本不存在高等意义上的地质地理教育。与 1912-1937 年的西北大学之陕源国立西北大学相比较，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直到 1923 年时才拟建大学预科和本科，而本科只待有预科毕业生时方能筹办，预科学制 2 年，本科 4 年。本科设有 13 个科别，地质科是其中之一。但在实际践行教育过程中，因本科缺乏合格的招生对象，加之所聘师资与学校原定课程设置所需不符，只好因人设科。可见，这一时期虽设有地质学科，但教育规模很小，学科、学制、课程设置、实验仪器设备、学生招生体制都很不完备，地质地理教育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而西北联大在西北地区 9 年期间，以留学于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国的地质地理学人才为其强大后盾，如最早将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理论传入中国的黄国璋教授，为西北联大地质系的开创作出奠基之功的郁士元教授，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家张伯声教授等教授，他们扎根西北联大，将近代西方最先进的地质地理科学引入西北，传播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逐渐形成了地形学、气象学、经济地理学、地质学等多学科体系。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的地理、地质教育均是由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孕育而来，师资常常相互共用。由以上比较分析可见，西北联大不仅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地质地理学教育基本格局，迅速提升其整体高等地质地理教育水平，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科学教育人才，而且为西北地区地质地理科学的发展与完善的高等地质地理教育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8-9.
- [2]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24.
- [3] 李晓霞.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数学教育[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2(3):515-520.
- [4] 李巧宁,陈海儒.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1,29(2):91-94.
- [5] 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J].文史精华,2007(202):62-64.
- [6] 地理系工作报告[J].西安临大校刊,1937(1):4.
- [7] 地理系第三次工作报告[J].西安临大校刊,1938(11):4-5.
- [8] 李永森,姚远.西北大学史稿上卷(1902-1949)[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302.
- [9] 各学院之现在与将来[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5(17):3-6.
- [10] 本校教职员录[J].西安临大校刊,1938(4):10.
- [11] 姚远.西北大学学人谱[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264,265,266.
- [12] 郁士元传奇(一).<http://www.ayl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2142>.2012-08-08
- [13] 本校录取新生名单[J].西安临大校刊,1937(3):7.
- [14] 地理系各年级籍贯人数比较表[J].西安临大校刊,1938(5):4.
- [15] 聘任文理师范两院系各年级导师[J].西北联大校刊,1938(7):24-25.
- [16]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第一学期在校学生籍贯统计表[J].西北联大校刊,1939(9):17-19.
- [17] 赵重远,黄发潮,朱恪孝.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回顾与展望[J].西北大学学报,1987,17(4):1-8.
- [18] 于洗.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概况[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5:99-100.
- [19] 地质地理学系学术空气日趋浓厚[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5):3-4.
- [20] 郁士元.勉县煤矿区之地质[J].西北联大校刊,1939(9):4.
- [21] 目录[J].地理教学,1939,1(5,6):1-125.
- [22] 毕业论文题目[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4(14):4-6.

[23]国语演说竞赛会纪录[J].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0): 17-18.

[24]学生举行时事讲演会[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3 (3): 8.

Geology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of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LI Xiaoxia^{1,2}, YAO Yuan¹

(1.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studying the Geology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of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to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of the Northwest area and Chian. The original journ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Geology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of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gradually formed multidisciplinary system, for example topography, meteorology, economic geography, geology and so on. The teaching staff are the geological geography specialized talents having completed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Britain, Japan, Austria and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professor Huang Guo-zhhang, Yu Shi-yuan, Yin Zu-ying, Zhang Bo-sheng, they introduced the western advanced geological geography science into China, and spread science, and developed science research. They also trained many science talents for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China.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not only formed the based pattern of higher geology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in Northwest area, and rapidly improved the overall higher education level, but also made a historic contrib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y and geography science and building the perfect system of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for the northwest region.

Key words: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geology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教育体系的演化

张建新, 李晓霞, 姚 远

- (1.西北工业大学 明德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4;
- 2.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 3.咸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全面审视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工学院与其工程教育的课程体系,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线索。原始期刊文献分析和考证。1938年,西北工学院在筹建之初,已设有土木、电机、化学、纺织、机械、矿冶6个系,后又增设水利工程和航空工程两个系,开设了投影几何、立体几何、工程数学、应用天文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热机学、平面测量、大地测量、地质实习、电工学、河工实验、房屋建筑、污水工程、工程契约与规范等成系统的工程教育课程,并在矿冶、土木、水利、机械等方面尽力结合西北工业实践。其课程体系的成熟和完善,迅速提升了西北科学教育的总体水平,标志着西北工程教育体系之形成,从而加快了西方科学教育在中国西北本土化以及整个西北科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教育;科学教育

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7月,令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原有之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然而,有关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工程教育的研究甚少^[2-4]。本文侧重于民国期间国立西北工学院工程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

1 工程教育系统

国立西北工学院(简称西工)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筹建之初,设立了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机械工程、矿冶工程六个系,后又增设水利工程和航空工程两个系,共八个系。其中,西工的矿冶工程学在抗战时期是全国独有的学科,而航空工程系是以北洋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中的航空组为基础设立的学科,后经学科结构调整优势整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航空学科优势发展的高等工程学府。在1933年之前,全国高等教育中还完全没有航空课程,之后,北平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几所学校才在机械工程学系里设置了一两门航空课程。至1935年才有正式的航空班、航空组、航空门。1937年,中央大学最早建立了航空系,全国时有航空工程系的高等学府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由此可见,西工在当时全国高等教育中开设航空工程学亦是名列前茅,而在西北地区建制化最早的航空高等教育则属西工。

西工有识之士认为有责任更深层次地研究探讨工程学科以辅助西北生产事业之推进,因此于1939年,又“充实工科研究所,暨工程学术推广部”^[1]。同年秋,工科研究所又呈奉教育部先成立了矿冶研究部,后拟增设其他研究部。1941年,在赖琨抵渝谈西工近况时,决定下年“增设工业管理系及建筑工程系,又因铁道人才之需要,复拟于机械系中设机车组,土木系中设路工组”^[5]。次年,赖琨再次抵渝谈西北工院现况时,说到各系毕业生供不应求,因此为适应国家需要之计,拟加办机电专修科。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工程学科发展至抗战结束,已有九大学科体系,与同一时期其他工程院校相比,西工是全国工学院设立工程学科最多最完整的学校。这些学科不仅立足于西北乃至中国工业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且也是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新兴前

沿学科,西工以世界高等工程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为着眼点,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及发展西北工业”为宗旨,开设工程学科,“树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与推进西北工业之建设”^[6]。

2 工程教育课程设置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工程教育尚初步发展,还没有完备的科学教育体系,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用、实验的开设等都是吸收与模仿西方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然而,西工土木系主任赵文钦就此指出工程教育多为应用技术,避免闭门造车,“就工程原则言之,可不论东西,均有相同之理。惟应用方面,中西不尽相同”^[7]。他就土木工程学科更进一步指出“①西洋之土木建筑材料,多为钢铁水泥,而我国仍多采用木材砖石。②西洋施工多用机械,而我国多用人工。③西洋注重坚固美观,而我国常因陋就简。④西洋试验齐全,设计之根据正确,吾国因缺乏实验,设计资料不足,必须估计各种数目字。⑤西洋多采用包工制度,我国则包工、征工并用”^[7]。由此,足见中西工程情况有诸多不同,故如何在吸收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以致用用的同时,又能将其因地制宜、融会变通,则是工程教育之重要责任。赖琰在西工第二届毕业生训词中亦谈到工程人员的责任、信仰与修养,特别强调:“吾辈学工程者对于素习科目,固宜继续探讨,精益求精,即其他普通知识,亦应随时充实,日新又新”^[10]。他还进一步指出“工程人员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更应有充分的普通知识;否则,一旦观感幼稚,判断谬误,小之被人讥为坐井观天,大之就可影响毕业的事业。如果你们除了某种工程外,对于历史、地理、文学、哲学,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趋势,完全隔膜,你们就不能把握全盘的时机,纵有专门技能,也难成为健全的工程人员。所以,你们对一门自应精通一切,对其他部门,也应略知梗概”^[8]。在此,西工明确倡导工程教育应注重通专并重、讲求实际、随时充实、学以致用用的科学教育观,这与北洋工学院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为真正做到“通”与“专”的统一,西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加强工程教育基本课程之训练,以培养通才。国文和英文作为重要的研究工具,是全校各系一年级必须开设的公共课,除此之外一年级还开设物理、微积分、化学、立体解析几何、投影几何、工程图画等完全相同的基础课程,并有相关的化学实验、物理实验等实验课程和工厂实习(详见表1、表2、表3)。如此等基本课程,学校实施透彻,学生将来面对各种职业工程,绝无削趾适履之病。其次注重专业、选修课程之训练,以培养专门工程人才。全校二年级同一学系设置的基础课程亦完全相同,只有在三、四年级才有专业选修课之分,在四年级有毕业论文设计与国父实业计划,而专业课设置与时代要求紧密相关,广而多,并且开设了许多全新课程。比如,30年代国家航空事业非常落后,又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国家急需航空工程人才,而原北洋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四年课程中仅开设了一门航空工程课程,即飞机工程学,占4学分,远远不能培植航空人才。但是,西工在原北洋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航空组的基础上不仅组建了航空工程系,而且增设了18门全新的航空工程学课程以供选修,如应用空气动力学、飞机学、飞机发动机等课程以培养航空专门人才。此外,矿冶研究部还开设了较高层次的课程,如工程材料X射线研究、光性矿物学等课程,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新的内容^[4],而且这些专业选修课与毕业设计、国父实业计划的设置显然在吸收了西方大学高等工程教育做法之同时,也融会贯通,与中国实际环境相结合,实现科学教育救国。西工不仅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通专并重的科学教育理念,而且在研究方向亦体现出其特色及应用性特点,正如土木工程系主任赵文钦在谈到该系训练方针时指出土木工程,门类繁多,“使每一学生,将各门研究尽善尽美,乃不可能之事”,进而提出若“将土木事业分为若干组,每组为一门或两门,使学生分别研究之,固最为理想”^[7]。在此,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工程教育不仅要注重通才教育观,而且要分学科更加细化研究方向以专门学习之,才能适应国家之需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且,为了进一步达到专门人才培养的目标,使学生毕业后能学以致用,尽快胜任工作任务,他也明确指出当前土木工程教育的主要目标,即:一为研究

铁路道路工程;二为城市改善工程;再次学习西方、讲求实际,注重教材与辅助图书。当时正处战乱时期,西工“各课本均由美国订购,延以交通不便,无法购买,而国内各书店束手无策,致同学无书可看”,故“西工教授鉴于目前国内大学书籍之困难,特自编印讲义,售予同学,课本问题迎刃而解焉,闻他校同学向西工订购者,颇不乏人”。^[9]1947年,“在天津购得之旧原版书145册”,向“上海中美书局购到原版书63册”,又向“上海东亚书社现购及订购之原版书及翻版书105册”,次年元月该院“研究所及各系分到五百元美金,选购英美工程书籍”^[10]。在西工开设的470门课程中,其中165门课程采用英文教材,占有课程的35.1%;其中164门课程用教授自编讲义或笔记,占有课程的34.9%。另有一些课程没有教材,完全靠教师和学生借阅图书馆藏书,甚至一些系几乎没有教材,全部课程采用教授讲义或笔记。如机械工程系二至四年级开课41门,其中采用讲义或笔记讲授的占32门,采用外文课本的仅9门^[3]。由此可见,在抗战期间西工教材图书非常紧缺,主要来源渠道有三个:一为订购英美教材;二为教授自编讲义;三为图书馆藏书。这也说明,其一在战乱时期,教材图书非常紧缺之情况下,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工程教育传播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顽强地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为西北地区、为中国培植工程人才;其二也说明了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的移植与传播逐渐转向本土生长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从洋务、戊戌时期的实业救国逐渐转向科学教育救国。其中,西工因地制宜,将西洋教材融会变通,自编讲义,以适应中国实际环境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工程教育课程设置状况

工程教育课程设置状况见表1-3。

表1 国立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课程设置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国立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课程	国文	平面测量	结构学	高等结构学
	英文	应用力学	结构计划	钢桥计划
	微积分	材料力学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计划
	物理	高等工程数学	钢筋混凝土计划	铁道定线
	化学	工程材料	铁道工程	养路工程计划
	工程图画	微分方程	大地测量	河工学
	投影几何	工程地质	应用天文	水工计划
	立体解析几何	经济学	土石结构及基础	房屋建筑
	物理实验	水利学	水文学	土壤力学
	化学实验	热机学	电工学	污水工程
	工厂实习	机动学	给水工程	工程契约及规范
		最小二乘方	电工实验	
		平面测量实习	水利实验	
		地质实习		
	材料实验			

表2 机械工程学系课程设置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国立西	国文	微分方程	机械设计原理	原动力厂设计
	英文	工程数学	机械设计制图	原动力厂设计实习
	微积分	材料力学	工程材料	热工试验

北 工 学 院 机 械 工 程 系 课 程	物理	应用力学	材料试验	高等机械设计
	化学	机动学	机械力学	高等机械设计制图
	工程图画	热工学	水力学	电工试验
	投影几何	经济学	汽机及开关	工业管理
	立体解析几何	测量学	汽动学	毕业论文
	物理实验	测量实习	原动力厂	国父实业计划
	化学实验	机件图画	内燃机	
	工厂实习	工作法	热工试验	
		金工	电工学	
			机车连用	

表 3 国立西北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课程设置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国 立 西 北 工 学 院 航 空 工 程 系 课 程	国文	应用力学	航空材料	应用空气动力学
	英文	材料力学	机械设计原理	飞机发动机
	微积分	经济学	机械设计原理实验	高等飞机结构学
	物理	机动学	电工学	飞机设计
	化学	飞机学	材料试验	发动机设计
	工程图画	高等微积分	内燃机	风洞及引擎试验
	投影几何	水力学	飞机结构学	航空问题
	立体解析几何	金工	理论飞行力学	航行学
	物理实验	测量	航空仪器	毕业论文
	化学实验	热机学	电工实验	国父实业计划
	工厂实习	热工实验	数学分析	
			发动机动力学	
			飞机螺旋原理	
			飞机螺旋设计	

4 结语

西北工学院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源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基础,时有 6 个工程学科,44 名教师,规模较小。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以后,以其全面的学科建制、完整的课程体系、雄厚的师资力量、严格的管理体制、日渐充实的实验设备、通专并重的办学思想以及经验、学理与试验三者并重的科学教育观念,形成了富有特色、更为完善的工程教育体系。

大批工程学科留学生归国作为各学科专业的教育者,急速推动其成长。例如结构力学专家金宝桢、水利专家李书田、冶金物理化学家魏寿昆、大地构造学家张伯声、师从当时土木建筑界泰斗茅以升的罗明燏、航空工程专家张国藩等教授皆是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累斯顿工业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留学归国的工程学科专家、博士。他们学识渊博、西学功底深厚,而且还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传播工程技术,培养专业人才,从而加快了西北地区科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使西方科学技术在西北特殊的地域环境中生根发芽、成长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西北地区工程教育本土化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编者.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 [J].西工友声,1940(1).
- [2] 西北工业大学史.
- [3]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240,245,251, 252,270 271,281 282.
- [4] 刁永健.抗战期中成长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J].读书通讯,1943(67):15 16.
- [5] 编者.赖琏抵渝谈西北工院近况 [J].申报,1941.
- [6] 赖琏.发刊词 [J].西北工学院季刊,1939(1):1.
- [7] 赵文钦.本院土木系训练方针之商榷 [J].国立西北工学院月刊,1948(4):2 3.
- [8] 赖琏.对本院第二届毕业生训词——工程人员的责任、信仰与修养 [J].西工友声,1940(1):3 5.
- [9] 编者.西北最高学府剪影 [N].西北文化日报,1947 03 24.
- [10] 编者.美金五千,收购图书 [J].西工友声,1948(3).

The curriculum evolu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National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ZHANG Jianxin¹, LI Xiaoxia^{1,2}, YAO Yuan¹

(1.Mingde College,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4,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3.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and the spread of its engineering education a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d to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education. Origin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1938, at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there had been civil, electrical, chemical, textile, machinery, mining and metallurgy six departments, then two additional hydraulic and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offered courses such as Projection geometry, Solid geometr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pplied astronomy, Applied mechanics, Mechanics of materials, Heat study, Level measurement, Geodesy, Geology internship, Electrical engineering, River engineering project experiment, Housing construction, Sewage works, applied a serie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o practice, such as mining and metallurgy, civil engineering, water, machinery, et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rapidly elevated the overall level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 At the same time, it mark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thereb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nsplant of western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the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Northwest Engineering College; engineering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

——基于《西北联大校刊》的分析

姚聪莉, 刘莹*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西北作为中国抗战的“策源地”和大后方, 在抗战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 由于为了指导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西北联大也因此对社会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具有西北特色的社会教育思想, 并开展了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关键词: 西北联大 社会教育 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

1937年9月10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 “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 设立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 组成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虽然名存不过三载, 但分出的子体——国立西北五校, 却分而有合, 教育资源共享、对外共同发声、联合招生、联合开展社会教育、联合组成学术社团, 联合投入第一轮西北大开发等, 艰苦办学九年, 直到1946年才陆续在平、津、冀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

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 与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呼应, 在战火中为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北联大校刊》是西北联大时期的校刊, 作为保留和记录历史的媒介, 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对于研究西北联大以及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教育与社会情况, 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西北联大时期, 对社会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如何, 形成了哪些观点, 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拟基于对《西北联大校刊》珍贵资料的分析, 来探讨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对社会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作用。

一、《西北联大校刊》编辑出版概况

根据西北联大校刊编辑及发行办法, 《西北联大校刊》每半月刊行一次, 其宗旨为“刊载校务之进行状况”^[1]。采用“中国报纸(或川纸)”纸张, 十六开报纸, 每期至少十六页。刊载内容包括: “论著、教育部部令、本校章则、本校布告通知、各院系处会室组布告通知、校闻、校友消息、教育文化通讯、专载、其他”^[2]。由校秘书处出版组制定组员负责编校。校刊的发行主要面向以本校各院系处会室组、全体教授讲师, 但也与其他文化教育机关、校友会、同学会有所交换, 也对外订购发行。

二、《西北联大校刊》传播的社会教育思想

社会教育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个教育名词, 广义的社会教育基本等同于“教育”。关于社会教育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生变化, 而学界基本认同王雷的界定: 所谓社会教育, 就是指学制系统以外, 由政府主导、民间和社团推动, 为提高失学民众和全

*姚聪莉,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刘莹,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新闻传媒研究。

本文为陕西省2008年软科学项目(2008KR93)、陕西省教育厅2008年科学研究计划(08JK151)的成果之一。

体国民文化素养和技能,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和设施,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教育活动^①。通俗教育、民众教育和平民教育的不同阶段对社会教育的称谓,在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几种教育是对社会教育渐次变化的不同形式的表述,并且交叉出现。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列的现代教育体系之一。

抗战时期,为了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唤起国民的爱国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仅仅依靠学校教育远远不够,对于大量的失学民众,施以社会教育成为当务之急。西北作为全国抗战的“策源地”和大后方,在抗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由于为了指导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掀起了社会教育研究的热潮,西北联大也因此对社会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具有西北特色的社会教育思想,开展了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1.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王镜铭在《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中阐述了抗战阶段民众教育的重要性:“欲争取最后胜利,缩短抗战过程,首应加紧与充实民众动员工作,发扬广大民众潜在力量,以支持长久抗战”^[3],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开展社会教育的紧迫性。此外,他还指出“首应加紧与充实民众动员工作,发扬扩大民众潜在力量,以支持长久抗战。所谓动员民众的最高目标,是使民众成为直接的与间接地,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战斗员……所以动员民众是现阶段抗战中的重要工作,而民众教育是重要工作中的重要工作”^[4]。他分别从学校与社会沟通、大学教育宗旨、训练学术高尚人格、锻炼学生工作技术、抗战建国中教育任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进一步阐述了“战时的大学,自当从事民教工作,所谓民众教育对学校本位教育言是成人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而言,是新兴的革命教育;大学推行民教,尤含有必然性质”^[5]。

在抗战时期,“中国人口四万万,不识字之民众竟占人口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6],可见当时我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而社会教育则是直接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对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来支持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战期间社会教育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国家应现代化,我国因未现代化,乃受强敌压迫,认字少,教育水平甚低,自无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矣”^[7];民众不识字人数众多,不符合宪政需要;“我国抗战必胜之条件与把握具备,自无可疑,然一般民众未能皆知,故于此尤赖社教之努力”^[8]。对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深入的论述,也为之后西北联大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

2.战时开展社会教育更是大学的职责所在

“国难日迫,人心危惧,于是在大学者无不思改革课程,以应时局之需要”,由于“吾国未行国民教育,致汉奸甚多。然则对大众之演讲宣传,亦大学之责任也……亦须有相当之训练”^[9];“民众教育之目的,在于造成现代国家所需之公民,在平时如此,在战时亦如此。盖培养健全公民,即所以增加抗战力量也”^[10]。这些研究均体现出大学社会教育能够启发民智,从而发挥高等教育在支持抗战中的作用。

社会教育的功能还体现在:(1)辅助学校之不足。“学校以外之民众,既不入学,又乏求知机会,故实施社会教育,以补学校之不足”^[11];(2)扫除文盲。抗战时我国文盲众多,文化落后,这必将影响到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发展生产的技能的提升。

3.完整有序的工作方案是有效实施社会教育的坚强保障

(1) 社会教育的原则与重点

王镜铭在《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中提出了社会教育的原则,一是“教育与农村合一”:“今日大学教育的推行民教,应将教育送进农村,将智识灌输给农民。教育与农村合一,才是民众教育的真正使命”;二是“政教合一”:“民众教育对象,包括整个社会生活,处

^①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万妮娜对王雷所著《中国社会教育史》一书进行了深入分析,厘清了关于“社会教育”的概念。

处要与社会接触，事事不能离开民众……大学教育推行民教应当政教合一，与当地县政府合作，使学术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一个计划之下推进工作，是会收事半功倍之效的”^[12]。

在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学校根据教育部令发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提出了社会教育的重点：“一、培育人才与社会并行；二、以先知觉后知，推广学术至于社会；三、深入社会，交相受益；四、参与抗战建国，贡献方略专技。并规定专科以上省校应尽其才力，至少为数省或一省服务”^[13]。

（2）社会教育工作的标准

教育部为督促全国各级学校普遍并切实兼办社会教育，依照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修订了工作标准，主要是“应师生合作，以便实际指导学生服务，小学应以教员为施教主体”^[14]的总体工作标准，以及根据学校等级而制定的具体工作标准，包括专科以上学校、高级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初级中学、小学兼办社会教育的工作标准。其中涉及了划定区域办理社会教育施教区；依照学校师资力量确定每学期办理民众学校课程的数量；以及根据学校所长采取有所区别的社会教育工作，例如师范教育学院要对其他学校社会教育工作进行考察指导，并加以研究，师范学校要研究编辑地方性教材，而职业学校要注重职业训练。

（3）社会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

《西北联大校刊》第十八期，刊登了教育部对于《各级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组织纲要》，是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成立社会教育组织机构的规定。在《纲要》中，明确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简称社教推委会）的目的，即为“各级学校均应在校内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主持规划并推进兼办社会教育事宜”^[15]。并指出了社教推委会的职责范围，包括拟定兼办社会教育计划，规划教育经费及编制预决算，组织支配并指导教职员、学生实施社会教育工作，联络当地有关机关团体协同施行，规划学识技能等训练事宜，考察教职员学生办理社会教育成绩，研究社会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编制兼办社会教育的概况和工作报告。并规定社教推委会每月至少举行会议一次。社教推委会是教育部针对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成立的组织机构，依据权责范围来在实践中统领各级学校的社会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

西北联大依照以上教育部规定，于西北联大第三十三次常委会议议决：“组织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李委员蒸及各学院院长、秘书长、总务主任为委员，并以李委员蒸为召集人……加推徐委员诵明及胡委员庶华为本会委员”^[16]，主持兼办社会教育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高振业在《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中，将社会教育的实施机构分成三类：一属教育体系、二属军政体系、三属救亡团体。这三类中教育体系又可以分为学校式和社会式的（“前者如民众学校、妇女学校，后者如民众教育馆等”^[17]）。李湘宸在《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中提出社会教育的方式为“一、学校的：如民众学校，民众训练班，补习学校，人员养成所；二、一般的：民教馆。博物馆，电影，戏剧等”^[18]。高振业认为，“最近颁布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其主旨亦在‘化除学校与社会之界限，而使学校成为社会化之中心。’所以理想之学校，为改良社会之中心，理想之教师，不仅是教室内学生之教师，而且是社会上一切活动之领导者”补习教育之内容，不以识字教育为限。乃以“生活上必须之文字为工具，藉以培养民族意识，激发爱国思想，并获得公民必备之基本知识与技能”^[19]。从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教育不完全局限在学校之内，而将军政、社会和救亡团体也列为社会教育的实施机关。同时在学校的社会教育也不仅仅局限在知识的讲授上，也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如“电影、幻灯、收音机、演讲、壁报、戏剧、图书及体育设备，普遍施教”^[20]。

（4）社会教育实施方案与途径

根据教育部兼办社会教育办法的有关规定，西北联大制订了推行社会教育事业的有关计划（《本校二十七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总结如下表：

主办科目	期限
文理学院主办	
1.国语及注音符号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2.防空防毒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月
3.科学常识讲习班	办理两期每期一个半月
4.调查陕南城固南郑两县风俗民情及协助各县改良陋俗	会商两县县政府计划进行
法商学院主办	
1.法律常识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2.地方自治讲习班	期限两个月
3.商业补习班	期限三个月
师范学院主办	
1.小学教员讲习会	暑期举办期限一个月
2.小学教员通讯研究部	——
3.民众学校	指导学生办理
4.体育训练班	期限三个月
5.民众业余运动会	春季举办一次
6.家事讲习班	期限三个月
医学院主办	
救护训练班	期限一个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北联大各学院分别开设了社会教育课程来推行社会教育，服务地方民众，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为抗战做准备。

除了西北联大开设的各类课程，以实施社会教育外，教育部还颁发了《师范等校院辅导中等以下学校兼办社教办法》，办法规定“国立师范学院、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及省立师范学校与省立民众教育馆须依本办法之规定，分别辅导中等以下学校兼办社会教育”^[21]，并根据院校等级师资不同而确定其辅导内容。师范院校辅导社会教育内容包括，在师范区内设立辅导会议，负责研究社会教育有关事项，辅导研究困难并予以解答，训练教育人员并进行进修指导，介绍与补充社教教材，联络本大学各院以利用原有设备进行辅导社教事宜。

另外，学者也在探求实施社会教育的途径与办法：李湘宸在《抗战期间社会教育之途径》中探讨了社会教育应有之途径：包括“一、集中力量——人力集中，因时因地，适应民众只需要；二、教养卫并重——要教育政治生产兼施；三、利用现有机关……以乡村小学为社教中心，与民众时常接近，小学教师易得民众之信仰，军政教合一实施，教育与政治合一推行较易，且须使学校与社会沟通，……今后最宜推动全体民众，务使先知先觉者能负责领导后知后觉者及不知不觉者”^[22]。高振业通过对抗战期间城固县民众教育的考察研究后，得出了社教应有的实施办法：一是健全组织。“组织为推行计划之动力，虽有完善之计划，苟无健全之行政组织，亦难期其收实效”^[23]，他建议设立“统筹划一者”：“教育局内应设民众教育督导员一人，助理局长处理关于民众教育方面一切事务”和应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一方面可使有关机关，便于同力合作，一方面使民众有参与之机会，以引其兴趣，注意与赞助”，同时设立“视察指导者”：并有“行政视导”和“教学视导”之分。二是统制设学。设立保学，就保内原有的乡村小学改办，并予以经费辅助来使其充分发展。三是整顿教师。现有教师只有“五分之一合格”，教师现状令人堪忧。因此采取以下措施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包括：根据教师现状，实行教师分等级，并举办保学师资训练班和在职教师进修组织，以及提高教师待遇等。四是强迫就学。当时民众生活穷困，宁愿劳动获取眼前利益而不愿就学；受旧思想

的影响,已经养成了“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态度,对于教育不感觉兴趣”;也由于以往民众教育大多以失败告终,民众对其缺少信任;甚至有些民众认为接受民众教育有可能是为服兵役做准备的。所以,“民众学校常有招生留生之问题发生”。当时“依照补颁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法,并参照武汉战时大学民众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依照调查结果,分期入学,并给予优待和惩处。五是广筹经费,包括县地方教育经费、徵收戏捐、募集教育基金等。六是教育内容应丰富并有针对性。“民众教育之成功与失败,端在对民众生活指导在切实与浮泛耳。成功之指导,在于引起民众之自动,欲引起民众之自动,必需根据民众本身需要,以达到国家之所需自目的,在抗战期间,亦即根据民众本身需要以满足抗战之要求之谓也。”

三、李蒸的民众教育思想

李蒸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爱国人士,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李蒸先生“虽主持师范大学,但兴味仍在于民众教育”^①。他在主持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期间,提出民众教育是针对失学青年与成年人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于培养民众的最低公民自治能力,要结合民众生活,活用机会地开展。^②北师大迁往城固,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他还在城固近郊的郃留乡成立了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1.任何人无可不受教育

李蒸民众教育思想中的民众指:“包括男女老幼,无阶级的区分,无资格的限制,在一个共和国应当指共和国的全体人民。”并且他还认为,“教育之于人生,无异于汽油之于机器,故任何人无往不可不受教育,无时不可不受教育”^③。李蒸的民众教育思想是全民性的,也是终身性的,这是对于当时广大民众文化基础薄弱的情况提出的,强调民众教育都应伴随每个人的一生。

2.最低限度的自治能力

李蒸为实现教育国民、民族独立目标,为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目标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推行民众教育。而民众教育的目标是,他认为,“民众教育应以实现自治为鹄的,应当以如何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为设施标准”。“最低限度的自治能力”包括知识技能、个人修养、公德素养三部分:“知识技能包括‘认识一千个常用字;能运用加减乘除的算法;至少有一种正当职业能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知道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间的准则;知道中国领土的大小及近百年来丧失概况;知道中国的历史久远及各朝代名称;知道地球上的人类及重要国家的分布状况;知道几种发明,以认识科学的势力,且藉以打破迷信’等8条,个人修养包括‘有强健的体魄;养成清洁好美的习惯;有为善的勇气;有求知的欲望;养成快乐的人生观’等5条,公德包括‘能与人合办某种事业,以发展其互助合作精神及能力;有管理公家事业之责任心;有为公益而牺牲私利之精神;有国家的观念’等4条。”^④

3.积极的民众教育

推进民众教育,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首先要求“办理社会教育的人,无论是主任,馆长或馆员,都首先要养成一种‘传教的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⑤,另外,积极采取办理社会教育的技术也是必要的,正如他所说“办民众学校,自然是以教民众识字读书为主要目的……亦要对学生的各方面都要注意到,根据众多民众的能力、兴趣与需要,无论是家庭问题、社会国家的问题、生计问题,休闲娱乐问题,都应当逐渐提出来讨论,这样子可以引起

^① 李 蒸.民众教育的认识[A].教育与民众第2卷第3期[C].1930,(11).

^② 张俊宗.李蒸及其民众教育思想[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③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7).

^④ 李 蒸.民众教育的途程[A].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4期[C].1929,(10).

^⑤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11).

成年民众的兴趣。”^①

李蒸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对西北联大时期的社会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之后其组织乡村教育实践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西北联大社会教育的实践

在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校各院系发动一切力量、集结一切教学设施为当地提供教育服务活动。首先，成立了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作为学校专门的负责推行社会教育的机构；其次，确立了办公场所。在当时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学院高度重视社会教育工作，专门新建草房一大间作为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的办公地点；第三，明确了经费来源及筹集渠道。除教育部划拨专款支持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之外，学校还积极筹款，以补充经费不足；第四，建立施教区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积极在学校附近的各县设立社会教育施教区，如在城固县的莲花池率先建立起了第一个施教区。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不久，学校组织各院系就开展了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医学院为南郑县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公共卫生训练班，共有 50 人接受了 7 门科目的培训。文理学院举办了“注音符号讲习班”、“防控防毒讲习班”和“科学常识讲习班”，并组织师生深入城固、南郑两县调查当地民情风俗，“并协助各县改良陋俗”^[24]。师范学院在附近各县开设了民众学校，并举办了体育训练班和家事讲习班等。

西北联大的社会教育工作，不仅开启民智，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提升民众生活生存技能，还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也对之后联大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奠定了基础。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由于西北联大在历史上存在时间不长，学术界对西北联大研究明显不足。但是西北联大不仅是作为抗战时期有影响力的内迁大学，而且它从知识、文化等方面促进了当时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也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尤其是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作用。《西北联大校刊》是研究西北联合大学的重要历史期刊资料，历史研究的灵魂是史料，没有有效的、丰富的史料就难以勾勒历史事件的线条，更谈不上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最初原貌。校刊经过出版，就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以文字形式记录当时教育部训令、论著、学校章程、布告通知、校闻、校友消息、教育文化通讯等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西北联大的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西北联大校刊》传播的社会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兼办社会教育的情况，借以反映出当时西北地区和中国社会教育的情况。从“教育部训令本大学兼办社会教育成绩，尚属优良，特予补助国币一千元，作为充实社教设备费用”^[25]可以看出，西北联大践行社会教育颇有成效。西北联大时期的社会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设置军政教合一的机构和完密的社教系统，以“使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打成一片”，从而使得社会教育发挥最大效用，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在当时抗战背景下为民众统一抗战提供了文化和思想基础。以及在《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中，建议划定民众教育施教区，并指出民教施教区工作：社会调查、研究、实验、辅导、训练工作，来适应社会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当地具体情况，社会教育的成功“不仅须有健全之组织，充足之经费，与夫优良之教师，尤需有充实之内容，如何使内容充足，必须根据国家之需要与民众本身之利益，否则不易，引起民众之自动。故于民校教学之外，更宜根据民众利益，指导民众生活，以达国家所需之目的”^[26]。以史为鉴，西北联大社会教育活动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供了诸多启发。高等教育如何在社区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如何与社会共享

^① 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6).

大学教育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如何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使大学的职责内涵更为丰富？使大学师生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并实践。

参考文献

- [1] 《本校<校刊>编辑及发行办法布告》.《西北联大校刊》.第7期.1938.
- [2] 同上.
- [3] 《王镜铭：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1939.
- [4] 同上.
- [5] 同上.
- [6]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七》.《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
- [7] 同上
- [8] 同上
- [9] 覃成章.《高等教育如何支持长久的抗战》（《西安临大校刊》第9期，2页，1938-2-14）
- [10]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1期.
- [11]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七》.《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
- [12] 《王镜铭：战时大学推行民众教育意见》.《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1939.
- [13] 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38-09-15，《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1938-10-01）
- [14] 教育部训令：办法各级学校社教推委会组织纲要（附纲要，《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页，1939-06-15
- [15] 教育部训令：颁发各级学校社教推委会组织纲要（附纲要，《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页，1939-06-15
- [16] 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38-09-15，《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1938-10-01）
- [17]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1期.
- [18]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七》.《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
- [19]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1期
- [20] 教育部训令：颁发各级学校社教推委会组织纲要（附纲要，《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页，1939-06-15
- [21] 教育部训令：颁发师范等校院辅导中等以下学校兼办社教办法（附办法，《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第4、5，1939-06-15）
- [22] 《历届纪念周讲演纪要·七》.《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
- [23]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3期（续第11期）.44-47页
- [24]本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18期，1939-06-15
- [25] 同上
- [26] 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3期44

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生活研究

刘俊凤^{1,2*}

- (1.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2. 西安邮电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1)

摘要: 抗战爆发后, 高校内迁, 西北联合大学落址陕西。在辗转迁移整合中, 其师生适应战时教育生活, 历经艰难困苦, 虽避居秦巴山水而安贫乐道、弦歌未断。他们饱有精神并乐观平和, 呵护联大的生机和活力, 实践“勤朴、公诚”之校训, 坚守“自由”和“教育”的大学精神和传统, 保持了一份难得的独立和完整。其师生坚持传承大学教育之精神, 播撒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之种芽, 为近代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当今西大人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 西北联合大学; 师生生活; 风格; 传统

抗战初期, 在高校合并内迁潮中, 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最为引人注目。两校合并当时京沪津的数所名校, 分别落址西南的昆明、西北的城固, 在抗战大后方呈南北呼应之势, 蜚声海内外。延宕至今, 西南联大已耳熟能详, 而同时期的西北联大虽造福于地方、影响至当代, 却鲜为人知, 实为憾事。笔者基于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相关文献资料, 试图择取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师生的教育和学习生活片断, 从生活史角度解读西北联大的传统与风格及对西北大学的影响, 从而发掘西北联大对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

一、内迁分立中的“亲土”与“传承”

1937年11月1日, 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的数百余位教授和千余名学子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正式开学, 这群不愿做

亡国奴的象牙塔中的学子聚集在简陋零散的校舍中, 开始了战时的大学教育和学习生活。这所于国难之时组建的临时大学, 历经艰难困苦、颠沛流离, 但落脚西北后竟似一株青春蓬勃的枝芽, 扎入到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广袤土地中, 继而生根、开花。

当时, 由于抗战初期来自战区的难民络绎不绝地涌入西安城内, 使原本陈旧的城市更显局促。西安临时大学的教师们不得不散居于民房、饭店和招待所, 学生们分别集中居住在三个校区的临时大通间宿舍中。不过, 临大师生既没有过多纠结、苦恼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也没有因临时而存“五日京兆之心”, 而是尽可能融入到地方社会中。

短暂的西安生活也留下了诸多美谈。临大农学系教师与武功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交流合作, 获赠农作物、园艺作物种子百余种以及昆虫标本十余种, 充实了临大农学系的教学资源, 更为日后同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共同成立西北农林高等学府奠定了基础。地理学系的郁士元、殷伯西教授分别带领学生组成考察队, 对学校周边的终南山、灞桥、汉城未央宫等地开展自然及人文景观调查; 还邀请当时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时任陕西水利局长的李仪祉先生, 为师生详细讲解泾惠渠的水利问题^[1]。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 临大的师生们走出讲堂, 走入社会, 近距离触摸西北老百姓的生活, 与西北逐渐结缘。在随后不久开始的学校分立、合并及

*刘俊凤(1975-), 女, 北京市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 西安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11977);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I006)资助项目。

南迁过程中，师生们关注、参与地方社会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城固，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文中简称“西北联大”）。次年8月西北联大即分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本校则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随后又吸纳了陕西省立师范、商业、医学等专科学校，初步搭建起了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框架体系。分立后的西北联大，以国立西北大学继承衣钵，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亦承袭脉系，虽不同处，而风度依旧，学术服务地方建设的传统被承继和延续。

与西安相比，经济落后的陕南更激发和推动了师生们动手解决问题和创造性研究活动的热情。譬如，初到城固，教学所用纸张极为匮乏，化学系的师生就收集当地所产构树原料，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竟然造出质地洁白平滑的白纸，满足了教学上的需求。有些研究活动更是帮助当地老百姓开发资源、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如陕南盛产桐树，本为当地一大财源，因为交通阻断无法出口而多被废弃，化学系师生随即着手实验研究，以裂化桐油制造汽油，发掘地方资源。汉中十八里铺盛产甘蔗，当地糖坊一贯使用旧法炼制，某年突然出现早霜，糖浆不能结晶，眼看一年心血付之东流，坊主求助联大师生，师生们经过调查确认，是旧法落伍，漏盆温度过低，导致结晶与母液不能分离，经调整温度，化解了危机。解决了糖坊问题的教授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办法，写成《糖液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美国《化学工程杂志》^[2]。西北联大的师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播迁流离中，始终与这块土地密切联系、结合着。

抗战胜利后，回迁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扎扎实实地担负起了西北学术重地的责任。地理系、地质系的师生们率先将考察视野拓宽至关中地区。1948年春，由韩宪纲、刘锺瑜、聂树人率领二三年级学生分别对华山地区、临潼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将各种考察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为这些地区的农牧业发展及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教授张伯声、郁士元、袁跃亭则带领地质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在华山一带作野外考察，采集大量岩石标本，绘制地质路线图、地质剖面图及高等地形图，结合华山的地质构造进行教学；经济学系和边政学系的师生把西北作为考察研究的范围，1947年11月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与陇海铁路局商定共同进行西北经济考察，对西北区域经济进行了广泛调查；边政学系由杨兆钧副教授于1944年秋率领边疆考察团对青海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并选定青海循化县附近之萨拉冈提回教文化及维吾尔文化为语言调查区，以夏尔县拉卜楞寺的藏民为佛教文化、语言文化习俗调查区；在谢再善、阎锐及朱懿绳的带领下，边政学系21名大四学生于1948年暑期赴新疆见习四个月，行程两万里，对民族、宗教、社会、经济、习俗制度、文化等做了综合考察^[3]。

这种落地即扎根的学术实践态度也促成了西北联大学生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行动。西北联大的师生不仅向西北社会展示了大学教育的先进性和学术性，也为西北社会建设做出贡献。据西北联大校刊登载，迁入西北当年的毕业生有近57%留在了陕甘；据国立西北大学学报复刊的不完全统计，抗战后的第7、8届毕业生中有近73%留在西北。¹这些毕业生都在陕甘各省、市、县的机关、学校、企业、厂矿、社会团体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其中，不惟受到时代责任感的驱使，更有大学教授们言传身教的感召和激励。出身书香世家并留学英国的地理系教授殷伯西在西北联大和国立西大执教多年，在西北地理考察活动中身先士卒，不仅亲自带领学生实地考察，还将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大量资料用于教学指导中。受其影响，学生中多有对西北边疆的研究和建设发生浓厚兴趣者。如学生于书绅不仅以《新新疆与西北国防》为毕业论题，还决意毕业后不做官，数次拒绝陪都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远走边

¹国难之时，讯息不畅。仅从西北联大校刊第2期（民国27年10月1日）至第7期（民国27年12月15日）陆续登载毕业生就业情况，计民国26年度不同专业毕业生中，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数学、教育、体育、国文、生物、地理、外语系、化学系、家政系、历史系、商学院共计学生113人，其中留在陕甘各省共64人。在国立西北大学学报，复刊24期（民国36年3月1日）至第35期（民国37年1月16日）的不完全登载中，第7届毕业生19人，有11人留陕甘。第8届毕业生52人，留陕甘就业的41人。

睡，执意到兰州工作^[2]。

二、乐城生活中的“坚守”与“生机”

从1938年三四月间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之名落定陕南算起，至抗战胜利回迁西安之前（1946年），八年的乐城生活是师生们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难忘的旅行生活。1938年3月中旬，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徒步从宝鸡翻越秦岭抵达南郑，校舍分立于秦巴汉水之间的城固、南郑、勉县各处。对于从来没有过这样长距离、大规模迁徙生活的联大学生来说，如何面对这场极为艰辛的旅行，其实是他们适应艰苦生活的一次预演。在启程的半年前，学生组织的下乡宣传队一面宣传抗战建国，一面深入地方生活、调查沿途地方社会实情，其中包括各县道路、旅宿条件、食品、物价等等，其详细报告也先行发表于校刊。校方也提前拟定《行军办法》，并安排了行军各大队、膳食委员会、运输队等各种组织机构。这场罕见的旅行就是在校方的有效组织和师生有条不紊的准备中开始的。

在有关记述资料中，人们担心的因缺乏交通工具和人数庞大而随时会出现停滞的情况并未出现，安步当车的学生们把迁徙之苦转化作春游之悦。在秦岭山间，他们偶尔走小路，与行驶在曲折公路上的汽车争先，汽车与人一呼一应间，欢笑声震动山谷，长途的枯燥劳累得以化解。由于每日至少需行十余公里，最多时达三十余里，晚上抵达居留点的学生们虽饥肠辘辘地围观伙夫熬菜煮饭，仍能毫无旅途倦意地热烈交谈。休息之余，通讯组坚持收听中央广播并于次日清晨书写张贴，不仅同学们及时了解国事要闻，当地居民识字者也竞相围观，是为一景。虽然衣衫俭朴、满面风尘，但有礼有序、快乐轻松富有青春气息的联大学子们，让沿途早已饱受游兵散勇之苦的百姓人家投出惊诧的目光，欣然招待有加^[4]。显然，对师生们而言，国难中颠沛流离般的迁徙赋予他们的不是避难的畏惧和愁苦，而是与联大同舟共济、共赴希望的坚毅。

安贫乐道的教职生活。于国难之时成长起来的西北联大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的饱学之士，他们忍受着清苦的生活，于颠沛流离之中，始终不忘为人师尊的职责。临大初成，教授们即布告全校：在环境窘迫的情况下，“究能保存若干学术研究精神，弦歌未断，黉舍宛然，特殊训练之外，不忘正常教学，埋头苦干，冀成学风，此未始非我一群学人领导知识青年共同体国家维持战时教育之至意所致，然亦其力求精诚战胜危机之一种心理建设也”^[1]。这正所谓文脉不辍，精神不坠。

文学院的黎锦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教和方志学家，其关于修订方志的创见和实践即在汉中城固时期形成。1938年9月，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城固县志续修总纂，仅用一月时间，便草成近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深思熟虑、筌路蓝缕，还不间断的将关于修订城固县志的体例、原则和方法等陆续发表于西北联大校刊，²以供师生切磋。至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时，因为其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其用不限于一邑”而命名为《方志今议》。在城固六年间，他深入陕西各县调查研究，先后主撰了城固、洛川、同官（今铜川）、黄陵、宜川等县志。这是民国县志中的创新和成就，更是当代陕西地方史研究的宝贵方志资料。

与学术研究相比，课堂上的师者风范更是西北联大于艰难困苦中坚守精神家园的生动展现。身着蓝布大褂，一顶瓜皮小帽的历史系教授陆懋德不仅学术精湛，有全部用外文讲授之水平，更是风趣幽默，常以其对平剧的爱好劝导学生仪表。偶尔在讲课中，突然指着一位学生说：“你的眉毛很好，不要吊”，令紧张听讲的学生忽然得以轻松，课堂陡然生趣盎然。还

² 《西北联大校刊》第4期载《现代放置之“三术”与“两标”》、第5期载《方志广“四用”破“四障”议》、第8-11期及第14-17期连载城固新修县志的方案，计含有总纲、自然志、人口志、农矿志、农村调查法、交通志、水利志、工商志、合作志九个。

有治学严谨缜密的黄文弼教授，终年一身中山装，两袖发亮，肘下裂缝，令学生观之有博物馆陈列品之感。但一站上讲台，黄教授引经据典，资料翔实，无一句闲话，令学生全神贯注并肃然起敬，文学院的王守礼教授在生活不宽裕的情况下，还叫学生到家中进餐讨论，当得知前来请教的学生赵毅参加演出，颇为担忧，听说赵是以表演为志向又颇为欣慰，常与他讨论推敲至深夜，悉心指导。其奖掖后学的殷殷关爱之情令其学生多年后忆起仍是热泪盈眶^[2]。这些以教育为职守，也同样饱受战乱之苦、拖家带口的教授们，一俟站在讲台面对学生时，一切物质上的困苦和个人的艰难都仿佛被他们用破旧的柴门轻轻掩到身后。

乐学生活令人神往。在教授的榜样带动下，联大学子格外珍惜难得的僻静和安定的学习环境。相对于每天争先恐后占领的“高地”——简陋又狭小的图书馆，乐城美丽的城野成了联大学子又一处宽阔的大课堂，晨读是乐城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濛濛清晨，城野的田边、树下、土台上，遍布了年轻的男女学生：有练习唱京剧，也有排练话剧的；有的朗诵诗歌，也有练习歌唱发声；更多的是练习俄文、德文和法文的的同学。但见练习者眉飞色舞、抑扬顿挫，咿咿啊啊、如入无人之境。深夜，课业繁重的工学院学生在油灯烛光下，研究着枯燥的航空理论科学，视为一乐。白天，医学院学生专心致志的聚焦实验室显微镜下，学习悬壶济世的法宝。尤令人感慨的是，每年四月三十日照例举办解剖节，全体师生员工停课一天，齐聚解剖墓前举行公祭，由院长主祭，诵读祭文，共同缅怀被解剖者的贡献^[5]，于学问之外，不忘涵养悲天悯人的医者之心。

虽世事多艰辛，但天地有大美，联大师生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曾出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赖琏教授，多年后还念念不忘“陕南乐城环境优美，为研究学术胜地，每忆畴昔情景，不禁神往”^[6]。

衣食住行乐趣横生。联大学子的衣食住行皆由政府贷金提供、学校统筹安排，同时因学生家庭境况不同，又有个人选择的变化。首先，淡食有章法。临大南迁途中，一日三餐均由膳食委员会负责安排，除了午餐是事前采购锅饼（锅盔）、咸菜分发个人外，早餐的粥饭、晚餐的干饭汤菜（猪肉、青菜、豆芽、豆腐、粉条烩）都是由提前到各站的膳食委（由学生选举组成）与伙夫准备的。其中，猪肉、萝卜每日必有，倒是青菜、豆腐之类很难得^[7]。进驻乐城后，学院各自办食堂，学生每顿以数人（多为8人）一组，围桌共餐，菜饭则各院有差异。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全是公费，伙食冠于各院，几乎每天都有红烧肉吃，还每三天“小变饭”，每七天“大变饭”（即加菜）。学生选举组织的伙食委员会担任柴米面菜的办理职责，必须办理的有声有色才能得到同学的认可^[2]。法商学院的食堂因主食不同而分馒头类和米饭类两种，选举出内阁制的伙食委员会，负责每日餐饭的安排，每期分为三个五天，头五天饭菜平淡，中间五天最坏，最后五天最好。不过，历史系状况惨淡，大多时候是八人一桌的水煮大烩菜。对实在熬不过清汤寡水的学子来说，城固街头的美味小吃就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美食记忆。城固北街“老乡亲”的牛肉泡馍独占鳌头，还有白水羊肉、醪糟蛋让人回味悠长。由于集体膳食是主要形式，因此大学食堂成为自由民主精神的试验场。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中，学校不仅是求学问道的殿堂，也成了全体学生的快乐家园。其次，衣着服被有传统。联大学子的穿着除了中山装、西装之外，最典型的就是早先学校作为御寒制服发放的蓝布大褂再外套一件黄棉袄。由于经费减少制服随后停发，早先发的制服被学生们届届传送，接替穿戴，竟成为学生印象中“世界上最舒服、最实用、最美好的服装”。因为这套服装，让他们贫富不分，和乐融融^[2]。在乐城田园般的生活中，少了物质的诱惑，多了质朴的感情和真美。物质匮乏之下，学子们既有取布一块、两边加缝，中间挖洞变为背心的乐趣，也有裁下长裤膝部，补到膝臀部破洞而一变为短裤的乐观，更有衣服被褥相互借用、不还亦不讨的豁达。第三，住行间其乐融融。由于条件所限，学子们居住的学校集体宿舍通常都是大通间、大通铺，上下两层，但学生们不以为苦。其中，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师生最能坐冷板凳，以“三多”（老鼠多、跳蚤多、破鞋多）、“三少”（警报少、女生少、西装少）著称于各学院。倒是课业之余，

使用“十一”号汽车（学生对步行的戏称）徜徉在乐城的城野美景中，常常是流连忘返、其乐融融。桃花林、汉江桥、橘子林、望江楼、渭水桥，阡陌间、白杨下都留下了学子们乐游的身影和朗朗的笑语。昔日法学院的学子忆及当年柴门乐读之生活，有杂咏记称：正院几回廊，弦歌深动肠，才看海棠红，又数枇杷黄（《咏读书看花》）；后院茅屋住，墙外野花香，同窗皆年少，谈笑常无疆（《咏寝室风光》）^[2]。

多年后学子们的回忆文章描述，虽然大家对当时物质生活的匮乏皆有同感，但深藏记忆之中的却多是于清贫中透露的乐趣和美妙，令人称奇。如果说回忆者通常选择记住艰难中美好的部分是出于潜意识，那么这种潜意识就是普遍存在于当年学子心中的，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对个人未来的希望，正是这希望使国难时期的大学始终生机勃勃。

在抗战胜利后的回迁浪潮中，西北联大（此时已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也回迁西安。然而，僻处西北的国立西北大学颇受南京的冷落，不惟教授的待遇不能与已经回迁的各大学相平等，学生的资助也一再被减少。1946年底，西安物价腾贵，已经超越京沪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公教人员薪津过低，生活濒临绝境，3学生也是捉襟见肘，勉强维持。为鼓励师生在艰难中坚定职守，继续努力深造或服务社会，时任校长刘季洪教授一边支持西大、西农、西工各校教授们不断向南京联名请求调整薪津待遇，一边诫勉学生们“事业成功之基本条件有三：一为科学态度。事无巨细，应规划周详，笃行践履，求其彻底；二为建设兴趣。凡百事业，破坏易而建设难，吾人应不顾一切艰阻，始终保持乐观厥成之兴趣；三为平民生活。富丽奢侈，每足以颓废青年之志气，而简朴之习惯，则为成功者之所备”^[8]。继刘校长之后，先后出掌校长的陕西籍马师儒、杨钟健教授更是发扬了西北人的精神，把勤朴、公诚的西大校训发扬光大，于濒临绝境的经济条件下，团结西大师生坚持办学。也正是昔日联大在艰难孤寂中的静默自恃，使弦歌未断之精神绵延不绝。

三、军训生活中的“自由”与“教育”

何兆武先生《上学记》中曾提到西南联大的自由之风气令师生受益匪浅。相较而言，西北联大所驻留的西安，北邻陕甘宁边区，这令国民党对西安的各高校监管格外严密。因此，要延续大学自由民主精神，实非易事。

为防止青年投向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夏开始，国民政府命令高中以上全体学生必须接受二到三个月的集中军训，即发轫于西安。其训练宗旨为“指正青年思想，改善青年行动，养成尽忠报国、努力服务的革命青年”^[9]。抗战之际，军训更成为青年学生掌握一定军事技能、实现全民备战的重要内容和必然手段。本是书声朗朗的校舍，因为统治青年思想和备战的需要，一时恍若军营。然而，强制说教和严厉束缚并不能真正压制这群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正是在“指正思想”的军事训练过程中，学生们活泼、率真的行为频频展现出压抑不住的自由天性和理性思考。

在西安临时大学伊始，学校就开设了军事教育课程，包括军事测绘组、军事工程组、军事机械组、军事电讯组、军事化学组，并要求学生必须选修一门，以记入学分。在自选课程时，学生对选修军事机械组和军事电讯组趋之若鹜，一时竟因报名人数过多，不得不分期举办^[1]。因为这两个组分别开设了初、高级汽车实习和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等与民用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表现出学子们对实用、先进的技能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

至西北联大时期，学校奉命进一步加强管制，做法就是增设训导处，实行导师制。根据规定，从一年级学生开始，在每周国文课第一堂，发四页格纸作为一周的日记专用纸，每日

³有关西大、西工、西农等校教授们联名电请中央，呼吁调整西安地区公教人员待遇，以及取消学生公费办法，改行奖学金办法的报道，在《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24期（民国35年12月）、第29期（民国36年5月）、第30期（民国36年6月）、第32期（民国36年8月）、第37期（民国37年5月）等，均有登载。

至少写半张，下周上课时上交。内容以自我反省和认识为主旨，包括每日起居行动、思想、言语、修己、治学、应事、待人等，对于社会实际问题及时事等，均可自由发表感想，要求学生每日临睡前完成。教员则从文字、思想、事实三方面评阅，并按周送给各院主任导师，分别登记学生生活情形。最后返还学生，逐周装订，每期一册，形成个人的历史记录。并特别规定了导师及教员，可随时调阅^[10]。此规定清晰透露了管制学生思想的用意，在崇尚“自由”、“民主”的大学里，实难以被师生们认同。

在进驻乐城当年举行的首届暑期集训中，被编入陕南支队的西北联大学子在雨中练习行军、打靶、军事演习，一系列军事训练活动让从未有过军旅生活的学子们兴奋，也让他们着实锻炼了体力、增长了军事常识。不过，学子们毕竟不是军人，虽然身体上的锻炼和意志上的磨练使他们受益匪浅，但教官们在思想上的强行灌输和行为上的专横做法却令他们难以认同的，于是各种消极的、积极的“抵制”就次第出现。

先是在行动上频频“破禁”。在每次被教官用一两个小时强迫灌输政治说教时，学子们大多采用直立注视而充耳不闻的方法熬过时间；反感教官声称“脏水不能饮，也不过两月”的蛮横，去茶房偷净水止渴。因为不满重视体力训练而轻视军事技能训练的安排，有的学生宁可被罚，在野训的极度疲劳之后，消极的走着跑步，也不愿遵行教官的严令，走在大街上高歌进行曲。实在不能忍受不许随意会客的隔离规定，被编入不同大队的联大同学，纷纷相约在中午2小时的诊病时间，去医院见面畅谈。

进而开始质疑集训的宗旨。各大队负责训练的中队长及区队长常常不认真调查事实，就指责学生中“有思想复杂的”，动辄傲慢地嘲弄大学教育的散漫。对教官们习惯于用粗暴、武断方式指责学生的做法，学生们不仅反感，更是质疑集训的宗旨，发出了只有“军事训练”而无“军事教育”的感慨，犀利地指出“训练式的严厉，只能发挥在平时；教育的力量才能完全发挥在战场。训练式的严厉，只能有益于集训中，离开集训便一切完了；教育的功用，在于永远保持住当时所学的技能”^[9]。

不过，集训时期的会餐仪式反倒成了学生眼中最富生动教育特色的一项。当时，全体教官和学生齐聚操场，以中央的升旗台为中心，六人一组席地而坐，围成（国民党）党徽的形状，每组放一盆猪肉烩白菜、两盆馒头。奏乐升旗后，一声令下，伴随军乐节奏，大家开始狼吞虎咽。饭后，时任汉中警备司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主任祝绍周对学生说，吃馒头的用意，在于馒头象征着日本军阀的头颅，人人可得而食之。学子们受到“饥餐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激励，精神为之一振，回营的步伐前所未有地整齐，所唱的《大刀进行曲》也响亮合拍，令人振奋。

四、西北联大之传统历久而弥珍

当今西北大学的前身——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于抗战之初，新校建设之时距原陕西高等学府西北大学的停办（1927年）已有十年之久。西北联合大学从成立到回迁仅有八年多时间，历史虽短，但在其艰苦卓绝办学环境中形成了令人敬仰、难以模仿的文化积淀，虽最终有各校回迁，却最终把联大之骨架和精神留在了古都西安，留在了以国立西北大学为首的西北各高等学府中。在这场同仇敌忾的民族抗战中，因为民族希望的召唤而弦歌不断，师生虽苦犹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传统，泽及后世，历久弥珍，追寻其足迹，有其特殊意义。现摘捡一二略述之。

一是务实的学习研究作风。西北联合大学在办学时，面对纷飞的战火，全力保障大学教育的完整性；面对清苦艰涩的环境，努力传承大学教育的精神。因此，在正常的课堂学习之外，各院系师生们纷纷主动走出书斋，走进西北开发建设的现场，结合地方资源，开展学习考察，把高等的学术研究融入到地方社会的建设中。国立西北大学的学术专注于西北文化的振兴和发展，考古、地质调查不辍，而学生则乐于团体活动，富有责任感，更具吃苦耐劳的

精神；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师生能坐冷板凳，生活清苦散淡，学习研究却用功甚勤；西北师范学院注重教师素质培养，体育活动频繁，学生热情活泼、青春跃动；医学院师生专心细致，细声慢做，学习、生活均亲如一家；联大之农学院与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的农学院虽远在武功，校园建设力求先进时尚，而研究实验始终奉行科学实干、为改良农业而服务的宗旨。

二是苦中作乐的豁达心态。大学本应是研究学术的重地、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在特殊时期的大学，因为被赋予了特殊的角色，其功能也因此丰富。在战时条件下，在播迁的过程中，来自不同院校和地区的师生们朝夕相处，无论研究学习、工作生活都如同处一“室”，形同一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西北联大师生独有的风格与传统。譬如，清贫生活的一致性，让师生对物质生活的态度趋于一致，淡化物质的匮乏，而注重精神的愉悦和乐观的情绪，在学生中形成了同学之间不分彼此、相互借助，甚至以获得前届传递下来的制服为荣耀的小传统。教授们从暂居西安到进驻陕南，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甚至一度受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但在目前所见的资料中，鲜见教授们自己对那段拮据生活的抱怨和详述。相反，在这一时期中教授们成果斐然的学术成就和在讲堂上的兢兢业业、沉静平和之状却深深留在联大学生们的记忆中。

三是追求自由进步的精神。战时教育固然有特殊性，但大学之追求自由、进步精神的发扬，是大学在任何时期作为引领时代先进性的先行者之根本所在。西北联大于战火中弦歌未断，簧舍宛然，于特殊训练之外，不忘追求自由进步，力求以精诚战胜危机，以默持弘扬大学精神。迁徙中院校的分分合合之间，固然有内部分歧的不悦，但师生们却始终保持着随时随地、结合地方资源和建设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习的稳重务实传统。而在相对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以静默自持的态度，保持一份思想的自由和教育的坚持，更是对匮乏和专制的默默消解。有关实行训导制时期的个人生活日记这一本身极具个人色彩的文献资料，也在此后的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和联大校友的回忆录中，寻无踪迹。这至少表明，联大师生们更倾向于采取了遗忘和淡漠的方式，默默捍卫着他们的“自由”。

以黎锦熙教授所作之西北联大之歌，在西北联大师生中广为传唱和身体力行，绵亘至今，绕梁而不绝：

并序连簧，册载燕都迴；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

体健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东南；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北，高等教育发展一直缺乏先进的外来资源。随着西北联大的到来，师生们一方面将地方社会纳入学科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又将文化新风与创新力散播于地方社会。整个西北联大整合播迁的过程，若不论对大学自身建制和发展的消极影响，更多的则是传播现代科学力量、造福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一朵盛开的奇葩，长久地炫目于国人的视野中，西北联大则如汇集而成的一股温泉，永远地浸润着西北广袤的厚土。

参考文献：

- [1] 《西安临时大学校刊》第5期，民国27年（1938）1月。
- [2]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民国58年（1969），台湾。
- [3] 李永森、姚远编著：《西北大学史稿》（1902-1949）（上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 《西北联合大学校刊》第3期，民国27年10月。
- [5]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37期，民国37年（1948）5月。
- [6]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27期，民国36年（1947）3月。

- [7] 《西北联大校刊》第 1 期，民国 26 年（1937）12 月。
[8]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 29 起，民国 36 年（1947）5 月
[9] 《西北联大校刊》第 12 期（集训专号），民国 28 年（1939）3 月。
[10] 《全校一年级学生写作修养日记和读书答记办法》，《西北联大校刊》第 9 期，民国 28 年（1939）1 月。

**Research of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fe**

Liu Jun-feng

(1.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
2.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 Xi'an710121)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ward migration, the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moved to Shaanxi.Mig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dapt to wartime educational life experience hardships, although living in the remote southern Shaanxi, they Anpinyuedao that is music is not broken. They are full of energy, optimistic, calm, efforts to care for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the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practice "Qin Pu Gong Cheng motto, adhere to the spirit and tra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freedom "and" education ", a rare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heritage, sowing the seed bud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modern cultur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Northwest in Modern leave precious spiritual legacy, but also for the peopl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Key words:The Northwest Union University; teacher and student life; style; tradition

回忆与口述史研究

回忆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

穆嘉琨

我是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 1940-1944 届毕业生。2012 年是西北大学建校 110 周年华诞，学校拟于金秋 10 月隆重庆祝，并在稍前举行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为了响应母校征文的号召，不顾年高力衰心怀深情厚谊，特草此文供母校参考。

一、我参加统考被西大录取到城固报到

1940 年夏我从高中毕业后，很快就到陕西武功县西北农学院考场参加全国高校第二届统一招生考试，我报的是文科，按照规定报了三个志愿：中央大学新闻系、四川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经济系，考完后我就回家等待录取消息了。我知道自己因为高中时逃难到陇县，加之生病耽误了一个多学期的课，考的并不理想，录取并无把握。

9 月以后，我收到一位高班同学从重庆来信，告诉我他在“教育部”门口张贴的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还将信将疑，再过了好多天，终于看到一份正式小报，印的是当年全部高校录取名单，这时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在高中误了一门立体几何课，但考试时恰好考的是我学过的大代数，其中有行列式的试题，我都能从容解答，我一向是考试的幸运儿。而同班同学落榜很多，只有另二人分别考上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后来陕西省新成立了政治学院，吸收了很多未被统考录取的学生，我的不少同学就去了那所学校。那年 10 月，我的父亲特地到西安为我买了一个旧的但很结实的皮箱，母亲为我新装了被褥，那时我才 18 岁，就带着这两件行李单身启程了。我先乘火车到宝鸡住了一晚，再乘长途公共汽车穿越秦岭经宝鸡、留坝、凤县、褒城四县抵达汉中。那时所谓的长途公共汽车，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大巴、中巴等等，而是一部敞篷的卡车，大家都将它称为“羊毛车”，因是国家用羊毛跟苏联换来的，它不是烧汽油，而是在车的右前面架设了一个大铁炉，下面烧木炭，还有一架小鼓风机，要不停地摇，才能将火烧旺。旅客上车时排着队，乘务员按旅客的次序把每人所带的包裹、箱子等大件行李在车上摆好，一直摆满，然后旅客手拎网袋、手提包上车，能坐二三十来人，坐的有高有低，大家都喜坐在车边的高处可望风景，都不愿坐在中间低处什么也看不见，并且摇来摇去，很快就有人晕车了，马上就趴在车边呕吐，坐在高处的人只好让位给他。这种车速度很慢，一般 15-20 公里/小时，一个旅客笑说车往山上爬时下去解个手也能赶上来。我们在宝鸡等车过了渭河到了益门镇（古称大散关的地方）就开始爬山了。秦岭是陕西乃至全国有名的大山，呈东西走向，南北宽度达四五百里，崇山峻岭，迂回曲折，险峻异常，此山北坡极陡，车行走了近 30 公里才爬到了山顶，这里立有“秦岭”二个大大的石碑，这时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旅客都变成了雪人。但是从山顶往下走只行了几公里就到了名为黄云铺的地方，一下子变得阳光普照，被绿色覆盖，流水淙淙，野花遍地，却是一番江南的风光，好像换了人间。又向前走，山连山，弯连弯，盘旋数十转，我们先后到了柴关岭、庙台子、双石铺、张良庙、马道驿等名胜古迹，用了一天的时间终于到达褒城（就是商朝那位“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褒姒的家乡了），这里是秦岭的南麓脚下，也是汉中盆地的北门。从

褒城继续南行，不足 20 公里就到达了汉中市，当即在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到车站买票去城固，因车站人多要排长队。当地有黄包车也可乘马前往。我选坐黄包车，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到达了城固找到法商学院报到，前后用了三天时间。这条路在读大学四年中，我往返走过六、七次，对沿途景色、名胜相当熟悉。这条路也相当难走，每次都要用上三、四天时间，有一次遇到大雨，山洪暴发，我在凤县一个小站上住了五天，待路修好才走。秦岭虽然风光无限，但山民衣衫褴褛，身体消瘦，由于缺碘造成“大脖子”病，比比皆是。我一人单身乘汽车走都如此艰难费时，吃了很多苦头，何况没有我这条件的人呢？由此联想到二年前抗战初期，西北联大全校师生二、三千人，包括家属，不畏风餐露宿，不顾困难险阻，不怕流血流汗而步行穿越秦岭的历程，至今思之，犹感心灵振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西北大学坚持在陕南办学八年，值得赞颂。（关于西北联大师生过秦岭的记述，我很少看到全面的记载，但我的体育老师王耀东教授在他的传记中就有他带领一支西安临大师生队伍步行穿越秦岭比较详细的记载）

二、抗战时期西大安身立命所在地城固的概况

城固建城于秦末汉初，早在楚汉相争时就闻名于世，萧何、樊哙都是本地人，汉王城、霸王寨、张骞墓都在这里，汉水流经此地，位居秦岭巴山之间，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水利完善，民风淳朴。我们在此读书四年，靠当地人民土地河水滋润与供养，在战时艰苦的岁月中，能够安心读书，学成报国，应感恩城固人民。在我读书的四年中，此地绝少发生水灾旱灾，虽不是十分富裕之地，却也称得上当时的小康生活。此地风景绝佳，同学们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空闲去旅游，但在城固四年中我们往往是春游桃园，夏泳汉水，秋逛桔林，冬赏腊梅。在假期中，有时也到汉中、洋县、西乡等地观光游览，名胜古迹很吸引人。我虽然别离多年，仍深有缅怀之情。西大校方 2008 年为纪念学校在城固的这段历史，立有“昭学励志碑”，其中提到“城固虽陕南小邑，然以山环水带、物阜民康故，素有乐城之名。自西大迁寓于此，一时人材荟萃，更增汉滨光华。城固八年，寓教数处，兴作艰辛之状，自非后人所易通知。然润弦歌不绝。其情其景，父老共鉴，汉水永铭。”欲知城固全貌，著名国学大师、西北联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曾主撰过《城固志》可供参考。但从另一方面看，城固是个农业县，工业毫无基础，只有一座从战区迁来的专造轻型武器的兵工厂，小县城有一条街道，两辆汽车都无法交汇，街中心有一个古典式的两层钟鼓楼，街上商店密集却无一座楼房，有一个小型的基督教堂和一个小清真寺，还有一座设有盆汤的小浴室。全县人口很少。总之，城固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学习、研究学问的好地方，可称战时的小桃园。不足的是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北到西安，南赴成都重庆都要翻越大山，且缺乏时代气息，对世界国家大事、学术界的新鲜信息知之甚少，这对于办好一所大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北联大迁来之前，这里可说是十分的闭塞，相当的落后。

三、为适应形势进行由西安临大到西北联大再到西北大学演变过程

1937 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为了不做亡国奴任日寇欺凌，保全国文脉培养人才，根据国家的规定和部署，平津两地高校大举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联袂南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由于当地房屋紧缺，西安临大被安置在城隍庙后街、北大街通济坊及小南门外原东北大学的部分校舍，相距较远，教学和住宿均有很大困难。西安临大下设 6 个学院 24 个系。1938 年 3 月，日寇打到风陵渡，潼关紧急，西安震动。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极不安全，许多居民外出逃难。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3 月中旬，全校师生员工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然后徒步 500 多里到达汉中，光教职员包括眷属就有 300 余人，学生没有确实统计数字，估计有千余人，他们怀着爱校爱国、藐视

困难险阻的精神用了 20 余天始安全到达汉中，事迹十分感人，实为中国教育史上伟大光荣、可歌可泣的一页。

学校迁到汉中后，分别安置在三县六处，校本部、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设在城固，医学院设在汉中，农学院设在勉县，学校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下设 6 个学院 23 个系，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及教育部特派员陈剑脩担任常委领导校务。西北联合大学的名称存在时间较短，为时只一年多就进行了如下的调整。

1938 年，教育部下令，将西北联大之农学院和工学院先后独立设校成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1939 年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原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分别独立设校，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

以上由临大到联大到西大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1937 年 7 月到 1939 年 9 月），由于变动仓促，而又在战时以打仗为第一要务，难顾其他如文教方面，但是当时的教育当局在策划、应变能力方面也有不足之处，以致朝令夕改，很短时间就把一所好端端的综合性的大学分解为一校五院分而治之，利弊究竟如何，值得反思。

我 1940 年秋入学时，西北大学还有文、理、法商三学院，那是一所大学必须具有的最低标准，我入学后通过与老同学交往以及本人查看文献资料，始得知上述情况，但也只知道表面现象，很不完整与准确。只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件是到校后不久，就看见西大中文系教授黎锦熙先生所做的西北联大的校歌，用的是文言文，古色古香，典雅高尚，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但有古汉语基础的人仔细琢磨也能大约懂得。可是这首歌始终没有请到名家谱曲，所以歌曲也唱不起来。直到我毕业那年，在第五届毕业生通讯录纪念册上，我才看到黎老这首歌的全文及文字说明。1944 年 5 月，因为校歌没有流传，黎老不甘心，又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北大学校史，可惜我没看到过。还要提到的是我们早就知道西大校训“公诚勤朴”却不知其来源出处，而这四个字却来自黎老的歌词中，是经过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的。再有一件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更久远的事，就是在 1938 年春夏之间发生的一次学潮，我入校时此事已过去了一年半，但这件事在学校中仍然是尽人皆知，到处在谈。作为新生的我也感到惊异与好奇，但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未看到任何正式历史文件作过详细报道。2009 年我收到老学长孙绳武寄赠一本名为《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是曹的儿子与媳妇写的），曹靖华是这次学潮的亲历者，又是被解聘的教授之一，在此书中专门讲述了此事甚详。要点如下：“1938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委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师生们拍手称快，国民党党团分子却大为不满。欢迎新院长大会上，一些三青团分子对许恶意攻击，遭进步学生驳斥，双方爆发冲突，几至动武……教育部即电令，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引起全校进步师生强烈反对。曹靖华及沈志远、彭迪先、章友江等十余名教授联名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并以‘快邮代电’分送全国各报社、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反对教育部破坏委任程序，要求‘收回成命’，得到师生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张北海恼羞成怒，会同胡庶华密谋策划，疯狂反扑……陈立夫亲临西北联大处理‘学潮’，无理指责法商学院开设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课程及俄语课‘宣传共产学说’，引起师生公愤。……由于汉中偏僻、闭塞，联大进步势单力薄，反动当局有恃无恐。教育次长自重庆赶赴汉中‘整饬弹压’，给曹靖华等十余名进步教授扣上在学生中‘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予以解聘，并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聘用’。另外，还撤销了许寿裳法商学院院长职务……曹靖华等十余名教授被解聘后，联大学潮实际上已被压制……。”

此次学潮的经过以及是非曲直，看了曹先生的这篇文章读者就会明白，在这里无需多发议论。但在西北联大才开头发生此压制学生正义行动、悍然解聘进步教授、扼杀学术自由的丑恶之事，促使西北联大成为短命大学，迅即瓦解，甚至影响了以后西北大学的发展与提高，使高教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其教训十分深刻。

四、四十年代前期西北大学办学教学情况

（一）西北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与领导人的变动情况

西北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分院、校、系三级，设立教务长、训导长为首的两大职能机构，同时还有一个学生军训处，辅助训导工作，有一名上校级的军官担任总教官，下边还有两名营连级的军官辅佐。此外，学校还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大都由学校的教授、讲师、党团骨干的人担任负责人。他们虽不是行政机构，但在学校对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兴风作浪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我在校读书四年，西大机构人员经常调整变化，外人很难知道实情，这里只谈谈校长的变动与他们在任上的表现和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1940年秋我入学时，西北大学并没有校长，据说教育部曾委任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西大校长，但皮氏并未到职视事，10月教育部就任命部首席参事陈石珍为代理校长，陈，江苏江阴人，南京东南高师毕业生，赴美留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归国后不久就到教育部任职，一直是当的“京官”。陈的办事能力很强，教育部特派他来西大收拾一年前因解聘一批教授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认真办好西大。岂料到职后不久，国民党区党部少数成员借口发学生贷金有问题而闹事，包围校长办公室吵闹甚至把校长乘坐的黄包车都烧掉了，这些闹事学生又扩大事态发起了“驱陈运动”。最后结果是两名带头闹事学生被开除，陈校长很快就离了职。事后有人说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所造成的，左派学生、进步学生均未介入，采取旁观的态度，其真相我至今都搞不清楚。抗战胜利后，陈石珍在教育部被任命为战后首届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曾在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被聘为特邀代表。

陈石珍在西大的续任名赖琏，是留美学工科的人士，是李书田校友，是国民党CC系的头面人物，也是陈立夫掌控国家教育的膀臂。赖原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后又调任西北大学校长，共六年之久后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到台湾后，他被派驻联合国任秘书处中文组组长。他在西大任上，出现了一件惊动全国教育界的大事：那是在1943年秋，正处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突然有一天汉中警备司令部派了一批军警特务来到城固，会同学校当局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镇压中共与进步学生的活动，当时立即逮捕了中共地下学生党员李可风、桂奕仙、王致增三人，便衣特务捕捉另一地下学生党员王升堂，王当场抗拒，幸有围观同学支持保护，始得脱身。此外，还按照黑名单向西大几十人作为“共嫌”发出了警告信，其中有许多是我最熟悉的好同学，如陈方澜、马洪庆、马遵德、钱琳等都在其内，陈方澜被勒令不写悔过书就不准毕业离校。这四人都不是地下学生党员，只是思想进步罢了。这事是在大环境影响下造成的，但学校当局尤其是校长赖琏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排除异己，压制民主，悍然引进军警到校逮捕进步学生，这绝对是不应当的。后来我们得知经过这一行动，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师生遭受了严重破坏与迫害。部分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仅有支部书记韩维彩，宣传委员王升堂两人。赖琏是个十分复杂的人，最近我看了“天下”这本杂志，上有高远写的一篇文章“世事纷纭说赖琏”一文，记载赖琏一生事迹包括在西大当校长时的所作所为，甚详。对这件事叙述的不太具体，尽管他对西大、西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仅凭这一件事，就说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赖琏之后名为杨宙康，据说是国民党教育部的一位社教司司长，来代理西大校长。

1944年我毕业后，听说就在44年秋季，教育部派原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刘季洪任西北大学校长。那时我已离校一年多，比我低两级的一位女同学告知我1946年春天学校又爆发一次规模大、斗争激烈的反对刘季洪的学潮。但她谈的很简单，我已记不清。但这件事，我认为也应当搞清楚，有待于校方或知情人士以后再写吧。凑巧的是1997年我去台湾时，曾到著名的台湾政大参观，看到在一块巨石上刻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竟是原西大校长刘季洪的题字，才知道刘到台后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二）系科设置，在校学生规模

西北大学成立后，设立文学院含中文、外语、历史、生物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系，法商学院设政治、法律、经济、商学、四个系，全校 12 个系。每系一般每年招生 30-40 人，年共招 360-480 人，四个年级总共 1440-1920 人，这是个约数，实数因为没看见有关的统计资料说不清。经济系是个大系，四个年级 200 人左右，我们 40 年入学那年，经济系人数特多，近 100 人，而商学系新生却只 20 余人，校方决定经济系学生调一部分到商学系，办法是发表给每个学生，填三个志愿，大家内心都不愿调系，结果有的同学三个志愿都填了经济系，而有的同学比较老实，除第一、第二志愿仍填经济系外，第三志愿填了商学系，结果就是这些同学转到了商学系，使这个系达到了 40 人，经济系减员到 80 人。这是我们入学第二年时的小插曲。

商学系办了很多年，在我们入学一年前都是以学俄语为主课，说是商学系实是俄语系，有三位俄语专家教学，除曹靖华先生被解聘外，还有徐褐夫、李毓珍两位，他们培养了许多俄语人才。我知道的有苏农官，1950 年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他随行担任俄语翻译工作；还有刘辽逸，是俄文翻译大家，曾翻译托翁“战争与和平”巨著；还有李之柱、于桂林、陆绍楹、陈文芄等人，他们分别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大连师范学院教授俄文。

（三）师资配备状况

法商学院经济系与商学系在一起，多门课相通、相近，因此两系上的一些主课都有教授教课，那时大学教授都喝过“洋水”，拿过学位，教学经验丰富，如法学课由法商学院院长杨兆龙担任，他是留德博士，著名国际法专家，在校时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极具学者派头，解放后他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上海），但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摧残致死，后平反。我的朋友沈立人曾是他的学生，编过一本《杨兆龙先生纪念集》，叙述他一生的业绩，为他恢复了名誉。教我们经济学就是罗仲言教授，多年后我们才知他就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罗章龙，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权威。教货币银行学的季陶达教授，他上课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上课不带粉笔或纸片，娓娓而谈，出口成章，且引人入胜。财政学由曹国卿院长上，他是留德博士。统计学由系主任孙宗钰上，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硕士，他有统计学专著，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人。社会学由王守礼教授担任。会计学由一位留美的青年教授刘溥仁讲授。英语课则由刘北茂教课，刘出身燕京大学，与刘半农、刘天华并称“江阴三刘”，是著名的二胡作曲家、演奏家，在校时我们常听他的二胡演奏，那真是一种高级艺术欣赏，出校后就很少听到这种高水平的演奏了。商学系除了上述主要课程外，还开了国际贸易、市场学、工商管理、商事法、经济地理、投资数学等课程。有些是选修。学校规定四年修满 132 学分才能毕业，大家都能达到。

其他法律政治二系的教师阵容也较强。法律系有王治焘、施宏勋、刘鸿渐等教授，在教学活动中常开庭辩论课，进行直观讲解示范，外系同学也常去旁听。政治系有许兴凯教授，他是个日本问题专家，经常作中日战争、世界大战的战局报告，对战局了如指掌，指点江山，评判战役，强调我们必胜，鼓舞听众信心，受到同学们欢迎。政治系还有卿汝楫教授，曾任过国民党某一部会的发言人。还有一位专门研究边政、少数民族问题的教授，是埃及大学毕业的回民教授杨兆钧，他给同学们演讲，一上来就用了一句阿拉伯语言向全体同学问好，声音洪亮，振动大厅，讲得头头是道。因为我也是回族学生，他是北京人，与我谈得来，以至至今未忘。除教学活动外，学校还经常开展一些学术性的活动，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讲演，一般都在校本部礼堂，甚至城固剧场举行，全校师生都能到场听讲。法商学院学生也愿意听自然科学家的报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二、三次来校，但他很少做大报告，而是和学生打成一片讲故事、聊天，我在法商学院就听他讲到甘肃游览鸣沙山的故事，大家听了感到津津有味。

（四）校舍及教学设施

文理学院设在城内文庙考院学宫等处，除图书馆几次扩建外，因经费紧张其他房舍很少改建。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小西门外，利用一所旧简易师范的校址办学，并没大兴土木搞建设。一进校门，就是一座东西略窄，南北略宽，长方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上层有走廊可通四边，二楼全部是教室，大小不等。还有院系办公室，一小图书室可供学生阅览。此外还有一间专为学会计的同学用的打字机室。由于都是文科，没有实验仪器室，教室勉可应用，但大的集会都要到城内举行。这座楼的东院是盥洗室、洗浴间、厨房及一大一小两座食堂，可供全院住校生用膳，有桌无凳，四年都是站着吃饭。楼的两边是部分教师宿舍、女生院、男生院。男生宿舍大部分是砖墙或土墙草顶房，小间住一、二十人，大间住三、四十人，一律双层木床，中间放桌子，共有三排六幢大宿舍和几个小间，可容纳二、三百人。许多三、四年级同学都住学校附近村庄农民的房子和小西关（从西城门到法商学院的半里长的小街区）的民房，租房价格不贵，一般是上年级毕业了，就由下一年级要好的同学继续租用。院墙外的西边，有一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排球场，下午课后球场上的人很多，当时只有法商学院有这样的操场，文理学院没有，连西北师大体育系的操场都比不上法商学院的。

我住的宿舍很特殊。这间是嵌在大宿舍与院墙之间的草顶房，40 m²大小，西面是八张上下铺床打通成的大通铺，东面是两个双人上下铺，共可住20人，中间一个通道摆了几张书桌，几条板凳可坐数人，但无法看书做作业，晚上需要到大教室在汽灯下做功课。宿舍实际上住了16人，有几个铺用来放箱子包裹等杂物。战时上大学，对于这些简陋的条件大家都不十分在意。至于伙食，因为大家都是吃贷金，贷金不交给本人，统由校方会计部门按名册和伙食标准交办伙食的学生组织，办伙食校方并不参与，由学生推举合适人选“民主办伙”。主要靠两个人物，一是总务，一是会计，其他采购、值厨等人员由他们聘用，每半月一期。每天伙食早稀饭，中晚米饭馒头，菜肴简单。每期伙食主办人前十来天尽量把钱省下来，以便最后二三天加菜吃荤，提高伙食水平。虽然主办人不连任，但办得好的以后还会被选出，办得不好的就没机会了。在伙食问题上，很少发生贪污现象。回族学生有专门的饭桌，我吃了四年为回族学生做的菜，从来没遇到吃不饱、吃得太苦的情况。

（五）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西大尤其是法商学院继承平大法商的老传统，各种社团组织林立。学会、系会、同乡会、中学同学会、基督教团契、回族同学会、读书会（中共地下党领导后转入地下活动），全校性的文艺团体如话剧、京剧、秦腔、歌咏等团体，都有很多积极分子参加，宿舍中常有人唱京剧，会拉胡琴的人很多。京剧主要的旦角是王佩琨与小生黄定，他们合演的“生死恨”、“奇双会”等剧珠璧联合，名噪一时，不亚于职业演员。话剧则有李英才、李战、张伶、赵蕴石等，演过“日出”、“原野”、“家”、“长夜行”等名剧，曾组成“新生剧团”到西安上演得到广泛赞誉。秦腔剧社则由高其伟、王扬、苏少兰、崔彤兰等演唱，受到广大师生尤其是西北籍的学生热烈欢迎。还有诗社，他们经常编出期刊，用壁报的形式发表，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壁报交错刊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很吸引人。

西大的体育活动也十分出色。当时西大、西师拥有国内一批体育名师，如袁敦礼、董守义、王耀东、徐英超等，体育系学生有国手牟作云等，蓝、排、足、垒，球类运动水平很高。校与校之间、院系和院系之间经常举行比赛。法商学院、西大的篮球队打不过西师，而足、排、垒球方面皆有与西师抗衡的实力。至今存在我记忆中的是法商学院足球队与西师的“小联军”足球队（体育系学生为中坚，还有体育教师参加）经常举行对抗赛或友谊赛，是城固一项重要赛事，每次比赛都吸引两校及当地中学生到场观看助威，踢得十分精彩。法商足球队有好几年都以商学系同学为主力，如戴保平（中锋）、郭冰（后卫）、哈美新（左锋）、谢蕴直（前锋）、马洪庆（守门员或中场）都是体力充沛，脚腿利落，奔跑迅速的队员，特别是戴保平勇冠三军，球技高超，是场上关键人物；而新疆维族同学哈美新脚下功夫极好，他

的沉底传中给对方以很大威胁，罚角球、点球是拿手好戏，常常立功。法商学院垒球队也很强，戴保平的击球、跑垒都高超，投手李恩普是全队灵魂，技术全面，当时无人可以替代。还有经济系的王家楷，他是运动天才，擅长各项球类运动。解放后考入南京军大，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军事大学工作，曾参加“八一”排球队，参加过全运会。转业后在郑州是有名的网球运动员，曾担任解放军老干部网球队教练。80年代初，他随队去上海比赛，我特地去与他见面。

课余时间也很丰富，城固文化底蕴深厚，秦汉古迹名胜多。法商学院西面一、二里处有汉博望侯张骞墓，我们及外地游人常去拜谒与祭扫，其他如霸王寨、汉王城、樊吟墓，同学们也都去过。

五、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西北大学是最早开发大西北的高等学府，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西北大学在陕南城固坚持办学八年，据有关资料，1940年7月西大首届毕业生毕业，其后在城固毕业的为二至七届，早在1938年和1939年于城固毕业的西北联大同学，均发给原校毕业证书，故西大第一届毕业生由1940年起，共计九届，毕业生总数为2395人，而编入通讯录的不足1000人。（见国立西北大学城固时期校友通讯录）

西大时期的毕业生，其出路究竟如何？这从来就没有人统计过，当时对高校毕业生国家从来没有建立过统配制度，一般由学校向用人单位和单位推荐聘用，很多毕业生都是自谋出路，他们主要通过家属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乡等种种关系找到或调动工作，有的是干本专业，有的是改行。那时就业个人有较大的自由。西大在陕南办学时期，我国东部以及中原地区早已沦陷，重庆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称国统区）只能算是半壁江山，但由于一面打仗，一面仍要搞国计民生建设，国家社会也很需要人才，因此当时并未产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而是都有工作可做，都能有自己的饭碗。即使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属于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就业门槛还是比较广泛的，他们毕业后分别进入国家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厂、商业公司、大中专学校，成为公教人员。拿我们法商学院经、商二系40年代毕业生就业来说，我们毕业时正逢国民政府财政部建立直接税体制，需要大量财经专业毕业生分配到各省、市、县税务机关当税务员，好几届同学都进了税局。川、陕两省很多县市都有西大的毕业生在直接税局工作，有的同学只两年多就已当上了县税务局长，回学校来要毕业生。抗战胜利接受上海市时成立了直接税局，是由陕西直接税局派来的人员组成的。当时上海市黄浦区直接税局的局长就是西大毕业生胡中流（中共地下党员）。财政部本身也需要公务员，西大一些同学就由西大在重庆工作的老师介绍到财政部工作，有田百川、陈方澜、秦敬先、徐漾、陈文笈、乃至我班的马遵德、赵崛等人。我班毕业生有40多人，经学校与有关部门联系，直接推荐给用人单位就有几大部门。一是宝天铁路工程局，共接受了我班与经济系同学10人左右，就有我在内。二是国民党空军（当时称航空委员会）也有10人左右如钱琳。三是财政部直接税系统，人数更多，凡是报名的都可以被吸收。此外也有极少数通过各种关系进入银行、资源委员会、花纱布公司、学校或其他单位。

对于西北大学城固八年中培养的人才真正有名望有地位有成就的人，尽管我交流广泛，但也知之不多。我曾看到西大校友通讯上登了千里青所写的“西大校史上的‘国’字号人物”，一位是国师黎锦熙，一位是国手王耀东，这两位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海内外皆知的有名人物。还有两位却是西北大学在城固时期培养出来的名人，一位是国嘴齐越，在校时就追求进步，参加地下党，1946年学潮时成功逃脱后到延安担任播音员，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文告和新闻包括开国大典，就是通过齐越之口传播出去，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新中国成立又担任开

国大典的播音员，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元老级的人物，是播音界的功臣元勋。还有一位国使申健，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学院就读，在校入党，在校经过临大、联大、西大的全过程，离校后与熊向晖等一起打入胡宗南部做秘密工作，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解放后曾任驻印和驻古巴大使，中联部副部长，是中国一名卓越的外交官。

读了千里青这篇文章之后，我颇有感触，不管怎样西大毕竟是一座百年以上的高等学府，确乃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之地，就在此时我收到了已过90岁的老学长且亲如手足的陈方澜从西宁寄来一篇名为“九十忆往”的文章，叙述他一生既曲折又不平凡的经历，叫我提意见。我拿到上海给秦敬先、沈有章、田盛文三位看了，他们齐声叫好，于是要我代表大家撰写了一副寿联，并请书法好的沈有章买了洒金红纸郑重写好，立即发出为他贺寿。由此使我想起西北大学的人才确实很多，千里青写了四个“国”字号的人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写一写几个“省”字号及“校”“院”字号的人物吗？那时我就想编一本西大优秀同学回忆录，历史是伟人创造的，也是人民大众、凡夫俗子创造的。我与方澜通过电话商量，西大人才很多，我俩是法商学院经、商两系出来的校友，只能请我们共同熟悉了解的、常有音信往来的法商校友，文章题目体裁篇幅写作时间等概不设限，年岁在90岁上下、具有写作能力，志愿参加。就这样把这事定了下来，我照顾他年岁大，所有操作之事由我负责，最后落实仅15人。2008年忙了一年时间把它编出来，定名为《九十老人母校情》，印了数百本，分发所有撰稿人并赠给母校及经管学院若干本作为纪念。参加写作的15人是孙绳武、陈方澜、韩维彩、王升堂、马遵德、马瑞玉、刘淑端、钱琳、王扬、李英才、杨清桂、田盛文、李鸿超、刘善述、穆嘉琨。本来还想邀请卫佐臣、徐德骥、樊亢等人参加撰写文章，但因为个人或老伴健康原因未能参加。秦敬先突然患病，很快就走了，十分遗憾。

1、按年龄划分，最高95岁，最低的88岁，平均90.3岁。

2、他们的工作地点分布在京、沪、西安、南京、内蒙、青海、台湾等十个省市。

3、简要介绍他们的简历以及写作内容：

①陈方澜、孙绳武、韩维彩、王升堂四位，他们在校时就是进步分子，投身革命，学有专长，进入社会后，表现突出。陈方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研究员，青海省政协委员、顾问，是名闻西北的经济学家；孙绳武，俄文翻译专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出版社副总编辑，译著甚多，曾获邹韬奋编辑出版奖；韩维彩，是中共西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曾任贵州农学院讲师、副教授，后调贵州省委党校教授；王升堂，中共西大地下党支部委员，包头钢铁厂高级经济师。他们所写的文章既有革命的经历，又有学术上的见解。

②马瑞玉、马遵德、刘淑端，这三位都可称为女中俊杰，也都是终身的教育工作者。马瑞玉，一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她是一个十分刚强果敢的女性，抗战中辗转万里，锐意求学：她面对不幸的婚姻但能正确对待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事迹十分感人。马遵德，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女性，解放前曾在财政部会计处工作，曾参加南京民主妇联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调大连，从苏联手手中接受财务工作，担任大连高校财务主管，直到离休。刘淑端，她毕业后留校授课，认真工作学习，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逐级提升为教授，她是罗章龙教授的爱徒，晚年致力于研究罗的历史和学术成就，颇有成果。

③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钱琳，王扬、田盛文、穆嘉琨四位，他们在旧社会都当过几年的旧公务员，在政权转变过程中，成为了国家机关工作干部，他们热爱新中国、新社会，拥护党的领导，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成就卓著。王在地矿战线，钱曾参加抗美援朝任翻译，复员后一直从事军工战线工作；田与夫人乔皓大半生从事中等学校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多年；穆在江苏省教育厅从事计划财务、教育科研工作达五十年，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耗尽心血，作出了贡献。还有李英才、杨清桂、刘善述三个同学，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曾遭遇坎坷：李英才进了国家建材局，曾被错划为右派。杨清桂，1948年在解放开封的战役中参加革命，南下武汉，作为军管代表接管银行，岂料因与大别山匪首同姓名被误打成

反革命，进入死牢，后被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分配到中南财大搞后勤工作直到离休。还有刘善述，毕业后在西安当公务员，“镇反”时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坐牢 21 年之久，1975 年被特赦释放，回三原乡下与妻女团聚，做过农村文化工作，未再担任公职，以诗书为乐。以上三人均富有才华，旧学、新学具有基础，擅长写作，杨曾翻译陈独秀传略，李曾写过数本小说与诗集正式出版，刘也曾有诗集出版，他晚年所写的纪念于右任一生成就的长诗，曾登载在画册上在台湾发行，与马英九、连战、萧万长题词并列。

④台湾的李鸿超，他是本书撰稿人中唯一的文学院历史系 44 届毕业生，大学毕业后曾任他的家乡陕西彬县中学校长，后在西安国民党党部工作，被选为国大代表。随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弃政从教，与台湾的陕西同乡大佬全力创办、发展明新技术专科学校，并逐步升级为学院、大学，成为知名的教育家，先后任该校的校长、董事长、创办人。经常到西安参加母校校庆活动并进行资助，被推选为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多年。他逝世后，校方曾写专文悼念，西大曾组团由一副校长为首到台湾明新大学参观交流。。

《九十老人母校情》出版后博得西大有关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认为这本书出自众人之手，虽然形式内容殊异，但是贯彻一条主脉，大家都是有志之士，志在爱国、救国、建国，为我们的伟大民族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奉献。这本书写的是“母校情”，包括了“师生情”、“校园情”、“革命情”、“亲人情”、“事业情”以至“城固情”等等，但反映更充分的是“同窗情”，仅凭这十来位分散在全国十个省市的老人因无缘聚会而只靠通讯手段来交流探讨，终于完成了各自的写作，这是十分难得的。由此说明母校情、贯彻终身的老同学之情的巨大威力与无限的魅力。江苏省著名学者、曾任中央社科院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立人读了此文后，曾为此书写了序，名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声”，在文中他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衷心的赞赏。

2012.7.30

百岁老人 缅怀母校

马瑞玉

一、实现大学梦

1940年我考上了辅仁大学，实现我十余年的大学梦，自是高兴。记得接到录取通知的晚饭，妈妈为我做的打卤面（家穷平时不吃的）特别好吃，也说明爸妈对我的上进也是十分高兴。还记得三哥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也是一个惊喜，爸爸说没钱上我在北大门前卖香烟也要培养三哥大学毕业。两位老人对我们兄妹的期望很大呀！

二、好事多磨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一时间真的是国无净土，民不聊生，北平沦陷了，完全被日敌统治，当时北京大学以及京津有名的大学为逃避敌人压制，特别是时有敌人包围学校抓捕爱国青年学生，大都迁到云南昆明和陕西城固。

1942年第二年第一学期的我刚凑齐学费到校注册上课。由于初中阶段我上的师范，高中阶段又因家贫多次休学工作筹学费，英语很差，大二的课本多系原文，所以学起来很困难。经三哥介绍他的同学为我补习英语，都在星期日到补课老师家，去时必经北海团城，总见到不少青年男女学生到那里去，我也好奇地随他们进去，看到这些学生唱歌谈笑很热闹，有人说日本鬼子进来我们就唱歌跳舞走出去，大家聚起就气愤痛恨地宣传抗日，我也气愤同慨，因为我多次受日本鬼子迫害（我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经历”一文中详述载入“九十老人母校情”一书中，此书系西北大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老校友回忆录）。

三、踏上流亡之途

一天中午，在我回宿舍路上，一位高班大姐拦住我问“你是马瑞玉吗？今天你必须离开北平！”我没来得及答话，只点了头，那位大姐转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寻思着，我与她素不相识呀！上午听同学嚷嚷“日本鬼子又要抓学生了”，在沦陷区这样事情时有所闻，闹的人心不安，今天是不是来辅仁大学抓学生啊！抓我？我考大学时考虑到北大、师大等校主体均已南迁北往，沦陷区的北大师大名存实亡，完全在日伪统治下，而辅仁大学是洋学堂，日本鬼子不敢染指。学费昂贵我真不敢望津，思考一再，决不做亡国奴，便自作主张，依然报考辅仁大学。没想到，日本鬼子胆大包天，连辅仁大学也不放过，孰不可忍，但又无奈！

我一个弱女子实无办法，便找到父亲牛街邮局工作的老乡，他颇多见识地很热情地为我们指点，必须走乡间小路比较稳妥，并介绍我们去西安找他的同乡帮助我们。

晚上天蒙蒙亮，我带着一家老小登上三轮车直奔前门车站，唯恐遇到熟悉的人。在火车里，望着这老小一大家子，心里没个底儿，竟是带家人逃亡，可哪里是安全地呀！正在百思不解时，火车味的一声停了，看站牌写着“介首”，这是我们流亡的第一站。站上的日、伪军声嘶力竭地盘查出站的旅客，轮到这儿却被扣留在一旁，我的心乒乓地跳，凶多吉少呀！经过长时间的盘查，我出示我的学生证，才放我们回到客栈，人们都惊喜地说到那里去（指日本宪兵司令部）多是有去无回呀。

深夜，有人敲门，我不敢开，以为是抓我们来的，真是吓得魂不附体。门外人说是北平同仁堂采药的，与我们是同路人，听音是北平口音，便开门让他们进来。这两位确是同仁

堂的，他们经常到西北采购药材，对这条路很熟悉并指我们路线和经验，因此以后的路比较顺利，遇到日本关卡给几元大洋便得放行，遇伪军只要给一二支香烟便顺利通过。过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冬棉衣没发下来，站岗的兵披一床破棉被十分可怜，爸爸给了他一盒香烟，因为他们也是为抗日站岗。

一路风餐露宿，经过日、伪军多次关卡盘查，约两月余辗转惊险路途到西安，得助于至亲好友的帮助又同三哥联系上，把家安定下来我便申请借读西北联大，就读法商学院。

四、投入母校怀抱

西北联大设在城固镇的城内，校本部就在那里，文学系、历史系、数理等系也在那里上课，法商学院在城外，经济系、商学系等在这儿上课。

我首先到校本部报到，是由几位不相识同学热情地带我去注册，后又陪我去离校本部约一里路的法商学院，她们像姐妹一样领我去女生宿舍，为我找到铺位，将我介绍给宿舍同学，使我感到回家的温馨，冲淡了一路的惊涛骇浪心情。联大是我的家，安全的家。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情同手足。这个宿舍有两个先我来的辅仁同学，更是亲切呀，我还为一位张淑辰同学做伴娘，另一位高一班经济系的同学，她们对我尤其关爱复加，毕业各飞东西失去联系，后来听说她们两早逝，我很悲痛，想不到毕业分别竟成永诀！这宿舍里同学是各系各班的学生，日间大家都分散着上课去了，很少见面，因为抗战时的学校建设不像以前那么完善，教室也不固定，有一个大教室是上课用的，比如我班男女生有73人上课，下课就走很少联系，男生多过女生，我班仅有十几个女同学。我是后来的，认识同学更少，到毕业时我只能认识十几个男同学，那还是在同乡会或同学会上认识的。我因为流亡途中耽误了半年课程，需要补足学分才能如期毕业，而要补的课有的在校本部，有的在法商学院，要城里城外的跑，赶着去上课，因此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小快马”，我并不去理会它。院系每年篮、排球赛时总认识球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坤伦、马遵德两位同学。解放后从上海校友会得知她们都是教授。可谓母校培养的女英才，令我钦佩。韩金铮同学是商学系的，我们在同一个宿舍，我睡上铺，她睡下铺。课余时，我们两人总在宿舍看书。她很沉静，不大与别的同学交往，宿舍里一般只有我们两个人，很安静。久之我主动同她交谈，原来她也是喜欢聊天的，慢慢地我们成了好朋友。一九四四年毕业时还合影留念。经过几度沧桑动乱，这张合影我还一直保存着。一九九二年通过上海校友会，我们俩取得了联系。我们分手后，她在台湾任教多年。年事高了就随女儿在美国安度晚年。当时我十分高兴，给她寄去我们毕业的合影。此后我们经常通话、通讯，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她离世。由于远隔重洋，有生之年始终未能见上一面，成为终身的遗憾。还有一位韩凤霖，平时彼此关系很好，互相体贴照顾，无话不谈。我们一直保持了六十余年的友谊，她现住在河南新乡，她教了一辈子的书，有六个子女都从教，晚年生活很幸福，还不时打电话、写信给我。

五、缅怀敬爱的老师们

我们经济系老师都是知名人士、名教授，这些老师原是京津名牌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人，是真正教书育人的楷模。有的老师告诫我们不要读死书要都活书，关心国家大事调查社会现象……的知识和道理，教学认真要求严格，令我受益终身，对我的启发很大。只知读好书，学好本领，不管身外事就是读死书。母校给我指出方向，老师教我做真正的人对我毕业后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增强我工作的毅力和辨别能力，这都是老师们潜移默化给我的启发和力量。

我们经济系教财政学的老师是曹国卿先生，教国际贸易学的是季陶达先生，教统计学的是孙宗钰先生，教经济学的是罗仲言（即罗章隆）先生，教社会学的是王守礼先生。先生们认真为学的楷模，教书育人的精神以及爱护学生的慈心令我敬佩、感动，我永铭在心，老

师们安息吧！

六、意外的灾难

1944年是大学毕业的一年，心情十分喜悦，整天忙于毕业考试，星期日也不肯放过。同学们相约到汉江边玩去，而我仍在宿舍里复习功课，猛抬头宿舍里充满灰尘还夹杂着砖头泥块从屋顶落下来，我的身上满是灰尘，桌上也落满灰土泥块，正在发愣，忽听后墙敲打声，便急忙跑出去，见有两位工人持锤砸墙，转身又看见军事教官贺范理站在远处指挥，此人在学校里权力很大，一向压制学生，我走过去，贺竟向我怒气冲冲地呵斥，我也没好气地对他说我从敌伪军数道关卡逃出来，没死在敌人手里，难道要我死在你们手里吗，并转身对两位工人说砸死人要偿命的，他们听我一说便怏怏地跑了，贺见情也无趣地走了，一场灾难被我制止了，幸免于死。为此学校当局听了贺的片面汇报要开除我。你们要杀人，我要自卫，抗拒何过之有？由于老师出面才免了开除。为警戒后来者，即杀鸡给猴看，记我两大过。

后来才知道砸墙事件是为了怕新生受老生影响，这样卑鄙恶劣行径隔离了人，贺但切不断学生们的爱国心！

举行毕业典礼后，手捧毕业证书背负着两大过重回宿舍，砸烂的后墙痕迹依然存在，可我的伤痕至今未能抹掉，我已97岁，我将带着它们同归于尽吧。

马瑞玉写于北京，时年97岁

2012年6月10日

回忆西北联合大学

——西北工学院大学生对我们的教育

李钟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我从高小毕业了。当时咸阳县县城里只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和一所简易师范学校。另有三所私立中学，其中的东望中学、东北中学均为张学良将军所领导的东北军的抗日烈、军家属遗属举办的，这两所学校也都是专为东北军军队子弟举办的（也收少量地方学生）。另一所是当地教育界人士举办的。虽然，我都考上了，但是权衡利弊后，还是选择了东北中学就读。因为此校离家较近，吃住在家，花销也不多。这所学校就设在当时县城内的安国寺里，两座教室是由一个寺庙改造而成的。中学二年级在大殿上课，我们一年级则在侧殿上课。学校校长名叫马家兴（女），教导主任是一位教《公民课》的刘老师，管生活的干事是邢老师（女）和打铃工人刘师傅。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人员。

这所学校由于是私立的，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所以校舍非常简陋，桌凳都是另两所学校停办后，转让给东北中学的。平时教师的工资、学校各项开支都要靠校长向当地政府、东北军、商会、工厂等处化缘资助。尽管学校经费困难，真是穷得叮铛响，但是教学工作却丝毫不马虎，校长聘请了一位从东北来的很有学养的老先生刘国瑞教我们国文。老先生教我们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和《古文观止》文选等，并且要求必须通背，这就为我们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校长还为我们聘请了一批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校址在现咸阳市火车站北边，即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的校址上）的大学生教授各门课程：纺织系的学生教我们英语，后来换了一位西工的女大学生教英语，她不仅要我们背诵英文课本，课外还教我们读《呐喊》、《聊斋》（均为英译）等；采矿系学生教我们化学，但那时的学校没有任何像样的实验条件；电机系一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大学生教我们音乐；土木工程系学生教我们数学；机械系学生教我们物理；水利系学生教我们体育。这批大学生备课非常认真，讲课时板书字迹工整。辅导答疑，批改作业都很负责任，极其仔细。课后，全班同学几乎都在仿学老师所写的英文字母、单词、化学符号、数学画图等等。有的还模仿老师走路的神态，讲课的语调，答疑的笑容，老师所讲方言的土音土韵等。

特别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一次寒假，我们五六个同学约好，多次冒着鹅毛大雪到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大学生宿舍，请求老师为我们辅导相关课程，老师们冒着刺骨寒风，立即领我们去其工字型平房教室。我们第一次进工学院教室，那里边没有书桌，每人仅有一把木椅子，椅子上没有左扶手，只有一个右扶手，扶手前边连着一个椭圆型的写字板，能放书本，能放笔记本。所有老师没有嫌我们笨拙、不机灵，而是搓搓手，哈哈掌心，边讲、边板书，耐心地讲、反复地讲，直到我们听明白为止。暑假里，老师们则是汗流浹背地为我们面授，很辛苦。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给老师送过任何礼品，从来没有请老师吃过饭。仅仅在临别时，给老师深深地鞠一个躬，说一声“谢谢老师”，就回自己的学校了。西北工学院学生那种对所教学生的关爱、热情、负责、敬业精神，时至今日，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回忆起当年受教的情状，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这批教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任教时间不长，仅仅两年多，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却留下了极为深刻、美好、永生难忘的印象。有两点至为深刻：一是他们秉承了“公、诚、勇、毅”的西北联大西工院的校训精神，以“科学救国”的教育思想给学生们以传

递；以他们的爱国理念，教育学生以公正、诚信、勇敢、坚毅之精神对待生活，报效中华民族。二是他们不仅给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运用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专业知识感染学生和引领学生。这是学生们感受特深的地方。

三四年前，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老同学在西安聚会时，无论是来自哈尔滨、大连、东营，还是来自大理、桂林、重庆、柳州，或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或者是老“海归派”。大家在一起，除了交谈离情别意、几十年的不同经历、心路历程等，谈得最多的还是对我们上过课的各位老师的印象，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老师的音容笑貌、讲授内容。谈到深情处，大家还会吟唱起当年老师教给我们的《马赛曲》、《毕业歌》、《满江红》等。背诵着《安徒生童话》（原著）中的《买火柴的小女孩》和《呐喊》（英译）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以及《聊斋》（英译）中的《聂小倩》等，怀念着已经记不清楚姓名的各科老师……

正因为这些诲人不倦的西北联大的准老师的悉心教导及老师本人所学专业的深刻影响，所以，高中毕业时，我们这些同学中，有四人考上了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分别学习电机、采矿、纺织、水利等专业。两人考上了军校。我曾想学纺织，还专门去西北联大西工院访问过陆教授，后因家境突变，考取了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虽然术业有专攻，但是，我仍多年与西工院纺织专业的老同学刘启秀、张平国（均已故）有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经常在学术研讨会上与早年从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毕业的陶秉礼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卢一新教授（原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务长）、张乐善教授（原西北纺织学院院长）等在一起，常常回忆起当年西北工学院的名人趣事，学风、教风和校风……以及所培养的精英人才、给国家的卓越贡献等，众人常常是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中共陕西省委原常委、副书记、副省长曾慎达同志回忆自己在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学习的情景时，曾经亲自对我说：“我是1947年考入西北工学院的，学的是机械专业。当时先在陕南城固县的古路坝上学，后来才迁咸阳的”，“我毕业后先在工厂里工作，后来调到省上工作。我们那一届省级领导班子中，我是1951年大学毕业、唯一的一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每当回忆到在西工院学习的生活时，80多岁的曾老心情格外兴奋，语速特别明快，记忆格外清晰，不愧是由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培育出来的精英人才。

上述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优良传统，正是从西北联合大学到西北工学院的宝贵精神潜移默化、精心培育出来的。包括后来所分化出的理、工、农、医、师等等高等学院，也都是西北联大扎根西北，开出的鲜花所结成的硕果。

今天，理应对西北联大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梳理与评价，并加以科学的总结，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好地指导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便于莘莘学子继承发展，发扬光大；使现今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得更快更好，更符合中国实际。

西北联大三位名师传略

李钟善， 刘新科*

马师儒（1888-1963）先生传略

马师儒，字雅堂，男，汉族，1888年生，陕西米脂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爱国学者，民主主义教育家，曾任国内多所知名大学教授，两度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度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系主任，为国育才，德业高崇，成绩辉煌。

马师儒出生在陕北米脂县一个书香之家。父祝龄，字子椿，前清廪生，热爱教育事业。陕北地瘠民贫，文化教育较为后进。马师儒自幼在私塾读书，塾师是本地区有名的严师，只知教学生咿唔背诵《四书》《五经》，没有思想启发，完全是填鸭式教育，经常以斥责、罚跪、打手板等为教育手段，学生以读书为苦事、视入塾为畏途。马师儒对这种教育十分愤恨。他在以后写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小时候受过书房老师的毒打，身体上时有发青、发肿部分，犹有余痛。在我后来十年的教育中，无论是对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我既坚决地反对封建社会的旧教育，又彻底地反对对幼年儿童用野蛮、粗暴的体罚。”

马师儒开始接受新教育是在1906年。他的姑丈高又宜（祖宪）早年受业于泾阳、味径书院山长、被尊为“关学后镇”（梁启超语）的刘古愚（名光蕢，字焕堂，1843-1903），1902年中举后任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教席，富有维新思想。1906年回到陕北创办绥德中学堂，任监督（校长）。马师儒考入该校，才开始接受当时的新教育。高又宜以“勤学爱国”为校训，经常勉励学生说：“鸦片之役，列强知我积弱可欺，鲸吞蚕食，瓜分豆剥。大好河山，沦于异族，神明华胄，降为奴班，祸莫惨于国亡，哀莫大于心死，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前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马师儒对此耳熟能详，信守笃行，深感绥德中学堂教学内容之进步、教学方法之合理，这对他尔后致力进步工作、攻读教育科学奠定了基础。

1907年，高又宜率领陕北学生马师儒等十余人赴日本留学，大大激发了未出国学生的豪情壮志。高又宜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与陕北旅日先进人士创办《秦陇报》，自撰发刊辞，宣传革命，流布国内外，对马师儒的政治思想启发很大。这时他关心时局，对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刊》开始感到新鲜，但经过一段时间，却认为那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后来孙中山先生同盟会出版的《民报》成了他的必读之物。当在上海亲自听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公开演说后，马师儒便很相信孙中山。在自传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新主张是正确的，是能成功的。”从此，他抱着“科学工艺救国”思想入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学习工科；继而转向“教育救国”的道路，又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学教育。高师毕业后以品学兼优留本校附中任教。——这是1913—1919年的事。

马师儒说：“在此期间，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勃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切想法，使人感到辛亥革命虽然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但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我有出国的必要。”于是于1921年考入德国柏林大学修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四年结

*李钟善，陕西师大教授、前校常务副校长。
刘新科，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业，通过考试、答辩，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撰写孔子、孟子、王阳明、颜元等教育思想文章，发表于德国教育杂志，得到德国教育界的好评。接着转入瑞士曲里溪（苏黎士）大学继续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并专门攻读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三年，经过考试、答辩，又获得瑞士教育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后，历任榆林中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教育学教授兼系主任，其后在北平和山东诸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北联大的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2年春，马师儒在西北联合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因奔父亲丧葬，由城固回到陕北米脂县，在延安晋谒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宴请他，特邀历史学家、老同事范文澜作陪。毛主席很详细地给他讲了共产党的发展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也讲到他自己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等。特别是评论了过去国共两党先由分而合，后来又由合而分的过程。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名义上是合作的，而实际情况则不是这样的。陕甘宁边区被封锁，被威胁，被攻击的紧张形势，现在已是无加无已。他听后立即回答：“主席讲的这一些事实，是我亲身经历的，也是我来往边区沿途亲自看见的。事实胜于雄辩，我打心眼里敬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经过这次谈话，马师儒对毛主席的“体大思精”极为崇敬。在他的《感怀奇遇》诗中有“平生奇遇只一人，体大思精迈古今；展开历史四千载，革命功勋莫与京”之句。在参观了革命圣地的工厂、学校、机关之后，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作公开演说，发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战争的真诚的认识与乐观的展望。他认为要救中国可怜的孩子，必须象延安一样改变中国的旧教育：“延安是奔向社会主义的站台。”在辞别边区时，边区教育厅长贺连城同志问他在边区的观感，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就象咱陕北所说的新发户；反过来，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倒象一个破落户。毛主席体大思精，所望群策群力，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历时半年，马师儒返回西北大学，积极鼓励支持女儿马昭信（艾松）参加学生运动，马昭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传讯后开除，即赴延安投身革命。

马师儒的延安之行，于当年9月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披露，大大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伪教育部部长来令申斥：“身为文学院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政治，应予警告！”当时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执行上级指示，免去了马师儒的文学院院长职务，并下了通辑令，阴谋对他“痛下毒手”。在这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马师儒恭录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对家事作了安排，准备为正义牺牲。关于马师儒的延安之行，《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中有一段记载：“马师儒教授老家是陕北米脂，有一年他回家奔丧，毛主席宴请了他。席间，毛主席嘱咐马师儒回到陕南后，代他问候黎锦熙先生。马师儒回到陕南，在西北大学‘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嗣后，马师儒被教育部解聘了。”“因马师儒先生是陕籍有名望的教授，多年任西大文学院院长，在舆论上和心理上他们不得不考虑带来的后果。”终于毒手未敢“痛下”。

1946年，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由于镇压学生自治运动遭到反对，去职。国民党政府迫于革命形势与社会舆论，不得不起用政治开明、学行为社会推崇的原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教授为西北大学校长。

马师儒任职后多有建树。在成立自治会、保护学生等方面，他公正开明，深得师生好评。他上任后积极增聘教授，曾几次亲赴南京和北平为西大约集人才。由于他在国内学术界交往甚广，仅1947年暑期后，即新聘专兼职教授37人，并积极邀请名家讲学，为提高西大教学与学术水平，尽了心力。

马师儒主持校务后，首先任命与他同乡且思想一致的语言及音韵学家高元白教授为秘书，协助他处理学校重大问题。尤其在抵制伪党团混入学校、拒绝特务公开或隐蔽与学校联系等方面，马师儒态度明朗坚决，革命师生无不心悦诚服，拍掌称快。政治系有一特务学生

孙某为反对马师儒的进步措施，公然挟持手枪气势汹汹到校长办公室威胁说：“我在西大的任务就是随时可以逮捕任何一个学生。”当场激怒了马师儒，他拍案训斥：“我是西大校长，随时可以开除任何一个学生！”针锋相对的呵责，特务学生只得悄悄溜走。

为了抗议西安警备司令部军警在西安南院门电影院打伤学生，马师儒率领学生代表们向当时驻陕反动军政头目胡宗南、祝绍周要求登报道歉，赔偿医药费。反动当局虽然勉强照办了，但终于认为有损于他们的威风，对马师儒怀恨在心。事后马师儒遭到迫害，特务们准备“再下毒手”，加之“马师儒先生以六十高龄积劳抱恙，奔波于宁、沪、平、津、为聘任名流教授苦心游说之中，”（《西北大学校史稿》第201页）国民党教育当局又多方掣肘，应付这一局面亦感力不从心，他便辞职，于1949年春赴四川大学讲学。

解放后，马师儒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积极从事教学和培养助教工作。在西安师范学院（后来的陕西师范大学）讲授中外教育史凡九年，每年都重写讲稿，他认为形势在发展，每届学生都各有特点，教师自己的思想也有不少进步，只有不断吸取新知识，了解新情况，才能做到以己之昭昭，使人昭昭。自己有了真正的感受，才能更有效地启发、教育学生。

上个世纪60年代教师退休制度尚未实行，马师儒已年逾古稀，院方党政领导见他目力不济、手腕颤抖、阅读书写都有困难，一再劝阻他停止教学、专门培养助教。他却说：“培养助教是义不容辞的本职工作，一定尽力而为；现在我的体力确实差了些，但脑子清醒，一定要上课，我情愿倒在讲台上。”这种为教学工作的赤诚心怀，感动了学校的领导，校领导同意他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如在课堂教学中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教，备课时他口授，助教笔录；上课前助教搀扶他到教室，讲课时助教板书。这样持续了两年。他常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包括建设祖国的各方面，必须认真研究。

马师儒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极为重视，坚持读文件和报刊杂志、写学习笔记心得，关心国家大事。1963年，马师儒在医院的病榻上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体会。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小子有何能？学愚公，辛勤，辛勤，莫负此心！”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礼记·学记》篇谓：“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马师儒教授道德文章，高山景行，弟子们无限缅怀宗仰。他的千百门徒，术业多有专长，继续绳绳，对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心力，先生的善教，可谓不朽。他长期从事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的教学及研究，著作有《教育概论》讲义、《现代教育思潮》讲义、《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中国教育史》讲义、《哲学概论》、《教育哲学》等多种教材和专著，另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等手稿；逝世前他将自己长期使用、珍藏的教育书籍120册分赠给弟子及教育科学研究室。

晚年的马师儒还担任中外教育史教授兼教育史教研室主任以及校务委员会常委等职。社会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西安市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马师儒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因心脏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5岁。陕西师范大学于八月三十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追悼会。其悼词由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刘端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刘泽如、常务副校长郭琦、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统战部、文教部负责人共同讨论定稿。并由时任陕西省高教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李绵致悼词。

马师儒先生与陕籍著名学者吴宓先生交情颇厚。吴宓在1961年9月23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在西安访学期间“马老师儒，赠梨与枣各一方盒。交谈1949、1950年避居四大学及瑞士风景、习惯”（见《吴宓日记（续编）1961-1962 P: 187》）。又在1963年10月20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得悉，马老师儒 雅堂，1963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安第二附属医院因心脏病逝世。紧张，不到二十分钟即歿（按马先生前年见，宓甚亲厚，盖一有福德之人）。

陕西师大八月三十日公祭”（见《吴宓日记（续编）1963-1964 P：83 足以证明马师儒与著名学者的深厚友谊及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马师儒先生是民主战士、爱国学者、躬行实践的教育家。

郝耀东先生（1891-1969）传略

郝耀东，别号照初，男，1891年农历12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杜永村（属今郭杜镇）。著名教育家。陕西师大前身创办于1944年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教育界著名教授。

郝先生的孩提时代，生活在中国传统的农耕家庭。父兄多以种田为生，唯二兄为前清秀才，在私塾任教。从懂事起，先生就为家里放牛，为父兄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九岁起开始在家乡的私塾读书，农忙时仍要回家参加劳动，从小就对农村生活有深切的体验，对农民的疾苦有直观的了解。1904年，郝先生就读于咸宁高等小学堂（现为西安市开通巷小学），据先生回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到交纳学费时，每次向母亲要钱，都要流许多眼泪。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的革命志士揭竿而起，积极响应。当时，先生正在西安府实业中学上学，由于政权更替，学校暂时停办，先生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受时任秦陇复汉军都督府秘书长的实业中学国文老师李子逸先生指派，担任南城门守卫，后被调回都督府，做译电工作。先生晚上翻译电报，白天到由李仪祉先生主持的三秦公学留学预备科学习。陕西省考试选拔留洋学生，先生考取留美的三名正取生之一，被派往上海学习英语。出国前，陕西政局有变，陆建章督陕，令未出国者停止出国，先生失去了一次留学机会，遂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1920年毕业后第二次考取了送美留学资格。

先生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在美国留学期间。

1920年冬先生到美后，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斯丹佛大学。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两件事先生印象最深，一件是先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件是直接参加爱国政治活动。据先生回忆：“我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19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这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选修了一门课，叫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的内容，系研究讨论下列一些问题：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等等。这时我初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并深深地相信社会主义最后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方法上很欣赏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即不流血的革命。”先生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是在1921年，当时美、英、中等九国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中有要求日本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的内容。先生在美国西部联合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组织，强烈要求日本归还中国领土，并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反日宣传活动。

先生于1924年在斯丹佛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后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事了一年研究工作，于1925年回国。归国后先后在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安庆安徽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

1943年下半年，陕西的一些有识之士，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陕西各中学任教的许多外省籍教师，将大批离陕，所以力促当局建立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以解决将要面临的中学师资匮乏问题。当时，郝先生任教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1944年7月，受陕西省政府之邀回陕担任校长，主持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务工作。

据中华民国六十五年十二月国立教育资料馆编印的《教育资料集刊》第一辑、民国教育纪事续编第一辑载，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陕西省政府聘郝耀东为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第一年招收学生五班二百五十名（该校本年一月筹办，校址设在西安崇廉路，“键七七三页”【P：一七一（三五七）】）”

省立师专校址选在西安市北城崇廉路37号女子中学校址（现西七路西安中学）。创办

之初，房舍简陋，图书、仪器严重不足，师生学习、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还经常发生学生断炊的情况。据1945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概况调查表”记载，当时师专有教室10间，学生宿舍25间，教职员宿舍30余间，其它用房10余间。另有办公厅一座9间，礼堂一座，操场一个。校园占地约30亩。郝先生为了解决办学面临的各种困难，四处奔波，筹措资金，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他办学民主，兼容并蓄，广泛聘请不同学术流派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不乏地下共产党员和有进步倾向的教师。建校时师专共设置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五个学科，学制三年，首届招生268人，但专职教师只有7人，郝先生便从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院校聘请兼职教师任教。1946年，在郝校长多方劝说下，师专购置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校址约100亩，并修建了181间校舍，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同年8月，在郝先生的主持下，省立师专汉中分校成立，分校开设国文、数学两科，招生100多名。学生一、二年级在分校学习，三年级转西安校本部学习。师专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足，但在郝校长的领导和人格影响下，教学质量得到了应有的保证。

师专建校三周年校庆时，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教书的苦与乐》的诗，尽言心志。教书苦，既有劳作之辛苦，“舌焦唇敝，搜肠枯肚。”又有生活之艰苦，“妻寒不能暖，儿饥不能抚。”还有精神之抑苦，“洁身自好遭排挤，曲事逢迎得称许。”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广大教师的同情。但先生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充满感情和由衷热爱的，“教书乐，乐如何，满堂儿童笑呵呵。”看到渴求知识的后生学子，舌焦唇敝之苦烟消云散。先生深得“勤耕耘，慢收获”的奥妙，抱着对后学高度负责的精神，“精研讨，苦思索，百年大计细揣摩”，精心组织教学。看到“天下英才入网罗”，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他快乐呢？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大专院校中，国共两党或秘密或半公开的斗争非常激烈。郝校长思想开明，虽身为国民党陕西当局委派的校长，但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活动并不热心，而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活动。1945年上半年，中共地下党员王维祺主编的进步报纸《文化周报》为弘扬“五四”精神，抨击国民党的思想控制，推动陕西民主运动，筹备在省立师专召开“五四”座谈会，国民党当局甚为震惊，派遣特务监视和捣乱。郝先生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会议如期在学校召开，西安各届名流景梅九、关梦觉、李敷仁等参加了会议，郝先生在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1947年，西安进步学生“六二”罢课的前夜，国民党当局实行大逮捕，师专有13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当时，郝先生带领部分学生在南京参观，返校后，立即和国民党教育当局交涉，营救被捕学生，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使学生悉数获释。国民党教育当局令郝先生在学校成立所谓“锄奸团”，以对付共产党，先生坚决予以抵制。当局给学校发送的反共传单，先生交给有关职员，让其原封不动地保管起来，不予散发。对列入国民党教育当局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只要先生探听到消息，都暗地里通风报信，促使其离校，以免遭逮捕。

先生同情进步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态度，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便采取调虎离山之计，迫使先生于1948年8月辞去师专校长职务，迁任安徽大学教授。

解放后，先生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任教。1960年，主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1965年9月退休。新中国成立以来，先生曾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安市政协常委，积极参与议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言献策。

先生性格平和，处事稳健，闲暇之余，喜好围棋、游泳。或邀一二挚友，纹枰论道；或搏击于泳池，无论冬夏。年过七旬，仍坚持游泳锻炼，特别冬泳，令后生敬畏。

文化大革命，先生也在劫难逃，受到批斗、抄家等政治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于1969年3月10日在西安逝世。拨乱反正后，在时任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常黎夫同志的关心下，西安市委统战部于1979年隆重召开了包括陕西师大党政领导和部分师生参加的平反大

会，为先生昭雪，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部长权秉华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先生热爱教育，献身教育，爱国、奋斗的一生。

黄国璋先生传略

黄国璋，男，1896年6月26日生于湖南湘乡。与毛泽东同乡，少时曾与毛泽东先后同学于湘乡东山小学。1911年，黄国璋就读于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这一年9月，毛泽东也来到该校上学。毛泽东一身农家子弟的装束和瘦高的身材，引起黄国璋的好奇和注意。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写了一篇自认为“第一次发表政见，有些不成熟”的文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在校园里立即引起轰动。毛泽东还是该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之一，这些都给黄国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黄国璋先后于1927年9月和1928年秋，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学地理系，获理学硕士学位，是上世纪20年代我国留美学生中专攻地理学而又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学成回国后，黄国璋壮志满怀，广泛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构建中国地理学教学和研究体系，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

黄国璋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早在1936年，他就被推选为中国地学会总干事。抗战胜利后，地学会恢复活动，又被推选为副理事长。1940年，黄先生在重庆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研究员兼所长。1950年中国地学会与地理学会合并，更名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担任第一任理事长，以后还曾担任陕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黄先生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了《社会的地理基础》、《我国国防与地理》、《中国地形区域》、《北美自然地理》、《爪哇——低纬农业之研究》、《学习本国地理的第一要义》等多部论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上海地理位置的抉择因素》一文，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曾刊载于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会刊上。这些学术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地理学界的泰斗地位。

黄国璋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借助其殖民地缅甸，大量掠夺开采中缅边界的银矿。由于当时疆界不清，外交谈判缺乏实据，致使我国处于不利地位。黄先生受命组织人力，筹措经费，购置仪器设备，1934年率队赴云南边界进行地理和疆界考察。在人迹罕至、毒蛇猛兽出没的崇山峻岭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半年，不仅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系统地获得了云南热带环境资源、民族和社会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抗战时期，黄先生以他在地理学界的突出地位，结识了大量文化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先生即是其中之一。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忧虑，经常聚集在一起以座谈会的方式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在许德珩先生的倡议下，许德珩、梁希、潘菽、黄国璋等人经常参加的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邀集爱国民主人士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为了掩人耳目，电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亲赴重庆。当时在重庆任职的黄国璋到机场迎接他的老同学毛泽东。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其间，会见了许德珩夫妇，并建议在“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勉励，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黄国璋先后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参加了反独裁、反内战、反暴力的民主运动，并以个人名义和一些知名人士发表了“反内战、要和平”的声明。北平解放前夕，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的黄国璋，顶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胁迫利诱，拒绝逃往台湾，与广大师生一起护校、护产，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北师大地理系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九三学社，黄国璋是许德珩的主要助手之一，特别在建国初期，协助许德珩主席为学社总社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

贡献。1950年11月在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会议上，黄国璋当选为社中央秘书长。

1949年6月，担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的汤璟真先生给刚进北平不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信后很快和汤先生取得联系，当得知在北平还有他的老师黎锦熙先生（陕西师大前身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及黄国璋等老同学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到北师大看望，并自设宴席招待他们。6月17日，汤璟真约了黎锦熙、黄国璋、傅仲嘉等在住所门口迎候毛泽东主席。在汤璟真的陋室中，毛泽东和他的同乡籍老师、友好同学谈笑风生，既有同学生活的美好回忆，又有对老师的尊敬，还有对建国方略的倾心探讨。黄国璋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许德珩、潘菽、黎锦熙等人在重庆、兰州等地知识界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九三学社的情况，毛泽东神情关注，频频点头。当黄国璋说到九三学社总部迁到北平后，孟林（汤璟真）也参加进来了，毛泽东连声说：“好，好，好哇！”毛泽东诚恳地希望他们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团结文教、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建设新中国再做贡献。

1952年10月已是二级教授的黄国璋先生奉调来陕西工作，先后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代系主任，西安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代系主任、系主任等职。

黄国璋教授是一位热爱高等师范教育的教育家。在他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十多年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地理学科专业人才，其中有不少是我国当前地理学界的有影响的院士、专家、教授。1956年，国家教育部就确认黄国璋教授为全国高校代培经济地理学进修生的学科点，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是全国最早设立培养高层次经济地理学人才的院校之一。黄国璋教授教学经验丰富，治学态度严谨，先后讲授过中国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学导论、地理教学法等课程。他备课认真，讲授深入浅出，对学生严格要求，并能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教学中去，深受学生好评。在主持地理系和负责陕西省地理学会工作期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特别注意为青年教师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他六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和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跋山涉水，到陕南山区进行野外考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六十五岁生日之际，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入党的要求，并主动公公正正地亲笔写了自传，表达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最高追求。

1966年9月6日，黄国璋教授和外语教研室讲师范雪茵夫妇因不勘屈辱，在红卫兵抄家的当晚含冤辞世。令人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陕西师范大学党政领导专门于1978年6月17日为黄国璋先生举行数百人参加的平反昭雪大会，并又在黄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纪念活动，再次充分肯定了黄国璋教授热爱祖国、不断求知、为地理学科建设和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代表大会，对黄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致力于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及民主科学事业作了充分的肯定，为其恢复了名誉。

说明：《西北联大三位名师传略》是编写者根据《陕西历代教育家评传》、《陕西师范大学校史人物传》、《中华民国教育资料集刊》、《吴宓日记续编》、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编《教育之树长青》等专著中相关资料和陕西师范大学张光远、甘枝茂两位教授的两篇文章综合增删改写而成，特予说明，并致谢意。

作者：李钟善，陕西师大教授、前校常务副校长。

刘新科，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友伉俪叶培大与袁保鑫

陈印政，王大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要：在西北联合大学艰苦的逃难办学过程中，曾留下了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叶培大于1934年考入北洋工学院电机系，1937年西迁后就读于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193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袁保鑫于1934年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又于1937年就读西安临时大学师范学院家政系。1938年学校南迁城固办学，二人相识于逃难途中，相恋于联大校园，并留下“球场上的白手绢”的美丽故事。1941年，袁保鑫毕业后，二人结为校友伉俪，并相伴终生。

关键词：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叶培大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在抗日战火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中，克服师资紧缺、校舍紧张、图书仪器缺乏等困难，坚持办学，并取得了辉煌的办学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为艰苦的办学过程增添了一丝浪漫色彩。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与其爱人袁保鑫，同为西北联合大学校友，他们相识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途中，相恋在艰苦的求学磨砺中，抗日的烽火洗涤了他们的意志，也见证了他们的忠贞。

一、叶培大与北洋工学院

叶培大(1915—2011)，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专家，杰出的教育家，是北京邮电大学(原北京邮电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曾长期担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北京邮电大学名誉校长。叶培大于1934年考入国立北洋工学院，1937年随学校西迁，并于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后留校任助教至1940年。叶培大于1947年至1949年间主持设计、安装、测试了国内第一部采用杜黑特(Doherty)线路100千瓦大功率广播发射机；1956年起率先在国内开展微波通信研究工作，并于中科院电子所合作在H01微波圆波导通信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参与的微波中继通信960路二型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联合七位院士倡议在国家“863”计划中设立通信高技术主题，并于1991年获得通过；1996年又受聘为国务院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后改为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一) 出身家事

叶培大于1915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南汇县新场镇(原属江苏省)，其父叶时茂，号秀峰，于光绪甲辰年应试考取秀才，后就读于上海神州法政专科学校修习法律，又在上海做挂牌律师，不久回到老家开设私塾。叶秀峰与其弟弟叶秀山同为江南小有名气的山水画家，他们的画作被收入《问菊轩画集》、《芥子园画谱》。叶秀峰共有三子两女，按照叶氏家谱，叶培大属“培”字辈，又因为是家中长子，故取名叶培大。

叶培大于1921年随父亲在自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进入家乡新场镇小学读完高小，之后进入以教学质量著称于沪的上海名校私立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在此打下良好的英文、文学和书法基础。受私立学校兴办实业教育的影响，选择大学志愿时叶培大矢志从工。中学毕业后先于1933年入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又于1934年报考国立北洋工学院，入电机

系学习。

（二）求学北洋工学院

北洋工学院前身是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立于 1895 年的北洋大学堂，首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928 年更名为北洋工学院，从此进入专办工科的时代。北洋素以重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发展著称，每当回忆起母校的办学风格，他总是说：“学风朴实，实事求是，教学非常严格，要求高，学生勤奋刻苦。”

叶培大忘不了北洋的老师对自己的培养，这里的老师很多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等名校，教学质量非常高。叶培大曾回忆说：“教我们交流电机课的是电机系主任刘锡璜，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人和蔼可亲，讲课思路清楚，不紧不慢，容易听懂，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美裔教授 James. D. Sertuck 也给叶培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修理电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教我们交流电路，上课劲儿大，大嗓门，逻辑性强，虽然全部是英语，却可以一字不漏地听进去，百分之百地听懂^[1]”。

北洋工学院重视学生培养质量，除了聘请优秀的师资之外，对学生的考查也是非常的严格。院长李书田始终不渝地坚持“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宁缺勿滥”的办学原则，《北洋学则》“从学生日常生活到教学管理，从学生成绩到升留级，从奖励到惩罚，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实行令人发怵的淘汰制^[2]”。勤奋学好的叶培大不用担心考试，他的成绩在前三年连续六年学期保持第一，还因此获得了下一学年 200 块大洋的一等奖学金。

（三）流亡西安

北洋工学院也历来重视学生的实习经历，并明确规定电机工程系的学生必须进行“发电厂实习，第三年级暑假开始起，实习三星期”，“本院支给实习学生由本院至实习处所往返舟车费之半数^[3]”。叶培大就读的第三年级正值 1937 年，当他来到江苏无锡戚墅堰电厂实习没几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实习结束的时候，天津已经沦陷了，无校可归。叶培大只好先回到上海南汇老家。

9 月底，叶培大在家中接到通知，学校已经迁到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一起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要求学生务必自行克服困难，设法前往西安报到复课。这时的上海因为淞沪会战，交通一片混乱。叶培大只能先乘乌蓬船到上海，然后爬上一列路过的军车，路上军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幸好一名军官趴在他身上才幸免无事。到达南京后又乘船赶往武汉，再向西北方向辗转而行，等到达西安时已近 10 月底了。还好，没有耽误 11 月 1 日的开学。

二、袁保鑫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袁保鑫（1917—2011），祖籍江苏省常州附近的武进县。武进袁氏是江南旺族，靠诗书传世。袁保鑫的高祖父袁绩懋为道光丁未科榜眼，官至福建按察使；曾祖父袁学昌，是光绪己卯举人，官至湖南提法使；祖父的族弟袁励准，是光绪戊戌科进士，后应经济恩科试，为甲等，旋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其父亲袁行健一直供职于铁路系统，受祖上诗书传家的影响，始终关心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并较早将袁保鑫及其另外两个孩子送入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高中时期，袁保鑫就读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并于 1937 年 6 月毕业。一向成绩优秀的袁保鑫踌躇满志，本来打算继续报考大学攻读英语专业，不料“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京津相继沦陷，她心目中想要就读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也因学校被日军炸毁，已经无法上课，而被迫中断教学。院长齐璧亭也只好“晋京向钧部面陈学院被毁情形，并请示复课

^[1] 余玮，吴志菲. 中国高端访问（8）[M].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80.

^[2] 王英春. 情系北洋的李书田先生[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 87 辑[C]. 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65.

^[3] 国立北洋工学院学生实地练习规则[A].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C].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291.

办法^[4]”。直到9月，教育部核准允许学校使用中英庚子赔款的补助继续办学，并迁至西安，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

面对无书可读的现实，以及日军的种种暴行，袁保鑫被迫跟随其表姐，踏上流亡之路。他们从天津出发，沿津浦铁路一路南下。由于日本飞机经常突然出现，对地面进行轰炸，一路上只能走走停停。数日之后，他们先暂时落脚于山东枣庄，袁保鑫在一所偏僻的煤矿学校找到了一份兼职教师的工作，以暂时解决生活问题。岂料脚跟尚未战稳，日本人的飞机就跟了过来，并经常对学校及周围进行轰炸。后来教室也被炸毁了，只剩下一段墙壁。师生们只好暂时躲避到矿井低下。这一切对于还不到20岁的袁保鑫来说，需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也只能与表姐相拥而泣，以泪洗面。

过了不久，袁保鑫在报纸上看到齐壁亭院长已经带领部分师生到达西安，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并号召走散的师生到西安复课。袁保鑫便立刻出发，先到徐州，后沿陇海铁路赶赴西安。

三、叶袁二人在西北联大

（一）西安临时大学时期

刚刚组建的西安临时大学，参与学校数量虽然较多，但因为抗战交通不便，能够克服困难到校的师生比例并不高，“至于图书资料绝少带出，仪器设备更谈不上。一时间临大校舍、设备、图书等等全面告急^[5]”。经多方努力，才将学校安顿下来。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合组后的工学院位于西安小南门外的东北大学校址（即今西北大学校址）；由北平师范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合组成的教育学院位于北大街通济坊。

西安临时大学时期，由于李书田仍然沿袭北洋一贯的“严谨治学”的办学风格，尽最大努力不降低教学质量。由于开学较晚，这一学期取消了寒假，上课至次年2月份。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的叶培大，成绩仍旧是第一名。但他的感觉却是“原本该进行的实习在西安难于付诸现实，战乱祸事也常常缠绕心头令他思绪难宁，因此自我感觉学习效率不高，实在的收获也甚少^[6]”。

当袁保鑫到达西安时已是1937年12月底。这时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师生，已经分散到西安临时大学各系，唯有家政系维持独立建系，并与北平师范大学各系一起，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师范学院。齐壁亭任家政系主任，教师主要有女师学院的孙之淑教授、王非曼教授等。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仅有家政一系得以独立保留建制，是与该系的办学实力分不开的。原来，齐壁亭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接着进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两年。回国后，按照美国办学经验建立家政系。“女师家政学系声名远播，国内各方都来函询问家事性质、办理方法及应设科目，并索阅刊物，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7]由此看来，得以保存完整建制也是实至名归。

见到恩师齐壁亭，希望继续读书。但西安临时大学早已于11月15日正式上课，并不再招收新学生。齐壁亭深感一名弱小女子千里投学之艰辛，流亡异地之不易，加之他早有耳闻袁保鑫聪颖好学，考虑到家政系学生较少，于是建议她插班就读家政系。虽然不能就读自己喜欢的英语专业，但考虑到能够有书可读，求学心切的袁保鑫也只好答应了。家政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营养学、食用化学、居家陈设、家庭理财等，担心将来出路的袁保鑫又选修了相关的化学辅系。

^[4] 王淑红，邓明立.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31~36.

^[5]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M].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235.

^[6] 李斌. 与光同行：叶培大传[M].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34.

^[7] 齐壁亭.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学系一览[M].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937：6.

（二）南迁汉中

在西安临时大学安心读书的日子不长，山西省府太原就于 1938 年春天沦陷。不久日寇窜抵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旋即关中门户潼关告急，敌机不断对西安飞机场进行轮番轰炸。临大师生被迫天天躲警报，不能安心上课。1938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又紧急下令，西安临时大学紧急南迁汉中办学。临大师生怀着共赴国难的悲壮和教育救国的信念，徒步翻越秦岭，攀援古代栈道，创造了教育史上独特的“文军长征”。

3 月 16 日，临大开始南迁汉中。迁校按照行军的办法进行编队，工学院由土木系教授刘德润博士带队。师生先乘拥挤的闷罐火车到宝鸡，由宝鸡至汉中褒城的 500 余里艰难山路，就只能靠双腿步行了。临行之前，学校按人配发陕西特产“大锅盔”面饼和咸菜，雇用大车装运必须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其余书籍文具则交由专人直接送到目的地。这样一路艰辛跋涉一个多月才到达汉中。在这一路艰苦行军的过程中，叶培大有幸认识了袁保鑫，二人相互鼓励，互相扶持，一起向前行进。

到达汉中之后，学校又收到教育部《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又因为联大师生人数众多，汉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足够的房屋容纳这么多人，西北联大只能分散到各地办学。联大本部和教育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的考院和文庙，工学院则设在了城固县城往南 40 里的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内。虽然两地相隔较远，但不管谁有空余时间，都会前往另一处看望对方。

安顿下来之后，二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紧张的学习过程中来。这一学期，学校直到 5 月初才开学，到 8 月份结束。叶培大仍然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且获得了两张来之不易的毕业证书，一张是由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签署的，另一张则是由北洋工学院签署的。

就在叶培大毕业之前不久，西北联合大学又收到教育部 6074 号训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8]”。后来，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也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

（三）叶培大初执教鞭

刚到城固时，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只有 300 多名学生。伴随着全国抗战的全面爆发，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涌到后方学习，焦作工学院等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迁到陕西的。到三校合组为西北工学院之后，加上当年新招生的学生，人数骤然增加到 700 余人，随之带来师资紧张的问题。由于叶培大一直品学兼优，所以留在了学校担任助教。从此之后，叶培大便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师资极度匮乏，在恩师刘锡瑛的指导下，叶培大首先担任电机系的助教，“除了协助教授教学、指导学生实验，批阅日常作业之外，很多时候，也需要这些年轻的助教们登上讲台，叶培大也执鞭上课，教授起电工基础课程^[9]”。这样的锻炼机会，让叶培大很快成长为一名称职的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叶培大仍然努力学习着，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识修养。

但是，叶培大也感到自己的提高受到城固办学条件的限制，由于缺乏仪器仪表和必要的实验条件，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深入开展。他把自己的苦闷告诉了时任院长赖琏先生，开明豁达的赖琏院长推荐他到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工作。1940 年夏，叶培大告别母校师生，只身前往山城重庆。

（四）球场上的白手绢

在古路坝学习期间，师生有空余时间都喜欢到球场看打球，因为“这里的篮排球校队，

^[8] 教育部训令[A].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C].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358.

^[9] 李斌，与光同行：叶培大传[M].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41.

在陕南各院校称雄一时^[10]”。有一段时间，到球场上看球的人更多了，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去看球，而是去看“白手绢”。

原来，到达城固之后，由于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相距 40 余里，叶培大和袁保鑫只能在周末才能相见。叶培大喜欢打球，相见之后，袁保鑫喜欢欣赏他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每打完一场，袁保鑫就会掏出自己的白手绢，去帮助叶培大擦汗。

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来是因为白手绢一般只有大户人家的闺秀才会使用，再加上白色本来就耀眼，吸引大家的注目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来是因为工学院是一所工科院校，女生本来就少，球场上忽然出现一位漂亮的女学生，注定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

叶培大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对袁保鑫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是因为袁家经济还算富裕，加上有同到陕西的表姐接济，生活还算过的去。相比之下，叶培大的手头就拮据的多，因此袁保鑫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叶培大，共渡难关。冬天到了，叶培大身上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袁保鑫就为他做了件棉长衫。二人也常到大华食堂，吃半斤水饺，要二两小酒，打打牙祭，给简单的生活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四、离开学校之后

到达重庆之后，叶培大就职于中央广播电台，参加了电台 10 千瓦中波机和单杆天线的安装调试工作。这一工作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在日军的不断破坏之下，当时只有这台机器能将中国抗战的声音传播出去，对于鼓舞国内民众的斗志，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时的袁保鑫还在城固就读，直到 1941 年 7 月毕业。期间虽然两人相隔异地，通信不畅，但这并没有成长拆散他们的原因，却成了增进感情的纽带。等袁保鑫毕业时，同样因为一贯的品学兼优，学校本来打算让她留校任教，但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选择前往重庆，与叶培大团聚。

1941 年秋，叶培大与袁保鑫在重庆结为伉俪，没有隆重的婚礼，他们只是选择在报纸上登一则启示宣告二人的结合。爱巢小筑，但他们却没有时间享受甜美的二人世界，而是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袁保鑫在大学时辅修的化学专业在找工作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她凭此受聘于沙坪坝女子职业学校，教授化学和代数两门课程。

1943 年，他们的大女儿叶尔康出生，从此之后，袁保鑫逐渐淡出职业，以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他在大学时家政专业所学的知识，也只有在营造家庭生活时派上用场。后来当四川白沙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邀请她去做讲师时，为了减轻丈夫的家务负担，她选择了放弃。

1945 年，叶培大凭借在北洋工学院打下的坚实基础，以电信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民政府工程技术人员公费赴美实习项目，赴美国哥伦比亚研究院进修学习。回国后，先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解放前夕经恩师刘锡瑛建议，返回母校北洋大学任电机系教授。1955 年，“天津大学（北洋大学于 1952 年更名为天津大学）、重庆大学两校电气通信方面的专业师资全部调入（北京）邮电学院^[11]”，叶培大也随之调入北京邮电学院工作，直到逝世。在此期间，袁保鑫一直陪伴在叶培大身边。

^[10] 赵仪君. 抗战时期山村见闻[A]. 左森. 回忆北洋大学[M].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89: 82.

^[11] 《北京邮电大学校史》编委会. 北京邮电大学校史（1955—2005）[M].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5: 6.

西北联大的故事

姚 远，宋轶文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第一篇 大迁徙的故事

王耀东化妆逃出北平

1937年7月28日这天早晨，北平街头。王耀东像往常一样照常起早去北平大学女子文学院指导田径队练习，准备参加北平市大中学校田径运动会。

然而，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沦陷日。王耀东像北平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一样，对此浑然不知，根本就没有任何战争动员或者准备。人们哪里知道，这天早晨，守卫北平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已经撤离，日本侵略者正在进城。

王耀东走到半路，发现街上行人很少，一个个面露惊恐，一打听才知道鬼子马上就要进城了。第二天他就看见大批荷枪实弹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耀武扬威。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日本侵略者肆意打骂我国同胞。

得知政府在西安成立了包括北平大学在内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王耀东便与体育主任谢似颜，于10月间，离开北平，绕道前往西安。临走那天，妻子齐志修悄悄来到谢先生家为丈夫送行，王耀东心情十分沉重，留下800元钱，让弱妻幼女稍待时日听候消息，随即化装成商人模样（日军严查军人和学生），并在医院取得防疫注射证（否则日本人要临时注射防疫），当即启程。

这可是一段凶险难料的旅程，他们连闯四关。

第一关，在布满日本军队的北平火车站，王耀东用行李遮挡住脸面，总算在持木棒列队而立的日本兵夹道中进了站，进站后才发现被人盗窃钱包，好在是零钱，车票也在。

第二关，到了天津，出站后在一小旅馆住下，不敢贸然去车站取行李。眼见得日本宪兵扣留许多中国同胞。两位迂夫子，硬着头皮去拿行李，却见行李就摆在站台上，尚未检查，还是车站服务员提醒他们说“趁日本人没来，还不拿走”，两位迂夫子这才提上箱子就跑。

第三关，因为各铁道线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他们只好改海路从天津乘轮船往青岛。在天津港，日军盘查极严，逐个检查行李物品，好在两人没有露出破绽，船过大沽口，总算脱离虎口。

第四关，从中国军队控制的青岛换乘火车到徐州，凶险却依然伴随。火车刚进徐州站，日本飞机就开始低空扫射，站台上的人纷纷逃避，只有他们还留在站台上，旁边有人高喊“卧倒！”，才赶紧俯身倒地，随即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幸亏没有受伤。

一路心惊肉跳，两位体育精英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大后方西安，双双被聘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体育教授。

三年以后的1940年，王耀东的妻子齐志修才带着两个孩子，历经艰险，数千里辗转找到陕南城固（1938年西安临大自西安南迁城固），一家人终于团聚。

从北平到城固

一、挣脱了镣铐

×月×日，这是摒弃旧生活，踏上征途的第一天，怀着一团投向祖国的热望，切盼，兴

奋和勇气，使我和旅伴齐岩忘掉了一切危险和预料必不可免的不幸！我们以最大的勇气向着这条曲折崎岖的长途出发。

早晨（新时间）（注）八点，我们赶到前门车站，经过一番粗略的检查便匆匆侥幸通过这第一关。一声汽笛我们告别了沉默衰老的古城，我们告别了一百五十万受着灾难的同胞，告别了白发鬓鬓祝福爱子一路平安的双亲，告别了年稚龄幼期待哥哥早日凯旋的弟弟！

没有泪滴，也没有畏惧，只有快慰，只有兴奋。

火车里非常拥挤，坐（座）无隙地，尤以敌侨居多，我们默默无语准备应付检查盘问和什么不幸的来临，经天津沿津浦线远德县至黄昏达济南，都很顺利从济南续向南行。夜幕拉下的时候，火车，乘客有些紧张了。车速一面渐渐减慢，由低速而至于一步步蠕动，同时乘警把所有门窗一律堵严不使灯光丝毫外露，这种用意，乘客们都会意领略，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到我方游击健儿的活跃，在敌区火车被炸，铁轨被毁，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也是敌人感觉最头痛的事，针对着这一现实，敌人乃将我老百姓组织所谓“爱路队”，作保护铁道的工作，沿途常有“一人爱路，万人享福”的标语，但是所收效果甚微，敌人仍然是防不胜防，束手无策的！

翌日清晨车抵徐州，一部客人南下，一部客人转陇海西行，此处是重要的交通咽喉，军事上战略的价值更无待说，所以极其重视他，此处无形中是现在华中汪逆伪府和华北政委会的交界，也自然是敌人海军和陆军在沦陷区势力的分野，因此在徐州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敌人于徐州特设苏北行政专员公署，由刘逆以琳主持，既不属伪政委会也不属伪中央。第二，纸币也因而华北的联银票和华中的储备票全不通用，乘客须在此地换用敌人军用票，同时，对于旅客检查最严，居住证良民证和旅行证之类的东西都是必不可少，就是“防疫注射证”也不能忽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敌人对我同胞统治之苛！

将达商邱时，我们除不能例外受这一番详细盘问和检查外，另外遇了一件险事，同车的一个敌侨用很流利的华语和我俩闲谈，问我俩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回答到商邱，又问有何贵干？我们告以营商，他冷笑了一声说：“哼！到陕西去上学吧。”我们立觉一惊，装没听见，捏着一把汗，坐卧不安，秘密既已被人识破，只有看命运如何了，我们战战兢兢用心把眼和耳连起，机警的等待着下了火车那场早在预料之中的事。

中午车临商邱，降雨给了我们莫大方便，我们商量闪躲那个敌侨，出乎意料，他也不顾我们匆匆而去了，因为大雨倾盆，在狭小的商邱车站站房的那一关口，除移侨仍然要经严格检查外，中国人则很容易的效行了。

在商邱我们停留一夜，我们住的旅馆兼营副业，既是烟馆、赌场，又是妓馆，我们认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赶快之住妥架之事，开始起早向南进发，我们计划是由亳县界首，经漯河，叶县到洛阳。

踏着紧张兴奋的步伐，在原野里行进。

但是万也想不到，他毫不迟疑，将原证交我，结果一场麻烦，用一元店簿钱结束。

第二天晨四时，我们披星戴月，起身行进，一个理想，一个渴望了四年多的理想，鼓励着我们，我们忘了疾乏，也忘了任何危险。

第三天行了七八十里路宿在十字河镇，此镇住有伪一和中□国军一一团，致我们被检查了三四遍，可笑的是，伪军都是持大刀，亦有卫兵持枪，服装既不整齐，精神也很萎靡，一想而至乃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

第四天我离开十字河，邻道是约二十里的一条被掘毁的公路，和水势涌汹的黄河支流，我们到达了双沟，到达我军国防前线，到达了祖国，老远我们望到了放哨的国军望到了别聚四年捍卫祖国驰骋疆场的战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标语，予我们激动的心情更大的刺激，走进双沟镇寨门，我们向守军握手，向守军致敬！他们更以军人所难有的温情，欢迎我们两个远道客人，他们忙着问：“北平的老百姓疾苦不？日本鬼子是不是筋疲力尽了？”

我们来到了祖国的天地，我们恢复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好像漏网之鱼，好像就坐监牢如今被释放的囚犯！

在祖国的田野里我们狂笑，我们高呼！我们唱歌！我们吐出几年来的哀愁深怨！从今以后，我们重获自由，重见太阳，重见生命！然而，在我们背后，一片一片的哀泣，一声一声呼唤自由的呻吟，侏子手下乞求的告□，惊动了心盘的深处，我们仿佛听见高堂双亲“勿虚此行”的嘱咐！

我们感到在双肩上一支沉重的力量，镣铐束缚了我们四年多，如今，乘牢卒不备，我们越狱，我们冲破了枷锁，但是，还有更多更多的群众，牢卒的鞭子向他们挥打！更残酷的刑具向他们□用，我们求的是磨练艰苦，不是物质享受，我们求的是精神解放，不是松懈苟安，肩上的重担不允许我们俭闲片刻！

我们需要填补空虚，我们需要新的细胞灌溉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在收复河山的战史里，有我们一页光荣战绩！

从萎靡的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里爬出，奔到一个战斗的走入现实的新生，这该是无上欣慰的事。

二、可怕的现实

别了四年的祖国，在战斗中它成长起来了，我们毫不怀疑它是有着踊跃的进步！炮火该唤醒全民族的奋起革新，战争一定使社会变质，血腥的污秽，旧世纪的残毒一定一扫而光，前方是紧张的、蓬勃的、激涌的、我们这样想，每一个沦陷区的同胞都这样想，这样希望，这样确信。

从双沟又走了一天半，到了界首，我们很惊奇在游击区里竟会有如此寂静的地方，界首镇商人云集，街道上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货栈里货堆如山，原来自抗战后，界首成了河南、安徽交通商业的要道，来往商人有如摩肩擦踵，这也许是好现象，因为这表示我们吸收游击区的物资，但是有些却恰恰和界首镇标语“严禁敌货入口”相反，化妆品、纸烟、煤油、人造丝等等大批输入，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全面抗战之际，这是何等的令人痛心。过界首经黄河渡口尚有武装商人，一群一群押着大批封闭坚固的烟货。税务员检查时，他们拿出 XX 师长的公车说是军用品，拒绝检查颇令人不齿，纸烟何以是军用？又据一般道听途说，那些烟货恐怕还是躺着才能吸的烟，精明的投机家，不辞辛苦，不惜国家民族的鲜血，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据说，沿途检查货物的军队，在某种条件之下，还可以护送没有武力的商人，这，真正是确实确实的“军民合作了”。

从界首西行，有一天宿店，黄昏军队查店，他们好像是大公无私似的，非和我们要由北平来的路单不可，我们百般解释，说明没有的理由，他仍然威胁，好像无路单，就是汉奸，请他检查行李，又无从得到汉奸的证件，双方相争好久始息，原来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借路单为名想大大揩油。再有每次查店□，勒索店簿子钱，跟本店簿没有，不知从何索起，大概有吃大鱼有吃小鱼就有吃虾米的，这点些许小端许是给兄弟们找点生活零用而已。

由界首行三天到漯河，漯河是过去平汉线郾城车站，较之界首更高一筹，有门面没货物的大商行比比皆是，但是他们货物愈来愈少，是而物价愈长，他们有他们的秘密奥妙！在旅馆里我好像人在北平，有钱阶级在拼命的享受，通宵的麻将还有花枝招展的女郎为着生活出卖灵魂。

从漯河到叶县仅是两天的路，在叶县被“党政军警稽查队”又用为一次汉奸。买汽车票当天登记来不及，我们发愁第二天不□走，可是中国人善于通融，公路管理局的规矩对于肯愿多出钱票的人概不适用，所以我们第二天就登了车。一个汽车最多只能坐一十四五人，可是沿途司机走私，涌上一二十人，弄得乘客几乎窒息。

八月十八日，安抵洛阳，旅程暂告一个段落。

在洛阳，我们一群投向祖国的青年，向和我们同命运流浪的河北省政府贤明当局，请求

救济，请求解决出路。一群一群的青年停留在洛阳等待着省府向他们伸出热烈的手，他们等待着，耐心的等待着，在招待所里像囚徒等待徒刑期满似的等待着。一群一群不甘等敌人蹂躏奴化的热诚的青年，被不耐心等待，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萎靡不振意志消沉，有的意志不坚，索性顺着原路，跑回河北，重做顺民！

啊！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实！

翻越秦岭故事多

1938年3月16日，晚上在西安乘火车，次日开始南迁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以常委徐诵明为大队长，率领1400余名学生，编为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教职员及其眷属、高中区队、女生2个区队皆无分队，为独立区队，每个中队500至600人，开始南迁汉中。从西安乘火车到宝鸡下车，住宿一宿。

20日从宝鸡南行开始徒步翻越秦岭，三个中队又前后分为四批行军。由宝鸡至汉中分十站行进。按照次序，第一中队先行，依次为第二、第三中队。全校千余学生行程近千里，历时月余，并以沿途社会调查抗战宣传、军事拉练、强身健体为目标。其中西安到宝鸡70公里；宝鸡到汉中255公里，每日须步行10余公里，多者30余公里。

规定学生们自备背包一个，草鞋两双，二人合组轻便行李一件。每个中队一般由军训教官任队长、年轻教授任副队长，下设运输组、设营组、纠察组、交通组、医务组、警卫组等。每个中队配有民夫、驮运骡马等。

佟学海买尽西安全城锅饼与咸菜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前夕，齐国梁教授任膳食委员会主席，佟学海为书记，进行了一次全城干粮、咸菜大采购，一时间全西安城大街小巷、老少妇孺皆为此而“战”。佟学海坐镇西安火车站，过称、登记、付款。直到3月16日临大西去宝鸡的火车开车前，采购317袋锅饼，共计8676斤，还有3000余斤咸菜。

其间闹了不少误会与尴尬。车站的锅饼收购，庶务组组员胡铭右先生在雇佣胶皮轮大车时，顺便委托大车公会会长之妻代为购集，由其率领全城各家锅饼小贩分头送至火车站，随即陆续过称，登记。由于称鼻不堪重负，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再系上，一直到昏天地暗开车前。正拟请大车公会会长之妻出具收条领款之时，她却说“以货换钱，何须收据”，不愿意出具收条，且恐火车开车无处要钱，便哭将起来。而这时，等车的临大学生们误以为几个大男人在为难妇人，反来谴责，真是闹得哭笑不得。

买咸菜时，分别向西安各酱园采购酱萝卜，起初倒还顺利，但后来一些较大的酱园所存酱菜无多，且不肯全数出卖，恐将无法应付经常主顾，以致停止营业，因此只好跑遍全城采购，最后也只买到17袋，计3000余斤。

这成为翻越秦岭千余名学生的主食。就这样也只能每人每日一斤锅饼，一块咸菜。翻越秦岭过了十天以后，这些锅饼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佟学海只好又在秦岭南部的马道一带再次收购锅饼，直到第十一天到了褒城以后，佟学海买锅饼的重任总算告一段落。

绣鞋不翼而飞

法商学院谷景耀与经济系张仪修所在的第三中队，夜宿凤县。一部分同学被指住于凤县西街一无名小庙内。

这小庙年代久远，殿宇清洁，庙内有女像两尊，被信徒打扮得粉面桃腮，束腰紧袖，栩栩如生，特别是其金莲瘦小，所着绣鞋更是古今罕见。夜晚，谷景耀与张仪修就躺在其脚下。临行，二人出自对民间工艺的极度好奇，各从女像脚上脱下绣鞋一双，藏之背囊。然而，带到汉中以后，皆不翼而飞。二人整整一学期心里都觉得惴惴不安。

刘艺民英雄救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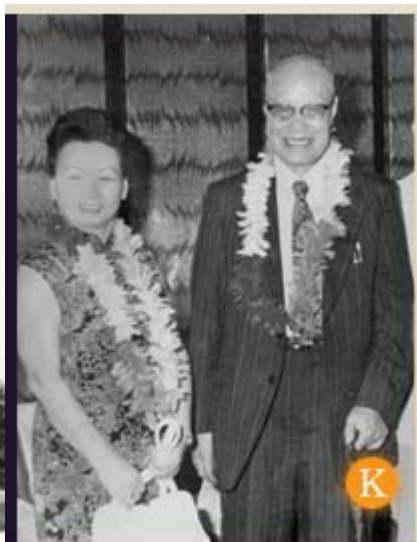
在翻越秦岭南迁汉中的川陕道上，法商学院校友刘艺民一直难忘一段扒车救美的惊险一幕。

那时候，川陕道虽然路矿极差，却也有一些商用汽车往来。一天，一辆客车拴着后门，空车沿着三十度左右的坡路缓缓前进，正从刘艺民所在的小队旁边经过。刘艺民出自好奇和机会主义念头，纵身一跃，一只手抓住了汽车后门的拉手，同时踏定了上车的踏板，心里非常惬意。然而，车子经过两三个女同学身旁时，其中一位叫韩镜良的同学，也心不由衷地猛然纵身一跃，右手抓住汽车后门的另一个拉手，但脚未踏住蹬板，车悬拖着她往前去，手又不能松，情况十分危险，遂紧握拉手惊呼大叫起来。这时，旁边的刘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感爆发了，他用右手抓紧拉手，左手一抄，抄住了她的腰部，一提，她趁势双脚踏住了蹬板。这时汽车并未停车，仍在前进。刘艺民看看韩镜良，惊慌之下，花容失色。而刘艺民却仍然紧紧挽牢她的腰部，直到车子开始走下坡路，这场英雄救美才慢慢落幕，刘艺民也才终止了保驾护航行动。夜晚集队宿营时，韩镜良的恋人（亦为校友，已故）特地来向刘艺民道谢。

1969年，故事的主人公韩镜良70岁时（时任台北中兴大学教授，前夫因“匪谍罪”被处决）与中国报界著名报人成舍我（1898—1991）缔结百年之约，成为其第三任妻子。韩镜良现居加拿大。



左二成幼殊、左三成舍我、左四成思危



成舍我与韩镜良

恪守古训“行不由径”的谢似颜教授

南迁路上，为保障秩序和安全，也避免发生意外，大队长徐诵明命令全队由公路前进，不准走小路。第一中队队长谢似颜教授遵命一直沿公路缓步前进，一些身体较弱和性情稳健者亦大多随行。

然而，川陕公路上酒奠梁、柴关一带盘道尤多，汽车迂回在大道上，还没人走得快，学生们常有与汽车争先者，故大家愈往前走，愈觉得小路实在近得多。于是，就连大队长和参谋团的人也不愿遵守命令多走冤枉路，都绕小路上山，在山下休息好久以后，才见谢似颜教授率领一部分队员整队而来。其始终遵循“行不由径”的古训和大队长命令，诚不愧为道德学之教授（在教育系亦兼带道德学科目之教学）。徒步行军，对学生和青壮年来说，当然不成问题，当时很多教师颇有疲乏狼狈之相，一路成为笑谈，像谢似颜教授这样“儒风不倒”者的

确令人敬佩。

谢似颜为浙江上虞人。生于 1895 年。1918 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亚预备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经历田径课间不幸被标枪击中头部、1923 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等。1925 年毕业归国，任武昌师范学院教授。1929 年 8 月北上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1932 年 1 月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体育主任。1933 年 1 月，被聘为北平大学教授，主持全校体育行政，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主任和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教授。1937 年抗战爆发后，北平师大地理系教授王谟甘当汉奸，筹办敌伪北平师大，邀任教授，被严词拒绝，遂与王耀东化妆逃出北平，经天津转海路辗转到西安，负责西安临时大学体育行政工作。1938 年 3 月，与王耀东带领第一学生中队翻越秦岭，迁至汉中、继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1944 年赴安徽临泉，任国民革命军将领汤恩伯的秘书。1946 年赴台湾，任台北师范学院体育主任、教授，后因维护台北高校学潮，而被解聘居闲，以师范学院中华教育辅导委员会委员闲差终其生，与许寿裳、戴君仁等西北联大同事过从甚密。1959 年 9 月病逝于台北。

迁徙路上的美国籍教授沙伯格

在翻越秦岭南迁汉中的川陕道上，有两位美国籍青年教授。一位叫克顿，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另一位叫沙伯格（B. F. Schaberg），在北平时就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跟随法商学院中队步行，与大家一起就着咸菜，啃锅盔饼子。沙伯格胸前挂着一具照相机，不时捕捉沿途风光和美丽山景。

沙伯格为美国芝加哥人。美国密苏里大学地质系肄业。1936 年受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敦礼教授之聘，到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任教。1937 年抗战爆发，随北平师范大学内迁陕西，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体操教授。1939 年暑假，由于太平洋形势告急，美国决定撤侨，他不得不在合同期未滿的情况下回国。他在校期间主要讲授体操、田径、篮球等课程。当时由于体育器材设备相当缺乏，他亲自上山选择木料，指导工匠制作了单杠、双杠、跳箱、鞍马、吊环等体育器械，并利用课内、课外时间，随时指导学生练习及安全保护，使体操运动在西北地区乃至抗战后方得以开展和普及。沙伯格还是学校里教师垒球队的队员，常常与王耀东、刘月林、董守义、刘汝强等教授在一起举行垒球比赛。所用的垒球，竟然是教授们利用制革厂的边角废料、用棉纱缠成的线团，让修鞋匠用皮子缝起来的特制球。

土匪劫车

1938 年 3 月 19 日晚上，第二中队队长刘德润正在主持召开各小组组长会议，安排明日行程，突然闻知，昨天在马道附近家眷汽车遭匪劫，“损失不赀”。刘德润担心自己的家属也在车上，不由得心思沉重起来。

从留坝县城南行至马道，是川陕公路上的一个险要之处。再南出谷，便是褒城。此地以当年汉萧何追韩信至此而闻名。同时，由于此地位于褒城斜谷口，太白河流经其间，路途艰险，当年又常常以车祸频发而闻名。然而，劫道者也看上此地的艰险，遂成为川陕道上土匪出没地之一。

王耀东教授也回忆说：整个民国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很差，各地匪患迭起，川陕边山区常有土匪出没，更有王三春等巨匪，动辄啸聚数千众，打家劫舍，抢掠商旅，甚至攻城略地，与政府军对抗。南迁沿途山高谷深，路途艰险，即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时，虽然开通了川陕道，但防匪仍为头等大事。

台湾作协会长尹雪曼校友也回忆说：一辆载乘学校教授和眷属的汽车，前几天在赴陕南路上被抢劫，人没有伤亡，但太太们的金银首饰和现金损失不少。所以，学校就给我们中队派来四位保镖，护送到陕南。给我印象很深，那时虽是阳历三月，农历还是一月底光景，秦岭北面，还有残余的积雪，但是爬上秦岭翻越过去后，南面就已有春天的气息。我看见这

四位保镖的时候，正是越过秦岭以后的事，因为大伙出发时还穿着棉衣，走路一热，那四位保镖就光着上身，露着胸臂，每人腰里插一把盒子炮，把手还扎着红布，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然而，我心里暗自琢磨，如果像美国西部片那样，土匪躲在山林或岩石堆里向这四位保镖一齐开枪，恐怕也是不堪一击。好在劫匪的事再没听说，我们安然到达目的地城固。

女生入观开先例

留坝张良庙可是远近闻名的道家森严禁地，从不容留女客。然而，西安临大南迁女队到此，却打破了此道观数百年的规矩，首开容留女客的先例。

此地处柴关岭，形势险峻，为邑要隘。往左行，即为庙台子——俗称张良庙（道家应该称“观”）。此地为汉留侯隐居之处，群峰葱翠，曲间清流，风景极佳。据南迁第三中队谷景耀回忆：其间花木清幽，十分整洁，在迎门处，有进履桥一座，院内平宇长廊，共有两列，左供方丈起居，右为往来接待所。受书阁题咏甚多，皆为纪念张子房治国安邦的故事。游人虽多，但从不留容女客。

然而，自宝鸡下车后第八天，临大第一支南迁队伍抵达庙台子，这张良庙却打破这一规矩，第一次容留数批女生，且留驻观内，整体数日方才继续前行。截止1937年12月，西安临大有女生229人，其中文理学院144人，法商学院24人，师范学院36人，医学院25人。

她们到底是谁第一批入观的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起码知道，是从1938年3月间，一群西安临大的女生给这深山老林中的道观、给这与世隔绝的秦巴山地带来了外面世界另类时尚和另类消息。

误杀耕牛打牙祭

法商学院谷景耀所在的第三中队抵达褒城。此地古称褒国，为褒姒故里，位于白水西岸，花香鸟语，山地清幽。大家晚间分宿于东西两岸。谷景耀与同学们被分至一座文庙。因空闲已久，跳蚤过膝，遂央人清扫，大家随打开行李，各按其位入睡。及至次日凌晨，一声枪响，惊醒各位。原来昨晚负责警戒的同学，在晨曦朦胧中，以为野兽来袭，随即举枪射击，误杀一头耕牛，经与物主和解赔偿后，整头牛全部赠与第三中队，因而数日不见荤腥的同学们终于大快朵颐。会餐之后，晴空万里，烟景阳春，有的往河边田野，有的去桃花树林，漫步轻歌，好不快乐。

无独有偶，王耀东、谢似颜带领的第一中队护卫队的一位学生看见一只大鸟落在牛背上，举枪就射击，没打着鸟，倒把雇佣老乡的牛给打死了，自然又是一番赔偿和赔礼道歉，以及一顿烧牛肉。

李俨院士与西北联大

李俨，又名乐之、乐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于1917年开始发表数学史论文，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首任掌门人。

早在1937年，李俨在陇海铁路局工作时，即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发生联系。据《西安临时大学校刊》报道：1937年12月29日，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为适应抗战工程需要，假东北大学礼堂（即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礼堂），“敦请陇海铁路西段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李乐知作《隧道工程》的学术演讲”，并且还拟请李乐知作“铁道定线之实际技术”的演讲。

1938年3月23日，西安临时大学翻越秦岭，南迁汉中，途中行李车故障，第二中队队长刘德润前往时驻秦岭隘门关之宝城铁路测量队接洽借车。时任测量队队长的李乐知（李俨）慨然允诺，测量队汽车一直载行李随队5天，直到故障于留风关。

据《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报道：1938年6月27日，李俨以陇海路工程局工程师兼宝

城公路测量队队长身份再次应邀访问已经由西安临大改名的西北联大。由理学院院长刘拓教授主持，请其在西北联大礼堂作了《中算故事》的演讲。

李俨于 1950 年在《中国科学》A 辑：数学，第一期所发表的《中算家之平方零约数》一文的署名单位有两个：一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一为“西北大学数学系”。这表明他至少在 1950 年已被聘为西北联大后继学校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并经常参加西北大学举行的学术与教学活动。1950 年 6 月 30 日李俨致严敦杰的信中就有：“最近西安西北大学数学系亦拟于暑期添设数学史，并拟约俨帮忙。如路局可以说通，则拟以新编之《中国数学史》作为讲义，每星期说一二小时。”

1956 年开始，还指导西北大学数学系教师李培业研究《算经十书》和宋元数学，并将其 1957 年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的《清季陕西数学史料之补充》一文引入其《中国数学史大纲》。

李先生三四十年代在陇海铁路局和西北联大的工作，以及李约瑟访问城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等，也是现在西北地区科学史事业筚路蓝缕，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李俨（1892—1963）

第二篇 老师的故事

锯掉脚趾变大脚的传奇女教授王非曼

1922 年，齐鲁医院外科迎来了一位 20 多岁的女子，要求做双脚放开矫正手术，将六岁裹起的三寸金莲放开。但因她的脚骨已经定型，无法放开，需要每只脚锯掉三个脚趾才成。她二话不说就上了手术床。手术获得成功，尽管给她带来终身痛苦，但毕竟可以穿上定做的皮鞋啦，一双脚获得了自由，年轻的心也获得了解放。她就是一代精英奇女子王非曼。

王非曼，幼名王淑静。她出身教育世家却不贪图安逸酷爱读书，对于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个时代，犹如一个异类被全村人侧目称为王家出了个半疯子。她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初小到高中的学业。1923 年，以全优成绩通过山东全公费赴美留学生的录取。是当年仅录的两名女生之一，且成绩第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公费女留学生之一。

1931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家政学系硕士学位。回国后她先是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是开风气之先的最早女教授之一。后因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西迁内地坚持战时办学，经历了 8 年多颠沛流离的文化苦旅，先后执教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

王非曼不仅喜欢读书和教书，还有难以忘怀的革命情结。1942 年暑假期间曾随团访问延安近 40 天，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有个赴法勤工俭学的恋人回国后因闹革命而牺牲，也对她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影响。

王非曼就是在这样政治动荡的旧中国，勇破传统，追求新知，教书育人，时刻关注着祖国命脉，用她那双为追求自由克服巨大痛苦而争取来的大脚丈量着天地四方，在家政学教育

方面留下她不可磨灭的深深足迹。

图 1 青年王非曼

图 2 中年王非曼



(图 1)



(图 2)

龚锡庆副教授城固家中遇害

由于教师工资很低又不解决住房，许多人不得不在外面租住一些条件很差的房子。1938年3月26日晚，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自西安出发13天后的一个夜晚，从东北流亡过来的法商学院商学系俄文副教授龚锡庆，住在城固县城小西门至法商学院之马路东的一个土墙茅屋内，突然被匪徒破门行凶刺死。邻居赵先生相救受伤在汉中住院。龚、赵两先生的财产亦被洗劫一空。城固县政府抓捕了几个疑犯，审问结果无下文。

两位先生皆为法商学院教师。龚先生到校刚刚3个月，为人谦和。赵先生则刚刚到校。因此，二人绝不可能为仇杀，完全是为土匪所为。

学校为此向教育部提出龚先生的抚恤金申请，并将其薪金送至1938年7月止。同时报销了赵先生的医药费。

为加强教职工安全，学校将校警扩充到30人。学校常委会第68次会议又通过决议，成立警卫委员会。由体育系董守义教授为总干事，军训教官李在冰为副总干事，加强全校警卫安全。

何日章褒河历险 张旭齐舍身赴义

1938年8月21日，正值周日，西北联大图书馆馆长何日章、教育部国立院校南郑招生委员会主席兼联大常委李蒸教授，以及招生处康仁叔、张旭齐四人，乘在南郑招生之便，同游汉中名胜石门。不成想竟致一人葬身褒河，何日章因筏绳脱缰而三冒险滩，险些丧命。

四人至褒河边上，见河流滔滔，水势汹涌，三股钢绳横架两岸，又遥见一青年从对岸划筏而来，招徕上筏，何日章难抑对西岸名胜的向往，遂揽衣上筏。李蒸常委持重，与三人在东岸等待。哪知返回时，竟有四人上筏，乘风破浪，挣扎前进，甫半，悬筏之垂绳即断，三青年见状离筏跳水而逃，孤筏如箭，顷刻已飘过三道激流险滩。幸有河中巨石稍阻，又有东岸顺流奔救之李常委、同来车夫等人和西岸两樵夫接住何日章抛出的绳子，将其救上岸来。此时已距石门四里之遥。

待东渡上岸，与李常委汇合，方知同事张旭齐已为救己而死。原来张旭齐见何日章乘筏

失控，即沿河追筏，见筏似近岸，即跃入水中相救，却被卷入巨浪，终未浮出。何日章闻知，足软不能成步，口襟不能出声，不禁放声痛哭。其后，李常委等至南郑县求助，捞尸首安埋。

何日章诗曰“呜呼旭齐，谁如君贤？为友捐躯，大义凛然”，并有挽诗：“雪滚浪飞石虎前，那堪梦梦问苍天；金生取义诚无恨，国瘁人亡倍可怜；宋玉招魂空袂湿，少陵怀友不夜眠”。

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招来群殴之祸

1938年7月3日至9月2日，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由西安迁汉中城固不到半年（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的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主持对汉博望侯张骞墓实施了发掘和增修。然而，在1938年8月24日至9月2日，已经发掘到墓冢东侧墓道东耳室，据说已经看见铁链所系的悬挂状棺木，但尚未进入墓室时，散居墓周数村的千余村民胸带“张氏后裔”红布佩条，群情激昂，扛着锄头、扁担，蜂拥至发掘现场，围住陵墓，要与掘其祖墓者决一死，一场群殴瞬间蓄势待发。发掘遂中止，双方协商，遂改墓室发掘为墓道增修，退出墓道并回填墓冢，树碑留念，纷争遂平息。

其实，西北联大常委许诵明、李蒸及许寿裳、黎锦熙等教授调查汉中著名古迹以后，提出张骞墓的发掘和增修详尽的计划。为此，事先商准各级政府，也曾与张骞后裔协商并获同意，一起发掘和增修工程。主持此次发掘的为西北联大历史系的陈士骥和周国亭两位教师，以及张循祖、杨贻等20余位学生。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黄文弼等历史系教授亦为主要参与者和研究者。县政府保安队陈思礼、联保主任朱秀峰（代表严维馨）、保长饶胜五、甲长饶文明等13名人工协助。由此看来，村民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愚昧和无知。

竣工后，陈士骥，周国亭发表发掘报告。次年由西北联大在墓前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其上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讲师吴世昌谨撰；国立

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书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李蒸、徐诵明、胡庶华谨立；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吉日，田鸿玉刻石立”。

1939年4月6日，西北联大全校师生员工1400余人，为纪念“民族扫墓节”，提倡民族精神，整队赴汉博望侯张骞墓，举行祭扫活动。

1939年8月13日至14日，刚由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的学校考古室举办了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先后有时在学校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教授、学校常委李蒸、徐诵明、胡庶华教授、学校秘书主任黎锦熙教授，以及师生数百人参观。1942年，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国立西北大学视察后，也到张骞墓拜谒。

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回迁西安三日后过世的传教士教授贾韞玉

在汉中城固时，西北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有一位传教士出身的教授，他的名字叫贾韞玉（1871—1946）。可惜的是，回迁西安（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三日后，竟不幸去世。

贾韞玉原名 Charles Carwarine 。1871年生于英国西部 Bath。清光绪中叶（1875—1908）来华，在陕南城固一带传教。1931年收贾梅瑞为养女，甚珍爱之。1934年曾返国。1936年秋复返陕南城固，已与内地会脱离关系，遂创设小礼拜堂和英语补习学校为生。1938年起，聘为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在校8年。其平日热心教学，服务认真。在城固时，还主持过一个全校性的英语会话班。随校自陕南回迁西安仅三天的1946年9月28日，突患心脏衰弱症，20余分钟后即不治而逝。安葬于西安南门外国教会协同义园墓地。学校复于10月2日在图书馆阅览室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会，刘季洪校长、总务长徐朗秋、高文源主任、孙宗钰

主任，以及 Oscar W.Beckon 等几位外国朋友百余人到会悼念。

学校为此专门责成外国语文学系霍自庭教授、徐朗秋教授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封存衣箱等物，送浸礼会暂为保存，现金由包志立教授代办，领取学校各款由霍自庭代办，包、霍二教授并负责贾梅瑞的生活用费，将其现金、积蓄法币 120 万元，美金 75 元作为其养女贾梅瑞生活费用，代为保管，并送其在西安教会私立尊德中学上学。

第三篇 学生的故事

琳琅满目的家政系手工艺义卖

家政系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北洋女师范学堂、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发展而来，既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教育之根，也是西安临时大学最有特色的系科之一。这个富有特色的系，在西安时，属第一院，与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一起在城隍庙后街四号上课。1938 年 1 月 28 日、2 月 4 日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一次“实习成绩义卖捐赠抗战将士鞋袜”活动，着实地“显摆”了一下家政系师生的手工艺绝活。

据《西安临大校刊》第 11 期报道：“鉴于前方抗战将士亟需鞋袜，特将平日烹饪、缝纫实习成绩全部献出义卖，而以所得卖价制备鞋袜，捐赠前方战士”。为此，“特设临时义卖处于本校大礼堂，每星期六下午举行义卖一次，以三次为限，前两次为食品义卖，业于一月二十八日及二月四日分别举行。售物计有饼干、花生饼、油煎饼、牛肉干、笋豆、假咖啡、香园酱、柠檬酱、桔子汁、可可糖花生、糖花生、花生糖、芝麻糖、鸡排、柠檬排、可口排、可口蛋糕、蛋糕、小蛋糕等食品数十种。”

临大师生既可捐款救国，又有美味可口，大家都慷慨解囊，竞相购买，不到一小时，大部分货品即已售罄。成绩非常可观。

“闻第三次将举行服装义卖，备有大批精美婴儿服装、儿童服装、桌布、靠垫、枕套、口袋、手帕等出售。”

这次义卖活动既显示了家政系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实习教学成绩和师生们的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制品，也显示了全校教职员工踊跃支援抗战义举。

“二刘事件”始末

这是西北联大政治系校友、著名作家、台湾中国作家艺术家联盟会长尹雪曼（1918—2008）所记述的一段浪漫往事——“二刘事件”。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尚在西安。

“二刘事件”中的“二刘”：一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的男生刘治国；一为经济系的女生刘秋英。女主角系湖南小姐，长得亭亭玉立，气质高雅，而且学习很好，因此成为男同学追逐的对象和谈资。男主角为联大剧团团长，是个好打扮的主儿，据与他同寝室的尹雪曼回忆，他每天早中晚都要洗脸，而每次洗脸两三盆水，香皂、雪花膏再涂抹之，个子不高，留个大背头，很潇洒，他是一个典型的“刘秋英迷”。大概迷得有点一塌糊涂，他邀刘秋英与他在西安街头合演一出街头剧：刘秋英饰演女儿，他饰爸爸，因为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爸爸带女儿逃亡到后方，靠卖唱为生；这天女儿唱啊唱啊，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母亲，忽然悲从哀来，哭将起来；这一哭，当然唱不下去；唱不下去，听众哪还能给钱，于是父亲不禁大怒，拿鞭子就打……，但这不过是剧情，并非真打。哪知道那天，他们二人表演此剧时，偏巧前一天刘治国去找刘秋英献殷勤遭拒，碰了一鼻子灰（传说）。于是，到了第二天演戏，刘治国竟然假戏真做，老实不客气地在饰演女儿的刘秋英身上用鞭子真抽起来！两鞭子抽下去，刘秋英疼得嗷嗷叫，爬起来就跑，戏装没下，戏也不演了，一口气跑回宿舍，立刻大哭大叫起来。

当天晚上，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湖南同乡会、还有刘秋英的几位粉丝来找刘治国兴师问罪。

与刘治国形影不离、好似保镖死党一样的一位法律系彪形大汉——王姓同学挡在其间，刘治国却毫不理会，只管洗脸。加上其他同学阻挡拉扯，事情竟然不了了之。湖南籍同学只好偃旗息鼓，收兵回营，另谋他策去了。后来，学校很快南迁，刘治国未到陕南，这个故事也就未再发展，只流传于校园了。

这就是“二刘事件”的始末。它使人深切地感触到抗战时期虽然大敌压境，但临大学生还是不畏强敌，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学生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浪漫情调。

警报声中的西北联大武装考试

抗战中的汉中，西北联大的师生们常常听到警报声和遭遇日机频频轰炸。

1938年11月4日，在汉中南郑县集训地，西北联大为期两月（自1938年9月8日开始）的军训——陕西省学生集训队陕南支队受训结束，并迎来考试之日。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模拟军事训练竟然赢来了一次携带枪支、刺刀、子弹袋的实战武装考试。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军训总队部已经通知：除了免戴钢盔以外，其他武器均要随身佩戴。卫万瑞同学在其《集训日记》中回忆说：“这种考试在我一生考试中，算是破题儿第一次”。

考试当日，军训教官还没有将考试题目写完，警报钟声即起，教官掷下粉笔夺门而出。武装考试的学生们也一窝蜂似地扛起枪来，撒腿就跑向城外。卫万瑞与一位周姓同学躲在一片树林的两个墓冢之间。

不一会儿，八架、九架……相继有二十六架日机在汉中城上盘旋。哒哒哒……我方高射机枪开始射击，日机炸弹爆炸。同时，汉中西关机场我方飞机应声而起迎击。一团团的黑烟由地而起，弥漫天空。卫万瑞清晰地看见我三中队的飞机在自己的头上盘绕飞过。

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申健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汇荃）、陈忠经（翹）、申健（振民）。这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以及熊向晖的说法。

申健（1915—？），化名申振民（刘少奇在一张任命书上改其名为“申健”）。1937年至1939年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学习。1938年5月，西北联大共产党地下组织以杨剑秋为介绍人，发展申健以化名陈松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杨剑秋向申健传达党组织决定，指示申健去胡宗南的战时干部第四训练团（在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受训，并打入敌人内部。受训毕业后任三青团西安市分团部干事长、书记，兼任宝鸡工合事务所主任。1945年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议。抗战后，熊向晖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汇苓）与申健结婚。1947年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赴美西保大学留学，1949年6月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社会部、中央军委联络部科长、驻印度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司长、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1950年，申健以中国驻印使馆政务参赞的身份在印度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5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台湾特务机关炸毁，申健被派到新加坡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随后又到万隆参与了周恩来的保卫工作。1960年12月，申健出任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文化大革命期间，申健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主持了中联部工作，为动荡时期维持党对外的正常交往作了很多工作。文化大革命后，申健出使印度，出任中国特命全权驻印度大使，为恢复中印友好关系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后，他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对外关系研究工作。1987年任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

西安临时大学校友：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

杨守正，曾用名田冲、田大聪，浙江上虞谢塘人。1935年就读于北平大学（后肄业），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习，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南迁前，他北上抵延安，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起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支队（三五九旅补充团）政治教员、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代主任、湖南人民救国军三支队政治部主鄂南嘉蒲宁县长，中原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吉林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东北工业部设计处处长、重工业部设计司司长，国家计委设计计划局副局长，国家建委标准定额局局长，辽宁省化工石油厅厅长，中共辽宁省委副秘书长，1964年起，任中国驻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苏联大使。1985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外交学院、解放军外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1991年被选为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

联大学生龚人放与老师曹靖华



龚人放为吉林双阳人。满族。生于1915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学毕业考入师生以苏联人为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奠定了良好的俄语口语基础。1935年只身入关，复入东北大学学习，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此时结识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和北平东北大学任教的著名俄国文学翻译家曹靖华老师，从而影响和奠定了其一生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人放于1938年入西北联合大学，复与在此任教的恩师曹靖华相遇，并在老师遭遇教育部无理解聘时联名上书要求收回成命，因此虽然成绩优异，却在1941年于西北大学俄文商学系毕业时，不能留校，只能在汉中中国银行谋得职业。在一次从西安往汉中押运现钞的车上与前往西北大学赴任的马师儒教授相识，遂得于1946年任西北大学讲师，从事俄语教学。

1948年春，拟赴解放区，遂经南京与曹靖华老师进入北平，曹靖华任清华大学教授，推荐学生任清华大学讲师，一起教授俄语，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1949年12月5日，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俄语广播讲座”主持人，1950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西语系（1951年分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曹靖华任主任，一直到工作到1985年离休。

龚人放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俄语广播教科书，撰写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俄语语法书。著有《乐观人生》、翻译剧本《云雀在歌唱》（苏，科拉比瓦著）、《深入勘探》、《最后笑的人》（苏，克朗著）、《绿街》（苏，苏洛夫著）、《嫁妆》（苏，吉亚科诺夫著）、电影长诗《南极洲的发现》（苏，杜甫仁科著）、报告文学《天涯海角》、《执行法院判决》（苏，高尔基著）。专著有《俄语语法》（上下册，中华书局，时代出版社，1953）、《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俄语语法、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译著有《教育子女的艺术——

一个母亲的笔记》(苏, 马霍娃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主编有《俄语百日入门》等。

他与老师曹靖华在北平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数度别离, 又数度重逢, 一起开拓了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纪元。